

海明威

第一部 (1899—1919)

第一章 “我是可以写一部有关橡树园的精彩小说”

—

20 世纪初叶，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园镇地处芝加哥市的西郊，距离芝加哥商业中心只有九英里，通过芝加哥西北铁路以及湖街高架公路这两条公交干线与芝加哥市中心相连。克莱伦斯·埃德蒙兹·海明威医生，朋友们都称他为埃德，对城市并不感兴趣，不过每年两次他总爱带着孩子们到公共娱乐场去看林林兄弟马戏团的表演；周末的时候，他有时也陪着他们去参观自然历史实景博物馆，它座落在曾经举办过 1893 年世界哥伦比亚展览的原美术大楼里。孩子们推开了庙宇式建筑的沉重的铜门，走进去时，常常会稍停片刻，满怀敬畏地望一望圆拱之下呈争斗状的两只大象，然后再匆匆跑进去察看正在展出的柱牙象骨骼以及其他奇观。厄内斯特·海明威 10 岁时，他最喜欢的展厅是非洲哺乳动物大厅，那里有摆放在模拟的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哺乳类动物：猎豹、狮子、疣猪、大羚羊、犀牛、水牛、大牝角鹿，还有斑点狼犬。在展柜中柔和的光线下，动物标本的玻璃眼球闪闪发亮，这很容易使年轻的海明威展开遐想，特别是当他像美国前总统那样穿上卡叽猎装的时候。这些动物都是活生生的，而他自己就是在非洲狩猎征途中的西奥多·罗斯福。

更多的时候，孩子们是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坐车进城。那些年里，她常把六个孩子像赶羊似地赶上艺术学院宽大的楼梯。她以家庭的名义在那儿享有常年会员的资格，可以去观赏荷兰绘画大师们的名画集锦。埃尔·格里科的“想象中的处女”，是该院 1906 年获得的名画，其价格之高颇有争议。他们还可以参观当时学院推出的各种巡回展览，尽管人们怀疑母亲自己恐怕只是匆匆扫了一眼马塞尔·杜尚的“裸女下梯”以及 1913 年曾在纽约阿莫利展中展出过的其他一些破旧立新的绘画。有时候，她也会给孩子们买票到音乐大厅去欣赏由弗雷德里克·斯托克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或者去由路易斯·沙利文设计的巨大的椭圆拱形礼堂观看大型歌剧演出。那些年里，高雅的文化在芝加哥正迅速传播，而在音乐和艺术领域里，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或如她有时自己签名时所用的霍尔·海明威）决意要让她的孩子们伴随着这些高雅文化而成长。

她对孩子们的远大期望得到了橡树园的帮助。除了有优秀的公共学校之外，海明威夫妇的家乡还有一座艺术中心、一座歌剧厅、两座剧院、一个交响乐团、一座宏伟的图书馆和一些特别优秀的教堂唱诗班。格雷丝对所有这些设施和团体都引以为自豪，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唱诗班，有好几年都是由她指挥的。不过，该社区在文化上最负盛名的东西却源于一群她并不喜欢的建筑师。她对这些建筑师的作品的厌恶程度几乎就跟她讨厌立方体艺术和阿诺德·舍恩伯格的音乐一样。

二

1871 年芝加哥的那场大火灾之后，在橡树园小镇定居下来的男男女女们有 20 年之久都一直喜欢欧洲传统风格的住宅设计。最能代表他们所熟悉的建筑式样的房屋是两座斜对面地座落在北橡树园大道上的住宅：一座是海明威家孩子们的外祖母厄内斯特和卡罗琳·霍尔的塔楼式三层楼房，另一座是孩子们的祖父母安森和阿德莱德·海明威的白色楔形板式住宅。在这一时期，

橡树园镇的面貌是如此因循守旧，以致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他 18 岁的新娘在 1889 年来到这个小镇时，也没敢按照自己的本意决定为自己盖一幢与众不同的住宅。

直到 20 年后他与当地的一位名媛马玛·博思威克·切尼逃往欧洲之前，赖特一直在橡树园居住和工作，其原因是他觉得越来越有必要这样做。该社区不仅人口正在增长，——到 1902 年时，居民的人数将达一万人，几乎是 15 年前的三倍——而且它的特点也正在改变。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在文化知识上更为广博的一代公民正值跨入成年时期或正在移居该地。

在橡树园，赖特的男性客户不管是实业家还是专业人员。大多是大学毕业生；他的大部分女性客户则都在社区事务中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作为家乡的建设者，这些男男女女们都渴望着从传统的品味中挣脱出来，而赖特及其在所谓的“草原建筑设计院”的同僚们正好可以向他们展示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因为，通过将结构团块和形状压缩到最基本的形式：立方体、方格、平面、直线；通过大刀阔斧地削减维多利亚时代所崇尚的各种装饰，这些人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审美观。不久，他们的作品就将导致建筑设计业的革命，米埃兹·万·戴尔·罗也正是将用这种设计去震惊 20 年代。

从 1899 年厄内斯特·海明威出生，到 1917 年他离开橡树园镇去堪萨斯城从事新闻工作，在这期间由“草原建筑设计院”所设计的所有建筑当中，海明威最感亲切和熟悉的，一是由约翰·S.伯根为他叔叔乔治·R.海明威设计的住房，——乔治·海明威说话时惯常用冷嘲热讽的方式，这一点后来在短篇小说《印地安人营地》中有所反映；二是由罗伯特·C.斯潘塞和埃本·E.罗伯茨在 1905 年设计的那所高中，——八年之后，厄内斯特作为一名新生进入了这所学校。乔治·海明威的低腰屋顶式房屋正是赖特脑海中所追求的那种住宅式样：简洁的屋顶，宁静的轮廓；而橡树园与河林高中的砖石外墙的水平走线有力地表现出了草原建筑设计院的主题：水平格调是民主的象征。

然而，在埃德·海明威和格雷丝·海明威建造的家中，显然缺少赖特及其同僚们的思想。1869 年，海明威夫妇在北橡树园大道格雷丝父亲的错落有致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中开始了他们的婚后生活。自从妻子去世之后，厄内斯特·霍尔感到特别孤独，所以女儿和女婿搬来与他同住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事过九年，有了四个孙儿之后，老人因患勃莱特氏病去世，将房产留给了格雷丝和她的弟弟莱斯特。格雷丝立即宣布她要将其出售，并用她名下所卖得的那一部分钱来资助建立一所更为宽敞的住宅。八间卧室、一套供他丈夫使用的诊所、一大间供她自己使用的音乐室等，这些都是她脑海中计划的一部分。对埃德来说，她的计划过于昂贵，令人吃惊。但是格雷丝全然不顾他的反对意见，她对自己的梦中住宅盼望已久，不愿再考虑其他的事情。虽然最后她找来了一位名叫亨利·乔治·菲德尔克的建筑师帮助她设计蓝图，但 1905 年秋与 1906 年夏之间在北凯尼尔沃思大道和衣阿华街相交的角落上竖立起来的那幢长椭圆形的灰泥住房、其中很大部分的设计还是出自格雷丝之手。

从一个正在扩大而且异常活跃的家庭的实际需要来看，这所房子的规划倒也十分恰当。然而这房子也是格雷丝自我意识的一座纪念碑，这不仅仅因为那间音乐室最奢华最昂贵，而且因为它仿佛断然声称在她那众多的才华中还有一种对建筑设计的高雅品味，尽管结果并非如此。每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路过这所住宅去视察街对面他自己也在修建的住宅时，那一排高高在上的天窗以及下面那定位不佳的凹窗，恐怕只是让赖特感到难受的众多外表特征

中的两个。假如他曾应邀进屋，看到那奇形怪状的楼层结构和主要房间里那些形形色色的“装饰”，他肯定也会大为不悦。反正对于格雷丝的品味来说，草原建筑设计院的简洁的设计模式是过于平淡了。

问题在于：橡树园建筑大师们的成就是否对她那富有才华的儿子也毫无意义呢？在《午后之死》中，他曾宣称：“散文就是建筑，重要的不在于内部的装饰，巴罗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流动的圣节》中回忆自己早年在巴黎的日子时说：“每当我的写作开始变得精美，我就会发现我可以将那些建筑上的漩涡饰和修饰删掉，把它们全都抛弃。”这段回忆里所引用的比喻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最最基本的形式的力量，最简单的句子所能取得的准确、明了的效果，这些都是人们在探讨海明威的写作艺术时得出的结论，据称海明威能够达到这些效果是通过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的教诲。那么，事实上会不会是草原建筑设计院最早教会他在最为赤裸裸的表现方式中看到美的呢？

表面上看，事情并非如此。他的童年时代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对草原建筑设计院的见解有什么很大的兴趣，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他也从来没有在与人会谈时回忆起橡树园的外貌在他的成长时期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没有提到赖特在该社区那五彩缤纷的形象。但是，他的沉默令人生疑，因为他一向不愿意对故乡的生活质量说什么褒扬的话。

三

不管海明威是否真地说过橡树园这地方尽是些“宽阔的草坪和狭隘的头脑”，可这俏皮话的确说明了他的态度。40年来，他一直坚持说他讨厌那个地方，而且不止一次地逃离那个地方。对他来说，正是由于下面这种轻蔑的对比可以信手拈来，便使他很容易让世人相信这座小镇就是乔治·F·巴比特那庸俗市侩的福罗拉山庄的又一翻版。海明威在世时，在讨论美国文化的主要批评家当中，多少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郊区的生活往往过于沉闷，令人窒息。这种判断在评论家们方面来说是对事实的歪曲，但就橡树园而言，则是海明威故弄玄虚。不过，这样说也并非否认他在其中成长和生活过的小镇在有些方面的确是很拘谨的一个社区。

自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橡树园就禁止出售含酒精类饮料。清教徒严格的法律使影剧院在星期日只好关门大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镇里虽然地域宽阔，却没有一户黑人家庭居住。人们还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以阻止犹太人迁入该地。这里教堂林立，数不胜数，但除了一所教堂之外全都是新教教堂，因此这个社区一般被称为“圣眠之地”。1889年，该地选民们颇为自豪地拒绝了芝加哥让其并入该市的邀请。两年后，由于那些对沙龙文化见怪不怪的蓝领阶层的天主教移民们在西塞罗城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西塞罗城一个组成部分的橡树园的选民们又主动脱离了西塞罗市政府的管辖，以进一步将自己和美国多元化的生活隔绝开来。海明威高中时的同学罗伯特·圣约翰后来成了一位有名的记者。据他所说，橡树园的内部也充满了狂妄自大的势利眼，镇北“贵族”居住区的人们往往瞧不起地处高架公路以南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组成的居住区的人们。

每逢星期日，“圣眠之地”的教堂里常常挤满了人群，有些虔诚的教徒在家中也要顶礼膜拜。比方说，海明威在与外祖父霍尔住在一起的时候，房主不但进餐前要谢恩，就寝前要祷告，每星期有六天他还要主持一个宗教仪

式，就连厨师和整理房间的女佣也得参加。仪式开始时，他先从圣经上读上一段，然后再从一本名叫《日常所需的力量》的书上读上几段。接下来这一小群听众中所有的人都要在那条厚实的比利时地毯上跪下来，闭上眼睛。这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这样做，除了“阿爸父”以外。“阿爸父”是圣经上称呼父亲的词，儿孙们都这样称呼这位老人。老人皓首仰望苍天，深蓝色的眼睛睁得滚圆，粉红色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这位永远和蔼可亲的阿爸父和上帝说话时就像和一位朋友说话似的，尽管他用的那些词儿来自《祈祷圣经》。

海明威祖父的宗教性格更为严肃，至少在有一段时间里，他对上帝的虔诚之心占据了他生活中的更大部分。如果说厄内斯特·霍尔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回到家园时一心想在餐具批发业中赚上一笔钱，安森·海明威在交出了一个黑人部队陆军师的指挥权时却打定了主意要全力侍奉上帝。这样，他就谋求并且接受了芝加哥市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职位。与该机构的“方向盘”德怀特·莱曼·穆迪的友谊只不过是安森从他的工作中所得到的许多满足之一。此人后来作为一名福音传教士，事业非常成功。然而，年复一年，安森·海明威越来越感到用他所挣的那一点微薄工资很难支撑日益扩展的家庭。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终于弃职在拉萨尔大街上开设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最后他竟然有能力在橡树园的北区修建起了一所宽敞的住宅，将六个孩子全部送进了奥伯林学院学习，并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精挑穿着细究举止的派头。安森的精心修剪的指甲、细心修饰的灰色胡须和使用刀叉时的优雅姿态，这一切都象征着自从离开了基督教青年会之后，他已经是今非昔比。不过，他那基督教信念中的正直感丝毫未损。像他的朋友穆迪一样，他坚信人的意志就是一切。苦干是道德水准的基础，而社交舞会、玩牌赌博、污言秽语、酗酒成性、下流书刊则危及德行。

对安森来说，幸运的是比他大六岁的妻子阿德莱德完全同意他的这些观点，因为尽管他大谈什么意志力等，但他仍然是个非常惯于顺从的人。另一方面，有着玛瑙色眼睛的阿德莱德——她是伊利诺伊州惠顿学院植物学专业的毕业生，安森也曾在那所学校就读——是一个既熟知花卉的拉丁名称又很有自己见解的女人。尽管她在把她所有的自然科学知识全部教给她的孩子们方面有着无穷无尽的耐心，尽管她也很宽容地让她的孩子们在家门前的草坪上乱跑（她说：“我又不是在培养草坪；我是在培养孩子。”），但她决不能容忍她所认定的罪恶行为。

到了下一代人，她的儿子埃德则寻求将一些清教的清规戒律强加到他的孩子们头上，而且求助于他所娶的那位笃信基督的女强人。但是，格雷丝·霍尔的童年相对来说可是受宠惯了。她的母亲不让她干任何家务，这样格雷丝就可以集中精力学习音乐。至于那位溺爱子女的父亲，他已经建立起了有利可图的生意，早早就退了休。他的生活就是以宠她惯她为乐。结果，格雷丝在执行清规戒律方面没有她丈夫那么严格。她虽然同他一样认为烟酒皆为大逆不道，但打牌跳舞可没什么罪过。在她看来，打牌是娱乐，跳舞是很好的运动。海明威医生的婚姻不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妻子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错误的。

尽管在孩提时代格雷丝既尊父又敬母，对父亲的圣公会和母亲的公理会她同时都表示忠诚，可到了出嫁之时，她却确认自己是个公理会教徒。橡树园的第一和第三公理会教堂都是宗教自由主义的堡垒，它们的宗教仪式格雷

丝和梅明威医生在不同的时候都曾参加过。格蕾丝对宗教自由主义的信念甚感亲切，因为她坚信世间一切皆可制服，罪与恶的存在完全可以解释，就是为了让善与德有个对手，与之抗争，将其挫败。威廉·E.巴顿于1899年秋接职于橡树园镇第一公理会教堂，正好赶上为海明威夫妇的男孩做洗礼。他认为即便是死亡也是一件善事，因为死亡能激发起对上天回报的清醒冥思。正是本着这种观点，教会史学家理查德·尼布尔30年后说，宽厚的新教相信：无怒之神凭依无十字架之基督的帮助将无罪之人引入一个无需裁判的王国。

正如海明威的小说最终将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样一种信念对于人类的苦难是一种侮辱。但是，绝对没有证据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海明威就屏弃了父母的宗教前提。虽然他在回忆中将自己描绘成反叛者和逃亡者，人们却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曾拒绝前往教堂。既然他的父亲和母亲坚定地认为他必须去，也许他觉得违抗他们的意志是徒劳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他顺从听话、乐于讨好父母时就难免有一种痛苦，或许这恰好显示出他自我克制的力量。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他被迫去听的那些布道对他倒成了一种得到安慰的源泉。他常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恐怕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因为正如他后来的作品所揭示的，他的童年常常萦绕着对死亡的恐惧，其理由他无法与任何人进行交流。牧师们不断地肯定开明的基督教徒不必畏惧冥冥之中的幽灵，这或许倒有助于他防止凶神恶煞无法近身。不论是哪种情形，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童年时代他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并无丝毫的抗议；他当时的行为与汤姆·索耶相去甚远。1913年春的一个星期日的早晨，13岁男孩的高亢的锐气确实曾使他一时冲动，可他当晚就给父亲写了正式的书面道歉。（“今早我在教堂的行为很坏，我明天一定表现好。”）此后果真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在参加普利茅斯联合会的活动时，海明威对他父母的信仰所作出的承诺，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青年人的组织每星期五下午五点钟左右聚会，地点是第一公理会教堂。在掌管该团体财务期间，厄内斯特负责处理其用于慈善活动的钱财。此外，他还帮助管理计划委员会，偶尔也到傍晚的宗教仪式上去讲演。联合会也有较轻松的一面，对他来说也很有意义。联合会主任玛丽·科尔·亨特懂得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玩得痛快。为了做到这一点，她组织了去德斯普兰斯河的郊游，上演过戏剧，还在教堂里安排过社交聚会。马塞利娜·海明威与弟弟同时参加了联合会。用她的话说：“第一公理会教堂成了我们的社交中心。”

在普利茅斯联合会举行聚会时，唯一的遗憾是巴顿博士不准许跳舞。甚至在人们向他指出街对面的唯一神教堂就无此规定时，他的反对意见仍毫不动摇。另一方面，在海明威医生就这一问题与格蕾丝进行了几次不愉快的冲突后，他最终取消了对这一举动私设的禁令。在橡树园高中读一年级时，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双双获准可以参加由殖民地俱乐部贝尔·英格兰姆小姐举办的舞蹈课，也可以在学校参加跳舞活动。三年后，格蕾丝决定在家中为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举行一次新年除夕舞会，从而宣告了自由意志论的彻底胜利。浅蓝色的请柬送出了81份，舞会节目单也在大门口分发，交响乐队演奏起生气勃勃的狐步舞曲和方形舞的老式曲调。餐厅里的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

20年代，巴顿博士之子布鲁斯则会将其父亲的自由理念庸俗化。他在《无人知晓者》这一本异常成功的书中将耶稣描绘成了一个超级推销员和粗野雄壮的男子。

肴。恐怕厄内斯特最喜欢的就是这些食品了。他那双大脚又笨拙又不协调，在舞池里构成了一种威胁。不让他跳舞使他很难受，可一旦禁令取消，他又觉得那无所谓，可有可无了。

四

橡树园在文学上的品味不难归纳，完全是英国文学占据优势。在藏书异常丰富的当地图书馆中只有少数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较为齐全、但从莎士比亚以来的每一位英国权威作家的作品却应有尽有。图书馆中美国现代小说的藏书特别贫乏，根本没有弗兰克·诺里斯或西奥多·德莱塞的作品。在1916年以前，甚至连一本斯蒂芬·克兰创作的《红色勇气勋章》都没有。

在橡树园高中，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上学的那年（1913—1914），一年级新生英语课的必读书目中包括有圣经故事、古老的英国歌谣、坦尼森的《国王田园诗》、柯勒律治的《老船工之歌》和沃尔特·司各脱的《艾凡赫》，再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在二、三、四年级，要求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阅读的有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班扬的《天路历程》，艾狄生、麦考利和卡莱尔的文章，乔治·爱略特的《织工马南传》，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乔叟、米尔顿、蒲伯、雪莱、济慈、布朗宁以及马修·阿诺德的大量诗选，可完全没有美国作家的作品。此外，教学的环境更令学生们意识到英格兰的存在。尽管从外表上看，橡树园高中是典型的美国式建筑，但上英语课则是在牛津教室里。这间教室里特别配有宽大而且多层的装有彩色玻璃的竖铰链窗户，有浮雕横梁的天花板、花砖地板和一排排高背橡木椅，前面的墙上有铜制的壁式烛台，壁炉前有一条巨大的橡木长凳，壁炉大得足以放下一整段圣诞节原木。壁炉的一面还雕有乔叟的诗句：“教得愉快学得快乐”；另一面则是两个希腊词，意思是“最佳”，该校正是将其作为它的座右铭。

具有强烈亲英倾向的海明威一家，看不出牛津教室里有什么不适宜的地方，对里面所教授的课程也毫无反感。实际上，格雷丝的双亲都出生在英国。作为他们的女儿，格雷丝总是在寻找机会强调自己的出身。为此，她特意根据英格兰的温德米尔湖来给位于密执安北部的家庭避暑别墅命名，结果最终别墅的名称被讹传为温迪米尔。她将橡树园家中的书架上填满了英国作家的作品，有莎士比亚、司各脱、狄更斯、萨克雷及史蒂文森。当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从语法学校毕业时，他俩都勉强读过绝大多数这类书籍。少年时代，厄内斯特每年夏天在密执安都会见到他最要好的朋友比尔·史密斯，他们都喜欢谈论英国现代小说。厄内斯特对美国文学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从杰克·伦敦和欧·亨利的风格在他中学期间所写的短篇小说中就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上可以看得很明显。厄内斯特也很推崇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西奥多·罗斯福的《非洲猎径》和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其中的牛仔英雄的行为准则被威斯特追溯到了中世纪英格兰的骑士精神。出于对当地一位居民的好奇心，这孩子还可能熟悉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小说，因为《人猿泰山》（最初发表于1912年的一本杂志）的作者于1914年将家搬到了橡树园，并在那儿写了几部续集。不过，在厄内斯特长大成人之前，大体上说，美国文学一直都是尚未开拓的领域。

他选择了老师们所喜爱的文学，这一点表明他广泛接受了橡树园高中的价值观念。学校的优秀标准就是他的标准，而且他永远都是个竞争者，他拼

命努力来达到这些标准。除了平均成绩达到 90 分以外，他还在学校管弦乐队拉大提琴，在合唱团唱歌。他既是学校男同学辩论社团的成员，也是男同学步枪俱乐部的成员。有段时间他管理过田径队，担任过水球队队长。三年级时，他在轻量级足球队踢前卫；在四年级还参加了学校代表队，虽然是一个并不怎么样的校队，他充当二线防卫；他还获得过校级游泳好手的称号。他为文学杂志撰写短篇小说，为学校的报纸报道体育和音乐活动，另外还为校报撰写林·拉德姆式的专栏文章。

虽然学校里有些老师让他感到厌烦，但他很喜欢范尼·比格斯这位身材苗条、为人宽容、戴着眼镜的老姑娘，就像哈克·费恩所说的沃森小姐。但是，比格斯小姐笑起来很美，在马塞利娜的记忆中她就是如此。对厄内斯特来说，比格斯小姐所教授的短篇小说课和报刊阅读课比其他课程都更有意思。谈吐机智的玛格利特·狄克逊教授高年级英语，他是海明威尊敬的另一位老师。和学校里别的足球队员一样，对校队教练鲍伯·朱普尔，海明威也是望而生畏。这位教练的佯攻计划很快就使他应招去伊利诺伊大学，在那儿他将作为“红色庄园队”的教练而出名。

1917 年春海明威毕业的时候，在橡树园高中录取的大约 900 名学生中，很有可能是有过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但他却不是其中之一。他在毕业纪念日那天的讲演大受欢迎，他在毕业操练典礼上举止严肃，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以校为荣的强烈感情。第二周，他又收到了第一公理会教堂男生部的主管劳埃德·哈特的邀请，去向一群都是小男孩的听众就自己在高中的经历谈谈“比较深刻的东西”。尽管厄内斯特在教堂的讲话未能保存下来，但他在那儿出现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就很清楚。如果“哈克·海明斯坦”（他有时这样称呼自己）果真对其学校的“文明”表示叛逆的话，哈特先生就会邀请别人去演讲

五

尽管在橡树园镇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对保守的、“墨守成规”的共和政体忠心耿耿，但是另有一种把新老版本的共和政见联系到一起的政治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格蕾丝和埃德·海明威都对其父辈在战争中的经历感到自豪。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公民来说，正是美国共和党保护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仍然十分重要。而且，当美西战争中的莽骑兵英雄继任总统时，对他们来说，他们那种将共和政体与美国精神划上等号的做法就获得了新的含义。然而，在西奥多·罗斯福使用美国的过去来作为美国性格的原型的同时，在他重申男子气概、个人荣誉、爱国责任以及其他传统美德的重要性的同时，他还表明了一个进步党主义的观点：没有最新的智能，社会就无法保持其强大。进步党主义的格言就是专业知识，这自然也就吸引了专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律师、作家、编辑等等。总之，就是这样一些人成了海明威家的邻居。

由于刺客的子弹击倒了麦金利总统，侥幸来到白宫的西奥多·罗斯福于 1904 年要求选民拥护他连任，橡树园全力以赴地支持了他。1910 年 12 月，当他作为前总统来到该镇时，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抬着他从火车站出发，穿过了一条条挤满了向他欢呼的崇拜者们的街道。崇拜者中间有这么两位，一位是白发苍苍的安森·海明威，尽管他从未有意识地与民主党决裂；一位是他 11 岁的孙子厄内斯特，为了这个场面他特意穿上了他的罗斯福式的卡叽猎

装。1912年，当罗斯福以“进步党员”的选票再次竞选总统时，罗斯福热又席卷了橡树园。

但是，证明了橡树园镇进步党主义表现的并不仅仅是对罗斯福的狂热。1907年，当简·亚当斯走出赫尔堂就诸如工业教育之需要和慈善与社会进步之关系等问题发表一系列讲演时，每次她的听众都挤满了大厅。同年，橡树园为伊利诺伊州平等选举大会尽了地主之谊。两年后，“19世纪俱乐部”中那些热心公务的成员及镇上其他活跃的妇女发起了一场强有力的运动，以便在学校董事会中争得一个女性的席位。为了赢得人们支持妇女在地方和州级选举中享有选举权，橡树园的男男女女们还向斯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请愿，在全州上下各处演说，举行筹款宴会以及游行等。在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确保美国妇女选举权的前八年，橡树园的妇女们便就地方性事务首次进行了投票。在地方报纸《橡叶》上，有一小批当地的妇女——确切地说是三位——当人们提到她们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用她们自己的而不是用她们丈夫的名字。她们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安娜·布朗特博士、肖托夸镇的讲演者贝尔·沃森·梅尔维尔以及著名的声乐教师格雷丝·霍尔·海明威。

六

按照诗人艾伦·泰特的话说，海明威具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心灵和强大的选择性观察能力”。可以想象，海明威本可以用一本小说的篇幅来叙述他在橡树园的童年生活，并公正地评判该镇的复杂性和各种矛盾。他曾经试过，但未能成功。1952年，他向耶鲁大学的一位年轻的文学研究者查尔斯·芬顿解释道：“我是可以写一部有关橡树园的精彩小说，但我不会去写，因为我不愿伤害活着的人。”这一说法显然不是事实。他的小说伤害了很多活着的人。千真万确，在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中，他不仅将活着的人描绘得丝丝入扣，而且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如果说他放弃了写一篇有关他早年在橡树园生活的小说的打算，如果说他基本上在短篇小说中回避了对该社区的描写，只是在—篇短篇小说中将其伪装成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小镇，在另几篇短篇小说中又从遥远的角度以倒叙的方式瞥视了它几眼，那只是因为用大量的篇幅来处理这种场面，对他来说过于棘手，而个中的原因与他所受的教养有关。

由于他母亲的干预，海明威没能享受到正常的童年生活。然而在日后的岁月里，他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他成长的环境。无论何时他听说学者们对他性格形成时期感兴趣，他的反应就是有所警觉。比如，查尔斯·芬顿曾告诉他打算在一本有关“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学习成长过程”的书中写进有关橡树园的一章，可话没落音，这位小说家就要求他“歇手停笔”。他的声调极不耐烦，却没能掩饰住他自己的紧张不安。他对芬顿说：“如果我写过橡树园，你就有理由去研究它。可我并没有写过。”在与其他学者交往的场合，他宣称在他死后的100年内，不要写有关他的传记。他曾经给处理他财产的遗嘱执行人下达过明确的指示：“凡我有生之年写的任何信件都不得发表。”

当然，任何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对母亲确实总是耿耿于怀。海明

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查尔斯·T.拉纳姆少将曾写道：“从我与海明威交往最早的岁月开始，他提到他母亲时总是称‘那个贱货’。他对我说过恐怕有一千遍他对她的怨恨有多深、有多广。”至于到底有多深多广，他除了责怪她像猎犬一样将他的父亲逼入坟墓之外，对其中的原委却从未道出一丁点儿。

第二章 奇思异想

—

埃德·海明威与格雷丝最初相遇是在少年时代。当霍尔一家在海明威一家街对面的新房子安顿下来后不久,年仅 15 岁的埃德就注意到了那家有两个孩子: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是女孩,另一个年纪小一点,是男孩。那女孩特别显眼。格雷丝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性发育成熟,早已拥有自己想成为的歌剧女主角那样高高隆起的胸脯。淡蓝色的眼睛,白晰的英国式的皮肤,玫瑰色的双颊,苗条可爱的胳膊,外加上她那头亮闪闪的栗发,这一切都使她格外引人注目。

尽管格雷丝有成年女子的外表,可她仍然是个行为像男孩子的顽皮姑娘。在移居橡树园之前,霍尔一家住在芝加哥,街坊邻里都知道格雷丝这姑娘会骑自行车。这车属于她的弟弟莱斯特。19 世纪 80 年代像这样的自行车大多是前轮大,后轮小,容易翻倒。因为骑自行车有可能会使身体受伤,因此人们一般不主张女子骑车。然而有一天,格雷丝却从莱斯特手中推走了他最引以自豪的东西,而且还擅自穿走了他的一条裤子。当她沿街骑车时,乍看上去还挺像个男孩。有一家店主看到后愣了半晌才恍然大悟。他向一位顾客喊到:“快来看啊,那骑车的是个女孩!”莱斯特比格雷丝小两岁,但在学习上要棒得多。在橡树园高中,他所有的功课都很出色,特别是外语,而格雷丝的拉丁语和自然科学才勉强及格。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以后,莱斯特攻读法律,最后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儿他因代表美籍日本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委托人打了几场反对种族歧视的官司以及他对古希腊文的渊博知识而出名。格雷丝总是很高兴来到海滨她弟弟的家里拜访。当她最后于 42 岁生下第二个儿子时(也就是还差几个月厄内斯特就满 16 岁时),她很高兴地给他取名为莱斯特。不过,在孩提时代,在格雷丝对弟弟的羡慕中充满了嫉妒。因为,家中新添了一个婴儿,就不可避免地结束了她对父母注意力的垄断,而格雷丝这种类型的人总是想独领风骚。另外,当莱斯特八九岁时所得到的行动自由比她所得到的要多,就因为他是男孩,而她是女孩。生性顽皮的格雷丝感到社会对男女的规定难以忍受。后来使她投身于妇女参政运动的那种决心同她抓过莱斯特的自行车时想要革除不平等的那股勇气别无二致。

厄内斯特·霍尔是他女儿的偶像。每当父女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爱考问他那经过艺术处理而显得高贵的家庭背景和在她看来非常浪漫的早年生活。他那英籍的外曾祖父,英国唐克斯特郡的爱德华·米勒,曾是一位作曲家,也是很有水平的风琴演奏家,获得过牛津的音乐博士学位。爱德华之子威廉·爱德华是当时英国最有造诣的小提琴家之一,并自豪地拥有一把史拉第维制作的小提琴,那是一位印度王子的慷慨馈赠。威廉·爱德华的女儿玛丽嫁给了查尔斯·霍尔,他在设菲尔德也曾以高超的银器制造艺术为自己赢得了声誉。1840 年,他们的儿子厄内斯特·霍尔就出生在设菲尔德。

童年时代,厄内斯特·霍尔就读于伦敦的一所公立技工学校——圣耶稣学校。他曾指望父亲将他送往牛津或剑桥,但由于电镀制品的发明,查尔斯的收入急剧下降,他只好收摊搬离,在衣阿华州戴尔斯维尔的一个农庄安了家,就在密西西比河的迪比克港市以西。因想受教育的梦幻破灭,厄内斯特·霍尔深感苦恼,16 岁时,他离家出走。离别前,为了发泄他对农场生活的感受,

他将父亲的一群马赶进一条河中淹死，那情景就像与他同名的作家后来所描写的在土麦那海湾里驮运行李的骡子断了前腿被淹死的情景一样。在随后的四年中，他在沿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几个小镇上当普通劳工，在船上当水手。南北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衣阿华第一骑兵团。不到一年时间，他就退役了，因为南部联邦的一粒子弹永久地留在了他的大腿中，从此使他不能再骑马。

对于女儿提出的所有问题，厄内斯特·霍尔都给予了直接了当的回答，例外的只是有关他的军事生涯的事情，因为他受伤的情况有点不明不白。在他的“伤残退役证书”上写着：他受伤是“在服役期间，尽管并非是在正常执行勤务期间，由一个手持武器对抗美国权威的敌人所造成的”。他坚定地拒绝对此事作出解释，由此曾引起一些谣言，起初是在衣阿华，后来又在伊利诺伊。人们说他是个逃兵。但他的女儿将他的缄默作为他骑士风度的进一步证明。她的儿子厄内斯特在成长的过程中耳边就一直回响着她的话音：她是根据她所知道的最优秀、最纯洁、最高尚的人——厄内斯特·霍尔——为她儿子取的名字。也许看来只有积累起比老厄内斯特更多的枪伤，小厄内斯特才能有希望在母亲的眼里超过外祖父。然而，格雷丝并不是从她所想象的具有骑士风度的父亲那里学会了那种风风火火、出头露面、我行我素的脾气。她所学到的这种性格要归功于两位女强人。第一位就是她的祖母玛丽·米勒·霍尔。正如格雷丝自己所说，她的祖母“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妇女”，在她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是“专横跋扈”的角色。在她孙女所了解她的所有那些年月里，霍尔祖母一直是个寡妇。然而，用格雷丝的话说，甚至在她晚年孤独的岁月中，她仍然是“健壮能干、无所畏惧”。格雷丝曾特别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过祖母“在想要横穿铁路时看到火车移动得并不很快，她就低头从铁轨与火车之间钻了过去；在城市的街道上她总是抢在车辆之间或车辆前面过街。她似乎过着一种受着魔法守护的生活”。也难怪格雷丝有胆量骑她弟弟的自行车！她曾见过祖母的行动。

教会格雷丝勇敢好斗的另一位人物便是她的母亲。卡罗琳·汉考克的父亲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船长，在妻子意外身亡之后，他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乘坐一艘货轮绕过了合恩角，希望有机会能够在澳大利亚务农，重建他们的生活。可是那儿的生活并未能使汉考克船长喜欢，他便举家来到衣阿华州富饶的戴尔斯维尔务农，在那儿他的女儿爱上了厄内斯特·霍尔。她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证明，卡罗琳也很喜欢冒险，而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次经历发生在她婚后的第七个年头。芝加哥大火灾发生的当晚，卡罗琳和厄内斯特·霍尔的家被烈焰吞没。他们总算活着逃了出来。当时卡罗琳正怀着一个月的格雷丝，但她转身又冲进屋内。小时候她在戴尔斯维尔时，人家给了她一架便携式风琴，叫作手风琴，她把琴带到了芝加哥。她丝毫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浓烟和烈焰中找到了那宝贝乐器并拖了出来。

卡罗琳生性固执，在与厄内斯特·霍尔的婚姻中大权独揽。其结果是，他们的女儿格雷丝应努力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的决定很有可能主要就是她的主意。卡罗琳自己嗓音优美，但她觉得格雷丝的嗓音中含有华贵的意味。当这孩子还在上语法学校时，母亲便适时地给她安排了声乐课、钢琴课、提琴课。从橡树园高中毕业以后，格雷丝没有像她的一些女同学一样去上大学，而是呆在家里一面勤奋学习外语——虽然她对学习外语的天资并不算高，一面继续自己的声乐训练，为高中学生上声乐课，梦想着有朝一日登台演出。她决心用格雷丝·欧内斯廷·霍尔作为自己的歌剧艺名，以此纪念父亲以及

音乐先驱、而且有可能也是为了纪念另一位女低音歌手，世界著名的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

很显然，格雷丝完全继承了她母亲的抱负，但也不是完全无忧无虑。根据她后来给孩子们所讲的故事，七岁那年她得了猩红热，使她完全失明。有几个月她都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她的父母心急如焚。后来有一天，当她坐在母亲的风琴前正试着弹个曲子时，她的视力竟奇迹般地恢复了，虽然同时她感到自己先天的弱视更严重了，而且两眼对亮光也变得格外敏感。她的孩子们对这个故事都深信不疑。但有关猩红热引起失明的报道即使有，也极为罕见。所以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她所患的是歇斯底里性的失明，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必须不负众望、必须严肃认真地学习音乐而产生的心理矛盾的结果。

1895年秋她的母亲死于癌症后，格雷丝的反应是表现出了一股子干事业的热情。仅仅三个星期之后，她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悲痛欲绝的父亲，狂傲地拒绝了未婚夫埃德·海明威所提出的马上结婚的恳求，乘火车来到纽约。她碰巧有机会与一位著名的声乐教师路易莎·卡比安尼共事。她不允许任何人妨碍她抓住这个机会。随后的六个月中，她任在学生艺术团，日夜苦攻音乐。晚冬时节，卡比安尼夫人为格雷丝安排了一场试听音乐会，请来了大都市歌剧公司的代表。他对格雷丝的嗓音十分欣赏，还说要和她签约。当然，这些都是格雷丝后来说的。在成名的楼梯上要攀登的下一步，就是参加麦迪逊广场公园的一个晚间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并未见报，尽管格雷丝总是加以肯定地说曾经有人予以评论，而且评论还非常不错。不管这事是真是假，这次音乐会却终止了她的音乐生涯。在广场公园的强光照射下，她头晕目眩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不论她的痛苦的根源是否源于她潜意识中知道自己会失败，她所经受的折磨的确是真实的，她无法再面对下一次的折磨。刹那间，一心想成为歌剧明星的梦幻就破灭了。那年夏天，与父亲在欧洲旅行的途中她才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到了10月份，在橡树园第一公理会教堂，她就嫁给了埃德·海明威。

二

如果说埃德在高中或在奥伯林学院期间对格雷丝就有了一种浪漫的兴趣的话，他一直过于腼腆而未表达。直到进入芝加哥拉什医学院之后，他才开始向她求婚。格雷丝对他的殷勤并不是不高兴的，这一点在1893年的一封信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信中她撒娇般地问他是否在职业上有资格为心中之爱开出处方。然而当她还问道他是否认为到剧院看戏在道义上是有错时，她表现出对他那清教徒式的习俗的不安。

在她的母亲患病的最后阶段，格雷丝几乎每天都见到她的求婚者。霍尔家的医生威廉·刘易斯向霍尔太太解释说，既然埃德·海明威在拉什医学院的学习已进入最后一年，而且他的住处又只有几步之遥，他干脆就请他来看护她。格雷丝对埃德为减轻她母亲的痛苦所做出的努力深受感动。当死神即将到来的时候，她和他越来越贴近了。既然他有六英尺高的身躯，肌肉发达的腿和胳膊，宽阔结实的胸脯和那只鹰式的鼻子，他当然是个富有魅力的男子，尽管他的下巴过小是个小小的不幸。他问道，她会考虑嫁给他吗？她回答说会是的。他又问，她是否能够考虑放弃在纽约继续学习的念头呢，她愤愤地从他的身边走开。直到事业的希望破灭之后，她才最终答应定下婚期。

她虽说同意了结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转回到传统女性的依赖和顺从

上来。新婚夫妇度完蜜月回来在她父亲家刚刚安顿下来，她便一门心思专门教起声乐课来。到年底时，她就收了男女学生 50 余人。她女儿马塞利娜后来宣称，他们的学费加在一起每月竟达 1000 美元。

海明威医生毕竟是羽翼初丰，开业之初，举步维艰。婚后头一年中，来就诊的病人寥寥无几，有几个月的工夫，他挣的钱不超过五六十美元。一旦格雷丝开始有了孩子，她的授课时数也锐减。她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丈夫的产科门诊收入虽不丰厚但却有了稳步增长。但是当他们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她是家庭的顶梁柱。当然，这种情况对她来说并不是完全出乎预料之外。埃德的那个很快就留起了范戴克式的胡须以便掩盖起来的过小的下巴，就象征着他性格中的弱点。比方说，在奥伯林学院当了三年学生之后，他突然犹豫彷徨，丧失了完成学业的决心、他并没有回校读完四年级。还有一个事实是，在他与格雷丝的角中，他极少占上风。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性格软弱的人正是格雷丝所要的那种丈夫。同时，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她又对他很失望，可谓失望至极。在他们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她经常采取鄙视的行为对海明威医生进行报复，一般来说总是以侮辱的形式。在家人和亲朋好友面前她总是装出婚姻美满的样子，不过至少有那么一次，她让她的面具滑落了一点。20 年代后期，她听到谣传说她那著名的儿子和儿媳要分道扬镳了。多年来，厄内斯特收到了母亲许多有关道德说教的信件，他肯定认为母亲对他的婚变极不赞成。然而她却用间接的方式流露出自己对婚姻的空虚感。1927 年 2 月 20 日她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听说你婚姻破裂，我很难过，不过婚姻大多如此。我对婚姻的看法非常摩登，不落俗套，只是不愿声张而已。”

格雷丝察觉到她丈夫生性懦弱，这一点在有些邻居看来也很清楚，因为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他很惧内。可在橡树园，人们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埃德的惊人的精力。他精力过于旺盛，简直不能静下来坐上几分钟。正如他的家人所知，他也不愿意让别人静下来。如果他走进房间看见哪个孩子身体躺着看书或思考，他马上就会问那孩子是否没有功课或无事可做。独处对他来说也很难做到，因为他喜欢一边做事一边谈论。在后院砍柴时，他也想要有人听他说话，就连他到地下室去装水果和蔬菜罐头、铸造猎枪子弹以及为外出狩猎钓鱼制作蜡烛时也是一样。

根据厄内斯特在那篇名叫《两代父子》的小说中对其父亲的白描，“海明威医生穿的那几套内衣满是他的汗臭味、即使刚刚洗完也如此。不管怎么说，真实生活中的这位医生总是从早到晚汗流夹背，忙个不停。除了在自己的诊所里为病人看病，上门出诊和在一家当地医院的产科工作之外，他还在周围的社区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为橡树园的一家孤儿院提供医疗服务，还为一家牛奶公司进行医疗卫生检验。有空的时候他还为男孩子兴趣小组讲解大自然，开办主日学校班，摆弄他收集的钱币、邮票、印第安人的箭头、印第安人的鹿皮靴，这还不算他那些制成标本的猫头鹰、松鼠，两只花栗鼠以及他儿时所收集到的一直泡在酒精溶液中的死蛇。有好些年他为家里跑腿采购还经常做饭。有个病人回忆说，在出诊期间，海明威医生还给家里打电话，对接电话的人说该把馅饼从炉子上拿下来了。

当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开始在学校学习生物学课程的时候，海明威医生

1900 年，海明威医生的收入为 2000 美元。20 年后，他的年收入增至 5000 美元。

将他们八年级的学生组成了一个阿加西俱乐部。周日上午，他带领孩子们沿德斯普兰斯河去野外郊游。不管他走得多快，讲得多么津津有味，他观察到的东西总比别人多：鲜红色的裸鼻雀或玫瑰色胸脯的蜡嘴鸟在树叉上筑窝，野生的獐耳细辛属植物从落叶下探出那紫色的花蕾，还有那非常罕见的纯白色的“印第安风笛”。海明威医生不但机警而且目光敏锐非凡。正如他的儿子在《两代父子》中所证实的那样：与小尼克·亚当斯站在密执安北部的一个湖边，亚当斯医生可以看见对面湖岸上自家的避暑别墅上正在升旗或有个女儿出了家门走到码头的尽头，而他的儿子却看不到任何旗杆或码头，只能看到湖岸的轮廓线和一片白茫茫的湖滩。尼克发誓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父亲“目光敏锐得像只大角羊，或者说像只鹰”。

海明威医生完全适合在森林中生活。他枪法准确，长枪短枪都在行；又是个钓鱼能手，熟知在野外生存的各种本领。作为两个年龄相差 15 岁的男孩子的父亲，他本可以满足于将自己的知识依次传授给他们，可是他一教起来，兴致勃勃，不能不把他的所知也教给他的四个女儿，特别是他的长女马塞利娜和充满男孩子气的四女儿马德莱娜，大家都叫她萨尼。

事实上，凡是海明威医生教会了他的孩子们去捕杀的动物，他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去品尝这些猎物。除了告诉他们经常食用的美味佳肴如鹿肉、鹌鹑、鹧鸪、鸽子、鸭子、龟肉、蛙腿以及各种鱼类该如何享用之外，他还向他们证明炖过的山拨鼠和炖鸡的味道非常相似，而烘烤过的负鼠，周围放上红薯，味道很鲜美。与他的年轻伙伴们在乡间野外漫游时，他告诉孩子们哪些草和果实能吃，哪些不能。他宣称野生洋葱做三明治的馅儿极佳，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尝试着做了一些，结果发现他说的没错儿。

按照马塞利娜的话说，“爸爸能使任何散步都令人愉快”。但是，如果她和兄弟姐妹们未能学会如何对付一些难题时，海明威医生的兴致会陡然消失。马塞利娜说，“父亲脸上的酒窝和迷人的笑容会突然变化，变得嘴唇绷紧、面容严峻、目光锐利，这是他严格讲究纪律的一面。有的时候，他从高兴到严峻的转变非常突然，对此我们毫无准备。刚才还在搂着一个孩子的肩膀，或者我们还坐在他的膝盖上，说说笑笑，可转眼功夫，由于我们的言谈举止不当或他忽然想起我们的什么过夫，他就命令我们回到自己房间，没准还不让吃晚饭。有时我们还会被横放在他的大腿上，挨顿痛打。每次受完惩罚，还要跪下请求上帝的宽恕。”她还说，犯了大错的话、他还用放任小柜子里的磨剃须刀的皮带抽他们，用苦涩的肥皂水给他们洗口，另外，有时几天不跟他们说话。他就是采用这些手段要孩子们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

他们的母亲有时也揍他们，偶尔甚至会用她的发梳而不是手来打。不过，她所施加的惩罚远远没有她丈夫那么凶狠，她发起脾气来有所克制，而他的脾气是爆炸性的。海明威医生一直都是一个严厉的训导者，这就是马塞利娜在其 1962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他那令人惊骇的暴烈脾气所给予的拐弯抹角的解释。海明威医生从他父亲的抽屉中拿了他那把古老的史密斯—韦森牌左轮手枪将一颗子弹射入了自己的脑袋。甚至在 34 年后，他的长女仍然不情愿谈论的情况是，有可能就她所知，他一直患有某种受压抑狂的症状。他那突发性的火爆脾气、忘我的狂热情感、偶发的精神崩溃（曾两次需要“休养治疗”），这些都是这种疾病模式中相对应的组成部分。这位个头高大、身材魁梧的医生总是心神不宁，从来都无法放松。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先是当丈夫，又是当父亲，他都感到不称职，对自己的无能总是耿耿于怀。他对孩

子们不听话所表现出的那种野蛮狂暴的反应隐藏着对自己痛遭挫折、壮志未酬的病态意识。他要求受到责罚的孩子们请求上帝的宽恕，但他本该要求自己这么去做。

三

在有些照片中，海明威医生的目光直盯着照相机镜头，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那紧张的神情就是他内心遭受折磨的痕迹。在父亲自杀身亡五年后，厄内斯特通过尼克·亚当斯非常懊悔地说，我们大家都以各种方式背叛了他。在他内心深处，海明威医生恐怕会有另一种说法。归根结底，难道不是他背叛了他的家庭吗？为什么不更勇敢些，坚持他所认为是正确的原则呢？

例如，他认为 1905 年格雷丝设计的房子对他们来说过于豪华，他们本应考虑他们收入的状况以及有多少张嘴巴在等着吃饭。还有在 1919 年，格雷丝本不该就为了她要避开家人而在他们夏季住所的湖对岸建造一幢小别墅，因此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然而，他没有坚持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更加简朴些，没有要求说他们应该有计划地存些钱，以便日后送六个孩子上大学对他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他反而任听妻子的摆布，让她为所欲为。（厄内斯特在《两代父子》中通过尼克·亚当斯的嘴说，我的父亲“既凶狠，又受虐”。）

不仅仅对住房，在其他方面格雷丝也很奢侈。在她婚前的那个夏天，她和父亲在欧洲旅行期间，她采买了许多礼服、帽子和 35 双手套作为她自己的嫁妆，从那时起她就定下了她一心要保持的服装要做工精细、格调优雅的标准。为了躲避橡树园的酷暑盛夏，每年夏天她都满心欢喜地到密执安的沃伦湖去，不过在那里更多的家务事就落在了她的身上，不像在橡树园，有很多佣人可供她使唤，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所以作为一种补偿，她就期望在夏季结束时，能去楠塔基特岛度过几周无忧无虑的假期，只带一个孩子做伴。在冬季，她偶尔去西海岸拜访她弟弟莱斯特或去南方访趣探幽。

在格雷丝的心目中，自己不仅出身名门望族，而且还是歌剧明星，只是由于命运不佳，才中断了音乐艺术生涯。至于她的丈夫，只不过是土里土气的产科医生，总是自寻烦恼。对她自我形象极为重要的是，在她生孩子的所有那些年月里，她都必须不时地应邀举行公开的音乐会，不过是在气氛亲切的沙龙，而不是在灯光耀眼的舞台大厅；而且，作为声乐教师，她还为人所需要，这样她就可以要求每小时收费八美元，决不还价。孩子们上床睡觉后，她还在钢琴边坐下，谱写流行歌曲。其中有些还在卢普的一家乐谱公司出版了。尽管她的版税从来没有达到什么了不得的数目，但她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既像她的祖辈爱德华·米勒一样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演奏家和教师。然而，她的丈夫竟然敢叫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生活要简朴些！

海明威医生在有关道德问题的争吵中忍受了更多的挫折。格雷丝一会儿死不退让地振振有词，一会儿又戏剧化地头疼脑热，退回卧室，就这样她软硬兼施，迫使他屈服。海明威医生本来坚决反对让孩子们跳舞，可是格雷丝软磨硬泡，逼其就范。当他们在他们自己家里举行盛大舞会时，他在这个问题上羞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他遭受的更加微妙、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是在 1899 年 7 月 21 日他的儿子厄内斯特出生后不久，格雷丝开始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和他一岁半的

姐姐马塞利娜一样穿戴打扮，好像他们俩是性别相同的双胞胎。那或许只是溺爱孩子的母亲一时心血来潮罢了。但对她的丈夫来说，那是他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最大最深的耻辱。至于对厄内斯特来说，其后果可谓自相矛盾，但却意义深远。

四

当格雷丝发现头一个孩子是女孩时，她欣喜若狂。这是她自己的一个翻版，在女儿的身上，她可以实现她的母亲对她自己所怀的在音乐方面有所造诣的希望。要是依着她汹涌激荡的胸怀，她本来要给孩子取的名字并不是像别人所建议的那样是圣女的名字，而会是莫扎特的马塞利娜，即那位最后竟被人发现是《费加罗的婚姻》中主人公母亲的盛气凌人的大龄女子。

18个月之后，她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这一回是个男孩，格雷丝非常满意地给他取名为厄内斯特·米勒。厄内斯特是取自她敬爱的父亲，而米勒则取自她父亲的兄弟米勒·霍尔。然而她才刚刚用这种方式来赞赏这孩子的男子汉气概，便开始损害起这种气概来。在厄内斯特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照了不少的照片，其中有许多张他看上去就像个女孩，尽管没有哪一张好像是他两岁以后照的。在另一些照片中，他穿着很明显是女孩穿的衣服，只是他留的是男孩式的短发。还有一些照片中，他身穿男孩的服装，可头发有点像女孩那么长。

当然，在分析这些事实时，人们并不能假设在本世纪初小男孩的服装和发型就应该和现代的大致相同。在邮购订单和百货商场的商品广告册上的插图中，在诸如《服装裁剪》与《标准服装设计》等月刊画报上穿着式样的指南中，在那个时代的《圣·尼古拉斯》、《话匣子》及其他儿童杂志的插图和广告上，在与海明威同时代的美国人重新印制在他们传记里的小男孩的照片上，在贝特曼档案馆的文件及其他资料库中，人们都可以发现情况正好恰恰相反。80或90年以前，小男孩打扮的模样比现在要多得多。在那个年代，对婴儿的性状况尚未有所认识，一般的母亲在对此作出选择时，比起现代母亲来说所受的拘束要少得多。

19世纪最后几年以及20世纪最初几年出生在美国的大多数男孩，都穿裙子，一直穿到他们会走路为止。只是从那以后，才有不少男孩穿专门为男孩子设计的服装。在正式场合，男孩子的典型服装可能是带有白色滚边的海军蓝水手装，或者是带纽扣的士兵服加上灯笼裤、绑腿，还有一顶战斗帽，通常被称为“英国兵”或“莽骑兵”服；要么他们就穿上高雅的丝绒夹克衫配上灯笼裤。白色宽领的条纹衬衣加上长裤或短裤，就像罩衫和长袖印花衬衣一样，也是挺流行的非正式装束。

倘若一岁以后的男孩子仍穿女孩子衣服的话，一般总是穿套衫和女式灯笼裤或长到踝关节的裙子，再穿12至18个月。但在两岁半以后，他们大多换上男孩子的服装。在美国所有小男孩的总数中，到四岁或五岁还穿女孩服装的男孩不超过10%或15%。他们的裙子、外套、围兜比起小女孩穿的服装相应来说更需要裁剪加工，实际上有些为男孩子设计的有点女孩子气的服装带有明显的军人气派。前面带有一个宽大的褶皱袋使人想起苏格兰高地人的褶皱短裙，而身着裙子的男孩穿的夹克衫还常常装饰有军官的肩带或绶带。为两岁以上男孩子设计的带有女孩子气的服装，与女孩穿的服装相比，在所有细节上完全一样的不到三分之一。

在世纪之交，超过半数的小男孩在过了婴儿期之后都喜欢炫耀男孩子气的发型。有些头发理得很短，分开后向下梳齐，或者干脆从中间向四周梳，修剪整齐露出耳朵。还有的发型如今叫作平头。还有的在耳朵上面把头发弄成方形式样，叫作“荷兰小子”。从另一方面来看，1886年出版的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小爵爷方特勒罗伊》则引发了一股披肩长发的时髦风气。到厄内斯特·海明威正在成长的时期，这种风气对一小部分小男孩——包括托马斯·沃尔夫在内——仍有影响。在那个时代，偶尔也可见到小男孩留的是另一种女式发型，叫作“荷兰娃子”。这种发型在上额剪成刘海儿，两边在耳朵下面一些剪成平齐。

男孩的服装和发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合。但大多数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出这是个男孩。在一至二岁年龄组中，也许有多达20%的男孩的穿戴和发型使他们和小女孩无法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在性别上是可以区分的。留长发的男孩，通常是穿男孩服装，即使穿的是女孩服装，上面也有明显的男孩子的标记。完全穿女孩服装的男孩则要留短发。过了两岁，外貌酷似女孩的男孩数量下降到5%左右。有迹象表明，实际比例要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例如，一份抽样调查表明，600个二至五岁的抽样对象中，仅有一名男孩的性别无法从其照片中识别。1897年7月间的服饰杂志《标准服装设计》中有一张插图，画面上是个三四岁的孩子，细茸茸的披肩软发，身穿折皱叠罩衫，蓬松的袖子，小花边的袖口，宽花边的衣领。要不是插图下方图例上标着“小男孩的围裙”，人们都会认为这是个女孩。

在厄内斯特·海明威幼年时期的影集中，他的服式总是与发型相配套，这种打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脱离了大多数同龄的男孩子。并且，照片还显示出他在着装打扮上频频变换，这是非常异乎寻常的。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男孩子会像他那样不得不多次改变外形。这一怪异现象也应由其母亲负责。不过，更令人惊诧的是：格雷丝尽心竭力地制造小厄内斯特和他的姐姐是同性双胞胎这一假象。

后来，格雷丝曾就抚养厄内斯特和马塞利娜的方式解释说，她一直想成为双胞胎的母亲。这种解释有如马塞利娜的那个关于她父亲惩罚孩子是因为他是一个严厉的训导者的解释一样，只不过是兜圈子。在其他许多可能的解释中，最可信的是：厄内斯特的出生唤起了她对于弟弟莱斯特降生时的痛苦回忆。厄内斯特比马塞利娜晚一年半出生，而莱斯特比格雷丝晚两年。莱斯特即刻成为父母关注的焦点，就仅仅是因为他是个婴儿。稍大之后，他又享有其他许多特别待遇。比如，他拥有一辆自行车，而这就仅仅因为他是个男孩。如果格雷丝与小莱斯特是同性双胞胎的话，她的生活将会有多么美好啊！同样地，马塞利娜——她母亲的再现——将会过上更幸福的日子，如果她和小厄内斯特能够成为双胞胎。因此，甚至对于儿子的性别她都及早采取了措施加以干涉。

与马塞利娜一样，格雷丝也为第二个孩子准备了剪贴簿，并于孩子降生之日起就开始记录他的成长过程。她这样写道，1899年7月21日，阳光和煦。小厄内斯特重达九磅半，“胖乎乎的，体形标致”，声音深沉优美，红褐色的皮肤，“鼻子、嘴巴活脱脱就像外祖父厄内斯特·霍尔”，还有手和指甲“长得都跟外公厄内斯特一个样”，眼睛呈深蓝色，发黑且浓，后来很快就变成了金发。四个半月之后，在母亲眼里，他似乎“除了腿和胳膊的长度外，已长得与姐姐差不多大了”。当他的眼睛最后“定型为棕色而非蓝灰

色”时，把他与棕色眼睛的马塞利娜的外貌加以比较就越加顺理成章了。

出生后的最初几星期，厄内斯特总是穿一件婴儿服。格雷丝解释说，这衣服曾是“他妈妈的”。五个月大时，他经常穿一身“白色镶嵌有花边的上衣，佩着粉色蝴蝶领结，一双浅蓝色皮鞋，……这是马塞利娜周岁照片中的装束”。为了在照相馆拍一张正式照片，他母亲给他穿的“正是姐姐马塞利娜在他这么大拍照时穿的一件衣服”。约一个月后，格雷丝开始在给孩子购买衣服时什么都同样买两件，虽然尺码并不总是相同。

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第一次穿的相同款式的一身装束是钩针编织的无边帽，较长的短大衣和一直拖到脚踝的褶边斜纹布裙子。此后，他们经常穿戴的还有粉红色的方格花布衣，带巴腾贝格式花边的白色兜帽，或者是嵌有花边的绒毛罩衣，黑色优质的女童皮鞋，长筒袜，饰有花朵图案的宽边帽。1901年在外公霍尔家住宅后面拍的一张照片中，厄内斯特头戴宽边帽，身穿拖到脚踝的长上衣。格雷丝在这张照片旁写着：“夏日女孩”。在一组标有“1902年10月”的照片旁她记有一段话：“这几组照片是在厄休拉（海明威家第三个孩子）六个月时照的，厄内斯特·米勒三岁半，马塞利娜四岁九个月。两个大孩子的穿戴总是一样的，像两个小女孩。”至于他们的发式，格雷丝有时希望他们一致，有时则不。有一段时间，她把厄内斯特的发型弄成鲤鱼形，自然而蓬松地披散着，几乎跟马塞利娜的一样长。把头发理成小平头也是她的主意。不过，她最欣赏的发式显然当属前额上拱着的刘海儿，一刀切的短发刚好盖住耳垂，这也正是马塞利娜当时所梳的发型。不久，她开始称孩子们为她的“可爱的荷兰娃子”。

除了使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看上去酷似双胞胎之外，格雷丝还希望他们——照马塞利娜的话来说——“感觉就是双胞胎，什么都保持一致”。他们在同一间卧室睡成对的白色童床；他们的玩具娃娃一模一样；他们过家家的微型瓷茶具也是同一样式。后来，她又鼓励孩子们一块儿垂钓、一块儿散步、一块儿去朋友家串门。由于格雷丝有意阻留马塞利娜入学，所以姐弟俩同年跨入校门。不过，从幼儿园开始，厄内斯特穿的是背带裤，从此除了御寒大衣和织帽外，他和马塞利娜就不再穿戴一致了。

尽管姐弟俩的外貌不断变化，格雷丝总是告之这对“双胞胎”：他们长得很标致，唯有发色美中不足，令她感到遗憾。有一段时间，她曾满怀希望，以为厄内斯特的头发会保持金黄色，因为这意味着他主要是继承了母方霍尔家族的血统。然而，在他的发色变得跟马塞利娜一样深时，她不得不承认两个孩子在相貌上都像他们父亲的家族。不过，她常挂在嘴边的对漂亮的金黄色的溢美之词却在两个孩子尤其是在厄内斯特的心中烙上了永久的印记。在他的生活中，注定会出现一些金发姑娘。当然，表明他受母亲观点的影响有多深的最为有力的佐证，最后是由他第四任妻子玛丽提供的。玛丽在其自传中叙述道，结婚前几个月，厄内斯特说服她请一位哈瓦那的美发师把她的头发由花生褐色染成淡金色。“没办法，我只好答应。漂白后的发色竟使他欣喜若狂。对金色的神秘之恋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审美观念中，愈是金黄色愈可爱，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在格雷丝传给孩子们的对于头发的情感中，头发长短的性感问题也相当关键。例如说，在1906年夏厄内斯特七岁、马塞利娜八岁半时，格雷丝宣布姐弟俩的头发必须得剃成“男孩式样”，因为他们要到密执安湖地区呆一段日子。秋天，当全家回到橡树园时，马塞利娜几缕长长的头发显得参差不齐，

令她烦恼。邻居一个稍大的女孩表示愿意帮她修剪耳边垂下的几缕头发。虽说她担心“妈妈也许会气疯的”，但马塞利娜还是把剪子递给了那女孩。直到修剪完毕，马塞利娜才意识到那女孩儿几乎把耳轮顶端以下的头发全剪掉了。“我要你一辈子都记住这件事”，那天晚上她母亲气急败坏地责骂她。格雷丝并没有给马塞利娜吃板子，而是让她戴着婴儿睡帽以遮盖住被剪掉的部位。马塞利娜被迫戴着睡帽去上学，度过了痛苦而又令人窘迫的两周时间。最后，马塞利娜的二年级老师壮着胆子来找格雷丝，请她终止这种惩罚。一周后，脱掉睡帽的马塞利娜升入三年级，“我的新同学几乎不知道这段耻辱的经历”。

随后的五年，马塞利娜与厄内斯特分上不同的年级。但在七年级升入八年级时，马塞利娜辍学一年专心学钢琴、小提琴和声乐，这一切徒劳只是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愿望。复学后，她再次与厄内斯特同班。即便如此，同学们也不再把他们当作双胞胎了。然而，在母亲眼里，他们仍是孪生子这一幻想仍是事实（这就是让马塞利娜辍学一年的原因）。格雷丝强迫他们为她继续扮作双胞胎。即使无法再使他们看上去像孪生子，她仍还可以坚持要求他们的举止行为应表现得像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在孩子们念高中阶段，她想方设法使他们形影不离：她给他们两张戏票；经常不许马塞利娜与其他男孩一块儿去参加聚会，这样就能让厄内斯特作陪。当然，还有她心爱的剪贴簿。通过制作剪贴这一方式，格雷丝不断地给孩子们灌输他们的“孪生意识”。格雷丝所钟爱的有关姐弟俩的“孪生轶事”要不是借助于昔日的照片及题字的效力，厄内斯特和马塞利娜对这段“孪生子”的记忆也许就会逐渐在脑海中消失。

五

从他一来到人间起，小厄内斯特就被母亲格雷丝拥入了一个甜蜜温馨的小天地。有六个月格雷丝与他同睡一张床，任凭他轻拍她的脸颊，紧紧依偎在身旁，吸吮她那柔软的乳房。“跟妈咪睡一块儿，整夜吃个不停。他感到很满足。”她高兴地在剪贴簿上记录道。开始学说话时，他大着舌头称她“甜咪咪”。学会祷告唇，他就跪在她的膝盖上念。当母亲翻开一本关于禽鸟的杂志合订本教他识别不同的鸟类时，他觉得坐在这样一位聪慧、迷人、标致的女士身旁无比幸福。

不过，在快乐的幼年时代的某个时候，他突然觉醒，对母亲令其所处的境地有所感悟。25年后，厄内斯特·海明威开始以一个习惯而闻名，那就是：欺骗朋友熟人，使他们相信他们对他们有好感，而同时他又在正在创作的小说中嘲讽他们的某些陋习。一些怒火中烧的受害者或是借助文字或是当面指责他为十足的奸佞之徒。如果他确是这种小人的话，也许就是因为他认为在自己还不知道狡诈为何物时就早已是其受害可以肯定，许多时候他显得乐于接受别人强加给他的角色。在他童年的照片里，不难看到他和马塞利娜身着漂亮的连衣裙、头顶颜色鲜艳的帽子在外溜达的情景；既有他对着照相机又高兴又羞怯地微笑的镜头，也有他与马塞利娜饶有兴致地假装请对方喝茶的镜头。有时，他甚至还有可能主动地去从事一些女性化的活动。一天，在格雷丝的缝衣间，他对她手头的活发生了兴趣。“他迷上了针线活”、格雷丝不久就乐滋滋地讲述道，“他兴致勃勃，象模象样地缝补爸爸的一条裤子，这条旧裤子是妈妈特意留下来让他缝补的。”

不过，虽说这个小男孩有时甘愿充当与自己姐姐同样性别的角色，但他的反抗却更为强烈。他认为自己是个男孩，他妈妈哪怕对此意愿稍有触犯，他便会扬起小手打将过来。有一天，他象征性地“枪毙”了她。当时，她像往常一样把他称作她的荷兰娃子，可这回，那女里女气的称呼终于惹发了这个假女孩的雄威。“我不是荷兰娃子。我是波尼人比尔。砰！我毙了甜咪咪。”他还非常喜欢玩枪毙马塞利娜的游戏，而且每次马塞利娜都得“倒地身亡”。

格蕾丝很喜欢听他自称是波尼人比尔。她对儿子的行为一贯矛盾，令人捉摸不透。她是否真正有心希望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男孩呢？有时，她给他穿上男裤与衬衫来激发他的男性意识。虽然马塞利娜的迷惑没有她弟弟那么严重，但她也被从她母亲那儿发出的性别信号弄得有点糊涂了。因为，一方面她给这对“双胞胎”弄相同的茶具；另一方面，她必定会给他们买同样的气枪。在密执安北部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初的几个完整的夏季里，她又把在橡树园耍的那套穿戴把戏倒过来耍。她不仅把厄内斯特打扮成男孩模样，马塞利娜也一样。事实上，格蕾丝有时称他俩为“小伙子”或“小子”。1900年8月间马塞利娜与厄内斯特在沃伦湖拍摄的一张照片附有以下有趣的描述：“装扮一新的两个壮小伙子”。两年后，她为他俩设计的是：上身是束腰上装，下身是灯笼裤或绑腿。正如马塞利娜所述，这真是“一种不男不女的装束”，更令他俩大惑不解。1902年8月在沃伦湖的一张照片中，他们就是穿着这种男女两用装。两人坐着，你望着我，我瞅着你。马塞利娜长发披肩，厄内斯特留着短发。当时他手握气枪，枪口直指天空，枪把搁在两腿间。

与此同时，海明威医生则不断地寻找机会强化他儿子的男性意识。他开始带他出去打猎或钓鱼，尽管厄内斯特当时不足三岁。然而，对丈夫的此举，格蕾丝并未加以阻止。她没有说这个孩子太小，甭说猎枪就连鱼竿也根本拿不动等等诸如此类的话。相反，格蕾丝鼓励他去，说这是他展示自己是一个“小男子汉”的好机会。1902年6月，在格蕾丝的剪贴簿中她欣喜地记道：“厄内斯特·米勒在两岁零十一个月时同两个大男人——他爸和格洛特费尔蒂先生一起去钓鱼，他钓到了一条最大的。他知道什么时候鱼上钩了，并将它们拖上岸；他能自个儿装弹、扣动扳机，枪法还不错；他还能轻松地走完一英里半的路程到乔·麦康内尔餐馆用餐。”

在两岁零四个月时，厄内斯特喜洋洋地第一次去理发店。见到她那刚剃完毛的小羊羔，格蕾丝一声惊呼：“好一个男子汉！”与此同时，在她儿子的壁橱里，衣物却大多是女装。在一组厄内斯特的照片旁，她附上了这样一句话：“男孩子就是不一样！”可在这组照片中，他穿得像个身着最漂亮服装的小女孩。在一个里面装着碎头发的信封上，格蕾丝记道，“厄内斯特·米勒·海明威，1906年2月15日理的发。他再也不能留长发了，因为他已六岁半并且在上学了。我的宝贝男孩，一个‘真正’的男孩”。

他母亲一方面想掩盖他是个男孩子，另一方面又急于激发其刚阳之气。身处这种矛盾之中，他当然心存焦虑又忐忑不安，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当别人问他害怕什么时”，格蕾丝于1901年写道：“他豪迈地叫道‘什么都不怕。’”然而，在他回答时，他那咋咋呼呼的样子其本身就意味着他心怀强烈的恐惧感。而且，或许由于他母亲一再提出这个极富挑战性的

这一总的说法的唯一例外是厄内斯特周岁的那年夏天，格蕾丝偶尔给他穿戴的是长裙和无边女帽。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厄内斯特周岁时在密执安要么穿罩衫，要么什么也不穿。

问题，反而加剧了他的这种感觉。当他扛着截短了的毛塞枪顺着人行道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踏步走时，他憋足劲儿以一种低沉的嗓音唱着《约翰·布郎的血肉之躯》，企图以此向橡树园证明自己虽然身着女装，但确是一个男孩。可是在1902年圣诞节来临之际，他却找到他母亲，向她承认：“我非常担心……圣诞老人是否能辨认出自己是男孩，因为他同姐姐穿着一样。”他对别人是否会相信自己显得毫无把握。他本能地觉得如果有男伴，情况就会有所好转。因此，他热切地希望能添个弟弟。可结果呢，1902年4月他却得知自己多了一个叫厄休拉的小妹妹。他满怀希望地憧憬：“我想也许明天耶稣就会给我送来一个小弟弟。”两年后，他的愿望再次被点燃了。“一天早上，我那宝贝（厄内斯特）爬到我床上，……我告诉他上帝将再送给我们一个小宝贝”，格雷丝回忆道，“听到这一令人高兴的秘密后，他兴奋得乐颠颠的”。但是，1904年11月上帝给海明威家送来了第三位“千金”。

海明威内心冲突的另一个症状反映在他所经历的入眠难的问题上。若干年后，他极力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的失眠症是由于回忆战争所造成的。但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推测的，海明威夜晚与各种纷繁骇人的思绪作斗争的习惯在其童年时代就已形成。“对于童年的厄内斯特来说，”在笔记簿中，菲茨杰拉德评述道：“毋庸置疑，对他来说，幽冥中潜藏着芸芸众生。”

在海明威的《印第安人营地》付印前的原稿中有一段后来被删除的描写，充分证实了菲茨杰拉德直觉的正确性。一天夜里，晚餐后，尼克·亚当斯的父亲和乔治叔叔划船消失在密执安湖的夜幕中，他们凭借着一盏灯去捕鱼，让年仅10岁的尼克孤身穿越黑黢黢的森林，回到他们的帐篷中去。在段落的末尾，读者会发现尼克对于海上女妖的死亡召唤是多么地敏感与脆弱，尽管读者不知其潜在原因。

夜晚，他对那幽深的森林始终心有余悸。他打开帐篷，在黑暗中脱下衣服，静静地将自己裹在毯子里。帐篷外，篝火随着树枝烧尽，炭火渐弱。尼克静静地躺着，尽量使自己入睡。他希望听到哪怕是狐狸或者猫头鹰或其他什么东西的一声吠叫，那样他也会稍定惊魂，然而四周万籁俱寂，没有一丝声响。虽然他迄今为止并不惧怕任何有形之物，但现在他变得异常恐惧。死亡这个概念突然潜入其脑海。几周前，在家乡的教堂里，他们唱过一首名为《终有一日银弦断》的圣歌。正当他们唱着时，尼克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也将会死去。这个思想困扰着他，令他黯然神伤……当晚，他坐在外面夜光笼罩的门廊里读《鲁滨孙漂流记》，企图以此驱除脑海中关于银弦断裂的臆想。保姆发现了他，吓唬他说如果他不睡就上他爸那儿告他。他爬上了床，一等保姆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就又爬起来，借门廊里的灯光读到天明。

海明威常被恶梦惊醒，冷汗淋漓，此实属其母所赐。这可以从他写的《我躺下》这篇短篇小说中轻而易举地得到印证。尽管主人公将自己彻夜难寐归咎于战争经历，可他母亲在他那波涛翻滚的思绪中隐隐象征着男性意识的摧残者。

故事伊始是一个名叫尼克的年轻美军中尉，他躺在意大利北部一间丝厂的地板上，那里距离前线有七公里。在他四周是一片蚕食桑叶的沙沙声。蚕声不绝，他脑海中那有意勾连的往事回忆也纷沓而至。之所以用“有意勾连”这个词，是因为自从受伤后，他一直担心自己晚上闭上眼睛，就会灵魂出壳。他发现保持清醒的最好办法是不断回顾童年时代的历历往事。他能够回忆起

的最早时光是住在爷爷家的那会儿。在住房的阁楼里，从一根缘木上吊下一只罐头箱，里面放过他父母亲的婚典蛋糕。阁楼上还放着一些坛子，里面装着他父亲小时候收集到的蛇，用烈酒泡着。不幸的是，由于酒的挥发，一些露出的蛇背已呈白色。中尉进一步追忆起爷爷去世后的一些情形：

我们搬到了一幢母亲设计建造的新住房中，许多不打算搬走的东西就在后院里被烧掉了。我还记得顶楼上的那些瓶子被扔到了火里，受了热爆裂了，火烧着了酒精，火苗窜得老高。我还记得那些蛇标本在后院里熊熊燃烧。

中尉并未提及是谁烧掉了那些蛇，但在后面紧接的回忆里却暗示是他母亲干的。因为在那所新房子里，他想起，“我母亲经常清理掉一些东西，她总是把房子收拾的很干净。”一次趁他父亲外出打猎，她清理了地下室并且烧掉了“所有那些本不该留在那儿的东西”。父亲回来时，那些东西还在路上燃烧。

“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清理了一下地下室，亲爱的，”母亲站在门廊里回答道。她微笑着站在那儿迎接他。父亲朝火看看，踢了一下什么东西。然后他俯下身来在灰中捡起了什么。“尼克，拿个火拨来！”他对我说。我到地下室给他拿了一把火拨，父亲就在灰堆里仔细地找着。他翻出了石斧，剥兽皮的石刀，还有一些做箭头用的工具以及几块陶土和许多箭头。这些东西全都已经烧焦了，缺棱少角、龌牙咧嘴。父亲把它们都小

心翼翼地翻出来，摊在路边的草地上……

“最好的箭头全都给弄成碎片了！”他说。

无论这一段插曲是否反映了海明威童年的真实情况，他都将其作为他母亲喜欢焚烧物品及长期对她丈夫专横跋扈的典型事例。尼克母亲脸上的微笑就是她胜利的象征，而那些被毁坏的武器和工具以及那些黑黢黢的折断了的箭头，就像前面那段插曲中的爆裂的瓶子和燃烧的蛇，都象征着他父亲的耻辱。那是这位中尉自己遭受的耻辱在回忆录中经过伪装的场面吗？这种可能性明显可以排除，因为他所描写的这个男孩并没有卷入他所耳闻目睹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场面。在这篇回忆性的故事中他写到：“一想到这件事，只记得两个人，所以我就为他们俩祈祷。”然而，在这位中尉讲述这个故事的声调中充满了激情。可以想象的是，在他的记忆中，他个人所处的那种危险境地，比起他自己意识得到的还要严重得多。

在一篇又一篇恶梦萦绕的小说中，海明威很早就开始探索他内心深处焦虑的要害所在，同时，他又没有直接加以承认。《我躺下》也并不是这条原则的一个例外。在这篇小说中，意大利北部这一背景框架让许许多多的读者都将其作为战争故事来读。其实，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这个背景，而是在这一环境中对儿童时代的回忆。这恰好就是海明威这篇小说的名字取自他所熟悉的祈祷词的原因。他小时候曾跪在偶像似的母亲面前试图用这些祈祷词使心灵得到安宁：

现在我躺下去就寝，

主当扶持我的魂灵。
我若故前尚未清醒，
主当扶持我的魂灵。

第三章 神奇的土地

—

1909年8月底格蕾丝将马塞利娜带到楠塔基特岛去过了四个星期，留下她那尽职尽责的丈夫一个人去收拾温迪米尔避暑别墅，并为厄内斯特、厄休拉和小萨尼做好开学前的准备。一年以后，就轮到厄内斯特陪母亲去楠塔基特岛了。乘坐长途火车从芝加哥到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之后，他们登上了在马撒葡萄园作短暂停留的一艘船，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格蕾丝事先给一位在珍珠街开设公寓的妇女权益活动家写了信，所以他们一到那儿就有房间在等着他们。厄内斯特每天都在海里游泳、钓鱼，什么鲭鱼呀、旗鱼呀、鲈鱼呀等等。星期天早晨他到中心街的一座教堂里聆听母亲在唱诗廊台上的歌声。在他们回橡树园的路上，尽管已赶不上开学的时间了，格蕾丝还是带他去看了保罗·里维尔的房子、协和桥以及波士顿地区的其他历史名胜。

由于受到了他六年级教师的鼓励，海明威试着捕捉他初次见到大海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激情，写了一篇有关驶越合恩角的航行的短篇小说。他所依据的素材是外祖母小时候去澳大利亚的情况，但却是从一个男孩子的观察角度来叙述的。故事只是在开头的那段提到了那孩子的母亲。叙述者说他出生在马撒葡萄园的一座白色小屋里，而“我四岁时母亲去世”。如果说这句后代代表了作者首次企图通过文学手段来发泄他对母亲的怨恨的话，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无论如何，《初次航海》(MyFirstSeaVouge)(原文即如此，是作者拼错了标题)这篇故事用欢快活泼的笔调描写了海洋的场面，它显示出厄内斯特对游览外域的兴趣与日俱增。在童年时代，除了去过楠塔基特岛游玩以外，他并没有游历过很多地方。但是，他却博览群书。有一套叫作《小小旅行》的系列丛书使他在想象中游览了法国、瑞典、德国、丹麦、比利时以及荷兰。有一年他得到的圣诞礼物是《鲁滨孙漂流记》，它把他带到了离家更远的地方，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故事也是如此。他的叔叔威洛比·海明威医生曾经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在山西省工作了八年，1911年夏的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妻子都在温迪米尔别墅做客。从他的谈论中厄内斯特了解了中国是个什么模样，他的见识大为增长。威尔叔叔在他的旅途中到过一些紧张骇人的地方，见过一些美丽的旷野，会过一些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达赖喇嘛。那是在蒙古境内碰上的，是在达赖喇嘛少有的一次越过西藏禁区的短暂访问途中遇到的。厄内斯特后来回忆道，他父亲特别羡慕威尔叔叔，他曾大胆地说过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也要到关岛或格陵兰去行医。但格蕾丝这位“决策者”对“他想了解奇观异境的欲望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不过，如果说威尔叔叔的奇闻异事只是让他的兄长备感生活的束缚的话，那倒更让小厄内斯特增强了一有可能就要出去见见世面的决心。

同时，密执安州的北部正展现在他的面前，那本身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那里，甚至当他还是个幼儿时，他就获准可以看上去像个男孩。

二

海明威家别墅的后面有一条沙路，始于亨利·培根的农场，然后翻山越岭穿过稠密的树林到达佩托斯基。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战士们仍然在那里举

行一年一度的露营活动。一簇簇的草莓丛沿着道路的两边生长，当红色的木莓和黑刺莓成熟的时候，就被印第安人采去，放在提桶里用椴叶盖上，避免受到阳光的照射。随后，它们被带到温迪米尔来出售。印第安人住在林中营地里，那是一片破烂不堪的棚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弄一点点小钱。厄内斯特回忆道，他们走过来时你根本听不到，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手里提着白铁皮桶，里面装满了水果。有的时候当他躺在吊床上读书时，没等看见印第安人就先闻到了他们的气味。

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个在经济上很成功的红种人是个名叫西蒙·格林的大胖子，他有一个大农场在霍顿小溪边上，离海明威家的别墅约四英里。厄内斯特喜欢同西蒙聊天，有时在沙勒沃伊湖畔的霍顿湾小镇上，他俩大汗淋漓地坐在吉姆·迪尔沃斯的铁匠铺前的大太阳底下。有时候，海明威医生带厄内斯特狩猎时也邀请西蒙同往，他们一道步行穿过树林寻找野禽。一天早晨，他们三人碰到一群翎颌松鸡在吉姆·迪尔沃斯的磨坊边吃食。这是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这种鸟。他看见这些鸟儿的个头和呼呼扇动的翅膀时显得过于激动，两发子弹都未击中，而他的父亲接连开枪，打死了五只。直到父亲自杀身亡以后很久，厄内斯特仍然记得大胖子西蒙捡起死鸟时大声笑着夸奖海明威医生的枪法。“每当我回忆起那次狩猎，我也非常敬佩我的父亲”海明威在1935年的《乡绅》杂志中写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射手，是我所见过的动作最快的射手之一，但他过于胆怯而赚不了大钱。”

厄内斯特的另一位印第安朋友是个肌肉发达、脾气暴躁的家伙，名叫尼克·博尔顿，职业是锯木工人。海明威医生有时雇他来劈砍漂上海明威家湖岸的圆木，因为有一艘名叫“魔法”号的汽轮总是拖着一大串圆木威风凛凛地缓缓驶达沃伦湖下游的一座锯木厂。大多数人认为博尔顿是个混血儿，尽管湖边的有些农场经营者确信他是个白人。博尔顿住在林中的印第安人定居处，有一个妻子生了个儿子，另一个妻子生了一男一女。他的女儿普鲁迪比厄内斯特小三岁，偶尔在温迪米尔别墅帮忙做家务。厄内斯特十五六岁时的那年夏天，经常与普鲁迪和她的兄弟比利去猎取黑松鼠。当他们三人静静地坐在丛林中聆听着顶端树枝上松鼠的叫声时，普鲁迪可能养成了把手伸进厄内斯特的裤兜探摸的习惯，她可能还曾仰面躺在一层床垫似的松针上让厄内斯特爬在她身上，而比利在一旁观望。在《两代父子》中，青年时代的尼克·亚当斯就曾宣称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他和一个名叫特鲁迪的印第安姑娘身上。和许多读者一样，海明威的遗孀总是将尼克的话当作真实生活的反映。玛丽·海明威在她的自传中宣言：普鲁迪·博尔顿是我丈夫“享受过的”第一个女孩。1944年，在伦敦的一家餐馆中，海明威告诉她说她的腿就像普鲁迪的腿一样，她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其他读者同样坚持认为，海明威小说中有关他与普鲁迪的初次性经验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和那个印第安姑娘只不过是朋友而已。真实的情况也许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普鲁迪曾与较大的白人男孩和成熟的男人私通，还与来自沙勒沃伊的那个家伙山盟海誓。看来，在此之前至少有一段时间，厄内斯特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女朋友，他们在林间的幽会也并不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十个印第安人》中讲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一个名叫尼克的男孩认识了一个名叫普鲁迪·米切尔的印第安女孩。尽管她身上那浓烈的气味不亚于任何其他印第安人，他还是爱上了她。结果，当他的父亲告诉他曾看见她和另一个男孩在林中“追逐戏闹”时，他不禁伤心痛哭。那天晚上他把脸

埋在枕头里，真正尝到了什么叫作心碎的滋味。当夜，他醒来时聆听着屋外微风徐徐吹拂着铁杉树，波浪哗哗拍击着湖岸。最后一句话写道：“清晨，湖岸上风急浪高，他静躺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的那颗心已经碎了。”

回到橡树园后，厄内斯特的女友多达五六个。不过，直到15岁半他才初次约会，他陪一个叫作多萝西·戴维斯的一年级学生去看篮球比赛。（他母亲乐呵呵地说：“他那些单身汉朋友们都快疯了。”）第二年5月，他曾邀请弗朗西斯·科茨在德斯普兰斯河上的月光下泛舟，但他的母亲却安排他在当月19日带姐姐去参加三四年级舞会。（“厄内斯特和马塞利娜一起去，尽管马塞利娜还收到其他人的邀请”，格雷丝说着，显得挺得意。）对他的朋友们来说，少年时代的海明威喜欢显得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常常显得紧张，睡眠中也常被恶梦惊醒。（其中特别恐怖的一次恶梦曾使他大声惨叫。那是发生在他住在温迪米尔别墅的一天夜晚，他和马塞利娜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轮流朗读着布拉姆·斯托克所写的《吸血鬼》，直到很晚才睡。）而且，在和橡树园高中的女孩子们的交往中，他并没有多少充当情郎角色的记录，所以他才有和普鲁迪·博尔顿的林间约会。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她不具威胁性，或许是因为她来自下层阶级，或许是因为她属于一个被征服的种族。

三

1900年厄内斯特·海明威一周岁的那年夏天，在沃伦湖畔，他和马塞利娜在父母新近建成的别墅前那狭窄的湖滩上裸体玩耍。海明威医生给他们拍摄的他俩赤身裸体的照片非常可爱，被格雷丝放进了剪贴簿。不过，在他赤脚踏得水花四溅或去探查被拖上湖岸的划艇时，可以肯定，厄内斯特有很多机会注意到——如果在此之前他尚未注意的话——他和姐姐的身体并不一样。

那么，这男性幼儿会不会对自己的这种有别于马塞利娜的身体器官感到自豪呢？当他看到她那光溜溜的情况会不会想到她是否经受过什么可怕的事，而那可怕的事会不会很快也降落到自己的头上呢？自豪感和恐怖感会不会在他那翻滚奔腾的想象中交织在一起呢？这些问题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弗洛伊德的推测。就厄内斯特·海明威这个例子而言，这些问题更是别有一番意味，因为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他和马塞利娜实际上正被当作同性双胞胎来对待。在后来的岁月里，失去阴茎的可怕意象在海明威有关在冰点温度下滑雪的夸张的笑话中将会做一些轻描淡写，而对这个意象进行过认真处理的将有两篇令人悲痛的作品：《先生们，祝你们快乐！》以及《太阳照常升起》。

厄内斯特和他姐姐的关系的发展，也可能成为他在其他方面感情动荡的根源。马塞利娜走路比他要稳健得多，而且可以轻易地将他摔倒。在真正的一男一女的双胞胎中，大部分情况下，在青春期以前，女孩总比她的兄弟高大、强壮。在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这对假扮的双胞胎之间，马塞利娜在身体上的优势是由于她要大18个月。格雷丝坚信她的这对“双胞胎”个头一样，但他俩的照片却可以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直到他们在上高中一年级时，厄内斯特比马塞利娜还要整整矮一个头。马塞利娜不仅比他弟弟个头高得多，有好一阵子，她的阅读能力也强得多。在校学习的五年中，她比他高一年级，对他们所学的课程，她总是要比他懂得多。加拿大作家莫利·卡拉汉于1923年在多伦多见过海明威，随后在巴黎也常见到他。卡拉汉说：“他的

内心深处有种什么东西总是使他想在他所从事的每个行业中都成为行家。”海明威掌握信息的能力快得惊人，这当然是他天才的一部分。但是，促使他这样做的竞争欲望肯定是在同他那无所不知、能说会道、美丽潇洒的姐姐马塞利娜的竞争得到了增强。马塞利娜就常用自杀或离家出走相威胁而免受父母制定的规矩的约束。

在海明威早年表现出来的对姐姐爱戴的背后，还长期存有一种怨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怨恨越发强烈。例如，1944年在伦敦，他竟然向马塞利娜大打出手，让他新近才结识的未来的妻子玛丽·韦尔什惊恐不安。他的妹妹厄休拉“使家庭超凡脱俗”，她“聪明、伶俐又漂亮，是个非常优秀的泥塑艺术家”；而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马塞利娜则“矫揉造作，讲究形式”。几年后，在乘坐豪华的“洛堪达·锡普里阿尼”号游船离开威尼斯横穿咸水湖时，他和玛丽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将马塞利娜同他所有其他的姐妹相比，以便专挑马塞利娜的不是。萨尼是个“了不起的垒球手”，卡罗尔不仅“长得最美”，而且“看上去就像个女孩，就跟我看上去像个男孩一样”。厄休拉是姐妹中“最好最可爱的”，可马塞利娜呢，却是个“排挤专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每每在竞赛中，他总是处在不利的地位，马塞利娜经常把他“排挤”在外。

自从海明威医生开始教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游泳，他就命令两个孩子都穿上泳装。但有的晚上他允许他们在临睡前不穿泳装在水里泡泡。这种特权很快就被厄休拉和萨尼获得，接着又是卡罗尔也有份。甚至在厄内斯特十几岁的时候，他和姐妹们在黑暗中游泳时仍不穿泳装。马塞利娜后来说，那使我们都感到像“秘密社团”的成员。但是，在这个秘密社团中，还有一个更为亲密的派系，它就正如后来经过文学手段处理的那次苍鹭事件所揭示的那样。

这个有关苍鹭的事件发生在1915年夏季的一天，是在厄内斯特15岁生日前后。那天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无事。厄内斯特和萨尼决定去野外午餐，还要到湖的西边很远的一个叫作克拉肯的荒野地区去探险。他们启动了家用摩托艇，在后面拴了一条划艇就出发了。他们到达那个地区后不久就上了岸。厄内斯特将一只美丽的苍鹭从浓密的芦苇丛中惊起并敏捷地射中了它，尽管他知道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他说，苍鹭可以为他父亲所收集的那些飞鸟标本锦上添花。他没有将他的战利品带到野餐地点，而是返回到汽艇上，将鸟包在一张旧报纸中放到座位的下面。几个小时后他们回来时，发现那只苍鹭不见了，当地狩猎管理员的儿子在一艘帆船中正等着他们呢。那年轻人手里握着这只死鸟盘问是否是厄内斯特打死的。厄内斯特回答说这只鸟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子给他的。这个年轻人显然对这回答并不满意，可他也再提别的问题就驾船驶开了。他刚走，厄内斯特和萨尼就匆忙赶回温迪米尔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的母亲。格雷丝依照她一贯的威严接手来处理这件事。她让萨尼呆在别墅，哪儿也别去，又叫厄内斯特立即离开，去朗菲尔德农庄，那是湖对岸的属于海明威家的地产，在那里海明威医生开辟了几个宽阔的果园和一个大型菜园。如果厄内斯特能够花些时间在农庄里干活，同时又让法规鞭长莫及，那么在橡树园忙碌的父亲无疑是会挺高兴的。

第二天清晨，两个陌生人出现在温迪米尔，开始询问有关厄内斯特的事，但并未讲明缘由。最能反映格雷丝强有力的个性的描写，莫过于有关她和这两个男子对峙的这一段文字。她很快就把他们打发去见她的丈夫：

我还以为他们是贼或是什么恶魔哩。他们一付鬼鬼祟祟、旁敲侧击、毫无教养的样子，也不说是干什么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和我家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那就别再这么厚颜无耻的赖在这儿。像这样跟一个孤独的女人和她的小孩子们胡搅蛮缠，既不讲明事由，也不表明身份，还一个劲问些怪问题，这可不是什么正当的行为，你们下回可要记住了。

那两人吓得慌了手脚，连忙退出。其中一人喊道：“夫人，我算是领教了。”格蕾丝唯一忽略而没有告诉海明威医生的细节是：她曾命令萨尼给她拿把短枪来。

格蕾丝的下一步行动是给儿子捎信叫他好好躲起来。厄内斯特很快就越过了朗菲尔德农庄与霍顿湾之间的山岭，与铁匠吉姆·迪尔沃斯以及他那位笑呵呵的妻子莉兹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莉兹管理着一个鸡肉食品快餐店，叫作派恩赫斯特小屋，俯瞰着沙勒沃伊湖。莉兹最拿手的食品有些正是厄内斯特为了他第二次更长时间的出逃所需要的东西。他做好了准备，最终到达了密执安州艾恩顿附近乔治叔叔的避暑别墅。除了偷偷摸摸回到朗菲尔德农庄摘些长豆角和挖些上豆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外，厄内斯特一直呆在乔治叔叔那儿，直到狩猎管理人员的怒气缓和下来。遵照他父亲的建议，他到博因城的一位法官那里认了错，并且付了 15 美元的罚金。

在他母亲去世 36 年之后，海明威又想起了那次苍鹭历险奇遇，并试图写一部小说。在随后 10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摆弄那些手稿，可怎么也没能完成。他自己去世 11 年后，那些零星手稿的大部分（但不是谈论尼克·亚当斯使普鲁迪怀孕的那些手稿）都得到了发表，收录在《尼克·亚当斯故事集》当中，是一篇挺长的短篇小说，名叫《最后一方清静地》。

海明威在概述这次冒险经历时，作了很多改动，其中之一就是他母亲所扮演的角色。尼克·亚当斯的母亲并没有去激怒那些爱刨根问底的狩猎管理人员，反而给他们吃了午餐和晚餐，然后才在因头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同时，在故事当中，也没有直接提到苍鹭。尼克的小妹妹对他说：“他们从你船上拿走的是你杀死的東西。”但是，这一含混的暗示却从未得到澄清。他被指控破坏狩猎规则的性质也更加严重：在禁猎期间他竟然杀死了一头十二斑点鹿。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尼克不是去乔治叔叔家躲藏起来，而是逃到一处未开垦的荒野之地，即《最后一方清静地》。另外还有一件事，肯定也是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是：他不是独自一人出逃。由于海明威欲将《最后一方清静地》作为他自己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他让尼克作为个性突出的主人公，而尼克的小妹妹利特勒斯则作为主人公忠实的伙伴。

作家到底是将哪一个妹妹放进了他想象中的荒野之地呢？这一点可以用排除法来加以确定。由于他“最小的”妹妹卡罗尔在 1915 年才四岁，其可能性就不大。但萨尼是 10 岁半，厄休拉 13 岁，她俩和利特勒斯的“11 或 12 岁”都非常接近。不过，厄内斯特射杀苍鹭时是萨尼和他在一起，而且她身上有股男孩子气，与利特勒斯的某些脾气也很相似，所有这些原因便可以使人考虑海明威是否在脑海中想的是她。然而，利特勒斯是“深褐色的眼睛、深褐色的头发”，而小萨尼是个碧眼金发的姑娘。更有可能的是，几乎也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深褐色的眼睛、深褐色的头发的厄休拉是利特勒斯的主要

模特儿。因为，《最后一方清静地》是一个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在动手写作之前，海明威曾对玛丽·韦尔什说过两遍：厄休拉一直都是他最喜欢的妹妹（在另一次或许是对厄休拉的恭维中，他通过《两代父子》中的尼克·亚当斯的嘴说：“在家庭里只有一个人的气味他喜欢，是一个妹妹。”）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厄休拉住在檀香山，她与厄内斯特之间仍保持着联系。在他去世后，她在夏威夷大学为文学创作设立了厄内斯特·海明威纪念奖。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能够扫除因他自杀而投下的长长的阴影。当她从医生那儿得知自己已身患癌症时，她就拿定了主意。1966年秋，她也服毒自杀。

凡自杀者常常都对自己所爱的人有过怨恨的经历。尼克和利特勒斯对他们的家庭都充满了怨恨。“（利特勒斯）和尼克彼此相爱，但不喜欢其他人。他们总是把家庭成员中的其他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外人”。利特勒斯的梦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让她的哥哥当她的丈夫。她对尼克说：“我要根据习惯法成为你的妻子。”“这问题我已琢磨过好多回了。我要去印一些名片，上面要印上：尼克·亚当斯太太，住密执安州十字村，事实上的妻子。”尼克笑着回答说，他认为这计划行不通，可她不肯罢休。“在我还未成年时我们就要有几个孩子，然后你就必须娶我了。”

他们逃离文明越远，就离乱伦越近。故事开始时的接吻只不过是热身运动，直到后来利特勒斯坐在尼克的怀里，尼克顿时冲动地勃起。性格外向的利特勒斯总是将其被动的哥哥引入一连串与性有关的话题：什么卖淫呀、月经期呀，更有甚者，还论及雌雄同体。她对这话题的兴趣还在他另一梦想中反映出来：利特勒斯不仅身穿工作裤和男孩衬衣，还拼命想把头发剪短。她承认，“我总想当个男孩。”（这样她想同哥哥住在“十字村”的愿望就很合适了。）过了两个晚上，利特勒斯与尼克在密林深处的一个沼泽边搭起了一个单斜面顶的棚屋。尼克出去抓鱼准备晚餐，回来时看见妹妹侧身躺着看书。他问她一直在干些什么来着。

她转过头望着他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把头发剪了。”她答道。

“怎么剪的？”

“用剪刀呀。你以为怎么剪的？”

“你是怎么弄的呢？”

“就把它握住然后剪掉。容易得很。我像个男孩吗？”

“像个婆罗洲的野小子。”

“我没能剪得像个主日学校的男生。看上去太杂乱了吧？”

“不。”

“真开心，”她说，“现在我是你的妹妹，可又是个男孩……”

事实上海明威最喜欢的妹妹曾一度看上去像个男孩，但只是在三岁的时候。那时，格雷丝给厄休拉的装束是一顶战斗帽、一条莽骑兵的围巾以及加有缘饰的长裤。（结果是，其效果极佳，格雷丝开始叫她特迪。）然而厄休拉的头发从未胡乱剪过，从未像个婆罗洲的野小子。这一细节海明威是凭记忆取自马塞利娜童年时的一次痛苦的经历。至于厄休拉是否说过想当男孩，则无法知晓。人们也无法知道她与厄内斯特是否以任何形式有过性方面的亲密关系，尽管海明威在1950年曾有意告诉评论家阿瑟·迈兹纳：在1919年从战场上回来后。

我的（17岁的）妹妹尤拉……总是躺在通往我房间的三楼楼梯上等着。她想在我进屋时她能醒过来，因为她听人说男人独自饮酒是非常糟糕的事。她会跟我一起喝点轻香的饮料，直到我去睡觉，然后她陪我睡，这样我在夜间就不会感到孤独。我们睡觉时总不关灯，除非有时她见我睡着了才关。她一直醒着，如果看到我快要醒了，就把灯打开。

由此可见，在《最后一方清静地》中，利特勒斯的那些雌雄同体和乱伦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真实生活的根据。然而一些幻想还是可能具有真实生活的意义。厄内斯特和厄休拉在少年时代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而且至少在厄内斯特的想象中，他们的这种密切关系似乎还会卷入一场更为夸张的性错乱的闹剧。

在厄内斯特的记忆中，这种闹剧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但在他的童年岁月，他却一直努力掩饰着这种持续了很久的心理上的卷入，其方法是向世人展现出自己颇有男子汉的气概。

四

由于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在1918年海明威住院后一直陪伴着他，她肯定会注意到医院里的其他人，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都喜欢跟他做伴。“你知道他那个样子，”很久以后这位过去的护士说道：“男人们都喜欢他。”橡树园高中大部分（虽不是全部）真正了解他的男孩也都喜欢他。学校中有些熟悉他的女孩觉得他挺傲慢，摆架子。但男孩子们往往原谅他这种自负的性格，因为谈起棒球或拳击或书本，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讲得精彩动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才思敏捷、谈吐幽默；与他一起漫步夜游或泛舟河上真是其乐无穷。能够反映出他很受器重的迹象之一，是他的绰号多得惊人：海姆、海米、海明斯坦、内斯托、波索斯、布彻、约恩邦斯。还有另一个他自己试图挂在自己身上的绰号叫作：“老禽兽”，但只有马塞利娜愿意用。在他同学爱用的绰号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海明斯坦，有时简称斯坦。他颇有些反犹太人的倾向，因此他觉得犹太人的名字真是滑稽好玩。

在他最接近的男孩子中，有几个在学校里是头面人物，可他们放学后通常都很仰仗厄内斯特。无论何时他有了什么新的兴趣，他的朋友们大多跟着学。拳击就是其中之一。1916年在芝加哥，厄内斯特首次观看了一场职业拳击赛，并马上爱上了这项运动。由于得到他父亲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他可以进入商业区的一家拳击训练馆。10年后，他吹嘘说他学习拳击时曾和传奇式人物如萨姆·兰福德、吉姆·布莱克本、汤米·吉本斯和哈里·格里布等人对练过。但很有可能他甚至从来就没有跟在体育馆训练过的无甚名气的俱乐部拳击手们对阵较量过，更不用说著名拳王了。他将那些在橡树园的伙伴们作为拳击搭档，在他们身上磨练他的拳击技术，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这项有刚阳之气的自卫术比他懂得的要少得多。

他们有许多回合的拳击练习都是在海明威家举行的。格雷丝的音乐厅就是设置拳击擂台的理想场所，观众们可以在楼台上观看。她修建这个楼台是为了容纳来参加她举行的音乐会的大批听众的。只要打得不是过于凶残，格雷丝也就并不反对拳击，厄内斯特的姐妹们也都很乐意观看。“我们女孩子

在楼台上观看”，马塞利娜回忆道：“并且向拳击手们的头上扔纸片和拳击手套来挑逗他们。”不过，后来的拳击打得非常火爆，厄内斯特和他的朋友们被迫移师去汤姆·丘萨克家。麻烦的是，厄内斯特不仅每次打比赛都想获胜，而且硬要把对手打得一败涂地。他脸上笑容可掬，却掩饰着内心的凶残狠毒，他的有些对手即便没有被击倒在地不省人事，也会伤得相当厉害。

他对他的朋友们的血淋淋的鼻子和肿起的眼眶毫不在意，但一见到泛泛之交的朋友身处危境倒会挺身相救。1917年2月，橡树园高中的三个女生接受了一个朋友的挑战，要去乘坐餐厅的送菜升降机。这些女孩真是“要去送死”，橡树园的报纸《橡叶》在几天后报道说：“当厄内斯特·海明威……看见并意识到那种危险时，他抓住了绳索并被拖离了地面，他赤手空拳拉住绳索在顶端卡住了滑轮。”过了一分钟左右，另外四个男孩过来帮助他将那几个女孩拉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密执安，他最要好的朋友是比尔·史密斯，他给海明威起的绰号叫威米奇。比尔有个姐姐叫凯蒂。威米奇喜欢她几乎跟喜欢比尔一样。比尔还有个哥哥叫耶莱姆亚·肯利，为方便起见，他们管他叫Y.K.。他们的母亲在比尔出生后不久于1897年去世了。他们的父亲是图拉尼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最关心的是撰写学问高深的悲哀故事，批判基督教对希伯莱思想的庸俗化。他并不照管自己的子女，结果抚养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他们那位社会名流的姑姑约瑟夫·威廉·查尔斯夫人身上。她常奔波于圣·路易斯、密苏里以及霍顿湾之间。虽然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少见到他们的父亲，但他却向所有的孩子成功地传导了他对文学的酷爱。在厄内斯特很熟悉的朋友中，比尔是唯一的一个像自己一样曾经涉猎过大量书籍的男孩。每次去霍顿湾，他都要把比尔找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光，经常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手里握着钓鱼竿，在清凉的霍顿小溪里趟水。（为了取暖，他们不时上岸从一只透明的“霍恩斯比最佳牌”的水壶里喝上一口烈性苹果酒。）一旦鱼钓够了，他们就回到“查尔斯姑姑”的别墅，谈论起他们最喜爱的英国作家，其中有些情节在那篇很精彩的叫作《三天大风》的故事中，尼克·亚当斯和他的朋友比尔也是津津乐道。海明威后来喜欢轻描淡写，反对谈论过多，这一点与他和比尔·史密斯的有关英国人粘液性气质的谈话有很大关系。“我们往往非常赞成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国绅士勇敢豪侠的风度。”1966年史密斯回忆道：“这种‘缄默寡言’的思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杰克·巴恩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报业的那种态度：不应该总是给别人一种老是在工作或受到压力的印象，但同时又要完成好工作，等等，等等。”

在比尔和厄内斯特所喜爱的英国现代作家中，基普林是他们极为崇拜的。多年以后，海明威在一封写给一位年轻诗人的忠告信中回忆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恐怕我的写作风格就像基普林。我曾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而且我还知道他有几篇短篇小说的确是最佳之作……你为什么重新开始，读读……《通道顶端》、《马拉比·(莫罗比)·朱克斯奇游记》、《野兽的标记》等。”基普林表现出了对任何事物都具有行家的见识这样一种感觉，他对身处崩溃边缘的道德意志坚强者也很迷恋，而海明威的小说也有这些特色。

厄内斯特也喜欢其他英国作家所描写的类似他自己个人问题的故事。在《三天大风》中尼克·亚当斯所提到过的各种书籍里，没有哪本比休·沃波尔的自传体小说《坚韧不拔》（1913）更受推崇的了。尼克说：“它太棒了，

是本真正的书。那里面他老爸总是缠着他不放。”《坚韧不拔》这故事实际上讲的很别扭，过分添枝加叶，但主人公和父母在一起时所经历过的备受痛苦折磨的生活却使厄内斯特浮想联翩。

故事开始的时候，康沃尔郡特雷利斯小城的一位老人告诉 12 岁的彼得·韦斯科特说：“生活本身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敢于面对生活的勇气。”对这个男孩的勇气的首次考验，是因为他未经允许很晚回家，他的父亲便命令他把浑身脱得精光，然后用一根藤条野蛮地抽他。虽然疼痛“难以忍受”，但他很自豪地强忍住泪水，直到他父亲离开房间。几天以后，韦斯科特先生更重地惩罚彼得，将他送到一所极为糟糕的学校。在他最终获准可以离开学校之后，他的父亲又迫使他在一座他不太喜欢的镇上的律师事务所任职。只有在他已经非常明确他那长期患有神经过度紧张的妻子已病入膏肓时，韦斯科特先生才把彼得召回家。

彼得走进母亲的卧室时，意识到尽管他父亲几乎从不让他和母亲有一刻的亲近，但他一直非常爱她。当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时，彼得向她吐露了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她回答说她自己也曾有过从事艺术的抱负。她天生嗓音优美，而且还举行过几次音乐会，后来由于精神崩溃才迫使她放弃了对职业生涯的追求。在彼得的追问之下，她才承认她的神经过敏是由于她丈夫在他们婚后初期对她冷酷无情所造成的。她说，“他有什么东西……能够加以伤害，他才感到快乐。”彼得对这一番表白深为感动，他将母亲紧紧地抱在怀里热烈地吻她。他母亲两次要求他再次吻她，彼得压住她的嘴使她透不过气来。当晚父亲和彼得在餐厅相遇，他告诉他说，他对母亲的关照给母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彼得径直冲向母亲的房间，发现她已快咽气了。“他……向她扑去，但她向后倒下，轻叹了一口气，便去世了。”

小说中的最后一个场面时，彼得已长大了几岁。他经受了婚姻的失败以及其他的失望和挫折，但是，他想作为一名作家并取得成功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小说结束时，风雨交加，彼得面向暴风骤雨祈祷，他所说的话应该使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年轻读者想起他童年时代的座右铭：“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什么都不怕。”

在孩提时代，厄内斯特对他的父亲曾经感到过一种彼得·韦斯科特从未享有过的亲近感。周末时离开橡树园外出狩猎钓鱼，对他们俩来说一直就是一种放松，可以躲进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的世界。而且，如有可能的话，海明威医生一直热切地期望能帮助他的儿子有个正确的生活开端，而不是去尽可能地赚取他的诊费。在最初几年中，他坚持每年夏季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温迪米尔。有段时间，厄内斯特由于母亲对他的态度忽冷忽热而深感消沉和困惑，极为关键的是他父亲坚定地支持了他那男孩所特有的兴趣。他长大后曾想当个医生，这并不奇怪。海明威医生向他展示了如何在森林中处理好各种事情的本领，这些本领后来成了他儿子狂热的爱好；在厄内斯特后来的生活中，一年中有些季节、有些户外场景必然会使他想起他的父亲；所有这一切也统统都不足为怪。正如他在《两代父子》中所描绘的：

他每年一到秋天或者初春，就常常会怀念父亲，或是因为看见大草原上飞来了姬鹀，看见地里架起了玉米堆，或是因为看见了一泓湖水……或是因为看见了雁阵，听到了雁声，或是因为隐蔽在水塘边上打野鸭，想起了有一次大雪纷飞，一只老鹰从天而降来抓布蓬里的野鸭诱饵，它拍了拍翅膀正要

窜上天去，却不防让布蓬勾住了爪子。他只要走进荒芜的果园，踏上新耕的田地，到了灌木丛中，到了小山岗上，他只要踩过满地黄叶，只要一劈柴，一提水，一走过磨坊、榨苹果汁的作坊、水坝，特别是只要一看见野外烧起了篝火，父亲的影子总会猛一下子出现在他眼前。

然而，小厄内斯特对他父亲的看法渐渐地就不再那么恭敬了。起初，他在青春期对儿童时代心目中的英雄所产生的反叛，其遵循的是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在发育过程中的一种正常模式。造成他们之间隔阂扩大的真正原因是，在格雷丝生下了卡罗尔之后，海明威医生在 1911 年作出了决定：作为五个孩子的父亲，他再也不可能在温迪米尔长期休假。这样就急剧地减少了他和厄内斯特一起在林中度过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厄内斯特越来越意识到他父亲对格雷丝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其结果就必然是他失去了尊严。1912 年，海明威医生因为精神异常，很悲惨地离家去“疗养”，这更加恶化了这种情况。厄内斯特对他的父亲采取了一种屈尊俯就的新态度，其内在的因素却是一种对其过于讲究清规戒律而日渐增长的愤怒。在《坚韧不拔》这本书中，那男孩子的老爸“老是缠着他不放”。尼克·亚当斯对该书的这种评价决非偶然。在彼得·韦斯科特的经历中，没有哪个方面能比这个更为厄内斯特所热中于认同的了。

不幸的是，这种导致父子之间纠纷的情绪从未得到解决，恰恰相反，厄内斯特的表面殷勤与实际愤怒年复一年地日渐强烈。这说明这里面还混有另一种感情。从温迪米尔后边的工具棚中，他可以观察到他父亲在炎炎烈日下大汗淋漓地在西红柿地里干活。他后来向比尔·史密斯透露说：在他要满 18 岁的那年夏天，他偶尔静静地坐在工具棚的门口，身边放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他不时地把枪拿起，瞄准他父亲的头。这种模拟的暗杀动作或许是出自这孩子想杀死这人的愿望，而这人就是他所担心的自己有朝一日将会成为的男人。

如果不仔细观察，人们还会以为厄内斯特在青年时期与格雷丝的关系融洽，非常愉快；特别是当他们在一起谈论音乐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为她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在厄内斯特的感觉中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在较为世俗的层次上，制作烘烤的食品是他们之间的另一根纽带。虽然一般来说格雷丝尽量不进厨房，但她很喜欢制作糕点，这使总填不饱肚子的厄内斯特非常高兴。甚至在他去堪萨斯城工作之后，格雷丝还给他寄去专递包裹，对他的爱吃甜食嗜好给予特别关照。

她对他称呼的态度也是甜甜蜜蜜的。当她真的弄清是他，而不是马塞利娜，才是她的最具天赋的孩子时，她对他的热情可真叫人肉麻，恐怕也会令人难堪，幸亏他学会了使用开玩笑式的幽默加上犹太式的绰号去避免这种肉麻。（他叫她海明斯坦大娘，简称斯坦太太。）总之，这种小小的伎俩成了母子社会交往上可以接受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便能够将他所暗藏的对母亲的怨恨与鄙视提升到他们之间的冲突的表面上来。当他十五六岁时，这种感觉因一种下意识的反叛而进一步恶化。他 15 岁生日那年夏天，他听到了令人吃惊的消息：他的母亲再次怀孕了。那孩子于 1915 年 4 月 1 日降临人间，而且这个愚人节的蠢蛋竟然是个男孩。他的母亲才刚刚给他起名叫莱斯特·克拉伦斯，厄内斯特就根据连环画中的一个人物开始叫他“莱斯特这害人精”。然而，这个浑名太累赘，也不足以表达他的感觉。多年来，他在那个新天地

里独往独来、称王称霸，这下可倒好，竟然来了个弟弟，所以他将其压缩成“害虫”。

但是，对格雷丝来说，她一直认为她英俊的儿子是真心爱她的。1916年2月15日，她将他的两张新近的照片放进她的一本剪贴簿里。其中一张他面色抑郁，嘴角下撇；另一张呢，腼腆羞怯，满面微笑。格雷丝说，第一张照片嘛，“每当他父亲跟他说话时，他就是这副模样”，而第二张照片呢，“每当他母亲跟他说话时，他就是这副模样”。毫无疑问，她向他表明了看法，但这种讨好卖乖并未能阻止他对她的日渐疏远，特别是在密执安度假的那几月中，他的这种疏远感尤为明显。1915、1916以及1917年的夏天，大多数夜晚他都要么睡在温迪米尔后面的一个帐篷中，要么睡在湖对岸朗菲尔德农庄的帐篷中，要么睡在他自己在墨菲角设立的露营地中，要么睡在霍顿湾的朋友们的家中。厄内斯特最喜爱的老师范尼·比格斯在1952年曾回忆说：“一想到他母亲生气勃勃、精神抖擞的样子，婀娜多姿的体态，热情洋溢的个性，我就怀疑厄恩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充满了他曾享受过的那种母爱的妻子”。这种对另一位成熟女性的热情赞赏与其说是反映了厄内斯特的感情，还不如说是比格斯小姐本人的情感，因为有传闻说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假定厄内斯特对母亲的感受与她自己相同的时候，比格斯并没有考虑他感情的综错复杂。尽管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对《坚韧不拔》中所描写的未来的小说家彼得·韦斯科特与其曾一度是音乐会歌手的母亲之间的热烈拥抱非常着迷，但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却逃避这种极有可能重演的场面。

1917年海明威离家去堪萨斯城之后，他把他与格雷丝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了。不过，她仍然可以给他写信叮嘱他，其中有一封就对他的行为表示了非常不满，而海明威对此所作出的即刻反应将可以初步指明他未来的命运。尽管他已经想要完全地摆脱她，但他却无法付诸实践，即便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也无法这样做，甚至在他几乎不给她写信之后他也做不到这一点。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他的母亲一直都是在暗中主宰着他内心世界的凶恶女王。

第四章 锦标赛

—

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促使厄内斯特去读了休·沃波爾的最新小说《黑森林》，因为那是一本根据亲身经历写的战争题材的小说。1914年英国参战，沃波爾曾想加入英军，但由于视力不佳而未能如愿。不过，他还是在萨尼塔作为抬担架的救护人员参加了俄国红十字会，来到了加利西亚东部，正好赶上俄军的大撤退，这便成为他小说的背景。

《黑森林》中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英国人叫约翰·特伦查德。虽然他从儿童时代起就患有严重的死亡恐惧症，他还是在俄国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救援工作中爱上了一位护士。然而，特伦查德对于女性过于软弱，他那情郎的角色最终输给了一位年龄稍大、在两性问题上颇有经验的医生。对此，特伦查德感到万分苦恼，他前去有大批死伤士兵的S森林做救援工作，就是为了渐渐忘却痛苦。一枚奥地利炸弹最终使他如愿以偿。他曾爱过的那名护士也遭奥地利炮火而身亡。

1917年春，厄内斯特的父亲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他想亲眼目睹战争的愿望必须延期。但是如果说他父亲可以武断地决定儿子年龄太小不宜参战的话，他却无法阻止他对沃波爾小说中那位红十字会志愿者和那位护士的梦想。在读完一本书之后，杰克·巴恩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说，有的时候这个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年轻的厄内斯特·海明威也经常有这种感觉。不过与《黑森林》相比，他的幻想却有所不同。不管是有意无意，他写进小说的是他对未来的计划，而不是对过去的回忆。

二

在他读高中的最后几个月中，厄内斯特眼前最为迫切的问题与上大学有关。马塞利娜已决定去读奥伯林学院，而海明威医生决意要让厄内斯特陪伴她。在奥伯林学院读书可是海明威家的传统，海明威医生感到他的儿子理应将其宏扬光大。但是，厄内斯特却不同意。他想去做更加令人兴奋的事，譬如去报馆工作，因为他在高中时就曾相当成功地学校的文学杂志写过稿，为校报当过记者，他早就知道自己想当一名作家。在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海明威医生同意写一封信给他的弟弟泰勒。由于有幸娶了一位女继承人，泰勒已是堪萨斯城一位有名的木料经营者。海明威医生问他是否能够用他的影响替厄内斯特说情去堪萨斯城《星报》工作。泰勒的好友亨利·J.哈斯克是《星报》的主编，他对泰勒告诉他的在橡树园的侄子的事情很感兴趣。哈斯克对泰勒说，到秋季就有新记者的位置的空缺，他的侄子要想应聘，只要届时露面就成。

有关他当年10月离开母亲的情况，厄内斯特向来对谁都只字未提。但是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他却用小说的形式以一种表现了强烈的恩赐态度的措辞重新描绘了他和父亲在火车站最后道别时的情景。当列车员就要收起上车踏板时，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踩着踏板登上了硬席车厢。“他的父亲与他吻别时说，‘在我俩分离的日子里，愿主保佑我们。’”乔丹记得：父亲的胡子湿润，心情激动，两眼噙泪，可他自己却深感尴尬，他“觉得几乎难以忍受这种场面，他突然觉得自己比父亲还要老得多，为他而感到难

过。”

泰勒叔叔在堪萨斯城的联邦车站迎接了这位年轻英俊、体格魁梧的侄子并带他回家去见了阿拉贝拉婶婶。虽说他们位于沃里克大道上的三层楼的维多利亚式住宅有足够的地方可供好几位客人居住，厄内斯特还是感到自己来来去去受到他们的监视难免太受约束。一旦有了适当时机，他就离开了他们，搬去与一个 29 岁的名叫卡尔·埃德加的单身汉同住，与他相识，是通过霍顿湾的比尔·史密斯的姐姐凯蒂的介绍。人们管他叫奥德加。他爱凯蒂爱得无法自拔，每年夏天都缠着她。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与厄内斯特在一两个月内合用他的公寓，而且有好多夜晚都彻夜不眠，听他年轻的室友充满激情地讲述新闻工作中的奇闻轶事。厄内斯特认为他的房主是个出色的家伙，甚至在他搬到一段距离之外自己的一个沉闷的房间以后还经常跟他见面。厄内斯特在出国之前最后一次去密执安钓鱼时，这位随和的奥德加就是应邀跟他一起去的三位朋友之一。

在堪萨斯《星报》工作时，厄内斯特的上司是个一本正经的城市版助理编辑，名叫 C.G.（皮特·）韦林顿。在该报的创始人及首任编辑威廉·罗克西尔·纳尔逊的监督下，该报所制定出的有关新闻英语要写得生动有力的规则多达 110 条，而皮特·韦林顿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每一个记者都要遵守这些规则。“韦林顿执行纪律极为严格，非常公正，也非常严厉。”海明威在 1940 年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时受益匪浅，真是感激不尽。”韦林顿严格要求他写短句，不能使用已无新鲜意味的俚语。他应养成措辞简捷的文风，尽量不用形容词。“那些都是我学到的有关写作的最好的规则，”海明威宣称：“我从未忘记那些原则。任何有才华的人，任何对自己所尽力要说的事情是真地有感而发有感要写的人，只要遵守这些原则，就决不会写不好。”在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海明威作品的责编马克斯韦尔·珀金斯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厄内斯特在《星报》的练笔生涯使他学到了许多有关写作的宝贵知识。珀金斯说，海明威“真正开始学习”是在堪萨斯城。

厄内斯特的首次任务是写联邦政府大楼，可他觉得这对于他那爱好冒险的口味来说过于平淡。用一位同行弗朗西斯·戴维斯的简捷的话来说，“他想去坐急救车”。挺无聊地过了 30 天之后，他终于花言巧语地说服了韦林顿，重新派他去做报道工作，其中包括第十五大街警察局、联邦车站以及位于一座山顶之上俯瞰列车轨道的市立医院。在警察局，他报道的是小型案件。在火车站，他采访正好路经那里的社会名流，观察着他所熟悉的形形色色的可疑分子的活动。在医院里，他与暴力犯罪和各种事故的受害者交谈。约翰·塞尔比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1918 年的头几个月，他同样也在为《星报》撰写有关医院情况的报道。在他的视觉印象中，这位来自橡树园的身材高大的新记者“总是消失”在医院的接待室中或急救车的后门里。

厄内斯特所憧憬的就是行动，而行动正是堪萨斯城可以提供的东西，而且多得要命。“我从未想过芝加哥是个令人不快的地方，”1953 年他对一个朋友这样说；而另一方面，堪萨斯城却“有点够人受的”。本尼·莫滕乐队和沃尔特·佩奇的“蓝色妖魔”曾猛烈地敲打出了疯狂无羁的爵士乐，为此堪萨斯城在 20 年代就出了名。其实，在此之前，这种音乐就已经在一个堪萨斯城的小镇上初具规模。在一条特别声名狼藉的街道上，每隔三四个门就有一个下流的娱乐场所，这种情况一直延伸了 25 个街区。在所谓的“血桶”和“黄色前线”等地，打打杀杀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报纸上未必都能顾及到，

而谋杀则是周六晚间的特别新闻。

同样，在《星报》最有争议的记者英昂内尔·卡尔霍恩·莫伊兹的周围，也萦绕着一股暴烈的氛围。多才多艺的莫伊兹承认曾在全国九家报馆工作过，或许还因为喜欢在酒吧间闹事、殴打警察以及将打字机扔出编辑部的窗户等事而被其他数家报馆解雇过。拉塞尔·克劳斯是一位未来的剧作家，从他所占有的《星报》体育版办公桌这一有利的位置，他曾饶有风趣地说厄内斯特·海明威似乎在仿效莫伊兹的一举一动。根据克劳斯的观点，“莫伊兹是厄内斯特最终用于塑造自己‘性格’的基础。这两人都粗野强悍，却是我所认识的一唯一的粗野强悍而又博学多才的家伙。他们可以在酒吧里弄得身无分文，然后却向酒吧招待引用莎士比亚。”但厄内斯特自己却说，他对莫伊兹只是“点头之交”，不过，他从远处曾对他做过仔细的观察，因而数年之后他写了一篇有关莫伊兹的短文：

莱昂内尔·莫伊兹是个了不起的编辑和记者。他可以在脑袋里带着四篇报道走到电话机旁，接着又考虑第五篇，然后一口气写完所有的五篇报道并赶上某一期的版面去发表。他的每一篇报道中都有一些精彩部分。无论在哪家报馆工作，他总是拿最高薪金。如果有什么人拿的钱超过了他，他不是辞职就是要加薪。他从不与其他记者交谈，除非是在喝酒。他身材高大粗壮、臂长手大。他是我所知道的打字最快的人。他开着一辆轿车。办公室里的人们都认为那车是个女人给的。一天晚上，他们在林肯高速公路上驾车去杰斐逊城的半路上，那女人在车里用刀刺他，他从她手里夺过刀扔出了车外。

莫伊兹不但是一个超级记者，而且既善饮酒又善玩弄女人。海明威医生的儿子对此极为佩服。

谈到喝酒，厄内斯特对于自己和比尔·史密斯一直爱喝的烈性苹果酒早已不再满足。他认为葡萄酒是一种更为世人所钟爱的东西，而经常与他一起喝酒的伙伴也是一个更为世俗的年轻人，22岁，名叫西奥多·布朗巴克，曾经加入过《星报》的行列。在此之前，他在科内尔呆了三年，在法国为美军野战勤务部开过四个月的救护车。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完成工作后，厄内斯特坚持要特德跟他一起去他的“住所”，他经常这样夸张地称呼他那小小的房间。尽管凌晨一点多钟他们才到家，厄内斯特还是兴致勃勃地拿出一罐劣等红酒和一本布朗宁的诗集，提议他们边喝酒边轮流朗诵布朗宁的诗句。大约一小时后，特德睡着了。四点钟时，特德被他脖子上的一阵疼痛弄醒，他发现厄内斯特仍是精神抖擞。布朗巴克崇拜伟人，在30年代他曾这样赞叹道：“有时我认为，天才的突出特征就是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们普通人工作完了以后，只想着去玩一下或是睡上一觉，而对于天才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

一旦离开泰勒叔叔的家后，厄内斯特也不再去教堂了。到来年1月他的母亲风闻此事后，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她极力想让儿子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便将他的行为斥责为离经叛道。母亲在信中用沉痛的语调指责他不去做一个基督徒，而且还结交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厄内斯特在收到这

厄尼是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又一昵称。——译者注

特德是西奥多的昵称。——译者注

封批评信的当天就回了信。在信中，他先是好言好语地敷衍了几句，马上又列举了几条站不住脚的借口，紧接着就毫不掩饰他的气愤了。

好了，妈妈，别那样哭哭啼啼的……别为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而担心、哭泣或烦恼了。我还是像以往一样每晚祈祷，对信仰坚定不移，所以请您高兴起来吧！……礼拜日我不去教堂，那是因为我为了准备周日版《星报》常常要忙到凌晨一点钟，有时甚至要忙到早上三四点。一般来说，星期日我很少在12点半以前醒来。所以，妈妈您看，并不是我不想去做礼拜。您知道，我从不对宗教胡言乱语，我也尽我之所能地去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妈妈，当我读到您写的关于卡尔（·埃德加）和比尔（·史密斯）的那些话时，我很不高兴。……卡尔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虔诚的、真正的基督徒。……至于比尔，我没问过他去什么教堂，我认为那无关紧要。我们俩都相信上帝和耶稣，我们也相信来世。教条是没有用的。请您别再这样乱说我的朋友了……

战时的堪萨斯城，对于年轻人的诱惑可谓无奇不有，尤其是妓女。（据当地爱嚼舌的人说，那条得名“第十二破布大街”的大道本应被称作伍德罗·威尔逊大街，之所以得此称呼是因为在那儿人们可以用任何价格买到一片破布。）厄内斯特的心中曾经想到过妓女，这一点可以找到许多证据。其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为《星报》所写的一篇特写。在这篇文章中，他作了一个比较：一边是一个妓女彻夜不眠地站在美术学院外的飘雪中的孤单身影，另一边，则是学院的女生在楼里与一群来自莱文沃思要塞和芬斯顿军营的士兵翩翩起舞的欢乐情景。厄内斯特的自制力很强，他很有可能仅仅是幻想过花钱与女人做爱，以此为乐，却从未真正这样做过。当然，他也很有可能光顾过几家脱衣舞戏院，因为在1927年，一个在堪萨斯城登记注册的粗俗歌舞表演经理曾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书的某一个故事中出现过，这个故事曾受到尖锐批评。

在密苏里的那几个月是厄内斯特18年的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的独立生活。然而，他母亲对于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说格雷丝并没有写很多的信以便使厄内斯特的思想和肉体在这一经受考验的时刻能保持纯洁而不受玷污，那是因为她没有必要那样做。她对于厄内斯特放弃基督教这件事的哀怨已经很明确地给了他一次告诫。他接受了这种道德说教，同时也觉得沮丧。但他当时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而在15年后，他所表达的情绪则要强烈得多。在《先生们，祝你们快乐！》这个可怕的故事中，他传达了这样一个见解，那就是经过15年的回忆思考后，他认为他的母亲带着面纱极力防止他在堪萨斯城有性生活的真正目的，也是企图使他失去男子汉的气概。

《先生们，祝你们快乐！》这个故事发生在堪萨斯城的那些凸起的山丘被铲平之前。故事发生在圣诞节，地点是城里的医院。威尔科克斯和菲希尔这两个急救车外科医生正在与霍勒斯聊天。霍勒斯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他年纪很轻，也许是新闻记者，也许不是。他的名字可以暗示他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名字的第二个音节拖长发音时，听上去就像“婊子的屁股”。按照医生们给霍勒斯讲的故事，前一天下午，一个紧张不安的、大约16岁的男孩来到接诊室，坚持要求做阉割手术。他说虽然“祈祷过，也尽了一切努力，”然而“可怕的欲望”仍然控制了他的全身，使他无法自拔。菲希尔是一个该

谐的、爱嘲笑人的犹太人，他对政府的条例（也许是与流产有关的条例）一贯是不屑一顾。他尽力劝说那个男孩打消自己的念头，告诉他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完全是正常现象，可是那孩子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说“那是不对的，是一种不洁之罪，是对上帝和救世主犯下的罪。”后来那男孩离开了医院，然而在圣诞节凌晨一点钟，一辆急救车又将他送回医院：他“用剃须刀阉割了自己”。在对于性欲的生理学原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这个男孩割掉了自己的阴茎，很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而且还选在了圣诞节”，威尔科克斯严肃地评论说。菲希尔马上反驳他：“选在哪个特定的日子并不重要。”当然这只是他的又一个犹太式的玩笑，因为在他说这话前不久，他还刻意用嘲弄的语调提醒威尔科克斯说，阉割事件可是发生在“我们的，不，最好还是说是你们的救世主的出生纪念日这天哟”。

虽然战时堪萨斯城的道德观念并没有让年轻的海明威完全失去他对童年时代所接受的那种令人感到宽慰的宗教的信仰，他的思想还是开阔了许多，认识到了自由也是一次无尽的考验，一种无穷的痛苦。这种认识与清教权威人士对人生的解释是非常相似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两个世纪前曾经说过，历史显示出“一种普遍的、持续的、总体上来说是有利的趋势：……邪恶的嗜好与欲望将战胜人类”。橡树园的自由的新教主义则持有相反的意见。它认为历史是一部人类战胜自我的记录。不过，在堪萨斯城，人们可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三

到达密苏里时，厄内斯特原打算先为《星报》工作七个月左右，然后去密执安“再过一个愉快的夏天”，接着就报名参军。他在11月15日给家人的信中郑重地告诉他们说：“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到万不得已时才参战。我很难做到时至那时再参战。”事实上，他发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他看来，那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很像是一场足球锦标赛，美国在这场赛事中是主队，德国和奥地利则是客队。如果他等得太久，他就可能会完全错过这场锦标赛。

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场竞赛中找到最好的参赛方法。整个冬天，他都让他的家人和朋友相信，他已尽力争取参军，但是由于左眼视力太差而未被录用。他对马塞利娜这样解释道：“像妈妈一样，我们俩视力都不好，可尽管这样，我还是会想办法去欧洲的。”他给特德·布朗巴克的印象是，未被军队录用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时常使他烦恼”。然而，并没有纪录证明他曾正式报名参军，另一方面，人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他申请过，就一定会被批准入伍。就拿哈里·S·杜鲁门来说，虽然他没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见，堪萨斯城的军医却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让他参了军。所以，当时情况很可能是，虽然他很爱国，但是一想到要在战壕中作战，他并不情愿。《黑森林》这个故事让他知道，救护工作是一种不用当步兵就能够接近战斗的高明办法，而布朗巴克则更让他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可行性。特德因为在学校里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所以他加入了美军战地勤务部而没有当兵。特德在给厄内斯特讲了他在法国的冒险经历后，他自己想开救护车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同时也使厄内斯特兴奋不已。早在1月份，这两个小伙子就曾自愿申请加入美国红十字会去海外服务（这个组织已故的创立者是克拉拉·巴顿，她就是橡树园的巴顿博士的姐姐）。四个月后，他们接到

通知，如果他们能在纽约的红十字会总部通过一项体检，他们就可以作为陆军少尉被派往意大利的一个野战救护队工作。

厄内斯特顺利通过了体检。不过，给他作检查的曼哈顿的医生建议他戴眼镜。他没有采纳医生的建议并不奇怪，这显示了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格雷丝很早就知道厄内斯特和马塞利娜的眼睛都有问题，但是因为她自己不喜欢戴眼镜，她就不主张她的儿女们戴眼镜。有一天马塞利娜抱怨说她上课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格雷丝就让她坐到教室的前面去。对于厄内斯特来说，没有校正的视力也是造成他后来在生活中特别容易出事的因素之一。虽然在他31岁时，他终于同意配了一副眼镜，虚荣心却常常使他在该戴的时候不戴。

使这位年轻的志愿者高兴的是，红十字会发给了他一套正规的美国陆军军服，包括完整的肩章、皮制的航空绑腿以及军官皮鞋。厄内斯特很快又添置了一双科尔多瓦皮靴，这让他又花了30美元。他对家人说，军队里的列兵和军士都必须向他这样的“伪装的中尉”行礼。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有一天傍晚在沿百老汇街散步时，他留意数了数竟有367个人——反正他是这样说的——给他行礼。5月17日，他参加了那场由75000名男男女女为红十字会发起的一次募捐运动，在一场由威尔逊总统及夫人观看的游行中走过了第五大街。由于厄内斯特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被选为游行队伍第一方阵第一排的右领头，这意味着当“向右看”的口令发出时，他能“好好地看一眼伍德罗·威尔逊”。

他以往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兴奋。当那些将使他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战争题材作家的经历开始积累起来时，他的创作性构思发展到了有时候他和家人朋友之间的交流所含的虚构成分比真实的成分还要多。这样一来，他对欧洲战争的思考便使他想到了他的祖父和外公曾经参加过的战争，接下来，又让他想起一部他曾看过的影片——D.W.格里菲斯的史诗片《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紧接着他又想到了梅·马什这位在影片中饰演“妹妹”的女演员。结果是，他一再反复地声称自己和梅·马什小姐还在演出一段罗曼史，虽然实际上他们两人从未谋过面。“马什小姐一本正经地说她爱我，”厄内斯特回到堪萨斯城时向一位记者哥们保证：“我提议去街拐角的小教堂，可她却又不愿尝尝战乱中的寡妇的滋味，所以我花了波普给我的150美元弄了个戒指给她，怎么也算订了婚。”如果说这个故事肯定让《星报》的年轻人念念不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相信的话，——它却对在橡树园与他通信的人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他宣布订婚的信到达的那天早上，格雷丝给他写的一封信正好写到了一半。在信中，格雷丝竭力使他为自己没有如她所愿地常给家里写信而感到内疚。“我们多么盼望收到你的信，”她说：“纽伯格夫人每天收到一封她儿子的信，她替我难过，便与我一道分享她的消息。”正在这时，信到了。

当格雷丝提笔再写时，她的心情更加抑郁。带着自我解嘲的口吻和理由充分的愤怒，她一开始便说：作为一位母亲她一定很不成功，因为她儿子从未承认他真正看上过哪个姑娘，却忽然谈论起订婚。她提醒海明威：他不过

D.W.格里菲斯是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是特写和淡出等电影创作手法的创始人。《一个国家的诞生》是由他导演的第一部大银幕史诗巨片，系根据美国作家汤姆斯·迪克逊创作的《部族成员》改编而成。——译者注

18岁，而且没有收入来源。如果他硬要蠢下去，注定会被当成笑料。“婚姻”，她教诲道：

是一桩美丽奇妙的事；但同时其神圣性也与缔结婚姻时的诚意成正比。你回家时可能会伤残瘸腿，那时候，这个女孩子还会爱你吗？婚礼后接踵而至的是常相厮守和一个家庭的小窝，那是一个上有屋顶、周围有四壁的小天堂。……像你认为的那种婚姻势必会很勉强，而且容易招致巨大的痛苦和彼此的误解。让上帝去帮你吧，亲爱的，我可帮不了。

两天后，她又采取了一种更具诱惑性的方式。“就在昨天，”她充满激情地提醒儿子，你还是个“黄头发的小家伙”，“紧紧地抱着我呢”。接着，她又回到正题上来。“别忘了，亲爱的，任何值得娶的女孩都值得你去等待，去为之奋斗；若是她真心爱你，就会心甘情愿为你守候，直到你成为一个男人，能够去照顾关怀她。噢，此时此刻我多希望能帮你一把啊！可我不行，只有上帝可以，他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引导你的生命之舟。”这份呼吁奇出48小时后，她又给厄内斯特写信了，不过此时她和海明威医生已事先收到了一份来自纽约的电报，上书：“高兴起来，并未订婚结婚或离婚，纯属玩笑。”因此，格雷丝又笑逐颜开，迫不及待地谈论起其他事情了。“老天！那些回家的家伙们不知会多么乐意看见你领着游行队伍，向‘可爱的伍德罗’敬礼。想到这个我们都要高兴坏了。”尽管她的语言华丽，格雷丝的言词仍旧十分符合逻辑。不到一周的时间，她就迫使厄内斯特承认他的故事纯属虚构。可是，没人愿意被揭露为一个骗子，况且她对婚姻生活“是一个上有屋顶、周围有四壁的小天堂”的描述也因其有些滑稽和虚伪而进一步激怒了他。至于她暗示说他可能瘸着腿参战归来，这一点有些令人吃惊，也可能正是这一点促使他不久以后就开始言过其实地讲述有关他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创伤的故事。

四

在穿越德国U型潜艇横行猖獗的大西洋时，海明威所乘坐的法国船运公司的船碰巧就叫作“芝加哥”号。厄内斯特告诉家人，这条船年久失修，腐朽不堪，遇到风暴时，她“前后颠簸，左右翻动，歪歪倒倒，鬼哭狼嚎地打着圈儿，晃个不停”。与船上的大多数乘客一样，他的胃也有如翻江倒海，难受至极。但是当太阳紧接着拨开了阴云时，他开始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同他在一起的有特德·布朗巴克、另一位名叫豪厄尔·詹金斯的战地救护车司机和一对“花花公子”般的波兰军官。他没有告诉家人的是，在船上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人加贝。加贝笑声沙哑，身上有种难闻的怪味，长着一头总是披下来的金发。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在一艘救生艇上的一批士兵们嬉戏玩耍。尽管厄内斯特可能并未参与嬉戏，但他至少是牢牢记住了加贝，并把她和那些波兰军官写进了他的那部流产了的战争题材小说《与青春同行》的第一章中，其主角是尼克·亚当斯。

从南边绕过了U型潜艇经常出没的海域后，“芝加哥”号最终抵达了波尔多港。在那儿，特德和厄内斯特去一个价廉物美的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坐夜车去了巴黎。军二天早上，在巴黎火车站，他们又得知不时有德军的远程炮“大贝尔塔”发射的炮弹在城内各处散落。特德认为他们应该呆在旅馆，

但厄内斯特不予理睬。他叫了一辆曾经在马恩省的第一场战斗中为挽救巴黎出过力的两缸出租车，把行李扔在了后座里，坐了上去，然后，他让特德告诉司机将他们带到“炮弹落下来的地方”。特德本以为这司机会吓坏，可当他们多付他钱时，这司机一下子就非常合作起来。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他们就在巴黎的城中穿行，寻找那种置身于敌军炮火下的刺激。快到马德莱娜广场时，他们总算听到了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声音。炮弹声震耳欲聋，特德还担心它是否会落在他们的出租车上。这颗炮弹击中了马德莱娜教堂，打下了教堂前殿的一块石头。直到这时厄内斯特才愿意呆在马勒塞布大道上的佛罗里达饭店里。

两个朋友很快就和 100 多名红十字会的志愿人员一同踏上了去米兰的征途。有人提醒他们说米兰那儿也在打仗。他们到达的那天早上，城郊的一座大型军火工厂被炸毁。厄内斯特和他的同行们收到了一个搜寻死者的命令。许多年后，这位《午后之死》的作者回忆起那令人恐怖的一幕：

说到辨认死者的性别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看到所有死去的人都是男性，倘若看见一具女尸则会令人惊诧不已。我第一次见到与死者常见性别相反的情况，是在一个坐落在意大利米兰市附近农村的兵工厂被炸后。……我们接到命令，在爆炸区的周围及附近地区搜寻尸体。我们发现了很多具尸体，把他们搬到了一个临时设置的停尸间里。坦白地说，使我震惊的是，这些死者大部分是女的，而不是男的。那时，女人还没有开始像以后的欧美妇女那样有几年兴剪短发，因此最令人不安的是发现长头发，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最难适应这一点。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偶尔会看不见这种长头发。我还记得，我们彻底完成了搜寻完整死尸的任务后，又开始寻找那些残碎尸骸。很多都已被炸飞到工厂周围的铁丝网上去了，从残存的铁丝网上，我们找到了很多一块块残缺不全的人体。……找寻残肢断体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人体被炸成碎片时竟然根本不按解剖线路，而是像炸开的弹片一样，被随意地分割得支离破碎。

对于这种死者性别的反常情况，他感到很吃惊。看到女尸的长发他感到不安，但有些尸体是短发这一事实则更令他不安。他对人类可以被如此之多的方式予以摧残感到震惊。虽然伦巴第区离他的家很远，但从橡树园来的那个年轻人随身带来了一整套旧的定影设备，用它留下了新的影像。

大概是在 6 月 6 日，在多洛米蒂山的石灰岩山峰脚下，在离维琴察西北 16 英里远的生产羊毛的小镇斯基奥，厄内斯特加入了被称为“第四分队”的救护队。这支救护队驻扎在一个旧工厂里，因为那荒凉的住宿条件和那四处弥漫的羊骚味，人们戏虐地称之为“斯基奥乡村俱乐部”。不过，那里的酒可是清亮的红酒，酸而爽口，那里的煨肉美味可口，意大利面制食品丰盛。如果能离战场更近一些的话，厄内斯特就会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了。

他的任务是驾驶一辆驾驶室座位较高的“菲亚特”卡车，将一批批受伤的士兵送到山里的一个救护所。在那儿，伤员们得到急救处理后，被安排送往医院。除了开车经过帕苏比毘山峰的 U 形陡弯时厄内斯特必须得小心谨慎之外，他觉得这工作枯燥无味。据说有一天，他和一个名叫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年轻的哈佛学子有过一次有趣的接触。约翰曾为法国赫赫有名的诺顿—哈杰斯医院开过救护车。现在他正和一支驻扎在离第四分队不远处的美国

红十字会救护队一起去完成另一任务。两个年轻人都未记住对方的名字，但是当他们 20 年代在法国成为朋友时，他俩才发现原来他们在同一时间都在多洛米蒂山地区呆过。约翰·多斯·帕索斯回忆起他曾和另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名叫西德尼·费尔班克斯的司机一道与海明威交谈过两个多小时。多斯·帕索斯对这一点的确定，使得海明威得以宣称，他也记起了他们的会面。当费尔班克斯应邀去证实他们的回忆时，他又添加了许多细节。费尔班克斯说，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当时立刻就理解了对方。至于费尔班克斯本人对海明威的评价是，他认为海明威固执己见，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忆有时的确是一件难以应付的差事。多斯·帕索斯的日记和一些私人信件表明，他在自己的单位被解职后，于 5 月 30 日去了罗马，而海明威是在整整一周后才在斯基奥露面。

一周后，厄内斯特感觉厌倦了。他告诉特德·布朗巴克说：“这儿除了风景，就是他妈的风景，别的什么也没有。我打算离开这个救护分队去看看是否就真的找不到打仗的地方了。”几乎是顷刻间，他的机会就来了。四分队的队长要找一些志愿者去充实军队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这些服务部位于威尼斯北部的皮亚韦河谷，将在詹姆斯·甘布尔上尉的指挥下由红十字会建立起来，其职责是向下岗的士兵提供咖啡、汤、糖果、香烟，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信和听唱片的地方。在军队服务部能够开始运转前，负责这些事务的“中尉”需要一天两次骑自行车到前线为部队分发香烟和巧克力。厄内斯特立即响应了号召，因为他听说自从秋季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败后，皮亚韦河下游一线的战事最为激烈。

6 月份的第四周，海明威中尉独自一人住在皮亚韦河畔福萨尔塔的一所小房子里，离前线大约一英里半。在一封写给他中学同学鲁思·莫里森的透着孤独气息的信中他写道：“每个黄昏，我装满干粮袋，拿上水壶和防毒面具赶到战壕里去。自然我还算过得快乐，遗憾的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美国人，天哪，我差点就忘了英语该怎么说了。”当他最终实在无法忍耐这种寂寞时，就请了一天假，骑车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那里住着红十字会的两位官员：比尔·霍恩和沃伦·皮斯。他们就住在一家养有成千上万条蚕的丝绸工厂的二楼。在那个工厂度过的那个晚上是一段离奇的经历，后来在他写的《我躺下》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福萨尔塔短暂的逗留期间，他感到最为亲密的意大利人是一位来自佛罗伦萨的年轻牧师，名叫唐·朱塞佩·比安基。大多数晚上，厄内斯特都是在安科纳旅第六十九团和第七十团的军官食堂吃晚餐。也就是在那儿，他结识了这位牧师。他“穿着和我们大家一样的制服，”海明威是这样谈论这位在《永别了，武器》中以唐·朱塞佩·比安基为创作原形的人物的：“但在他那灰白色军服的左胸上方有一个深红色绒质的红十字。”牧师在社交方面对厄内斯特有很大帮助，每当他感到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对餐桌前那些军官们的交谈感到迷惑不解时，他就用他那不太纯正的英语给海明威解释。在《永别了，武器》中，有位意大利军官告诉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有时我感觉你和（那位牧师）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安科纳旅第一团的数字一样。”当亨利中尉对他说见鬼去吧时，那位军官微笑着说他只是开个玩笑。

厄内斯特十分乐意与牧师交谈，但 7 月 8 日那天晚上他却没有去军官食堂，而是骑车沿皮亚韦河西岸走了很长的路到前线监察哨去看看他是否能鼓舞那里的士兵的士气做点什么。当他正在防空洞中分发巧克力的时候，战

壕中几英尺外的一枚迫击炮弹爆炸了。许多年后，他曾声明，在《永别了，武器》中，亨利中尉受伤的那段描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真实遭遇。“我听到一声咳嗽似的声音，接着传来区—区—区—区的声音，接着像融铁炉的门呼地一下被旋开，一道闪光和一声轰鸣，开始时发白光，然后在一阵急骤的强风中不断变红。”小说中这样描写说：弹片嵌进了这位美国中尉的双腿，将他从地面上掀起，在一股令人眩晕的冲力下使他的头撞到了防空洞的洞壁上。他身边最近的那个士兵痛苦地尖叫起来，这名中尉转身一看，发现那位士兵的一条腿被炸飞了，另一条腿仅由一些肌腱和裤腿连接着还留在原处。他想尽力去帮那个士兵，但却发现自己也无法站起来。他用手臂和胳膊肘支撑着一点一点地爬到那个士兵身边去解下他残留的那条腿上的绑腿来做止血带。但到这个时候，那个士兵已经死了。

他的双腿由于鲜血的缘故又热又湿，鞋子里面也是一样。他伸手去摸膝盖，但似乎却摸到了胫骨。他祈求上帝帮他离开这里。有个士兵从他的腋下抬起了他的上半部身体、另一个抬起了他的腿。在把他抬向一个救护所的途中，另一颗炮弹又在附近炸开了。那两个士兵立刻趴倒在地保护自己，把他摔到了地上。之后，他们一边道歉一边把他抬起来继续前进。到达救护所之前，他们又把他摔到地上一次。许多负伤的士兵躺在地上，等待救护。一位军医大夫从救护所出来，给他的双腿绑上了绷带。医生说因为有很多灰尘吹到了他的伤口上，所以并没有出血过多。过了一会儿，两个担架员和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过来要把他抬进去。“我还能再等等！”他说：“还有许多比我伤得更重的人！”那英国人不顾他的抗议，吩咐担架员把他抬了进去。护士们脱掉了他的裤子，上尉军医边检查边指示副手作记录。“左股和右股、左膝和右膝还有右脚多处表皮外伤，右膝和左脚有深度割伤。头皮有撕裂的伤口……颅骨可能骨折。”在现有条件下，军医尽可能地取出了存在于中尉腿内的众多弹片，同时给他注射了破伤风针，让他嗅了点白兰地，再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

他被救护车从救护所送入了一所野战医院，在那儿他呆了几天，浑身缠满绷带。然后他由火车送到了米兰一所新建的美国医院进行手术，以便取出身上残余的零碎弹片。

五

有四份文件可以证明，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所记叙的关于7月8日晚上发生的事件是真实的。首先是一封华盛顿红十字会发给他父母的电报，告知他们海明威被一枚迫击炮弹击伤。其次是厄内斯特自己给父母的一封有线电报：“腿受迫击炮伤。将获勇敢奖章。10天后可行走。”第三，一本有关美国红十字会在意大利工作情况的30页的小册子——（军事部门的报告：1918年1月—7月）——也曾提及海明威：“E.M.海明威被距他三英尺远爆炸的一枚炮弹击伤，同时，站在他与爆炸点之间的一名士兵身亡，并炸伤另外数人。”第四份证明是一张意大利政府授予的奖状，那是对勇敢军功银质勋章的说明：

厄内斯特·朱勒·海明威，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人（芝加哥），美国红十字会陆军中尉，美国红十字会官员，负责运送物资（慰问品）给正在交战的意大利士兵。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尽管被众多弹片严

重击伤，他仍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兄弟情谊。在照顾自己之前，他给予了那些遭受同一颗炮弹袭击、受伤更重的意大利战士以慷慨的帮助，他坚持要等他们先撤离后才肯让别人帮他转移。

简而言之，海明威曾为弹片致伤，表现得非常勇敢，最后被送到了
一个救护所。

当特德·布朗巴克于7月14日到达米兰后，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清楚了。特德花了一天时间探望厄内斯特，随后给海明威医生写了封信，告诉他了解到的一切事情。这封信的第一段正好可与《永别了，武器》中的内容相互印证：

我刚从这里的那家美国红十字会医院看望厄内斯特回来。……尽管大约有200多个弹片嵌入他体内，但无一击中髋关节以上部位。只有几个弹片大得足以造成几处深度创伤。最严重的情况分别是膝盖中的两片和右脚中的四片。医生说这些伤口的痊愈将不成问题。而且，厄内斯特的两腿会很快恢复如初。

布朗巴克信中的下一段是这样开头的：“现在我已跟您谈过了他的伤势情况，我想您一定乐意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然后，他就叙述了一遍海明威是如何受伤的情况以及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在这样做时，他没有理由怀疑他所复述的英雄故事的真实性。

厄内斯特正在分发巧克力时，一枚巨大的迫击炮弹在几英尺外炸开了花。强烈的气浪将他掀翻在地，他被埋在土里，失去了知觉。在他和爆炸点之间有个可怜的意大利人被当场炸死，另一个站在几英尺外的意大利人两腿被炸飞。第三个意大利人也伤势严重。厄内斯特醒来之后。他把那个士兵拉到背上，驮着他到了最近的地下掩体。厄内斯特说，直到第二天一名意大利的军官告诉了他所发生的这一切之前，他已无法记起他是如何到那儿的，也想不起他还曾背着一个人。军官说因为他表现出色，已通过表决将授予他一枚勇敢勋章。

布朗巴克的信的其余内容和上面比起来没有多大意思，只是在临近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将用所收集到的从他腿中取出的弹片和子弹做成指环。”然而，无论是在信的开头关于厄内斯特情况的详尽描述中，还是在接下去的关于他如何受伤的文字里，布朗巴克都没有提到子弹创伤。那么，布朗巴克所说的子弹已从腿上取出又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海明威医生和格雷丝被这句话的措辞弄得莫名其妙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那是由于布朗巴克在一整天的劳累后所出现的表达上的疏忽。其实，提及子弹之事的正是他们自己的儿子，是他坚持说自己负伤后还将一名意大利士兵背到了一个地下掩体。这件事令人吃惊的具体细节只有假以时日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7月15日那天，来自华盛顿红十字会总部的电报传到了海明威家中。当天早些时候，一名新闻记者采访了格雷丝。他注意到她并不了解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事情的详细情况，主要只是对儿子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业绩津津乐道。她自豪地告诉这名记者：“他中学毕业后进入报界，加入了堪萨斯城《星报》编辑部。在那里他干得极为出色，因而被同行们誉为大明星，尽管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约一天后，厄内斯特的电报送到，带来的消息是他自

己已被上报申请一枚奖章。格雷丝一直等到当月的 21 日——厄内斯特 19 岁生日那天——才给他回信。19 年前的今天，她在信首写道：“你喜临我家，当时还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不点儿，你的衣食住行，事无巨细都依赖于我。这一切宛如发生在昨天。”在提及了一些有关他哺乳期的趣事，她又夸奖他的男子汉气概：“我知道你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当最光荣的时刻到来时，你未负众望；你考虑别人多而关心自己少，因而将永远是一名英勇的男子汉。”她还不止一次提醒他注意：他的名字可是按“伟大而高贵的人物来命名的”。这是指她的父亲和叔父。自然，按她的说法，他是一个小霍尔，而不是一个小海明威。“当一名英雄的母亲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此刻，她已是容光焕发了。

也就是在那天，她那入院的儿子给家中写了第一封信。他宣称：“我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挂彩的美国人”，尽管他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在 6 月初，他的一位同事，救护车司机爱德华·M. 麦基中尉，就牺牲在一枚奥地利的炮弹下。厄内斯特继续说道：一些炮弹碎片还留在体内、一颗机枪子弹陷在右膝盖内，另一颗还在右脚里，这些将不得不通过外科手术取出来。除此之外，他一切均好，“其余的子弹和弹片已经取出。”他说道。所有的 227 处伤口——就好像百老汇的那 367 次敬礼！——恢复状况良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击中他的子弹均未伤及骨头，即便是嵌入他膝盖和脚上的子弹也是如此。“这些伤口均不会留下后遗症”，他强调说。在内战期间，一颗米尼式流弹击中了厄内斯特·霍尔的大腿，而他的这位同名者的弹伤程度更为严重——至少他这么断言——尽管有多严重还不得而知。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遭受子弹创伤的呢？这一点令人费解，尤其是他处于地下掩体四壁严密的保护之下，掩体本可使他完全免遭机枪射击，除非他曾离开过掩体，雨点般的子弹才有可能击中他的腿部。但是，如果说他是被两名士兵抬到救护所的话，正如《永别了，武器》中所描绘的那样，那么机枪扫射不也同样会将他们击倒吗？再者，他展示给布朗巴克看的子弹怎么会是从他身上取出的呢？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机枪发射的是尖头、低速（每秒 2500 英尺）、旋转的子弹，每当射中肌肉时，它们不会翻转跌落，速度也不会降低，而是直接洞穿身体，除非它们击到骨头上。可就海明威的情况来看，却没有射穿，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那样。他所声称需要动用外科手术才能取出的那两颗子弹，倘若真的击中了多骨的膝盖及脚的话，又为何没导致其骨伤呢？说实话，这本该是非常严重的创伤。因此，即使不考虑那份电报、那纸红十字会的官方报告、那枚勋章的证明以及《永别了，武器》一书，海明威的有关其机枪创伤的一席阔论也站不住脚。他随后于 8 月 18 日给家中寄的信也一样难避其嫌。在那封信中，他最终就自己是如何受到子弹创伤的情况予以了解释。

在这封信中，他并未谈起自己曾手肘并用，艰难地连爬带滚地试图去援救一名受伤后痛苦呻吟的士兵，而是谈到了他将一名意大利人背到了 150 码外连长所在的地下掩体中，尽管在此过程中他被机枪击中。”我只觉得一颗机枪子弹就像一个冰雪球打在我腿部上那样啪的一响，血流了出来。但我又站了起来，将伤员弄到了掩体内。在那儿，我差一点瘫倒在地。我外套上满是那个意大利人的血。”连长以为这个血淋淋的美国人快要死了。“你瞧，他们看到我血糊糊的外套，还以为子弹射穿了我的胸部。”这样，他也就证实了自己对布朗巴克所讲的话。

作为一个双腿被迫击炮弹击中并且头部严重划伤的人，海明威再怎么英勇，再怎么强壮，他还能挣扎着站起来，背起一名成人，并还能走半个足球场那么远的距离，这可能吗？在双腿被机枪子弹击中失去知觉后，他还可能继续其沉重的步履吗？更何况，将伤员移交给连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再说，海明威所获得的银质勋章为什么不去详细地叙述这一惊人的——即使是徒劳无益的——壮举，而是笼统地针对他在自己也需要被送下战场前却向其他受难者慷慨地施以援手呢？假果真如他所言，那么意大利政府岂不是要被感动得授予他更令人艳羡不已的金质勋章吗？要知道，当轮到给其盟军分发奖章时，意军指挥官们向来慷慨大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同样是银质奖章，对于意军士兵来说就必须做出些卓著之事才够格，而对于美国人，有时仅仅因为他们受了伤就能到手。麦基中尉就是一例。他当时“在同两名意军军官商讨协调之事，被一枚炮弹片击中而丧命”。尽管他并没有过任何英勇之举，死后还是被授予了银质奖章。

对此，《永别了，武器》一书中进一步的阐述：里纳尔蒂中尉闪进了亨利中尉所在的战地医院病房，给他的美国朋友带来了一个喜讯，“他们想奖你银质勋章……你有过什么英勇之举吗？”当亨利回答说没有时，里纳尔蒂进一步追问道：“你不是背过什么人吗？戈迪尼说你背过几个人，可是第一救护所的少校军医说那是不可能的。报请嘉奖的提议得由他签字。”“我没背过任何人，我当时根本动不了”，亨利申辩道，但里纳尔蒂对此实话下以为然。“瞧你伤得这么重，”他劝慰道。“我想我们能给你弄到这枚银质勋章。”

《在异乡》是海明威自己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之一。对于奖章之事，这则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在米兰一所医院的治疗室里，那位讲述故事的美国人碰到了一些年轻的意军军官。他们对他的获奖表示了友善，并且还问他因何原因获奖。“我把奖状拿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兄弟情谊’和‘克己忘我’等等。但是，一旦删去那些修饰词，我之所以获得嘉奖的真正原因只是因为我是美国人。”意军军官们所佩带的勋章却象征着“非常不同的经历”。故事的讲述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受了伤，这是事实；可大伙儿都明白，战时受伤不过是一场偶然不幸而已。”治疗室里的那些朋友“像猎鹰一般；可我却算不上鹰，虽然在那些从未打过猎的人的眼中，我可能像一只鹰”。

1919年初，海明威一回到橡树园就开始在小镇上宣扬自己的事迹，他父母准知道那并不真实。虽则如此，他们对儿子一跛一拐的真实性倒是深信不疑的。就表面看，公众亦无心向他提出质疑。于是，回来一周后，在橡树园中学的礼堂里，他就详细地大谈特谈起一支名叫阿尔迪蒂的意大利敢死队，以暗示在福萨尔塔战役中受伤痊愈后，他还同他们并肩作过战。然而，即使所有的观众都目睹他手不离杖，否则便不能正常行走，他演讲完后还是没有谁提过什么尖锐的问题。在《橡树园人》的一次采访中，他同样是夸大其词。他告知那位崇拜英雄的青年记者说，他被机枪子弹射倒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并且总共破击中32次，都是45毫米口径的子弹。当橡树园暨河林地区烈士纪念委员会的女士们给他邮来一份战斗经历调查表时，他的答复令她们惊愕不已。他的答复是：在完成美军志愿者救护服务队的公干后，他作为一名中尉加入了安科纳旅第六十九步兵团，并且还参加了三次大战役，即皮亚韦河下游战役、格拉帕峰战役和维托里诺韦内托战役。

在 20 年代初期，他继续向在芝加哥和巴黎的朋友们胡吹其战功，但是在谎言惑众似乎成其为第二天性的同时，正如他在 1924 年写的《士兵之家》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也付出了难以预料的代价。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叫哈罗德·克雷布斯的老兵，他经历过贝鲁森林之战、苏瓦松之战、圣米耶尔之战以及阿戈纳之战。他发现家乡的人们已经听过了太多的大肆渲染的故事，以至任何平铺直叙、不加装饰的事实都提不起他们的兴趣。为了吸引他们，他不得不撒谎；但从内心情感来说，他却感到非常内疚。

因为撒了谎，战争中他亲身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令他感到厌烦。过去那些时刻，那些每每想起来都会使他感到宁静而清醒的日日夜夜，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他本来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那么干，而他却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一个男子汉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理应做的唯一的事情。但是现在连这些时刻也丧失了它们宁静可贵的性质，随后连它们本身也在记忆中模糊消失了。

或许是为了保存这些曾使他有理由为自己自豪的记忆，海明威最终就其受伤的那天晚上所发生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描述。不过，他是在一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讲述这些情况的。大体上讲，他的读者们却拒绝认为它能概括整个事件的经过。在卡洛斯·贝克所写的权威传记中，他先是向所有的神话爱好者们就海明威是如何“摸到他的（意大利伤员）的腿和脖子，以消防员的方式使劲将其驮起，开始步履艰难地朝战地指挥部移动”进行了描述；然后，他以同样的绘声绘色就这位未来小说家的右脚背上的整齐的伤痕展开了丰富的联想，“那里中了一颗铜壳子弹”。在杰弗里·迈耶所创作的最新、最全面的传记作品《海明威》（1985）一书中，福萨尔塔地区所发生的神话故事依然存在。不过，在其《年轻的海明威》（1986）一书中，迈克尔·雷诺兹却断定：这个负伤的中尉于 1918 年 8 月 18 日写给家中的信“纯属虚构”，尽管他并未排除海明威被机枪击中之事。

有关海明威被意军征募入伍之事也同样长期被传为佳话。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一些报刊、杂志的作者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以肥私囊。40 年代，在其《袖珍版海明威全集》一书的简介中，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再次肯定了其真实性。他断言：在米兰医院里经过包扎后，这个年轻的英雄“还在意大利的阿尔迪蒂敢死队服役过一段时间”。随后，在菲利普·扬和罗伯特·佩恩·沃伦所写的有关海明威的评论著作中，在 1969 年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重新发行的《永别了，武器》的一篇封底作者生平介绍短文里——该短文特经小说家的出版商同意发表——都重复了这句话。

评论家们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海明威写了一部一个男人因腹下受伤而变成了残废男人的小说，他自己曾经讲述过他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的理由，但评论家们却没有对其提出疑问。这位《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倾向于这样的解释：在米兰疗伤期间，他曾拜访过另一所医院的生殖—泌尿科。在那里，他同一些生殖器受伤的士兵们交谈过。出于对他们的悲惨处境的疑惑，他开始想象杰克·巴恩斯这一人物的困境。在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他撇开了唯一的一个富有意义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海明威何以对那个特殊病科的伤员们如此感兴趣。

意大利米兰的美国红十字会医院设在繁华的维亚曼佐尼大街上一幢漂亮的石砌大厦里，带有一座庭院和大门。这儿离拉斯卡拉游乐场和商业长廊不远。伤病员就住在顶层漂亮的高顶房间里，阳台上可以饱览室外秀色。在这里，有 18 名护士护理着不到护士人数三分之一的病人，因此任何一名新来的伤病人员均可望获得精心的护理。1918 年 7 月间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新伤员在轮椅上被推了进来。这是一个年轻人，黝黑英俊的相貌因环绕头部的绷带的映衬更显得迷人，甚至他的上身被打满绷带的双腿的衬托下也显得格外强劲有力。护士们无论年老还是年轻，都群集在他的周围。

有一位名叫埃尔西·麦克唐纳的中年护士，身材矮小，说话时喉音很重，一听就知道是来自苏格兰。海明威经常和她彼此调笑逗弄，很快就建立了一种无拘无束的关系，从而为他违反院规打开了方便之门。就拿酒来说吧，按医院规定，伤病人员禁止在病室里私藏葡萄酒或含酒精类饮料。这小子虽然来自禁酒的橡树园地区，也远远算不上是一个酒鬼，可他却是想喝就喝。当他藏在房间衣柜里的一些法国白兰地空酒瓶被发现后，护士长对他严辞责备，但护士麦克唐纳只是佯装怒容。当他再次补充“供给”时，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她总是母鸡般围着他转，正如她后来自诩的“就像是一位好母亲一样”。她还陪着他去另一所医院进行手术前的 X 光检查，并提醒他在恢复期间要穿拖鞋以保护他那“可怜兮兮的伤脚”。按照她的说法，海明威是“一个被打坏了的玩具娃娃，如今千里迢迢从皮亚韦河畔来到米兰，为的是把弄坏的部分用胶水重新粘在一起”，而她就是要努力使他完好如初。

麦克唐纳护士对他也许有如母亲一般，但与真正的母亲比较起来，她却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说到 26 岁的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情况则不一样。她的身材与格蕾丝相同，有五英尺八英寸高；栗色的头发更是与格蕾丝别无二致。在个性方面，阿格尼丝也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她决非一个胆小怕事、不敢抛头露面的人。在她还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时，这个喜欢表现自己的年轻女子就结识了许多男人，乐于同他们一起厮混。由于她喜欢同那些她所青睐的男人打情骂俏却不愿为那些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求婚者所羁绊，她获得了一个水性扬花的名声。在纽约巴勒维医院的医疗培训结束后，她即与一名医生订了婚。不过，一旦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她就觉得不再受束缚于他了。尽管海明威确实为阿格尼丝的美貌所吸引，但如果不是她开朗奔放的性格使他易于接近并了解她，那么他们可能根本演不出那一段罗曼史。

虽然在和普鲁迪·博尔顿交往时，海明威也许还有些勇气，但要在体面的年轻女子面前主动出击，他仍显得羞涩腼腆，缺乏自信。况且，在他骚动不安的本性中有着一种被动的倾向，使他希望能够躺在那儿享受服务。在医院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手术后，当右腿和右脚被套在塑料模子里时，他别无选择，只好任人摆布。有好几个星期，他与阿格尼丝的做爱模式基本保持不变。夜幕降临时，他或是躺在床上或是在阳台上倚靠着椅子，把脚支在另一把椅子上。大概是由于右腿不能动，使他在和阿格尼丝拥抱时被迫居于她的下方。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迹象表明他喜欢这种拥抱姿势，而其原因则是后来才逐渐清楚。

不久，他就向阿格尼丝求婚。然而，即使他的这位夜班护士为他充满青

春活力的热情所心动，她还是对于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心存不安。于是，她便开始称他为“娃娃”，以期引起他对这一点的注意，但他却完全沉迷于她比他大七岁半这一事实并随即授予她“娃娃夫人”的称号。在沃彼尔的小说《黑森林》中，护士抛弃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而倾心于一位医生，可海明威决心要改变这一结局。当阿格尼丝告诉海明威她已写信给未婚夫终止了他们的婚约时，他欣喜若狂，自信已赢得了她的芳心。“老实说，我不明白她究竟看中了野蛮的斯坦哪一点，”他在给比尔·史密斯的信中写道。“不过，比尔，幸运的是她看走眼爱上了我。”他决定回到美国一找到工作后，就派人去接阿格尼丝。当他们步入教堂举行婚礼时，他希望比尔能做伴郎。

刚能拄着拐杖行走，海明威就和阿格尼丝一起到商业长廊里去逛商店，坐马车到圣西罗跑马场去观看赛马，在比菲酒吧共饮加了桃子的白葡萄酒并相依相偎。到9月中旬时，海明威深信阿格尼丝对他已是情真意笃，于是决定与另一位救护车司机小约翰·W.米勒出去度假。在马焦雷湖上的斯特雷萨大饭店他们度过了愉快的10天。晴空碧云之下，海明威或是在湖畔读书，或是让米勒带他一块儿划船。傍晚，他小心谨慎地与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格雷皮伯爵——一位99岁的耄耋老翁——一起玩撞球。那伯爵不仅球艺精湛，而且不论谁赢他都会请他年轻的美国对于喝葡萄香槟酒，同时还给他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在海明威的眼里，伯爵睿智慷慨。10年后，他在《水别了，武器》中就是这样描述伯爵的。

回到米兰后，得知阿格尼丝即将启程前往佛罗伦萨，他大吃一惊。佛罗伦萨的一家医院挤满了遭受流感袭击的病人，急需多名护士。阿格尼丝应招前往。她走后，为了打发时间，他去拜访红十字会的几位朋友。新的总部设在斯基奥以东16英里处，在巴萨诺—德尔格拉帕镇附近。他到达的当天，即10月24日，意军开始进攻，目的在于在维托里奥威尼托取得辉煌胜利。结果，巴萨诺到处都挤满了士兵，包括身穿独特的灰色军服、头戴黑穗军帽的几支阿尔迪蒂敢死队。通过对这些昂首阔步、英勇顽强的官兵整整一周的观察，海明威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种曾经与他们并肩作过战的幻觉；更确切地说，他幻想是在那时受的伤。但是，实际上，在巴萨诺唯一阵临到他头上的不幸是黄疸病症发作而波送回米兰。

应红十字会上尉吉姆·甘布尔和辛辛那提甘布尔肥皂工厂的邀请，他还在西西里岛海拔较高的陶尔米纳逗留了一周。海明威后来对一位在米兰的英国朋友发誓说他根本没有到过陶尔米纳，事实上“除了从卧室的窗户向外张望”，西西里岛的其他地方他都没有见识过，因为在他落脚的第一家小旅店，那位招待他的女主人把他的衣服藏了起来，使他跟她在一起呆了七天。虽然这个故事纯属捏造，但它很有可能是一块“挡板”，以便遮掩海明威对在陶尔米纳一周的实际记忆。比海明威岁数稍大一点的甘布尔性情温和，他对他的这位年轻朋友颇有好感。他不仅支付了海明威在西西里岛的费用，而且提出愿意承担海明威整整一年的开支，这样他们就可以共同游遍欧洲。虽然海明威对此兴奋不已，但阿格尼丝却不让他接受。“我的意思是让他回美国”，她后来解释说：“因为他很招那些比他大几岁的人的喜欢。……我告诉他，如果依赖他人生活，那就永远一事无成。”海明威回国后，他给甘布尔——他称其为队长——写了一封有悖于其性格的热情洋溢的信：

吉姆·甘布尔即上文提到的詹姆斯·甘布尔的昵称。——译者

伙计，你知道我早就打算给你写信的。翻开我这一个月来的每天的记事簿，你就可以找到“给吉姆·甘布尔写信”的潦草字迹。由于没能和你一块儿呆在陶尔米纳，我无时无刻不在生闷气。每当我想到原本我可以和你一起在那儿，我对意大利就真是他妈的得了思乡病。队长，说实话，我的感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常常想起沐浴在月光之下的那可爱的陶尔米纳，想起你和我，虽然有时有些醉醺醺的，但往往这样时总是很愉快；我们漫步穿行于那了不起的古老的地方，观赏那海面上的月光波影，那烟雾缭绕的埃特纳火山；月影婆娑，月光皎洁，月光从别墅后的楼梯上倾泻而下。每当我想起这一切，哦，吉姆，我是多么渴望置身其间啊。

在米兰听海明威吹嘘如何被拘留做了一个星期性俘虏的那位英国朋友是一位盎格鲁—爱尔兰人，名叫爱德华·多尔曼·史密斯，人称钦克。停战日那天晚上，他们在军官俱乐部初次见面。他年仅23岁，瘦高个，蓝眼睛，上嘴唇留的红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胸前佩带着诺森伯兰郡第五燧发枪团代理少校的醒目军衔标志。1914年，英军在比利时的蒙斯作战，试图阻止德军向巴黎挺进。从那时起，他几乎一直在南征北战。海明威担心，如果告诉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勇士自己仅仅是一名红十字会的官员，恐怕不能引起他的注意。据多尔曼·史密斯回忆，海明威曾对他说自己“在格拉帕峰指挥阿尔迪蒂敢死队时身受重伤，现在米兰的一所医院治疗，刚能拄着拐杖行走”。多尔曼·史密斯只要问几个主要问题就可以轻易地戳穿这一虚构的故事，但也许是意识到年轻的海明威正希望与自己搭起一座友谊之桥，所以也就没有追问。

这种容忍恐怕与钦克含蓄的说话方式、自我解嘲式的幽默、随和的态度相关。海明威花了好几个晚上与他在科瓦酒吧对饮，在比菲酒吧进餐，这才说服他的新朋友道出是如何获得衣袖上的三道杠和胸前的十字军事勋章的。对于一个伴着基普林的印度故事长大的19岁的美国中西部男孩来说，多尔曼·史密斯似乎集真正绅士所具有的所有美德于一身。虽说身处民主时代，他却是19世纪贵族的典型代表，正像他那些戴着单片眼镜的普鲁士对手们，他们在炮火中传奇式的典雅风范也令海明威钦佩不已。

多尔曼·史密斯所讲的两则战争轶事，后经提炼出现在海明威的一本关于现代暴力的22页的集锦作品中，那就是《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此书的某些部分正是要献给“英王第五燧发枪团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爱德华·多尔曼·史密斯”。海明威在1923年8月5日给埃兹拉·庞德的一封信中描述说，这场战争起初是“明确和高贵的”。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观点。他试图用多尔曼·史密斯的口吻来细述其早期的冒险经历，从而表达这一观点。“那天出奇的热。我们把一个绝佳的路障挡在桥中央。那真是无价之宝。这路障实际是从一所房子门前卸下来的一大块旧的熟铁格子，死沉死沉的，挪不动。敌人要过桥只能翻过来，但你却能透过格子向外射击。这玩艺可真是绝透了。”

后来，海明威给“各个时期的最佳战争故事集”《战争中的人们》（1942）写了一篇纯粹是卖文之作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记错了与多尔曼·史密斯初次见面的情形。他说，他还在医院时就与多尔曼·史密斯见过面。他还说：“在19岁生日前几周受了重伤后，很痛苦，不过后来想通了，在我以前

受伤的人都没事，我也会没事的。“多尔曼 - 史密斯给他写了几句莎士比亚的诗，出自《亨利四世》一剧的第二部分，使他感到非常欣慰：“说真的，我并不在乎：反正人一生只能死一次；我们都欠上帝一次死亡。……随便怎么个死法，今年死了，明年就获得了解脱。”

显而易见，在 1918 年夏秋两季写信时，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一直“过得很糟”。就他的家人、他在橡树园和堪萨斯城的朋友以及意大利的同僚所知，他的心理状态很正常，因为他从未向他们提及对死亡的恐惧，从未提到他的睡眠不好，也没有提到在未来的时代将会称之为战争疲劳症的其他症状，尽管在 8 月初他对因病卧床略有抱怨。在信中，他的态度是对体验生活的热望，是他的爱国自豪感，因为他曾经为即将到来的协约国的胜利作出过贡献。他要让收信人明白，战争是一场妙不可言的游戏，他有幸加入到了其中。另有一个令其斗志昂扬的原因被他隐瞒了。为士兵们分发香烟和巧克力本来一直被看作是妇女的工作，幸亏有了那一阵狂暴如雨的迫击炮弹片，有了中弹受伤后的自吹自擂以及奋不顾身营救一名受伤的意大利士兵的传奇故事，才让这项工作看上去像是一件男人干的活。与多尔曼 - 史密斯这样的勇士相比，海明威几乎什么都没干。不过这终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母亲的判断。当她得知儿子在战场上倒下时，她称他为英雄。厄内斯特在 10 月 18 日从米兰给家里发的一封信中宣称：“受伤的确给你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它是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中所受到的打击。”

的确，他深爱他的创伤，几乎希望因此而死，既是为了他的母亲，也是为了他自己。“当母亲将儿子带到人世间时”，他夸大其词地给母亲及家人解释道：“她肯定知道有一天儿子会死，而为国捐躯者的母亲应该是世界上最骄傲的女人，也是最快乐的女人。与其在年老体衰、万念俱灭时死去，还不如在这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青年时代死去，让生命在灿烂的光明中消逝。”（1919—1923）

第二部 (1919—1923)

第五章 退稿单

—

1月初，海明威乘坐 S.S.朱塞佩·威尔地号船回国。收拾行李的时候，他意识到，自阿格尼丝去佛罗伦萨之后，三个月了，他们之间仅仅有过三次短暂的重聚。不过，她倒是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曾在其中的一封信里暗示说，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她就可能要嫁给他。在他看来，这个含含糊糊的许诺有着一份正式婚约的效力。

10天后，朱塞佩·威尔地号船抵达曼哈顿。在前来迎接轮船靠岸的一位纽约《太阳报》记者看来，当时正有气无力地拄着一根拐杖，穿着一身漂亮的军服，披着一件由米兰最高级的一家男士时装店斯帕诺利尼时装店定做的黑色斗篷的海明威，看起来是很值得采访和交谈的对象。实际上，在紧接着战争结束后的那几个月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中，海明威的风度之浪漫潇洒和谈吐之优雅动人都是无出其右的。就连曾经指挥过美军彩虹师的年轻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不能将海明威比下去，尽管他也很喜欢穿华美的制服，并且喜欢故弄玄虚地讲述自己的战场经历。麦克阿瑟曾遭受过两次芥子气和催泪弹的袭击，因此身体上出现过短暂的不适，他觉得这样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同新闻记者谈话时提到“负伤”。

海明威向《太阳报》的那位记者讲述了很多情况。不过，在描述自己在机关枪扫射下中弹的经过时，他显然讲得比他在特德·布朗巴克和在他自己的父母面前所讲的要轻描淡写一些。《太阳报》上的特写文章写道，在海明威被枪弹弹片击倒后，两名意大利担架员明白他需要及时护理，便抬着他越过战壕胸墙。奥地利机枪手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越过胸墙之前便遭到一阵猛烈的机关枪扫射，海明威肩上和右腿上各中一弹。另外两名担架员将这位高个子的美国人送到了后方接受抢救。尽管如此，《太阳报》的那位记者还是对海明威十分着迷。那位记者断言，海明威身上的伤疤多于“任何遭受过同盟国炮火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到芝加哥车站迎接他的只有海明威医生和马塞利娜，这一切显然是格雷丝的安排。厄休拉自然是不可能到车站迎接的，因为她上大学去了；而他所乘坐的火车到站的时间又较晚，七岁的卡罗尔和四岁的莱斯特在此之前就已经就寝。不过，14岁的萨尼不加入欢迎队伍就没有什么理由了，除非说是格雷丝有意要提醒厄内斯特注意他和马塞利娜之间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兄弟姊妹的特殊的亲密关系。厄内斯特离家期间很少给马塞利娜写信，格雷丝为此感到十分苦恼。

事实上，她的一系列旨在唤起儿子的孪生同胞意识的努力在他还没有回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得知他的膝盖和脚骨上将要做手术这个消息的三周后，格雷丝特意告诉他说，他的姐姐也因膝部肿得厉害而瘫倒了。“亲爱的孩子，马塞利娜感觉和你相近，因为此时你们俩都因为‘膝盖的问题’而卧

麦克阿瑟和他那位当兵的父亲以及占有欲极强的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关系，这一点也使他和海明威有着一种有趣的相似性。

床不起。”在他回到橡树园后的12个月里，格雷丝又做了更多的努力以便向他证明他和马塞利娜之间的共同点是如何如何的多。1920年，当他在多伦多干起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后，她又试着换了另一种策略。她想通过使他对姐姐的名誉地位产生嫉妒来重新激起他对姐姐的兴趣。“因为你漠不关心，我给你写信时也就不去谈马塞利娜的事情，但就社会地位而言，她是非常成功的”，她这样告诉他。当这种策略仍然不能奏效时，她又试图使他对他的姐姐产生同情。因此，在1921年春，她在他所居住的芝加哥的公寓里留字告诉他，马塞利娜因患阑尾炎被迫做了手术。对这个消息，他所作的反映表面上是友好的。他马上给他姐姐发去了一封信，但其真正意图却是为了增加她的痛苦，因为他竟然恶毒地在一封并不太长的信里不止一次——而是13次——提到了她被“开刀”的事实。

几个月后，当厄内斯特正在筹备着同哈德莉·理查森结婚时，格雷丝再次亮出了同情心这张牌。马塞利娜“心力交瘁了”，她十分夸张地对她儿子说：“精神都已经崩溃了。你不能给她写写信吗？……她老是那么急切地询问你的打算。”这一次，他连写几句挖苦话的耐心都没有了。因为，尽管马塞利娜是那样深爱着她的弟弟，以至于他即将结婚的消息使她精神上难以忍受，但他的态度却是，只要能做得到，他希望避免同她有任何来往。在50岁时写给萨尼的一封信中，他竟公然宣称，在他眼中，马塞利娜“从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即50年前起……就一直是一个拥有头衔的婊子、妓女、坏女人。”

厄内斯特的嫌弃使马塞利娜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因此，她等待时机，待他死后便进行报复。关于他本人的情况，他从来不愿让广大读者了解的一个方面是他那与众不同的童年故事。假若不是因为马塞利娜写了那本《在海明威家》（1962），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便永远也不会为人们所知了。

二

海明威是在帕多瓦附近的一所美军医院里最后一次见到阿格尼丝的。她完成了在佛罗伦萨的工作之后便调到了那所医院。可她寄到橡树园的信却是发自另一个地址，是位于托雷—德—莫斯塔的一所挤满受伤的意大利军官的医院。她说她工作干得挺带劲，心情也很愉快。不过，当别的护士指责她对那些长相英俊潇洒的病人献媚求宠时，她也有些不高兴。“你知道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事的，对不对？”她问道。如果她反问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厄内斯特的疑心的话，那么，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他每天都给她写的长信突然明显地变得更长了。你不要写那么多的信了，她在1919年3月1日的一封信中这样告诉他。在这封信中，她几乎说出她的感情已另有所属了。“我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完人。不过，说实在话，我过去倒一直是那样的，只是现在正逐渐失去本来的面目。今晚，我感觉非常差劲，所以，让我向你道声晚安吧，孩子，不要有什么轻率的举动，好好享受生活的乐趣吧。爱你的，阿吉。”就在那个还没有过完之前，她就说出了实话。她已经受上了一个有爵位的意大利中尉杜卡·多梅尼科·卡拉乔利。《黑森林》毕竟成了预言。厄内斯特将他的护士输给了一个更加老练的对手。

在她所写的海明威一家的传记中，马塞利娜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免谈及她本人对弟弟这次恋爱失败的感受。不过，她却表明她十分关注厄内斯特的反

应。据她说，他当时失望至极，以至于发了高烧，不得不卧床养病。以后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都无法想任何别的事情。他用以自我安慰的狂暴念头之一是希望阿格尼丝在返回纽约的时候能在码头上失足跌倒，把门牙全都磕掉。这种念头是在一封写给埃尔西·麦克唐纳的信中表露出来的。他对她的怨恨在心中郁积了多年，这一点可以从《在我们的时代里》的第十篇短篇作品中明显地看出来。在米兰的一所医院里，一位名叫阿格的护士坐在故事叙述者的床上，她的身体在炎热的夜晚摸上去凉凉的。他俩商定，停战以后，他应该回国找一份工作，以便为他们结婚创造条件。但他一离开，她马上就听任一个阿尔迪蒂敢死队的军官同她做爱。在阿格对他说“他们之间的事只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游戏”之后几个月，故事叙述者因为同一个芝加哥闹市区百货商店的女店员在林肯公园内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通奸而染上了淋病。

阿格是实有其人，女店员则是编造的。“我开始设法淡忘（对阿格尼丝的记忆，经过一个疗程的酒精的治疗和其他女人的治疗，我已彻底清除了它，”厄内斯特用不无戏剧性的口吻告诉他在红十字会时结识的朋友豪伊·詹金斯，但像往常一样，他又把事实夸大了。当天气晴朗之后，他便同橡树园的一个名叫凯思琳·朗韦尔的漂亮姑娘一起泛舟游乐：他还时不时地同一个曾经在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名叫尼古拉斯·内罗尼的硬汉一起到芝加哥的威尼斯酒吧去分喝一瓶意大利吉安提酒。6月初，在密执安的一家乡村俱乐部里，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据他自己的计数，他那回一共喝了“十五杯马提尼酒，三杯香槟威士忌和记不清有多少杯的香槟。”

6月15日，他收到阿格尼丝的一封信，诉说她已遭情人抛弃，但此时厄内斯特心中即使还有可能残存着一点要和她言归于好的冲动，那也让他那受过伤害的自尊心给打消了。“可怜又可恨的孩子，”他写信给豪伊·詹金斯说：“我为她感到很惋惜，但又不可能为她做些什么。我曾经受过她，但她却欺骗了我。……她现在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我却还是希望能对她有所帮助。‘但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在很久以前很远的地方，从班克到曼德勒并没有班车运行。’”直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出现麻烦以后，阿格尼丝才作为他一直爱着的女人隐隐出现于他的想象中。

在平复感情创伤的过程中，他主要借助于工作而不是借酒浇愁。那年春天，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屋里，一边抽着在海外学会抽的俄国雪茄，一边创作着短篇小说。他把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用打字机打出来，投寄到《红书》或者《星期六晚邮报》杂志。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模仿了通俗杂志的风格；这些作品也都无一例外地带着退稿单回到他的手中。在他次年于温迪米尔别墅动笔写作的一篇小说中，他已显示出他的写作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但有待学习的东西仍然很多。《意大利方式》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内罗尼的拳击手的故事。这位拳击手本来默默无闻，化名皮克尔斯·麦卡提从事拳击活动。后来，他参加了阿尔迪蒂敢死队，在巴萨诺北部山区进行的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学会了狠杀奥地利人。尽管小说本身比较粗糙，但《意大利方式》是一部反映出雄心壮志的小说。这篇小说本身就已昭示出，其年轻作者已经有了这样一种信念，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将会拥有意大利的这场战争，就像别的作家拥有别的战争一样。

在他灰心失望的时候，支撑着他的是崇高的理想。遗憾的是，在他母亲看来，这些理想一点也不现实。她所看到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提出他应该上大学的建议，他却一笑置之；他没有露出一丝想要找个工作迹象；

她要他把自己凌乱得难以形容的房间收拾干净，他却根本不予理睬。

除了对厄内斯特感到失望外，47岁的格雷丝还要忍受胳膊和肩部关节炎的痛苦，且不说她已进入了更年期。还在1919年时，她的神经就已经崩溃了。在她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几乎有点歇斯底里意味的信中，这一点就已经体现了出来。这封信的内容是谈她对温迪米尔的厌恶。“每年夏天当我被迫去那个地方度夏时，我的神经都崩溃了。在那儿，四面都是山丘和湖水阻隔着，没有什么风景可欣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成天在家里当苦力，站在洗涤槽和灶台旁不停地干活，直到我的脊骨神经疼得我不得不躺下。即便有机会来了，可以去游泳或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时，却又常常因身体过于疲乏而不能成行。多少年来，我的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以至于现在只要温迪米尔的景象出现在眼前，我就禁不住眼中落泪，喉咙哽咽。”

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她有一个计划遭到了海明威医生的反对，因而引起她的不满。她的计划是，在和温迪米尔隔湖相望的朗菲尔德农庄的小山上为自己建一栋小别墅。她准备这样给它命名：格雷丝小屋。不过，尽管海明威医生从未正式同意过这一计划，她却我行我素地于1919年建起了那栋别墅。“我爱你们所有的人，”她用最富演戏意味的姿态向全家人慷慨陈词：“但我若想继续活下去，就不得不偶尔离开你们大家，去休养一下。”

唯一的一个似乎能够完全理解格雷丝的人是从前跟她学过运嗓法的学生，即一个名叫露丝·阿诺德的年轻女子，她20岁出头、文静而又漂亮。露丝是附近伊利诺伊州河林镇上一个推销员的女儿，1907年开始跟格雷丝学习，当时她12岁。一年以后，她搬进了海明威家在橡树园的住宅，既当临时厨师，也给做母亲的当个帮手。对这个姑娘来说，能摆脱她那几个作威作福的姐姐，还有她那冷漠无情的父亲和她那长期患病的母亲，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此外，她还崇拜格雷丝，称其为“妈妈”。“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拥抱您，亲吻您，”在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她动情地说。这个怀着崇拜之心的姑娘很快就学会了格雷丝独特的说话方式，而且还喜欢摆弄她“妈妈”的那头秀发。“真希望此刻您能在这儿，我定会将您的头发洗烫成漂亮的卷发”，1909年夏，当格雷丝和马塞利娜母女俩在楠塔基特岛度假时，露丝给她们写信这样说：“现在是晚上九点半，妈妈，我得去洗发然后睡觉了。”若干年后，她在另一封袒露心迹的信中对格雷丝说道：“我真希望此时能为您洗发，抚摸您那秀美可爱的额角，就像我有机会时每天晚上所高兴做的那样。”

1919年初夏，露丝随同格雷丝、马塞利娜、厄内斯特和更年幼的孩子们一起到了温迪米尔。格雷丝小屋建成以后，格雷丝往往只喜欢带着露丝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卡罗尔、莱斯特去那儿，一连住上好多日子。晚上，两个女人在一起拼缀碎呢地毯，一起谈笑和唱歌。也许她们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不含任何性的成分。可是在有些人中却流传着一种“恶毒的谎言”，说她们是相爱的情侣。后来，在格雷丝孀居时期，在她与露丝一起住在河林镇时，这种谣言更被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

1919年8月2日，露丝离开了温迪米尔别墅，回到了橡树园。那儿的住宅是由勤劳的海明威医生亲自照管的。没过几天，她就发现，在北凯尼尔沃思大道600号这一家里，她已被一个再也不能自我克制的吃醋的丈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当格雷丝从她丈夫口中得悉他所做的事后，她立即抗议说：“许多年来，可爱的、忠诚的露丝将她自己的青春和忠实的服务贡献给了我。

她现在需要我。……世上没有什么人能夺去我丈夫的位置，除非他自动放弃这种位置去做小肚鸡肠的人，并与他妻子的那位缺乏幸福和温情的家庭生活的忠心耿耿的女友争风吃醋。”至于露丝，海明威医生的敌意使她既感到莫名其妙又十分悲伤。“要我不再去 600 号已经是够不容易的了。”她在给格雷丝的一封信中诉说道：“要我舍弃您和您的爱，更是万无可能。您是我心目中如此完美的典范，而且一直是鼓舞着我的一种精神力量。”马塞利娜和厄内斯特两人虽然同是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见证人，但他们对此所采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对于认为这种关系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想法，马塞利娜持嗤之以鼻的态度，同时她还对妈妈说，她觉得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不理智的”；可海明威则认为无风不起浪。这种观念很可能在许多方面左右了海明威内心深处对他母亲的看法。也许它只是进一步证实了他潜意识中存在于了很久的有关她的性别极其复杂的认识，——他的这种认识起源于很早的时候，那时他听到了家人讲述的少女时代格雷丝·霍尔的故事以及家史中那个爱骑自行车的假小子的故事。也许在他看来，她总是千方百计地羞辱海明威医生、这本身似乎就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她的性别的复杂性。也许这事也可能促使他对她感情上的脆弱性产生了新的认识，因而使他对她多了一份同情。但即便真的如此，那也丝毫没能缓和母子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1919 年的整个夏天，母子间的关系都十分紧张。从格雷丝的角度来说，厄内斯特从来都不承担一点家务杂事，尽管他右腿的腿劲已经恢复。他除了写他那谁也不想买的小说，或是嘴里叼支香烟若有所思地到处走动外，便是驾着比尔·史密斯的别克车在乡间小路上飞驰，要不就是同一个曾在莉兹·迪尔沃斯的餐厅里当过女招待，名叫玛乔丽·邦普的红头发中学生一起看月出。为了尽力做到公正——当然是按她自己的标准，格雷丝对马塞利娜说：“厄内斯特非常像我。……当（他）度过了这一阶段……与自己和其他人的矛盾冲突，把他的精力转移到正事上来后，他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从厄内斯特这方面来说，特别令他恼火的是他的地位竟然没有变化。仿佛他在堪萨斯城时根本没有在星期六的夜晚坐过救护车的后座，也不曾从伦巴第的一个战场上出力搬运过女尸，也从来不曾体验过弹片扎进皮肉的痛苦。他刚回到橡树园的那个晚上，格雷丝曾称颂他是得胜归来的英雄、可第二天她便开始将他仍然当作小孩子来对待。有时候，看到她的身影，听见她的声音，他就受不了。到了这种时候，他只好逃走。

三

1919 年夏季，海明威所作的最远的一次钓鱼旅行把他带到了位于苏必利尔湖以南 15 英里处靠近锡尼城的密执安半岛北部的丛林地区。厄内斯特和他的两位朋友阿尔·沃克以及约克·彭特考斯特在大福克斯湾和小福克斯湾上垂钓七日，钓到大约 200 尾鱈鱼。约克钓的鱼中有一条长达 15 英寸半，但最大的一条鱼还是由厄内斯特差一点就钓起来的。“我在小福克斯湾的一道旧水坝下钓丢了一条鱼”，他给豪伊·詹金斯写信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条鱈鱼。我的钓鱼钩钩住了一些陈旧的圆木，我使劲地又拉又拽，可在我把它的身子拉出水面将近一半时，我的钓鱼杆折断了！”不过，他还是有收获，为一篇著名的小说作品找到了素材。

1924 年 8 月 15 日，他告诉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B.托克莱斯说，在他刚写完的一篇有关钓鱼的小说中，他“试图像塞尚那样描绘乡村景色，

心情十分舒畅，有时候也很有些来劲。小说长约 100 页，什么也没有发生，可乡村景色太美了。那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所以在我看来是一目了然，其中一部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对鱼的描写也十分精彩。不过，尽管如此，写作还是一件吃力的工作，难道不是吗？”他觉得那篇小说对鱼的描写十分精彩，这的确没错。（“他观看着鳟鱼用它们的头部扎入水流中稳住身子。因为他是穿过河水那凸透镜般的水面一直望到深处的，河水表面的流水拍打在阻住去路的圆木桩组成的桥墩上，滑溜溜地激起层层涟漪，这许多在水深流急的河水中的鳟鱼就显得稍微有些变形。”）他说他对自然景色的创造性描写像是一组塞尚的绘画作品，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面前，极目所见，就是那片松林覆盖的平原。被焚烧的土地到左面的山脉前为止了。前面，平原上掀起一个个岛屿似的黧黑的松林。左面远方就是那道河流。）这就是说，他的信从两个方面向斯泰因和托克莱斯两位女士准确地介绍了他所创作的作品。然而，有趣得很，他居然只字未提自己在《大双心河》中极力想达到的多个目标中难度最大的一个目标：在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小说中展示激烈紧张的内心活动场面。

当孤独的尼克·亚当斯离开锡尼城火车站，穿过一片“被火焚烧过的土地”朝着“远方的那座标志着苏必利尔湖边高地的青山”走去时，他的心中有一种美妙的解脱感。“他感到自己已经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写作，不再需要完成其他的义务了。这一切都已甩到身后去了。”到了傍晚，他便支起帐篷，钻到里面去，欣喜地注意到帐篷里面的空间是多么地“像个家”。最后，他认为：“他安顿了下来。什么东西都不会来侵犯他。这是个扎营的好地方。他就待在这儿，在这个好地方。他正在他自己搭起的家里。”

由此处开始，这篇小说接着描写了大量细节来说明钓鱼活动是多么了不起，尼克的时间又过得有多么愉快。不过，在他的意识域的边缘也潜藏着一些阴郁的愁绪。第一天晚上，刚吃完晚饭，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头脑“正在启动运转”，不过，由于疲惫的缘故，他可以“止住它”。第二天，他的欢乐情绪又一次遭到破坏。他与一条他所见过的最大的鳟鱼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搏斗，结果却以鳟鱼的挣脱告终。当尼克收回钓丝时，他感到“有点不舒服，似乎要坐下来才好受一些”。为了避免在一天之内再一次打败仗，他便修改了原定的计划。他决定不再跳进那大树掩映的沼泽内的齐腋窝深的水中，因为在那儿他可能钓到大鱼，但却无法将其弄上岸。因此，他决定将这项活动推迟到以后再行。“今后能在这沼泽中钓鱼的日子长着呢，”小说结尾时，他这样自言自语道。

尼克往河边进发时感觉已经抛在身后的“其他的义务”是什么呢？他为何不止一次地把帐篷称作他的家，他又为何那样高兴呆在里面呢？为什么没有杀死那条大鱼他就感到不舒服呢？除了《拳击家》之外，《大双心河》提出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比任何其他一部海明威的小说都多。

如果将这部小说与作者的个人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这些问题似乎就能找到答案。1919 年的夏天，厄内斯特是在思考和写作中度过的，同时也是在与母亲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第二年夏天，他们之间的不和已爆发成为公开的冲突。他 21 岁生日过后才几天，她就把他赶出了温迪米尔，并且在他临行前递给他一封信，那封信毫无疑问是她书信写作生涯的最佳代表作。因此，到他写作那篇反映他到锡尼的钓鱼旅行的小说时，他不仅受着战后第一个夏

天那些令人烦恼的往事的困扰，而且还受着第二个夏天的更加令人烦恼的往事的烦扰。另外，尼克觉得已抛到身后的“其他的义务”也可能就包括让他母亲高兴这一义务。他把帐篷称作是自己的家，这种说法可能就代表他对于自己被逐出父母的度夏别墅一事的一种反映。也许可以说，那片被火焚烧过的土地和那些因生存于其中而变黑了的蚱蜢是一种含蓄的暗示，令他想起了他母亲对焚烧东西的嗜好。最后一点，他的那种似乎正在启动运转并且不断威胁到他的满足情绪的心理活动可能就是愤怒。

《大双心河》岸上的那位钓鱼者显然是一位心理矛盾的人，但矛盾的确切性质却从来没有说明过。”在沼泽地里，两岸光秃秃的，巨大的雪松在头顶上会聚在一起，阳光照不进来，只有一些斑驳的光点；在湍急的深水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钓鱼会是可悲的。”这些话非常适合那个钓鱼者，说明他在极力避免触及他那备受纷扰的内心世界。自始至终，尼克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不可理解的人物。

然而，对于20年代的许多读者来说，尼克并不是一个谜一样的不可理解的人物。因为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尼克之谜的答案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创造他的作家乃是受着战争创伤的“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最后，这种看法渐渐出现于对这篇小说的正式评价中。埃德蒙·威尔逊在《厄内斯特：道德规范的布尔东·戈热》（1939）中宣称，那种使尼克产生了“一点恐慌”的经历就是“他自己曾亲身参加过的人类的大规模毁灭行动”。在为陈述这一观点作铺垫的部分和由此而阐发开去的部分中，《厄内斯特：道德规范的布尔东·戈热》这篇文章包含有一些极有见地的论述，阐述了在海明威小说的那种极其简单的表面之下潜藏着强忍住的悲痛和抑制不住的不安情绪。不过，在《大双心河》这篇小说中，威尔逊却觉得有必要具体说明其中潜在的不安的根源。可他在说明的时候却只能想到这种不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他没有举出原文文本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论断，原因很简单，因为原文中根本找不出这种证据。小说中没有提及战争的只字片语，而且，从可以观察到的尼克的行为来看，恐慌是不是他所要摆脱的情绪还大有疑问。人们也同样看不出，战争的创伤与他所觉得已经抛到身后的那些没有说明的“其他的义务”或与他那对帐篷“像个家”的极其满意的表示有什么关系。

《厄内斯特：道德规范的布尔东·戈热》发表五年后，马尔科姆·考利给海盗出版社出版的《袖珍版海明威全集》（1944）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进一步加强了威尔逊的说法。对海明威来说，这篇文章一定没有令他惊奇。因为，在《流放者的归来》（1934）中，考利就已宣称，190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美国作家都属于迷惘的一代，战争已经破坏了他们与自己祖国之间的关系，而他们与其他任何国家也没有依附关系。考利的基本信念之一是，他认为海明威对那场战争有着与自己完全一样的感受；他还喜欢将他们的其他一些方面进行比较。他有一段生活经历与海明威在密执安的那段生活经历十分相似，那是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宾夕法尼亚州坎布里亚县的一段生活经历。他童年时代的夏天常常在那儿的树林中钓鱼、打猎和散步。他生活中与橡树园相对应的是匹兹堡的一个住宅区，他的父亲就像海明威医生一样在那儿行医。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考利曾有意参加法国的一支救护队，但由于他到达巴黎时，救护队对司机的需求趋缓，结果他便去为法国军运部门开军用卡车。根据他的回忆，这与在意大利开红十字会救护车并没有多大差别。他是那样完全地与海明威认同，以至于在他的《袖珍版海明威全

集》序言中他竟错误地断言这位小说家出生于 1898 年，即他本人出生的那一年。海明威曾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他已意识到考利的那种把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强加在他身上的倾向。因而、在他临死前五年写给《纽约时报》的哈维·布赖特的一封信中，他用挖苦的口吻说道：“马尔科姆觉得我跟他一样，因为我父亲也是个医生，而且我出生后才两周就去了长有铁杉树的密执安。”对海明威来说，考利由《流放者的归来》中迷惘一代的观点进而提出关于《大双心河》的合乎于此种观点的解释，这一定会让他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

在《袖珍版海明威全集》中考利虽未明言，却通过巧妙的暗示手法论证说，海明威所描写的那位钓鱼者，就像海明威本人一样，也是一名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正极力勾勒出对受伤情景的充满恐惧的回忆。诚然，小说中是找不出证明尼克心境的证据，但这并没有使考利感到困惑。他说，海明威的小说“大多都是连续性的”，这意思就是说，《大双心河》中隐含的情绪可以根据他三年后写作的《我躺下》所表达的情绪来理解。后面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战时在意大利的一名美国中尉，他害怕在夜晚闭上眼睛。由此，考利说，《我躺下》具有这样的作用，可以使读者“对前一篇小说的看法发生一些改变”，并且使人们注意到“我们在读第一遍时可能会忽略的东西：背景部分有一些阴影，而小说的故事有一部分发生于内心世界之中”。

在强调《大双心河》和《我躺下》所表达的情绪之间的一致性的时候，考利忘了指出这一点：在后一篇小说中，情绪描写最多的阶段是主人公的童年，其中涉及到主人公双亲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过，考利对战争创伤论的进一步补充修正很快使其他的评论家们受到启发，这些评论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名叫菲利普·杨的敏感的年轻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着一本《袖珍版海明威全集》跑遍了半个欧洲”。1952 年，杨凭着他对考利这篇序言的推崇，结合他本人对战争的反应，写成了一本书，宣称海明威 1918 年所受的伤对他影响极深，致使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所创造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作品，都围绕着《大双心河》中那位身有残疾的“病人”的故事，并且以其为主题。10 年后，马克·肖勒发表了一个现已成为评论界口头禅的观点，他将海明威描述为他在皮亚韦河畔福萨尔塔所遭遇的事件的终身受害者。肖勒以涵盖一切的口吻宣称：“他所遭遇的事情里再也没有比这次受伤更重要的因此，在解释这篇小说时的战争创伤论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下来，并不是靠着文本所提供的证据，而是依靠评论家们所了解的作者生平，或者说是依靠评论家们自以为掌握了作者生平。作家去世后，这些评论家们便迫不及待地抓住他死后发表于《流动的圣节》中的一个评论作为表明他们看法正确的铁证，因为作者的这个评论说，《大双心河》是描写“战场归来的情况的，但其中没有直接提及战争”。他们若是聪明一点的话，就该想一想，这是否是一位善于捉弄人的大师在坟墓里同他们开玩笑，就像他生前常做的那样。

这篇小说发表后，有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海明威对它一直闭口不谈。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他却多次声明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不过，这些声明也很有可能反映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40 年代晚期标志着海明威死亡的开端。自杀的怪念头充塞着他的脑海，其中还掺杂着对精神失常的恐惧。他的朋友巴克·拉纳姆曾看见他早上写作时手里端着一杯酒。若干年来，他一直爱说第一次战争使他损失了大量的睡眠，但在他在作这种坦白的同时，他通常又很谨慎地以十足的男子气宣称自己已经终于战胜

失眠，重新恢复了良好的正常状态。然而，形成于40年代晚期的那场令人心惊胆战的悲剧暴露了这种大话的虚假性。他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又坚决反对寻求专家的帮助来解释这些问题，因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一番英雄主义的解释。为了补偿他那处于危险境地的自我意识并维护其坚强男子汉的声誉，他又一次地求助于福萨尔塔的经历。

于是，在写于1948年8月25日的一封信中，他告诉马尔科姆·考利说，他现在已能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身体上、思想上、精神上以及道德上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大双心河》描写的是一位从战场上归来的人，而身为作者的他在那篇小说中仍然在受到伤害。他向考利保证说，关于他的实际情况是，在战争中“我一直深受伤害，临到后来，我真正是感到恐怖了”。在几年后另一封写给《纽约时报》的查尔斯·普尔的信中，他又一次地将《大双心河》描述成为“一篇描写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年轻人的小说。不过，据我的记忆，小说却根本没有提到过战争。这也许是使该小说成功的因素之一”。然而，私人通信中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前期的排练而已，为的是在《流动的圣节》中他可以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假象。

《流动的圣节》这本书写于1957年至1961年之间。在此期间，作者长期以来同自己就自我毁灭的问题所进行的辩论正坚定不移地朝着极端的决定方向发展，尽管他抱有一种令人恐怖的信念，他也认为自杀是一种缺乏男子气概的懦夫行为。他死后，他在评论界的敌人正是坚持着这种观点，这也正是他所害怕的。照这些评论者看来，他的生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凄凄惨惨地结束的。1962年1月，德怀特·麦克唐纳在《遭遇》杂志的版面上以颇为幸灾乐祸的态度评论道，1930年后他就不再拥有勇气了，到了1961年夏天——这位评论家残酷地接着说——其处境就更是危机四伏了：狮子已经再也阻挡不住，宝剑刺不进公牛的脖子，大鱼也开始挣断钓丝，这已是第15个回合，勇士看来已经不行了，唯一的出路便是自我毁灭。

就连诺曼·梅勒这样的海明威的狂热崇拜者，也在《绅士》杂志上一篇题为《巨大的损失》的忧心忡忡的文章中不情愿地承认，海明威的自杀是“美国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死亡以来最不可理解的一起死亡事件”。使梅勒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通过自杀这一行动，海明威似乎是对自己所代表的一切都发生了疑问。他原来一直是以他所从事的一切事业的坚强捍卫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原来曾一贯宣称人生的唯一大事是坚持活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同那样的死亡调和起来呢？

对于这个问题，梅勒的决定性答案是：“海明威不可能是一个为了寻求刺激而去主动冒险的勇士。他本人生长期奋斗，艰苦求索，其真相更有可能是他在努力同自己的怯懦作斗争，力求克服内心里一种想要完全毁灭自己的欲望。他内心的画面是一幅恶梦般可怕的情景，他夜晚的时候就用来同那些鬼神搏斗。对他一生业绩的盖棺定论甚至有可能会得出这样的认识：他未竟的事业是悲剧性的，他所完成的事业则是英雄的事业，因为他身上可能背负着一个忧虑的重担，任何一个气量比他小的人一定会被这种重担压得窒息而死。”

作为一种推测，梅勒的评论具有一种非凡的启发意义。它本该促使人们对海明威早期生活的动因进行彻底的考察，但它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旧的思维习惯占了主导地位。福萨尔塔成了一位侠义英雄历史的断裂点。通过在

《流动的圣节》中装模作样地暗示《大双心河》描写的是一位竭力摆脱有关那场战争的回忆的男子，海明威本人也为那种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

在福克斯湾钓完鱼后回到温迪米尔，厄内斯特发现他的父母都在家，但露丝·阿诺德却已踪影全无。在后来的岁月里，露丝只能在海明威医生不在家时来拜访格雷丝，这是他在婚姻生活当中为数不多的几项持久的胜利之一。

当他的父母关闭了温迪米尔的别墅回到橡树园后，厄内斯特继续住在迪尔沃思的家里直到10月初。在这段日子里，他上午写小说，下午则帮莉兹干点杂活，以此作为换取衣食的手段。他一直喜欢莉兹，她那活泼愉快的面容反映了她的热忱慷慨的性格，她对于听音乐会和讲演的浓烈兴趣也很令人愉快。由于同格雷丝的关系变得这样糟，他越来越信赖莉兹了，似乎觉得她才是心目中的母亲似的。他也喜欢她的丈夫，那个名叫吉姆的铁匠。海明威医生非常严厉，而这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大胡子男人待人却很随和，尤其是在饮酒问题上。多少年来，吉姆都在暗中给厄内斯特和比尔·史密斯苹果酒，好让他们在霍顿小溪里钓鱼的时候喝。

不少读者对海明威同普鲁迪·博尔顿有性关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其中有一些人同样也相信——武断地相信——他是直到那年秋天与迪尔沃思一家住在一起时才开始丧失自己的童真。据说，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他护送莉兹的派恩赫斯特小屋的一个女侍者——不是玛乔丽·邦普，她已经返回中学了，而是另一个年轻女子——出门到霍顿湾码头的尽头时，就在那粗糙的铁杉船板上他和她发生了性关系。然而海明威本人却根据这个小插曲创作了一篇猥亵的短篇小说，并在这篇名为《在密执安北部》的小说中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说法。尽管小说中的那位女侍者显然没有经验，但她那位纠缠不休的搭档却似乎颇为老练。当然，小说中的这一情节描写也有可能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但是，有些人认为，海明威的身体直到20岁时还是如他母亲所希望的那样是一座没有被玷污的圣殿，而这一情节描写却给这种假装体面的想法投上了一层怀疑的阴影。

由《在密执安北部》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的心目中对待迪尔沃思一家究竟是持何种态度，因为小说中的那位青年男子被取名为吉姆，而与吉姆发生性关系的那个女侍者叫莉兹；此外，吉姆“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长着满脸胡子”，他是霍顿湾铁匠店的店主；吉姆特别喜欢的莉兹身上的特点之一正是她的面部表情“如此活泼愉快”。由于这篇小说是发表在巴黎一家好标新立异的先锋派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三篇故事与十首诗》（1923）的书中，迪尔沃思一家有幸同海明威父母一样一直对《在密执安北部》一无所知。但马塞利娜读过这篇小说，她产生了极大的反感。甚至在她哥哥死后，她仍然对他在那篇小说中对迪尔沃思一家的侮辱愤愤不平。“该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一男一女，有着与我们的两个朋友——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对夫妇——一模一样的名字。小说中对他们的描写，尤其是那男的，同我们的朋友十分吻合，因此，我读着读着……只感到恶心。”

《在密执安北部》的初稿是1921年晚夏于芝加哥写成的，此时正值海明威同哈德莉·理查森于9月3日结婚的前夕。小说的第二稿和最后一稿是在五个月后于巴黎写成的。尽管日后海明威在待人残酷方面还会留下长久的记

录，但通过用两个可以辨认的人物来替换自己和那位女侍者，海明威可能只是想淡化这篇小说的自传性质，这样，他所深受的人读起来也就不会感到痛心。不过，即便假定不想伤害哈德莉确实是他所虑及的一个因素，他为什么偏偏从人群中选定了吉姆和莉兹·迪尔沃思作为他的替身？他是否是在迎娶一个比他大了近八岁的新娘前夕，尽量使自己去摆脱掉另一位年龄大得更多的女人的性诱惑呢？

不管这件令人好奇的事情是否真地属实，《在密执安北部》是一篇让人感到清新的写得十分真诚的小说，尤其是它对诱奸后所发生的事情的记述。一得手后，吉姆便对那位女侍者如此漠不关心，他趴在她身上睡着了。莉兹从他身下挣扎出来，摇了他几下，满含泪水地呼唤他的名字，可吉姆只是把头偏向一边继续睡着。最后，莉兹脱下外套盖在他身上，小心掖好两边，就像是他的母亲。”然后她穿过码头，踏上陡直的沙土路回去睡觉。一股寒冷的薄雾从港湾上升起，透过树丛蔓延开来。”有“一类人”的心境海明威非常了解，D.H.劳伦斯曾经这样评论道：“这种心境是一种有意识的、习以为常的漠然状态。……什么都无所谓，任何事情都任其自便。人希望自己处于无拘无束的状态。他只避免一件事情：搅和在其中。”这种评论显然适用于《在密执安北部》中那位在情感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吉姆。

不过，它并不适用于整篇小说。因为，极为重要的是，《在密执安北部》既是从一位女性又是从一位男性的视点来讲述的。而且，女性的视点支配着处于高潮阶段的最后情节。从莉兹和吉姆躺在码头上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莉兹从他身下挣扎着爬出来走开的那一刻止，读者感受到了她之所感。

船板坚硬。吉姆撩起她的裙子，要对她动手动脚。她很害怕，可是她又期待着。她不得不接受它，但是它又让她害怕。

“你不可以干这样的事，吉姆。不要。”

“我一定要，我就是要。你知道我们一定要。”

“不，我们不要，吉姆。我们一定不能。哎哟，这不好。你不能。那东西太大了，让人太痛了。你不能。哦，吉姆。吉姆，哦。”

码头的铁杉木板又硬又冷又粗糙。吉姆重重地压在她身上，他弄痛了她。莉兹推了推他，她被压得这么难受。她蠕动着。吉姆却睡着了。

那些对海明威毫不留情的读者们对他最为常见的指责是：他的小说里缺乏对男人行为的判断，因为他对女人不能感同身受。《在密执安北部》却显示出这种指责对于他的生活和工作是多么地缺乏鉴别力。在霍顿湾码头上所发生的强制性诱奸行为近乎于一种强奸。在这种情况下。这位作者——尽管他自己的健康的性心理遭到了歪曲——关注得更多的却是他那无力抵抗的猎物一方，而不是那位粗暴地强取豪夺的一方。海明威突然放弃了他那断断续续的铁匠的视点，而完全地沉浸到了仰面躺在他身子底下的那位半推半就、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的意识之中。

五

他返回橡树园肯定会一事无成。早在离开迪尔沃思全家之前，他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忍受了几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后，他觉得自己有如囚徒。他告诉父母他什么都写不出来，必须返回密执安。一周后，他来到了佩托斯

基，在埃瓦·波特夫人的寓所二楼租了一间房。他取出衣物，穿上羊毛衫以驱寒，并着手工作起来。大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去那儿吃饭。

坐在工作台旁，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了芝加哥。去年夏天在那里爆发的残酷的种族暴乱并没有激起他的文学兴趣，但在这个城市里，有组织性的犯罪活动日益泛滥，犯罪力量日渐猖獗，这一现象却令他着迷。11月4日，由于那位人称“大个子比尔”汤普森的小丑市长再次当选，黑社会的头目们得以在市政厅里继续拥有一位朋友。由于近期禁酒法案在国会获得了通过，它对烈酒进行了界定，除了度数极低的啤酒外，其他的酒都遭到了禁止。这就使得在禁酒令于1920年1月生效之际，位于芝加哥及其郊区的非法制酒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可获暴利的行业。

在风城有一帮意大利暴徒，他们处于约翰·（机枪手约尼·）托里奥的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桀骜不驯，就连托里奥的统治也极不稳固。他们给海明威的印象是：他们就像是阿尔迪蒂敢死队的队员。在与尼克·内罗尼一起在沃巴什大道上的威尼斯咖啡馆里吃意大利饺子时，他注意到有许多面无表情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一间僻静的密室里集会搓牌。日子一久，海明威对此可谓了如指掌。1941年，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谈起海明威，说他也是一位诗人。“而且，我会说，毫不犹豫地说，就其作品的非凡现实性而言，在所有健在的诗人之中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芝加哥的歹徒们就是具有非凡的现实性的题材之一，在佩托斯基，他努力将他们捕获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例如，在一篇名为《雇佣兵》的小说中，他谈到了“位于沃巴什大道上的那家名叫坎勃里纳斯的咖啡馆”。在那儿，未经店主许可，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后边那间烟雾弥漫的小房间，一旦进去了，里面的人便会“刹那间鸦雀无声”，他们的双眼会带着“只有时不时地想到死亡才会有的那种超然的紧张神情”上下打量着你。过了一會兒，他们才会恢复谈话。

不过有一次，门猛一下子被推开，人们抬起头，眼光射向门口。认出来人后，有个男人就从一张牌桌旁半欠起身，一只手藏在背后，还有两个男人猛地趴在地板上。只听得门口一声轰鸣，于是在马来群岛结下的冤仇就在坎勃里纳斯咖啡馆的后屋里了结了。

为了努力支撑起他那风雨飘摇的统治，1920年，约翰·托里奥派人到纽约找了一名助手。助手是一位肌肉发达的年轻小伙子，其衣服色彩别致，看上去绷得有点紧。在20年代中期，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匪帮中属阿尔·卡彭的权力最大。1926年，在西班牙首都一个不合季节的寒冷日子里，海明威决定把他写成一部艺术作品，在此过程中，他回忆起了1919年年底的那些日子，当时他创作了诸如《雇佣兵》等不成熟的习作。

《杀手》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位于芝加哥外的一个名叫萨米特的镇上，时值一个秋天的夜晚，但海明威事实上构思的是佩托斯基。在一幢公寓楼二层的一间房间里，奥利·安德烈森，一位“可能卷入了芝加哥所发生的某件事情之中”的大个子瑞典人，躺在他那凌乱不堪的床上，等着黑社会的杀手来找他。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饭馆里，年轻的尼克·亚当斯正在同店员乔治谈

话，这时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头戴一顶圆顶帽，脖子上绕着一条丝质围巾，手戴丝质手套，身穿一件长大衣，看上去绷的很紧。此人名叫阿尔，他正在寻找奥利·安德烈森。在阿尔旁边还有一个男人，阿尔称他马克斯。“他与阿尔身量相当，虽然他们长相并不相似，可穿着有如一对孪生兄弟。”“他们身穿紧紧绷绷的长大衣，头戴圆顶帽，看上去就像是搞杂耍表演的。”

虽然海明威可能一直想从过去的不愉快记忆中抹去他早期的孪生生活经历，可它还是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而且在《杀手》中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正是这对“孪生兄弟”，正是他们对待在饭馆里的以尼克·亚当斯、店员乔治和厨房里的那位黑人厨师为代表的整个世界的那种无缘无故的敌意，以及他们对待对方的那种易怒的态度，使得这篇小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力和感染力。这篇小说因此而名闻于世。影响到《杀手》这篇小说的显性因素有：海明威同堪萨斯城里一些轻刑犯人的直接接触，他对进到威尼斯咖啡馆密室里的那些人的密切观察，以及他对于20年代芝加哥那些从事血腥职业的无赖之徒的持久关注。2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的报刊上，对芝加哥的这些罪犯曾经有过大量的新闻报道。但是，影响到这篇小说的还有另一个不太明显的因素，那就是假如作者自己没有那份“孪生姊妹”的经历，小说就不会写得这么生动迷人。阿尔对马克斯的指责“你说的太多”，可能就是厄内斯特对马塞利娜的叱责。

《杀手》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才达到完善。至于1919年秋在佩托斯基，海明威所能写的最好的作品是一系列以霍顿湾和博困城周围的生活作为题材的措辞简练的生活小品文，他把这些作品集体命名为“十字路口”。在他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中，有一位伐木工，他曾同著名的拳击手斯坦利·凯彻尔交过手，打了六轮比赛；另有一个人物是个牛皮大王，他专讲一些战争故事，尽管他只是在休战后才赶到法国的；还有一位名叫保利娜·斯诺的漂亮姑娘，她被诱奸并遗弃，最后被送入教养学校；最后，还有一位名叫比尔·吉尔伯特的属于奥吉布瓦部族的印第安人，他有一个名叫普鲁登斯的女儿。如果说海明威可能是想起了他的旧情人普鲁迪·博尔顿，这种说法不足为奇，因为，关于她的死亡报道曾出现在佩托斯基的晚报上。不错，这则消息的发表已有两年，但是由于她的死非常轰动，因此一直就是人们闲谈的话题。据说，在1918年2月前，16岁的普鲁迪就已同来自沙勒沃伊的白人理查德·卡斯尔同居了。谣传说她怀孕了，卡斯尔也曾说要娶她的。到后来，他们却采取了一种人们始料不及的行为。一天早晨七时许，他俩双双吞服了马铁子碱。

波特夫人家的这位寄宿者从清晨一直写到中午时分。饭后，他接着创作几个小时。到头脑终于开始混沌不清时，他便披上绵羊皮夹克，把下午剩下的时间用于为县里铲掘沙土以支付房租。或者，他会在佩托斯基的高等中学附近等着玛乔丽·邦普出现以护送她回家。周末，他常常带着玛乔丽到埃尔克斯俱乐部去跳舞。他还喜欢同另一个年仅14岁的名叫格雷丝·昆兰的活泼女孩儿一起闲聊和跳舞。不久，他便开始称她为“卢克妹妹”。这不仅是因为他想念自己的亲妹妹们，而且是因为他并不情愿称她为格雷丝。他还与和他同龄的一个面容娇好的犹太女孩艾琳·戈尔茨坦约会了好几次。不过，他的社交生活由于囊中羞涩而受到了影响。倘若再不找点什么事干的话，他除了返回橡树园之外就别无选择了。

他对女子救护社团所作的一次讲演幸运地终止了这种局面，这正是他一直所期盼的。那些女士们想听一些扣人心弦的战争故事，而他的表现也并未

让她们失望。随后，一位看上去高贵的白发女人上来与他攀谈。她说她叫哈丽雅特·格里德利·康纳布尔，是到镇上看望母亲的。她的丈夫拉尔夫是 F.W. 伍尔沃斯连锁店加拿大分店的经理。康纳布尔夫妇住在多伦多，但是他们将在 1 月份的某个时间带着他们那 26 岁的女儿多萝西启程去棕榈海滩。她问海明威是否愿意在她们离家期间住到她家去看护一下小拉尔夫？这个男孩虽然年近 20，但由于生来是个瘸子，因此看戏、听音乐会、观看拳击比赛或曲棍球都得有人陪。海明威当即欣然应允下来。在他于 12 月 20 日写给豪伊·詹金斯的信中，他这样说道：“这个多伦多的小子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地道的秘鲁炸面包圈。”

大概是出于思念妹妹厄休拉的缘故，海明威在除夕时回到家中，可是到 1 月份的第二周，多萝西和康纳布尔夫人就领着他去参观了一所他从未住过的大房子。除了在斯特雷萨大饭店外他从未见过如此之大的台球室，那音乐室也比他母亲的大两倍，里边的管风琴设施配置完备。在给他住的舒适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可供他写作的书桌。住房外有一个网球场，场内已注了水供溜冰用，网球场的旁边还有一间小屋，溜冰者可在此避风，喝热巧克力饮料。

后来证明，这份工作简单得近乎荒唐。总的说来，早上的时间可供这位“临时看护”自由支配，在拉尔夫不想外出的夜晚，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的事情。客住康纳布尔家期间，他贪婪地看了不少书，其中包括约瑟夫·康拉德所写的《胜利》和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爱之象征》，里面不仅描写了男女交欢时所能采用的各种不同体位，而且还详细地描述了包括什么收集毛发在内的恋物癖。

2 月份康拉布尔一家返回城时，他获得了一次同康拉布尔先生长谈的机会。他们谈得很投缘。康拉布尔先生是一位咄咄逼人、精悍强干的生意人，喜欢搞些恶作剧。若干年后，一位讣告作者回忆道：“他最爱搞的恶作剧是穿得像个女人，走进庄重的兰布顿高尔夫球俱乐部男人更衣室里。在男人们惊呼着往门后钻时，康拉布尔就压低嗓门说：‘我正在找我的男朋友’。”在了解到海明威具有文学方面的抱负后，这位以经营廉价商品而发家的大亨把他带到市商业区，将他介绍给多伦多《星报》的一些行政主管。格雷戈里·克拉克是负责特写的主编，以前曾当过步兵。对这位“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行动敏捷，面色红润，披着一头黑亮蓬松的头发，长着一张阔而红润的嘴巴的年轻人”，他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刻。克拉克进一步注意到，他老是出汗，并且不能正确地发 L 音。在讲述事情时，他怪腔怪调，声音急促。甚至在他逐渐了解并喜欢上海明威后，克拉克对他的印象仍然是：“在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谁能够比他更为奇怪地把极度的敏感和对暴力的兴致组合在一起了。”海明威生性腼腆，但这并未妨碍克拉克和其他编辑推荐他去给以特写报道为主的周六版《星报周刊》供稿。1920 年，《星报周刊》总共从他那儿买下了 26 篇稿件，内容涉及到怎样去租一幅油画以及到当地理发职业学校接受免费修面可能导致的危险等等。

六

3 月 18 日那天，海明威医生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格雷丝最近的精神状况。“你母亲好多了”，在信中他高兴地写道：“我希望这个即将来临的夏季能再次使一切恢复正常。”复活节那天，为了让母亲高兴，厄内斯特给她送了一朵百合花。对他的体贴，格雷丝激动得喜形于色，最后她竟然能

够就他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说了些赞美之词。“对你事业上的成功，我感到非常高兴。你的能力能被人赏识，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有空的话就给我寄些剪报来。”

然而，5月份，他们才刚刚重逢就又开始争吵起来。他母亲生气地注意到，他又谈论起到蒸汽上当一名锅炉工，准备以此方式和特德·布朗巴克一起乘船去远东地区，这是典型的杰克·伦敦的风格，而不是在努力寻求一份前途光明的工作。她好言相劝，可他却大发雷霆。海明威医生希望儿子能够呆在橡树园，至少呆到6月中旬，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共和党全国会议在芝加哥召开之际一起度过几天。可厄内斯特怒不可遏，不愿再呆下去。他气冲冲地动身去了霍顿湾。他的父亲对这个夏天所产生的不祥之兆感到惶恐不安。6月4日，他给儿子去了封信，信中力劝他要学会更好地自我克制：

我真心希望你，我亲爱的厄内斯特，希望你能多想想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要尽量做到宽厚、善良、温和。我为你的能力和独立精神感到自豪，对此你不必有任何怀疑。但你要努力缓和你的个性，永远不要威胁父母。在你最磨人的那许多年里，我俩都曾竭尽全力来帮助你，我相信你终有一天看到自己享受到有一个家庭的快乐，并能体验到随之而来的忧心、焦虑与责任。希望你能表现出男子汉良好、高尚、勇敢和礼貌的品质来。要敬畏神灵，尊重妇女。

在海明威医生的婚姻生活中，那种经常遭到声色俱厉的训斥的情形显然并不意味着在厄内斯特同格雷丝摊牌时，他会站在他的一边。无论怎样，他都会坚决地支持他的妻子。

父母的指责使厄内斯特的感情受到了新的伤害。在他与朋友的交往中，这种伤害以一种超出正常范围的乖戾和争强好胜的形式显露了出来。在比尔·史密斯和他进行的一次穿越树林的徒步旅行中，由于厄内斯特指责比尔试图第一个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而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迪尔沃思的儿子韦斯利同他所进行的一次谈话，也演变成为一种只有他厄内斯特才敢在碎玻璃上行走的示威举动。一天下午，在佩托斯基，艾琳·戈尔茨坦同他打了几局网球，最终也以他的怒气冲冲和她的忿忿不平而收场。后来，她忍气吞声，邀请他与她的伯父伯母一起共进晚餐。结果，他却带来一条显然是在当地市场上买的鱼，但他却告诉他们说是自己捕的。此举令他们困窘不已。

在他21岁生日的那天下午，他和比尔·史密斯、特德·布朗巴克出现在温迪米尔。格雷丝为他们准备了一顿美味的晚餐。随后的几天里，他就在别墅的附近晃悠，看看书，同厄休拉和萨尼聊聊天，与在附近的卢米斯家作客的13岁女孩珍妮·雷诺调笑逗弄，而且还向25日才赶到的露丝·阿诺德虚情假意地献殷勤。海明威医生当时在橡树园。厄内斯特和他母亲的关系从未这么糟。当他发现她在翻一份《美国人》杂志时，他奚落她，说她在看“白痴文学”；他还挖苦地问她是否只是出于慕名的原因而向《大西洋月刊》寄去了征订款。如果格雷丝当时没有理睬的话，那是因为她正在忙于给他草拟一封信以剥去他厚厚的脸皮。

他们的争吵很快就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厄休拉和萨尼当时正计划在26日那天举行一次秘密的午夜晚餐，在湖对岸的赖恩岬角，她们将计划吐露给哥哥，说珍妮·雷诺、鲍勃·卢米斯和伊丽莎白将偷偷溜出来参加，此外还

有一位来拜访卢米斯家的姑娘。她们还说，如果厄内斯特和特德·布朗巴克要是也能够去的话，晚会定会增色不少。

这些狂欢者们又是吃，又是游，又是唱，还点起了篝火，烧了大量的柴木。总的来说，他们玩得很尽兴，这样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钟。可是，等她们吵吵闹闹回到家时，他们发现湖岸上放着一盏照明灯笼。原来，卢米斯夫人找不到她的孩子，便怒气冲冲地跑到温迪米尔叫醒了格蕾丝，继而格蕾丝发现屋子里的床上也是空无一人。卢米斯夫人和格蕾丝都将满腔怒气发泄在那两位在晚会的最后一刻才到场的客人厄内斯特和特德身上。她们说，他俩的年龄老大不小了，怎么能够这样；他俩是在犯罪，是在败坏那些无知小女孩的品行。对这些指责，厄内斯特的答复显然蛮横轻慢。第二天早晨，格蕾丝冷冰冰地通知他，她勒令他和特德立即搬出去。于是，便出现了她后来写信给海明威医生所叙述的那一幕。“厄内斯特用他所能想到的各种恶名辱骂我，还用各种恶毒的言词数落我；但是我忍住了，并未歇斯底里地发作。”不过，她给了他一封写好的信，那也是一份彻头彻尾的“退稿单”。

爱子厄内斯特：

自从你 18 岁那年决定不再需要任何来自父母的忠告和教诲后，三年来我尽量保持着沉默，以让你设法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你得自己建立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也就是你在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打交道时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今，你已 21 岁，根据你的一些要好朋友和一些善意之人的说法，你仍需要好的教导。在此，我不怕你生气，再次讲述这番话。

在我看来，母亲的爱就像是一家银行。她所生的每一个孩子降临人世时都带着一本有着巨额存款的银行帐户，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最初的五年里，他取呀取呀，取个不停。他们取的是她肉体上的辛劳与痛苦、她的缺睡少眠、她的关注和安慰、她的服侍、擦洗、穿衣、喂食和逗乐。母亲几乎是守着他们一颦一笑的贴身奴隶。

在所有这些早期岁月里，银行帐户上没有任何进项。“别犯愁，”母亲心里想：“有朝一日，他会给我慰藉，并会回报我所做的一切。”想到这儿，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随后的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直到孩子们成长为少年，银行的帐户一直是透支。他们提取的是爱护和同情，是他们在陷入困境或遭遇到不公正待遇时所需要的支持和鼓励，是他们生病时期的看护，是教育、指导以及对他们稚嫩的身体、思想、心灵的开发启迪，而其代价则是这一阶段父母常常感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至于银行帐户上的进项，仍然是寥寥无几，只有几个便士，这几个便士就是他们心甘情愿地向母亲提供了一些帮助、体贴以及类似“谢谢您”的话语……

事实上，银行的帐户因为无所存和无所进而处于危险的虚空状态，除非偶尔有一阵子他们会为过去的行为感到内疚，走到她的面前道一声“对不起，我真的会尽我之所能去做好的”。

好了，少年时期过去了。孩子长成了真正的男子汉。银行仍在支出慈爱，在他蒙受委屈时支出同情，对他和他的朋友们所进行的冒险尝试投以热心的关注，给予他的朋友们以礼貌和款待，尽管这些朋友们与母亲毫不相同，尽管他们很少会注意到母亲的存在，除非他们具备良好的教养。

银行继续向他支出理解，为着他那初萌的爱情支出兴趣，为着他的每一

个计划支出喜悦。到这时，帐户上需要一些存款，大笔的存款，诸如感激和理解以及对母亲的思想及所做之事的关切；还有给家庭带来的小小慰藉，有意去支持母亲的一些特殊偏爱，决不要辜负她的期望。把鲜花、水果、糖果或是一些漂亮的饰物带回家孝敬给母亲，献一个吻，拥抱一下。孩子们应该时时刻刻怀着一种愿望，多多地理解她所尽的绵薄之力，称赞她的烹调技术，支持她的一些小计划；他们应该真心地去听她唱歌，听她弹钢琴，或者讲一些她津津乐道的小故事；这是一种悄悄支付帐单的方式，以此来消除母亲心头的忧虑。要体贴她，想到她，并在她的生日和母亲节那天祝她快乐。母亲最看重的礼物是一封使人备感甜蜜的信以及几枝鲜花。而这些只是为了能使帐户得以更好地维持。

我所认识的许多母亲都在接受这些东西，并且礼物和回报要丰厚得多。这一切都来自于她们的儿子，来自于一些在能力上并不及我儿子的人。厄内斯特，我的儿子，除非你醒悟过来，中止你那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生活，那只知索取不知图报的行为；除非你中止那种企图依赖别人生活的想法；除非你停止那种将所挣之钱都挥霍殆尽用于满足自己奢侈的行为；除非你停止出卖那张漂亮的脸蛋儿去勾引容易受骗上当的小姑娘们；除非你不再忽视你对神灵、对救世主耶稣基督应尽的天职；换言之、除非你重振你的堂堂的男子汉气概；否则，除了沉沦堕落，你别无他途：你已经透支过度啦。

这个世界属于你们。它正急需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这些男子汉应该具有发达的肌肉、良好的道德素养以及强健的体魄，他们应该能令自己的母亲仰视而不是低垂着蒙羞的头后悔不该生下他来。你生在一个有身份的家族。在这个家族中，所有的成员都耻于接受别人的东西而不去平等相报。他们言谈优雅，对女人彬彬有礼；他们慷慨大方，富有骑士风度。你是以我所知的两个最杰出、最高尚的绅士来命名的，可不要玷污了他们的名声。

等到你学会不再去侮辱和耻笑你的母亲时你再回来。

当你恍然大悟，有了生活的理想和目标时，你会仍然看到你的母亲正等着欢迎你，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她爱着你，同时也期盼着你的爱。

在我们彼此分处不同的地方时，上帝会监督我们的。

你的仍在期待并将永远为你祈祷祝愿的母亲

格蕾丝·霍尔·海明威

等到厄内斯特终于有机会独自看这封信时，他仍然无动于衷，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或者说，即使他写了回信，他也从未寄出。但是，两周后，他却写信给了他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名叫格蕾丝的人，即格蕾丝·昆兰，他的“卢克妹妹”。他向这个14岁的小姑娘倾述了自己为何不再在家生活的理由。他用他那极具创造力的脑袋所能想出的关于他母亲的动机的最具破坏性的解释博得了她的信任。“母亲很高兴能抓住一个机会把我撵走，因为自从我反对她为了给自己修一所新房子而撒掉了两三千个子儿（美元），——通常人们都会用这笔钱将子女送至大学，——她就或多或少对我怀恨在心。”他还给在橡树园的父亲发了一封怒气冲天的信，可他父亲却并未给予他任何同情，因而让他更加怒火中烧。“厄内斯特最近给我的信，”海明威医生向格蕾丝报告说：“是他一怒之下写的，信中所说的话完完全全既不像一个绅士也不像一个我们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的儿子。……他必须工作，必须靠自己去奋斗；

而且，只有让他自己独自忍受痛苦的打击才能把他那自私的铁石心肠磨软。”

9月初，格雷丝把她写给厄内斯特的信寄了一份给丈夫。海明威医生对这封信倍加赞赏。他回信说，她在信中对“母亲在家庭生活的游戏中所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作了精彩的解释，他在信末鼓励她继续保持自己的勇气。不过，虽说他完全支持自己的妻子，但他并不希望看到更多的争斗。9月18日那天，海明威医生给儿子写了封信。当时他住在博因城一个十分邈远的客栈，以替比尔·史密斯的姑母查尔斯夫人等人干些杂活来挣钱度日。

（海明威医生写道）我想知道你这个秋季和冬季的打算，因为我从姑娘们那儿得知你和特德已经放弃了“环游世界之旅”？……我刚刚给你亲爱的母亲去了信，……告诉她我将写信给你，目的是请你到格雷丝小屋去，并主动提出帮助她收拾关闭温迪米尔别墅和格雷丝小屋。由于这个夏天你和你母亲之间有些误解，我相信如果你作此努力，问题便会解决。此外，我还是要祝愿你们能彼此相爱，这是你们应当做的。

然而，厄内斯特还是更愿意以使格雷丝觉得对不起他的方式同她和好。一天下午，他和凯蒂·史密斯还有奥德加（卡尔·埃德加）——即凯蒂的长期追求者——三人一起在沙勒沃伊湖上航行时，小船的系绳铁角刮伤了他的肚脐部位。由于伤口感染，他最后被迫去看了一下医生。这场灾祸并不严重。然而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却解释说由于内出血的折磨，他无法按父亲的意愿去帮助她关闭温迪米尔别墅。一想到儿子又受了伤，格雷丝就吃不消了。在返回橡树园时，她给他留了一张便条：“我们离开那天你没能来，我感到很难过。我当时还为你准备了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希望你的内伤不要再折磨你。你告知我此事的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那是感应神经痛。一想到你经受了这么多的折磨，我就痛苦不堪。永远爱你的妈妈。”

他所期待的正是她的这种反应。两个月后，当她和她的弟弟莱斯特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度圣诞节期间，他对她早先的责备作了冷嘲热讽答复，他确信这封信会令她高兴。“最亲爱的母亲”，他在芝加哥的寓所里写道：“遵照您的指示，我已痛改前非了。至少您要我知错就改的，难道不是吗？好歹我已回心从善了。”

格雷丝丝毫没有觉察出隐藏在这些保证里的嘲弄意味。她也没有辨别出潜藏在他季节性问候语中的有如利刃般的敌意：“好了，圣诞快乐，我的老亲娘，我就不祝您新年快乐了，因为新年不过是向坟墓更迈进了一步而已，毫无快乐可言。”相反，到1920年岁末的几天里，她对儿子的印象却是这样的：他终于幡然悔悟了；他在一家杂志社谋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他碰到了一位名叫哈德莉·理查森的年轻女士，好像还非常不错；并且他又开始给他的母亲寄来充满爱意的信了。

七

历史学家威廉·E.洛伊希腾伯格曾这样说道：“到1920年时，”由于战争带来的痛苦、关于同盟国的争论、对共产党的恐慌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等原因，这个国家已被弄得焦头烂额。一语以蔽之，举国上下深受（伍德罗·）威尔逊主义之苦。……用（新闻记者）马克·沙利文的话来说：“威尔逊曾经是令人意气风发的象征，可这种意气风发已经变得酸不唧唧；威尔逊曾经

是令人欣喜若狂的化身，可这种欣喜却已变成胆汁、成了如今苦难社会的替罪羊。

但是，并非每个美国人都对政治怀有兴趣。据海明威返回美国后写的信件来看，很明显，年轻的他对有关同盟国的争论、红色恐慌和通货膨胀都毫不关心；尽管在白宫的威尔逊可能已成为倍受美国人“青睐”的替罪羊，可海明威对这个瘫痪之人竟也不置一词。至于战争带来的痛苦，他不久倒是会大谈特谈起来，但是在1919年，在他所接受的新闻专访以及同年所作的讲演中，却丝毫不见类似的情感流露。相反，在他和红十字会的一些前官员们互通的信件中却到处洋溢着炽热的怀旧情结。他恨不得能立即同好友们再次集聚一堂以一叙当年的冒险壮举。1920年的元旦，他从橡树园给格雷丝·昆兰发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他对即将到来的重逢所怀有的那种兴奋之情。“周六晚，来自全国的前意大利阿尔迪蒂敢死队的15名队员将在北部举行晚宴。詹金斯[豪伊·詹金斯]已安排妥当，他说今天会打电报邀我前往。他打过电话问我何时能去。15名老队员，……这将是一次多么盛大的聚会呀！”

有关那场棒球赛的丑闻是第一桩在他的灵魂里激起他“战后幻灭感”的公众事件。1920年9月28日，也就是在他被撵出家门仍居住在博因城的日子，他了解到在1919年世界锦标赛期间，芝加哥白短袜队的八名队员因贪图10万美金而同由一位名叫阿诺德·罗思坦的纽约赌徒领导的辛迪加进行了私下交易，他们故意输给了辛辛那提红色队，因而受到起诉。队中一些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光脚汉乔·杰克逊、快乐的费尔施、埃迪·奇科特，也涉嫌其中。

林·拉德纳由于对这桩称之为“黑袜事件”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而中止了他的棒球文学创作，直至1925年。同年，他的朋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们介绍了一位名叫迈那·沃尔夫谢姆的犹太赌徒，据说是他“在1919年买通了世界锦标赛的后卫”。虽然菲茨杰拉德并非一个特别热心的棒球迷，但他花了大量时间倾听拉德纳那充满尖酸辛辣言辞的独白。或许是由于受到某段倾诉的启发，他决定在他的象征美国腐化的小说中写进一个被小说化的人物罗思坦。与菲茨杰拉德相反，海明威一生都是棒球运动迷。除了记下每天的体育版外，他还花了不少的下午观看幼兽队或白短袜队的比赛。这项丑闻曝光后，他怒不可遏。起诉的消息宣布两天后，格雷丝·昆兰的弟弟德吉告诉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谴责那些运动员弄点外快的做法。当时，海明威几乎抑制不住“一种强烈而又不可抗拒的欲望要揍他的屁股”。在他的小说中，他对这桩丑闻的反应同样也是大加鞭挞。《三天大风》中提到的某些真实事件将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推移到了美国参战之前。可是在他们酗酒谈话时，尼克·亚当斯及其朋友比尔却流露出对棒球的失望之情。这种感情曾于1920年袭上海明威的心头。

“咱们为什么干杯呢？”尼克举杯问道。

“咱们为钓鱼干杯吧，”比尔说。

“好极了，”尼克说：“先生们，我提议为钓鱼干杯。”

“就为钓鱼，”比尔说：“到处钓鱼。”

“钓鱼，”尼克说：“咱们就为钓鱼干杯。”

“这比棒球强。”比尔说。

“这扯不到一块，”尼克问：“咱们怎么扯到棒球上了？”

“错了，”比尔答道：“棒球是大老粗玩的。”

在其生活中，尼克嗜好威士忌酒的习惯也比他的创作者要早得多。在很短的时间里，尼克和比尔两人就干掉了“一大杯又一大杯”的爱尔兰威士忌和“一大瓶又一大瓶”的苏格兰威士忌。但是，海明威在米兰加入军官俱乐部之前既未沾过爱尔兰威士忌，也没喝过苏格兰威士忌；而且，他是在他同母亲的关系爆发了巨大冲突之后的痛苦日子里才贪恋上酒的。精神病医生罗纳德·R·菲耶韦在一本关于情绪巨变的有趣著作中推测道：“海明威酗酒……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法。”事实的确如此。正如他曾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所承认的：“我的整个一生麻烦就在于，每当事情糟糕透顶时，我总是喝点酒，而且马上就感觉好多了。”

1920年的晚夏，他和约克·彭特考斯特、特德·布朗巴克以及豪伊·詹金斯一起在布莱克河上钓鱼，这是他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的另一种方式。而且，在奥德加再次遭到凯蒂·史密斯的拒绝而于9月返回堪萨斯城后，海明威便从自己与她的约会之中寻求到更多的安慰。他极富挑逗性地称凯蒂为冷美人。她已29岁，他才21岁。然而正如以前他和阿格尼丝一样，他们之间的年龄悬殊吸引着他，使他着迷。

一天夜晚，他俩在博因城的一家名为马丁的小酒馆里喝了一点儿酒。第二天，他俩驾着她兄弟比尔的别克车绕着佩托斯基兜风。海明威突然在一个天主教堂前停了下来。他们点燃了谢恩烛，借着那摇曳的烛光，海明威“为我梦寐以求而又永远不会得到的一切而祈祷；随后，我们情绪饱满地步出教堂”。后来，他对他那十多岁的知己格蕾丝·昆兰如是说。在给“卢克妹妹”的信中，他继续说道：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踏上返程的路上，他的祈祷就应验了，因为“上帝让我品尝了一次有浪漫色彩的冒险经历”。（这句有意思的评语究竟是何含义，他并未说明。）接着，一场暴风雨来临，在他们驱车冒雨回家的途中，凯蒂在他身旁的座位上睡着了。

海明威出人意料地决定在天主教堂前停下来祈祷，这自然而然和与富有同情心的凯蒂的一席交谈具有某种关联。因为，作为一位比较宗教学方面的权威人士之女，凯蒂对于信念问题思考良多。但是，在他的决定深处显然还潜藏着他父母的愤怒和沮丧，以及他们对他们近期借以评判他的清教道德标准的强烈憎恨。20年代，对在巴黎的西尔维亚·比奇以及其他朋友们，海明威坚持说他与天主教的联系始于自己负伤的那个晚上，当时他的朋友唐·朱塞佩·比安基，那位从佛罗伦萨来的牧师，来到了那个救护所，并且足以令

她后来也同样死于类似的情况下。1947年9月12日傍晚到分，约翰·多斯·帕索斯驱车前往西部。在科德角高速公路上，他的妻子凯蒂·史密斯·多斯·帕索斯靠在他的肩上睡着了。落日的眩目强光照花了这位小说家的双眼，他没有注意到有一辆卡车停在路上。结果，凯蒂飞出了挡风玻璃，因其头顶被削去而当即死亡。多斯·帕索斯失去了右眼，但幸存了下来。凯蒂曾在下科德角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普罗温斯敦、韦弗利特和特鲁罗有许多人都喜欢她。在一封寄给正在住院的多斯·帕索斯的信中，埃德蒙·威尔逊宣称他从未见过有比凯蒂之死更令当地居民悲伤的事情了。葬礼上，威尔逊说：“由于失去凯蒂的悲痛之故，每个人都显得苍老凝重。在大家的心目中，她始终是那么年轻。……[她]必定是一个难得的好妻子。我有一个印象，和她在一起，您永远不会有厌烦感；虽然她对其他大多数人都是那么地害羞，但她肯定会令您感到无限的快乐。她献给生活的厚礼是无法用统计学来衡量的，然而那正是我们为什么希望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下去的原因之一。”

人惊异地对他低语了几句洗礼用语。这些并不可信的故事其实都是些组成战争创伤神话的素材。直到那天他与凯蒂在佩托斯基教堂里点燃蜡烛为止，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表明他曾在清教以外的教堂里跪下祈祷过。

第六章 “这世界是一座监狱， 让我们一起去砸碎它。”

—

动身到东方国家去旅行的想法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因为特德·布朗巴克没有了这个兴致，而海明威又不愿意只身去进行这次旅行。由于远东之行成了泡影，他便拉上凯蒂·史密斯，意欲进行一次适度一点的冒险。他们打算一起去芝加哥找工作。凯蒂打算在找工作期间住在艺术俱乐部，海明威则可以和 Y.K. 以及杜德尔丝住在一起，至少可以住上几个星期。凯蒂向他保证，她的兄嫂对于分出一席之地来款留客人是非常慷慨的。他们已经在自己那套东芝加哥大道上的公寓里暂时收留了三个年轻人，因此，他们不会介意收留第四位客人的。

就在她和厄内斯特一起搭她哥哥比尔的便车去芝加哥之前，凯蒂给圣路易斯家乡去了一封信。玛丽学院是 T.S. 艾略特的祖父创办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还在玛丽学院读书时，凯蒂就认识了一位年轻女子。凯蒂认定，哈德莉·理查森的母亲刚刚去世，她需要出来散散心。她极力怂恿哈德莉到芝加哥来住上几个星期，Y.K. 哥哥一定会很高兴安顿她的。

二

海明威的一些男性朋友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他怎么会被哈德莉吸引。虽然她有一头富有光泽的红发，性格活泼机敏，兼有音乐才能，但是，她毕竟已年近 29 岁，而且也不是什么大美人！这些评论者们忽略了一些心理因素。首先，海明威到芝加哥后不久，就发现在博因城独自生活是很艰苦的；其次，在他和哈德莉各自的生活背景中，尤其是在他们父母的性格当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在他们之间立刻建立起了一种兄妹般的情意来。同时，由于她的年纪稍长一些，就使她更像一位母亲。

詹姆斯和弗洛伦斯·理查森有六个孩子，其中哈德莉生于 1891 年，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哈德莉的传记作者艾丽斯·亨特·索科洛夫曾经这样描述理查森太太：她是“一个个性鲜明、信仰坚定的女人”，“是理查森一家的主心骨”。她的一大爱好是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而通过音乐来表达自我则是她的另一大兴趣所在。他们舒适安逸的家坐落于圣路易斯的西区，那儿的橡树有如天主教大教堂一般直插云霄。在他们家黄色的音乐室里，摆放有两架斯坦韦牌大钢琴。理查森太太和成群的朋友们常常在这个音乐室里演奏起交响乐和协奏曲。理查森先生喜欢用浑厚的男中音演唱一些歌曲。在没有外人的晚上，理查森太太也常为她的丈夫作钢琴伴奏。然而，在她的兴趣的天地里，高于政治与音乐之上的，是她对于神秘的灵魂现象的热中。通神学，心念科学，灵应盘，无意识书写以及与亡魂的通灵交流，这一切耗用了她大量的想象力。

哈德莉的父亲是一个幽默得可爱的男人，在经济上属无能之辈，一生孤独凄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的父亲曾是社会上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为人苛刻，进取心十足。他经营着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制药生意，但从中却得不到任何满足。他发现，自己与极端自私的弗洛伦斯的婚姻是一场磨难，却又不敢过于声张。90 年代中期，他不顾坚决主张禁酒的妻子的公开

反对，开始酗酒。1903年，在哈德莉12岁的时候，他对着脑袋举起了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剧还从其他途径悄悄地潜入了理查森一家的大门。两个孩子幼年夭折。有一天，小哈德莉也跌出了二楼婴儿室的窗户，脊背受了重伤，不得不在轮椅上几乎呆了一年时间。15年后，哈德莉那怀孕的姐姐多萝西娅在一次火灾中被严重烧伤，在产下了一个死胎之后不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哈德莉那源自本性的友爱和热情便为她赢得了许多朋友。然而在12到14岁期间，她的这种合群的性格渐渐地消失了。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所十分亲近的父亲的去世以及母亲对她的态度。母亲终日忙于恢复已故丈夫的生意和财产，因而无暇顾及日渐长大的哈德莉想要询问她的一些问题。她对倒数第二个孩子明显有着偏爱，常常喜欢与之做伴，并为其取了自己的教名；同时，她坚持认为哈德莉自小时候的那次事故以后就变了一个人。虽然少女时代的哈德莉越来越远离社会的挑战，但是她在玛丽学院的功课一直很好，并且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过，由于她对自己太缺乏信心，尽管老师肯定地说她具有文学天赋，她却不敢相信。毕业后，她和母亲还有姐姐弗洛伦斯一起到欧洲去进行了一次旅行。在这次灾难性的旅行中，在一座同样是叫作弗洛伦斯的城市里，她得了神经衰弱，一阵阵的晕眩和持续的头痛是这个病症的先兆。入学布林·莫尔学院之后，她的功课很糟糕，时常生病。第一学年结束时，母亲让她退了学。理查森太太令人泄气地对她说：她根本就没有力量成为一个大学生。

这个多灾多难的女孩只有通过音乐来一展她的才华。早在十六七岁之前，她的钢琴演奏技巧就与专业水平相差不远，从布林·莫尔学院辍学之后，她比以往更加投入地置身于钢琴练习中。玛丽学院的老朋友们偶尔来访，对她谈起自己的结婚计划，但哈德莉从父母不和谐的家庭生活中看到了“婚姻是个陷阱”；她梦寐以求的目标是终身与音乐为伴，她准备“为此而抛开一切：人群、聚会、男友”，虽然曾有一度她也怅然地渴望她的音乐老师——一位曾在意大利学习过音乐的叫作哈理森·威廉斯的青年艺术家——会对她产生兴趣。

但是，即便是她那不凡的音乐才能也没能缓和母亲对她的悲观看法。理查森太太不安地大声数落着哈德莉，说她把自己搞得太辛苦了。后来，哈德莉也不得不承认，过量的工作使她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有一段时间，她尝试着每练习半个小时就休息15分钟，可是这个计划也行不通，她只好放弃。与此同时，她放弃了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的念头。

直到1919年，她才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一年她28岁。她和昔日的同窗们重新开始来往。在她们的一次聚会上，她结识了利奥·洛布。这位48岁的医生说服她与自己交往。她勇敢地跨出的另一步是她打起了网球，而且进步显著。不幸的是，母亲显然不能与她共同分享这些发展所带来的欣喜。既然女儿弗洛伦斯已经出嫁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理查森太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哈德莉能听命于自己的意愿。1920年夏天，理查森太太患上了勃莱特氏病，母女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紧张局面一下子被打破了。心地善良的哈德莉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

在10月份的葬礼上，她感到心力衰竭，身体疲惫。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

她没有一点想法。几天以后，凯蒂·史密斯给她写来了一封信，邀请她前往芝加哥。

三

哈德莉抵达芝加哥的当天晚上，在史密斯公寓举办的晚会上，她遇见了一群有趣的男人：唐·赖特、博比·劳斯、比尔·霍恩，以及一个名叫威米奇或是什么海明斯坦的“粗大笨拙”的家伙，他也是刚到芝加哥。他习惯性地以前脚掌挨地，像个拳击手似地脑袋前后摇晃。他笑起来的时候，嘴巴咧得大大的。当他对你说话时，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你的眼睛。他对阅读、钓鱼、打猎、回意大利去等等话题或任何从脑海中冒出来的奇思异想有着巨大的热情，那热情简直令人惊愕。这个男人对生活具有强烈的激情。也难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男人或女人，似乎都急于引起他的注意。

让哈德莉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整个晚上海明威总是会回到她的身边。后来他告诉他的弟弟莱斯特，在他看见她的那一刹那，“一种强烈的感觉占据了我。我知道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在她逗留的三个星期里，每一天他们都呆在一起。到他送她乘上开往圣路易斯的火车时，他们两个人已经意识到在他们之间拥有多少的相似之处、多少共同的想法和多少趣味。哈德莉喜欢烈酒，这个新发现令海明威尤其感到高兴。与 20 年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饮酒对哈德莉而言也特别富有刺激，因为社会试图禁止饮酒。不过，她对这种刺激的体会还另有一个原因：她每喝一口酒，就在证明自己是父亲的而不是母亲的女儿。这一时期，饮酒正好刚刚成为海明威的一个日常习惯；哈德莉缺乏经验但是乐于从命，成了与他共同探索酒精奥妙的合作伙伴。她在回到圣路易斯之后给他写的第一封信中就揭示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纽带。“你知道，你说过你几乎把我当成一个酒徒来崇拜，我的心中仍然珍藏着这句话。当然啦，（福斯塔夫老家伙，）这句话我是不会告诉每个人的，你知道吗？”

得知自己所见过的这个最英俊、最迷人的男人竟爱着自己，哈德莉同样感到神醉心迷。但是，一想到别的女人可能会抢走他，这种恐惧使她兴奋的心情在回圣路易斯的途中黯淡了下来。特别是多伦多的康纳布尔家族的多萝茜·康纳布尔看起来危险性最大。在哈德莉逗留芝加哥的这段日子里，她也出现了。其中的原委，哈德莉没用多长时间就搞了个水落石出。她在 11 月 11 日写给海明威的信中谈起了自己对这个漂亮的韦尔斯利大学毕业生的疑虑。“康纳布尔是个颇有点异国情调的小东西，不是吗？可爱、羞涩，不过唐·赖特却说是放荡，而且贪图享受。伙计，她什么时候开路（即：把她甩掉），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会因此而不能为多伦多的报纸撰稿吗？”在一次晚宴上，海明威是对别人发动了情感攻势，但不是贪图享受的多萝茜，而是另外两位年轻女子。第二天早上，他满怀懊悔地对哈德莉坦白了至少一部分情况，心照不宣地向她乞求宽恕。“我可以理解，”她同情地回答他：“在一个有智慧有着正常好奇心的男人的经历中，该要融合多少千差万别的个性特点呀。也许你真是太年轻了，厄内斯特。……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想象我会热情洋溢地接收一个除了身体之外其他方面对我毫无吸引力的男人。……我很高兴你还是坦白了。在诚实的人们之间，一切都会过去，难道不是吗？”

在她其他的情敌中还包括凯蒂·史密斯，她曾私下里告诉埃德蒙·威尔逊的女儿罗莎琳德，她和海明威曾浪漫地来往过一段时间。只是至于来往的

程度，她没有说。但是不论怎样，如果那篇令人恶心的、也可能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关于尼克·亚当斯的故事《度夏的人们》（1916）全部都是基于事实的话，他们之间的来往很有可能是在1920年夏天开始的，那时奥德加还在追求她。

在这个故事里，海明威再次使用了真实的姓名。尼克说，随着一个个的夏天过去，“可怜的老奥德加”想得到凯蒂的欲望变得越来越“令人同情了”。他已经30出头了不说，还因为精索静脉曲张挨过两刀。他一看见自己的心上人，眼睛里就会浮现出一种“煎鱼”的神情。凯蒂不能忍受奥德加碰她，却很为尼克而倾倒。故事结尾的第三部分饶有兴趣地描绘了他们做爱的场面。当尼克从后面和她做爱时，凯蒂被他动作中控制的力量深深触动了，但是她对自己的表现却有点信心不足。她问他：“我是不是很差劲，威米奇？”他让她相信她很不错。可是，很显然，尼克的满足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来自凯蒂的身体，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奥德加听说他们俩私通的话会“杀了他自己的”。

另外一种可能是，海明威和凯蒂从1920年的整个秋天一直到1921年的年初都保持着不一般的朋友关系。那时，他正好住在好像是专门为了调情而准备的相当美妙的宿舍里。1920年这一年，Y.K.的广告生意里做得非常红火，所以到年底的时候，他决定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所谓“美丽城”的纪念城里租一套有七个房间的公寓。在妻子去纽约学习音乐期间，他邀请了几个朋友搬进来合住，他们不用交房租。接受这个邀请的有博比·劳斯、唐·赖特以及海明威。在此之前的两个月里，海明威一直作为比尔·霍恩的客人住在北州大街上一套并不比一张邮票大多少的房子里。在他给哈德莉的信中，他以一种逃避式的坦白提及自己的新生活，这样就算他说自己和凯蒂·史密斯出去跳舞，她也无从追问什么。不过，尽管如此狡猾，他还是怀有很深的负疚感，结果是他的来信中很快开始出现这样的特征：他以一种矛盾的情绪评论起自己对她的感情的持久性。这给了她得以坦率地问他一两个问题的机会。例如，他对她说，他希望自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爱她。她立即要他对这个不冷不热的表白作出一个清楚的解释。“你究竟是不是说你觉得无力承受我们之间随着长期发展而带来的压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就是他坦率地说出来的时候了。

然而，既然他没有说出来，她便很高兴地把自己的疑虑放到了一边。正如她一再承认的那样，她疯狂地爱上了他。此外，她也和他一样热切地想找到一个伴侣。她已离群索居地生活了许多年，她渴望见见世面，但是正像海明威一样，她也希望在闯荡世界时身边有个伴。对她来说，“相依相随”是这样奇妙的一个词，所以她替那些从未找到一个情投意合之人的年轻女人们感到惋惜。她把自己比作是辛克莱·刘易斯最新出版的小说《大街》里的女主人公卡罗尔·肯尼科特。她对海明威说：“在那个孤独的小镇里”，卡罗尔“如此渴求的是有一个人能与她同声相应。我得说，即便是‘啊呀’一声也行！”

3月份，海明威到圣路易斯去看望她。他穿着一套布鲁克斯兄弟牌新西装，头上戴着他的意大利军官的船形帽。两周后，她上芝加哥来，提着一个

虽然《度夏的人们》已经达到出版水平，但是在作者的有生之年一直未能付梓。这样，奥德加和凯蒂便幸免了海明威曾在他的小说与文章中对其他许多人进行的那种羞辱。

手提箱，里面装着她最近添置的一件饰有保加利亚刺绣的绸缎长裙。当她走进 Y.K. 的公寓时，由于某种原因她突然害怕起来，可是爱人那洋溢的热情却帮助她克服了这种情绪。几天后，当他们去橡树园作客时，她和海明威医生一起快活地游泳，还得到了格雷丝对她的认可。在临走前的头天晚上，她告诉厄内斯特她有一笔委托金，每年有 3000 美元的收入。加上他为多伦多《星报》做国外通讯员的收入，她的这笔钱足以使他们去意大利生活。顷刻间，一切就这么样决定了。他们将于夏末在霍顿湾结婚，然后于秋天的某个时候动身去欧洲。“这世界是一座监狱，”哈德莉感叹地说：“让我们一起去砸碎它。”

四

到芝加哥的头几个星期里，海明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直到 1920 年 12 月他才被一家名为《合作共同体》的月刊杂志社聘为撰稿人兼编辑。这家杂志社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激起投资人对拥有该杂志的公司即美国合作协会的兴趣。母公司的头儿是一个叫哈理森·帕克的会说漂亮话的骗子。他最终会因为使公司陷入 1500 万元的巨额债务并因此破产而被愤怒的股东们送上法庭。海明威可以立刻就看出这个公司具有某种欺骗性，但是，正如他给正在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母亲的书信中所说的，既然它的新闻分支机构每周支付他 40 美元，他决定不去“扮演那个耗子弃臭船的角色”。另一种补偿是，有一些有趣的人在为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中之一是一个叫克雷布斯·弗兰德这个怪名字的年轻人。克雷布斯在法国打过仗，他打算再回到那里去生活。

在业余时间里，海明威根据自己心灵里的阴影，编出了一个有趣的没有标题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奥彭的英国士兵。在故事的开头，精疲力竭的奥彭卧倒在一片雾气迷茫的山坡上，守卫着一座桥，以防德军的进攻。一个穿着灰色衣服敌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了桥，奥彭举起步枪开了火。那个人中弹摔下了自行车，他怪模怪样地跳动着，像一只被扯掉一条腿的蜘蛛。在自行车前轮停止转动之前，那个人死了。

战斗中的一个间歇让奥彭陷入了幻想之中。他把机枪手依靠灵活的双手开枪比作钢琴家依靠灵巧的双手演奏。他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比喻，因为他总是希望成为一名音乐会钢琴演奏家并且在艾伯特大厅演出。他突然想起了家里的那间音乐室，从前他常在那里为他的母亲弹肖邦的曲子。“亲爱的，多么动听啊，”他记得她这样对他说过：“再弹几首吧。我真不清楚舍恩伯格的音乐有什么意思，亲爱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战斗继续打了起来。奥彭被一颗炮弹炸伤，陷入了昏迷。在发烧状态下，他梦见自己曾经英勇地死去，进了瓦尔哈拉英烈祠，它甚至高高地耸立在天堂之上。他看见了纳尔逊勋爵、弗朗西斯·德雷克男爵、格兰特将军、卡斯特将军、舍曼将军、红头发埃里克·泰摩兰，还有其他一些人。在这些名人

英国画家威廉·纽厄纳姆·蒙塔古·奥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官方艺术家。他的作品包括伍德罗·威尔逊、福煦元帅以及其他战时领导人的肖像画。而为芝加哥人所熟知的，是他于 1908 年创作的一幅画，这幅画在海明威 1920 年来芝加哥不久后被艺术学院收藏。这幅题为“灰衣女人”的画描绘的是画家身看坠地长裙的妻子。尽管战后女性的时尚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格雷丝·海明威仍然穿着那样的长裙。事实上，她会在自己的余生里一直穿下去。也许，就是这幅画的这一细节启发了海明威，让他想起了他想在这篇有关士兵的故事里描写的那个女人，他把这个士兵命名为奥

瓦尔哈拉英烈祠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译者注

中爆发了一场荒唐可笑的争吵。他们打了起来。可是，打架对他们来说是种享受，因为在瓦尔哈拉“存在着屠杀的乐趣，却丝毫没有死亡的弊端”。因此，当奥彭把他的刺刀一下子捅进乔治·华盛顿的腹股沟时，国父只是大笑起来，说：“嗯，刺得好，……我忘了你是英国人。”但是，当被华盛顿当胸扎上一刀时，奥彭可不觉得怎么样。他希望自己能够离开瓦尔哈拉以及这里“令人厌恶的游戏”。一个往下通向天堂的梯子成了他逃走的途径。他一下这个梯子，就发现自己站在一条乡村小道上。“在奥彭看来，它像是家乡的那条乡村小道，头顶上高大的榆树连接成荫。”他“毫不迟疑地”沿着小路走下去，来到了一扇门前，转动把手，走了进去。一个妇人微笑着等在里面。“母亲，”他喊道：“我走了很长的路。”“孩子，我知道你会来的”，她说。

在房间的另一头他认出了自己那架旧的大型平台钢琴。母亲说他所有作曲的文具仍然保存完好。“我一直留着它们……等一下。钢笔和墨水就在那里。”奥彭喜不自禁。“现在我真可以从明天起继续写那部交响乐了。”不幸的是，这话还没说完，他就猛地记起了第二天在瓦尔哈拉他还得战斗呢。“……砍成碎片是人最大的乐趣，”他挑衅地说。母亲微笑起来，看上去“像是智慧之母”。他继续谈论起战争带来的快感。“今天我们砍呀砍，在我杀过这条路来找你时，我把乔治·华盛顿穿了个透。……战斗的快乐留在我的心里。”母亲又微笑起来。他很恼火，他强调她必须相信他说的话。可是显然她不相信。“不知为什么，在他明白这一点之前，他就跪在她的面前。她抱着他的脑袋。”在她的抚摸下，奥彭虚张声势的英雄气概崩溃了。“母亲，那滋味可不好受，”他坦白道：“很可怕。母亲，我真想留下来搞我的音乐。我不想去瓦尔哈拉！”“孩子，我明白。”他母亲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她的抚摸和话语让奥彭感到自己又是个孩子。

母亲让他看到，他没有理由这样急切地逃避自己身为男子汉的责任。不仅是他，还有瓦尔哈拉的所有居民们，现在都和平相处地一起住在她的家里，成了家里的守护神。战争把他们烦透了，以至于他们回到瓦尔哈拉仅仅是为了迎接新的成员：因为这场世界战争的缘故，近来又有一大批这样的新成员了。她骄傲地把奥彭战死后颁发给他的奖章拿给他看，她让他相信他因为守卫大桥而成了英雄，他现在可以留在家里搞他的音乐了。奥彭一下子跳起舞来，“一种奇怪的舞蹈，是一种大幅度跳进的音乐，带着持续的颤音作为一种装饰音形式。”不幸的是，这种剧烈的运动在他的胸口上曾被乔治·华盛顿扎了一刀的地方引起了一阵疼痛。又一阵疼痛触动了他，他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一小片榴霰弹的弹片从他的胸部被取了出来。“告诉他们，我不想再回到瓦尔哈拉了”，他喃喃地说。“你不用回去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他。

一个死去的骑车人和一只还在转动的自行车车轮；对一个父亲形象猛扎的一刀；一个年轻人看到自己童年时家庭的天堂幻景，以及他进一步看到的音乐室里的母亲；这个年轻人故意渲染的表面热爱战争的伪装；母亲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对他在保卫大桥时的表现深感骄傲；她表示他不用再去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她允许他以全副的身心投入自己的艺术；……从所有这些细节以及其他方面都可以看出，奥彭的故事完全是一个由赤裸裸的希望和恐惧交织成的不调和的混合物，作者几乎没用什么气力去控制自己梦幻般的想象。

在芝加哥居住时，海明威还写了一本小说，但后来放弃了。他曾和中学时的好友莫里斯·马塞尔曼合作创作了一出名副其实的毫无价值的闹剧《废话连篇》，而后他又试着写起了诗歌，并编了好几篇被精明的杂志社退回来的小说。他还潜心阅读过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心理学》、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以及一切他能找得到的关于他刚刚参加过的这场战争的历史，包括一些辅助性的研究资料，如伊萨克·唐·莱文的《俄国革命》。（“他坐在前廊里读一本有关这场战争的书，”海明威在《士兵之家》中这样描述哈罗德·克雷布斯：“这是一本历史书，他正在读着自己曾经亲身参加过的所有的战斗。在他读过的所有书里，数这一本最有趣了。现在他才真正地了解了这场战争。”）

在离开家出外逛荡时，他看到和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景象和声音。在北大道上有一个叫武尔茨一策普的啤酒店，一个德国乐队在那里演奏着感伤音乐；在两个黑帮人物卡迪耐拉和科斯马罗以及“另一些意大利黑社会杀手”（他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上绞刑架的几个小时前，在州监狱的门外聚集着一大堆令人难受的乌合之众；还有在黑人 and 白人都可以去的夜总会里深黑色皮肤的爵士乐女郎如泣如诉的歌声：“惹人恼怒的情郎，不要再欺骗我，……惹人恼怒的情郎，好好地待我。就由我去吧，……甜蜜的果冻卷，不要再烦我。”（后来，这一爵士乐的片断将会出现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在他感到精力充沛的晚上，他对城里剧院中首轮公演的戏剧进行了亲身体验，从佐薇·埃金斯的《落魄者》中的埃塞尔·巴里莫尔，到《无忧无虑》中的贝尔·贝内特，再到《1920年：乔治·怀特丑闻》里的安·彭宁顿，他都逐个加以欣赏。他追逐新的体验的胃口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他仍然很容易感染上一阵阵的低落情绪。就他自己的感受而言，一直烦扰他的是他害怕婚姻可能会成为一种死亡的形式。3月下旬，豪伊·詹金斯把这种情况搞得更糟了。他把海明威拉到一边警告他说，如果他知道什么于己有利的话就不要被拴住了。到4月底的时候，他对比尔·史密斯这样坦白道：他因为想起了那些再也无法重温的去北部乡村钓鱼的单身汉旅行而“他妈的差点儿发疯了”。

男人一生中往往会热爱两三条河流，爱它们胜过世上的一切，然而一旦他爱上了一个姑娘，他妈的这些河流不管他有多么在乎都会干枯掉。最让我痛苦的是，那片田野一如既往地死命地拉扯着我，今年春天也同以往一样狠命地拉扯我。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只要是白天还不会想起来，可一到晚上它就来了，折磨着我，而我却去不了。

在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当中，有时候他可以借着对战争的激烈评论来摆脱至少一部分的忧郁情绪。一方面，他短暂的服役历程自然会带给他“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另一方面，大多数正在出版的关于这场战争的书都把它描述成了一场极为混乱的屠杀，而现在他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战争后期的观点，其原因当然是和他对人类生活的巨大悲观失望分不开的。

在此期间，海明威可能阅读过的书包 C.F.霍恩和 W.F.奥斯汀的五卷文集《战争大事记》（1920）以及托玛斯·N.佩奇的《意大利和世界大战》（1920）。这两本书都为他写作《永别了，武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细节。

有点令人惊奇的是，在他反战诗歌的第一首诗中，他拼命攻击的目标是加布里埃莱·丹农齐奥。因为，作为一个小说家，丹农齐奥是海明威在战后最感兴趣的人物之一，主要是由于他在《火焰》（1900）中无比浪漫地描述了一个年轻诗人和一个比他年长的女演员之间的缠绵性爱。这个故事取材于丹农齐奥和埃莱奥洛拉·杜塞之间著名的爱情纠葛。这个曾经对家人及朋友夸耀自己与女演员梅·马什定婚的年轻读者发觉自己很容易进入小说中男主角的角色。但是，除了是个作家外，丹农齐奥还是个狂热的政治独立运动的拥护者以及战争爱好者。意大利政府迟迟才作出的对抗同盟国的参战决定使这个小说家欣喜若狂。他和陆军、海军一起为他的国家而战；在一次军用飞机失事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对军人们发表了无数言词热烈的演说。海明威在《过河入林》（1950）中曾经写到坎特韦尔上校回忆起自己1918年在威尼托还是个年轻的陆军中尉时，曾经站在倾盆大雨中和突袭部队的一个排一起听丹农齐奥向一大群集合起来的意大利士兵发表演说。他那只失明的眼睛上戴着一个眼罩，他的脸“苍白得像是海鱼的肚子，在菜场里刚被翻了个身，棕色的一面没露出来，看上去已经死了30个小时了”。他丑陋得让人恶心，而在坎特韦尔中尉看来他的演讲更加让人恶心。“死亡何所惧”。丹农齐奥对着被雨水浇透了的人群大喊大叫。年轻的坎特韦尔心想：“这些狗娘养的还想要我们怎么样？”这正是年轻的海明威在1921年年初时的体会，虽然他并没有亲自见识过这位演说家的表演。

丹农齐奥
五十万死去的意大利人
他却从中找到了快感
这个婊子养的。

在他的战争诗歌中，只有一首很明显地表现出他对婚姻无异于死亡的恐惧。由于无法入眠，一个年轻的女人躺在那里，脑海里尽是一些折磨人的原先与当兵的情人做爱的场面。突然，他又再次出现了，又一次拥抱着她，也就是说，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死人的拥抱而已。

被杀的皮亚韦：1918年6月15日
欲望和
所有甜蜜的脉动的痛楚
还有温柔的伤害
那是你，
消失在阴郁的黑暗里。
在这个深夜里你不带笑容地走来了
躺在我的身边
一把暗钝、冰冷、僵硬的刺刀
在我灼热膨胀的跳动的灵魂上。

在后来的岁月里，海明威时常提到战争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伟大的题材之一；而对一个像他这样讳莫如深的作家来说，战争题材的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使用战争造成的伤残来暗喻一些更微妙无形的残疾。这样一来，他就

可以不必直接承认自己无力应和哈德莉的热烈的爱情，他可以通过诗中这个被唤起性欲的年轻女人来表达他的无能，她的情人再也不能满足他了，在海明威中尉中弹倒下的同一个夏天，他在皮亚韦战役中战死了。这种象征性地再现作者潜在情感的方式诚然很奇怪，但是也许并不比他四年后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表达更奇怪。

有时候，他的情绪从低潮上升到高潮再从高潮跌落下来的变动过于迅速，以至于人们几乎会说同时既是兴奋的又是抑郁的。例如，在他 23 岁生日前不久，他回味起刚刚结束的哈德莉的来访，有感而发地写了一首题为《平平的房顶》的痛苦沮丧的诗。

夜晚，城市的房顶上很凉爽
城市流着汗
滴滴嗒嗒的，一丝不挂。
生命的蛆虫
在城市灼热的孤独里爬行。
爱在城市里凝结
爱在从人行道上来的炙热的耳语中变酸。
爱变得衰老
伴着人行道的衰老。
夜晚，城市的房顶上很凉爽。

但是，在 7 月 21 日他生日的这一天，在他写给“卢克妹妹”的信中，他又洋溢着无比的热情。

也许你很想听到有关哈德莉的一切吧。……她是个很棒的网球手，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钢琴演奏家，并且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尽管剪报上（随信附上）预言我们将于秋天在圣路易斯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我们却打算耍耍他们一下，我们要在霍顿湾那个别有风味的小教堂里结婚，然后去花天酒地快活三个星期左右，然后再回到芝加哥。……我想，整个 11 月份我们都会住在那里，然后去意大利一年或两年。……我们打算去那布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春天天气转暖。我想，我们会住在卡普里，然后到阿布鲁齐山区里去，可能是卡普拉科塔山，那儿有一条很不错的钓鱈鱼的河桑格罗河，还有网球场，它海拔 1200 米。那是你听说过的最美妙的地方。那以后不久，他的心情又糟糕了起来，另有一首诗为证：

夜之鸟
你的羽翼掩着我的双眼
黑暗的夜之鸟
展开你黑色的翅膀，像一只火鸡，昂首阔步
拖着你强壮的翅膀，像一只雄性的松鸡，敲着咚
咚的鼓声，
划破了我肚子上光滑的肌肤
你那覆盖着鳞片的双爪

为了使《被杀的皮亚韦》更符合自己的个人经历，海明威后来把标题的日期改为 1918 年 7 月 8 日。

你的喙啄在我的唇上
然而你的羽翼掩着我的双眼。

这首诗和《被杀的皮亚韦》一样，其叙述者也是一个陷于生死恋中难以自拔的女人。

五

有这样一位中年作家，他的小说为他赢得的声誉远远多于金钱。因此，时至 1921 年的冬天，他仍然在为芝加哥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并且和芝加哥其他一些广告人来往密切，Y.K. 史密斯便是其中之一。正是在 Y.K. 租下的那套宽大的住宅里，在一个同往常一样盛大的晚会上，一个肩膀宽阔的年轻人迎着这位作家走过来，眼睛里闪烁着仰慕的光芒。在所有的文学前辈中，没有谁能比舍伍德·安德森对海明威影响更大的了。

这位作家长着一头假发一般桀骜不驯的黑发，他那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那浑厚的笑声以及色彩鲜艳的衬衫，看起来都像是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灵魂的外在标记。44 岁的安德森一谈起拳击、棒球或赛马，还是像孩子似地睁大了眼睛。而且，他有一段非常奇妙浪漫的罗曼史，只要一脱帽，他就会很乐意地对新结交的朋友从头道来。1912 年秋天，他当上了俄亥俄州伊利里亚小城一家生意兴隆的涂料厂的总裁。由于婚姻不幸福，生意令人不快，伊利里亚又让人感到厌烦，终于有一天他走出了办公室，不停地向前走。他发誓，从此以后他唯一的主宰将是文学。

不过，安德森孩童般的率真却并不可靠。自早年起，一种逃避的需要就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感情生活中。在伊利里亚的时候，这种需要在一次精神崩溃中达到了高潮。他关于自己离城出走一事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偶尔他也会承认他那时正处在疯狂的边缘摇摇欲坠，但大多数时候他把自己说成是在英勇地反抗，而这一切正是一个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的男人的典型特征。

安德森在涂料厂的秘书还记得，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的早上，他走进办公室，“举止怪诞”。打开邮件后，他走近她，大笑了一声说：“我觉得脚好像湿了，而且越来越湿。”说完了这句模糊地象征着他就要被责任淹死了的话之后，他随即离开了办公室，说是出去散散步。三天以后，人们在克利夫兰的一家药店里发现了她，只见她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得了记忆缺失症。在休伦路医院里，人们根据她衣服里的证件了解到她的身份。

在此之前至少两年的时间里，安德森工作得十分卖力，到了危险的地步。在办公室里工作了一天之后，他习惯于把自己关在自家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写作，常常整夜不停。他的妻子科妮莉亚非常爱他，很为他担心，她认为他有点儿疯了。为了缓解他已感觉到正在内心里积聚起来的压力，他独自在树林里长距离地散步。此外，他开始酗酒，“使劲追女人”。虽然事后他说在离开伊利里亚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意识一片空白，但是实际上他在四处徘徊的过程中还是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纸的家信寄给妻子。表面看来，那封信不过是记载了旅途中所发生的事件，但里面充斥着污秽、攻击和逃避的意象，似乎投射出了成年人的恐惧心理以及与哭泣的孩子们的情感认同。信中第一页和第二页上的匆匆涂鸦，几乎不容置疑地表明他已经是多么地近乎于疯狂了：

孩子们为什么哭泣。因为他们到处受践踏。在他们中间奔跑着黄色的狗，棕色的尘土粘在它们的脊背上。狗在号叫，孩子在哭。夜里，狗在号叫孩子在哭你的头在痛。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的狗这么多满是肮脏房子的长街。

如果他问了，他就能够找到科妮莉亚。但是如果你去问别人，他们就去打你。伦纳德太太的手上拿着一本书，她就企图用它来打我。在贝德福德附近有个地方。一个哭泣的孩子看着一个嘴上叼着烟斗像一只黄狗一样咆哮着的男人。我试着喝了一点啤酒但是很苦，房间里全是那些要打我的男人，但是我跑掉了。

在科妮莉亚的照料下，他于12月下旬回到了伊利里亚。处理掉涂料厂的生意后，他动身来到芝加哥找了一份广告业的工作，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曾经在芝加哥的一家仓库里做过一个普通劳工。他公然抛下了妻子和孩子，然而直到1916年他们才开始办理离婚手续。那时，他终于决定要把自己同一个叫作田纳西·米切尔的音乐舞蹈老师的关系合法化。（和海明威一样，他也总共结了四次婚。）他的第一本小说《饶舌的麦克弗森的儿子》于同年出版，随之很快问世的是《前进中的人们》（1917）、《中部美国之歌》（1918）、《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1919）和《穷白人》（1920）。

不平静的心理历程，对体育运动的热中以及反叛的精神：安德森和海明威之间的相似之处绝不仅仅只限于此。安德森希望能让文学再一次展现“肉体在人类关系中极度的重要性”，这一点海明威自然也很赞成；安德森在一篇名为《变成女人的男人》的短篇小说（后来收入《马与人》[1923]）中讨论了两性人的主题，而这一主题也将出现在海明威的作品中。

故事的叙述者回忆起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给一匹叫作“中意的小子”的马的主人做马夫，他以一种奇怪的激情热爱着那匹马。它常常用鼻子在他的脸上蹭来蹭去，有时候这使他希望“中意的小子”是个姑娘，或者他自己是个姑娘而它是个男人。他还记得，在一个很冷的雨夜里，他离开了养马的那个露天马戏场，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来到了附近一个采矿的小镇上，走进一家酒吧。在吧台上叫了一杯酒后，他瞥见吧台后面有一面打碎的镜子，从那上面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只是那“根本不是我自己的脸，而是一张女人的脸。那是一张女孩的脸，我是说……那还是一个孤独惊慌的女孩”。喝了三杯威士忌之后，惊魂不定的年轻人回到了马厩，脱下淋湿的衣服，光着身子钻进了正好在“中意的小子”的马厩上方的一堆马毡里。夜里，两个喝醉的黑人发现他躺在那里，一把扯掉了他的毯子。在他们冒着烟的肮脏的手提灯的灯光里，他那漂亮、苍白而又纤细的身体看上去就像一个女孩。这两个黑人猜想，既然是在这种地方，她也不会是个上等女人，他们便决定占一占这个便宜。“小美人，你躺着别动。我们不会伤着你的，”其中一个家伙笑了一声说。男孩蜷缩起身子，两个黑人一齐向他扑上去，他挣脱了，逃进了黑色的雨夜，像个疯子似地狂奔着。在一片白骨成堆的屠宰场地里，他绊倒在一副马的骨架上。他抬起手，“抓住死马的脸颊，它两颊上的骨头被雨水浇得冰冷”。恐惧如巨浪般席卷着这个年轻人，而这恐惧又像一阵烈焰焚烧，终于“把要做一个女孩的一切蠢话烧成了灰烬”。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即便是对双重性角色的最奇特的描写也不会比《变成女人的男人》更奇特了。

青春期的概念是这两个作家之间的另一个相通之处。在安德森看来，他

自己永远是个青年人。“在谈到《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时，你用了‘青年’一词，”他在1919年12月写给文学评论家范·怀克·布鲁克斯的信中说：“你不知道你多么准确地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不够成熟，活着的时候不够成熟，到死的时候还是不成熟。如果我不是表现得这样不成熟的话，那么这就该是个可怕的自白了。”当然，海明威可不愿意承认他也是命中注定要这样不成熟地活着和死去，因为这直接违背了他相信自己是个男子汉的愿望。为了使芝加哥的新朋友们也相信这一点，他把自己的年龄夸大了两岁，或许还不只两岁；即使是哈德利也是在结识他六个月以后才知道他只有21岁，而到1927年离婚时，他将会被人们称作“爸爸”。不过，就在他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极其成熟的男人的同时，那些使安德森一举成名的青春派小说如磁铁般吸引着他。1929年，海明威对欧文·韦斯特这样评论安德森：在他文学生涯的早期，安德森“曾写下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可爱的故事，那时他一直在搞广告写作；他写得朴实无华，但是，至少在我看来，他写得非常优美。他写人，写乡下；说真的，他写得最棒的是少年时代”。在小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安德森对一个年轻人的描绘令海明威为之倾倒，以至于他在自己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里对它进行了模仿。让他的一些朋友深感难堪的是，他总是否认《我的老头儿》是模仿来的。然而从它关于一个男孩初涉幻灭的成人世界的重点描写，到它所描绘的赛马跑道的背景以及它故作天真的地方腔调，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它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

海明威还从其他方面不那么明显地仿效了《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的写法。在处理类似《了却一段情》和《三天大风》这些小说中对年轻的尼克·亚当斯的心理描写时，他吸取了安德森对年轻的威拉德的情感敏锐记录，在自己的叙述中加以变化。他也仔细地研究了安德森处理乔治·威拉德父母之间恶劣关系的手法，以此为自己去完成写父母的婚姻这个在感情上异常艰难的任务作准备。当然，安德森写倔强的威拉德太太时所用的同情的笔调并不适合用来描绘海明威脑海中的母亲的形象，而且他也无意于模仿安德森对威拉德太太混乱的性经历的描述。但即便如此，他至少对于提及她少女时代的这一句话还是比较熟悉的：“有一回，她惊动了全城的人，她穿着男人的衣服，蹬着自行车穿过大街。”

他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日渐重视，毫无疑问是他和安德森的友谊的又一成果。虽然海明威在少年时代就很看重这本书，但是他并不喜欢它。可对安德森而言，马克·吐温的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大手笔。他似乎总是把这个书名挂在嘴上，尤其是在他遇见海明威的那个冬天，因为那时范·怀克·布鲁克斯刚刚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马克·吐温研究著作。安德森很推崇《马克·吐温的磨难》（1920）一书，认为它象征性地剖析了那些困扰着所有美国作家的难题。但是，他仍然嫌它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称赞不够充分。早在《马克·吐温的磨难》付印出版前，他不断地催促布鲁克斯承认马克·吐温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听见了众神的耳语。“我相信那本书是在他的农场小山顶上的一间小木屋里写出来的，”在一封洋洋洒洒的来信中他这样提醒布鲁克斯。

他文思泉涌。我猜想，夜晚他从山上下来，迈着步子，像一位君王，一个风华绝代的花花公子，他嬉戏于河流与世人之间，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之上，漂流在那如同大动脉一般从大地的中心奔涌而出的宽大的河流之上。

安德森对布鲁克斯、保罗·罗森菲尔德、沃尔多·弗兰克以及他所有的

文学朋友们宣告说，他的事业实际上完全归功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它赋予他以洞察美国式的孤独的灵感，而这种洞察力使他在创作中驾轻就熟；它形成了他在《穷白人》的开篇中对密西西比河那“可爱的静谧”的体会；它孕育了《中部美国之歌》中诗句的节奏和韵律以及《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故事集里的摸索、蹒跚和渴望的风格特色。在遇见了这样一个迷恋哈克贝利的人五年之后，海明威打算重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且要亲自对它重作一番评判，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很有可能，他还听这位前辈作家称赞过格特鲁德·斯泰因。据有些人说，安德森起初对她的作品不屑一顾，但倘若的确如此的话，他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她那极其简单朴实的行文和措辞表明，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摧毁可以比马克·吐温所梦想的再深入一步，而她重复使用某些关键词语的技巧则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也许正是在他与海明威的交谈中，安德森时常强调说，斯泰因小姐是个健康的厨师，操持着“词汇的厨房”。

给一位曾不屑于上大学的年轻人做私人导师，这就是《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的作者在海明威的芝加哥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父子之情。尽管海明威因脱离了父亲的管束而松了口气，他还是觉得需要一个长者来引导自己，而安德森则具有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正确引导的天赋。与他相交很熟的伯顿·拉斯科在报纸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被生活伤害的人们，陷于内心冲突而不能自拔的女人，受挫败的、悲观的、幻灭的灵魂，都在他这里找到了安慰。”在安德森看来，海明威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本能地干着值得干的一切。”他喜欢与这个年轻人来往，正如这个年轻人喜欢与他来往一样。他很容易就养成了邀请他到自己在市郊帕洛斯特帕克小镇的小房间里来做客的习惯。

但是，在1921年的春天，他们暂时中断了来往，安德森和妻子前往欧洲，到他的文学崇拜者保罗·罗森菲尔德的府上做客去了。在他离开芝加哥的这段时间里，他可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所以直到他回来之后，海明威才得知他有幸邂逅了一个名叫西尔维亚·比奇的美国女人。她是巴黎一家叫作“莎士比亚图书公司”的书店的主人。她很友好地介绍他认识了包括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詹姆斯·乔伊斯在内的一些作家。安德森对他说，文学的未来正在巴黎锻造成形，那里才是海明威应该去的地方。

六

正当安德森和妻子在国外逍遥的时候，海明威还在坚韧不拔地为《合作共同体》工作。他在打字机上按部就班地、绞尽脑汁地写专题报道，痛苦地从这家显然濒于破产的企业身上挤出薪水来。在空闲时间里他沉浸在阅读现代小说的喜悦中，他读的书包括弗洛伊德·德尔的《傻蛋》和《多刺灌木丛》、萨默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以及《克拉多克夫人》、克鲁特·哈姆逊的《饥饿》、罗斯·麦考利的《慢条斯理》和博尼—利夫莱特公司再版的康拉德的《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康拉德在这个版本的著名前言中写道，一个作家的职责是“让你听见，让你感觉到，……让你看见。这些，也只有这些，就是一切”。

7月份的一个周末，哈德莉从圣路易斯来到芝加哥，安排好在他过生日的那天送了他一台科罗纳牌打字机。月底时，她又来了一趟，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每天共进午餐，然后出去散步，她挽着他的胳膊。那是“美好的

时刻……我们呼吸在一起，行走在一起，”她后来这样回忆道。晚上，他们尽量单独呆在一起，但不幸的是，这在 Y.K. 的公寓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Y.K. 已经搬出宽敞的“美丽城”，回到了他从前在东芝加哥大道 100 号的寓所。他既带上了海明威和比尔·霍恩这两个不交房钱的房客，也欢迎他四处漂泊的妻子杜德尔丝回来住。海明威怀疑她背着丈夫与人私通，反正他对她是敬而远之。为了能两人独处，海明威和哈德莉喜欢到房顶上去，在那上面只要他们蜷缩依偎在扶墙下就不会被周围楼房里的居民看见。“我希望现在就能爱抚你，”哈德莉在 8 月初从钓鱼的野营地（她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结婚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寄给他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还记得吗？最后的那天晚上，在那个房顶上，我们俩都努力要成为最幼小最受爱抚的那一个。”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开始轮流地进入那个被爱抚的情人角色。

海明威还喜欢谈论性。他要哈德莉为他描述她的每一个浪漫的冒险经历和她现在的性幻想。可她的爱情经历是如此有限，她唯一能搜寻到的轶事就是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书时发现与她同住的埃德娜·拉帕洛的母亲是个同性恋。哈德莉说，她努力向我证明，热爱女人的女人过着多么愉快的生活。“由于我易受他人的影响，我开始幻想自己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低级的性感受，而她也这样幻想我。”回顾往事，哈德莉可以肯定那种吸引力并没有变得很强烈；她说，如果她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不是那样不如人意的话，她可能一点儿也不去被拉帕洛太太所吸引的。至于她现在的幻想，它们可是丰富多彩的，虽然全都围绕着她打算嫁的这个男人。8 月 21 日，出于一阵澎湃的激情，她这样袒露自己的心声：“我生命的每一部分需要你。我想被你亲吻，我想把你的头按在我的胸口上，紧紧地抱着，那样一连几个小时地拥抱着你，你这幸福的东西——爱你，爱你——这世界上最属于你的人。”

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他们的婚礼非常优美。9 月 3 日是密执安北部一个明净晴朗的日子，位于霍顿湾边上的那个小教堂用野百合、香脂树的枝干和黄色的花朵很漂亮地装点起来。几乎有 100 人从圣路易斯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再加上海明威一家的所有的朋友们，教堂里是座无虚席。比尔·史密斯是伴郎，他的妹妹凯蒂是伴娘之一。

海明威在派恩赫斯特小屋里穿上礼服，他的两位从皮托斯基赶来的朋友，达奇·帕尔索普和卢门·拉姆斯德尔在一旁做观众并给他提建议。海明威后来在一篇叫《新婚之日》的尼克·亚当斯的故事里坚持说，当天达奇和卢门很紧张，而尼克却没有。但是格雷丝却认为她的儿子整整一天都极为惶惶不安，七岁的莱斯特也声称他哥哥走在教堂的过道上时两腿显然在打颤。因为哈德莉迟到了 15 分钟，教堂里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那天下午她去游了泳，低估了弄干头发所需要的时间。由于她的头发比较长，又很浓密，所以直到她终于露面的时候还是湿的。但是，她能肯定，她戴在头上的花环，披散在身后的薄纱，象牙白的花边长裙以及娇嫩的花束都足以引开人们的视线，这样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头发。仪式结束之后，人们聚集在派恩赫斯特小屋外面拍照，这些照片大多数都是对新娘适当的奉承，而同时也看得出她的相貌比起新郎的妹妹厄休拉来差远了。（据说，大美人马塞利娜没有参加弟弟的婚礼，因为不满于他对自己的疏忽，她设法让自己在英格兰被不可避免地耽搁了。）

在莉兹·迪尔沃斯准备的鸡肉晚餐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坐上了一辆由一个叫约翰·科泰斯基的当地人开的福特汽车，在暮色中呼啸而去。科泰斯

基答应只收取五美元就开车送他们沿着山路去沃伦湖。到那里以后，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海明威医生的小划船装上桨，划过河，到达了温迪米尔。格雷丝不但提供了那间别墅给他们度蜜月，而且为了进一步取悦儿子，她在走廊上加了新的屋檐，重新油漆了地板。“在黑暗里我们划了很长一段路”，《新婚之日》的作者这样写道。后来，在《永别了，武器》中关于那对情侣逃过马焦雷湖的叙述也有这一段描写的影子。作者继续写道，尼克扶着新娘一离开小船就吻了她。“她照着他教过她的方式，火辣辣地回吻他，她的嘴唇微微张开，这样他们的舌头可以相互嬉戏。”然后，他们到了别墅前，尼克打开房门，点上灯，他们一起审视着整幢别墅。

格雷丝的床成了他们做爱的主要场所。如果《海流中的岛屿》可以被当作传记来读的话，他们的姿势有时可能相似于海明威中尉接受库罗夫斯基护士拥抱时的样子。小说的主人公，画家托玛斯·赫德森，在他驶出古巴的小船上睡着了，梦见了他的第一位妻子和他睡在一起，睡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

像她有时候喜欢做的那样。他体味着所有的这一切，感觉着她的腿抵着他的腿，她的身体贴着他的身体，她的乳房压在他的胸口，她的嘴唇拨弄着他的嘴唇。她的头发垂下来，沉沉地柔滑地覆在他的眼睛和面颊上，他的嘴唇从她索求的唇上移开，把她的头发含进嘴里。……然后他躺在她的身体下面，她那丝缎般的头发像一幅帘子掩住他的脸，他慢慢地有节奏地移动着。

由于温迪米尔不保温，所以取暖很困难。有几天因为天气转凉，这两个度蜜月的人都得了重感冒。海明威的喉咙很疼，他甚至不想出去散步。不过有一天，他还是尽力地带着哈德莉去了一趟皮托斯基。在那儿，他把她介绍给了玛乔丽·邦普和另外两个姑娘，他傻兮兮地称她们是向他求婚的失败者。哈德莉因此而被进一步地激怒了。简而言之，也许除了性生活之外，他们的蜜月不能算是很成功的。两个星期一结束，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返回了芝加哥。

起初，他们的计划是住在 Y.K. 的公寓里，因为他曾慷慨地对他们说过，他公寓里的一间卧室随时都向他们敞开。但是，在举行婚礼的几个星期前，海明威在谈论 Y.K. 的妻子的放纵时，有点过于口无遮拦，为此 Y.K. 和他吵了一架。Y.K. 恼火地告诉他，他和哈德莉将不得不另找住处了。海明威在北迪尔伯恩大街上一幢破旧的没有电梯的大楼里租下了五楼的一套房间。那里面的漏水的管道，摇晃不稳的床架，使这个套房比他估计的还要简陋，从他和哈德莉搬进去的那一天起，他就尽可能地少呆在里面。穿过城市长距离地散步比帮助妻子收拾房间更适合他的胃口。白天，孤孤单单的哈德莉为了找个说话的人只得和拐角处杂货店的伙计聊聊天。

有一天，正当她一个人的时候，格雷丝上门来了，显然是为着讨论婚姻生活中的幸福美满而来的。为了证明她的主题，她告诉儿媳她与海明威医生打算在 10 月 1 日举行宴会庆祝他们结婚 25 周年，他们想请哈德莉和厄内斯特作为他们的特邀嘉宾。他们还邀请了厄内斯特的一些朋友们，希望他会

海明威凭着他那残余的天真是无法理解史密斯夫妇的，他无法理解他们夫妇二人都对婚姻抱着放荡不羁的态度。如果杜德尔斯觉得她可以四处寻欢作乐，那么 Y.K. 也一样。然而三年后，他们这场名义上的婚姻因为 Y.K. 的情妇企图杀死杜德尔斯然后自杀这件丑闻而彻底崩溃了。

因此而觉得这个宴会更富有生趣。得知他母亲的客人名单上有 Y.K. 和杜德尔斯·史密斯，海明威立即给 Y.K. 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粗鲁地取消了格雷丝的邀请，他嘲弄地提到杜德尔斯对 Y.K. 的男子气的看法，并且警告 Y.K. 他不久将回去“收拾我丢下的衣服和那些可能已经被翻了个遍的信件”。Y.K. 在回信中冷淡地告诉他，他已经把海明威的衣服放进了储藏室，他可以在门房那里拿钥匙。“这很好理解，”他最后说：“你写来的这封信使你再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再出现在我的家里。”

正是 Y.K. 的慷慨大方使海明威节省出了他否则得在房租上花的钱，也就是说，是 Y.K. 使得他有能力支付去欧洲的行李托运费。此外，也是在 Y.K. 的宴会上他遇见了舍伍德·安德森以及哈德莉。但是，一旦海明威的怒气上来了，这些对他一点儿也不管用。那时候，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怎样去刺伤他的恩人，而正像他后来与其他人争吵时所做的那样，他瞄准了他的私生活。他公开地提醒 Y.K. 注意他妻子的不贞不洁，这也预示了他将对哈罗德·洛布、查德·鲍尔斯·史密斯、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一些人同样要进行的侮辱性的攻击。

既然已经认定在《合作共同体》再干下去毫无经济益处，海明威便几乎完全靠着哈德莉的委托金的收入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这种状况与他父母结婚时的第一年特别相象，那时候他父亲微薄的出诊费只能作为他母亲收入的一项补贴。虽然他偶尔也为多伦多《星报周刊》写一篇文章，但是这种零星的努力主要是为了提醒该报的执行编辑约翰·博恩他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国外通讯员。不过，在他和博恩就正式联系的具体事项进行谈判之前，他和哈德莉必须决定他们打算在欧洲的哪个地方住下来。

一天晚上，在安德森家的一次晚宴上，这个老作家反复地强调他希望海明威落脚巴黎的建议。美元兑换法郎的比率会使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消费惊人地低廉，况且他们在找到自己的住处之前可以住在安德森曾经居住过的左岸旅馆，即距离圣日耳曼广场不远的雅各布大街上的雅各布—安各莱戴旅馆。雅各布旅馆不仅住满了有趣的美国人，而且从那里走到旅居巴黎的美国的家里也很方便。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就在奥德翁大街。如果海明威有这个愿望的话，安德森将很乐意为他写信把他介绍给自己也是在欧洲之行中结识的比奇小姐、格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埃兹拉·庞德，此外还有刘易斯·加兰提埃尔，他曾经是芝加哥的新闻记者，现任国际商会的巴黎负责人。加兰提埃尔曾领着安德森游览巴黎，毫无疑问他也会乐于让海明威分享他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安德森还没有来得及结束他的这个小小的演说，他的两个听众便深信不疑地认为巴黎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从那以后，一切都很快被落实了下来。约翰·博恩正式聘请海明威为《星报周刊》的第一位欧洲通讯员。每当有任务时，每周他可以获得 75 美元，外加其他费用，而对于所分配任务之外被采用的稿件，报社将以一个字一美分的方式支付稿酬。《星报周刊》的编辑还请海明威不断地投递新闻素材。至于安德森提出要写的那五封介绍他的信件，他都已经完成，海明威夫妇只要在自己便利的时候投进巴黎的邮筒就可以了。

他们决定乘坐法国船运公司的一艘名为利奥波尔迪 号的旧船。它将于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离开纽约，在圣诞节的前四天抵达法国港口。在他们离开芝加哥的头天晚上，海明威把他们家里的所有罐头食品收拾起来全部送到安德森家去。在自己的小说《阴险的笑》被这个从前的学生狠狠地讥讽了之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德森对海明威早先的周到细致却仍然念念不忘。

第七章 美国人在巴黎

—

在海明威寄自巴黎的头几封信中，处处都流露出他对低廉的生活费用的热中。他在 12 月 23 日的信中向安德森汇报说：“我们常到位于波拿巴大街和雅各布大街拐角处的克莱尔餐馆进餐。在那儿两人花 12 法郎就可点一顿高档正餐，还可享用葡萄酒。我们……通常早餐平均花费 2.5 法郎。想想看，东西甚至比你们在这儿的时候还要便宜。”三天后，他在给豪伊·詹金斯的信中提到在雅各布旅馆租两室套间一天只要 12 法郎；贴有墙纸的一套 12.61 法郎”。14 法郎就能买一瓶甜酒，一瓶“上好的皮纳尔牌美酒”只花 60 生丁。在 1 月 8 日给詹金斯写的另一封信中，海明威写道：刚过完圣诞节，他就去逛了一家男士服装店，是“一家著名的伦敦公司”，即库克公司在巴黎的分店。他按身材定做了一套当地最高级的爱尔兰呢西服，价值却只相当 50 美元。然而在海明威夫妇以及其他在巴黎的美国人所谓吉星高照的背后，却隐含着一些冷酷的历史事实。

从 1914 年到 1918 年间，将近有 150 万士兵在战斗中牺牲，占法国有生产能力的男性人数的 10.5%，另有 110 万士兵留下了终生残疾。在法国的德军占领区，上百万人民被迫背井离乡，成千上万的房屋部分或全部被毁，牲畜几乎被一扫而光，工厂的机器被有组织地拆成散件，运往德国。

战后法国的每一位总理都力图实行赔偿政策，安抚那些深受战争伤害的公民。但为了实施该项政策而采取的供给资金的手段引发了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1920 年，12 法郎兑换 1 美元；到了 1925 年，则需要再加一倍的法郎。由于大众对通货膨胀的普遍愤慨，房东们已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取消政府对房租的控制——控制房租是 1914 年强行实施的战时政策。结果，房东们便拒绝接电线，拒绝装置现代的卫生设施以及其他许多他们的房屋本来缺少的必备设施。与此同时，对经济高度敏感的投资商也变得特别不情愿投资兴建新的住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有 950 万套单元住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为 975 万套。并且，政府宣布其中的三分之一已不适宜于居住。国家经济的不稳定还打消了农民购买电机设备的热情，同时导致车辆生产厂家无心直接面对生产大众廉价轿车的挑战。一直到了 30 年代中期，法国农场上的马匹还跟 1850 年时一样多，法国城镇大街上的马车数量也与 1891 年时持平。

这些情况均表明法国正陷于深深的困境。但在 20 年代，这种情况却有助于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对美国人具有异常的吸引力。从 1920 年起，跨过大西洋的移民由一滴水渐渐积聚成洪水。到了 1927 年，根据美国商会的估计，单在巴黎的美国居民就有 15000 人，而巴黎警署的统计则为 35000。从那些移民的角度来看，马车乃是旧世界魅力之典范，它并没有令他们想到法国技术的落后。《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坐在那不勒斯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呷着开胃酒，品着傍晚的空气，玩味似地注意着“马车咯吱咯吱、得得得地来来往往”，最后拉着一位他特意选来陪他吃饭的轻佻女子钻进其中的一辆。房租控制政策是美国移民选择法国的另一个原因。假使对付老化过时的家用设施令人棘手，那么雇名女佣，问题就能得以缓解。绝对有利的兑换率甚至使并不怎么富裕的美国居民都有能力雇用仆人及享受其他多种生活的舒适和便利条件。

刘易斯·加兰提埃尔是海明威最先遇到的美国人之一。海明威把介绍信寄给了他，并邀请他在米绍餐厅进餐。收到信后，刘易斯立刻赶到了雅各布旅馆。米绍餐厅的菜肴是一流的，但海明威夫妇对于其不菲的价格有点发怵，所以当新结识的朋友说他愿意请客时，夫妇俩不禁舒了一口气。这位 26 岁的加兰提埃尔不仅慷慨大方，而且趣味清高，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他操一口纯正的法语，对巴黎了如指掌。从一开始进餐时，海明威就觉得沉浸在快乐之中。但当哈德莉也显然有此同感时，海明威好斗喜争的兴致便上来了。他把话题转向了拳击。当加兰提埃尔承认对此项运动还略懂一二时，海明威邀请他回雅各布旅馆较量几个回合作为饭后消遣。他箱子里有两副标准拳击手套，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合适的器材。他还向加兰提埃尔透露，在穿越大西洋的途中，就在他们乘坐的蒸汽船的餐厅里，他与一位来自盐湖城的意裔美国士兵进行了一场三个回合的拳击表演赛，那家伙被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加兰提埃尔说明他不愿意接受海明威的邀请。他解释说，他确实不愿打人，就跟不愿让自己被打一样。可海明威却不愿意接受这种否定的回答。

在海明威夫妇租用套间的起居室里，两人互碰拳套以示问候，之后便开始相互迂回伺机出击。哈德莉做计时员。过了一两分钟，谁都没有出拳，加兰提埃尔直起身子笑着说他已受够了。他退下一只手套，戴好眼镜，开始解另一只手套，而此时海明威正一蹦一跳地挥舞着双手左右出击作拳击练习。突然，他出拳直冲加兰提埃尔，击中了他的脸，打碎了他的眼镜。幸运的是，玻璃碎片没有进入这个可怜家伙的眼睛或割伤他的脸。哈德莉看得出，海明威对此显然感到很宽慰，但他毫无悔恨之心。毕竟他有力地显示了他的男子汉雄风。

不管怎样，加兰提埃尔交朋友的愿望并没有随着这场拳击赛的结束而逝去。几天后，他再次与海明威夫妇碰面，以帮助他们找一套寓所。许多美国人都选择住在雅各布大街素雅的 18 世纪的街面屋及古玩商店中，但海明威却想要一套比附近可能找得到的房屋便宜得多的公寓房。在第六区的其他地区转了几小时后，加兰提埃尔最后把他们带到了第五区热纳维埃夫圣女山附近的一个工人居住的贫困街区。有人告诉他们，在卡迪纳尔勒穆瓦涅大街 74 号的一栋旧房子的第四层里有一套两室公寓。在污秽的螺旋楼梯所通达的每一层楼道里都有一个蹲式马桶，马桶两边各有一个凸起的水泥踩脚。公寓本身似乎给人以到处都是角落的感觉，活动很不方便。一张巨大的仿桃木床占据着房间的一头，另一头则是一张难看的橡木餐桌和两把椅子。浴室实际是一个壁橱，包括一个莲蓬头、一只碗和一个污水罐。厨房小到一次仅能挤进一人，旧式的炉子只有两个燃烧器。污水罐的水只有到楼道去倒掉，垃圾则直接倾到楼下大街上。称为“圆炮弹”的煤球可以在卧室的壁炉里燃烧，它们是唯一的取暖来源。直到海明威夫妇于 1 月 9 日迁入后，它们才发现另外两个缺点。半夜三更时，他们在卧室里还能听到隔壁舞厅传来的音乐；而就在街对过的壕外广场是一家咖啡馆所在地，是人渣聚集的场所。由于“邋遢的身体散发出的味道和酩酊大醉者的刺鼻酒味”，他们简直难以忍受，无法作为一个近水楼台的酒吧去加以光顾。

在《流动的圣节》中，海明威回忆了“初到巴黎过着穷开心的日子时对巴黎的印象”。说到开心，他和哈德莉的确都很开心。但说到穷，他们的手

头则并不拮据。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于罗伯特·科恩的描述准确地披露了海明威夫妇的实际经济状况。虽然科恩是纽约一个最富有的犹太家族的后裔，但他自个儿并不富裕。自从挥霍完从父亲那儿得到的遗产后，他就靠母亲给他的每月 300 美元的津贴生活。这笔津贴与他曾经过惯的奢华生活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法国他的钱可是派得上大用场。与科恩相比，海明威夫妇在 1922 年的收入甚至更高。哈德莉的委托金一年可以带来 3000 美元的收益，海明威当记者一年也至少可以挣 1500 美元。正像科恩从父亲的遗产中仍可获得一小笔钱一样，哈德莉婚后一个月也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了 8000 美元财产，带着这笔意外之财，她来到了欧洲。因此，她和海明威本可以很容易地生活于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中，事实上，那样的话她也就感到获得了解脱。但是，他雄心勃勃的旅行计划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他决定除了尽享佳肴美酒之外，还要以或是旁观者的身份或是参加者的身份参与至少六项体育运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仅仅动用原先打算节省的存款显然不够，还得四处凑现金。为此海明威铁了心似地坚持安身于贫民窟，全然不顾哈德莉在街上目睹粗俗的男男女女们时的惴惴不安以及她无法理解他们的隐语时的灰心丧气。他所愿作的一个让步是雇一名女管家，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确。他们选中的那女人是来自布勒通的农民，丰满健壮，性格温和，她要他们叫她玛丽-科科特。她能照着菜谱做出多种美味，而那菜谱，海明威兴冲冲地这样描述说：是根据“我们所听说或品尝过的各种菜肴”而制定出来的。

早上，他与哈德莉在静默中各自专心用餐，然后他到穆费塔德街的一家邈邈的旅馆里进行写作。他在那家旅馆的六楼租了一个房间。尽管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如此断言，但实际上魏尔伦并非卒死于这个房间里。旅馆没有中央取暖系统——这并不奇怪，因此爬上六楼后，海明威还不得不在屋内生火，燃料是从拐角的一个商贩那儿买来的树枝、引火柴和小硬木。好在他对生火还很在行，这得感谢他的父亲。在他确定烟囱已被堵塞的日子里，他也乐得省去爬上六楼的麻烦。他不停地步行着，所经过的路线他永远也不会忘却。这条路线依次经过亨利第四公立中学、圣艾蒂安都蒙古教堂、圣米歇尔大道的万神庙，接着路过克吕尼博物馆和圣日耳曼大道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他所中意的咖啡馆。不过，不管他是在幽静的小巢中伏案写作，还是在咖啡馆里面对着一杯咖啡或一杯圣詹姆斯甜酒——为了让豪伊·詹金斯相信，他在信中保证说，“那是纯正的有着七年陈酿历史的有如幼猫下颚般滑润的甜酒。”——写作，反正在 1 月那几个寒冷多雨的星期里，他的蓝皮笔记本上的文字不断地向上堆得越来越高。在《流动的盛宴》中，他回忆说其中有一个完成的作品是一篇关于密执安的短篇小说。由于它是在“一个狂风大作十分寒冷的日子”里写成的，那么他就“让故事也发生在这种天气的日子里”。然而，他的记忆愚弄了他，因为他所说的这篇短篇小说实际是指《三天大风》，而这篇作品是在两年后才创作的。事实上，他所创作的那篇小说，或者更确切他说，他所修订的那篇小说，并不是在讲述两个男孩在一个狂风大作的下午喝得醉熏熏的故事，而是在讲述一对男女在霍顿湾做爱时，水面升腾起了薄薄的凉雾。

三

海明威并没有把安德森的介绍信邮寄给西尔维亚·比奇，而是在头一次

来到她的书店时随身带着这封信。集书店与租书部于一体的莎士比亚书店十分舒适，给人以宾至如归的感觉。一个大火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气，一些老式的椅子和桌子散置在室内。地板上铺着白色的羊毛地毯，那是1919年西尔维亚在塞尔维亚为红十字会工作时购买的。窗台及几张桌子上摆满了新书，成百上千的其他书籍则塞满了与天花板齐高的书架，那一排排的书架一直伸向后屋。有一墙面沿墙摆放着书架，展示的主要是英美文学期刊。另一面墙上则挂着沃尔特·惠特曼、埃德加·阿伦·坡、奥斯卡·王尔德、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作家的照片。

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34岁，是一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女士。当海明威向她通报姓名时，他欣赏似地注意到她有着一张可爱的有如雕塑而成的脸，一双棕色的好似少女一样熠熠生辉的眼睛，还有她那秀美的双腿。其实，不仅她的女性魅力没有逃脱他的眼睛，而且他那敏锐的目光还注意到了她那棕色的天鹅绒夹克和男孩一样的短发。她的头发“从秀美的前额往后梳，齐耳的发梢显得浓而密”。事实证明，这些着装打扮的细节表明了她的性欲取向。西尔维亚的终生所爱是位看起来像主妇的法国女人，比西尔维亚小四岁，名叫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莎士比亚书店就是仿效她的奥德翁街书店暨租书部的模式开办起来的。

另一位在一场灾难性的婚姻中意识到自己对男人没有性兴趣，但却被海明威发现可以成为男人所需要的那种“铁”朋友的女人，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女小说家。她于1922年秋来到巴黎。正像她那高耸的鼻梁、饱满的嘴唇和极富弹性的栗色头发所暗示的，珍妮特·弗兰有着独具力量的个性和独立的意识。她从早期创作的失败中逐渐站立了起来，终于得到了一份引人注目的职业：《纽约人》杂志的“定调人”。在海明威的亲密朋友中，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没有谁能比珍妮特更理解他对斗牛的痴迷之心，也没有谁能比她从与他的斗智中获得更大的满足。她还乐于充当这位来自伊利诺伊的英俊青年的母亲。她自己就曾就读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大学。在拿破仑·波拿巴旅馆她的房间里，有一把印有西班牙武装商船和高大帆船图案的椅子，她称之为“厄内斯特之椅”，他每次来拜访，她总是让他就座于此椅，仿佛他是个又回到家的孩子。

同样，西尔维亚·比奇也是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在他们初次见面一起长聊时，她让海明威谈了他的生活经历，海明威以一系列沉重心酸的故事回答她，致使她发出阵阵同情的感叹声。“我……了解到他在一家军队医院呆了两年，以恢复腿伤，”她71岁时回忆说：“在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快完了，有人甚至开始询问是否要为他准备临终的圣餐礼。不过，经过极度衰弱的他的同意，圣餐礼改成了施洗礼，——‘仅仅是为了防备万一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她还记得，她的新朋友把话题一转，说到了他的孩提时代。他向她吐露“当他高中还没有毕业，还只是‘穿短裤的小男孩’时，他的父亲猝死，家境凄凉悲惨，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是一把枪。他发现自己成了一家之主，母亲和弟妹都依赖于他。他不得不辍学，开始谋生。他在一场拳击赛中挣得了第一笔钱，但是，据我推测，他并没有继续干这一行。”西尔维亚说，海明威在讲述这感人的经历的过程中，曾一度挽起裤管，脱掉皮鞋，好让她仔细看他的伤疤。

虽然他当时没有带着足够的钱加入租书部，但西尔维亚告诉他可以在今后随时支付保证金，并欢迎他随便借多少书。出门时，他选借的书有：屠格

涅夫的《猎人笔记》（这本书他还将反复借阅多次）、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小说》。那天下午、他和哈德莉又来到了书店，支付了保证金。西尔维亚发现“羽绒猫”——当时他对妻子的昵称——是一个“迷人的假小子”，“一个讨人欢喜的有趣的人”。哈德莉问她是否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她回答说有；海明威也想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往往何时会来，他得到的答复是：“一般都是在接近傍晚时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明威不仅在莎士比亚书店遇见了詹姆斯·乔伊斯，还有其他许多法国和美国作家，包括埃兹拉·庞德。

“在我以前结识的人中没有谁能比她对我更好，”在《流动的圣节》中，海明威这样评说西尔维亚。作为回报，那几年他也一直待她很好。他的第一个善意之举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关。对于即将出版的《尤利西斯》，西尔维亚在投资上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1921年2月，《小评论》的两位先锋派编辑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因为发表了小说中的瑙西凯厄这一部分而被纽约市的一个三人审判组裁定犯有猥亵罪。于是该书的出版商本·W.许布施宣布，他对冒险资助并出版全书已不再感兴趣。一个月后，乔伊斯向西尔维亚提起了这些灾难性事件的进展情况。带着完全丧失信心的口吻，他叙述完这一悲惨的故事，最后还表示出对于《尤利西斯》永远不能出版的担心。当西尔维亚提议他允许由莎士比亚书店来完成此书的发行，并以征订的方式来销售时，乔伊斯欣然接受。第二年1月，出版在即，可是来自印刷商的帐单显然远远超出了西尔维亚的预料。由此，她非常感激海明威主动帮助收集订单，而且他还进一步计划走私一批到美国。他在芝加哥结识的一位叫巴尼·布雷弗曼的新闻记者新近在安大略省温莎城的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常常乘坐轮渡从底特律的新寓所前往温莎城上班。海明威曾仔细研究过芝加哥商贩秘密走私加拿大威士忌以供应他们的顾客的方法，他觉得巴尼是援助此项现代文学事业的最佳人选。一旦计划酝酿成熟，布雷弗曼首先在温莎城租了个房间，接着西尔维亚便邮寄给他一个装有40本《尤利西斯》的大纸板箱。加拿大海关法规定对于外国书籍课以销价25%的关税，这意味着布雷弗曼得支付300美元。好在他说服了海关监督人员，使他们相信箱中的书籍乃是廉价小说，每本价值不过50美分，所以他逃脱了重税，只付了6.5美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带着一本包好的《尤利西斯》回底特律。10分钟的轮渡航行显得无比漫长。当他过美国海关时，一官员指令他打开包裹。这本在纽约海关会使警铃大作的小说在底特律竟然未引起注意。布雷弗曼得意洋洋他说，他成功地骗过了共和党及其卫理公会的查禁“警犬”们。结果，在美国，所有这40本书均邮寄到了诸如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书店、发行商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和舍伍德·安德森等征订者的手中。

四

2月2日，乔伊斯40岁生日之际，两本有着蓝色封面和白色烫印书名的《尤利西斯》的样书从第戎的印刷商那儿及时抵达巴黎。西尔维亚把一本样书文给作者，另一本——用一位英国朋友的话说——则“像左岸的自由旗帜一样”在莎士比亚书店的橱窗里“展示”。

不过，海明威夫妇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在1月末，他们就已决定，也就是说，厄内斯特已决定，他们应该到瑞士去玩玩，学学滑雪。滑雪橇、滑雪靴、厚运动衫、帽子等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乘坐火车

前往蒙特勒山区的香比镇，在那儿他们在一家海明威早有耳闻的农舍里租了一间带有大双人床的房间。每天清晨，当他们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时，房东太太冈维奇夫人就给他们那高大的瓷炉抱来一捆柴禾。关上窗户，点燃熊熊燃烧的炉火后，她把早餐送到他们的床前。在白雪皑皑的香比镇，他们俩人都觉得滑雪和他们过去曾尝试过的任何运动一样刺激，尽管在雪坡上运动了几小时后海明威觉得受伤的右膝似乎发僵发硬。坐在瑞士的小雪橇上沿着结冰的山路往下滑更是令人开心无比。海明威高兴地向多伦多《星报周刊》的读者们解释说，瑞士的小雪橇是“一种根据加拿大小女孩雪橇的样式改造的特别牢固的胡桃木制雪橇”。他还说，滑此种雪橇者可以从 4000 英尺高的松洛普山顶

沿着一条又长又陡的路段向下滑，路的左侧是 600 英尺的陡坡，右侧则是一排树。雪橇从一开始就快速滑行，不一会儿，它的冲速就比你曾感受到的任何事物的速度都要快。你毫无依靠地坐着，离冰面仅 10 英寸。山路扑面而来，如电影般一闪而过。

不过，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真正看出他对于旅居国外的热情确实在猛增，那还是他从香比镇写给凯蒂·史密斯的信。他在信中极力怂恿她来瑞士。他惊叹道：“瑞士是一个美妙的国度。”

我们住在一家瑞士人经营的农舍。他的名叫冈维奇，会说英语。我们在床上用早餐，再加上两顿丰盛的饭菜。冈维奇太太是个高级厨师，我们吃的正餐有烤牛肉、奶油花菜、炸土豆、饭前汤和饭后浆果，另外每天还有拌着奶油的瓜子。……既然有巴黎、瑞士和意大利这样的地方，还干吗生活在美国那种见鬼的地方。我的天哪，这些地方可真让男人们感到有趣。如果还有人对你撒谎说：美国很美丽或充满了乐趣，值得安居，你干脆就奚落他们。

尽管他对美国的排斥是幼稚的，但是他为欧洲而感到的激动具有不可否认的感染力，并预示着他的小说行将发挥的一种文化功能。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海明威所写的关于美国人在欧洲的故事成了几代游客的旅行指南，这正像亨利·詹姆斯所写的故事成了前几代游客的旅行指南一样。他的作品告诉了他们该到那儿去游览，如何才能玩得开心。正如他在写给凯蒂·史密斯的信中所暗示的，他尤其善于表现餐桌上的乐趣。如果说在詹姆斯的《专使》中，摆在斯特莱瑟和维奥内夫人面前的蕃茄炒蛋和淡黄色夏不利酒令你饱了眼福却未勾起你的食欲，那么相比之下，海明威笔下的食品就会着实会令你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啤酒很冰，喝上去极爽。油果很硬，浸泡在加味酒中；橄榄油味美可口。我在土豆上撒了一层黑胡椒，把面包侵入橄榄油润湿。从啤酒桶里满满地灌上一大杯啤酒后，我开始慢条斯理地边喝边吃。油果吃完后，我又叫了一份，外加一根腊肠。这种腊肠就像一根又大又粗的法兰克福香肠一分为二，撒有一种特殊的芥末料。”

这种描述同时可以证明海明威的胃口极大，并且配有过人的酒量。与他的酒量相比，甚至连他的编辑——那位酗酒如狂的马克斯韦尔·珀金斯——也自愧不如，尽管在他的小说中有几个人物当然可以与他同属于一个级别。（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最后一章，杰克·巴恩斯和布雷特·阿什利坐在马

德里王宫旅馆的吧台高脚凳上，各品了三杯“外面结着水珠的冰镇”马提尼酒之后，来到了博廷餐馆。海明威这位旅行作家断言：它是“世界上最佳的餐馆之一”。在那儿他们要了一顿午餐，包括烤乳猪和一瓶里奥哈酒。布雷特没吃多少，但杰克却“饱餐了一顿”，五瓶——抑或是六瓶？——里奥哈酒的大部分也是他干掉的。）作为一名钟情于美酒佳肴的作家，海明威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总是对从未尝过的食物的味道和最佳的制作方法充满好奇心，——这个特征是他父亲的又一遗产。在1922年春写给海明威医生的信中，海明威生动地描述了近期他和哈德莉所作的一次40英里的远足旅行。他们穿越了巴黎北部的一条森林地带。他详细地列举了他所见的动物：“鹿，野猪，狐狸和野兔”；接着他不出所料地还补充道：“我吃了两回野猪肉，味道好极了。他们把野猪肉配以胡萝卜、洋葱和蘑菇制成肉饼，外面撒有很细的棕色面包屑。”虽然海明威不像他父亲那样是一名信得过的好厨师，但他却总能献给读者颇为丰盛的美味。

五

他从瑞士带回来的纪念品中有一瓶樱桃酒。每当他在穆费塔德街的小房间里工作了一上午后，他就会喝一大口。有时，他开始写一篇新的故事时，文思受阻，他就会或者坐在火炉前吃着克莱门氏小柑橘，把果皮塞到火焰旁边，看着劈劈啪啪爆烈的蓝光；或者仁立在窗头，眺望着巴黎的屋顶。除了写关于密执安的故事之外，他还思忖着记下对法国首都的印象。不过，为了使愿望终能成真，他首先还得学会避免使用那些不能达意的词句。

在不懈追求更纯正的散文风格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到他的动机是希望能从战时那种歌颂光荣和荣誉的浮夸文体中跳出来。不过，如果说他对加布里埃莱·丹农齐奥这样蛊惑人心的演说家素有厌恶，而这种厌恶无疑增加了他对浮夸文体的敌意，那么，他脑海中母亲那歌剧一般的语言，——什么“婚姻……其神圣性与缔结婚姻时的诚意成正比”；什么“在我看来，母亲的爱就像是一家银行”；什么“你是以我所知的两个最杰出、最高尚的绅士来命名的”；等等——就更导致了他对浮夸的憎恨。正像海明威的神话一样、海明威那另立文风的划时代的决定，也是源于他那戏剧般的家庭生活。凝视着小小火盆里的火苗，他告诫自己，他应该做的一切就是“写下一个真实的句子，然后就从那里开始”。然而，要达到他所追求的紧凑和透明绝非易事。他的蓝皮笔记本里尽是些经过涂改、删减和添插的句子。

工作了一天，合上笔记本后，他经常漫步穿过卢森堡花园，来到位于卢森堡博物馆的画廊，陶醉在莫内和马内的作品中。不过，他的大部分时光还是在塞尚的油画前度过的。有时候，他下午一直走到塞纳河，沿着码头寻找在书摊上可砍价销售的英美新书。他喜欢在位于城市岛顶端的小型公园里观看垂钓者用长竹竿试着捕获一种颇像鲱鱼的鳟鱼。它“肉肥味美，甚至赛过新鲜的沙丁鱼”。煎鳟鱼味道鲜美。每当他不回家和哈德莉吃午饭的时候，这位已是腹中空空的作家就会在圣·路易斯岛的小餐馆里点上几盘，通常包括三道菜和几杯博纳酒。这种酒是餐馆在一家合作商店中按加仑购买的。

夜幕降临时，他经常出去到城里走走，哈德莉几乎总是挽着他的胳膊。他们的散步很随意，有时就近徜徉于前门旁舞厅的周围，那里一周有六个晚上人头攒动，都是该街区的工人；有时却又远至施塔德·阿纳斯泰兹街，那儿的餐桌设在树下，拳击手充当服务员，而拳击台就摆在花园中。然而，尽管精力充沛的海明威好活动，但他也时常呆在房内，因为他手头总有一摞书

要读，还有不断增多的信要回复。而且，他喜欢就坐在那儿聆听哈德莉在她租用的那架小型竖式钢琴上弹奏拉韦尔、勃拉姆斯或斯克里亚宾的曲子。那栋曾经看着他长大成人的房子总是回绕着音乐声，至今海明威仍按捺不住对它的渴望。

珍妮特·弗兰娜曾经证明，海明威在观看职业拳击赛时，他能用周围拳击迷们的行话给拳击者加油和喝倒彩。用她的话说，他是“一个天生就反应快的语言学家。由于他不断地需要理解人们的语言，与人们交流，所以他就首先通过耳朵去学习一门语言”。他提高法语口语的另一个方法是精读体育杂志，因为他觉得要摸清任何一种运动的内外门道，就必须研究评论家们的观点。他在1922年春定期阅读的众多体育杂志中，他最为关注的当属有关赛马的杂志。清晨，哈德莉还在梦乡里，海明威便起身坐到饭厅一扇开着的窗户外，写着什么东西。过会儿，如果他知道当天在昂吉安或欧特伊有赛马，他就会下楼去买一份赛马报。然后，大约在中午时分，他和哈德莉就带着午饭、一瓶葡萄酒和一张赛马图表，出发直奔赛马场。尽管他们自称是在赛马，实际上却并不是。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痛苦地承认：“实乃赌马，但我们称之为赛马。”他单独留有一笔钱以便总能赌马。倘若他们赢了，他就把所得收益的四分之一给自己，四分之一给哈德莉，余下的留作赛马的储备资金。

渐渐地，这些活动对他不仅仅只是一种娱乐，而开始成为他所谓的“副业”。他经常独自前往赛马场，长时间地与骑师、调马师、马主交谈，以尽量积累得胜的经验。他自认为此种战术并无不妥之处，因为这不仅带来了金钱收益，而且为他的几篇关于赛马的短篇小说提供了素材。但是，即便这些成果也无法抹却他阵阵不安的感觉。“半瓶醋”的美国人整日整夜地泡在蒙帕纳斯大街的咖啡桌旁，谈论着他们想要干什么却又从不去做，海明威觉得这实在可鄙。他给《星报周刊》撰写了一篇语气强烈的文章：“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人渣已被大量地舀了起来，一瓢一瓢地撒到了巴黎邻近圆亭咖啡馆的那一带。”他认为哈罗德·斯特恩斯乃是前格林威治村人渣中的人渣。斯特恩斯是一部反响强烈的论集《美国的文明：30位美国人的探索》（1922）的编辑。斯特恩斯在该书的前言中含蓄地指出，本土对他这种充满活力的人来说过于沉闷。1921年夏，他离开纽约前往巴黎，宣称意欲在更称心适意的环境下写出几本能产生轰动效应的书。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他很快便堕落成酒鬼和饭桶，唯一使他还小有名气的是在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上以彼得·皮克姆这个化名开辟的赛马专栏。海明威对赛马越来越着迷，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他是不是也正在冒险成为另一个斯特恩斯呢？多年后，他自己这样说道，他在赛马上孤注一掷，但在工作和与哈德莉的生活中却没有如此投入。至于他是如何设法放弃赌博的，他一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不过，他大约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把这项他所沉湎于的运动抛诸脑后。在为最终做到了这一点而高兴的同时，他的成就“留下了一片空白”，——此乃海明威独特的表达法，意思是他陷入了忧郁之中。他补充说，每当他失去一样东西，无论好坏，他总会有此种感觉。

六

他和哈德莉从香比镇回来后不久，西尔维亚·比奇就送给了他一本《尤利西斯》，算作对他帮助联系订户的感谢。他急不可耐地立即开始阅读，并马上跟舍伍德·安德森谈了读后感。“乔伊斯写的那本书真是他妈的棒极了，”

他在3月9日给安德森的信中写道。过后他又带着安慰的口吻补充道：“书可能很快就会到你那儿的。”说到怀着热切的心情，亲密地谈论这本小说的，并非唯独海明威一个人。乔伊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埃尔曼评论说，是否读过《尤利西斯》，成了移民是否老练通达的标志。特别是在巴黎左岸的文学家中，《尤利西斯》的崇拜者们自认为是少数的幸运儿，尽管实际上这本小说在大西洋的两岸正在不断地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譬如，年轻的海明威在1923年秋到达多伦多时就对年轻的莫利·卡拉汉说，乔伊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卡拉汉说，海明威的那种口吻表现出他是在“让我得知了什么秘密”。

无疑，海明威对《尤利西斯》多层次的丰富内涵是曾叹为观止；然而，未等读完此书，他就已兴味尽丧。西尔维亚送他的那本书现在与他的其他文件一起收藏于波士顿J.F.肯尼迪图书馆。他只看了该书的前半部及莫利·布卢姆最后的独白。最让他倒胃口的，是斯蒂芬·德迪勒斯的人物刻画。他认为，“乔伊斯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未能认识到“一篇好的作品只能是杜撰的、想象的。……《尤利西斯》中的德迪勒斯就是乔伊斯自己，所以这个人物很糟糕。乔伊斯对他的处理过于他妈的浪漫和学究，而他面壁虚构的两个人物布卢姆和布卢姆太太则塑造得很成功。布卢姆近乎完美，布卢姆太太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至于《尤利西斯》的作者，他对海明威佩服得五体投地。乔伊斯认识到，海明威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他都不是像他的表面那么简单。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了解他时就可以对他的强悍视而下见，那毕竟还是理解他的关键之一。乔伊斯曾在30年代对一位丹麦采访者评述说：海明威是“一个身材魁梧、浑身是力的农民，如水牛般健壮，是一个地道的运动员。他随时都可以过他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如果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过某种生活，那么他就决不会去描写那种生活”。而且，每当这两位作家一起四处逛咖啡馆时，海明威就凭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担负起保障这位爱尔兰人安全的任务。50年代中期，海明威对《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说：“每每我们外出喝酒时，乔伊斯要是陷入了一场争斗，他甚至不敢正眼瞧对方，于是他就说：‘把他收拾了，海明威！给他点颜色看！’”不过，乔伊斯坚持说，海明威决非蛮横粗暴之人。“像他那样的巨人确实都很谦逊，”他对那位丹麦采访者强调说：“在海明威外表的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有一天，在莎士比亚书店，乔伊斯给西尔维亚·比奇作了一番颇有教益的分析，分析的对象是海明威和美国小说家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他们两人为自己树立的形象均给人以错觉。海明威喜欢被人认为是“大老粗”，而麦克阿尔蒙则尽力冒充“细心敏感之人”。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西尔维亚在记下了这些评论后，又加了一句：“海明威，乔伊斯可揭穿了你的真面目！”

不同于海明威在文艺界结下的其他许多友谊，他和乔伊斯的友情从未因争执而遭到破坏。不错，在背地里，他会毫不犹豫地取笑这位爱尔兰人的缺点，比如他竟然欣赏他的女赞助人哈丽雅特·韦弗资助他在昂贵的饭店里用餐的嗜好。海明威曾对舍伍德·安德森说，有关乔伊斯的报道说“他和他的家人正在挨饿，可你却会发现这一大家子爱尔兰人每晚都在米绍餐厅用餐。……格特鲁德·斯泰因说过，乔伊斯让她想到了远在旧金山的一位老妇人。老妇人的儿子在克隆代克突发横财，老妇人激动得双手紧握，奔走相告：‘哦，我可怜的乔伊！我可怜的乔伊！他现在可是万贯缠身了。’可恨的爱

尔兰人，他们总是为这为那而哼哼唧唧，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爱尔兰人挨饿。”不过，正如珍妮特·弗兰娜的情人索利塔·索拉诺所说，每当海明威陪伴乔伊斯时，他总是带着相当于“崇拜”的尊敬对待这位巴黎先锋派的王子。

埃兹拉·庞德是另一位从未与海明威发生过争吵的作家，虽然在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由于海明威根据这位诗人歌剧演员一般的外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险些儿反目成仇。庞德夹克上华丽的蓝色玻璃纽扣、他的开领衬衫、他那未经修剪的山羊胡须，总之，他那显然是在模仿普契尼所写的《放荡不羁的人》中的鲁道夫的模样，令海明威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冒牌货。1922年冬末，庞德和他漂亮的妻子多萝西邀请海明威夫妇到田园圣母院大街庞德的工作室里去饮茶，室内有许多日本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海明威由此断定这位总是流露着自负神情的庞德收藏这些作品正是他虚荣心的又一表现。过了一两天，一篇狠狠讽刺这位诗人附庸风雅生活方式的人物特写出现于海明威的打字机上。他本意欲把这篇稿子投给《小评论》杂志的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可后来刘易斯·加兰提埃尔对他解释说，这两位女士对庞德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作为她们杂志物色新秀的专家，他不拿分文酬劳地为她们服务了许多年。于是，海明威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从那时起，海明威开始意识到庞德这一架机器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华盛顿特别行政区的圣·伊利莎白医院，四名精神病学家在检查了这位诗人之后，得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建议法庭免除以叛国者的罪名对他进行强制性的审判，理由是：在战争期间他在罗马电台作亲法西斯的广播时，已是濒临疯狂之人。精神病学家们没有他早年的临床记录，所以无法准确判断出他何时丧失理智。不过，他的老朋友海明威却愿意相信他的颠狂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期。“1933年在乔伊斯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海明威在细读了诗人“疯狂”的广播发言稿副本后，于1943年对艾伦·泰特说：“乔伊斯就深信他已经疯了。所以庞德在场的时候，乔伊斯就叫我去作陪，因为他担心庞德没准会干些疯狂的事。的确，与1923年头脑还十分清楚的他相比，他那时就失常了，尽说些十足的胡话、废话和庸俗之词。”因此，他不应该被绞死而“应进疯人院，——一个被他所斥责的场所，你可从他的‘诗章’中找出他开始斥责疯人院的那部分”。既然我们知道“他是如何变疯的，是如何逐渐地不断地变得毫无责任感和呆头呆脑”，海明威再次用一种满是激情的声调肯定地对泰特说：既然我们知道“他曾是一位多么伟大、完美、优秀的诗人，是一位多么慷慨大方和真正高尚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曾多么乐于帮助那些他所信任的人们，比如艾略特、乔伊斯，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毫无名气的（拉尔夫·奇弗·）邓宁，因而我认为我们绝对有义务来反对实施任何绞刑，尽管我们大家都应该站在绞架上并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绳索。”

至于庞德是否在与海明威相交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精神失常的这一问题，海明威总是托辞闪避。据圣·伊利莎白医院给庞德做检查的医生的描述，庞德古怪偏执，脾气暴躁，做作夸张，妄自尊大，以自我为中心，动则眉飞色舞。这些形容正好是对1922年海明威所遇到的那个庞德的概括。另外，这位播音者是曾经提醒英美人民注意犹太宣传者已经把他们骗入了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战争、而且他说那些“蠕虫先生和黏液先生仍然正在通过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和斯克纳克塔迪、纽约及波士顿的每一家犹太广播台向你们进行灌

输”；但是，早在1921年的一篇题为《红棕色刚果》的短评中，他就已经丝毫不差地发表过如此言论。短评的主题是：正是犹太人的一个阴谋——“犹太狗犹太猪这个部族的图腾和禁忌”——酝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时代的庞德在“诗章”中着了魔似地谈论“高利贷”，海明威说从中他察觉到了疯狂的痕迹。其实，也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证据可以表明庞德在出借钱财的问题上失去了自我控制。例如，1920年，在他给《小评论》写的一篇随笔中，庞德就为反犹太经济学家C·H·道格拉斯少校的《经济民主》一书热烈欢呼，称此书是把现代文明从可憎的高利贷中挽救出来的纲领。他对道格拉斯幼稚思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谈论到，在经济学家中，道格拉斯也许算得上一名“士兵，但决不是少校”）的毫无批评的热中，也曾进一步在庞德结识海明威前完成的一系列“诗章”中显露了出来。

性与艺术的关系是庞德长期以来怀有奇特想法的另一个主题。因此，在1922年夏，他出版了一部名为《爱的自然哲学》的译著，原著为雷米·古尔蒙所写的《性爱：性本能随笔集》。在译著后记中，庞德不仅赞同古尔蒙那令人生疑的观点：“一次圆满而酣畅的性交与大脑的发育相关”，而且宣称大脑自身多半可能是“一种保留或储藏生殖液的巨大的结块”。庞德断言，创造性思想是一种男性力量，他把它比作一种“阴茎或精虫”，它天生的目标就是生活中“女性那浑沌的深渊”。“甚至人的自身已感觉到”，他在显然是指他在英国那段严阵以待的岁月时补充说：“在给伦敦这个巨大而又默从的阴户注入新思想时，那种感觉就类似于性交中男性的感觉”。

这真是“十足的胡话、废话和庸俗之词”。简而言之，在20年代早期这些就已经是庞德思想中的主干部分。然而，在帮助艾伦·泰特描述那段岁月里的诗人时，海明威对他那些非文学信仰的胡话或者说是疯话却闭口不谈。相反，他只是强调庞德如何关照同行，如何帮助他们。这种对积极方面的强调并不奇怪。因为，在《向庞德致敬》这篇发表于1925年5月号《这一季》杂志海外版的文章中，海明威早已表明了他对庞德所给予他的许多关切的感激之情。

至此，我们发现庞德这位专业诗人大约以五分之一的的时间致力于诗歌创作。其余时间，他则尽力在物质和艺术两个方面增加朋友们的财富。每当他们受到攻击时，他就会来辩护。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的文章在杂志上得以发表；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免受监禁之苦。他贷款给他们，为他们销售绘画作品，为他们安排音乐会。他还撰写有关他们的文章，把他们引见给贵妇人，他说服出版商采用他们的著作。当他们声称不想活时，他便通宵做陪，劝阻并亲眼看着他们放弃轻生的念头。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放弃了一有机会就采取阴险手段攻击庞德的打算。

庞德第一次帮助海明威的努力始于海明威要求他读一读他的一些诗及小说。“棒极了”，是他对海明威诗歌的评价。征得作者同意后，他即刻把其中的六首诗寄给了纽约《日晷》杂志的斯科菲尔德·塞耶，并在随之而附寄的信中陈述了他对它们的看法。他还自告奋勇地为《小评论》收下了海明威的一篇小说。不幸的是，玛格丽特·安德森拒绝刊载庞德接受的那篇小说，塞耶也退回了所有那六首诗。但是，至少能令海明威感到欣慰的是，一位美

国的专业诗人对他的作品深表了同情。

诗人“出众而又辛辣的口才”以及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大西洋两岸作家绯闻轶事的添油加醋的闲谈，也有助于使海明威深深相信他与庞德可谓趣味相投。不过，在庞德最能令这位最初并不信任他的年轻人颇有好感的所有办法中，没有什么能比他令人惊讶地宣布他想学习拳击这一招更有效。“我一直在教庞德拳击，但收效甚微。”不久以后，海明威就告知舍伍德·安德森：“他习惯性地突出下巴，活像一只淡水螯虾。……今天下午我又去那儿上了一堂课，但结果还是不理想，我不得不在几个回合之间自己进行拳击练习，这样才能出一身汗。不过，我还是要为庞德说上一句好话，他总是大汗淋漓。此外，拿尊严和在评论界的声望去冒险干一件他一窍不通的行当，对他来说着实有点堂正大度的味道。”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庞德有时也会趁海明威未加提防时给他一两记有力的冲拳，而海明威对他的尊敬也就随着他拳击力度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我现在定期与埃兹拉·庞德练习拳击”，他写信告诉豪伊·詹金斯说，“他已练就了非同寻常的铁拳。通常我能在那铁拳到来前躲闪开。当来势过于凶猛时，我就把他击倒在地。他是块学拳击的材料，已经学会了带着手套重重给人以打击。总有一天，他会趁我粗心大意，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他的体重可约有180磅呀。”

当海明威请求他的新朋友读读他笔记本上的作品时，庞德给予了他十分具体的建议。受益者后来说，这是他所得到的建议中最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几个月前，庞德就已给T·S·艾略特提供了类似的帮助。那时，艾略特给他的是“一篇题为《荒原》的杂乱混沌的诗歌的原稿”。对于格外易于动怒的海明威，庞德在提出批评前总要小心地写上几句恭维话；或者，他在信中总要用男人的语言去谈论体育以缓和他的批评的刺激性。他在几年后写的一封信便是一例。“我认为就你的才智，应写得比这个稿子更好。”他在1927年1月25日的信中唐突地告诉海明威。不过，接着他又补充说：“见鬼，我要找些能终止这一讨论的话题。我要说：我的朋友海姆，我可以把你击倒在拳击台上；然后，我想要看到的是有力的击拳，而不是在拳击台上温柔的拥抱。”对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作家来说，还有一些有助于他们友谊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共同拥有一个愿望：为了自己的缘故，一定要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10年前，在巴黎地铁协和广场站，庞德走出一列火车，突然看见一张漂亮的脸庞，接着又一张，又是一张。经过18个月的酝酿，庞德就此经历写了以下两行诗：

人群中出现的这些脸庞，
一根又湿又黑的树枝上的花瓣。

在欧洲呆了半年后，海明威也成功地用六个长句精练地概括了他在巴黎的经历。所有这六句话均为明显的视觉聚焦，这一点肯定会令《在一个地铁站》的作者钦佩不已，尤其是这三句：

我曾站在一辆挤满了人的七点钟的巴蒂诺勒公共汽车的后半节车厢里，车子沿着一条湿波渡的亮着灯的街道歪歪扭扭地行驶，回家吃晚饭的人们读着报纸，路过的雨中滴着水珠的灰色的圣母像时，他们也从不抬头。……我看见了用一个用一条腿在街上行走的人，她是在康邦路与贝尔南热纳路之间

的马德莱娜大道上工作，她一瘸一瘸地在雨夜里沿着人行道行走，有一个面孔红润的圣公会牧师为她撑着一把伞。……我看见两个懂得治蛇毒的塞内加尔士兵在植物园的蛇馆里，他们偿在暗淡的灯光下逗弄一条眼镜蛇王，那蛇直直地、愤怒地弓起头部，来回晃动着，有几个棕色人种的小个子也围在那儿。其中一个戴着土耳其红帽，他蹲着，假装也在逗那条蛇。

明快是庞德的又一个审美原则。偶尔他也教导海明威如何更快更好地叙述故事。以《阿尔卑斯山牧歌》为例，这个短篇小说是海明威在庞德移居意大利后正着手创办《流放者》杂志时从巴黎邮寄给他的。与以往一样，庞德还是以一种美国乡巴佬的口音告诉海明威说，实际上他无法发表这篇作品，除非他愿意删除开头的部分。

这（牧歌）是一篇好小说，但文学气太浓，坦尼森风格的味儿太重。我希望你集中更多的注意力到客观本身，少一点文学气。你明白我所说的文学气的意思吧。所谓文学气就是读者（甚至是对作品颇感兴趣的读者，比如像我这样对其格外抱有希望的读者）不得不在前言部分就把眼睛盯在每一页上。……摆在主题前面的任何东西都是坏的。文学多半都会把一个主题给层层包裹起来。太多的装饰之物。主题应该总是无需包装就足够令人感兴趣的了。

只是在这一次，海明威没有理睬诗人的建议，他在范·怀克·布鲁克斯所编辑的一本作品集中原封不动地发表了《阿尔卑斯山牧歌》。然而，还没等这本集子问世，海明威就在给庞德的一封信中承认，恰恰正是由于庞德挑出的那个问题，这则故事确实不甚令人满意。说到海明威在巴黎的另一位指导者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几乎从未这么具体地提出过批评。

七

艾丽斯·B·托克莱斯是在1907年第一次拜访斯泰因小姐的。当时，格特鲁德·斯泰因与哥哥利奥住在弗勒吕斯大街27号的一栋公寓里。在毗邻的工作室里，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一排排绘画作品，一直通到天花板。这些作品包括有勒努瓦、戈甘和曼古因斯的作品；有两排马蒂斯的作品；大量毕加索在创作诙谐角色时期的作品；有包括一位女士的大幅画像、一些小幅油画及许多水彩画在内的塞尚的作品；有瓦洛顿的一幅大幅裸体画和瓦洛顿亲绘的格特鲁德的画像；有图卢兹-洛特雷克、莫里斯·德尼和博纳尔的作品各一幅；多米耶和德拉克鲁瓦的小幅作品各一件；还有埃尔·格雷科的一幅中幅作品及其他许多作品。大约15年后，当海明威和哈德莉被引入这间工作室时，他们觉得仿佛就置身于“最好的博物馆中最好的一间展厅”内。其实，令他们倾倒的所有这些收藏作品还不如战前丰富，因为1913年利奥与格特鲁德不欢而散之后，他移居到佛罗伦萨，从那儿他通知格特鲁德把塞尚的半数作品及勒努瓦的全部作品给他寄去。

假若他乐意那么办，利奥本可以索要更多的油画，因为在他们收藏这些作品的辉煌岁月里，格特鲁德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对这种视觉艺术的独立判断能力。见多识广的美国画家莫里斯·斯特恩认为，她的艺术敏感力只是她兄弟的一个“反映”。呵格尼丝·厄恩斯特是一位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新闻记

者，她后来与金融家尤金·迈耶结婚。她对格特鲁德的印象甚至更为淡薄。“当我1909年结识她时”，她很久以后回忆道，她认为格特鲁德就是“一个骗子”，她“靠着从利奥那儿学到的东西谋生”。

在欣赏艺术品的方面，格特鲁德或许是个冒充内行的骗子，但是作为艺术心理分析家，她却极其机敏。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观察了许许多多的艺术家，而且是因为她“很有头脑”，——伯纳德·贝伦森的妻子玛丽1903年在日记中就是这样记录的。那是在格特鲁德首次拜访佛罗伦萨郊外贝伦森一号塔迪庄园后玛丽所作的评价。除了有头脑之外，她还拥有锐利的才智、编词造句的天赋以及自我推销的本事。这一切可是她那具有盛气凌人的个性的哥哥所永远无法抹煞的。经过了几年时间，她渐渐地不再在聚会中洗耳恭听利奥的独白了，而是开始考虑清楚地表明她自己的见解。当她最终真的开始这么做了，那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海明威夫妇在弗勒吕斯大街的第一个下午，海明威就被明确地告知他可以与格特鲁德一起坐在工作室的一头，正对着壁炉，而哈德莉可以与艾丽斯·托克莱斯在另一头交谈。到此次拜访结束时，另一件事已经成了谈话的焦点。在橡树园，“斯泰因太太”曾是厄内斯特对母亲的昵称之一；而在巴黎，斯泰因小姐则成了格雷丝的最能包罗万象的替身。虽然两个女人在某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她们有好几个相似之处都是意味深长的。

首先，她们的年龄仅相差20个月。她们两人都爱在交谈中唱主角。像格雷丝一样，格特鲁德说起话来，那副女低音的嗓子也以其天鹅绒般美妙的音色和自信的语调博得注目。至于格特鲁德与艾丽斯·托克莱斯的关系，海明威也许认为这是他母亲与露丝·阿诺德的关系的一种更大胆的法国式变异。最后，还有体形所造成的印象。格特鲁德的身体似乎甚至比格雷丝更丰满，尽管格雷丝在厄内斯特四岁时就已如气球般膨胀到180磅。自身有体重问题的玛丽·贝伦森也无法原谅格特鲁德的肥壮。1903年，她把格特鲁德描述成一个“肥胖臃肿的人，皮肤呈红木色，却有个庄严如纪念碑似的脑袋”。三年后，当玛丽和她的表妹埃米莉·道森在一个托斯卡纳式的明媚的下午驱车回到一号塔迪庄园时，“我们看见山上出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幽灵，一个圆滚滚的肉墩子，旁边是一团高大的明亮的棕色火焰。这些怪印象后来变成了格特鲁德和她的哥哥。她比以前更肥硕了（但挺干净）。……他们干脆让人的眼睛受不了。在与他们握手后，埃米莉和我带着痛苦的诧异继续驱车前行”。在1908年夏日的第一天，玛丽向父母吐露说：“（今天）我们痛痛快快地进行了一次‘只有女士’能参加的游泳，斯泰因小姐除了那身脂肪外是一丝不挂。我确实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么肥胖的人。”至于海明威对格特鲁德的肥胖的印象，他首先想到的是她“非常丰硕但个子不高，腿粗腰壮，像个农妇。”她乳房的大小尤其令他感兴趣。他思忖着每个能有多重。“我觉得大约10磅，你觉得呢，哈德莉？”他们告辞后，他这样问妻子。

她的头发同样令海明威感兴趣。格特鲁德那时还没有决定把她的头梳成尤利乌斯·凯撒式这种令现在世上大多数人想到她的发型。据《流动的圣节》的作者所说，那时，她的发型“同她可能在大学里就已梳理的发型一样”，是一头“可爱、浓密的头发，一种充满活力的移民发式”。海明威暗示说，她的头发和她“美丽的眼睛”、“结实的德国犹太人脸庞”很相配。在他与莉兹·迪尔沃斯的相处中也许只是潜在的那种性冲动，在他与格特鲁德的关系中却是作为一种明确的因素被提了出来。读过W·G·罗杰斯写的《看到这

一切时，请记住我：格特鲁德·斯泰因其人》（1948）之后不久，他告诉罗杰斯：“我更喜欢剪发前的她，就很多事情而言，那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她以前常跟我谈论同性恋，说同性恋适合女性，但对男人没有好处。我常常边听边学，总想着操她一顿。她清楚这一点。那是一种良好的健康的感受，比有些谈话更有意义。”

在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她女性肉体的丰腴的同时，他也能够把她当作一名男子来谈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我就好似兄弟一般”，他在给舍伍德·安德森的一封信中感叹说。他认为她是两性人的感觉可以由格特鲁德自己的感觉进一步加以证实。她赞成威尼斯心理学家奥托·魏尼格尔所写的名为《性与性格》（1906）一书中提出的见解。魏尼格尔坚持认为完全女性化的妇女缺乏想象，但拥有想象的只有那些半男性化的妇女。他向一位专家宣布：“所有真正著名的有着出众智慧的妇女都显示出一些男性的构造特征以及与男人身体上的相似处。”他进一步辩论说：“既有吸引力又迷恋于其他妇女的妇女，其本身就是半男性。”换句话说，女同性恋有时就是智慧力量的标志。难怪格特鲁德喜欢同海明威讲述性倒错的现象。

然而，她这样做似乎还另有动机。引入这种谈话给了她一个品评海明威的的机会。一向在与新朋友的交谈中谨慎到了斤斤计较的海明威显然未能意识到，在弗勒吕斯大街27号，直觉的心理分析是这栋住宅主人的特长。11年后，格特鲁德在《艾丽斯·B·托克莱斯自传》中对他的猛烈攻击显示出她对海明威的了解有多么地深，尽管她对其家庭背景的奇特细节一无所知。“海明威的真实的故事将会是一本多么妙的书啊！”她刻毒他说道：“这样一本书可不是他所写的东西，而是真实的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自白。这本书将给另一批读者看，而不是给海明威现在拥有的读者看，不过那将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难道她是在头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天就察觉到这位充满阳刚气的年轻人正掩饰着什么吗？如果她察觉到了，那么她就是把她的想法给封了起来，不让他知道。格特鲁德和她的伙伴两个人“似乎都喜欢我们”，海明威回忆道。过了些天，当这两位女士爬了四层楼梯来海明威夫妇的住所拜访时，“她们似乎更加喜欢我们了”。格特鲁德坐在床上，礼貌地询问厄内斯特是否能看看他的一些作品。其他人谈话时，她浏览了他的几首诗、一本小说的部分手稿和几篇短篇小说。她推三阻四地表态说，这些诗“率直而有基普林式的风格”。她对那本小说没什么好感，因为她觉得描写不够集中。不过，她很喜欢那些短篇小说，除了《在密执安北部》之外。她解释说，这篇小说“inaccrochable”，也就是说具有“不可悬挂性”，就像是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由于其道德上的可憎而无法展出。她警告说，没有哪个美国出版商会接收这篇小说，正像没有哪个出版商会愿意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书上冒险。话题转到了绘画上后，她告诉海明威和哈德莉如何购买绘画作品。“你们要么是买衣服要么就是买绘画作品，”她向他们建议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是有钱人就无法做到两者兼得。”当她和艾丽斯向这对年轻夫妇道别时，她邀请他们再次来弗勒吕斯大街作客。

可能是在海明威第二次拜访之际，格特鲁德取出了一把剪子，教海明威如何修剪他妻子的头发。自从抵达巴黎之后，哈德莉一直梳着短发。由于她的丈夫希望甚至更短一些，她便也这么想来着。在他们结识的最初几个月里，恐怕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建议比这次理发示范更能有效地令海明威把她当作

“家人”了。

到年底时，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当格特鲁德在卢森堡花园遇到海明威时，她发出了一个总的邀请，他可以在任何一个下午的五点之后到她的工作室里来作客。他发现，未经事先通知她的顺便探望往往格外令人愉快。他总能有美味的小蛋糕可吃，也常常可以选一种芬芳无色的白酒饮用。这种酒是通过蒸馏提取紫梅、黄梅或覆盆子的精华制成的。酒盛于雕花玻璃水瓶中，斟入小玻璃杯中享用。他呷着酒，她则往他的杯中添酒。他们两人谈论着墙上的绘画，尽管关于画家格特鲁德有比关于绘画作品本身更为有趣的事可说。她还谈到她了的作品。她向海明威展示了几千页稿纸，那都已经由忠诚的艾丽斯干干净净地打印好。格特鲁德每天都要笔耕，她讨厌修改，也不在意别人批评她的作品时常令人感到晦涩难解，结果是：她便仍然未能得到她自我感觉她的天份应该得到的认同。出于对D·H·劳伦斯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嫉妒，她毁谤他们的作品，对其他许多同时代的作家的小说也百般挖苦，但那些说过她作品好话的，像舍伍德·安德森等人，显然除外。然而，尽管她争强好胜，海明威却发现与她探讨他自己的作品受益匪浅。与埃兹拉·庞德不同，她不拘泥于细节，因为她不是编辑。她不愿意修改自己的稿件就表明了这一点。她总是恪守她所谓的“总体原则”进行评论，但是当她坐在她的那特别的椅子上，像个洗衣女似地把胳膊搁在膝盖上休息时，她讲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而海明威则对她的每一字每一句进行认真的斟酌。

在海明威发狂似的并且频率不断增加的关注下，格特鲁德变得甚至比平时更加妄自尊大。正如她在多年后带着不无尖刻的口吻所承认的，她有个“弱点”让这个年轻人给抓住了。她对于他的兴趣并没有由于艾丽斯·托克莱斯而丧失。格特鲁德的伴侣为格特鲁德而生活。她为她做饭，为她打字。当声名赫赫的画家和作家在壁炉前聚集在格特鲁德的周围时，托克莱斯则与他们默默无闻的妻子们交谈。然而，无私是力量的源泉。格特鲁德记得，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在菲耶索莱，一天下午，当格特鲁德要求托克莱斯做她的妻子时，格特鲁德恳求他说道：“请你在乎我吧。”“妻子应该缠住她的丈夫不放，这是莎士比亚说的；一个脉脉含情的妻子应该与丈夫形影不离，她就该这么做。”艾丽斯叫道：“我是你的新娘。”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格特鲁德所记忆的大致情形。然而，艾丽斯毕竟总是存在着寻找到另外一位情人从而退出她们的关系的可能性。正像艾丽斯的传记作家琳达·西蒙所观察到的，“格特鲁德对艾丽斯不忠的担心隐含于她的作品中。”这种担心导致每当艾丽斯显出不快时她就变得一副低声下气的顺从样子。

多年来，艾丽斯允许格特鲁德与像舍伍德·安德森和巴勃罗·毕加索这样英俊的男士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因为她觉得他们不会对她造成威胁。但是，海明威由于其“乌黑闪亮的眼睛”、“粲然的微笑”和“使他看起来像个意大利人”的过长的头发而显得不同于其他的男士。很明显，艾丽斯一开始就是以怀疑的态度来揣度他，虽然她为了格特鲁德而真心诚意地待他并且仍继续这么做。这么说，也就可能是她挑选出格特鲁德在1922年秋从法国南部寄给海明威夫妇的卡斯巴香瓜，是她建议这对年轻夫妇在1923年夏去参观潘普洛纳。然而，正是因为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使这座小城变成了不朽的小城，所以对艾丽斯来说它被永远地糟蹋了。甚至在他死后，她还说就是“因为海明威”，她便再也不愿意回到那儿去。

海明威说，格特鲁德明白他想操她。但倘若格特鲁德知道的话，那么艾丽斯也知道，因为她是格特鲁德心思的研究家。然而，她在等待着时机。一直到了海明威自以为格特鲁德的友情是理所当然时，她才最后给这个大胆的家伙立下了规矩。“你知道嘛，我叫格特鲁德要甩掉他”，她后来这样告诉一位朋友。

第八章 不和的种子

—

通过参加英裔美国人新闻俱乐部在右岸召开的每周例会，海明威渐渐结识了另一些记者，其中与他志趣最相投的要算布鲁克林《每日鹰报》的盖伊·希科克。作为十足的体育迷和有名的乐天而随和之人，希科克对赛马、拳击和法国酒的精通令人难忘。希科克齐刷刷的黑色小胡子也给人以深刻印象。1922年夏天，在访问德国期间，海明威也留了深褐色的刷形胡子与之媲美，并显得更胜一筹。

正如艾丽斯·托克莱斯以不以为然的口吻所提到的，海明威也让头上的头发长过了耳梢，而且脑后的头发又长又密。根据海明威可能原本打算写进《流动的圣节》中的一段未发表过的文章来看，他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外表使一些他在新闻俱乐部结识的人部不愿意与他接近。他们中的一个偶尔会把他叫到一旁，与他谈及此事。“你不能忘乎所以，海姆，当然这与我无关。但你能这样不加修饰。看在上帝的份上，整理一下，至少梳个适当的发型。”虽然这个故事也许过于完美，以至于令人难以置信，但它的确证明了故事讲述者对头发长度问题所一直持有的态度以及他对在记者圈中作为一个自行其是者的强烈意识。他并非真的想继续做新闻记者，而且他对这种工作所耗费的时间深感畏惧。“这个该死的报道差事正一步步地把我毁了，”在离开芝加哥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对舍伍德·安德森这样抱怨说。

促使他如此发怒的原因，是来自《星报》要求他出席4月9日在热那亚隆重开幕的国际经济会议的指示。他一边诅咒着，一边又不得不照办。他理了发，穿上了他的爱尔兰花呢西服，登上了他买的那双上好的英国皮鞋，前往意大利。他也许在感觉上并不像是个老练的记者，但至少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回事。

自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维也纳会议以来，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是世界上此类会议中最生动的一次。在老城狭窄的用石头铺成的街道上，每一面三角墙上都悬挂着旗帜，仿佛正在举行一个节日庆典。每天早晨，秘书们、金融专家们、成百上千的新闻记者们以及来自包括战败的德国和革命的俄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代表，涌入热那亚银行家协会的宫殿圣乔治宫的大厅。这次会议中的全体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代表们开始谈论重建欧洲。在到场的许多有权势的政治家中，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成了焦点人物。他带头召集了这次会议。当这位白发的威尔士人首先出现在演讲台上时，整个大厅爆发出不约而同的赞美声。但是，也就是这些为劳埃德·乔治齐声喝彩的代表们却很难在其他方面如此一致。会议曾明显地陷入了僵局，而德国与苏俄却已经在16英里之外的拉帕洛开始秘密磋商。令热那亚与会者感到诧异的是，它们很快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两个大国取消了战前债务和战争赔偿，并签署了一个贸易协定。德国愿意成为第一个给予苏俄以外交认可的国家。作为交换，俄国人秘密允许在其国内某地合作生产武器，并在该地训练德国士兵，可这直接违背了凡尔赛和约。

海明威从热那亚发出的报道实难令人满意。首先是由于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其次他也没有为弄清议程的意义作任何努力。他只是满足于匆忙地写成有关敌对代表之间口头冲突的戏剧性报道和引起他注意的各式人物的生动

描述：从德国大臣沃思博士“看上去像德国乐队里的大号手”，到两个年轻的俄国秘书，她们的“新面孔、艾琳·卡斯尔式的短发、裁剪成流行样式的西服”使她们成为“会议大厅里最漂亮的小姐”。至于说到拉帕洛的进展状况，与报道已经发表的令人震惊的苏德恢复友好关系的详情相比，他更有兴趣谈谈他在幽默作家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别墅与主人一起喝的那杯马沙拉白葡萄酒。

他花了大量时间在饮食店与林肯·斯蒂芬斯、马克斯·伊斯特曼、乔治·塞尔迪斯和萨姆·斯皮瓦克一起喝酒吃饭。据推测，这些人也是来采访会议的。有时候，他们五个会被雕刻家乔·戴维森召集在一起。乔是从纽约前来为一些政界要人绘制头像的。“我已超越现实，看到将来，这一点挺管用。”自从他1919年访问红色俄国以来，斯蒂芬斯就以他的言论闻名，而伊斯特曼、塞尔迪斯、斯皮瓦克和戴维森等先生也把俄国革命视作全世界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红色曙光。这些消息灵通而且自信的同伴们的谈话对于海明威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他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但他并未对他们有关北部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全然善意的观点提出疑问。

不久后，他对《星报》的读者们说，“北部意大利的红色分子，”他既是“某个家庭的父亲，同时在一周的六天里，他又是一个好工人，可在第七天，他讨论政治。他的领袖们明确地拒绝了俄式的共产主义，因而他之属于红色派别正如一些加拿大人属于自由党。他并不为之斗争或企图因其而改变世界，他只想谈一谈。”海明威这样认为，如果北部意大利红色分子偶尔制造暴力事件的话，那么仅仅是因为他受到了敌人的挑衅。

虽然这位《星报》的记者对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未免感情用事，但他对贝尼托·墨索里尼及其党徒则不抱任何幻想。他说，法西斯主义者都是“毒龙的牙齿”，他们是在战后的意大利随时都有可能赤化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从那以后，这些架子十足的恶棍走上街头，头戴黑缨帽，身佩利刃，带着弹药，唱着法西斯赞歌《青春》（意大利语是“Giovinezza”，但海明威常把它写作“Giovanezza”）。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遇上了一个令他们不能满意的政治会议，不管是共产党的、社会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他们就会袭击甚至杀害与会者，如果武力威胁不足以驱散集会的话。“法西斯主义者，”海明威说道：“年轻，粗暴，激进，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具有南方民族的年轻和英俊的容貌，总的来说，他们形象颇佳，并且确信自己绝对正确。”

“主啊，赐予我们的时代以和平吧！”自孩提时代起海明威就聆听属于美国新教圣公会的外祖父高声朗读《祈祷通经》，他对这句话耳熟能详。但和平不属于战后的意大利。海明威报道说，从1919年以来，法西斯分子与红色分子之间在半岛各处发生了成百上千次剧烈冲突。刚刚结束的几个月里，在托斯卡纳地区和北部出现了血腥的搏斗、谋杀、报复和激战。政府派出1500名精选的武装警察前往热那亚，以镇压因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到来而引发的赤色或反赤色示威，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可能与他的那些饮食店的伙伴们一样，海明威确信一旦军队撤离，暴力就会重演。

他在热那亚会议上结交的左翼记者们进一步影响了他的观点，他们把美国在进步时代的变革描述成对不值得挽救的社会与经济制度的修补工作。“我们美国人曾经发动了那样一个短暂的揭发贪污腐败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林肯·斯蒂芬斯在20年代时常常提出这样的异议，尽管他自己也曾写过一本揭发贪污腐败的杰作《城市之耻》（1904）。他对苏联的经

验如痴如醉，进而他这样说：“它延缓了我们的时代灭亡的时间，其时间之长，超过了我们致力于此的时日。”“它延长了荒唐的年代，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他第一次发表了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后不久、容易轻信的海明威对他儿时所崇拜的英雄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和生活也作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评论。

工人们相信
他毁灭了希望、
他的画像挂在了他们的窗户上。
“看看他在法国干了些什么！”
他们曾说。
也许他想——
也许，
卧榻才是将军们九死一生的沙场，
而他的归宿正是这样。
他的一生引发了无数的传奇
传奇将永存和发扬
他的存在也无法将其阻挡。

这首诗连篇讽刺，但其中最大的讽刺就连作者本人也无法意识到。在最后三行里，海明威无意中对他自己的传奇今后将具有的力量作了预言性的描述。

二

在返回巴黎时，他儿时就患有的严重喉痛发作了，这次是最糟的一次。他坚信这一弱点归因于在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所遭遇的一桩事故，一根棍子刺入了他的咽喉的底部。极端的虚弱使他无法专注于新的创造，他便把以前的六首诗寄给了《诗歌》杂志的哈丽雅特·门罗——其中的一首定名为《罗斯福》，同时他对期望之中的尽快用报社的经费所作的苏联之行浮想联翩。然而当这一指派未能实现时，他决定多休息一段时间，与哈德莉以及他从米兰来的老伙伴钦克·多尔曼—史密斯一起钓鱼、爬山。史密斯答应于5月中旬在他们过去曾经在香比镇呆过的膳宿公寓与海明威夫妇会面。

他们三人的休假是以爬卡普奥莫安山峰开始的，这是一次高达7000英尺的陡峭而危险的攀登。在一个大约高一英里的峰顶，他们放开手，任由自己滑下雪野，渡过一段美妙的时光。至于他们接下去迎接的另一大挑战，他们干得可就没有那么漂亮了。在钦克的怂恿下，他们沿着穿过圣伯纳德山隘通向意大利的路线出发了。他们并未意识到山隘还未通路，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人从瑞士这一侧登上去过。有时，他们跋涉于及膝深的积雪中。对哈德莉来说，这是她所经历过的最艰苦的处境。“虚荣和无知”，她懊悔地回忆道：“使我穿了一双轻便的美式牛津鞋，既不适合于地形，也不适宜于气候。我认为我是想让钦克赞美我那修长的双腿。”当他们奋力前进时，她感到浑身冰凉，可能还有几分惊恐。但终于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圣伯纳德的小客栈。在这里，他们获得了一个可以过夜的避难所。第二天早上，哈德莉发现她的脚肿了起来，她的鞋也变小了。然而，两个男人赞成继续向前行。在去奥斯

塔的一路上，他们走 20 分钟就歇 10 分钟。即使这样，她的鞋实在是太紧了，在离市镇不到几英里处，她再也无法忍受。余下的路程，她多多少少只得被搀扶着走。“我的脚起满了水泡”，她回忆说：“两天没下床。”

和往常一样，她拿出了最大的勇气追随她的丈夫。但在给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的信中，当谈及此次徒步旅行时，海明威却从有些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除了只是附带提及“在奥斯塔海明威夫人的脚肿起来了”之外，他对哈德莉所受的折磨只字未提。同时，他要让女士们了解到对他来说爬上小客栈有多么艰难。“为了爬上最后两三公里的雪地，我付出的努力是上尉和海明威夫人的两人之和，并且每 200 码就要喝口法国白兰地。”

几天后，钦克与他们分手返回他在莱茵兰的军队驻地。随后，海明威带着哈德莉到米兰所有的地方进行了一次令人陶醉的观光。1918 年的这次游历对他来说意味深长。他们的漫游后来成为《永别了，武器》第二十三章的原形。在那一章中，在亨利中尉不得不回前线的头天晚上，他和凯瑟琳·巴克利在大教堂前稍事停留，大教堂在“夜雾里显得灰白而且湿润”。然后，他们继续向前，在商业长廊东瞧西逛，最后到了一个旅馆。

在米兰，海明威对社会主义的叛徒贝尼托·墨索里尼进行了采访，这一采访给他带来的是另一种兴致。他看到这个法西斯头子坐在他的《意大利民族》报社的一张桌子前，抚弄着一只小猎狼犬的耳朵，说话像个文人，但他却统率着一个既是政党又是军队的 50 万人的组织。在海明威对此次采访的报道中，他没有正面回答墨索里尼企图用他的权势去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但是，他却强烈地暗示了这个答案将是苦涩的。

为了更进一步地追溯对昔日往事的回忆，这些旅行者乘汽车从米兰到了斯基奥，又从斯基奥坐火车和租用小车到了福萨尔塔。不幸的是，两个市镇对他来说都已无法辨认，斯基奥比以往中尉印象中的小镇要简陋得多，而福萨尔塔被战火摧毁的中心区已重建成令人生厌的现代风格。当司机载着他们沿着皮亚韦河畔开出去时，海明威的怀旧情绪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在他曾受伤的地点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一处堑壕或防空洞。

三

回巴黎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又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向哈德莉建议说，一次穿越黑森林的徒步与钓鱼旅行将是抵挡 8 月酷暑的理想方式。像往常一样，她欣然答应。然后，他用甜言蜜语诱惑刘易斯·加兰提埃尔和他的未婚妻多萝西·巴特勒同行。新闻记者比尔·伯德和他的妻子莎莉也去了。这帮远足者们约定在斯特拉斯堡碰面，因为海明威夫妇打算乘飞机去，而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坐火车去。

海明威对他那些多伦多的读者们讲述说，银色的双翼飞机升上天空就好像飞行员和他的两个乘客被一个巨人慢慢地举起。“我们脚下的大地展开成了一块平面，看上去像被分割成棕色、黄色、绿色的方块以及一大块平坦的绿色，那儿是一片森林。我开始能够领会立体派的绘画了。”这一情景他可能也向格特鲁德·斯泰因描述过，因为 12 年后，当她访问美国期间，第一次坐飞机时，她的反应十分相似。“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解了地面是怎么样一回事，四个等分的区域构成了一幅图画。俯视美国……才使人明白为什么后立体派绘画会是那样的。”

如果说飞往斯特拉斯堡的航程对海明威来说是一次令人震颤的经历，那么余下的旅行则让他大为光火。黑森林被维护得过于整齐，因而不能满足一个已经习惯于密执安荒地的男人的要求；粗鄙、肥胖的德国旅行者们摇晃着他们笨重的身体，四处走动；繁文缛节的官僚习气使得获取团体钓鱼执照困难得令人泄气。更有甚者，海明威对多萝西·巴特勒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两年之后，在他热中于寄出的致人于死地的信件中，海明威把自己对她的看法告诉了她。“多萝西，虽然我吻了你，但即使在我吻你时，我也从未喜欢过你，可为了偶尔能见见刘易斯，我愿意努力去喜欢你。无数次我的努力都成功了。但这一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哈德莉也和她的丈夫一样并未享受到黑森林的乐趣。而且，他们返回巴黎后不几天，无法松弛的神经紧张使他们自蜜月以来第一次大争大吵。引起争论的原因，是多伦多的约翰·博恩寄来的一封电报，他指派海明威去君士坦丁堡报道希腊与土耳其之间战争的惨痛后果。哈德莉强烈反对他去，她不喜欢独自呆在他们的公寓里。况且，不管怎么说，这次旅行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因为即使战争已结束，据传那儿的传染病仍十分猖獗。他说她简直是疯了。哈德莉反复申明她的态度。忽然，他们两人都发怒了。“真是糟透了，”她回顾说。在他离开前的三天里，她一直都不愿和他说话。他走后，由于意识到她已将自己的喜好置于他的事业之上，她的孤独感变得愈发强烈。没有人让她觉得可以向其诉说隐衷，她的婆婆尤其不能。在写信给格雷丝时，她愉快地谈起“每天练习三小时（钢琴），并和这里所有快乐的人一起闲游”。她承认她思念厄内斯特，但“每个人都向我保证他很安全，因为那儿已经平静了下来，他不久就将回家。”不幸的是，她补充说，他的旅行出师不利，他“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扭伤了脚踝，而且出租车司机摔坏了他的打字机。”

10年后，在《先生们，祝你们快乐！》中，海明威所写的第一句话便令人迷惑地提到了君士坦丁堡。“那时候，距离跟如今可大不相同，泥土从如今已被削平的山坡上吹下来，堪萨斯城与君士坦丁堡十分相似。”说到堪萨斯城的山峰已被削平，这与对性欲感到不安的男孩在故事中给自己所做的可怕的外科手术有关。但说到堪萨斯城与君士坦丁堡“十分相似”，这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在第一句话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这座城市再未被提起。那么，他为什么要自我麻烦地提出这一对比呢？也许，1917年秋海明威在堪萨斯城的想法与他五年后在君士坦丁堡的想法是有联系的。堪萨斯城是一个充满了邪恶诱惑的城市，尽管有他母亲令他不快的秘密警告，可他仍然感到了诱惑的吸引。1922年秋，君士坦丁堡同样以邪恶而闻名。纵然凯旋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已经宣布了整顿城市的打算，但当他光顾肮脏的加拉塔区的夜总会和舞厅时，海明威是否受到了诱惑从而对刚与他吵过架的妻子不忠了呢？反正在《乞力马扎罗的雪》里，他是念念不忘地提起了这个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曾经见识过他被忿怒、欲望和罪恶这些矛盾交织的情感所撕裂的地方，堪萨斯城和君士坦丁堡的确是“十分相似”。而《乞力马扎罗的雪》与《先生们，祝你们快乐！》十分相似，是因为它也是在性悲剧的绝望感下写成的。在与保利娜·普法伊弗的婚姻渐渐毁灭的过程中，《乞力马扎罗的雪》的作者追忆了他与哈德莉的婚姻中最初的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时光，还有他最初失去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的那段岁月。

在他现任的妻子海伦换掉了绑在他那生了坏疽的右脚上的绷带并拿去清洗之后，一个名叫哈里的奄奄一息的作家，在炎热非洲的黑暗中躺在他的行

军床上，看着炉火的影子跳上帐篷，想着在巴黎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吵架后“独自在君士坦丁堡”的日子。“他一直嫖妓，但在那之后他仍无法排遣寂寞而只是更糟。”他给他爱过的第一个女人，“那个已经离开了他的女人”，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她，他从未能抹去对她的爱。在高高的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的新闻俱乐部，他清醒而冷静地写了这封信，并让她往他在巴黎的办公室回信。不管所谓的嫖妓之事是否为真实的自传，有关给某个初时情人写信的部分的确是直接队现实生活中取材的，虽说海明威给阿格尼丝的信是在返回巴黎时才写的，而不是在君士坦丁堡；虽说信的语调也只是友善，而不是热烈。

四

《乞力马扎罗的雪》的男主人公还记得，他曾坐着火车横穿安纳托利亚，整天骑着马穿行在一片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着罂粟花的田野里，直到最后，他到达了战场，在那里，武装的土耳其人正稳步而又笨重地挺进，穿着裙子的希腊士兵正在逃跑，而他们的军官们在击毙了逃兵后自己也在逃跑。“就在那天，他第一次看到了死人，死人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和向上翘起的有绒球的鞋子。”其实，海明威自己并未见过这种情景。

8月份，当土耳其人把希腊人逐出安纳托利亚时，他仍在德国度假。而到了10月中旬，他所跟随的那些越过色雷斯的希腊步兵们也都是穿着多余的美军制服。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个人向他描述了那些穿着裙子死去的士兵，他是一个在新闻俱乐部做联络员的印度骑兵部队的英国上尉。对海明威来说，也许是死亡与性别交叉现象的结合，使得这一描述与他记忆中曾经在米兰郊外荒野里亲眼见到的死去的短发女人的景象同样生动。他初到君士坦丁堡的几天住在隆德雷斯旅馆，那里到处都飞着那一时期贝德克尔版导游手册上所谓的“安眠的敌人”。在海明威搬到了一个干净一些的地方一两天后，这位被蚊子咬得遍体鳞伤的通讯记者患上了疟疾。虽然服用奎宁使他感觉稍稍好些，但因高烧不止，他有一个星期左右无法参加新闻发布会。由于他没有能力将他的工作做好，使他与执行编辑之间的另一矛盾开始恶化。在离开巴黎前，海明威曾背地里答应从土耳其和希腊发电报给在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尽管在他与博恩的协定中他把自己作品的独家报道权交给了《星报》。在多伦多，博恩注意到从国际新闻社的电波里传出来的报道，与那些他从自己的通讯记者那里收到的报道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他将自己的怀疑通过电报发给了君士坦丁堡。海明威最终设法摆脱了麻烦，但他与《星报》的关系却再也不比从前。虽然博恩继续站在他一边，但新闻社内某些有权势的人开始断然反对他。

根据在匆忙召集的穆达尼亚会议上所签署的协议条款，色雷斯东部将移交给穆斯塔法·凯末尔，希腊军队被限令在72小时内撤军。随着希腊军队的撤退，25万色雷斯基督教难民涌上了通往色雷斯西部和马其顿的碎石路。10月17日下午，海明威坐上了开往阿德里安堡的火车，前去观看这场撤退。那天晚上11点，他下了车，进入了一片泥泞的混乱之中，士兵、包裹、婴儿、弹簧床面、被褥、缝纫机和破旧的马车，一切都暴露在绵绵不绝的雨中。是睡在泥里？还是睡在满是虱子的旅馆房间里？面对这一抉择，他选择了后者。

第二天早晨，他出去观察人们“寂静、惨白的队伍”。这支队伍如流水

一般穿过马里查山谷向着卡拉加奇的方向移动。他与难民们一起走了几英里，他躲闪着身体晃悠悠、嘴里发出咕咕噜噜声音的骆驼和爆了胎的牛车，牛车上高高地堆着被褥、镜子、家俱、捆得结结实实的猪，另外还有缩在毛毯下的抱着婴儿的母亲们。间或，也会有一队军用骡子负载着麦束般捆在一起的枪支走来，或一辆载着希腊参谋军官的破旧福特车急驶而过，军官的眼睛因缺乏睡眠而布满了血丝，混浊不清。但是，除了断断续续有这样一些插曲之外，所有可以看到景象的便只有“湿透了的色雷斯农民在雨中缓慢、蹒跚地跋涉”。

海明威从阿德里安堡发来的报道是一流的。作为一个小说家，色雷斯大撤退对他来说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最终它将成为《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有关意大利军队从卡波雷托撤军这一叙述的主要素材之一。

在他的报道中，所有那些他在通往卡拉加奇的路上目睹的事件中，他着墨最多的是这样一个情景：一辆牛车上，一个男人举着一块毯子，为一位分娩中的女人挡雨。海明威报道说，在整个过程中，她是唯一发出声响的人，直到她的小女儿哭了起来。一年半后，他把一篇有关撤退的随笔收进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篇随笔对这个故事的叙述却稍微有些不同。“一个女人正在分娩，一个小女孩哭着为她举起了一块毯子。”随着对写作技巧的反复思索，他进行了第二次改编。这一次，他说是他自己试着去帮助那个女人。反正，他无法停止思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也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女人处于极大的痛苦中，某个人试图去帮助她，第三个人则因无助的恐惧而不知所措：这一情景以不同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屡次出现，是因为在他的早期生活中可以找到其根源。

在海明威的幼年教育中，分娩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个产科医生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是在他15岁时。此外，格雷丝经常讲述在他的姐姐马塞利娜出生时，她是如何的痛苦与危险。怀上她的第一个孩子后，她请教过一位有些名望的年长的橡树园的医生。1898年1月15日，她在这位医生和一位护士的看护下，在她父亲家的二楼卧室里进行分娩。尽管在下雪，海明威医生还是乘坐马车到外面出诊去了。在她分娩中间，格雷丝的医生心脏病发作，昏厥了过去。海明威医生在接到他岳父或护士打来的电话后，冒着大雪赶回家，对失去知觉的医生进行了急救，又给他的妻子打了第二针麻醉剂，并做了一次高难度的产钳分娩，多年来，海明威医生在橡树园和郊外曾参与过其他一些痛苦的接生工作。1908年，他在纽约呆了四个月，在纽约产科医院学习产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因此，熟悉而又可怕的分娩被铭刻在海明威成长的记忆中。他脑海中的这样一幅图画——一位女人坐在牛车上，在倾盆大雨中行驶在通往卡拉加奇的路上——对他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一生中，它不仅有着一个重要的过去，它也会有一个重要的将来。

五

这位《星报》的通讯记者乘坐东方快车风光地回到了巴黎。当初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妻子，现在他又给她带来了琥珀项链、象牙和一瓶玫瑰油等礼物以求和解。虽然哈德莉被这些友善的表示所感动，但海明威的脏衣服、被臭虫咬过的脸和剃光的头——为了除去虱子他不得不剃光了头发——更令她震惊。至于说他对哈德莉的容貌的反应，他认为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漂亮，

而且我们彼此深爱，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去欧特伊看比赛，每个人都围在木炭火盆前；11月的蓝天明亮，草皮坚硬，场地极佳，我们从看台最高处观看每场比赛。”然而，有一种失落感占据了他的心，他给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写了封信，向她提及他婚姻中的新问题，并告诉她怎样与他在办公室取得联系。

与哈德莉重聚四个星期后，他去了洛桑。《星报》让他去报道定于11月21日在那里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旨在草拟一份有关希上战争所造成的领土问题的解决方案。苏联、英国、意大利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将派出代表团。哈德莉原打算在会议开始几天后再去与海明威欢聚，但她因患了重感冒而不能如愿。接着，海明威也得了感冒。这便使他更加思念她。他告诉她说，“我疯狂地盼着你来，而且永远这样地爱着你。”他努力要她相信：“我需要你，这决不是故意欺骗你。”

不过，如果说他是一心一意地想要哈德莉深信他是一个可敬的丈夫，那么，他在洛桑从事新闻工作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却比他在黎凡特地区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不耻。他不但继续给国际新闻社发报道——这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了采用完全相同的措辞，为的是不让多伦多知道他的所作所为，而且，他还与全球新闻社有了一项秘密约定。10年后，他自己承认说，他“以两个不同的名字为同一个早晚新闻栏目提供24小时的电报服务”。全球新闻社付他多少钱不太清楚，但巴黎国际新闻社办公室的弗兰克·梅森每星期寄给他90美元并报销他的费用。但是，当海明威在12月中旬向国际新闻社索要800瑞士法郎作为据他声称是他所付出的电报费的补偿时，遭到了梅森的拒绝。根据帐本的记载，国际新闻社欠他的钱不可能超过500法郎。所以海明威必须用一摞收据来证实他的额外费用。索赔者无法提供收据这一点很快就在一行愤怒的电报中被揭示出来：“海明威，巴黎国际新闻社建议你吧票据本从头到屁股都戳上洞。”

虽然身兼三份新闻工作令他来回忙碌，他仍然不失时机地与朋友们一起娱乐，林肯·斯蒂芬斯就是他的朋友中的一位。海明威从阿德里安堡发回的新闻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问海明威手头是否有小说作品，海明威从箱子里掏出了他的杰作《我的老头儿》。尽管这篇小说模仿了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斯蒂芬斯还是对这个故事极其感兴趣，他主动将它邮寄给了《世界主义者》杂志的编辑雷·朗。雷·朗是位才华横溢的编辑，但他的辉煌事业最终随着他与秘书情人的双双自杀而告终。在洛桑，海明威还结交了一个新朋友威廉·博莱索·赖亚尔，他是曼彻斯特《卫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后来，他以威廉·博莱索这一名字为纽约的《世界》杂志工作，并用同样的名字写了一本畅销书《十二怒汉反抗诸神》，这是一本传记作品。身着毛领长大衣的赖亚尔看上去有点像个莎士比亚时期的蹩脚演员，而实际上他以前是一个从南非回来的军人，在战争中指挥步兵时，他被严重炸伤。此后，他加入了英国情报机关，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影响公众舆论。在洛桑时，他不断贿赂欧洲大陆的新闻记者，使他们的报道带有亲英国倾向。赖亚尔对政治家的嘲弄绝不亚于他对新闻记者的讽刺。他说，权力是一种疾病。它繁衍了猜疑和暴躁，以至最后在每一个拥有猜疑和暴躁的人的心目中都坚信个人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海明威几乎每晚都与赖亚尔共进晚餐，每当听到他对出席会议的政治家带有偏见的评论时，海明威都会放声大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赖亚尔使海明威屏弃了他先前对墨索里尼智商的高度评价，而且，海明

威乐干倾听赖亚尔的一些关于性倒错者的闲话，其中包括土耳其清教徒穆斯塔法·凯末尔、苏联外交部长格里戈里·契切林和英国外交部长寇松勋爵。寇松勋爵对小男孩的欲望富有传奇色彩。据最新的有关寇松的传闻所言，一个年轻的外交部职员接通了打往美好海滨旅馆的电话，希望与他的部长通话。他问寇松所住套间的那位接电话的男仆：“我说，帝国的那位统帅者在吗？”不知为何，他听到的是一个令他愣了半晌才清醒过来的清晰而又语调冷淡的回答：“我就是帝国的那位同睡者。”

在一条海明威为《星报》所撰写的新闻中，就体现了赖亚尔含讥带讽的才智对他的影响。在这条新闻中，海明威描述了墨索里尼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三个星期前，法西斯“进军罗马”，使墨索里尼得以接管政权。在洛桑会议上，他极其自以为是，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他那装模作样的气派十分符合他的领袖身份。海明威叙述道，当他宣布将在他的套房的接待室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时，记者们涌入房间。“墨索里尼正坐在桌前读书，他面孔扭曲，眉头也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皱着，显出独裁者的表情。”他把这种姿势保持了一段时间，似乎忘记了记者的存在。最后，海明威踱着脚走到他背后看看那是本什么书，“那是一本法英字典，但却拿倒了！”同一天晚些时候，海明威继续说，一群住在洛桑的意大利妇女来到独裁者的套房，献给他一束玫瑰。“墨索里尼身着方领角的长大衣，灰色裤子，白色鞋罩，走出门来。那些妇女中的一个走上前，开始她的演说。墨索里尼对她怒目而视，露出轻蔑的表情。他那双惨白的非洲式的大眼在其他五个女人身上转来转去，然后回到房间。”显然，这个代表团中没有哪个成员有足够的魅力能勾起他那难以捉摸的兴趣。过了一会儿，他打开门，让一个名叫克莱尔·谢里登的漂亮女记者进去了，她半个小时内没再露面。

当海明威1919年初离开意大利时，他认为战后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意大利更适宜干共产主义革命。到1922年初热那亚会议时，他再也不这样认为，可一群左翼强硬派对此仍坚信不移。然而，不但革命没有爆发，而且法西斯分子还囚禁或杀害了革命领袖，或将他们流放。在洛桑讽刺了傲慢的“领袖”七个月后，海明威在一个关于不切实际的激进分子的讽刺小故事中回忆了他那些热那亚的朋友们的盲目乐观主义。

那是1919年，在霍尔蒂海军上将的白军镇压了贝拉·库恩的匈牙利红色分子之后的几个月，一个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正坐着火车在意大利旅行。他从“布达佩斯党的总部”带来了一块方形油布，说他“受到了白军的极大迫害”，并请求沿路的同志帮他渡过难关。由于他没钱，意大利铁路人员轮番照顾他，让他在铁路餐厅吃饭。

这个年轻人爱上了意大利。那儿的人民很美，吉托、马萨乔和皮那罗·德拉的画也很美。他买了他们作品的复制品，把它们包在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前进》里。可是，曼泰尼亚的画却不符合他的口味。

尽管他在霍尔蒂那伙人手中遭受了种种折磨，那个年轻人仍然“完全”相信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所以，当他向故事的叙述者询问意大利革命运动的进展状况而被告知情况十分糟糕时，他丝毫未感到气馁。“但是，以后都会好起来的”，他公开表示说：“你们这里拥有一切，这是一个人人之为之充满信心的国家。它将是一切的起点。”

在和这个革命者一块步行到罗马涅后，故事的叙述者在博洛尼亚与他道别。这个年轻人打算坐火车去米兰，接着去奥斯塔。从那儿他将步行穿过圣

伯纳德山隘到瑞士——这与海明威和钦克·多尔罗·史密斯曾一同步行的路程正好相反。在年轻人搭乘的火车离开博洛尼亚前，故事叙述者告诉他在米兰应到哪儿去吃饭；他给了他几个同志的地址，在他到达那个城市后，他们可以帮助他；他还与他谈论了那儿的曼泰尼亚的画。年轻人表示他不喜欢曼泰尼亚。在近400字的故事中，这种厌恶已第二次被陈述。他开始了他的旅行，而故事的叙述者最后听到的有关那个革命者的消息说，他被瑞士当局关进了监狱。

在这则故事中的一些名字背后又有着故事。在墨索里尼信奉社会主义的时期里，他曾一度担任《前进》的编辑。后来，为了强调他与这个组织并无任何瓜葛，一个法西斯机动警察分队于1919年4月15日闯入那家报社，撕毁了订阅报纸的单子，毁坏了它的铸排印刷机。罗马涅是墨索里尼的出生地。据海明威为《星报》所写的一则报道、1922年春，历史上素为共产主义力量中心的博洛尼亚被15000名法西斯阿尔蒂蒂敢死队队员夺取并实行了恐怖统治。至于说到曼泰尼亚，他的画曾受到海明威的尊敬，尤其是米兰的那幅坚贞不屈的《死去的基督》。“十分苦涩”是亨利中尉在《永别了，武器》第三十七章中对这幅画的描述。“尽是钉子孔，”他补充说明道。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年轻的匈牙利革命者那样不喜欢曼泰尼亚的作品。作为在梦幻世界中游荡的理想主义者，他不能忍受画家对基督所受折磨的描绘，就和他无法勇敢地承认和面对已渐渐形成的有关共产主义失败的预兆一样。

作为《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中18个简短而且无标题的章节中最先出版的章节，这个有关革命者的故事告别了对红色曙光的乐观态度，但它仍持有共产主义运动是暴政的敌人和人民的支持者的主张，12年后，他对红色宣传的再次轻信导致他在对西班牙内战的判断上犯了可怕的错误。

六

感冒初愈，哈德莉就开始为她的瑞士之行收拾行装。海明威告诉她说，在洛桑的工作一结束，他想回香比镇去度个长假，所以她在行李包里为他们的滑雪衫留出了空间。在一个单独的皮制小旅行袋中，她还小心翼翼地放入他丈夫在欧洲所写的所有文学作品的原稿、打字稿和副本。她认为也许当滑坡无法滑行的时候，他会想修改其中的哪个作品。到了里昂车站后，她让一个搬运工把她的行李搬上火车。当她进入车箱时，小旅行袋被偷了。虽然她对其他车箱进行了疯狂的搜寻，但仍然是一无所获。

海明威正在洛桑的车站等着接她。她不停地哭，却无法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她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可能那么糟糕；而且不管是什么事，她都不该再哭了。最终，她哽咽着说出了缘由。他确信她不可能把副本也放了进去。安排好某人替他采访会议后，他独自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可所有他能找到的只是“一首杂乱无章的诗”的三篇铅笔手稿和《在密执安北部》的手稿。因为格特鲁德·斯泰因不喜欢《在密执安北部》，这篇稿子被藏在了抽屉里。由于《我的老头儿》当时正在《世界主义者》杂志社审核当中，《诗歌》杂志也接受了他的六首诗，所以这些作品得以保留了下来。否则，过去就会被一笔勾销了。正如他在给拉帕洛的埃兹拉·庞德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句嘲讽的话：“哈德莉这事做得可真够彻底的。”

《巴黎：1922年》中的六句话是后来在一本已经被忘却的笔记本中发现的。当时，他把这些话临时抄写

在他自己进了公寓并证实了他妻子有关灾难的故事是真的之后，他这一生都记得“我晚上做了些什么”。可能他喝醉了并找了个妓女，或者想到了自杀。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因为他从未透露他所经历的细节。第二天早上，他匆匆赶往弗勒吕斯大街 27 号，这正像他当年知道由于死去的苍鹭而遇上麻烦，他便急忙地返回温迪米尔他母亲的住处一样。斯泰因小姐和托克莱斯小姐——他仍这样称呼她们——对他很是同情，并且请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其余的时间，他与格特鲁德坐在工作室里，交谈了许久并读了她近期的一些作品。那天晚上，在回洛桑的路上，他在餐车里喝了一大瓶博纳葡萄酒，还写了一首关于会议上各种名人的低俗的诗，从寇松勋爵这个小男孩的爱好者，到用他那双“黑鬼的眼睛”瞟着美国大使胸脯平平的妻子的墨索里尼，可谓应有尽有。

这一情绪极度激动时期的另一作品，是海明威为《星报》撰写的一篇有关俄国外交官契切林的文章。身为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契切林留有一小撮红胡子，大眼睛，高额头，走起路来没精打采地“像个老教士”。虽说他的举止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弱点的男子”，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尽管契切林爱穿军服，但实际上他“为人胆怯”，而且从未当过兵。的确，一直到他 12 岁时，他穿什么衣服还得由他的母亲决定。海明威似乎对提供最后这一点信息有着特别的兴趣，在结尾的一段中他又重复了一次：“那个直到 12 岁穿什么衣服还不由自己决定的男孩总想做个军人。”

七

与往常一样，作为一个组织者，海明威召集了一大群朋友和熟人在香比镇与他和哈德莉一聚，其中包括橡树园的老朋友伊莎贝尔·西蒙斯、圣路易斯一家、戴夫和巴巴拉·奥尼尔以及他们 17 岁的儿子乔治。这些人哈德莉已认识好多年了。在沃州滑雪比赛中，海明威曾和年轻的乔治在两人大雪橇上组成了一队，沿着滑雪道向松洛普山口滑下去。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位组织者会带着一群滑雪者登上雅曼峰或利斯峰。那儿滑坡很长，雪质干脆，周围人也不多。海明威曾对伊莎贝尔·西蒙斯解释说，晚上在炉火前喝了酒后，他就会上床去读“吕西安一家和乔·康拉德……因为它们太长了。”

但是，在香比镇的日常生活激动的表面之下隐藏的却是一种再度的疏远。1 月初，哈德莉在给格雷丝的一封信中间接地提到了此事。表面上，这封信是用来回复格雷丝的，因为格雷丝告诉了他们有关马塞利娜最近与底特律的斯特林·桑福德结婚的消息。哈德莉告诉她的婆婆说，她饶有兴趣地想到马塞利娜开始了一种新生活，“远离了她的家和原来的伙伴，为了一个起先并不能完全接纳你的陌生人全心全意地付出了一切”。在这一平静的评论之中，隐含的是一种怅然，她承认她自己的丈夫并未全心全意地对她。

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奄奄一息的作家回忆到：从希土战争返回巴黎后，报社把他的邮件送到了公寓。在一堆信件的最上面是一封来自那位他从来未能忘怀的女人的回信。在君士坦丁堡的新闻俱乐部里，他曾给她写了一封信。“一天早晨，那封答复他写的那封信的回信托在一只盘子里送了进来，当他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后，他浑身发冷，想把那封信塞在另一封信下

在一张随手在洛桑拣来的电报单上。

乔·康拉德是约瑟夫·康拉德的昵称。——译者注

面。可是他的妻子说：‘亲爱的，那封信是谁寄来的？’于是那件刚开场的事就此了结。”在香比镇，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巴黎的办公室把海明威的邮件寄给了他。在一堆信中，就有一封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寄来的长信。

“当我从惊愕中恢复平静后”，信的开头写道：“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什么事令我如此欣喜。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以那样一种方式终结总是存在一丝苦涩。特别是在我回来后，麦克（埃尔西·麦克唐纳）给我念了你写的关于我的那封尖刻的信。……不管怎样，我始终认为这事最终会被证明是对的，而且你也会意识到这是最好的方式。我确信，既然你现在已经有了哈德莉，你就一定会认为我是对的。想想我在写这封信时是多么像个老古董啊。”（显然，海明威没有告诉她哈德莉与她同岁。）在被她的意大利中尉遗弃后，阿格尼丝回到了纽约，她成了“一个更为伤心却更聪明的女孩。我感到我想摔些东西，最好让某人也伤心一下，人生真是不值得活下去了”。在贝尔维她原来的医院呆了36个月之后，她签了为罗马尼亚红十字会工作的合同并在那儿呆到了1920年秋。从那以后，她参观了一些她多少有所了解的城市，包括君士坦丁堡和巴黎。没有任何地方像巴黎一样。“我仍然想念灰色、潮湿的秋天里栗树的香味，想念李树……和马德菜娜大道后面我那心爱的小餐馆，我那每天晚上都会在里面吃奶油巧克力的伯纳德餐馆。”现在，她回到了美国。“真是好极了”，她最后说，“感觉到我的一个老朋友又回来了，因为我们曾是好朋友，不是吗？”她知道他成了作家后，感到很骄傲；她希望他们能偶尔通通信。有机会用这种方式与他交谈确实是“极其珍贵的”。“向你和哈德莉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紧握你的手，就像罗马尼亚人说的那样。你的老朋友冯（噢，对不起。应该是阿格）。”

在蜜月中，哈德莉曾不得已遇上了玛乔丽·邦普和厄内斯特的其他一些老情人。从她对这些人的妒忌的反应来看，她可能压根就不乐意海明威与阿格尼丝再次联系上。但是，如果她是像《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她的那个对应角色那样，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的话，她的做法只会使海明威对她比以往更为不耐烦。因为，在他的余生中，海明威一直是若有所思地这样提醒他自己，正是由于哈德莉的多事之举，才使得他不得下重新开始写作。1月29日，在一封从香比镇发出的信中，他告诉埃兹拉·庞德：“这样高的纬度实际上使我失去了性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说它会使男人失去性优势，而是说它抑制了性腺的活动。”然而，是他的态度，而非是纬度，才是减少了他与哈德莉的性生活的真正原因。

减少并不等于终结。尽管哈德莉说她总是采取预防措施，2月份时，哈德莉还是发现她怀孕了。她觉得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这正是时候，但海明威并未分享她的快乐。这是她不够聪明的又一事例；也许，这也是她对她的婚姻状况产生忧虑的另一征兆。正如她丢失了他的手稿所可能表明的那样，她的潜意识里存有剥夺他丈夫的文学生涯的企图，因为这能使他摆脱对她的委托金的依赖。与之相类似的，她的怀孕可能也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是偶然的事件，因为如果她生了厄内斯特的孩子，难道这还拴下住他吗？

但是，令她惊慌的是，海明威仍旧生气，而且，回到巴黎后，他绕道去了弗勒吕斯大街，向他确信会对他表示同情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诉说了隐衷。也许，她确实同情他，但她却不会那样写。“海明威和他的妻子出去旅行，不久，海明威单独出现了，”在《艾丽斯·B.托克莱斯自传》中，格特鲁德

用她那满怀恶意的方式这样叙述。“早上 10 点钟，他走进房间，呆在了那儿，他一直呆到晚上 10 点。然后，他突然宣布他的妻子已经怀孕，接着便怀着极大的痛苦表明：我，我做父亲还太年轻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安慰他，并送走了他。”

大约过了一年后，——这时他对一切为人父母的责任已相当熟悉，——海明威在一篇名为《越野滑雪》的小说中回忆起了当他知道哈德莉怀孕的消息时有多么的沮丧。尼克·亚当斯正在蒙特勒山上与一个年轻的名叫乔治的朋友一块儿愉快地滑雪。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想做的事就是一起游荡，漫无目的地顺着斜坡滑行，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开始，一直穿过奥伯兰，直奔瓦莱，跑遍恩加丁，进入黑森林山区。尼克上个夏天就曾在黑森林山区钓过鱼。不幸的是，乔治不得不回学校，而尼克的妻子海伦也要生小孩了。“你打算回美国去吗？”乔治问。“八成要回去吧”，尼克说。“你想回去吗？”乔治问。“下！”尼克说。做父亲还太年轻了！在《越野滑雪》中，这番肺腑之言一直回响着，既痛苦又清晰。

第九章 运动

—

那次去黑森林的钓鱼之旅成了海明威在巴黎与哈德莉发生激烈冲突的序曲。可一想起那次不愉快的旅行，海明威还是认为有他最惬意的时刻，那便是与比尔·伯德之间的谈话。伯德又高又瘦，颇具教授风度。因为他很有计谋，所以和他在一起很有趣。他与另一位有胆有识、很快就名声大噪的年轻记者大卫·劳伦斯在开始创业时是小本经营，后来则办起了统一报业协会。自1920年以来，伯德一直以该协会欧洲经理的身份在巴黎市外工作。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把他对手工印刷的经久不变的兴趣变成了虽有风险但也有前途的出版社。

还是在圣路易岛一条狭窄的街道里散步时，他注意到有一家用手工在一架古旧的印刷机上排字的小印刷厂。为了提高自己的排字印刷技术，伯德拜那家老板为师。几个月的训练之后，他就租了隔壁的一间空房子，买下了一家虽旧但很不错的马修出版社，自己做起印刷业来。他为自己的出版社取了三山出版社这个名字，以纪念巴黎的三座山圣热纳维埃夫山、蒙帕纳斯山和蒙马特尔山。然而，就像他总是用小写字母来印刷人名一样，他也总是用小写字母来印刷书名。

起初，伯德只满足于再版一些古典文学书籍。直到通过海明威他认识了庞德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后者力劝他出版一系列“纯粹现代的”书籍。伯德说，如果庞德愿意联络一批作者的后，他就愿意那样做。在同意了这个条件后，庞德建议这个系列应该被看作是对“英语散文现状”的一次“检阅”。他本人也提供了一些冠以《轻率的言行》这个题目的自传性材料片段，这些片段概述了他16岁之前的生活。同时，他还请求另外七位作家赐稿，他们是：T.S.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厄内斯特·海明威，以及他所认识的另外两位没有什么名气的英国人，一位是有时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B.西里尔·温德勒，另一位是一个用笔名B.M.G.写作的上层女士。除艾略特和刘易斯找了借口之外，其他人都答应了，虽然海明威还不知道他的书要写些什么内容。手稿遭窃之后，他更增添了几分茫然。结果，在伯德用手工印刷出的第一个有关这套系列丛书的广告册里，除了一个人之外，每个条目下都同时列有书名与作者名。在这个小册子里，与海明威的名字对应的位置上出现了“空”的字样。

伯德提出了解决这个“空”的办法。在他长时间地逗留在香比镇和他到拉帕洛参观期间，海明威写出了六篇关于各种暴力的散文及随笔。1923年春天，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立即把它们刊印在《小评论》的“流放者”专刊上。海明威定的题目叫《在我们的时代里》。伯德读了这些随笔后，建议海明威作一些修改后再写12篇。18篇随笔的手稿足有一本书的长度。这本书的题目《在我们的时代里》真是妙极了，因为它是《祈祷通经》颇具讽刺意味的对应。如果伯德在夏秋之交拿到了这些手稿，他就能保证在1924年初出版。伯德还想要海明威让他出版《在密执安北部》和《我的老头儿》这两个短篇。可是，就在他忙于婚事时，另一个出版商罗伯特·麦克阿尔蒙捷足先登拿去了这两篇故事的手稿。尽管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和他是朋友，但他对温和宽容的伯德毫不手软，将手稿夺了过去。

麦克阿尔蒙之所以常常背叛朋友，是因为他自己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他出生在堪萨斯城一个名叫克利夫顿的肮脏小镇里，是家中 10 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的一个姐姐常说：“即使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就认为大家都不要他。”他害怕背叛，她说：“在他遭到使他如此痛苦的背叛很久以前。他就害怕。”他最终的这副面貌就是由于妄想狂所致。熟识他的人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的疑心有多重，憎恨有多深。比如说，1920 年，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纽约初次遇见麦克阿尔蒙时，就被他那严厉的眼神和充满冷漠的举止所震惊。

凭借着他的那点小聪明，他那弄假成真的才能，更重要的，还有他那副轮廓清晰、引人注目的漂亮外表，麦克阿尔蒙下决心要得到他觉得在家里从未得到过的关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刚认识他时，他靠在库柏联合会的男女混合班上当裸体模特谋生。威廉斯回忆说：“他有一副理想的年轻人的身材。这副身材也许就是帕拉佐·韦基奥壁龛里多纳特罗所创作的身着铠甲、充满青春活力的梅迪奇的原型。像无数女子一样，许多男子也被他的身体所吸引。画家马斯登·哈特利就是其中的一位。无论是男是女，麦克阿尔蒙都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巴黎，他晚上来往穿梭于时髦的左岸酒吧和舞厅之间。在左岸的酒吧里，他指望见到那些富裕的美国侨民；在舞厅里，他与那些男扮女装的法国工人跳舞。然而，不论他身处哪一群体之中，他都不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正如西尔维亚·比奇给他作的总结：“他吸引人们”而又“控制着他所处的人群”。

麦克阿尔蒙通过与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布赖赫结婚而到了巴黎。布赖赫的真名叫安妮·威尼弗雷德·埃勒曼。她的父亲约翰·埃勒曼爵士是船舶运输业巨头，是英国无可置疑的最富有的人之一。当威尼弗雷德还是个孩子时，她就被禁止交朋友，甚至连养宠物也不准。这是因为约翰·威尼弗雷德爵士自己不需要任何陪伴，因此他觉得她也没理由沉湎于此。所以，一旦她长大成人，正如她后来在自传《献给阿耳特弥斯的心》中所坦白的那样，她的“一种难以压抑的情感就是要获得自由”。她希望到她在书上读到过的所有地方去旅行，有女伴的陪伴更好，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向她们倾注她那被压抑的爱。

约翰爵士对他女儿的这种漫游行为极不赞成。他认为，对一个女子来说，在没有男子保护的情况下去漫游世界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对一个其父是富翁的女子而言更是如此。面对约翰爵士没有明说的不给予她以财力资助的威胁，布赖赫想到了自杀。幸运的是，在纽约，她巧遇了“一位热中于现代作品的年轻的美国作家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他想去巴黎见见乔伊斯，但缺盘缠。我便把我的问题说给他听了，并说如果他与我结婚，我父亲就会让我独立。我将把我的生活费分一部分给他，他要做的只是偶尔与我一起去拜见父母。其他时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样，他们便结了婚，时间是 1921 年的情人节。在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蜜月”旅行之后，麦克阿尔蒙定居在巴黎，而布赖赫则继续旅游到了瑞士。

在布赖赫看来，他们的婚姻只是一种交易，就像她父亲所做的任何一次生意一样，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算计。至于麦克阿尔蒙，他也似乎同样一直在算计。当然，他也可以有理由认为，无论是智力还是身体，他对妻子都确实具有一种真正的吸引力，而他的被抛弃则无疑是给他那重年的信仰雪上加霜。在他以后的生活里，他更加坚信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对。结果，他很快

就在巴黎变得声名狼藉：酗酒成癖，行凶斗殴，拿着他妻子的钱财挥霍无度。

一些美国侨民常常拿麦克阿尔蒙与海明威作比较，他们认为麦克阿尔蒙是一位比海明威更优秀的作家。例如，《这一季》的合编者，患有结核病的厄内斯特·沃尔什，他称麦克阿尔蒙是“最诚实最真实的美国作家，是唯一可以在写作上与约瑟夫·康拉德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相提并论的人”。可是，命中注定，麦克阿尔蒙当年想当作家的誓言永远没有实现。在文学史上，他留给时代的最有意义的印记只是一位编辑兼出版家。在纽约，他创办了一个名为《联络》的诗刊，目的是为了抬高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其他一些怀才不遇的诗人的知名度。在巴黎，他从他岳父那里骗取了 14 万英镑的礼金，成立了联络出版公司。正如后来评论家埃德温·米尔在给麦克阿尔蒙的贺信中所说，这个公司致力于出版那些“美国……难以忍受的作家”的著作。这个公司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开端，它出版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春天及所有》、米纳·洛伊的诗集《月球旅行指南》（麦克阿尔蒙拼错了“指南”一词）、马斯登·哈特雷的《诗二十五首》、麦克阿尔蒙自己写的有关性骚乱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小册子，还有布赖赫有明显伪装痕迹的自传体小说。在这本小说里，她一方面把青少年的自己说成是一个顺从的女孩，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喜欢冒险的男孩。

二

海明威第一次见到麦克阿尔蒙是 1923 年 2 月在拉帕洛的华光旅馆里。海明威和哈德莉是应正在那里越冬的埃兹拉和多萝西·庞德之邀，从香比镇赶来与埃兹拉和一个名叫亨利·斯特雷特的画家打网球的。亨利·斯特雷特绰号叫迈克，后来他和海明威在巴黎成了好朋友。海明威从希土战争中回来后，斯特雷特曾为他画过一幅沉思的肖像，到了拉帕洛他准备再画一幅，同时也给哈德莉画一幅。斯特雷特在普林斯顿上大学时是一个倡导和平主义的政治激进分子，他的朋友们后来把他看作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中的伯恩·霍利迪。1917 年春天，斯特雷特既是一个勇敢的暴乱首领，同时又是大学本科生吃喝俱乐部中徒劳的罢课者。这位身高六英尺、体重 200 磅的人物在普林斯顿还练过一段拳击，这一细节被海明威用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普林斯顿人罗伯特·科恩身上。在巴黎与他较量了几轮之后，海明威一到拉帕洛又向他挑战。哪知斯特雷特很快就扭伤了脚，既不能拳击也不能打网球了。

海明威碰到麦克阿尔蒙的那天晚上，他正搀扶着画家缓缓前行。像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一样，麦克阿尔蒙也立刻向斯特雷特（好色的亨利是他的另一个绰号）套近乎。不过，和海明威在一起，麦克阿尔蒙逐渐感到不自在起来，因为他认为他具有两面性。有时，海明威“装出一副顽固不化、厚颜无耻的老手形象”；有时，他又是一个“易受伤害、十分敏感的小男孩，故意装得年轻而又单纯；他时时想炫耀自己有多么勇敢，可不知为何在与人谈话时又严加防范，疑心重重，聚神凝视，目光挑剔。他既像个小男孩又像个硬汉子似地装模作样地走近一家咖啡馆，面对他没有把握的陌生人，他那相当松弛的大嘴唇上总是潜伏着一声鄙夷的吼叫”。这无疑是一种败坏别人名誉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形成于拉帕洛。在麦克阿尔蒙写这些话时，海明威经常跟他讲粗话，有一次还动手打中了他的下巴，因此，他在那时感兴趣的

只是想对海明威进行报复。然而，在拉帕洛，这位性欲错乱的编辑对海明威的装模作样却颇感兴趣。三个月后，由麦克阿尔蒙出资，这两个男人结伴游历了西班牙。而且，在旅行过程中，麦克阿尔蒙还要求海明威给《联络》杂志撰稿。

为了给他的《马拉泰斯塔诗章》作些调查研究，庞德离开了拉帕洛城。他走后，哈德利整天与斯特雷特的妻子谈论怀孕的事情，以此打发时光。那时，斯特雷特的妻子刚刚生了孩子。海明威则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了六篇关于暴力的短篇作品。他计划把这些随笔寄给《小评论》。六篇作品中，只有一篇取材于第一手材料，就是那篇关于一个妇女在通往卡拉加奇的路上于雨中生孩子的故事。另两篇取材于1914年8月钦克·多尔曼-史密斯在比利时蒙斯附近的战斗中的轶事。至于那篇有关一支爱喝酒的美国炮兵中队在法国后方夜行军的故事，其来源一直无法考证。海明威自己从未见过斗牛，但他在与迈克·斯特雷特谈论了几次斗牛以后，凭借想象写了一个年轻斗牛士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在另外两个斗牛士被牛严重顶伤后，一口气杀死了排列成行的五头牛，之后他精疲力竭。在香比镇逗留期间，他在伦敦《每日快报》上读到了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故事，依此他写了最后一个短篇。那是一篇关于六个内阁部长遭到处决的故事。

海明威能从《快报》上的报道中随意取材，显示出他对新闻这种媒体的局限性是多么了解。新闻记者注重事实，追求的是事件的意义；而作者却创造形象。格特鲁德·斯泰因曾经对他提醒过这种区别。她曾说：“如果你一直从事报业工作，那么你看到的只是字词，而永远看不到事物。”他在拉帕洛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她，对于她的一席话，他想了许多。他“正在努力创造，使我的心智永远保持活力。”

《快报》上的故事之所以引起海明威的注意，是因为它报道的是不久前雅典处决内阁部长的事情。据认为，这些部长应该对希腊在与土耳其作战中的惨败负责任。《快报》的通讯记者报道说，在执行处决的那天早晨，前总理古纳里斯正住在一家医院里，生命危在旦夕。然而，11点的时候，他被放上一副担架，抬到一辆货车上，运到了离雅典城一英里半的地方。当车子转回去运其余五个人时，他就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那五个人当时都被囚禁在监狱的一个单间里。

那天早晨，作为那恐怖时刻的前奏，卫兵们发现五个人中已有一人因心脏衰竭在途中死于货车上。

车子到达目的地后，古纳里斯被他们从担架上抬下来。然后被架着站起来面对行刑队。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位在欧洲最近的历史上风云一时的可怜人物竟根本不能站立了。因此，他们就给他注射进足量的禁用毒药，以加强他心脏的搏动，从而使他能够站立在行刑队的前面。那个在途中死去的人被架着站在他旁边，他们像鬼魂似的排成一排，四个活的，一个半死不活的一个死的……

射击的命令终于下达。就在犯人们倒地的那一瞬间，行刑队冲上前去，将他们左轮手枪中的子弹一发不剩地全都射进尸体，就连那个死于从监狱出来的途中的人都未能幸免。随后，他们的尸体被扔上一辆卡车运到城外的一个公共墓地，随随便便地扔下来堆积在一个坑里，然后覆盖上稀泥。

海明威反复琢磨这些事件，最后他把它们加工成如下一段：

那天早上六点半，他们在医院的一堵墙边枪毙了这六名内阁部长。院子里有积水。院子里那砖铺的人行道上散落着一些被雨打湿的落叶。雨下得很大。医院所有的窗户都钉得死死的。有一名部长得了伤寒。两个士兵把他抬到楼下走进雨中。他们试图架着他让他靠墙站着，可他还是跌坐在一个水坑里。其他五个人背靠着墙静静地站立着。最后，那位军官告诉士兵说不用让他站了。当他们第一次齐射时，他就坐在积水中，脑袋耷拉在膝盖上。

这些简洁的句子像一声声重锤。《快报》上的记述中所有表示强烈情感的词语如“恐怖”、“鬼魂似的”以及“可怜”都被省去了。通过把屠杀的时间提前到那天清晨，把地点从城外某一个没有点明的地方转到一家医院的院子里，故事的戏剧效果大大增强了。浓墨重彩地描述那位病入膏肓的部长而没有提到那个死者，在效果上并未有所减损。积水、落叶和大雨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医院紧闭的门窗象征着那些医生和护士们的麻木不仁。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一向以仁慈为本，可这次他们却对自己的一个病人视而不见。尽管做了一番努力，那位重病在身的部长还是未能站立起来面对行刑队。随着人格尊严的逐渐散失，他坐在积水中，被枪杀了，脑袋耷拉在膝盖上。“主啊，赐予我们的时代以和平吧！”在一段有如警句一般精辟的话里，海明威把他自回到欧洲以来所了解到的所有 20 世纪历史上那冷酷无情、无休无止的暴力都浓缩了进去。

三

海明威为《小评论》所写的那几篇作品是在一段有利的时期里完成的。此后，在拉帕洛，他的文学创作灵感几近枯竭。由于他的心里老是想着与哈德莉在如何为人父母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他随手记下了一些笔记，准备写成一篇名叫《雨里的猫》的短篇小说。这是一个关于一位不开心的妻子与她丈夫的故事。他们住在一个海滨胜地的旅馆里，他们的房间一边面对着大海，一边朝着公共花园，是华光旅馆里最好的房间。然而，这些笔记始终只是笔记。这是一段非常压抑的时光。后来他说：“我想我再也不能写作了。”

意外的是，一位腼腆的绅士使他重振旗鼓。这位绅士寄宿在小镇旁一座山上的修道院中。他的眼睛灰蓝，头发细长。他的名字叫爱德华·J·奥布赖恩，是当年最佳短篇小说选的编辑。海明威跟他说了装有手稿的旅行箱被偷之事，然后悲伤地把那卷了角的《我的老头儿》的手稿给他看。这是一篇有关赛马的故事，是他唯一留存下来的稿子，最近刚刚被《世界主义者》杂志退了稿。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回忆说，他把这篇小说“当作一件奇品”给他看，“就好像你曾以一种难以让人相信的方式丢失了某个轮船上的罗经柜，你也许现在会愚蠢地让人看一看这个罗经柜；或者，就好像你刚刚在一次碰撞事故中脚被截断，你也许会拣起这只仍然穿着鞋的脚并取笑它。”令海明威惊奇的是，奥布赖恩很喜欢这篇小说。虽然按惯例这位编辑只能选择以前出版过的作品，但他却立刻接受了《我的老头儿》并把它收录在《1923 年最佳短篇小说选》里。实际上，奥布赖恩最终还决定把这本选集献给海明威。

结束了调查研究返回拉帕洛后，诗人庞德偕妻子与海明威夫妇进行了一

次徒步旅行。尽管他们每天都从容地野炊午餐，他们还是很快就到达了比萨并以更快的速度抵达了锡耶纳。一贯争强好胜的海明威大概是此次徒步旅行速度的决策者，结果，他发现因此而带来的惩罚他是在劫难逃。他把庞德一家送上开往拉帕洛的火车后，就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他在给埃兹拉的一封信中戏称这是“心绞痛”。事实上，毛病出在他右膝的伤疤上。在异常艰苦的跋涉后，这伤疤仍然会使他疼痛难忍。

即使如此，他仍然渴望更多的锻炼。壮丽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是坐落在崎岖而又美丽的多洛米蒂山东部一个巨大盆地里的一个小镇。他曾听说春天在那里滑雪非常惬意。到了那里之后，他和哈德莉就在人满为患的意大利科西嘉的贝尔维旅馆住了下来，旅馆在忙碌喧闹的广场北边，只有几个楼区之隔。广场上有迷人的巴洛克教堂及 250 英尺高的钟楼。然而，科尔蒂纳这个镇子并不大，他们没花多长时间就走了出来，走进了美丽广阔的乡间。

尽管哈德莉极力让自己快活起来，但她的努力还是彻底失败了。除了对她的丈夫不愿做父亲的态度不满之外，那时她的怀孕也正处在妊娠反应期，身体日渐虚弱。接着，让她惊恐的是，海明威得到了约翰·博恩的来信，他要一系列的有关最近在鲁尔区发生的骚乱的第一手报告。法国军队已于 1 月占领了这个峡谷，作为对德国没有运送足够的煤炭到法国以清偿赔款清单的报复。海明威给博恩打电报说他正在途中。哈德莉同意继续呆在科尔蒂纳，而不愿意回巴黎。

海明威发现，1923 年春德国人发泄愤怒的对象不仅仅是法国人。他对《星报》的读者们说，当德国共产主义者与德国国家主义者面对面时，“他们都满腔仇恨地对望着彼此的脸和衣服。这仇恨就像弗劳·贝尔塔·克虏伯工厂后面堆积如山的炉渣一样，又冷又硬，铭心刻骨。”鲁尔区是一口沸腾着仇恨的大锅。经过两个星期紧张艰苦的工作之后，海明威成功地报道了这一事件。此外，他还作了一番认真的努力研究经济问题，这是他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因此，博恩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

在去鲁尔区之前，海明威曾途经巴黎停留过较长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向格特鲁德·斯泰因诉苦说哈德莉怀孕了。回来时，他又在那里停留，这一次是为了带上鱼具。虽然这时科尔蒂纳较高的山坡上仍是冰雪覆盖，但这个地区也有一些鳟鱼出没的秀丽的小河。哈德莉会喜欢在这些河里钓鱼的，因为在海明威的指导下，哈德莉也像他一样，使起鱼竿来得得心应手了。

返回意大利花了两天中大部分的时间。抵达时，他已是筋疲力尽。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有在火车上行程将近 10000 英里的记录：在巴黎和瑞士之间往返六次；先后四次经过意大利。至少暂时可以说，他满肚子装的都是旅行，而哈德莉满肚子装的都是被冷落。她丈夫不在期间，她也曾成功地与一位意大利钢琴家里纳塔·波加第交过朋友，后者曾一度是富裕而有才能的画家罗曼·布鲁克斯的情人。然而，总的来说，哈德莉还是感到可怕的孤独。当地人说的是意大利和德国方言，她几乎听不懂。另外还有一件事困扰着她，那就是村子里没有可以让她信赖的医生供她咨询。因此，在贝尔维旅馆里，疲惫的海明威拥抱的是一位一点也不快乐的妻子。

更糟糕的是，正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海明威一直想让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其他一些朋友们所相信的那样，他与哈德莉沮丧地发现科尔蒂纳的钓鱼季节还没有正式开始。不过，他说，当时旅馆里一位满嘴酒气的园丁准备把他们带到比贡蒂纳河上一个可以钓到很多鳟鱼的地方。可结果证明，那条河

满是污水和烂泥，已不能垂钓。在园丁所吹嘘的那个地方的附近是一个垃圾堆。

回到贝尔维旅馆后，这位恼羞成怒的钓鱼人在旅馆老板面前告了那个园丁。老板立即解雇了他。1925年圣诞节前夜，海明威在奥地利的施伦斯给菲茨杰拉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向他证实说：“因为那是他在镇上的最后一项工作，他又喝了很多酒，非常绝望，就在马厩里吊死了。”海明威一听到园丁的死讯就坐下来写作，“立刻用打字机写下了一个没有标点”的短篇小说《禁捕季节》，这个故事“几乎完全是所发生事情的实录”。事实与故事之间唯一的重要区别就是他省去了园丁自杀的细节。他对菲茨杰拉德解释说，当时他一直在为《小评论》写一些有关暴力的稿件，“我想写一篇没有暴力的悲剧故事。因此，我没有把上吊这一情节放进去。这也许听起来有点愚蠢。但我认为这个故事不需要自杀。”30年后，在《流动的圣节》中他又重申了省去自杀细节的原因：“这个细节被省掉是基于我的新理论。如果你知道你省略的部分，而被省略的部分又会增加故事的感染力，你就可以省略一些东西，从而使人们感受到比他们所了解的更多的东西。”

与海明威在米兰医院里写的几封有关在福萨尔塔所发生的事件的信一样，关于园丁的轶事趣闻虽说有趣，却经不住仔细回味。作为一个运动员，海明威曾在一位优秀老师的指导下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在钓鱼狩猎方面也有规律可循。他的父亲曾反复告诉他，有些规律必须要遵循。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海明威曾违法捕杀过一只苍鹭。长大成人后，他一直严格地奉行父亲的哲学。他讨厌那些运用各种鱼线和鱼钩钓鱼而不给鱼以搏斗机会的钓鱼者，讨厌那些从车子里射击的猎手，讨厌那些砍掉牛角的斗牛士。因此，认为他在科尔蒂纳的禁捕季节里还一直对钓鱼感兴趣似乎就不太合乎情理。同样，一个园丁听说旅馆的经理要解雇他，他就马上去上吊；或者，听到这个新闻后，海明威立刻就会按照他刚刚才形成的省略理论坐在打字机前劈劈啪啪地敲打出这个没有暴力的悲剧故事；这些事似乎也不太合理。最后一个似乎不大合情理的地方是，省略上吊的情节怎么会增加故事的感染力呢，因为在《禁捕季节》里，那位勇猛、残忍的钓鱼向导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举动能让读者怀疑他有自杀的倾向。

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个故事完全是海明威杜撰的，其中所描述的婚姻争端也只发生在他的想象之中，它起因于他对哈德莉怀孕的矛盾心情。听说她的状况后，他非常恼怒。后来，他不仅不关照她慢点行动，照顾好自己，反而拖着她进行极为消耗精力的活动：在拉帕洛打网球，快速步行到比萨和锡耶纳、在多洛米蒂山滑雪。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难道他不是试图用这些自然方法让她流产吗？这些方法失败后，他的心里难道不是冒出了人工打胎的想法吗？在《禁捕季节》里，他微妙地暗示了他确实这样想过，并为此深深自责。

科尔蒂纳的春天，一个刮风的日子，“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一会儿又隐没了，下起了零星小雨”。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和一位名叫佩多奇的园丁行步穿过小镇（佩多奇这个名字海明威是取自于意大利战地服务团一个士兵的名字。他曾在斯基奥为第四分队的美国救护车司机服务）。妻子拿着几根鱼竿，鱼竿还没有接上鱼线。她“老大不高兴地”落在同伴们的后面。她的名字叫“小不点儿”，是海明威给哈德莉取的绰号之一。丈夫的名字一直没有提到，取而代之的是通篇的“这位年轻的绅士”。这是一种保持距离的

技巧，故事中像这样的暗示还有很多，意在暗示妻子疏远了她的丈夫，而作者也在疏远他的妻子。这位年轻的绅士自己也似乎一点都不快活。正如乌云笼罩了太阳，他的泰然自若里总有一层内疚和紧张的阴影。这在他与妻子交流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真抱歉，让你心里这么不好受，小不点儿，”他说，“真抱歉，刚才午餐时我那样说话。同样的事，咱们俩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没什么关系，”她说。“你所说的都不重要。”“你太冷了吧？”他问道，“你能再穿上件毛衣就好了。”

“我已穿了三件毛衣了。”

表面上，小不点儿与她丈夫的不和与他不顾她的反对固执地拒绝放弃在禁捕季节去钓鱼的想法有关。“当然，你没有这份胆量就干脆回去”，他们一起走时，她讽刺地说。他要她自己回去，他说第二遍时，她就回去了。“不管怎么说，这么大的风，你会受凉的”，他对她喊道。

然而，仅仅由于对违禁钓鱼的意见分歧，是不能当作他对她在“午餐时那样说话”并不安地向她道歉的原因，也不能成为她对他作出特别冷漠的反应的理由，更不能解释故事中的一种意识。在小说中，人们意识到有某种道义上肮脏的东西正有待解决。这种意识是通过一些肮脏的比喻，诸如粪肥、泥土，通过园丁对那个年轻绅士狡猾的眨眼举动和他称他为“亲爱的”时那种无礼的放肆行为传达出来的。显而易见，一些相当重要的东西已经融入这个故事里。

虽然开始时小不点儿是老大不高兴地远远跟在两个男人后面，他们也没说什么话，但在她被说服与他们并肩走后，佩多奇很快就跟她交谈起来。”他有时用的是丹佩佐方言，有时用的是蒂罗尔人的德国方言。他拿不准这对年轻夫妇到底更懂哪种方言，所以他就两种话都说。”这位健谈的园丁指着站在一幢房子门口的一位姑娘说，“我的女儿”。“他的医生”，小不点儿有点不耐烦地说：“他有必要指给咱们看他的医生吗？”显然，她是把德语中的女儿听成意大利语中的医生了。这种张冠李戴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失误。它不仅暴露了她内心所想，而且说明了如此恼怒的原因。对于她的愤怒，这位年轻的绅士作出的迟缓反应是宽慰她、说他俩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婚姻幸福。（“同样的事，咱们俩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然而，尽管他表示出对她的身体状况很关心（“你太冷了吧？”），蒂尼还是冷冷地拒绝了他的哄骗（“没什么关系”）。

照海明威看来，哈德莉怀孕的不幸后果之一，是她想他们俩都回到美国或加拿大去。她的理由，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那里的医生、护士、医院都比巴黎好”。由于海明威自己也对她生产的过程十分担心，所以对她的这句话印象很深。然而另一方面，他极不情愿放弃他自己已经创造的新生活。在他左思右想时，他也许曾想到过让哈德莉独自横渡大西洋。因为在《禁捕季节》里，当那位妻子讽刺地说“当然，你没有这份胆量就干脆回去”时，那位年轻的绅士搪塞道，“你干吗不回去呢？”

但是，《禁捕季节》的作者显然不希望这种家庭分歧长期存在。相反，这个故事读起来让人觉得好像海明威突然屈从了所有与自己相反的观点，而且还伴随着一种道义上已接受过洗礼的感觉。这种猜想有其文本上的证据：

到达河边时，那位年轻绅士改变了主意，不想在这禁捕季节里钓鱼了。开始是因为他突然感到“不自在，生怕鱼场看守或者民防团随时会从城里跑到河边来”。当他发现忘了带钓鱼线上的铅坠而最终不能垂钓时，他“松了口气。他不再违法了”。佩多奇想劝他第二天上午跟他一起再去，但正如故事的结局所示，他显然不想再去了。“我也许不去了”，他告诉佩多奇：“十有八九不去了。我会托旅馆老板留个话的。”

到达河边时，为什么那位年轻绅士的思想发生了如此根本的变化，这正是海明威没有回答的问题。春天是鱒鱼产卵的季节。法律禁止在产卵地垂钓以保护产卵的雌性鱼种。法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一直到他真正地坐到河岸上装上有接头的钓竿，接上线，这位年轻的绅士嘲弄法律的企图才最终消逝。在他的前面，溶化的积雪使河水猛涨而且改变了颜色，它含蓄地提醒人们这是大自然更生的奇迹。在他后面，他可以看见一些别的东西：科尔蒂纳教堂的钟楼在山边若隐若现。可以想象的是，这些东西阻止了他对神圣生命的漠视。

四

这对年轻的夫妇之间既有公开的争吵，也有私下的吵闹。这之间隐含的一致性，明白无误地表明海明威渐渐掌握了作为一名重要作家而应有的艺术调遣力。不过，由于不能卖掉（我的老头儿），他已经非常灰心丧气，因此他还不是很想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发表。在雷·朗通知他《世界主义者》杂志不打算发表他那关于赛马的小说之后，他就按照爱德华·J·奥布赖恩的建议，把它寄给了《画报评论》的编辑阿瑟·T·万斯，结果只是又收到了一封拒绝刊印的信。5月21日，海明威从巴黎给奥布赖恩写信，告诉了他这个情况，并且坦白承认万斯的结论已经“使我情绪十分低落。由于这件事，我喝了个酩酊大醉。现在只觉得更加低沉。（万斯）说什么原来显然已经把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如果有人告诉他这部小说不错，他就准备买下。想来这不过是一种无望的踢皮球游戏。……当然，这很荒唐。但当这些小说的底稿随着那样的信被退回的时候，我简直懵了，几乎不可能再写作了。似乎任何发表作品的理由都被摧毁得一干二净”。在一个只有一句心酸的话的段落里，他补充说：“不过我还是拼命想让自己的作品得以发表。”

尽管春天的巴黎景色优美，然而甚至这也不能使他摆脱沮丧。事实上，他觉得优美的景色在嘲笑他。一切看上去都有点过于美好。直到他和鲍勃·麦克阿尔蒙一起即将动身前往西班牙时，他才能够再次露出一丝笑容。迈克斯特雷特估计他会像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一样喜欢上斗牛。他还是一家餐馆的菜单背面给他画了一幅精致的西班牙地图，标出了他自己所喜爱的许多地方的名称，包括马德里的一家小餐馆——那儿的特色菜是在一块橡树板上烘烤的乳猪，配有蘑菇状未经发酵的米饼和里奥哈葡萄酒——以及住有斗牛士的圣赫罗尼莫街上的膳宿公寓。离开巴黎前，海明威怂恿比尔·伯德一起去，这位后来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出版商答应早些时候到马德里与他和麦克阿尔蒙会面。

旅行者在火车上以酒为伴度过了第一个晚上。第二天，麦克阿尔蒙直想呕吐。当火车与一列平板货车并排停靠时，平板货车上正躺着一具爬满蛆

虫的狗的尸体，他更加作呕。他担心可能是胃出了毛病，故而把目光投向别处。对此，他的同行者大为厌恶。海明威说，在战争期间他看到过像成捆的柴禾一样堆放着的人的尸体，尸体上遍布着蛆虫。他承认这些景观确实令人恶心，但是他们那一代人必须让自己习惯于丑恶。当他继续高谈阔论时，麦克阿尔蒙想起了埃兹拉·庞德告诉过他的关于“海明威已经使自己变得冷酷”的话。

不过，尽管海明威想让麦克阿尔蒙明白他是一个更为坚强的人，他并没有忘记和这位出版商一起，在参观第一场斗牛前，先到斗牛场大门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喝上几盅以壮壮胆量。麦克阿尔蒙还记得，他们都认为可能会因为那些马的遭遇而感到难受，因为那个时候，马被赶进斗牛场时是没有任何保护的。所以，他们还预先带了一瓶威士忌到斗牛场，以防万一受到震惊而有必要喝些镇定剂。

“我对斗牛的反应根本不是我预想的那样，”麦克阿尔蒙 10 年后在他的自传里说：“起初它似乎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好像是在荧屏上发生的一样。第一头公牛极其凶猛地冲进斗牛场内，马群被带进来时，它迎头向马冲过去，把第一匹马顶在它的头上。但是它的角并没有穿进去。我并没有为这可憎的一切所震动，而是从座位上站起来，兴奋地叫了一声。事情发展得太快，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这匹马的悲惨遭遇。但是，后来有一匹马绕着场子疾驰，它踩着自己的肠子。我显然不喜欢这种事情。”到那天傍晚，麦克阿尔蒙的情绪变成了不满。“我憎恶围观者的残忍，讨厌人们在斗牛士处于危险的时候向场内扔衬垫、衣物。围观者本人并没有危险。……斗牛士的表演十分精彩，他步态优美地移动着，十分认真地同死亡游戏。至于马的角色，我决定把它作为西班牙人残忍的论据。他们比许多法兰西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残忍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海明威却是兴奋加狂热。他在为《星报周刊》所写的一个特别报道中这样写道：第一头公牛是：

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它就像史前时代某种巨大的野兽，绝对地致人于死命，绝对地凶恶无比。同时，它又是沉默的。它一声不吭，十分轻快地奔跑冲击。当它转过身来时，它就像一只小猫那样撒开它的四肢。飞奔之中，落入它眼中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个骑在一匹不幸的马上斗牛士。斗牛士把靴刺刺进马的身子里，马带着斗牛士狂奔乱跑以躲避公牛。公牛可不想被人甩掉，它疾驰着，从一侧以全速向马冲去，然而它竟无视马的存在，把一角扎进斗牛士的大腿里，将他连同马鞍一起从马背上掀了下来。

海明威瞧不起麦克阿尔蒙的消极反应。这种蔑视强烈而又长久。九年后，他在《午后之死》中对麦克阿尔蒙进行了野蛮地挖苦：

X.Y.，27岁，美国人，男性，大学文化，童年时代在农场里骑过马。第一次去看斗牛时带了一瓶白兰地，在场上还喝了好几口。当公牛冲向斗牛士并袭击马时，X.Y.突然从肺腑中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嚷声。他喝了几口白兰地。在公牛和马的每次遭遇之间他都要重复叫嚷。他似乎在寻找一种坚强的感觉。我对斗牛抱有真实的热情，他却对此深表怀疑，声称这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他对斗牛毫无热情可言，便断定其他人也不会有热情。……他从不喜

欢任何种类的运动，从不喜欢冒险的游戏。他只关心娱乐、职业、酗酒、夜生活、闲聊、写作，还有游山玩水。

在旅途中，麦克阿尔蒙曾允许几个年轻人搭车，这可能进一步引起了海明威的厌恶。另外，就是因为麦克阿尔蒙支付了所有的帐单。在同 Y.K. 史密斯打交道时，海明威就已经表示出他有一种以恶意偿还慷慨的嗜好，这可能是一种摆脱所有责任感的方式。但是，与 Y.K. 不同，麦克阿尔蒙并没有被气得再也不慷慨了。相反，他继续掏钱，同时也接纳着接受慷慨者的侮辱。

伯德到了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海明威的兴趣也逐渐由侮辱麦克阿尔蒙转向了一群斗牛士身上。这些斗牛士是他们在圣赫罗尼莫街的膳宿公寓里遇到的，后来，旅行者们又伴随着他们到了塞维利亚参加科珀斯克里斯蒂斗牛圣节。从聆听这些人的谈话中，海明威不仅学会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西班牙方言，而且知道了一大堆关于斗牛艺术的观点，包括许多技术术语。他一如既往地又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尽管塞维利亚的圣节丰富多彩而且引人入胜，这三个美国人还是早早就离开了，赶去观看龙达的古老斗牛场上举行的几场斗牛赛。龙达是一座海明威一直都很喜欢的让人感到紧张刺激的山镇。一天下午，他们离开了斗牛场，走到了一个能够俯瞰埃尔塔霍峡谷的陡峭悬崖边。在那儿，他们看到了一座 18 世纪的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的塑像，海明威把他存入了记忆仓库以备日后参考。龙达之后的下一站格拉纳达令他们大失所望。那里的斗牛场的确漂亮，但是计划中的斗小牛大战（即初出茅庐的斗牛士和小公牛之间的较量）却因下雨而取消了。对于海明威来说，吉普赛人的窑洞也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东西。他把对格拉纳达的愤懑一齐发泄到麦克阿尔蒙身上，他抓住每一次机会奚落他。尽管麦克阿尔蒙僵硬的脸上呈现出不满的神色，他还是没有把几次都准备好的拳头从口袋里抽出来，同时他也控制住自己不说出针锋相对的话语。海明威见不能激怒麦克阿尔蒙，就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侮辱，每当这时，伯德都劝他不要这样。但是这个调解者为他的苦心所得到的只是海明威保证不是冲他发脾气。”你知道的”，他对伯德说：“你的劝告我会听的。”他从心底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不好。因此，他们一回到巴黎，海明威就以一种妥协的姿态，明显地表示出对麦克阿尔蒙的谦恭。这种妥协的姿态预示着他对今后他所冒犯的其他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姿态。

如果麦克阿尔蒙以武力对海明威进行反击的话，他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对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正是这点自知之明使他控制住了自己。再者，他还期待着海明威能够加入他新近成立的出版社。海明威一动手写完另外 12 篇随笔，伯德就打算出版他的《在我们的时代里》。不过，由于三山出版社还是手工印刷，所以接到全部原稿后，伯德还需要五个月的时间才能出版这本书。麦克阿尔蒙则另有打算。在第戎住着一位名叫莫里斯·达兰提埃尔的出版商，已被西尔维亚·比奇雇去印刷《尤利西斯》。麦克阿尔蒙打算利用他那快得多的印刷设备。海明威十分渴望能尽快有一本书出版，以提高他的声望。所以，当麦克阿尔蒙保证他将在这个夏末有一本硬壳封面的内容包括《在密执安北部》、《我的老头儿》和《禁捕季节》的书面世时，海明威十分兴奋。他们以握手的方式确定了这项交易。为了使这本书更厚一些，他们进一步达成共识，由麦克阿尔蒙把海明威的一些诗选收进去。就麦克阿尔蒙个人的观点，他并不觉得这些诗怎么样，他也不喜欢《我的老头儿》。这篇

小说中那位年轻叙述者的虚妄而又幼稚的态度让他感到困惑。在麦克阿尔蒙看来，正如舍伍德·安德森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一样，《我的老头儿》把孩子们的真实生活描写得过于感伤。“与这类作品中的……孩子们相比”，他曾经说：“我所接触过的孩子，他们在观察事物时要冷静得多而且更鲁莽。”他以为，在美国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可悲的倾向，即歌颂“并非真正孩子心理状态的冒牌货……以为这就是真正的美国人”。比较起来，《在密执安北部》和《禁捕季节》却是很好的作品。正是为了这两篇小说，麦克阿尔蒙才出版了《三篇故事与十首诗》这本书。

五

一回到巴黎，海明威就忙着赶写比尔·伯德要的那些随笔的剩余部分。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想要平等公正地表达自己对斗牛的认识和感觉，他还得进一步了解更多有关的具体情况。艾丽斯·托克莱斯给他带来消息说，在西班牙纳瓦尔群山上有一个白砖砌墙、阳光明媚的潘普洛纳城，7月份在那儿的圣福明宗教喜庆节日上将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斗牛比赛。海明威随即向他的妻子哈德莉报告说，潘普洛纳是个世界级的斗牛场，哈德莉便很愉快地同意和他一起去看看。当时，她已有五个月的身孕，可夫妇俩都认为这次经历不会对她有什么伤害。再者，他们都相信会生个儿子，斗牛比赛说不定会让他们未出世的儿子在胎儿期就受到那种强壮有力的影响。

晚上，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达了潘普洛纳。在宪法广场周围宽大的连环拱廊下，那些小咖啡馆已全都满座了；街上也挤满了熙熙攘攘一群又一群身着蓝色衬衣的农民，在这传统风格的巴斯克嗨哟嗨哟舞会上，他们尽情地转啊，跳啊，摇啊；短笛、单簧管正呜呜奏鸣，圆鼓敲个不停；几乎每分钟都有烟火升入天空，冲天炮急速旋转直冲天空，发出阵阵呼啸和爆炸声；那些跳舞的人你碰我一下，我撞你一下。这时，海明威夫妇吃力地把他们的行李从车顶上取下来，最后来到一家旅馆前，两周前他们就在这儿预订了一套双人间。

然而，旅馆并没有给他们预留任何东西。那个屁股肥胖的女房东用夹杂着法语和带着巴斯克口音的西班牙语告诉他们，他们每人每天花七美元可以住上一个有一个单人床的小房间，不过房间正对着厨房的通风管道；要不他们每人每天花10美元可以住一间好一点的房间。海明威说，他觉得在街上和猪一起睡可能还要舒服一些。女房东说，那也可以商量。海明威又说，他宁愿睡在大街上也不愿住在这样一家待人冷漠的旅馆里。哈德莉坐在他们的帆布背包上，心里已经做好了会有一场僵持的准备。最后，女房东让步了，她答应在城里的一栋房子里为他们安排一个房间。他们可以到她那儿去吃饭，一切包括在内每人只需五美元。

旅馆里的一个侍者背起他们的帆布背包，把他们领到一栋老房子前。老房子的墙很厚实，如同一座堡垒。房间倒是既可爱又凉快，房内一张大红地毯，两张舒适的床正好嵌在壁凹里。窗户朝着铁架门廊敞开，正对着大街。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音乐的气息。

自从他们到巴黎的第一个月和第一次到香比镇起，在潘普洛纳的这一周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了。他们一起到四处走动，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天刚亮，男人们和男孩子们就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奋力奔跑，就像那些就要被击杀的公牛朝着斗牛场的围栏飞奔一样；那些衣着华丽、眼睛乌黑的姑

娘们肩头上披着漂亮的围巾，头上盖着黑花边的头巾，与她们的男伴们一道穿过黄昏中的人群；那些来自安达卢西亚的清教徒前辈们的阔边帽高耸于街头咖啡馆的桌面上，与马德里的稻草帽和巴斯克乡村的蓝扁帽挤在一起。

海明威在给芝加哥的一位老朋友比尔·霍恩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他们能在那座城里进行斗牛比赛也许是上帝的旨意。”那年，西班牙八位最出色的斗牛士在潘普洛纳的狂欢节上进行角逐，其中五名斗牛士在节日结束前相继被公牛用角顶伤。在著名的斗牛士中，只有尼卡诺尔·比利亚尔塔成功地避开了公牛的伤害，他行动起来像一匹幼狼一样柔软灵活，站立时又像一支长矛那样笔直。海明威曾经看过比利亚尔塔在塞维利亚的斗牛表演，但是直至来到了潘普洛纳的斗牛场上，他才变得对他如此狂热痴迷，以至于为他未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尼卡诺尔。“尼克”也成了—个虚构的英雄人物的好名字，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

在海明威和哈德莉观看斗牛比赛感觉最精彩的一个下午，出场的有三位出色的斗牛士。他们是：一个名叫奥尔莫斯的长腿家伙，他让海明威想起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中场守卫特里斯·斯皮克；另一个叫阿尔加贝洛，是一个年轻的安达卢西亚人，瘦高个，高高的颧骨，看上去像个真正的印第安人；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曼努埃尔·加西亚，人称马埃拉，他黑黑瘦瘦，一眼望去好像没有什么生气，他已经染上并正受着一场肺结核病的煎熬，这病最终将夺去他的生命。

海明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下午的第二头牛属于马埃拉。一开始，这位斗牛士朝着公牛吼叫了几声。牛朝他冲过来时，他被逼到了围栏边，牛角不断地向他的身体两侧猛扎。终于，马埃拉决定时机已到，该是杀死公牛的时候了，他用穆莱塔玩了一些“绝对难以令人置信的动作”，然后拔剑刺去。但牛向他猛冲过去，用角钩住了他。马埃拉被抛到空中，重重地摔到地上，他的右腰首先着地。看起来，他的腰部伤得很厉害，几次他想起身挥剑，都使他脸上滚下大颗大颗的汗珠。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拼命想给牛以最后一击，可每次剑都脱了手。公牛差不多钩住了他20次，但最后还是被他杀死了。当得胜的斗牛士坐到位子上时，他的位置正好处在海明威所在看台的下方。海明威发现他的腰肿得很厉害，几乎是平时的两倍。海明威后来说：“我想起了我曾见到过的这样一些斗牛士，就因为他们的手受了伤，他们就退了场。”马埃拉是一个硬汉子。正像海明威后来在《午后之死》中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六

海明威曾经默许过哈德莉不在欧洲分娩的愿望。他们将回到海明威为之工作的那家报纸的所在地。在8月中旬他们即将离开之前的那个月里，海明威完成了比尔·伯德索要的那组随笔。其中有四篇写的都是发生在意大利的事。在第一篇里，有一个名叫尼克的伤兵正背靠着教堂的墙壁站着，两眼“炯炯有神地直视前方”。他小心地转过头来，注视着身边面朝下躺着的那个名叫里纳尔迪的伤兵，嘴里说道：“你和我，我们都获得了单独的和平。”在

穆莱塔是斗牛时为吸引牛的注意而挂在棒上的红布。——译者注

海明威曾希望这些小说也能够发表在杂志上，因此寄了几篇给《日晷》杂志。可是，正像《日晷》的编辑们早些时候拒绝了他的诗歌一样，他们也拒绝了他的小说。

第二篇里，皮亚韦河畔的福萨尔塔城正遭到夜间炮轰，一位伤兵横躺在城中，正惶恐地向耶稣祈祷，希望他能带他离开这儿。可第二天晚上，在梅斯特雷，他又带着一个妓女上了楼。在第三篇里，一个伤兵在米兰的医院里交了一回桃花运，回到芝加哥的家中便染上了淋病。在第四篇里，一个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员相信，红色的黎明一定会在意大利出现。另外两篇作品是作者关注美国犯罪现象的产物。第一篇写的是堪萨斯城的两个恶棍打劫一家烟酒店后被一名警察击毙的事件。第二篇描绘了芝加哥州监狱绞死一个名叫萨姆·卡迪耐那的臭名昭著的暴徒的情形。（如果他要求的话，这次行刑海明威原本可以亲眼目睹，因为碰巧他在行刑前的几个小时路过那座监狱。但正因为没有亲眼见到，他才能自由地想象当两个看守朝着匪徒走过去并往他头上蒙罩子时，犯人是如何瘫成一滩泥的。）另外还有一篇随笔取材于美国电影制片人肖第·沃纳尔最近告诉海明威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他在雅典皇宫花园撞见希腊国王的情形。那时，国王被革命委员会的人限制在宫里，而革命委员会由一位名叫普拉斯蒂瑞斯的强硬派分子控制着。沃纳尔说，在他们的谈话结束时，那个不幸的国王表示愿意到美国来。海明威把这件轶事统统据为己有，但在表述这件事时，他的那种语调更像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其余的五篇随笔都源于他最近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马的肠子啪达啪达地拍打着白马的腿”：这句话把笔墨首先集中到了这匹可怜的马上。在马德里的斗牛场中，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都曾亲眼看见它被牛角刺穿。（海明威的眼睛没有回避这令人感到悲惨的一幕，他也希望读者不要回避它。他写道，当马跑动时，一束蓝色的肠子掉下来，前后摆动着；鲜血噗噗地从两条前腿之间淌了下来。）“人群一直都在叫嚷，他们不断向场内扔面包片”：这句话同样也是在回忆海明威与麦克阿尔蒙在马德里的第一天下午的情景。“如果这就发生在你的面前”：这句话是在对尼卡诺尔·比利亚尔塔的奇妙优美的挥动斗篷和击剑的动作表示敬意。“我听见鼓声从街上传来”：这句话描绘了马埃拉对一个无知的墨西哥斗牛士的厌恶，因为他在以为自己要表演的那天表现得飘飘然。“马埃拉静静地躺着，头枕在胳膊上，脸颊贴着沙地”：在这里，作者想象着这位伟大的斗牛士在公牛三番五次的角抵之下死于斗牛场内的情景。

自从戈雅的《斗牛术》蚀刻作品问世以来，斗牛这项运动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五篇随笔中得到如此强烈的表现。一年多以后，这种表现的力度在（没有被斗败的人）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到他年近30岁时，海明威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这项运动的同义词。人们一想到斗牛，必然会想起海明威；同样，人们一想起海明威，斗牛也就自然是与他联系起来的第一件事。不错，他是多项运动的爱好者，但斗牛中有一些东西使他对它的感情更为特殊一些。在他第一次的斗牛经历中，他就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在他的余生中，他也一直是这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

那么，为什么在他的意识里这项运动会上升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对这个问题，多伦多《星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有一个随手拈来而又引起强烈反响的答案。这位年轻记者曾在1923年10月20日的报上载文、宣称斗牛“不是一项运动。它是一场悲剧，它象征着人与兽的搏斗”。在《午后之死》中，当作者庄重地提及仪式和悲剧时，年轻记者所指出的那些情感将最终得到印证和加强。但是，马克斯·伊斯特曼却用一种腐蚀性的批评将《午后之死》斥责为过于感伤的胡说八道。遵循他在巴黎的头几年里所形成的风格，海明威

努力想剔除那些表面华丽而实质空洞的辞藻，也就是他母亲所喜爱的那些辞藻。尽管如此，当他在公共场合以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身份对斗牛的意义发表评论时，他还是照样堆砌辞藻。迫于自我掩饰的需要，他就是无法像本来那样去清楚地表达自己。

能够获选在斗牛场内搏击的公牛至少都应在半吨重以上。它们要有结实的肌肉、快捷的步伐和锐利的牛角；它们也必须以令人恐怖的娴熟技巧挥舞它们的牛角；它们确实确实有一股可怕的雄性力量。一个男人要孤军迎战这样一头公牛，的确需要 *cojones*。西班牙人使用这个词带有劝戒之含义，因为在搏斗中生殖器时刻都处于危险之中，腹部、臀部、肠子乃至生命本身也都无一例外。要征服一头公牛，斗牛士首先得克服自己的畏惧心理，包括克服对性器官受到损坏从而失去大丈夫气概的恐惧。假如人们可以如此去诠释格特鲁德·斯泰因那句众所周知的嘲讽的话，那么真正的海明威原本倒的确可以写出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

然而，只有在小说中，他才能把这项运动写得既富有哲学的意义又具有戏剧性的激情。而且，他也只这么写过一次，那就是《没有被斗败的人》。同样，也只有他的小说才能够让人感觉到他是如何被斗牛中的性意象所纠缠。而在他和哈德利离开潘普洛纳后，在他所描绘的关于西班牙的五个斗牛场景中，唯一把他的这种思想显露于外的例子，就是“马埃拉静静地躺着，头枕在胳膊上，脸颊贴着沙地”。

由于血流不止，他感到暖暖的、粘糊糊的。每次他都能感觉到牛角的刺入。有时候，公牛只以头来撞他。有一次，牛角刺穿了他的身体，他可以感觉到牛角已经扎进了沙地。……马埃拉先是感到一切越来越大，然后又越来越小。接着一切又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又越来越小。之后，所有的一切开始跑得越来越快，就像有人在快速放映一部电影一样。然后，他就死了。

坐在潘普洛纳斗牛场的座位上，海明威深深为马埃拉尽管腰部受伤但仍不放弃战斗的硬汉子精神所折服。但是，只有在纯粹是想象的场景中，只有在致命之伤最终夺去了斗牛场上男子汉的一切抵抗时，钦佩才变成了自我认同，旁观者才变成了斗牛士。在《在密执安北部》里，海明威把自己融入了一个女人的意识之中，一个铁匠正不顾这个女人的异议而强行以性器官插入了她的身体。尽管“马埃拉静静地躺着”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它也含有在不可阻挡的雄性攻击之下而孤立无援的意味。

七

在长时间撰写《在我们的时代里》书稿的后期，海明威经常和埃兹拉·庞德打打网球，以此来使大脑松弛一下。之后，他们就常去诗人的书房谈论怎样排列这些随笔的次序，以求它们“都能紧密相连成一本书”。与庞德的《休·塞尔温·莫贝雷》的各部分次序一样，《在我们的时代里》的篇章安排能够最后敲定也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在8月5日写给庞德的一张总结性的便条上。海明威解释道：“公牛出来了，随后再次出现，然后就结束了。战争的爆发明朗而高尚，如同往事一样，蒙斯等先是推近然后又变得模糊不清，最

“cojones”是西班牙语单词，有“勇气”和“睾丸”两种意思。——译者注

后以那个家伙回家（芝加哥）去迎取掌声而结尾。由于希腊首相被刺，难民纷纷逃离色雷斯。整个事情以（肖第·沃纳尔）与希腊国王的交谈结束。——在年轻的毛焦尔的故事中，激进派起初高贵无比，然后又为非作歹。在警察枪击一个打劫烟酒店的坏蛋时美国出现了。这样排列很好。最后以国王结尾也棒极了。噢，那个国王。”

一天，一个名叫马尔科姆·考利的年轻美国人被人领进书房，打断了海明威和庞德的谈话。庞德向这个年轻人介绍海明威，考利立刻说他听说过他。数年后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考利回忆说：“海明威像一个中西部人那样慢慢地咧着嘴笑了一下。”当海明威追忆他为什么还记得考利时，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咧嘴而笑。当时，仅仅在一两周前，确切地说是在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那天，这个年轻的诗人被捕了，被关进了监狱，他受到威胁说要判几个月的监禁，原因是他把圆亭咖啡馆的老板揍了一顿。作为一个激进分子，考利很看重圆亭咖啡馆这个“长期有各国革命者光顾”的地方。但是，咖啡馆的老板却因为像对待妓女似地对待美国妇女而恶名昭彰。一天晚上，在圆屋咖啡馆和达达主义者特里斯坦·察拉喝下一个晚上的酒之后，考利决定以达达主义者的一种“重要的暴力手段”来要求这个粗野的法国佬检点自己。他被警方捕后，左岸的几个最好战的流亡者，包括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大富豪佩吉·古根海姆当时的丈夫以及狂暴怪僻的劳伦斯·韦尔都转向捍卫同胞的利益。麦克阿尔蒙提出了那个老板有不轨行为的有力证据，促使当局释放了考利。不过，他愿意帮助考利并不意味着他尊敬他或是喜欢他，相反，他倒认为他是一个“相当笨拙”的家伙，“悟性相当缓慢”。他之所以出面为他作证，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

在《乞力马扎罗的雪》这部小说的初版中有一段海明威写得很清楚，他很快就和麦克阿尔蒙一样对考利不以为然。这位患有坏疽病的英雄在回顾他在巴黎的早期生活时，记起有一次在蒙帕纳斯大道上散步。“他经过一家咖啡馆的时候，看到了马尔科姆·考利。他的面前有一大堆碟子，他那土豆般的脸上露出一副蠢相，正在和一个叫特里斯坦·察拉的罗马尼亚人谈论达达运动……”不过，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就要发表在1936年8月的一期《绅士》上的前夕，海明威又重新考虑了他的那种直率。考利在35岁左右时，已经成了《新共和》的文学编辑，由此而在图书界享有相当的名气。因此，他所在的位置可以使他经常报复那些曾经侮辱过他的人。在与类似他一样瞧不起考利的朋友们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私人通信中，海明威可以肆无忌惮地谈论他对考利的看法，有一处他就称他为“可耻之辈”，又有一处把他叫作“笨蛋”。但在公共场合，他还是决定要慎重。结果是，考利的名字在《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最后一稿中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伤害的“那位美国诗人”。

在1923年的后半季，海明威试图和麦克阿尔蒙恢复友好关系。在他们的交谈中，时不时会涉及到对考利的看法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议题还是马上就要出版的《三篇故事与十首诗》。当校对稿于8月上旬送来时，海明威给麦克阿尔蒙写信，说他是多么感动，书稿看起来又是“多么好，多么清爽啊”。考虑到书还是“他妈的太薄了”些，他请求他的出版商能否多增加一些空页使它更厚一些。他说：“我已经把房子里所有图书中的空页情况检查了一遍，在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的封面后发现八张空页紧跟其后，一个字也他妈的没有；在马克斯·比尔博姆的《七个男人》中发现了

四张空页，另有两页显然已经被主人撕了下来用作罐头纸了；在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廉价版本里也发现夹有四张空页。”麦克阿尔蒙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意在正文前面放八张空页，后面放五张。他还同意了海明威的请求，把目录用醒目的黑体字印在灰蓝色衬底的封面包装上。另外，他还向海明威保证在8月17日他和哈德莉前往多伦多之前手上就会有装订好的这本书。

八

在和哈德莉乘船离法前一个月左右，海明威透露，他对将升格成为人父这一事实的保留态度再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一次去造访盖伊·希科克的布鲁克林《鹰报》编辑部时，他大谈特谈起控制生育的问题，他用一种令人吃惊的激动的嗓门爆发似地警告说，现在还没有一种保险的避孕药物。当然，在这种粗喉咙大嗓门的表达中，他主要还是表示他很高兴，他正憧憬着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加入到他们中来。在给比尔·霍恩的一封信更多的是反映他愉快的心情而不是事实的信中，他声称：“哈德莉从没有生过病，甚至连恶心也不曾有过。比尔，她从来没有感觉这样好过，也从来没有看起来这样精神过。”他补充道，恋爱是“唯一值得一做的事情。不管恋爱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处于这个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就是值得的”。

为哈德莉敲响最后警钟的是埃兹拉·庞德。当哈德莉和海明威来到诗人的书房向庞德告别时，庞德把她拉到一边，忠告她千万不要设法改变她所嫁的人。他说：“大多数妻子都千方百计改变她们的丈夫，可对海明威而言，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当你带着小孩从加拿大回来时，你就会不一样了。女人成为母亲后就变得软弱多了。”哈德莉十分憎恶这条忠告，她甚至私下里十分憎恨提出这个忠告的男人。她知道他是个与人通奸的男人，瞧不起女人，认为她们是比男人低一等的动物。她自知，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庞德。但是，她又禁不住为他所说的话提心吊胆。

第三部 (1923 1926)

第十章 “故事里的尼克从来就不是他自己”

—

海明威在瑟堡上船时所携带的行李可谓其重无比，因为那里面装有西尔维亚·比奇送给他的全部《尤利西斯》。到达多伦多时，他成功地让人把这些书都私运进了美国。此次迁居，能够真正令他感到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这次漂亮的行动，再就是他和哈德莉在康纳布尔庄园对面的山谷边缘上为自己找到的一处“棒极了”的公寓。加拿大是“所有国家当中最臭的那七国之首，是排脓流毒的屁眼”；多伦多也不过是乏味的俄亥俄州小城镇的一个更大的翻版，而舍伍德·安德森早年就是从俄亥俄州逃出来的。他写信给庞德说：“如果还有什么人想就美洲扯那种淡，什么汤姆·米克斯呀，家呀，还有什么寻找美的历险记呀，就让他们来找我吧。”

海明威曾指望《星报》能够派他去专门采写当地的新闻，这样他就可以在哈德莉分娩时送她去医院。不幸的是，本地新闻编辑室主任哈里·欣德马什是一位患有虐待狂的顶头上司。他觉得海明威是一个桀骜不驯、两面三刀、需要教训几次才能懂得谦恭道理的年轻人。海明威在报社里才刚刚露面，欣德马什就命令他到安大略省金斯敦市去采访某个事件，而且他还特意关照在发表海明威所提交的长篇文章时不能署名。一个星期左右以后，欣德马什派他前往远在佐治亚海湾以北的萨德伯里盆地。10月初，他又派海明威赶赴纽约，报道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到达该市的消息。

在纽约的四天里，海明威努力想通过电话和舍伍德·安德森取得联系，但未能成功。其实，因为要求他发回的报道数目可观，即便他们联系上了，也不可能有时间会面。在纽约的大街上，海明威见到的人似乎同他一样饱受折磨。他曾经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这样评论说：“在那儿的时间里，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露出过笑脸。”他承认，秋天的纽约是美丽的，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喜欢这座城市。至于劳埃德·乔治，他认为这位威尔士人“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卑鄙邪恶”，尽管他从来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他的这些特点。海明威暗示，劳埃德·乔治的虚伪，可以用他头上那“满头长发”作为象征。

10月9日，纽约中央车站为前首相和他的随行人员发出了前往多伦多的专列。我们这位《星报》的记者也乘坐这趟专列离开了纽约。10日早上，在离多伦多10英里的地方，列车长交给海明威一封由康纳布尔夫妇发来的电报，上面说哈德莉已于昨夜被送进了韦尔斯利医院。根据哈德莉后来写给伊莎贝尔·西蒙斯的一封信，当海明威最终来到她身边时，他看上去已经因“疲惫和紧张”而整个人都垮掉了。显然，对他来说，此次旅行的最后几分钟就像是一场恶梦。不过，哈德莉的分娩却异常顺利。在他焦灼不安的丈夫眼里，她显得格外轻松和精力充沛。正如他和哈德莉所预料的那样，婴儿是一个男孩。他们随即给他起名叫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他的头发和鼻子都与他的父亲一模一样，虽然海明威声称从孩子的脸上可以发现与西班牙国王的“极其相似之处”。

那天晚些时候，在报社里，欣德马什责备海明威未能直接赶回来工作。

对此，海明威直言不讳地报以“对他和所有他那帮喜欢播唇弄舌的同事们的鄙夷和仇恨”。他还表示，如果欣德马什再次给他设陷阱，他肯定会揍他。欣德马什并未解雇海明威，只是更加无情地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由于神经疲劳所导致的崩溃”，海明威发现自己在夜里无法入睡，胃里也存不住食物。虽然他不断安慰自己这只是“病态的牡蛎往最漂亮的珍珠身上拉屎撒尿”，但是由于他对欣德马什整天怒不可遏，他担心自己所想要认认真真写的东西的质量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在一封写给弗勒吕斯大街的朋友们的信中，他承认到现在他才“第一次理解了人们怎么会仅仅因为无法完成面前堆积如山的繁杂事务而自杀”。不过，尽管他在《星报》工作的日子令人精疲力竭，但导致他陷入郁郁寡欢之境地的缘由也许并不是他的工作，而是约翰·哈德利·尼卡诺尔极其可怕地破坏了家庭的宁静。“这孩子就喜欢大叫大嚷，实在是个讨厌鬼。”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海明威哭笑不得地这样评论道：“我想，再这么嚷上两三年，他非得把他那脑袋嚷掉不可。叫嚷好像是他唯一的娱乐方式。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乐此不疲。”

二

对海明威来说，《三篇故事与十首诗》未能引起足够的评论，是他受到的另一个挫折。在《星报》编辑部里梳理各报的交换报纸时，他无意间发现在星期日纽约《论坛报》的每周社会与文学札记专栏里发表了伯顿·拉斯科的一篇短文，上面谈到埃德蒙·威尔逊最近让拉斯科阅读了一位署名海明威的作家刊登在《小评论》上的六篇随笔。拉斯科宣称，这些随笔是些“可以使人解颐的东西”。他接着说，这同一位作家还是另外一本故事与诗集的作者。拉斯科的朋友刘易斯·加兰提埃尔从巴黎为他寄来了这本书，但他还来不及阅读。考虑到海明威对权利和尊严有着异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对此感到恼火是不足为奇的。拉斯科得到这本书已有两个月之久，可他竟然还没有读过，竟然还未予以评论！这位专栏作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这正像潘普洛纳的女房东绝不能说在她那儿并没有以海明威的名字预留的房间一样。

虽说他很恼火，但海明威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对拉斯科说出自己对他的看法，而是给埃德蒙·威尔逊写了一封感人的信。

亲爱的威尔逊先生，

在伯顿·拉斯科的《社会与文学札记》中，我注意到您曾要他留意看一看我发表在《小评论》上的一些文字。

现寄上拙作《三篇故事与十首诗》。就我所知，这本书迄今在美国还没有受到过评论。格特鲁德·斯泰因告诉我她曾写过一篇评论，但我尚不知她是否已经发表。人在加拿大，对什么都是一无所知。

我很想寄出一些东西供人评论，但不知道是否必须像在法国那样应该题献给某某人才行。作为一个无名小卒，书自然就不那么引人注目，因此也许

格特鲁德的评论发表在巴黎 11 月 27 日出版的芝加哥《论坛报》上。评论说：“《三篇故事与十首诗》读来令人非常愉快。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令人满意。不仅如此，就这本书而言，我可以这样说，只要海明威坚持他的诗性和灵性，那就会既是诗也是智慧。……我应该说，海明威应该坚持他的诗性和灵性，避免过激的情感和过于浮夸的想象。人有灵性，有大量的灵性，是件好事情。它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就不会为拉斯科先生所接受。在加兰提埃尔把书寄给他三个月之后，拉斯科先生竟然还没有工夫来得及阅读。

我希望您喜欢这本书。如果您感兴趣，能否寄给我四五位评论家的大名以便我能把书寄给他们去评论？若蒙见告，我将不胜感激。明年元月我们返回巴黎前，来信仍可寄至这个地址。

无论您是否有时间这样费神，在此我都表示由衷的谢意。

您的真诚的

厄内斯特·海明威

1923年1月11日

威尔逊十分赞赏这本书。他告诉海明威，他愿意在《日晷》杂志的“简话”栏里为该书写一篇短评。同时，他也指出，《我的老头儿》与安德森的《我想知道为什么》非常相似，他对此感到失望。海明威立即回信说：“您能喜欢书中的一些东西，真叫我感到格外高兴。就我此刻所能想到的，在美国只有您的批评意见值得尊重。”但是，他还是请求威尔逊能够原谅他在《我的老头儿》上持有不同意见。那篇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他的父亲和赛马。虽说安德森也确实写过男孩和赛马，但海明威相信自己的故事绝非模仿。他坚持说：“我知道我并没有受到他的启发。”在否认了这种原本无可争辩的影响之后，他接着又去贬低安德森目前的作品。他说：“也许由于纽约的人们对他说了太多的溢美之词，（他的作品）简直是糟透了。”

他继而又谈到了其他一些美国文学的最新发展情况。他告诉威尔逊说，在1922年发表的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E.E.卡明斯的《巨大的房间》。而另一方面，威拉·凯瑟的普利策奖获奖图书，令世人瞩目的《自己人》——却并不值得慎重对待，因为那肯定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写照。“您也上过战场，对不？”他问道。“（凯瑟）所描写的结尾场面……难道不是很精彩吗？可您知道那是从哪儿来的？那是《一个国家的诞生》中的战斗场面。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对照过，都被凯瑟化了。可怜的女人！她只好从别的什么地方去获取战争经历。”

在这第二封信中，海明威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努力抑制住自己对即刻受到评论的热切渴望，力劝威尔逊不要发表有关《三篇故事与十首诗》的短评。他告诉威尔逊，一个月之内他就可以拿到《在我们的时代里》这本书。一旦到手，他会尽快寄一本给威尔逊。“从中您可以知道我努力想要表达的东西。两本（书）……合起来可以写一篇评论。”两本书是可以写一篇评论，也确实写了一篇评论。11个月之后，在《日晷》杂志1924年10月号上，威尔逊对文学界盛赞《在我们的时代里》和《三篇故事与十首诗》的作者是“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他标志着一个天才的降临。在《光明之岸》这部关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编年史中，威尔逊对这一史实曾经作过长篇的记述，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自己发现海明威的自豪。但是，即使是威尔逊自己所提供的证据也表明，他的发现实际上是受着海明威本人的幕后操纵。自从他接触到西尔维亚·比奇书店的期刊架之后，海明威一直极为关注文学批评，而且越来越显得急不可耐。他选择了这位28岁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开始同他进行通信联系。在他作出这个决定时，他实际上是自己挑选了一位评论家。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早已有作品刊登在《新共和》、《名利场》和《日晷》等杂志上。按照海明威的意见，惟有他才可以引起广泛的好奇心，只有他才具备严肃的目的，才能用真正有影响的评论所需要的精确性和强有力的风格来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海明威写给威尔逊的第一封信听起来天真纯朴。然而，两年后，《纽约人》的一位评论家就注意到海明威“发表作品甚至不是为了被讨论，而仅仅是为了让知识界那么一个特定的圈内人去阅读”。在这一公共关系的杰作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有预谋地建议威尔逊为他所写的那篇评论。

三

在向西尔维亚·比奇报告了婴儿降生的好消息之后，哈德莉也向她承认到加拿大来是她和厄内斯特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她曾告诉另一位通信者：“在我们本该格外幸福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却是沉重的，非常沉重。”除了他的妻子外，海明威愿意陪伴的人有康纳布尔一家、《星报》里几位较年长的同事和一位在《星报》兼职的名叫莫利·卡拉汉的大学生。至于他遇到的其他人，他打心眼里感到腻烦。“他似乎感到窒息”，卡拉汉回忆说。他对许多记者伙伴的评判都是刻薄的。这人“无羞耻”；那人有着“同性恋的作派”。有一回，连卡拉汉也受到了他的奚落。海明威问他是否写小说。年轻人回答说会写，而且答应会带一些作品到报社去给他看。第二周，海明威恶声恶气地提醒他别忘了他的承诺。卡拉汉解释说他一直太忙了，忘掉了这事。让他震惊的是，海明威竟然抓住他的忘性进行人身攻击。海明威嗤之以鼻地回答说，他想看看卡拉汉的小说的唯一原因是：“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你是否是另一个该死的冒牌货。”

为了不至于发疯，海明威竭力只在心里想着西班牙。虽然他也十分怀念巴黎，但能够安慰他的灵魂，使他重新信仰生命价值的东西却是对西班牙的记忆。在他看来，西班牙是“欧洲最好的国家。它没有被宠坏。它的坚强和奇妙令人不可思议”。不止一位朋友告诉过他，加利西亚是欧洲大陆上捕捉鱒鱼的最佳场所。他打算在1924年的夏天亲自去体验一下那儿的河流。再次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旅行当然少不了钱，可来年他的经济情况却会破天荒地紧张，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报业的工作，他已经向《星报》提出了辞职，辞职从1924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这样，他就断绝了他和哈德莉的大部分收入。更糟糕的是，哈德莉的经纪人在圣路易斯的错误投资也降低了哈德莉手头证券的价值。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心不顾一切地再到西班牙去。

圣诞节前夕，他回橡树园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所有的家人都对没能见到哈德莉和孩子表示失望。但是，哈德莉一直担心这样一种旅行所导致的疲劳和神经紧张会使她的奶水枯竭。格雷丝送给她孙子的礼物只好转交给她的儿子，而非儿媳。在最大的一个礼盒里有一双丝袜、一双粉红色的鞋和一件精美的衣服。格雷丝没有忘记提醒海明威，这件衣服同他小时候穿的没有什么两样。

使这次会面更加难堪的是，马塞利娜也在场。她的丈夫斯特林·桑福德是底特律爱迪生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她和他一起从密执安州某市郊区的家里赶来，在橡树园度过圣诞节。尽管他对自己的妹妹非常厌恶，海明威在到家时还是对桑福德夫妇表现得特别彬彬有礼。那天晚上，当海明威医生和格雷丝上楼去睡觉后，他同他们一起坐在客厅的壁炉前交谈。似乎是急于向他的

妹妹证明他确实是个作家，他忽然离开了客厅一小会儿，回来时手上拿着一本《三篇故事与十首诗》。他把书丢到她的膝盖上，告诉她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留下这本书。不过，她必须等到回家以后再读它。他不愿意老朋友们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存在，因为他清楚那里面有一篇肯定会冒犯他们的故事《在密执安北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在一节安静的普尔曼式列车车厢里，马塞利娜抽出了这本书，立刻就翻到了《在密执安北部》。很快她就充满了强烈的厌恶之情。那也许就是她的兄长早已料到她会作出的反映。

由于他在橡树园的停留较为短暂，海明威和母亲之间没有时间去做酝酿一场争吵。再说，他的胡子、成熟的面孔（看上去已有 35 岁）以及他的法语知识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走后，她给他写了一封旨在极口赞誉的信。“看到你已经变得如此成熟，是那么地像我的父亲——给你起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达你这次回来对我所具有的含义。星期天晚上，当你坐在那儿谈话时，你所表达的对生活的见解，正是他拥有的见解。那是一种气势恢宏的世界观，没有人能够随意去划定上帝的仁慈和公正的界限。”

回到多伦多后，海明威发现有一个包裹正等待着他，里面有几本《在我们的时代里》。这是印数有限的 170 本《在我们的时代里》即将出版的预告，在今天看来、它们具有特别的价值。书的封面印刷着一些被争抢撕烂又拼凑在一起的碎报纸，设计得耀眼醒目；正文印刷在毛边纸上，装帧相当美观。由于他急于把这些书送到埃德蒙·威尔逊以及其他一些能够有助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的手上，海明威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应该寄一本给他的父母。不过，他确实指示比尔·伯德给他们寄去了一张订书单。接到这张订单后，海明威医生签订了一份将购买半打书的合同。书最终运到了橡树园。海明威医生和格雷丝每个人都拿了一本书，坐在椅子上开始读起来。当读到第十章的最后几句话时，他们的恐惧达到了极点。通过书他们得知，这位曾经被一个名叫阿格的护士抛弃了的战争退伍军人，在搭乘出租车穿越芝加哥的林肯公园时，曾从一位女店员那儿染上过淋病。格雷丝泪流满面，而海明威医生则暴跳如雷。他气急败坏地说，他无法容忍在他自己的家里竟有如此“肮脏的东西”。他把书包了起来，准备退回巴黎。格雷丝恳求他留下一本，因为毕竟他俩都知道那是他们儿子的第一本书。足以令人吃惊的是，海明威医生的意愿竟然占了上风。六本书都被运回到三山出版社。此时，马塞利娜碰巧也在橡树园。她提醒父母说，厄内斯特早晚会得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一定会怨恨不已的。

四

1 月中旬，海明威夫妇乘坐丘纳德船运公司的“安东尼亚”号（按照凯瑟的书名，海明威把这艘船称作“我的安东尼亚”）一路剧烈颠簸地渡过了大西洋。之后，因为庞德夫妇本人已经再次回到拉帕洛去过冬，海明威便与哈德莉和孩子一起在庞德夫妇的那间既潮湿又没有取暖设备的一间公寓里凑合着住了一两个星期。经过坚持不懈的寻找，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住处，一家人最后来到了与庞德住所相距并不远的一套公寓：田园圣母院大街 113 号。公寓周围有修剪整齐的树木和干净明亮的咖啡馆，使他们的居住环境以前的住所要诱人得多；但是公寓本身并没有电，水暖设备也几乎和他们以前不得不容忍的楼梯间的设备一样原始。更糟糕的是，公寓附近有一家喧闹的锯木厂。当舞厅的音乐总算不再吵闹海明威一家的睡眠时，圆锯的呜呜声和发

动机的喋喋声就必定会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一直不停地令他们烦恼。

2月10日，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当间，海明威抽空给庞德写了一封闲聊的信。里面谈到他患了一次极讨厌的感冒，自觉心气不顺，老想找人打架。就像他的一部影片中的恃强凌弱者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一样，他是左右开弓，四面出击，好一阵砍杀周围的文学名人。在乘船渡洋之前，他们曾在纽约作过一次短暂的停留。据此他断定，目前在美国有一股反对舍伍德·安德森和“扫帚崽子们”的“巨大潮流”。所谓的“扫帚崽子们”，是指哈罗德·洛布、马修·约瑟夫森和某个小杂志的一些编辑们。这家杂志的刊名承诺要扫清这个世界。他接着说，《日晷》杂志把每年2000美元的年度奖刚刚授给了《马克·吐温的磨难》的作者。他满含讥讽地把这位作者称为“某个叫威克姆·布鲁克斯或范·怀克·斯蒂德或什么东西的家伙”。另外，有关《日晷》的消息还有，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已经离开了编辑部，“他的括约肌显然已经失去了以往迷人的张力”，他的位置也已被“一位老处女”玛丽安娜·穆尔所取代。至于说到眼下巴黎的文学状况，“当你能够透过雨雪去辨认清楚人们的面孔时，这座城市里仿佛挤满了大量的狗屎”。如果说给庞德写这封如实信件这位通信者还有什么能够值得他高兴的事情，那就是多亏了他吃的牡蛎和他喝的这个国家的葡萄酒，多亏了他心里已经令人兴奋地有了“即将要写的七篇小说”的谱儿。

海明威的一部分作品是在他们新家的餐桌上写就的。但是当婴儿开始哭喊时，或是当他已无法再忍受锯木厂不断的噪声时，他就会收拾起写作材料，步行到了香园咖啡馆去。像圆屋咖啡馆和圆亭咖啡馆这类时髦咖啡馆的常客是永远不会到丁香园咖啡馆里来的。那里面的客人大多是与妻子或情人呆在一起的上了年纪、长着胡子的法国人。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回忆说：“他们都对各自感兴趣，对饮料、咖啡、泡茶还有挂在金属杆上的报纸和期刊感兴趣。没有谁会出风头。”住在街区里稍微年轻一些的人也是丁香园咖啡馆里的常客。他们中有些人戴着十字勋章，另外一些还戴着军功章。“我观察着他们，看着他们是如何巧妙地克服四肢残缺所带来的障碍。我看清楚了他们的假眼的色泽，以及他们的面孔在整容时的技术熟练程度。经过大幅度整容的脸总是铸有一种近乎于彩虹的光泽，特别像一条已经打磨得非常光滑的滑雪道。”就这样，在一群毫不知情的残废军人面前，海明威坐着写下了那篇关于孩提时代的尼克·亚当斯在密执安丛林一个印第安人营地中所目睹的自戕的故事。到2月底时，他完成了这篇短篇小说。

《印第安人营地》本来还有一部分倒叙材料。年轻的尼克在去教堂后回家的路上唱着一首有关剪断脐带的圣歌，然后他读了一夜的《鲁滨孙漂流记》。但是，经过再三思考后，海明威删掉了这一情节，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叙述只是由一系列不断展开的即时即地、环环相扣的事件来构成。而且，在每一时刻和环节上，他都紧扣着一种刺激与反映的行为主义机械论。

海明威是否读过行为心理学创始人约翰·B.沃森的文章或著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未必需要这样做也照样可以熟悉沃森的理论，因为沃森的理论在20年代可谓“甚嚣尘上”。沃森认为，只要沮丧者细心地挑选环境，沮丧的心情是可以被克服的。从《大双心河》中可以发现，这一观点不仅使海明威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作家而倍感兴趣。因为钓鱼者决定离开可能使钓鱼变成“悲剧”的沼泽地，这一决定最完美地体现了沃森的自我管理的学说。至于沃森对海明威的看法，可以说他是海明威的崇拜者，尽管海明威在作品中并没有长时间地严格奉行行为主义理论。沃森是一位粗鲁的潇洒男人，热中于追求女性和绘声绘

半夜时分，亚当斯医生、儿子尼克和兄弟乔治走进了一个棚屋，里面有一位印第安妇女正在痛苦地尖叫。两天来她一直想把孩子生下来。在她上面，他的丈夫躺在双层床的上铺上静静地抽着烟斗。亚当斯医生小心翼翼地对尼克解释着所发生的事情，由此显而易见他十分担心尼克会被这件事给吓坏了。“噢，爸爸，你不能给她吃点什么，好让她不这么一直叫吗？”尼克说。“不行，我没有带麻药，”亚当斯医生回答道：“不过让她去叫吧，没关系。我听不见，反正她叫不叫没关系。”医生开始手术时，他的兄弟乔治和三个印第安男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按住了产妇。她的丈夫仍然躺在床上，翻了个身面向着墙壁，用毯子把自己的头蒙了起来。亚当斯医生用一把大折刀做了一次剖腹产手术。手术花了很长的时间。婴儿是个男孩，哭声强壮有力。亚当斯医生用九英尺长的细肠线把刀口缝合了起来。过后，他感觉到“他的劲头来了，喜欢说话了，就像一场比赛后足球运动员在更衣室里的那股得意劲儿”。然而乔治却竭尽挖苦之能事朝他那兴奋的兄弟泼冷水：“噢，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没错的。”亚当斯医生朝上铺仔细看了看，一边揭开印第安人丈夫头上的毯子，一边评论说：“在这些小事情上做爸爸的往往最痛苦。”那位印第安人在脖子上贴着两个耳根割了一个大口子，毯子里放着一把剃刀，锋口朝上。尼克看到了印第安人自戕的一幕，亚当斯医生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是乘船渡湖来到印第安人营地的。在他们步行回湖边的船上时，尼克问道：“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我说不出，尼克，”亚当斯医生说：“我猜想，他这人是受不了什么的。”尼克接着又问：“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不太多，尼克，”他的父亲回答道。上了船，尼克坐在船梢，他的父亲划桨。太阳正从山那边升起来。一条鲈鱼跳出水面，在水面上弄出一个水圈。尼克把手伸过船边，放进水里。他注意到水是温暖的。“清早，在湖面上，尼克坐在船梢，他父亲划着船，他满有把握地相信他永远不会死。”

《印第安人营地》最先发表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新杂志《大西洋两岸评论》1924年4月号上。到当年夏天过了一半时，有如此之多的读者都向海明威打听这篇小说是否基于他个人的经历，他感到有必要在《大双心河》中间说几句关于写作艺术的题外话，但这些题外话他最终还是决定从小说中删掉了。在这些题外话中他宣布：“故事里的尼克从来就不是他自己，是他虚构的人物。他当然不会有机会看见一个印第安妇女生孩子。那正是小说奇妙之所在。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在去卡拉加奇的路上，他曾经见过一个妇女生孩子，并试图帮助她。那就是事情的原委。”

读者以为海明威就是尼克，并向他打听童年时他在丛林里看到的印第安产妇，这不免有些缺乏想象力。但事实上，《印第安人营地》里的尼克的确是海明威，尽管这与读者的见解并不是一回事儿。《印第安人营地》这篇短篇小说可以说是文字精炼的奇迹。通过虚构的事件，小说过滤出相当多的自传性情感，表现了作者与父亲之间曾经一度有过的亲密感觉和作者长期以来对乔治叔叔的反感，以及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具有的对分娩痛苦的某种恐惧。不过，写作《印第安人营地》的灵感主要还是来自于另外一些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明显的感情，而产生这些感情的原因全都围绕着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的出生。躺在上铺的印第安人丈夫是一个象征，他就是在开往

多伦多的火车上正在接过一封电报的海明威他自己。以他那种非凡的想象能力，他显然不难设想妻子在韦尔斯利医院里的情形；手术室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就仿佛他身临其境一般。与此同时，他也忧心如焚（当然后来证明那是不必要的担心），惟恐她痛苦万状，深怕她意识到他可能无法及时赶去帮助她而陷入无依无靠的孤苦境地。（也难怪当他最终赶到她身边时，他会显得那样精疲力竭！）不管是从相同点还是从不同点来说，这位印第安人丈夫都被妻子的痛楚折磨得萎靡不振，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来帮助他的妻子，甚至不敢去看儿子的出生，就好像他的身体并不是真正地在那儿，尽管令人恐怖的事实是：他在那儿。在作者和印第安人丈夫之间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哈德莉和孩子从医院回到家以后，海明威给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写过一封信。信中他曾提到自杀的想法。当印第安人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时，他只是用自己的举动实现了海明威的思想。通过描写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海明威得到了净化和解脱，这种可能性在小说结尾的那种平静的气氛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现代读者来说，《印第安人营地》的结尾并不能帮助他们意识到总有一天船上两位人物的真实化身也会自我毁灭，反而会使这种意识变得朦胧。

五

按照罗伯特·麦克阿尔蒙所说的俏皮话，50岁时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看上去就和连环漫画《月亮马林斯》中的长毛屁股爵士一模一样。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可就是一个令人悲哀的邋里邋遢的家伙。福特的个头很高，体形肥胖，脸庞呈粉红色，蓄着两撇总是粘有污物的小胡子，穿着难得送进洗衣店洗上一两回的衣服，说起话来低声粗气，咕咕哝哝，甚至他的英国同胞也难以听懂。类似的不拘小节的行为与H.G.韦尔斯在描写他认识的文学名人时所说的“放荡不羁”正相吻合。但是，作为小说家，福特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匠人，在善于对其他作家的作品作出精确的评论方面也有着极好的名声。战前，在编辑《英语评论》时，他不仅劝诱亨利·詹姆斯和H.G.韦尔斯分别创作了《快活的角落》与《托诺-邦该》，他还发表了类似D.H.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H.M.汤姆森和温德姆·刘易斯等作家在成名之前的投稿。

1922年秋天，福特厌烦了英国潮湿的气候和苏塞克斯乡间寓所的与世隔绝，他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了法国。一年刚过，他便创立了《大西洋两岸评论》，并且许诺要把它办成年轻作家借以成名的园地。就海明威而言，这一诺言实现了，因为福特说：“我读他的作品才刚刚读了六个词，便决定把他寄给我的东西全都发表出去。”《大西洋两岸评论》从创刊到停刊不过一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福特发表了海明威的三篇小说。由于埃兹拉·庞德的推荐，他还雇用海明威作为他的助理编辑。一天，庞德和福特坐在庞德家的工作室里，看着海明威掂着脚尖跳来跳去，用拳头猛击房间里阴暗处他假想的靶子。庞德对福特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记者。他的诗写得非常不错，他的散文风格也是世界上最棒的。”

《大西洋两岸评论》杂志社设在圣路易斯岛大街一幢建筑物的阁楼里，楼下就是比尔·伯德的三山出版社。由于福特不善管理，其他助理编辑也没有经验，杂志的出版任务是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完成的。无论是印刷、纸样、装订、发送还是销售，一切可能出错的地方都一期接着二期毫不例外地出着错。加上福特每周四在那儿举行的茶话会，楼里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八年后，

在他为现代图书版《永别了，武器》所写的序言中，海明威这位昔日的编辑感叹说：“你们真该去见识一下那些周四的茶话会！”

法国人说“*lasemaineàdeuxjeudis*”……也就是一周有两个星期四。对我来说，考虑到噪音、大声的吵嚷、未经邀请就擅自闯入的客人和咒骂声，那么一周仿佛就有60个星期四。（客人们都）坐在长板凳上，——是学校的板凳，——挤在伯德那些了不起的手动印刷机中间。他们都对我高声叫嚷：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作；或者：我知道的太多了，没法写了；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编辑。他们又是算帐，又是高唱《弗兰尼和约翰尼》，或是忙着订菜订饭。天花板是拱形的，法国梧桐的树叶飘落下来，落到了外面的码头上。灰色的塞纳河缓缓地流淌着。

当茶话会的规模完全无法控制后，福特关闭了这些茶话会，但又开始每周在海明威原来住所下面的卡迪纳尔勒穆瓦涅大街的舞厅里举行舞会。随着舞会上擅自闯入的客人数量再次失去控制，福特取消了舞会，可他又增加了他在那套如同大仓库一般的公寓里举行的烛光晚会的次数。这套公寓座落在阿拉戈大道上，是他自己和情人（年轻的澳大利亚画家斯特拉·鲍恩）所共同享有的。得益于福特的所有这些欢宴和聚会，海明威的熟人圈子成倍地扩大。哈罗德·洛布、南希·丘纳德、约瑟芬·赫布斯特、约翰·赫尔曼、朱阿纳·巴恩斯、塞缪尔·帕特南、内森·阿施、格伦韦·韦斯科特、斯科菲尔德·塞耶、E.E.卡明斯以及查德·鲍尔斯·史密斯等20多人，海明威都是在他老板的宴会上头一次见面或是逐渐熟悉的。然而不论他聚集了多少客人，福特总是能够力争成为他所举办的表演会的明星。赫伯特·戈尔曼曾经戏封他为“巴那斯山区的当权者”；塞缪尔·帕特南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说，阿拉戈大道上的聚会最为奇妙的地方就是它为类似他那样的年轻美国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倾听那位曾经与康拉德合作并且发现了D.H.劳伦斯的人回忆起他的昨天”。

海明威同样对福特所谈起的有关康拉德的话题感兴趣。但是，由于他对整个美国文学尤其是对亨利·詹姆斯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福特对亨利·詹姆斯的回忆可能对他具有更多的意义。因此，就像海明威在《春潮》（1926）中写了没几页就表明的那样，那些有关上了年纪的詹姆斯的不太精确的描写，是基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先生所谈到的一段轶闻趣事：英国的功勋奖章送达他床边的那天，詹姆斯指示他的护士“把灯关掉，免得别人看见我脸红”。另有一段关于詹姆斯的故事也有可能是海明威从福特那儿听来的：1895年，在德文郡的旅游胜地托基城，这位文学大师在学骑自行车时摔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这段学骑自行车的不幸遭遇，既有可能是詹姆斯于1896年夏末时节在拉伊城的家里请年轻的福特吃饭时亲自告诉他本人的，也有可能是福特自己捡来的二手故事。然而不管怎样，詹姆斯因学车而负伤这件事对海明威具有一种复杂的含义。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将会在一个重要的段落里谈到这件事。

六

巴那斯山是古希腊山峰名，是神话中阿波罗及缪斯诸神居住处。——译者注

海明威起初对福特怀有好感，但是很快这些好感就被恶狠狠的敌意所淹没和抹杀。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有这么几个因素。同以前的亨利·詹姆斯一样，海明威也觉得福特的许多矫揉造作的做法令人生厌，特别是他总把自己装扮成最后一位托利党老乡绅。海明威前去为《大西洋两岸评论》工作才仅仅两个月，就对庞德抱怨说：“他老是他妈的想搀和到英国乡绅的渣滓堆里去，你从他那儿得不到什么好东西。”福特还常常提到他的参战经历以及他所遭受过的改变了他的声音音色的毒气袭击，吹嘘什么尽管他已是40岁的人了，还自愿地积极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切也都使海明威甚为反感。海明威愤愤不平地问庞德：“莫泊桑、巴尔扎克、还有写《巴马修道院》的那个家伙，他们都曾参加过战，难道不是吗？无论如何，他们只是从中去学习。他们可没有总是拿着官去哗众取宠。我得开始否认我曾参加过战争，因为我担心我也会在战争问题上像福特那样对待我自己。”不过，真正激怒海明威的。并不是福特个人为人处事的风格，而是他在编辑问题上的态度。

福特在《大西洋两岸评论》的第一期上就刊登了他的朋友T.S.艾略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艾略特对福特只是表示了不冷不热的鼓励，而且他还对福特意欲使《大西洋两岸评论》成为年轻作家的传播媒介的声明表示了异议。艾略特说：“我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一种不必要的偏袒性歧视。”他坚持说，评论的价值不在于它抢先报道了多少独家新闻。“好的文学是由极少数怪才在偏僻的角落里创作的：评论的用处不在于挤出才能，而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你能服务于这个目的，只要你能发表……各种年龄的非常好又非常独立因而无法找到其他出版物的作家的作品。”借此机会，艾略特还指出，并没有什么与英国文学不相同的美国文学，与此相反的主张不过是显示了当今这个“愚蠢至极”的时代的“错误的民族主义”。从福特去年秋天发表在艾略特的刊物《标准》上的一篇文章里，海明威得知福特甚而可以作出在他看来更加可憎的文化判断。福特写道，“在我们的思想和艺术世界中出类拔萃的”，“只有英国和法国算得上数……。看在老天的份上，让我们与世隔绝；而且，只要我们把法国包括进来，让我们敢作敢为，邪恶卑劣，不知自责地排斥外来影响吧。”

不过，几乎是在刚刚表达了这些情感之后，福特就立即后悔了。他不仅把计划中的杂志取名为《大西洋两岸评论》，而且在最早的一期杂志里他宣布，从文学上讲，美国似乎已经成年了，而英国“却流尽了鲜血，我们最精华的鲜血”。但是，以海明威的口味而言，福特还是发表了太多的英国和法国作家的作品。更有甚者，海明威确信福特已经胆怯地抛弃了扶植年轻作家的主张。其结果是，他接受并发表的由著名作家创作的小说与人们在美国主流杂志上所看到的小说在精神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福特发表这一切全他妈的是为了妥协，”海明威在5月份写给庞德的一封信中大发雷霆。“换句话说，也就是除了（特里斯坦·）察拉和类似的法国蠢货之外，福特接受和发表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世纪》、《哈泼》等出版物所接受和发表。这简直是糟透了。见鬼的是，他竟然没有得罪广告商，订户们也没有停止订购，所以他干吗不这样连蒙带混？”9月份时，他又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萊斯嚷嚷说，他已经“腻味了福特和他那帮妄自尊大的蠢猪”，是他们“破坏了他评论中本来可以得到的机遇”。一个月后，他再次在这些女士们面前对福特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和恶棍；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最假模假样的英国绅士派头。”

福特创建《大西洋两岸评论》时，希望能使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投稿保持一种大致的平衡。但是多亏了海明威在杂志社内的密谋策划以及庞德在社外的骚扰，《大西洋两岸评论》最后实际发表的文章总数是：英国 60 篇，法国 40 篇，美国 90 篇。美国的投稿出自于这类作家之手，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林肯·斯蒂芬斯、H.D.纳塔利·巴尼、约翰·多斯·帕索斯、内森·阿施、朱纳·巴恩斯，还有格特鲁德·斯泰因。每当忆及此事时，福特都很自豪他曾发表了所有这些美国人的作品。但是，如果不是海明威和庞德从中使劲为这些作家说话，该杂志极有可能不会网络住这样一批令人刮目的投稿者。

例如，以格特鲁德·斯泰因来说，福特曾透露他会很高兴有一天能发表她的一些东西。海明威抓住这一含糊的话作为行动的信号。格特鲁德并非年轻的作家，但是她的作品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大西洋两岸评论》应该支持她。根据《艾丽斯·B.托克莱斯自传》的记载：“这时，海明威非常激动地走了进来。”

福特想在下一期上发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一些东西。海明威希望能够连载《美国人的成长》一书，因此他想立刻就拿到前 50 页。格特鲁德·斯泰因对此自然感到十分激动。可是除了我们已经装订起来的一册之外，我们手头上并没有一份手稿。海明威说：没关系，我来抄写一份。于是我和他就悄悄抄了一份，刊登在下一期的《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就这样，一篇不朽的作品头一次发表了。它是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的的确确是开山之作。我们都非常高兴。

尽管他已接到通知说这篇稿件篇幅过长，但就在格特鲁德的手稿在《大西洋两岸评论》4 月号上第一次连载之前，海明威还向她保证，福特已经同意发表文章的全文。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海明威的这种保证纯粹是谎言。事实的真相是，福特抱怨他的助理编辑不仅仅隐瞒了《美国人的成长》长达六卷这一事实，而且还对他说这是一篇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因为，除非发了疯，否则不会有哪位编辑会全文连载篇幅如此之长的作品。通过欺骗的手段，海明威把福特逼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不得不向格特鲁德解释他无法全文发表她的手稿的原因。艾丽斯·托克莱斯也一直怀疑海明威。她纳闷在这一切不凑巧的窘境背后是否有什么“别的原因”。她的猜测差不多可以说是绝对正确。出于对福特的愤怒，海明威故意千方百计地在福特和其他作家之间挑起麻烦。

另外一位在海明威的庇护之下将作品付梓的美国作家是内森·阿施。他是意第绪语小说家和剧作家肖尔姆·阿施的儿子。年轻的阿施祖籍波兰，在瑞士、德国和法国长大。1914 年战争爆发后，他和父母一起逃到了美国。他先在锡拉丘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后来在纽约市受聘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但是，在华尔街干了两年之后，阿施下定决心要献身于文学。1924 年他到达巴黎后不久，他把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大西洋两岸评论》。一天早上，海明威去洗手间时，在福特的桌子上看到了这篇还未拆封的手稿，顺手把它带走了。阿施回忆此事时说：海明威追忆当时的情况是，后来“他对我的小说感到非常地激动，甚至忘了把他的裤子扣上”。哈罗德·洛布也曾想起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说，海明威“逐字逐段地”阅读了阿施的作品，这对

年轻的作者阿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这段趣闻令洛布大为惊奇，并非海明威的评语有多大的帮助，而是海明威竟然“如此渴望帮助”别的作家。

5月下旬，当福特离开巴黎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六周的访问时，他那位心怀不满的助理编辑要想伺机推倒这位主编在杂志上所拥有的权威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在福特外出访问期间，海明威改变了7月号 and 8月号两期杂志的基本特点。在7月号杂志上，他发表了三篇福特至死也不会同意发表的作品：一篇是最近刚刚成为海明威挚友的幽默作家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关于大学友爱生活和足球热的讽刺小说；一篇是林·拉德纳戏弄达达主义——而达达主义恰恰是福特最看重的运动——的荒诞讽刺小品；另一篇是海明威成本人未加署名的社论，其中他嘲笑了福特曾予以高度评价的三位作家让·科克托、特里斯坦·察拉和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其实，如果不是海明威怀疑塞尔迪斯在担任《日晷》杂志的编辑时应对拒绝发表他前年向该杂志投寄的《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某些章节负责，海明威或许也会赞赏他那生龙活虎的新作《七大生动的艺术》。在8月号杂志上，海明威对福特最大的不恭敬是取消了福特在该杂志上已连载数月的连载小说《有些人不干》，代之以埃尔莎·冯·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的一组洋泾浜英语诗。人们谣传埃尔莎是一个德国贵族的寡妇。她性情古怪。大约在10年前，因为她把煤筐颠倒过来当帽子，把蔬菜搅碎器当胸针、把长柄冰激凌勺当耳环，把金属滤茶球悬挂在晃悠悠的乳房上，她在格林威治村里已是臭名远扬。海明威认为她的诗同她的人一样荒诞不经。但是为了惹恼福特，几个月来他一直想把这些诗的一部分悄悄塞进杂志里去，目的只是想让福特在最后的一刻发现这些诗并把它们砍掉。多亏了海明威，8月号的《大西洋两岸评论》上还特地刊载了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的一篇小说、内森·阿施的一篇作品、盖伊·希科克的一篇文章，以及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一篇对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小说予以好评的评论文章。由于福特不喜欢麦克阿尔蒙的作品，他先前曾经拒绝发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这篇评论。

7月4日，当外出的主编回到杂志社时，7月号杂志早已出版，8月号杂志也已上了机，无法再收回。不过，福特还是设法插进去了一篇编者按，对下属的颠覆性行为加以评论。他说：“在我们外出期间，这本《大西洋两岸评论》是由精明强干、令人崇敬的年轻美国散文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先生主编的。”福特费尽心机地指出，仅仅除了两个地方之外，“本期刊物完全是海明威先生的聚会。对读者来说，它肯定会是一种令人惬意的变化。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少有的特大范例，可以帮助他们见识一下那个年轻的美国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但却从未像本期刊物一样如此卓有成效地把那个年轻的美国的主张强加给我们的读者。”

虽然福特曾经一度试图重新强调《大西洋两岸评论》的英国和法国特色，但此时此刻他已不可能再拥有以往的权威。因为，杂志的主要赞助人，对福特的政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纽约著名律师约翰·奎因在7月份时突然死亡。短短几个星期，《大西洋两岸评论》的经济状况似乎就已陷入无望的境地，直到海明威带着另一位天使到来。克雷布斯·弗兰德是海明威在芝加哥《合作共同体》杂志工作时的一位同事。他与一位年纪比他大40岁的富可敌国的女人的婚姻，使得他后来又有能力回到法国的首都（初次见识巴黎时，弗兰德还是一个士兵；由于严重的炮弹休克症，他在那儿养过伤），并且在一座地理位置极佳的大楼里租下了一套公寓。白塔餐厅就在这同一座楼里。弗兰

德夫妇从不自己动手烹调，他们干脆就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吃。弗兰德同意让《大西洋两岸评论》再继续存在五个月。同时，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西洋两岸评论公司的总裁，而海明威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更多的编辑权威。年底时，福特对杂志的控制已大大被削弱，最后一期杂志完全成了美国作家的天下。除了海明威、唐·斯图尔特、内森·阿施、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和其他几位天赋稍逊的作家（包括伊丽莎白·弗兰德，也就是克雷布斯那位年逾60的妻子）的短篇小说之外，《美国人的成长》又发表了最新的连载；另外，还有埃文·比德尔·希普曼的代表诗。埃文·比德尔·希普曼年龄20岁，衣着破旧邋遢，是新罕布什尔州普兰菲尔德镇的一个富家子弟。据他自称，他在巴黎四处逛荡，是因为一家名叫《美国牧马人》的杂志聘用了他，他是该杂志驻欧洲记者。

七

在《大西洋两岸评论》工作的最后日子里，海明威曾向麦克阿尔蒙报告说，阿施和希普曼干了一架。“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大打出手，俩人谁都没有留下伤疤。我猜，他俩谁都没有着实地打上一拳。希普曼的女友离开了他。他已回到比利时去追她了。她离开他是因为他向阿施借了钱换了新牙。而阿施揍他是想要这犹太佬感恩。就这些了。”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漂亮的与该死的》一书中，主人公安东尼·帕奇在犹太族纽约人的脸上察觉到了某种阴险的东西。T.S.艾略特在描述普救派犹太人时使用的也是这样的词汇：“一双膝盖松松垮垮地弯曲着，肘关节和手掌一起朝外翻着，这就是芝加哥的犹太族维也纳人。”既然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和艾略特同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么他当然也会发现用反犹太人的形容词去诅咒那些相识的犹太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那些他所憎恨的犹太人，比如林肯·斯蒂芬斯的新夫人埃拉·温特。1924年7月17日，海明威从西班牙的布尔格特写信给庞德说：“斯蒂芬斯同一个19岁的布鲁姆斯伯里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婚姻，你自然已经听说过。”海明威自己已经忘记，就在两个半月前，他曾从巴黎给庞德写信。信中说：“阿贝·林肯·斯蒂芬斯已经和令人讨厌的22岁的犹太猪去了意大利。那犹太猪对待他就像戈甘（原文即如此）对待凡高一样。”

对于同性恋，海明威更是无法容忍。1924年曾出版了一本名为《掌上明珠》的小说。海明威对这本小说的作者所持的反感就是一个例子。当他还是威斯康星州基沃斯昆小城的一个男孩子时，格伦韦·韦斯科特就曾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流过眼泪。他的言谈话语、举止作派甚至比他的姐妹们还要女性化。不仅如此，等他到了巴黎后，他还学到了一种英国腔调。福特是既喜欢这个人又推崇他的作品，可海明威是两者都无法忍受。韦斯科特的散文风格是“赝品”；他的小说“根本就无根无据”；而他那矫揉造作的谈吐则十足地让人作呕。这正像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里试图对舞会上出现的一位年轻的同性恋男子所作的简短描述一样。罗杰·普雷斯科特是这个年轻男子的名字。或者说，在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马克斯韦尔·珀金斯提出异议之前，这一直是那个年轻男子的名字。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认为普雷斯科特显然等于韦斯科特，他逼着海明威把名字换成了罗伯特·普伦蒂斯。“他是纽约人，从芝加哥来，”杰克·巴恩斯解释说：“是一位写小说的文坛新秀。他说话带点儿英国口音。我请他喝酒。”

“非常感谢，”他说，“我刚喝过一杯。”

“再来一杯。”

“谢谢，那我就喝吧。”

我们招呼老板的女儿过来，每人要了一杯掺水的白兰地。

“我听说，你是堪萨斯城人，”他说。

“是的。”

“你觉得巴黎好玩吗？”

“好玩。”

“真的？”

我已有几分醉意。并没有真醉，但说起话来已经到了不择词句的程度。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说，“是真的。难道你不是这样认为？”

“呀，你发起脾气来真讨人喜欢，”他说。“我要有你这套本领就好了。”

我站起来向舞池走去。布雷多克斯太太（即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情人）随后跟着我。“别生罗伯特的气，”她说。“你知道，他不过是个毛孩子。”“我设生气，”我说。“方才我不过觉得好像快要吐了。”

有时候，海明威会无缘无故地用言语去中伤他人。而且，他不时地甚至会屈服于更加丑恶的情感，对别人的身体进行直接攻击。这其中的一个牺牲品，是通过哈罗德·洛布与他相识的。在阿拉戈大道上有一个用红色泥土覆盖的网球场，正好靠近那座设置了断头台的监狱。洛布和海明威养成了一起到那儿去打网球的习惯。按照洛布的说法，“厄内斯特的球艺不佳”，因为他的眼睛不好，膝盖有毛病。“不过，他打得非常起劲，每打一个好球都高兴得不得了，因此玩起来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当他和洛布的两个朋友保罗·费希尔与比尔·布利特进行双人对打时，那就更有趣了。费希尔是一位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美国建筑师。他那运动员一般的外貌常让洛布想起一则“箭领”广告。布利特是来自费城的外交家。他的夫人是约翰·里德的寡妇路易斯·布赖恩特，当时据说正在写一本有关费城高级住宅区的礼仪小说。拳击是海明威的另一消遣。洛布喜欢此道；保罗·费希尔也同样喜欢，或者说，曾经一度喜欢。因为在9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海明威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忽然加重了拳击的力度，开始冷酷无情地痛打费希尔。事后，海明威对洛布解释说，他当时就是想“把他揍个屁滚尿流”。

他想把费希尔揍个屁滚尿流，也许就是因为这位建筑师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那时候，海明威和哈德莉正处于经济十分拮据的境地。他对那些从来没有类似问题的人们嫉妒得发狂，而在他的周围，在侨民群体中间，他却常常能遇见这种人。尽管洛布最初所继承的遗产已大部分挥霍殆尽，可海明威一想起这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犹太人是库恩-洛布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孙侄儿，他的母亲是传奇人物炼铜大王迈尔·古根海默的女儿，他的心里就充满了痛苦。比尔·布利特是费城布利特家族中的一员。他生长在里顿豪斯广场，随后不论走到哪里，从巴黎到里维埃拉再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都能够继续他那奢侈的生活。埃文·希普曼穿着一件肮脏的白衬衣，灰色的西眼皱皱巴巴。他看上去也许像一个流浪的乞丐，但他却上过格罗顿公学，母亲也属于比德尔家族。斯科菲尔德·塞耶也是一个生来有福的富家子弟。身材苗条、性欲错乱的南希·丘纳德是丘纳德船运公司创始人之孙贝奇·丘纳德爵士的女儿，她在圣路易斯大街上的公寓地处海明威家和《大西洋两岸评论》

杂志社之间，是海明威上下班时路上方便的歇脚处。纳塔利·巴尼在雅各布大街上拥有一座华美的住宅，足以显示她的财富尤胜一倍。她的祖父是俄亥俄州德易敦城列车车厢的生产商；外祖父是辛辛那提最成功的商人。克雷布斯·弗兰德和罗伯特·麦克阿尔蒙都与金钱结了婚。而且，就是在海明威痛揍保罗·费希尔的那个月，他告诉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说：最近又有一位名叫巴克利·亨利的不错的家伙通过与惠特尼家族女继承人联姻而可以从此养尊处优。

1924年5月，在写给爱德华·J·奥布赖恩的一封信里，海明威概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在1924年所处的经济状况。他说：“我快要破产了，因为除了从福特的《大西洋两岸评论》得到了150法郎的稿费外，我一直没有赚到什么钱。”《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售罄，但所得利润已被比尔·伯德事先挪用，以填补他在其他出版物上的亏空。《三篇故事与十首诗》也同样没有任何赢利。至于他在《大西洋两岸评论》的编辑工作，所得报酬就是应邀去参加福特的晚会，仅此而已。

为了省钱，他不再给自己买衣服。当外套的肘部磨破时。他就打上补丁。哈德莉也只好将就着手上现有的衣服穿。他们两人舍不得在午餐上花钱，在咖啡馆里吃吃喝喝留下了一大堆盘碟之后也是让别人掏腰包。作曲家弗吉尔·汤普森说过，海明威从来不用钱请客。只有“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才还了他们的债。……在那本书中，他为所有的朋友们都买上一杯”。由于所有这些节俭行为都做得在明面上，于是在像西尔维亚·比奇这样富有同情心的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如此印象：海明威一家正竭力维持着一种勉强糊口的生活。其实，在大多数方面，他们仍然过着以往那样的生活。他们一方面日益感到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不惜动用老本。事实上，他们再次雇用了玛丽-科科特作为仆人，一边吃着她做的饭，一边喝着与以前一样高档的葡萄酒。他们常去巴黎竞技场观看拳击比赛。为此他们倒是无需花费分文，因为盖伊·希科克一直为他们提供着记者券。但是，为了维持他最近对六日自行车大赛刚刚产生的兴趣，海明威不得不给自己和哈德莉买票以进入冬季自行车赛场。每天夜晚，人们都可以发现他们在冬季自行车赛场的座位上吃着野餐。通常他们是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因为按照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话说：“海明威……有一种狂热的个性，使他会设法让所有的朋友都转而迷上他当时怂恿大家着迷的东西。”多斯·帕索斯认为，海明威对自行车大赛着迷的另一个标志是，“他常常穿着一件如同环法自行车大赛运动员一样的条纹上装，在外面的大道上来回骑自行车。他把头埋在自行车车把中间，两膝齐耳地用劲骑行。”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他的幻想，海明威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辆昂贵的自行车。海明威也毫不犹豫地继续沉迷于他对西班牙和斗牛的迷恋。1924年夏天，海明威和哈德莉再次前往潘普洛纳旅行。其间，他们发现，由于喜庆节日所导致的物价膨胀，食品和住宿的价格比去年又上扬了许多。

为了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海明威受雇在蓬图瓦兹大街上的一家体育馆里做职业拳击手的陪练。有时候，他也把时间花在和包括哈罗德·洛布在内的一群人打牌赌钱上。同时，他在赛马场上的赌注也在不断提高。尽管他对多斯·帕索斯保证说他在奥特伊尔和隆尚赢了“一大笔钱”，但这种话出自海明威之口，人们难以置信。至于他在牌局上的运气，洛布在回忆中暗示，那是时好时坏。至于他陪练的拳击手们，他们是每打一轮只付给他可怜的10法郎。

在他滥用自己和哈德莉的存款的同时，海明威极有可能一直在进行自我安慰：一旦像《星期六晚邮报》这样稿酬丰厚的杂志开始采用他的小说，他就会立即停止继续使用存款。1924年间，他一共发表了10篇他感到非常自豪的短篇小说。但是，其中没有一篇是在美国的全国性杂志上发表的。有三家小杂志一起发表了他的六篇短篇小说，所付报酬总数是60美元。这三家杂志是《大西洋两岸评论》、《小评论》和厄内斯特·沃尔什与埃塞尔·穆尔黑德的《这一季》。它们的编辑都与海明威相识。另有一篇短篇小说在德国柏林先锋派杂志《横断面》上发表后，为海明威赢得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评价。但是，即便是在这些小杂志的世界里，他也未能获得人们对他的作品的一致支持。以纽约为基地的杂志《日晷》与大多数同类型的高档次刊物不同，它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给投稿者支付较为像样的稿酬。然而，正像它过去曾经拒绝了海明威的诗歌和《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文学随笔一样，它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他的短篇小说。

虽说《星期六晚邮报》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曾使海明威很沮丧，但真正让他发疯的却是《日晷》的退稿。愤怒之中，他大肆贬低《日晷》杂志，把它视为哈佛那帮过分追求美学标准的势利小人手中的玩物。在他看来，斯科菲尔德·塞耶、小詹姆斯·西布利·沃森和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几乎在每一期杂志上都要肃然起敬地提到普鲁斯特；他们还把每年的年度奖颁发给另外一些哈佛毕业的伙伴，像什么T.S.艾略特和范·怀克·布鲁克斯。另一位哈佛学子约翰·多斯·帕索斯在描述这一时期的海明威时说，他“为自己感到遗憾”，而且，“他最为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没有上过这所大学。”这句话如果不加以适度的提炼，难免显得有些不公平。海明威只是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们的面前才有时感到自怜。这些常春藤学校的家伙们似乎相互都认识。他们似乎谁也没有把排斥了海明威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们不仅在自己控制的杂志上排斥海明威，而且在自己举办的宴会上也排斥他。譬如说，1923年6月17日，在巴黎首次公演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的斯特拉温斯基的《婚礼》的同时，一位名叫杰拉尔德·墨菲的富裕花花公子和他的妻子萨拉在塞纳河上的一家驳船饭店里举行了一次盛大舞会。唐·斯图尔特受到了邀请，因为他和墨菲在耶鲁大学时都曾是骷髅队成员。多斯·帕索斯、斯科菲尔德·塞耶和其他的哈佛毕业生们也都受到了邀请。可海明威却没有。

不过，海明威的这种自怜并不意味着他会允许塞耶这样的势利小人可以忽视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而不受惩罚。不久以前，曾经发生过两个文学事件，牵扯到两位文学名人。虽然这两个文学事件发生的地点相距遥远，却为海明威咬牙切齿地向《日晷》报仇提供了材料。第一个事件与1922年《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逝世有关。令海明威大为厌恶的是，这一事件在塞耶那个宝贝的杂志上又引出了一篇谄媚的文章。文章题为《普鲁斯特的纪念碑》，发表在1923年3月号《日晷》杂志上。不难预料，这又是一篇哈佛人的作品。这一回是马尔科姆·考利。第二个事件涉及到埃兹拉·庞德所受到的一次侮辱。数年来，庞德一直是《日晷》驻巴黎的记者和文稿代理人。但塞耶对这项人事安排从来没有感到过完全满意。继他和其他编辑开始连载庞德翻译的雷米·德古尔蒙的某些作品——庞德称之为《麻雀的尘埃》——之后，塞耶的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加深。庞德的译文似乎没完没了，塞耶开始有些不耐烦地称它为《麻雀的狗屎》。塞耶不仅似乎有意地让这个嘲笑传到了庞德那里，而且这位主编随后竟然变本加厉，随随便便就终止了庞德作为该杂志文稿代

理人的身份。在海明威看来，塞耶对他的朋友兼同盟的所作所为纯属哈佛式的专横行为。1924 年秋，海明威在《横断面》上发表了一首诗。他故意模仿一年以前考利纪念普鲁斯特的文章的题目，并且围绕这一题目使用了长长一连串的和狗屎相关的比喻，借以对《日晷》发起反击。

他们说埃兹拉是狗屎。
可埃兹拉却超绝盖世。
让我们为埃兹拉建立起一座丰碑，
一座卓然耸立的碑。
你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座，
你们能否再建一座？
让我来试着再建一座，
让我们大家都来试着再建一座。
让那个角落里的小姑娘试着再建一座。
快来呀，小姑娘，
为了埃兹拉，再建一座。
好极了。
你们都是成功的孩子。
但现在却让我们把这一堆狗屎加以收拾。
《日晷》为普鲁斯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
我们为埃兹拉建起了一座纪念碑。
纪念碑就是纪念碑
毕竟，惟有精神才能永远生辉。

八

当然，狗屎类的排泄物并非海明威最喜欢使用的诋毁性言辞。无论是在大庭广众还是在私下里，每当他感到某些文学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是一种威胁时，严阵以待的海明威最常用的武器还是指责对方断子绝孙、性无能和同性恋。1924 年 5 月 2 日，他以电报式的风格向庞德宣布说：“E.E. 卡明斯已同斯科菲尔德·巴格林·塞耶的第一位妻子结婚。”他还说：“范·怀克·布鲁克斯获《日晷》奖，原因即在此。”因此，他实际上是在暗示，塞耶被妻子抛弃后，只好转向这位他日后为其颁发了 2000 美元奖金的评论家寻求性安慰。在紧接着的另一个段落里，海明威告诉庞德说，吉尔伯特·塞尔迪斯的兄弟乔治（也是一位哈佛毕业生，也是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个女人同他结婚。“让我们希望这个婚姻能够臻于完美吧，”信的作者这样评论道。继这些社交性评论之后，几个星期后的《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海明威的旅行手札。其中他再次设法暗示范·怀克·布鲁克斯并非是个真正的男人。海明威说：“美国每产生一位作家、就会产生 11 位评论家。既然《日晷》奖颁给了一位评论家，可以预期这个比例还会上升到 1:55 以上。由于我从来都把评论家们视为文学里的阉人……算了，没必要说完这句话了。如果这封信能够被发表，那就意味着 150 法郎就足以解脱人们的责任感，无须再遵守强加于高尔夫球和创作性写作的规则了。”

布鲁克斯要么是个同性恋，要么是个被阉过的人。海明威的含沙射影无

非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海明威生性偏执、多疑，特别警觉别人对自己的任何挑衅。他确信布鲁克斯曾经对他作为男人的阳刚之气和作为作家的未来表示过怀疑。布鲁克斯在《日晷》上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是他正在写作当中的评论亨利·詹姆斯的专著里的章节。亨利·詹姆斯在美国进行创作时，曾经创作了《华盛顿广场》和《波士顿人》。布鲁克斯的文章在赞美亨利·詹姆斯在美国的创作的时，也明确地暗示这种赞美不过只是一种铺垫。对这位作家最终以英国社会为其艺术创作园地的举动和其后他在文学才能上所发生的变化，布鲁克斯还将进行尖刻的分析。事后，这种文学上的流言蜚语的确得到了证实。

在布鲁克斯看来，《日晷》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以及日后收录了这些文章的题为《亨利·詹姆斯的历程》的专著的目的是警告 20 年代那些有才能的美国作家。他们选择了在国外居住，可这种选择具有内在的危险性。换句话说，他对詹姆斯的评论就是要直接告诫那些移居海外的年轻美国作家，而海明威也正是这样看待这些评论的。无论如何，按照海明威的解释，布鲁克斯的评论充满性攻击的含义。美国的作家割断了他的美国根，这无异于在冒一种阉割了他的艺术的风险。对此，海明威是勃然大怒。他以性侮辱来还击布鲁克斯的性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海明威对布鲁克斯的猜测仅仅源于他的所读所闻，但他猜测布鲁克斯出了一些毛病也并非毫无道理。如果说他的反击性评论未免有些恣意妄为、昧着良心，但这些评论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恶魔般的聪明。作为一个自己有着许多秘密的人，海明威相信别人也有这些秘密。他正是以维护自身秘密的那种不辞辛劳的精神去挖掘别人的秘密。

布鲁克斯的传记作家詹姆斯·胡普斯曾经写到：《亨利·詹姆斯的历程》是“一本由一个病人写的书”。在躁狂抑郁症的压迫下，布鲁克斯早已精神崩溃，导致他先是多次威胁要自杀，然后又实际上实施过自戕，最终被长期禁闭于精神病院。因此，20 年代初，布鲁克斯就已无可救药地把自己生活中的焦虑与詹姆斯的焦虑混为一谈。（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里，布鲁克斯的神志迷乱终于有一天导致他出现了一种令他恐怖的幻觉：詹姆斯站在他的床头，瞪着两只“又大又亮充满威胁的眼睛”望着他。）这位曾经抨击詹姆斯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的评论家忧心忡忡，惟恐他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把握也在逐渐丧失。更有甚者，布鲁克斯着了魔似地担心自己的性缺陷。“当埃莉诺（布鲁克斯的发妻）与母亲和孩子 4 月份一起回到家时”，传记作家胡普斯讲道：“她发现范·怀克比以往更沮丧，似乎变了个人似地为人‘冷酷、可怖’。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身体上，她都无法接近他。他说他已经阳痿。也许他说得不错，因为阳痿是躁狂抑郁症的一个症状。”胡普斯认为他所讲述的这次遭遇发生在 1926 年春天。但是，很显然，从布鲁克斯患上这种精神病一开始，阳痿的症状就一直在折磨着他。无论如何，从布鲁克斯论述詹姆斯的文章里，海明威嗅出了一丝性焦虑。他对布鲁克斯的报复就是以此为向导的。

九

毕业于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的天之骄子们，即便对海明威表现得非常友好，也同样会得罪海明威。查德·鲍尔斯·史密斯遇到的就是这种命运。

史密斯曾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耶鲁和哈佛法学院的同时代人。后

来，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城，埃德温·阿林顿·鲁滨逊收他为徒，他成了麦克道尔殖民地的一员。20年代初，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奥利夫在法国南部租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他的妻子是亚拉巴马州人，30多岁，当时正处在怀孕初期最艰难的时期。每次到巴黎，他们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参加文学聚会上。1924年初，他们不止一次地邀请他们的新朋友海明威夫妇到他们的家里作客。也正是在他们的房顶下作客时，海明威才意识到史密斯夫妇的关系紧张，而这事又牵扯到他们的一位女友，她显然是爱上了史密斯。但是，海明威对这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却睨而视之。他确信他的男子气比看上去要少得多。基于这种认识，又一篇短篇小说《史密斯夫妇》诞生了。

一位年仅25岁、生活足以自立的哈佛毕业生却同一位病病殃殃的40岁的南方女人结了婚。经过了波士顿的婚礼之后，他们“努力地想生一个孩子”。在前往欧洲的船上，他们做过尝试；在巴黎，他们也做过尝试；当他们在都兰租了一幢别墅后，他们又再次做了尝试。同他们住在一起的一位女友非常喜欢小说中的妻子。在小说的结尾，两个女人开始一起睡在一张“中世纪的大床上”。小说中的丈夫嗜酒成瘾，独自住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晚上，他们一起坐在花园里的梧桐树下共进晚餐。炎热的晚风吹拂，丈夫喝着酒，妻子与女友交谈着，他们“都非常幸福”。

为了强调史密斯夫妇的尴尬处境，也为了确保别人也能够体会到他所亲眼看到的那种不幸，海明威有意加剧了史密斯夫妇之间的婚姻矛盾。在他的笔下，奥利夫和另外一位女性成了情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有所扩大；他还暗示史密斯要么是患了不育症，要么就是性无能。这篇小说完成于1924年的春天。10月（也就是在这个月，奥利夫·史密斯在分娩一对双胞胎时去世），它首次发表在《小评论》上，一年以后又再次发表于《在我们的时代里》。又过了一年之后，查德·史密斯不得不给小说作者写了一封抗议信。可是这封信却只是激起了海明威对他再次进行侮辱。

我亲爱的史密斯：

几个星期以前，我接到了你的来信，但却不想立即回信。我发现你竟然与（我短篇小说里的）人物对号入座，真是太有意思了。希望这能促使你再买上几本这本书。下次我去巴黎时，也一定会很高兴替你或替你的朋友订上几本。

除了结构上的某些不足之处外，你的信似乎也非常有意思地代表着这样一类信，即你写这封信是写给一个你确信已经离开了巴黎的人。我注意到，在无法绝对保证这个前提（即我不在巴黎）的条件下，你是如何在信的结尾部分又带入了一种希望事情有所好转的语气。这样做的良好企图是为了缓和该信的第一部分所造成的危险。你的写作风格有了如此长进，我能祝贺你一下吗？

你对我使用的“可鄙的小虫子”这个词对我来说实乃谬奖。我感觉你一定是一个可以鉴别任何卑鄙事情的权威，而且我不打算反驳你对我的划分。我记得，与你见面时，我对你充满了鄙夷之情。我甚为后悔，因为那是一种廉价的情感，它对于文学创作的确非常不利。我感觉，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不过，实在令我后悔不迭的是，这种鄙夷的感觉一直留连不去。事实上，自从从我听说了你在美国的历险事迹之后，这种感觉更是有增无减。我深信，对你来说，我确实是一个可鄙的小虫子，因为不仅你这样告诉过我，而且我

在你的身旁也自觉非常渺小。因为，对我来说，我亲爱的史密斯，你确实是一位非常可鄙的大人物。

若能与你巴黎再次相见，不胜荣幸。若能把你击倒在地上几回（也许就是一回吧，那得看你有多大的能耐从地上爬起来了），我想那大概或多或少也是一种荣幸，尽管我相信事后我是应该会感到遗憾的。……为了避免你被我上面的某一个段落所蒙蔽，你一定得相信，我亲爱的史密斯，这封信的结尾对你而言只有一种语气，那就是对你，对你的过去、你的现在和将来，还有对你的信所具有的风格，我有一种真诚的和强烈的鄙夷。

崇拜你的朋友

厄内斯特·海明威

于瑞士格什塔德

如果海明威真想在某种程度上安慰史密斯的话，他本可以向史密斯指出，在小说发表之前，他曾主动修改小说和人物的名字，这至少可以给史密斯和他的妻子留一点情面。不过，他作这些修改并非是出于怜悯。相反，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他可能以一块石头同时击中两位诗人。于是，他把小说名从《史密斯夫妇》改成了 Mr.andMrs.Elliot（《艾略特夫妇》）。当然，他没有把这篇小说命名为 Mr.andMrs.Eliot 也同样不是出于怜悯，而是由于他常常无法确切地把握究竟应该怎么拼写 T.S.Eliot（T.S.艾略特）的名字。在通信当中，他偶尔会把这个名字拼写正确，但通常他提到艾略特时总是犯拼写错误的。

倘若不是海明威对 T.S.艾略特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人们本可以争论说海明威崇拜艾略特，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他的诗，而且对文学刊物上有关这些诗的知识背景的讨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在杰西·L.韦斯顿关于圣杯传说的著作《从仪式到传奇》（1920）中，韦斯顿小姐解释了艾略特的《荒原》在构思框架上所依照的蓝本。她指出，在圣杯传说的背后隐藏着古代有关繁殖能力的神话。它的拟人化代表人物是那位性器官曾经遭到残害然而却神奇地恢复了功能的渔夫王。对海明威而言，这一切绝不仅仅只具有一闪即逝的兴趣。在《大双心河》中，我们这位作家把渔夫放在一片“被火烧毁的土地上”。无可置疑，他显然是注意过《荒原》中渔夫坐在一片“贫瘠的平原”边上的描写。海明威还曾特意去读过安德鲁·马弗尔的《献给他害羞的情人》，因为他听说艾略特喜欢这首诗。海明威的马洛式的小说名《在异乡》，与其说是取自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中的片断（艾略特就是在这部作品里找到的这些词），毋宁说是引自艾略特《一个夫人的写照》之前的题词。

海明威憎恨艾略特，是因为这位诗人运用了他的权威，以海明威绝不赞成的方式影响了《大西洋两岸评论》的政策。因此，他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法来惩罚艾略特。在庞德面前，他总是把艾略特称作梅杰·艾略特，“故意把他和梅杰·道格拉斯混淆起来。梅杰·道格拉斯是一位经济学家，埃兹拉对他的见解颇感兴趣。”海明威的讥讽在于，艾略特的所作所为就和道格拉斯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们都是疯子。9月号的《大西洋两岸评论》发表了海明威的《康拉德补遗》。在对这位已故小说家表示赞美的同时，海明威无端地评论说，如果他知道“把艾略特先生碾成细细的干粉，再把干粉撒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康拉德先生的墓上，康拉德先生就会立刻显灵的话”，他就会“明天一大早带着一具香肠馅碾碎机动身前往伦敦”。（此乃十足的死亡与再生的主题。）两个月后，海明威在《横断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添加脚

注的女诗人》的辱骂性作品，其中他不仅耻笑了艾略特在《荒原》中添加脚注的做法，而且还说了其他一些十分龌龊的话，包括断言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是一个“大学里的女色情狂”，萨拉·蒂斯代尔“不能生孩子”，佐蔽·埃金斯是圣路易斯《镜报》出版商威廉·马里恩·里迪的情妇，等等。不过，《艾略特夫妇》才是他对准艾略特的最残酷的一击。

20年代，诗人艾略特的大多数崇拜者在欣赏他的成就时，他们遵循的都是作为批评家的艾略特所制定的批评原则。在他早期最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批评家艾略特宣称：“艺术家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地牺牲自我、不断地泯灭个性的过程。”因此，当艾略特在《荒原》中使用不育和阳痿的意象，描写无聊的淫乱和粗俗的谈论流产的场面，并用这些场面来包裹他对现代的感情已病入膏肓的指责时，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一切看作是诗人和他妻子的某些个人问题的间接表现，尽管艾略特的朋友们早已意识到，与他结婚的那位英国女性维维安·黑格伍德，正像埃兹拉·庞德所总结的那样，是“一个病人，经常性地精神崩溃，需要常常找医生”；尽管艾略特的朋友们早已知道，在写作《荒原》的主体时，艾略特正在洛桑接受治疗，艾略特本人就曾在理查德·奥尔丁顿的面前把自己的病情描述成“一种终生折磨他的意志缺失和感情错乱”。

一直到了80年代，当人们开始在舞台上、在传记中描写和长篇大论地讨论艾略特夫妇的私生活时，许多读者才开始正视这一事实：在《荒原》中并不能完全排除作者个人的感情，在刻画文明的同时，该诗也凸现了诗人个人的痛苦。而海明威却十有八九不会对这些日后的发展感到吃惊。1922年至1924年间，他无疑从庞德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艾略特夫妇的故事。但是，比他听到的这些谣传更为重要的是，在细读《阿波利奈克斯先生》、《冬夜狂想曲》、《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这些诗作时，他那专挑作者毛病的轻蔑的眼神，就如同他在审读范·怀克·布鲁克斯的文章时所培养出来的眼神一样。他的结论是：与查德·鲍尔斯·史密斯一样，艾略特在成人性欲的挑战面前也同样吓得惊惶失措。这种相似性一旦闪过他的心头，他就会转而去利用这种相似性。于是，《史密斯夫妇》摇身一变就成了嘲弄休伯特·艾略特和科妮莉亚·艾略特的小说。

如果说海明威对艾略特所表现的蔑视能够说明这位诗人的某些情况，那么它同样有助于描绘这一时期海明威的生活。综合起来看，20年代中期，海明威对哈佛学人实施的攻击，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妒嫉成性、极端自私自利的作家，同时又像一个争强好胜的运动员一样气势汹汹。他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妨碍他，即便是需要使用暴力威胁或漫骂性的言辞，他也在所不惜。

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对人文主义者（其中之一是欧文·巴比特，他曾是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的攻讦也是以性嘲弄作为其特色。“作为自然主义者，在我的冥思苦想中，我忽然想到，尽管恪守礼仪是一件好事，可如果人类还要繁衍，有些人就必须行为不雅，因为生殖繁育的特定姿势就是不雅的，大大地不雅的。而且，我忽然想到，也许这些人（人文主义者），这些正派得体、同居共存的孩子们，他们同样是如此不雅，或者过去曾经如此不雅。不过，别是怎样开始的，我希望也能看到有那么几个人是怎么。在他们雅巧的小册子已然失去了价值，所有的欲望也已变成了脚注时，我真希望能够推测一下这些可怜的人儿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阳痿期的。老妇人：那句关于欲望的诗行写得真不错。作者：我知道。原话出自安德鲁·马弗尔。我是通过读T.S.艾略特学来的。老妇人：艾略特夫妇二人都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我相信他们是做木材生意的。作者：我叔叔与一个姑娘结了婚。她的父亲是做木材生意的。”

尤其是在攻击别人的性缺陷时，他仿佛是在宣称自己在性能力上无懈可击。其实，选择这一目标，正是由于他对自己也有相同的担忧。如果说海明威常常无缘无由地表现得非常卑劣和邪恶，那正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痛苦的年轻人。

第十一章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更快活”

—

70岁的哈德莉曾经这样回忆说：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只有两次她看到海明威跪在房子里进行祈祷。一次是在她的结婚日；另一次是在1924年3月10日下午，他们夫妇在格兰德肖米埃尔大街圣卢克圣公会教堂为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进行宗教洗礼。那天，勃姆比——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的父母当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穿着格雷丝为他购买的花边衣服和婴儿软鞋。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软克·多尔曼-史密斯也在场。他们向牧师保证，作为孩子的教父教母，他们一定会监督孩子的成长，让他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海明威在一旁却咧着嘴一边大笑一边评论说：他们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是天主教徒。仪式结束后，在海明威夫妇的公寓里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哈德莉把拌了糖的杏仁端了上来，自豪的父亲打开了香槟酒瓶。

1924年5月底之前，婴儿一直都是由哈德莉喂养的。但在一次社交性拜访中，既是医生又是诗人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告诫哈德莉，她的奶水一定是不足了，因为勃姆比的体重达不到标准。威廉斯医生还拨了拨婴儿的包皮，看它是否过紧。这时，勃姆比“自然就哭了起来”。威廉斯医生评论道：“这让他的父母大为恼怒”。从那以后，配制牛奶，煮沸奶嘴，灌装奶瓶就成了田园圣母院大街113号的家常便饭。当他来劲时，海明威会亲自完成这些任务。人们也不是没有听说过他给婴儿换尿布或给婴儿洗澡的事。一天早上，西尔维亚·比奇到海明威家串门。她对海明威护理儿子的技艺颇感吃惊。“作为父亲的海明威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他问我是否认为他将来可以做一个保姆。”有时，他去莎士比亚书店也会带着勃姆比。“他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的儿子，虽说有时候是颠倒了个儿，”西尔维亚回忆说。海明威常常站在书店的中央，读着最新的期刊。

不过，照护勃姆比的任务主要还是落在了他母亲的身上。为了不让勃姆比意在吸引别人注意的哭闹声使他专心致志于写作的父亲分散了精力，哈德莉在天气晴朗时常常推着小车，带着儿子出去一连好几个小时。通常，也是她给他喂食、换洗，将他放在床上小睡。在照看勃姆比特别费力的那些日子里，能够早一点安歇是哈德莉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为了让海明威得到他必须得到的陪伴，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忘却自己的疲惫，不管他是打算呆在家里，是读书，是出外参加聚会，还是去冬季自行车赛场观看自行车比赛。海明威的朋友豪伊·詹金斯曾经劝说他不要同哈德莉离婚。海明威给他写信时特意提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更快活。她的钢琴弹得还是那么好，房子和孩子也照看得有条不紊。她总是做好了出去的准备，在咖啡馆里吃牡蛎，在晚饭前喝上一瓶勃艮第酒。在家里，我们有上好的威士忌酒和一大堆书，还有起居室的盆火。无论是想读书，或是想躺一躺，或是愿意的时候可以出去转一转，真是舒服极了。”正像海明威对所有的妻子所做的那样，他总是不断地鼓励哈德莉：她能够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在她的想象中她可以做的事情。多斯·帕索斯在自传里曾若有所思地评论说，“海明威对他的女人们总是苛刻的。不过，我相信，他是一个高明的建设者，而不是一个低能的破坏者。他离开他的女人们时，总是能让她们比最初相见时更擅长于应付生活。”但是，一大清早三点钟，在冬季自行车赛场的高层看台上，再怎么

鼓励也是没有用的。多斯·帕索斯在看够了赛事时还可以“悄悄溜出去，回到我的住处去”；但“海明威却常常叫可怜的哈德莉在那儿坐上一整夜”。当她困得实在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时，她会蜷缩在长凳上悄然入睡，而她那不知疲倦的丈夫继续热情不减地为他最喜欢的骑手们欢呼。哈德莉嫁给了一个过于年轻、太富朝气的男人。无论她如何竭尽全力去做一个随叫随到的游戏伙伴兼贤妻良母及高效率的好管家，她还是没有办法与他保持相同的节奏。

哈罗德·洛布的伴侣基蒂·坎内尔过去是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她长着一头金发，说起话来直言不讳。看到海明威显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改变妻子的一生，基蒂·坎内尔感到十分愤慨。在拉斯帕伊大道上有一家图卢兹黑人饭庄。哈罗德和基蒂时而同海明威夫妇一起在此就餐。基蒂不可能不注意到，哈德莉原本是一位迷人的女性，可在打扮上却从不迷人。为了说服她更好地照顾自己，基蒂带着她一块儿出去购物，后来还把自己的一些珠宝送给她做礼物。海明威看到这些珠宝时，他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无言地指责他不关心哈德莉的女性爱好，心里顿时涌起敌意。然而这又反过来让基蒂感到满足，因为她给“一位驯服的妻子”做了“一个坏榜样”。海明威随即问自己，在他的家里，基蒂成功地播撒了婚姻不和的种子，他该怎样做才能让基蒂为这小小的成功而后悔呢？

答案是把她丑化为弗朗西斯·克莱因，就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那位长得特别高的姑娘。她说起话来“故作快活”，实际却难受得发疯，因为她的情人正要弃她而去。基蒂后来告诉一位采访者，除了这一刻毒伤人的描写之外，海明威在创作小说时还曾明确地向她保证：尽管这本书会把那个“杂种”洛布撕个粉碎，但他在书中完全没有涉及她。“为了看看我是否相信他（的这种保证），”她说：“他看着我，一副我所说的‘明媚的早晨式的脸庞’——粉色的脸颊，白色的牙齿，脸上一副好似八岁小男孩的奇妙的笑容。它让你感觉到好像给了他一只苹果，或者也许是给了他你的心。”

二

基蒂给海明威的实际上是一只猫。送这个礼物是在她把珠宝送给哈德莉引起了麻烦之后不久，其部分用意也是为了和解。不过，她如此慷慨的主要动机是，这只小猫在起居室的壁炉上把用以装饰的塞夫勒产的瓷瓶推到了壁炉边上，都快要摔光了。把这么一个“妙不可言的坏家伙”送给一个她已经得罪了的男人，基蒂并没有忘记告诫他这是一只喜爱破坏东西的猫。但是，因为海明威和哈德莉两个人都非常喜欢猫，而且她们也没有收藏什么易碎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基蒂的这份礼物。

看着卷毛猫咪先生——海明威给小猫起的名——和卷毛小猫——他时不时地仍然如此称呼哈德莉——在他们的公寓里快乐地玩耍，几个星期后，海明威写就了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位女性和猫之间的亲昵关系。这篇小说原本是一年多以前在拉帕洛构思的。那时候，他与哈德莉之间因为她的怀孕而产生的矛盾在他心中正处在最激烈的阶段。当《雨里的猫》最终写出来后，它主要描写的还是最近在海明威的家中由于基蒂·坎内尔的挑拨而出现的不和。而且，倘若不是有《在密执安北部》和《禁捕季节》这两篇小说作铺垫，《雨里的猫》的视点也许会被人们视为是令人惊骇的。在前两篇小说中，作者已经表现出一种能力：他能够以一种批评的眼光去看待男人对待女人的那种麻木不仁；而在《雨里的猫》中，他再次表现了这种能力。与现实中的他

不同，在小说里他能够承认，指望哈德莉像是他自己单纯的复制品那样去过她自己的生活，他的确是在粗暴地对待她的本性，正像他的母亲干涉了他的生活一样。

小说开始时，一位年轻的美国妇女站在意大利海滨胜地旅馆她的卧室窗前，凝望着窗外不停地飘落的雨。在一张雨水浇淋的绿色桌子下面，她看见一只猫正拼命把身子缩紧，不让雨水淋湿。忽然，她十分冲动地对躺在床上看书的丈夫乔治宣布说：“我要下去捉那只小猫。”然后，她就离开了卧室。但是，即便是在侍女的帮助下，她还是没能找到那只猫。她的失败使她本来就沮丧的情绪更加抑郁。这位妇女闷闷不乐。是因为在她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合她的口味，能够具有足够的女人味。这一点，在她从梳妆台上拿起一面镜子，端详着自己的侧影、后脑勺和脖子时，她表达得非常清楚。她对头发样式所表达的不快尤为突出。

“要是我把头发留起来，你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她问道，又看看自己的侧影。

乔治抬起头来，看她的颈窝，像个男孩子那样，头发剪得很短。

“我喜欢这个样子。”

“我可对它很厌烦了”，她说。“样子像个男孩子，叫我很厌烦了。”

乔治在床上换了个姿势。打从她开始说话到如今，他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她。

“你真漂亮极了”，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天逐渐见黑了。

“我要把我的头发往后扎得又紧又光滑，在后脑勺扎个大结儿，可以让我摸摸”，她说。“我真想要一只小猫来坐在我的膝头上，我一抚摸它，它就喵喵叫起来。”

“是吗？”乔治在床上说。

“我还要用自己的银器来吃饭，我要点上蜡烛。我还要现在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梳头，我要一只小猫，我要几件新衣服。”

“啊，住口，找点东西来看看吧”，乔治说。他又在看书了。

他妻子往窗外望。这会儿，天很黑了，雨仍在打着棕榈树。

“总之，我要一只猫”，她说：“我要一只猫，我现在就要一只猫。要是我不能有长头发，也不能有任何有趣的东西的话，我总可以有只猫吧。”

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侍女站在门廊上，紧抱着一只大玳瑁猫。旅馆的老板吩咐她把这只猫送给这位美国太太。

当她谈到讨厌看上去像个男孩子时，这位妻子指的是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她表现出她想要一只猫，并以此来安慰她那完全没有乐趣的生活时，她那种绝望至极的说话口吻决不会是哈德莉式的口吻。在这一点上，妻子所表达的沮丧感恰恰是小说作者自己的感觉。在把猫送给了海明威几天之后，基蒂·坎内尔发现的就是这种感觉。基蒂·坎内尔后来曾告诉一位采访者，她在一家咖啡馆里碰到过海明威。他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照他的话说，“情绪极为低沉”。他愁眉苦脸地告诉她：“我一生中只有一个安慰。”基蒂原以为他会提到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婴儿，结果却非常吃惊地听到他说“我的猫咪”。在故事的结尾，海明威超越了对一位不安分的妻子的同情心。他借用

了一位女性的面具说出了自己的忧愁。

三

临近 1924 年岁末时，海明威十分惊奇地收到了一封比尔·史密斯的来信。多年来，比尔因为海明威侮辱了自己的兄弟 Y.K.，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但是这股怒火终于平息了下来。现在，他打算恢复和海明威的友谊。在他那封宽宏大量的长长的回信中，海明威先是对“自己在 Y.K. 面前表现得像个反常的蠢驴的冒犯行为”表示了歉意。接着他说，自从他和比尔上次接触以来，他写了不少的东西。在迄今所写的所有作品中，“几乎所有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都是和密执安相关的。他声称，他一直忘不了他和比尔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的家乡，忘不了“我们和姑姑（查尔斯夫人）在农场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我们第一次去布莱克湾和斯特金湾的美好旅行，我们和男人们一起经历过的奇妙岁月，还有秋季的风暴、挖掘土豆和所有的一切”。似乎是为了急于不要让比尔误以为他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意味着他现在生活的不幸，紧接着他便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他的婚姻。他强调说，他和哈德莉“曾经经历过而且现在还在度着美好的时光”。“我们的消遣是拳击、音乐会、斗牛和钓鱼。她钓起鱼来可不像一般的女人们是假装着有兴趣于此道，而是像一个男人。她在拳击上表现出来的颖悟就像她对音乐具有的灵性一样。她可以毫不逊色地同一个人一道喝酒。她把勃姆比这个男孩子喂养得活蹦乱跳，长得又快又壮，身材就像（路易斯·）菲尔波，睡起觉来一睡一晚上，高兴起来就像一条小狗。……哈什（哈德莉）容颜未衰，反而越长越漂亮，把个家管理得就像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一样。”

总而言之，头两年他和哈德莉在欧洲度过了无穷无尽的蜜月，现在这蜜月仍然在顺利地进行。然而，事实的真相却远非如此。正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婴儿的降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1月15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海明威牢骚满腹地在信中告诉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现在天还没亮。勃姆比一晚上没睡，哈德莉和我只好轮流地或一起陪着他。……我想，勃姆比一定又是有一颗新的臼齿快要长出来了。”另外一件让人心烦的事情是，每次海明威想要晚上外出时，他和哈德莉必须首先做好安排，让房东太太——也就是锯木厂老板的太太——肖塔尔夫人每隔一小时左右来看看勃姆比。由于海明威坚决反对带婴儿一起外出旅行，他们在外出时也就不得不花额外的钱雇用玛丽-科科特来照看他们的儿子。

海明威的自由受到了如此的妨碍，这肯定是基蒂·坎内尔那天在咖啡馆里见到他非常抑郁的原因之一。不过，令他情绪消沉的还有另一个更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出于他永远无法揣摩的缘故，他正在失去爱情。他坚持认为，哈德莉的容貌依旧；他甚至声称，她长得越来越漂亮。可是在给比尔·史密斯写那封眉飞色舞的信之前，在两篇有关密执安的短篇小说中，通过尼克·亚当斯他承认，他实际上正在寻找某种方式以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

虽然在《了却一段情》里尼克·亚当斯的女友名叫玛乔丽，但这并不能证明人们普遍的猜测，认为她的原型就是作者在佩托斯基时的红发情人玛乔丽·邦普。玛乔丽喜欢钓鱼；她和尼克不仅仅是情人，而且也是好伙伴；她爱他爱得发狂；等等，等等。这一切特征都可以验证她是哈德莉的化身，一个更年轻的化身。小说的作者想象尼克和玛乔丽在沙滩上生起了一堆火，看着天色渐渐变黑。此时，他实际上是在排演他最终将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上演

的一幕。“今晚会有月亮，”尼克说。“我知道了，”玛乔丽回答道。在事先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尼克忽然指责她。“你什么都知道，”他说。“我什么都教过你了，”他接着说。“现在就没劲儿了。”玛乔丽问道：“爱情也没劲儿了？”“是啊，”尼克说。他双手蒙着头。这句简单的回答暗示出他是感到多么地空虚无聊。玛乔丽没有再作任何进一步的抗议，她划船而去，消逝在夜色中。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尼克的朋友比尔突然出现。他问尼克：“她走的时候还好吗？”这句话说明，这次无情的分手是事先计划好的。由此可见，《了却一段情》以遮遮掩掩的方式表达了海明威对自己的婚姻的感觉，里面还夹杂着少许的一厢情愿。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抛弃的妇女是不会不找任何麻烦就离开的。

在紧接着的一篇小说《三天大风》中，海明威对哈德莉、对他们共同生活的模棱两可的感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两个朋友狂喝滥饮了一阵威士忌酒后，秋天的第一场风暴仍然在他们借以藏身的小屋外继续肆虐。比尔对尼克说：“你非常聪明，威米奇。”“你什么意思？”尼克问。“同玛吉那档子事吹了，”比尔解释说。“要是你没吹，这会儿你就得回家去干活，想法攒足钱结婚。”尼克一言不发，因此比尔就继续醉醺醺地设法安慰他。“男人一旦结婚就彻底完蛋。……他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屁也没有。他玩儿完了。”尼克又一次一言不发。他的空虚感使他已经从简洁化为沉默。只有在他的内心里他才能承认他为此行为付出的代价。

玛乔丽走了，大概他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那才是大事。他跟她谈过他们要一起到意大利去，两个人该有多开心。他们谈过他们一起要去的地方。可如今全过去了。

四

当比尔·伯德告诉海明威他的父母已经把六本《在我们的时代里》退回了三山出版社时，他所采取的报复措施是：他没有把刊登了《印第安人营地》的那一期《大西洋两岸评论》给他们寄去。不过，他没法儿不把刊登着《医生夫妇》的那期杂志寄给他们，因为他非常渴望他们能知道他的这篇作品。他最真诚地希望这篇小说能够赢得他们的赞誉。同时，他也想用这篇作品去刺伤他们，因为他仍然在为他们拒绝了他早期的作品而感到痛苦。

事后证明，海明威医生仅仅认为《医生夫妇》是一篇想象出来的小说，穿插着一些可供辨认的细节，“我已经读了你在12月号《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发表的有关《医生夫妇》的文章”，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知道你特别擅长记忆细节。读着你的文章，我肯定也看到了湖边的那根旧木头。我把那本关于老熊湖（沃伦湖）的书拿了出来，让卡罗尔和莱斯特看尼克·博尔顿和比利·泰布肖在岸边锯那根又大又旧的湖边木头时的照片。那时你才12岁。……亲爱的孩子，希望你能常常给我寄来一些你的作品。”厄内斯特很快回了信。“谢谢你美好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我非常高兴你会喜欢那篇关于医生的小说。……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故乡密执安的小说。故乡总是真实的，但小说中的事情却是虚构的。”不过，尽管小说中的事件是虚构的，它们却把这对非常容易对号入座的夫妇放在了一种维妙维肖但却极不友好的背景之下，特别是那位医生的妻子。

迪克·博尔顿——在小说中，海明威是这样称呼尼克·博尔顿的——是生活在森林里印第安人营地中的一个笨手笨脚的混血儿。遵照亚当斯医生的请求，迪克和两个帮手来到亚当斯夫妇家下面的湖边锯木头。这些木头原本是“魔法”号轮船拖运到湖边锯木厂里去的。一些木头散了开来，漂流到岸边。与现实中的博尔顿不同，小说中的替身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相反，他侮辱了他的雇主，指控他偷盗了这些木头，而且他对医生的称呼也极不礼貌。怒火中烧的亚当斯医生告诉这个混血儿：“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医生，我就敲断你的狗牙，叫你咽下去。”可博尔顿却冷静地回答说：“啊，不，谅你不敢，医生。”此后，亚当斯医生朝着小屋走去，印第安人走掉了。

后来，亚当斯太太叫她的丈夫，问他是否出了什么事。她正躺在床上，房里拉上了百叶窗。床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她的《圣经》，她那本（科学与健康）和《季刊》”。（正像哈德莉的母亲是各种精神信仰疗法的热心人一样，亚当斯太太显然也是一位基督教科学家。）亚当斯医生一边向他的妻子解释说迪克·博尔顿刚刚和他吵了一架，也许是因为“我治好了迪克老婆的肺炎，他欠了我一大笔钱”；一边以擦枪来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把装满了沉甸甸、黄澄澄子弹的弹夹抽了出来，让子弹撒在了卧室的床上。之后，他用一块破布擦了枪，又把子弹推回到子弹夹中去。这一切完成后，他把枪搁在膝盖上默默地坐着，因为“他很喜欢这支枪”。亚当斯太太替博尔顿辩解：“亲爱的，我倒认为，我真地认为，谁也不会真地做出那种事。”当她再次说这种虔诚的话时，亚当斯医生突然站了起来，把枪放在镜台后面的墙角里。他宣布说他想出去走走。亚当斯太太让他告诉年轻的尼克，他的母亲想要见他。医生离开家时，摔手关上了身后的纱门。这个动作概括了他所有的无可奈何的怒火。但是，他还是为此表示了歉意。“对不起”，他在拉上百叶窗的窗户外对妻子说。“没事儿，亲爱的”，她说。亚当斯医生看见尼克背靠着—棵树坐在那儿看书。他告诉儿子他母亲要他去看看她。“我要跟你一起去，”尼克说。“行啊。那就快走吧”，父亲说道。“我知道黑松鼠在哪儿了。爹”，尼克说。“好吧”，父亲说。“咱们就到那儿去吧。”

在美国文学中，逃避女性权威的幻想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主题。为了逃避他凶悍的老婆，瑞普·凡·温克尔走进了山林；哈克·费恩也悄悄地溜进了河里，而不是回到家中去聆听沃森小姐的训斥。但是，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26年5月号《文人》杂志上一篇赞美海明威作品的评论里所指出的那样，《医生夫妇》自有其一种特殊的品质。菲茨杰拉德本人也生长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的父亲总是感到自己身上有某些缺陷，并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所以，当菲茨杰拉德说下面这段话时，他确实是在说心里话。“小说中的羞辱感是非常强烈的，它立刻就能引起读者对往事每一个类似事件的回忆。人们无需借助评论，也无需用人指点，就能精确地知道年轻的尼克在看到那一场面时内心里强烈的情感。”菲茨杰拉德的评论发表后还不到三年，海明威医生就在橡树园的卧室里把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部，从此永远摆脱了他妻子的声音。不管怎么说，海明威正是这样去理解他父亲所作的选择的含义。亚当斯医生和亚当斯太太就是海明威医生和海明威太太。关于亚当斯医生把枪搁在膝盖上，默默地坐在密执安的卧室里，他的妻子严厉地指责他缺少基督教仁慈心肠的描写，以一种让人寒心的方式预示着那场即将降临于海明威家庭的悲剧。

就格雷丝的形象对海明威 1924 年作品的影响而言，对医生太太的十分辛辣的素描并不是唯一的范例。虽然在《大双心河》中海明威没有具体地提到钓鱼人的母亲，但是这篇小说却是以对 1919 年的回忆作为事实根据的。那时，他已从温迪米尔别墅逃到了大福克斯湾和小福克斯湾的岸边。在《士兵之家》中，他更是凭空捏造出了一场母子之间发生在某个战场上的面对面的冲突。通常，这是绝对超乎他的小说想象力范围之外的。在这篇小说中，橡树园被称作“俄克拉荷马的家乡小镇”。

从一开始，《士兵之家》就以主人公哈罗德·克雷布斯的名字表现出了一种感情上的复杂性，因为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分是海明威从他的朋友克雷布斯·弗兰德那儿借用的，而克雷布斯·弗兰德是同一位年纪大得足以作他母亲的女人结了婚。从战场上回到家乡后，年轻的克雷布斯每天早上起得很晚。他步行到图书馆去借书看，练习单簧管，看着姑娘们从身边走过。可是克雷布斯并没有感觉到他需要一个姑娘。他告诉自己说，去结识一个姑娘太费劲儿了。他宁肯阅读一部战争史，或者是和“他最好的妹妹”海伦交谈。她非常喜欢他。

“今天下午我们学校又要赛室内垒球了”，（海伦）说。“我当投手。”

“好啊”，克雷布斯说，“胳膊有劲儿吗？”

“我投得比好多男同学都好。我跟他们都说是你教我的。别的女同学都不怎么样。”

“是吗？”克雷布斯说。

“我跟大家说你是我的男朋友。你不是我的男朋友吗，哈尔？”

“你说呢？”

“难道就因为哥哥就不能是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

“你准知道。哈尔，要是我长大了，你也愿意的话，你能做我的男朋友吗？”

“行。你现在就是我的女朋友了。”

这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克雷布斯太太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与她家中这一对儿女之间的这种近乎乱伦的穿插戏毫不相干。厄内斯特和厄休拉·海明威之间的那种虽说是自然但却过于强烈的相互喜爱绝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的。但是，尽管海明威决心要做到自我理解，他似乎也把这种决心带入了《士兵之家》的创作之中，但他对克雷布斯和他妹妹之间的亲昵关系却只做到了戏剧化，而未能加以解释。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克雷布斯太太的专横所作的描写。站在厨房的门口，她两眼盯着她的儿子在那儿喝一碗燕麦粥。当他把早上的《堪萨斯星报》翻开折了折，靠着水壶竖起来时，她告诫他别把报纸弄脏了。接着，他开始享受两个煎蛋、几片脆炸咸肉和一堆荞麦面饼，可她却搅了他的兴致，追问他是否认为该是考虑考虑打算如何谋生的时候了。

“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克雷布斯说。

“上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妈妈说。“在他的王国里不会有闲人

的。”

“我不在他的王国里。”克雷布斯说。

“我们大家都在他的王国里。”

这一场面令人极为痛苦的结尾是以克雷布斯太太的问题开始的：“你难道不爱你妈妈吗，亲爱的孩子？”克雷布斯生硬的回答：“不爱。”当他母亲开始哭起来时，他又脱口说出了一句更具有概括性的坦白话：“我什么人也不爱。”作出这种可怕的坦白时，海明威第一次表现出了一丝自我理解：他和格雷丝之间永远扯不清道不明的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毁掉他的整个感情生活。然而，虽然克雷布斯知道如果能摆脱他的母亲对他来说具有相当的利害关系，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她个性轨道的拉力。“我不是那个意思，”一看到她的眼泪，他连忙告诉她。“我不是说我不爱你，”他又加了一句。而且，他吻了吻她的头发。这个举动对海明威而言可是充满了感情震荡的。“我是你妈妈”，她说。“你还是个娃娃的时候，我把你贴着心抱着。”她的话使克雷布斯感到“心里不好受，隐隐约约有点恶心”。他们都在餐桌旁跪了下来，但是当叫她祈祷时，他说他做不到。那么他愿意让她为他祈祷吗？她问。他说可以。祈祷结束后，他又一次吻了她。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家时，他对自己说餐厅里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真正地触动他的心，他只是为他的母亲感到难过。他想，也许再经历一次类似的哭笑后，他就会在堪萨斯城找一个工作，他的母亲也就会“安心了”。在即将独立的前景鼓舞之下，小说结尾时克雷布斯满怀着希望。“他愿意生活过得顺顺利利。以前生活过得就是这样。……不过他还要到学校的操场去，去看看海伦玩室内垒球赛。”

《士兵之家》是一篇反映年轻人努力摆脱家庭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把一生对家庭所具有的厌恶和愤怒都填塞了进去。不过，把克雷布斯太太塑造成一个恶魔这种毫不留情、毫无限制的做法说明，小说的作者仍然受着她那位活生生的原型的束缚。只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男人才会看出：她一直竭尽全力想要做一位好母亲，她从没有伤害儿子的意思，而且她同样也被她无法理解的心理冲动抛来抛去。

六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是这样评论他在20年代中期认识的海明威的：“我从未见过哪个男人会像他那样沉入绝望的谷底。”但是，在另一个场合，这位诗人还曾评论说，当海明威不绝望时，也没有谁能比他对生活中充溢着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具有更敏感的意识。

1924年，海明威最幸福的时刻是在他刚刚为《大西洋两岸评论》完成了一大堆的工作之后，他和哈德莉一道启程前往西班牙。马德里是他们的第一站。他们在海明威和麦克阿尔蒙曾经住过的那间斗牛士们常去的膳宿公寓租了一间房。在首都以南20英里的阿兰胡埃斯，他们亲眼目睹了一次壮观的斗牛，其间身体柔软流畅的尼卡诺尔·比利亚尔塔以优美的姿势一连斗垮了六头公牛。从那儿他们向北旅行到了潘普洛纳，去观看圣福明的宗教喜庆节日。这一回，在预定旅馆房间时，他们没有遇到麻烦。

“这是人们可以见到的最他妈的疯狂和有趣的时候”，海明威写信对豪伊·詹金斯说。“城里的每个人都连续一周喝得酩酊大醉；每天早上公牛都

被放了出来，在街道上呼啸而过；人们整夜整夜地跳舞、放烟花，……我们这些家伙实际上成了城里的宾客。”为了增强他的游兴，聚集在他身旁的朋友包括钦克·多尔曼-史密斯、鲍勃·麦克阿尔蒙、唐·斯图尔特、约翰·多斯·帕索斯、比尔·伯德和萨莉·伯德，还有年轻的乔治·奥尼尔。萨莉头一次参观斗牛场时，就被公牛和马匹的痛苦吓坏了，以后再也没有去。而哈德莉这位永远是最好的游戏伙伴不仅每天下午跟在海明威的身旁，而且晚上只睡很少的觉，一大早就爬起来观看她的丈夫参加自由赛。在自由赛中，业余爱好者可以现场同三到四头小公牛进行角逐，小公牛的角被包了起来，以免严重地伤害人。海明威一连五天早上都参加了自由赛。进入赛场后，他一边挥舞着一领红色的披风挑逗着一头公牛，一边大声喊着：“嘿，来呀，公牛！”当牛就要一头撞在他身上时，海明威就会抓住它的角，扭歪它的脖子，把它压到地上去。

虽然他不断地向唐·斯图尔特提出挑战，要他也加入到这种角斗中去，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幽默大师却感觉到公牛并不是特别小。因此，每天早上，他都在斗牛场的边上可怜地转来荡去，希望海明威会全神贯注地去显示自己的勇气，那样他就会忘掉他这位犹豫不决的朋友。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最终还是让斯图尔特自己下定了决心。一头公牛低着头朝一位正在挑逗它的潘普洛纳年轻人猛冲过去。在最后关头，那年轻人越过看台底部的栏杆，朝着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跑去，但公牛却连蹦带跳地紧追不舍。那年轻人和各式各样的旁观者，包括多斯·帕索斯，连忙跌跌撞撞地向上翻过几排座位，退出了危险地带，但斯图尔特不知为何却跳进了赛场。有两个年轻人似乎是急于要向他表示他们对美国赢得了美西战争并不记仇，把一领披风塞到了他的手里，领着他越过沙地，来到了另一头公牛的面前。数百观众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斯图尔特努力想优雅地挥动披风哄骗猛冲而来的公牛，可惜的是，“公牛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转动”，斯图尔特后来在自传《逢凶化吉！》中回忆说。“我被一头撞了个满怀，”他后悔不迭地说道。

我的眼镜朝这一边飞去，披风朝另一边飞去，我被抛向空中，观众发出了一阵高兴的叫喊。不过，当我落在地面时，奇迹发生了。我已经完全不再害怕。而且不仅如此，我简直是疯了。我抓起披风，朝着我的敌人追过去。追上后，我再一次把披风举在我的面前，狂叫着“来呀，你这愚蠢的婊子养的！”公牛……再一次成功地把我的披风抛向空中，然后奔跑开去。……厄内斯特拍拍我的背，我感到仿佛我已赢得了一次触地得分。离开赛场后，我发现有几根肋骨骨折，但这并没有搅扰最后一夜的狂饮滥舞。那是个人怀念的一个星期，是男人的节日，是一次光荣的大学同学聚会。

其他关于斯图尔特短暂的斗牛士生涯的叙述大体上也证实了斯图尔特自己的回忆。只有一个情况例外。7月29日，芝加哥《论坛报》以“公牛撞伤两位扬基斗牛士”作为其封面标题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以扣人心弦的方式讲述到：海明威最近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与死亡发生了冲突。当他在赛场上救援他的朋友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免遭伤害时，一头公牛撞伤了他。发布这一消息的报道者听起来好像是真地亲眼目睹了海明威的英雄壮举，但他当时十有八九是在另一个国家里。因为，从报道的日期中可以推断出，海明威从西班牙回来后，对芝加哥《论坛报》巴黎报社的某个熟人曾经讲过这

个故事。无论如何，正是以这则消息作为起点，公众开始意识到男子汉海明威的存在。当然，早在五年前，纽约《太阳报》就曾宣称海明威中尉比任何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遭受过更多的磨难。芝加哥的《美国人报》随后也附和了这一判断，它说海明威中尉是“美国中弹最多的人”。从那以后，作为记者，海明威在为多伦多《明星周报》创作小说时也给自己塞进去了许多广告。但是，一直到了芝加哥《论坛报》的文章发表后，新闻界才开始比较正式地吹捧他。

单是海明威从潘普洛纳的故事中捞到的好处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26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文学专栏作家把唐·斯图尔特的光荣负伤转移到了海明威身上。它断言后者曾经因为“一头恼羞成怒的公牛”而断了三根肋骨。1927年，伯顿·拉斯科又给《艺术与装饰》杂志的读者带去了一则轶闻：他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那儿听说，海明威在潘普洛纳把约翰·多斯·帕索斯从公牛的伤害中戏剧化地救了出来。正当那只把他抛向空中的公牛准备用尖矛一样的牛角去刺穿躺在地上的多斯·帕索斯时——福特显然没有对拉斯科说在自由赛中牛角是包着的——海明威抓住了牛的脖子，把多斯·帕索斯拖走了。还是在1927年，《时代》周刊在评论《没有女人的男人》时声明：“作者海明威曾是学校里的足球明星和拳击手。战争中，他在意大利的救护队里服役，几乎是它最年轻的成员，并受了重伤。停战后，他一直住在巴黎。每年春天他都要前往潘普洛纳观看斗牛比赛。有一次，他亲自进入了赛场，一头公牛撞断了他几根肋骨。”1928年，《文人》上有一位作家宣称海明威不仅是“一位半职业化的拳击手”和“滑雪专家”，而且还是“一位业余的斗牛士”。

由于这些报道，海明威开始不仅被公众视为战争英雄，而且被视为体育英雄。这种见解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因为在随后出现的20年代的大众文化中，具有最高才能的运动员，他们的形象非常高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来说，巴比·鲁斯、雷德·格兰奇、博比·琼斯、比尔·蒂尔顿、杰克·登普西都是些家喻户晓的名字。按照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话说，海明威有一个“高大健壮的身材”保佑，自然就看上去好像也是一位体育明星，而他对自己勇猛无畏的详尽的描述更是加强了那种印象。在拳击场上，他把这种印象和萨姆·兰福德与哈里·格里布的形象混淆起来；他成了橡树园高中令人敬畏的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和中流砥柱；作为滑雪者，他实际上是个专业运动员；而在潘普洛纳的赛场上他有勇气和力量去与一头即将刺穿唐·斯图尔特或者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危险的公牛进行搏斗。所有这一切吹吹捧捧的气球都吹满了热气和大话，可就是没有人操心费事地去刺破它们。在为体育而发疯的20年代，海明威发现他可以指望新闻界去重复和夸大他对每一种体育威望的要求。

海明威对他可以毫无代价地以任何方式操纵大众传播机器的自信心是惊人的。但遗憾的是，这种自信心是一种最终会导致他毁灭的狂妄自大。他的作品很快就会成为诠释的对象，可他却并没有在意这些诠释。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会感觉到不得不去以一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的方式生活，以保持这种形象的可信度。从30年代初起，公众注意力的无情聚焦和人群没完没了的喧闹，将会妨碍到他自由的创作和想象。

第十二章 哈罗德与霍勒斯、斯科特与泽尔达

—

潘普洛纳的宗教节日结束后，海明威夫妇乘坐一辆满载着巴斯克农民的长途汽车前往位于龙塞瓦列斯古老寺院附近比利牛斯山脉高处的布尔格特城。从那儿他们徒步远行，穿过了大片的原始山毛榉森林，来到了伊拉蒂河冰冷的源头。这是海明威所见过的“最原始的乡野”。他后来告诉豪伊·詹金斯：“甚至连骡子也在崎岖的小路上被弄得晕头转向。”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和伯德夫妇与他们一起艰难地跋涉。扎下营地后过了一两天，多斯·帕索斯、钦克·多尔曼-史密斯和乔治·奥尼尔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在他们第一次出外钓鱼期间，哈德莉的收获超过了所有男人。不到半小时，她就从瀑布下的池子里钓出了六条鳟鱼。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她的功劳算到了杰克·巴恩斯的头上。

多斯·帕索斯、麦克阿尔蒙、多尔曼—史密斯和乔治·奥尼尔另外还打算花两周时间步行去安道尔旅行。他们最终要出发时，海明威突然决定要和他们一道去，这让包括哈德莉在内的每个人都大吃了一惊。但是，令哈德莉万分宽慰的是，夜幕降临时分，海明威又回到了营地。他解释说，同妻子呆在一起，是他的职责。他说的也许是实话，但多斯·帕索斯的传记作家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却暗示他的动机或许是出于更为自私的考虑。“与多斯·帕索斯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徒步远足旅行者”。因为，多斯·帕索斯的父亲，老约翰·R·多斯·帕索斯，是一位生机勃勃、志得意满、性欲旺盛的公司律师。他常常以一种类似自我惩罚的急行军的速度远足步行，以此来保持他那矮小而勇猛的斗鸡一般的身材能够匀称。孩提时，他的儿子是一个绝对没有运动员气质的豆芽菜。但是，一个私生子要使自己在父亲的眼里合法化的梦想激励着他去摹仿老多斯·帕索斯作为一个徒步旅行者的丰功伟绩。如果海明威同多斯·帕索斯一起去爬比利牛斯山脉的更高处，那么也许在远足旅行结束之前，他就会被迫放弃旅行。经过了六天的水泡和急行军速度的折磨之后，麦克阿尔蒙就被迫选择了这样的结局。而回到哈德莉身旁，海明威就摆脱了他在文学对手面前丢面子的危险。

二

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海明威发表的东西还太少，尚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但是，另一方面，1924年他工作得十分勤奋，到9月份时已经储备了九篇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地》、《大双心河》、《医生夫妇》、《了却一段情》、《三天大风》、《士兵之家》、《艾略特夫妇》、《雨中的猫》和《越野滑雪》。把这些小说和联络出版公司已经出版了的三篇短篇小说《在密执安北部》、《禁捕季节》、《我的老头儿》合并起来，然后再把比尔·伯德已经出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文学随笔穿插编排进去，他相信，他现在手上终于有了一部书稿，足以引起美国一家出版商的注意力了。

这些小说与个人的内心生活息息相关，浸透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而文学随笔所表现的事件都取材于两个大陆的经历，描写了肉体所经历过的暴力。合起来，它们构成了一部真实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正如海明威10月份对埃德蒙·威尔逊所作的解释，他想“在仔细地检查细节之前描画出一部全景图，

就像你先用眼睛去看某样东西，譬如说一段海岸线，然后你再用 15 倍的望远镜去观察它。或者也许可以这样说，你先看着它，然后再走进去，在它里面生活；然后再走出来，再一次看着它。”为了使小说与随笔交替出现的部分能够发挥恰当的作用，他把关于美国伤员在意大利北部与一位水性扬花的护士相爱的随笔和关于匈牙利革命者的随笔就视为仿佛是短篇小说一样。

这部选辑质量极高，编排极具艺术性。然而，正像他很难用这部选辑里的作品去打动美国的杂志一样，他在劝说任何一家美国出版商接受《我们的时代》时几乎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临近 9 月底时，他给在纽约耶鲁俱乐部的唐·斯图尔特寄去了一本书稿，因为斯图尔特曾经说过他愿意帮助海明威。这位幽默作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这部书稿交给他自己的出版商乔治·多兰。但是，搁在手上过了三个月之后，多兰拒绝了这本书，还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抱歉的话。受到挫折的海明威在 1 月 5 日给哈罗德·洛布写了一封骂骂咧咧、读来稍稍有些没有条理的信。他评论说：

多兰先生感到，在一部短篇小说集里，他们没法在性的问题上总是和我保持一致，因为多兰先生不喜欢“在一系列的惊愕之中又加上一个惊愕”；还有什么类似的屁话：虽然在一部小说中他可以总是和我保持一致，假如他们给我写信提此建议的话，那么也许可以把这些短篇小说暂时搁置起来，作为第二卷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不过，他们都同意我的东西很有吸引力，真是一本好书呀，只是他们不想出版。唐说，这都是胡说八道，他们就是不想领头出版短篇小说的书，管它是好还是坏。所以他已把书给了门肯（H.L. 门肯）那个狗东西，让他推荐给（阿尔弗雷德·）克诺夫。

斯图尔特的推想是：门肯既然曾经坚决地捍卫过西奥多·德莱塞小说中坦率的性描写，那么，他也应该同情海明威的性描写。尽管海明威也热切地希望斯图尔特的推论是正确的，可是他从一开始还是坚信斯图尔特肯定是错了。门肯对侨居巴黎的美国人从来就是除了嘲讽的评论之外还是嘲讽的评论。更何况这位巴尔的摩人对文学再也没有兴趣了。1924 年，他和乔治·让·内森在阿尔弗雷德·克诺夫的支持下创建了《美国信使》，其主要意图是为了促进门肯作为一个社会评论家的生涯。当门肯甚至懒得将《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告诉克诺夫一声，从而最终证实了海明威的悲观预测时，我们这位恼羞成怒的作者心里记了仇。后来，当他无意中得知门肯对《在我们的时代里》的简短评论时，他再次记下了对门肯的仇恨。门肯说：“都是些信奉无神论的年轻记者们写的那种大胆和无耻的东西。连耶稣基督也变得下流卑贱。两个人敞胸露肚，一种软绵绵的肉欲之爱。还这么堂而皇之地印刷在里维斯斯手工制作的印刷纸上，由埃兹拉·庞德认可出版，一版的印数仅仅限制在 170 本。”对此，海明威发誓，他会让门肯为他的不屑之词而后悔的。

与此同时，哈罗德·洛布也和唐·斯图尔特一样在竭尽全力帮助海明威。1924 年初秋，当他得知他的网球伙伴有一部书稿想要出版时，洛布认为，如果最近刚刚同意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小摆设》的那家博尼—利夫莱特公司

《在我们的时代里》（inourtime）和《我们的时代》（InOurTime）这两本书的书名在英文里仅有大小写的区别，旧译皆为《在我们的时代里》并作注予以分辨，较为罗嗦。为方便辨认和记忆，本译著特在译名上加以区别，特此说明。——译者注

能够同时出版《我们的时代》，那就太妙了。该公司的欧洲代理商利昂·弗莱施曼正好带着一份需要洛布签署的合同回到了巴黎。与他会面时，洛布问他是否能够找个晚上带着海明威一起去香榭丽舍大街旁弗莱施曼豪华的公寓拜访。也许是弗莱施曼昂贵的天鹅绒吸烟衫，也许是弗莱施曼那令他不快的自鸣得意的劲头，反正这位代理商一出来和他们打招呼，海明威的情绪立刻就变得阴郁起来。在洛布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试图使谈话进行下去的同时，海明威却坐在那儿闷头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弗莱施曼最后转身对他说，他听到了一些人对他的小说的好评，愿意读一下他的小说。如果他的印象不错的話，他将把书稿寄给纽约的霍勒斯·利夫莱特。从这些话里，海明威听出了弗莱施曼纡尊降贵施以恩惠的口吻。过了一会儿，在他和洛布走下楼梯进入大街时，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他破口大骂，弗莱施曼是一个卑鄙的犹太佬。他或许忽略了——或者相反，他可能还记得？——洛布本人也是个犹太人。

一旦平静下来，他的野心又占了上风。他及时地送了一份书稿给那位代理商，却发现弗莱施曼并不比乔治·多兰更急于下决心。结果，第二股怒火又涌上他的心头，接着却被沮丧压了下来。在他看来，他的头两本书得到的尽是些愚蠢的评论，这更加剧了他的愤怒和沮丧。在多伦多时，他曾一时悲愤难忍，在一封写给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的信中提到了自杀的话题。这一回，在一封写给埃兹拉·庞德的信中，通过谈论最近美国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弗兰克·布兰德基的死亡悲剧，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一话题。不过，他把这种含蓄的对援助的呼喊声掩盖到了他自诩生活越来越光明的吹嘘之下。“你是否看到了在参议员布兰德基自杀后，人们发现在他的嘴里含着一根煤气管？我还是要说，只要想做，谁都可以做到。不过，事情看起来正有所好转。我想我一段时间内是不会证实我的这个理论的。”

为了克服他自己的紧张情绪，他将全副身心投入到一篇小说的创作之中。就他自己对这些紧张情绪的理解而言，这篇小说象征性地探讨它们的起因。11月底，经过两个星期的工作，他最终完成了《没有被斗败的人》。除了攻击类似伯顿·拉斯科这样的评论家——他曾居高临下地宣称《三篇故事与十首诗》尽是些对林·拉德纳和舍伍德·安德森的重复——之外，海明威也许还借题发泄了他对埃德蒙·威尔逊的余怒。

从某些方面讲，威尔逊在《日晷》上对他头两部作品的评论可以说是任何作者都希望得到的那种赞美之词。关于《在我们的时代里》，威尔逊曾说：“我倾向于认为，在迄今美国作家所写的所有有关战争时期的作品里，这本小书具有最多的艺术尊严。”他还称赞海明威的才能“极富于首创性”，并说他的散文是“第一流的”。对这些评论，海明威异常感激。在他10月份写给威尔逊的信中，他告诉威尔逊，他认为他的评论是“冷静、清醒、正派、公平和富有同情心的。……在本书受人评论时，您是我唯一觉得值得一读的一位写作评论文章的评论家，也是唯一我曾经读过和有一些了解的评论家”。然而另一方面，威尔逊曾经说过《在密执安北部》本来可以成为一篇杰作，但却失败了，因为它有一种“奇怪的缺陷：它一方面描写粗鲁的和原始的人们，但同时又让他们显得相当模糊”。脸皮薄的海明威要是不对这一评论生气，那也就不是海明威了。同时，威尔逊坚持认为他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都曾受到过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教诲，这一点也一定令海明威愤愤不平。威尔逊断言说：海明威先生

必须被视为是除了一个作家——舍伍德·安德森——之外唯一感受过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女人的一生》的才华并且明显受其影响的美国作家。的确，斯泰因小姐、安德森先生和海明威先生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自成一派。这个流派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质朴无华，常常流于所描写的人物的语言不避俚俗，因而实际上起到了传达深刻的情感和复杂的心态的作用。与美国作家在遵循英文散文的传统风格时所取得的较出色的成就相比，这标志着美国在散文上与众不同的发展。犹如一束晶莹的光柱射入深深的水中，它在艺术上证明自己已然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

这种赞美可谓热情洋溢，但它毕竟不是慷慨地专门给予海明威一个人的。

在《没有被斗败的人》里隐含着海明威的信念：斗牛士就像作家一样，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也同样必须听由无所不知的评论家们的摆布。这篇小说写的是上了年纪的曼努埃尔·“马诺洛”·加西亚在赛场上试图东山再起的英雄壮举，其中穿插引用了一系列由《先驱报》后备斗牛评论员在赛场边记录下的笔记。“老将马诺洛设计了一组观众喜爱的绝招，并以酷似贝尔蒙特的风格作为结束，”评论员写道。这正像兜售名人与权势效应的记者们曾经用他的前辈来比喻谈论海明威的作品一样。

早在晚间赛事结束以前，评论员就离开了。因此，他没能看到斗牛士挥舞披风最优美的时刻，没能看到他在试图杀死公牛时剑却不幸地扎到了骨头，没能看到观众对他投掷坐垫和空酒瓶时他所受到的屈辱，也没能看到他在完成表演之前拒绝接受别人为他治疗疼痛的伤口时的情景。所有在1924年秋天的日月里咬噬着海明威的愤怒、挫折和失败感，还有他不顾评论家或出版商怎么样评论他的作品他都必须做一个成功作家的坚定决心，这一切都融入了《没有被斗败的人》。照他所见，这是他当时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而且总有一天。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会同意他的见解。斗牛士们不仅仅像作家一样，马诺洛还是人类的典范。在万物存在的世界中，人这种动物只有在面对选择的自由这种重负时，只有在拥抱早晚总有一天他会死亡的意识而又绝对不让这种意识摧垮自己的意志时，才能真正获得“真实感”。

《日晷》和《星期六晚邮报》先后都立刻拒绝了这篇小说。海明威不得不再次面向欧洲的小杂志寻求文学上的承认。《没有被斗败的人》最初是以德译文在《横断面》上发表的。1925年秋末，埃塞尔·穆尔黑德和厄内斯特·沃尔什最终用英文在《这一季》上发表了它。

三

—美国画家伯特伦·哈特曼是海明威夫妇的朋友。在他的催促下，海明威夫妇把冬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奥地利的施伦斯小城，同伯特伦·哈特曼一起住在陶伯旅馆里。由于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每天每人的膳宿费不过才合1.25个美元，而旅馆街对面的一位可爱的年轻妇女也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比巴黎低得多的保姆费用，为海明威夫妇照看勃姆比。在施伦斯的生活只有一件事不大顺心，那就是那年的雪姗姗来迟。不过，海明威每天都和哈特曼一起在陶伯旅馆的保龄球场上玩保龄球，与哈德莉一道到山里去进行有趣的散步。圣诞节过后第四天，他向哈罗德·洛布报告说，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能看见“漂亮的小酒馆，那上面雕有耶稣基督正在接受惩罚的十字架，里

面坐满了身着羚羊皮的猎手”。

海明威从施伦斯也给西尔维亚·比奇、格特鲁德·斯泰因、艾丽斯·托克雷斯、豪伊·詹金斯和其他朋友们寄去了信或明信片，但他似乎最怀念、写信写得最多的还是洛布。他对洛布使用的是一种看似侮辱实则往往表现了友情的称呼。他警告他“如果你不来（拜访我们），那你就不仅是个下流的婊子养的，而且是个无知小人。到这儿来可谓易如反掌，因为所有的海关手续等等都可以在火车上办理，你只需要在布克斯下车，越过铁轨，换一点零钱，买一张到布卢登茨的票就成了”。当洛布回信说他即将乘船去纽约以便和博尼—利夫莱特出版公司的编辑谈谈他的小说出版事宜时，海明威大为扫兴。“这事可真是倒霉透了”，他回信说。“今天早上，听说你不能来，我们都悲哀极了。本来我们是可痛痛快快大玩一场的。”不过，每当回忆起此事时，海明威都承认幸亏洛布没有到施伦斯来。因为，回到纽约后，洛布就可以联合作者的其他朋友一起努力，并最终成功地为《我们的时代》找到了一家出版商。

试图通过门肯说服克诺夫的努力显然失败后，唐·斯图尔特立刻就把他手中的书稿送给了霍勒斯·利夫莱特。结果证明，由于里昂·弗莱施曼的拖拖拉拉，霍勒斯·利夫莱特对此事尚一无所知。洛布到达纽约后，他也对利夫莱特谈起了《我们的时代》，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等人也都提到了此书。大家共同的认可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促使霍勒斯·利夫莱特坐了下来，开始认真注意起这本书。

利夫莱特生来就是一个赌徒。早年他告别了华尔街上欣欣向荣的经纪人业务，与格林威治村的激进派艾伯特·博尼一起进入了出版界。多年来，他一向以敢于冒风险而令出版业为之震惊，其中最大的一次风险是他轻蔑地拒绝了约翰·S.萨默的恫吓。作为半官方的纽约“不道德行为查禁会”的首脑，萨默同他的前任安东尼·康斯托克一样不苟言笑、极端拘谨。1915年，按照门肯在描写他们的行为时所说的话，萨默和他的宠臣们一起“就像是主日学校的男孩子在《旧约》中十分勤奋地发掘带有污点的珍珠那样”把德莱塞的《天才》仔仔细细地通读了一遍。在宣判该书是不道德的作品之后，他们成功地胁迫约翰·莱恩公司收回了该书在美国的销售权。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20年代初，直到利夫莱特出版了该书的未经删改的版本。这种胆大妄为的近乎对抗的行为把这个出版商带到了奥尔巴尼的州议会大厦。在那里，他四处游说疏通，反对萨默支持的一项名叫净化图书法案的议案。该议案在州众议院已经获得通过，在州参议院通过似乎也已成定局。但是，在热情似火的参议员詹姆斯·J.沃克那句不朽的妙语名言的帮助下，该议案以微弱的劣势未获通过。参议员当时说：“我不知道曾有那位年轻的女士因为一本书而断送了自己。”

既然是严厉查禁文艺作品的反对者，在斗争中获胜的利夫莱特在海明威的书稿里自然也就不会找到太多的令他倾向于反对的东西。《艾略特夫妇》中有一段使他觉得过于淫秽；《在密执安北部》也被他全部勾掉，因为在表现性交的痛苦时它显得太直露。但是书中其他的东西他都喜欢，而且他通知斯图尔特和洛布，他准备出版该书。两位作家立即把这个好消息电传到了奥地利。

他们的电报到达陶伯旅馆的那天晚上，海明威正在麦德兰尔别墅着迷地玩扑克。那是在附近海拔2000米的山腰上建筑起来的一座具有阿尔卑斯山建

筑风格的棚屋。到第二天早上电报送达棚屋时，海明威已经在当地滑雪学校校长瓦尔特·伦特的陪同下到弗蒙特冰川五英里的冰冻斜坡上去尝试由上至下一泄而下的滑雪去了。一阵暴风雪使他们想爬上1200英尺高的冰川顶峰变得异常困难。（几个星期后，海明威在给洛布的一封信中不乏想象地回忆说：“天哪，那真是冷。我的生殖器，也就是阴茎、鸡巴、阳物或穿洞器都要或是快要冻僵了，不得不用雪去搓。”）直到黄昏时，两个滑雪者才又重新出现在麦德兰尔别墅里。海明威对电报的第一个反应是斯图尔特和洛布一定是在开玩笑。但是，一旦确定了他们的消息确实是真实可靠的后，他变得非常激动。尽管他已精疲力竭，那天晚上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在陶伯旅馆，利夫莱特发来的证实电报也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封信。劲头倍增的作家立刻毫不耽搁地干了起来。他要写一篇关于职业拳击手的小说，希望能够以此填补由于《在密执安北部》被查禁而导致的空白。2月13日，经过一整夜的修改，他用打字机打出了一份《拳击家》的样稿，准备寄给纽约。在稍后寄给利夫莱特的信中，他对他讲了自己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新的小说会使这本书看上去更棒。它几乎是我写过的最好的小说，使整本书有了一种额外的统一性。”他或许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这篇小说具有一种反复出现的梦幻的性质。

在密执安州曼瑟洛纳镇附近的铁轨旁，少年尼克·亚当斯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去揉揉眼睛上肿起来的大疙瘩，那是眼前刚刚拐过弯去已经消逝的货车上“那个混帐小子扳闸工”的杰作。现在，已经没办法再坐货车去曼瑟洛纳了。尼克只好步行。树林边的一个火堆吸引了这个男孩子的注意力，他决定过去瞧瞧。有个人坐在火堆前，双手捧着脑袋。他的名叫亚德·弗朗西斯，是一位痴痴呆呆、自认是疯子的前拳击赛冠军。从拳击手变了相的大花脸上，尼克可以看出他的头上到处都曾受到痛打。“他的鼻子是塌下去的，眼睛成了两条细缝，两片嘴唇奇形怪状。”更让人恶心的是，他只有一只耳朵，“牢牢地贴在脑袋半边。另一只耳朵只剩下个耳根”。

从夜色中走来了一个嗓音柔和、疯疯癫癫的黑人，名叫伯格。伯格和伯格初次见面时，他俩都在监狱里服刑。释放后，两人一起在国内四处旅行。就像黑鬼吉姆对待哈克·费恩那样，伯格似母亲般地照护着亚德，为他烹调美味的煎火腿鸡蛋三明治，时时处处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弗朗西斯先生。不过，这位体贴入微的黑人也是一个施虐狂。他带着的那根用破旧黑皮包裹着把柄的棍子就是一个无声的证明。身兼主人和奴隶、摧毁者和看护者的双重身份，这位黑人是海明威塑造的另一个凶狠母亲的形象。因此，当亚德无缘无故对尼克大发雷霆并要诉诸武力时，伯格用不着和他这位偏执多疑的伙伴理论一番，他干脆用棍子照着他的后脑勺敲一下就成了。

当不省人事的拳击家躺在火堆旁重重地呼吸时，伯格回答了尼克那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他怎么会发疯的？”黑人回答说：“一则，他挨打的次数太多啦。”接着，他又加上了一句，以便从根本上限制这个回答：“不过挨打只是使他变得头脑有些简单罢了。”他那更深思熟虑的见解是：亚德是被他个人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逼疯的。“他妹妹是他的经纪人”，黑人解释说。“人家在报纸上老是登载什么哥哥啊妹妹啊这一套，还有她多爱她哥哥啊，他多爱他妹妹啊什么的，后来他们就在纽约结了婚，这下子就惹出不少麻烦来了。……其实，他们哪里是什么兄妹啊，根本没影的事，可是就有不少人横竖都看不顺眼，他们开始嘀嘀咕咕，有一天，她就此出走，一去不回了。”

黑人咽下了一些热咖啡，抹抹嘴，阴沉沉地说：“他就这样疯了。”

过了一会儿，伯格继续说：要不是亚德的脸给揍扁了，他本来不是一个难看的人，至于他的妻子，“她是个很好看的女人。看上去简直跟他像双胞胎。”出于某种原因，伯格故意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有趣的事实。“看上去简直跟他像双胞胎。”忽然，伯格叫亚当斯趁早离开。显而易见，关于拳击家，他不愿意再告诉尼克什么了。尼克离开火堆向外走去时，他意识到伯格已经把他侍候的那个“小人儿”（在睡觉时，他那张被打得变了相的脸“看上去就像孩子似的”）给弄醒了。亚德像个小婴儿似地哼哼唧唧地哀诉着他的头好疼。“弗朗西斯先生，回头就会好的。”尼克听见拳击家的那位母亲一般的保姆正在劝慰他。“你只消喝上这么一杯热咖啡就好了。”

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的所有小说中，从传记的角度讲，梦幻一般的《拳击家》是最有争议性的。海明威写作这篇小说是在听说利夫莱特准备出版他的书稿的背景下。他终于有理由相信自己正在向世界文学的冠军地位挺进。但是，是他的激动不掺任何杂质呢？抑或是这种激动伴随着一种胡思乱想的担忧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这篇小说具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尼克·亚当斯被打得鼻青脸肿，前额肿起了一个包。他的姓氏的第一个音节也是Ad（亚德）。从眼前这幅可怕景象，在这位头部被打得稀烂、痴痴呆呆的前拳击赛冠军身上，仿佛就孕育着这位年轻人的未来。“他说他从没发过疯”，亚德对伯格这样介绍尼克。“他还要经历好多事呢，”黑人回答道。50年代末，在他的朋友A.E.霍奇勒的面前，海明威将会对这些不吉利的话表现出一种让人惊奇的敏感，就好像他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应了验的预言一样。

亚德和他那位似像非像的双胞胎妻子兼经纪人的婚姻破裂也让人们对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伯格所讲的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已经说明，他们之间致命的分歧源于别人给他们造成的不愉快。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兄妹，或只是别人的谣传，别人反正就是不乐意他们在一起。在讲述这样一个关于失败婚姻的奇怪故事时，海明威或许也表达了他自己对哈德莉，对她在他们的关系中所扮演的那种模糊的姐姐—妻子—母亲—经纪人的角色的不满。或者也有可能，在想象亚德同一位看上去简直跟他像双胞胎的“很好看的女人”的婚姻时，海明威是在戏弄一种长久以来一直压抑在他心中的有关他和马塞利娜——那位他自称是非常鄙夷的漂亮的“双胞胎”妹妹——的幻觉？

四

海明威从施伦斯给利夫莱特发去了“欣然接受”的电报。然而回到巴黎后他却发现，如果他能稍稍晚一点表态的话，他本来可以与另一家更有名气的公司签订出书合同。因为，在西尔维亚·比奇为他保存的一堆信件中，有一封来自菲茨杰拉德在斯克里布纳公司的编辑马克斯·珀金斯。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在出版界享有盛名。它的成就不仅仅包括不朽的纽约版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和故事、高尔斯华绥的《福尔塞世家》、伊迪丝·沃顿的作品，而且还有由20年代初的天之骄子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创作的几部书籍。马克斯·珀金斯在信中说，他听约翰·皮尔·毕晓普说海明威已经完成了一本新书。“我希望这消息确实，也希望我们能看看这书”，珀金斯的信继续说。“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肯定会带着彼此投机的兴趣尽快去读完它。”约翰·皮尔·毕晓普是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朋友，后来他

与海明威在巴黎相互结识。

在此之前，也就是去年10月，菲茨杰拉德正在法国南部的一座乡村别墅里致力于完成《了不起的盖茨比》。珀金斯收到了他从那儿匆匆写给他的一张潦潦草草的纸条，由此听说了“一位名叫海明威（原文为 Hemmingway）的年轻人”。菲茨杰拉德描述海明威是一个为《大西洋两岸评论》写作的美国侨民，他注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埃兹拉·庞德在巴黎的一个什么叫作自我（原文即如此）的出版公司为他出版了一本短篇作品集。现在，我的手头上没有这本书，不过它确实不错。我会尽快去拜访他的。”菲茨杰拉德还引用詹姆斯的一个小说名加了一句：“他是个真家伙。”在确定了这个短篇作品集实际上是三山出版社的出版物后，珀金斯从巴黎邮购了一本。邮包在12月份时就已通过了海关检查，但是珀金斯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到2月份他才开包阅读了里面的内容。当时，他向菲茨杰拉德谈了他的印象。“通过一系列文字简洁、有力、生动的短短的故事，（这本书）逐渐达到了一种了不起的效果。正如海明威所见，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的一种出色的、紧凑的和完整的表达。”随后，在给作者本人的一封信中，珀金斯又重复了这一判断的重要内容，虽然他不得不同时对“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出版这样一本书”表示了怀疑：“……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这本书太小，如果以一种惯例规定的价格出版，书商没有机会赚取可观的利润。这真是一种遗憾，因为你的方法显然是一种能够使你用非常简练的语言表达你的意思的方法。”在信的结尾处，珀金斯强调说，如果海明威碰巧正在写什么不会实际上有碍于商业出版的东西的话，斯克里布纳公司愿意考虑出版事宜。

不知是何原因，这封信在邮寄时投错了地方。因此，如果不是珀金斯几天以后从约翰·皮尔·毕晓普那里得知《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作者确实正在写一些可能让斯克里布纳公司感兴趣的作品，并且再次给海明威写信，那么，海明成就会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这位编辑对他的作品感兴趣。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在读了你的信之后的那份高兴劲儿”，海明威在4月15日的回信中对珀金斯说。他还满怀感情地说道：“你一定不会不知道，如果我能把书稿送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我该有多高兴。”他解释说，依照他和博尼—利夫莱特公司同意签署的合同，“他们将有权对我以后的三本书作出选择。他们同意，除非在接到书稿的60天里他们行使了这种出版第二本书的选择权，否则他们的权利就失效；而且，如果他们不出版第二本书，他们也就放弃了出版第三本书的选择权。”这样，就在成为博尼—利夫莱特公司的作者的那一时刻，海明威就让珀金斯知道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写一本利夫莱特不得不拒绝的书来斩断他和该公司的联系。他告诉珀金斯：“不管何时，只要我的处境允许我给你寄去一些东西供你考虑，我就一定会这样做。”不过，他告诫这位编辑说，他可不想写一部小说，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一种非常矫揉造作的人为杜撰的表现形式”。（也许，这就是他借以表达他已经被长篇小说这种形式的更长的长度和自由度吓坏了的方式。）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目前他有几篇短篇小说已经延长到8000到12000字，所以也许有一天他还是会写一部长篇小说。（说这话，他的意思是他正在决定如此做的边缘上，尽管这样做有风险。）

“真是倒霉透了——我是说我”，珀金斯回信说。不过，即便他是真地感到失望，他也大可不必如此。不到10个月后，海明威就将在纽约珀金斯的办公室里签署一份合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强迫利夫莱特放弃了

他。

五

自从 1924 年的冬末或初春读了埃德蒙·威尔逊的那本《在我们的时代里》之后，菲茨杰拉德的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要在 5 月份安排一次和海明威的会面。在那时，他和他的妻子泽尔达计划在巴黎呆上一个半星期。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菲茨杰拉德夫妇把在法国首都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追随另外两个侨民的身上。这是他们事先没有想到的。这两个侨民是：画家杰拉尔德·墨菲和他的妻子萨拉。在长岛时，在他们的邻居杰拉尔德的妹妹埃斯特的请求下，菲茨杰拉德夫妇曾经拜访过他们。

那年春天，墨菲夫妇隐藏在圣克劳德的一幢原来属于作曲家古诺的房子里。但是，就像菲茨杰拉德夫妇一样，他们也正要去里维埃拉度假。墨菲夫妇打算去昂蒂布角的海角旅馆，这样，原来曾经一时想要做风景画家的杰拉尔德就可以亲自监督新近购买的别墅的改造工程。自视甚高、潇洒倜傥的杰拉尔德和文静漂亮的萨拉好像正过着一种美满的自我实现的生活，而无法达到充分自我实现的菲茨杰拉德夫妇立刻就满怀敬意地爱上了他们。甚至在和墨菲夫妇呆了好多个小时之后，菲茨杰拉德夫妇还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去。有一次，他们在夜阑人静时又回到了圣克劳德大街住宅漆黑的窗户下，希望他们悲哀的召唤声能够使他们获得进入的权利。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崇拜，墨菲夫妇是惬意多于烦恼。他们向他们的新朋友保证，夏天时他们希望能够多多地与他们相见。斯科特自然有一部小说要写。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他和泽尔这就没有时间去参加萨拉的宴会，或和他们一起享受一下午间的阳光。

出乎两对夫妇意料的是，那个夏天带来的却是紧张和劳累。菲茨杰拉德在 30 年代回忆说，他不得不“在一个悲惨的时候”把《了不起的盖茨比》“从我的胸口里”拽出来。但是，到 10 月底时，小说还是最终放进了寄给马克斯·珀金斯的邮包里。一个月之后，菲茨杰拉德夫妇离开了里维埃拉前往罗马和卡普里岛过冬。事实证明，对他们俩来说，那是一个糟透了的冬天。随着春天的再次降临，《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将出版。一想到此，菲茨杰拉德的心里就充满了朦胧的凶兆，而且这种凶兆随着一周又一周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可怕。1925 年 4 月 10 日是小说的出版日。那天，他从卡普里岛给珀金斯写信说：设想如果“妇女们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没有重要的妇女；评论家们不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写的是富人，没有从《苔丝》中借来的农民，而它的背景又是爱达荷州，该怎么办？设想如果它甚至不能还清我欠你的债，——啊，光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卖出去两万本！事实上，我的信心已是荡然无存了。——若不是这封信到你那儿时最糟的结局已经该知道了，我是不敢告诉你这一点的。”

由于他对书的命运感到过分紧张，菲茨杰拉德无法呆在原地并努力放松自己。他劝泽尔达说，他们应该乘下一艘可以买到票的船从那不勒斯驶往马赛。珀金斯关于小说最初销售情况的电报到达时，菲茨杰拉德正在海上。电文是：“销售情况尚不明，评论极佳。”菲茨杰拉德从马赛给珀金斯发去一封电报，称这个消息令他感到“消沉”。随后，他便焦虑不安地和泽尔达一起驾驶他们随船运来的雷诺轿车驶往巴黎。但是，自从他们买了这辆车以后，他们一直不太爱惜，——菲茨杰拉德夫妇从来就不爱惜他们的车。结果到达里昂时，他们只好被迫把车寄放在汽车修理厂里接受全面的检修，改乘火车

继续他们的旅行。在泽尔达的坚持下，汽车修理工同意除了把雷诺轿车修复原状之外，他还会把车的顶篷锯掉。这位女士看来似乎更愿意乘坐敞篷轿车旅行。

出于一时的冲动，菲茨杰拉德认为在巴黎一直呆到他写完下一部小说是个好主意。因此，他签署了一份租约，租下了蒂尔西特大街上一套装修豪华的公寓。（《夜色温柔》花了八年才完成，而不是八个月。）就在他和泽尔达搬进去之前，一天晚上，他独自一人信步离开了旅馆去喝上几杯。在蒙帕纳斯大街上一个名叫疯人的小酒馆里，他看见在吧台旁有一位英俊的家伙。由于滑过雪的缘故，他的脸依然呈棕褐色。同他一起的是一位30出头的英国妇女和一个年轻的苏格兰人。他们的名字是达夫和帕特，从名字本身区分不出来男女性别，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颇为有趣。不过，菲茨杰拉德真正想要与之交谈的是他们那位英俊的伙伴。

六

菲茨杰拉德比海明威大三岁，名气也远比他大得多。但是，从一开始，海明威就立刻凌驾于他之上，不管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作家。他们两个人在疯人酒馆里的邂逅过了两个月之后，海明威从西班牙的布尔格特写信给他的这位新朋友。他对菲茨杰拉德所持的态度将会永远以这封信中所描写的那种两人之间的差异作为特征。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天空的，大概是一个漂亮的真空，挤满了一夫一妻制的赞成者，都是最有权势的名门望族的成员，喝起酒来往死里喝。……可对我来说，天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斗牛场，而我占据着两排席位；外面有一条满是鱒鱼的溪流，任何人都不得在里面钓鱼；城里有两座可爱的房子：一座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住，在那里我是一夫一妻制的赞成者、我会真正地好好地爱他们；而在另一座里我会让我的九个情人分别住在九层楼上。

简而言之，菲茨杰拉德喜欢喝得酩酊大醉；而海明威喜欢性满足。

菲茨杰拉德没有回信反唇相讥或是叫他闭上臭嘴，相反，他把海明威的性攻击和贬低视为种种象征真理的陈述。因为在菲茨杰拉德的想象中，海明威天生具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阳刚之气，就像他相信杰拉尔德·墨菲和10分级马球运动员汤米·希契科克也具有这种男人气一样。而他自己只能梦想着自己像个吸血鬼似地吸干他们身上的精髓。“当我喜欢男人时，我是想能像他们一个样”，他对自己的笔记本承认说。“我很想失去那些赋予了我个性的外在的品质，我想和他们一个样。我并不想要男人。我只是想把他身上所有的那些使得他富有吸引力的品质汲取到我自己身上来，然后再把他丢掉。”

可悲的是，菲茨杰拉德对于作为作家的海明威的崇拜并不亚于他对于作为人的海明威的崇拜。依照菲茨杰拉德那种妄自菲薄的意见，海明威是他们这一代文学人物中“一位真正的天才”，而且，他无法想象公正的、有见识有教养的人会不同意他的见解。1926年的夏天，在里维埃拉的一个海滩上，菲茨杰拉德把格伦韦·韦斯科特拽到一边，问他是否认为海明威的文学成就被人忽视了、误解了，所给的报酬也太低；而与此对照相比，他的《了不起

的盖茨比》和韦斯科特自己的《掌上明珠》的价值是否被评论家们捧得太高。菲茨杰拉德急切地抓着他的小说家同伴的肘部摇晃着，他想知道韦斯科特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海明威。也许，菲茨杰拉德冒昧地猜测说，韦斯科特愿意为他写一篇歌颂的文章。1941年2月，菲茨杰拉德去世后两个月，韦斯科特在《新共和》上写到：“他从未想到，”

在我这方面的敌意和小人之心也许会抑制我对一位新同事或对手的艺术的热情。……（菲茨杰拉德）不仅说了，而且我相信他也真诚地感到海明威的优势是一种本质上的优势，不可模仿。自从海明威开始出现在出版物上的那一刻起，或许他就觉得他自己能够或不能够创作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感觉到，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尽可以自由地为了利润而写作，为了乐趣而生活。更重大的责任和更崇高的奖赏如光荣和不朽都可以委托给海明威去完成了。

然而，在评价菲茨杰拉德的成就时，一种显著的升格使他在身后赢得了大量的荣耀。在海明威生活的最后的十多年里，面对这种对他早就习以为常的优势的威胁，他作出的反应是努力把他的对手再降格还原到原有的地位上去。遵循着这些原则，他所作的第一次显著的努力可见于1950年4月22日写给阿瑟·迈兹纳的一封信中。阿瑟·迈兹纳当时正在创作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为此，他主动与在古巴乡间别墅的海明威开始了通信联系。尽管我们这位居住在“观景庄”的大师当时正要开始修改《过河入林》的毛条校样，他还是抽时间给迈兹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的背后不仅隐藏着他对菲茨杰拉德姗姗来迟的好运气的嫉妒，而且还隐藏着他对《过河入林》的好坏的担心。结果是，从10个段落中都跳出来了一个不光彩的小人，其中最后一段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风流浪漫、野心勃勃，噢，天哪，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多么地有才华。他也非常地慷慨，但却不善良。没有受过教育，也拒绝以任何方式教育自己。他会大张旗鼓地研究足球，嗯，还有战争，但全都是扯淡。当他清醒时，他是一个可爱的快乐的伙伴，尽管他老是崇拜英雄的倾向会让你感到有点难堪。……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没有约束，随时都会离去，随时都去为了离去而离去。他是软弱的爱尔兰人而不是坚强的爱尔兰人。我希望他就在这里，我可以把信给他看，这样他就不会认为我在他的背后说他的坏话了。

虽然海明威显然希望他能够影响迈兹纳对菲茨杰拉德的判断，他却不准许他引用他的信，因为他已经把那些最富有吸引力的材料做了标记，准备自己用于《流动的圣节》。对海明威来说，在公众面前揭穿一位他所认识的——或者说是他自称认识的——其文学名望远大于他自己的作家，这个任务太重要了，绝不能交给别的什么人。

按照《流动的圣节》，在疯人酒馆里的那天晚上，他对菲茨杰拉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既像个男孩又像个女孩。

那时的斯科特是这么一个男人，看上去像个男孩，脸蛋处在英俊和漂亮之间。他有着非常好看的波浪形头发，高高的额头，激动而又友好的眼睛；

爱尔兰式的嘴巴娇娇嫩嫩，两片嘴唇细细长长，若是在一个女孩子身上，会是一个美人的嘴巴。他的下巴造型美观，耳朵漂亮，没有特色的鼻子显得潇洒，或几乎是漂亮。这本来并不会造就一张漂亮的脸蛋，那是由颜色、非常好看的发型和嘴巴造就的。那嘴唇一直让你担心，直到你认识他；而然后它就会让你更加担心。

通过把菲茨杰拉德的那种神经质的健谈和与他在一起的那位雄气十足的家伙的悠闲自在的风度加以比较后，我们的这位回忆者进一步强调了菲茨杰拉德的女人气。因为，按照海明威的记述，菲茨杰拉德进入疯人酒馆时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在一位从前的普林斯顿大学棒球运动员的陪同下。他的名字叫邓肯·查普林，人“非常地好，神色自然，轻松自如，态度友好，我喜欢他远远胜过喜欢斯科特”。不过，令这种旨在毁人声誉的对比难堪的是，邓肯·查普林后来告诉一位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作家说，1925年他根本就不在欧洲。

在把对手的脸蛋儿抹黑了之后，我们的这位回忆者又转向了他的腿。菲茨杰拉德一屁股坐在酒馆的凳子上，海明威不由得注意到“他的腿非常短。如果是正常的腿的话，他也许会高两英寸。”至于他穿的衣服，他那套布鲁克斯兄弟牌西服“很合身”，但是，不幸的是，他选择了一条卫士牌领带去配他那件白色的领尖上钉有钮扣的衬衣。“我想我也许应该跟他说说领带的事，因为在巴黎确实有英国人，也许有一个两个会到疯人酒馆来，当时就有两个人在。但紧接着我就想，见他妈的鬼去吧。……后来证明，他的领带是在罗马买的。”

要了香槟酒之后，菲茨杰拉德的脸再次引起了海明威的注意。“他坐在吧台旁端着香槟酒杯，他的皮肤似乎紧紧地绷在他的脸上，……接着那皮肤越绷越紧，直到那脸像一个死人的头。”究竟喝了多少杯酒才导致这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并不清楚，但海明威的潜台词是这个数目并不大。回忆录写到，晚上结束时，在邓肯·查普林的帮助下，海明威把可怜的非茨杰拉德像泼水一样泼进出租车里，送他回家。

几天以后，两位作家在丁香园咖啡馆里再次见面。海明威说，菲茨杰拉德在那儿喝了两杯威士忌加苏打，脸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一边谈论着“作家、出版商、代理人、评论家和（《星期六晚邮报》的）乔治·霍勒斯·洛里墨，谈论着传言和成为一位成功作家的经济意义”，一边变得“愤世嫉俗、滑稽可笑、非常快活和可爱”。他们最后是否转向谈论一些更为隐私的话题了呢？《流动的圣节》所说的只是他们在丁香园咖啡馆的台阶上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着天色渐暗，人们在人行道上走过，灰色的夜空变化着。分手前，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他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乘火车去里昂，取回他那辆修理好的雷诺轿车，再一起开回巴黎。他接受了邀请。回忆者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在已是春末，田野应该是最好看的时节，而且……我是在一位年纪更大的成功的作家陪同之下。”至于海明威把这次旅行看成是巩固友谊的一种方式，而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这种友谊对他就会比对菲茨杰拉德更为重要，这一切在回忆录里却只字未提。

《流动的圣节》把里昂之行描写成了一次喜剧：虽说恼怒但却宽容大度的海明威在未说一个难听字眼的情况下容忍了菲茨杰拉德式的笨拙无能和自我怜悯，因为“你无法对斯科特发火，正像你无法对某个疯子发火一样”。

启程的那天早上，按计划他们应该在火车站碰头，菲茨杰拉德应该把票带来。可火车就要开了，菲茨杰拉德还没有露面。海明威买了一张站台票，沿着火车走了一趟，寻找他。火车很长，菲茨杰拉德没在火车上。尽管他和哈德莉的经济十分紧张，海明威还是感到别无选择，只好抽出一些钱来买了一张火车票，自己一个人前往里昂。

第二天一早，当他正在昨晚下榻的里昂的一家一流旅馆里刮胡子时，菲茨杰拉德从大厅里给他打来了电话。海明威建议他们在咖啡馆里匆匆吃一个早餐，但菲茨杰拉德却想在旅馆里吃一顿更昂贵的早餐。菲茨杰拉德还坚持要旅馆为他们准备好一份路上的午间野餐，尽管海明威指出他们完全可以在马孔买一瓶马孔葡萄酒，在肉品店里买三明治的配料。在汽车修理厂，海明威惊奇地发现雷诺轿车竟然没有了顶篷。汽车修理工请求海明威劝说菲茨杰拉德一回到巴黎就立刻安装上活塞环。“想办法让这位先生认真点”，修理工恳求道。“至少把这车当回事儿”，他请求说。“呵，”海明威说道。

离开里昂北边大概一小时后，两位旅行者在雨中停了下来。紧接着的瓢泼大雨可能又让他们停下来了10次。但是，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从里昂旅馆里带来的丰盛午餐：块菌烤鸡肉、美味的面包和马孔白葡萄酒。到达马孔时，随着酒瘾的发作，海明威又买了几瓶酒，把它们撬开了盖。“我不敢确定”菲茨杰拉德从前是否直接就着酒瓶喝过酒，回忆者评论说：“他对此感到很激动，……就像一个姑娘头一回不穿泳装去游泳那么激动。”

不幸的是，刚刚下午时，被雨水浇透、浑身发冷的菲茨杰拉德就开始为他的健康而担心。他忧郁地宣布说，最近意大利有两个人因为肺充血而死亡。这个数字似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论海明威怎样试图让他高兴起来，告诉他充血不过是肺炎的老式名词，可菲茨杰拉德还是极度消沉。随着越来越急促的雨水拍打在他们身上，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他是否怕死。海明威回答说，有时候比另一些时候怕得多。到达索恩河畔沙隆时，菲茨杰拉德忽然把车停了下来，在一家旅馆里要了一间房，上床睡觉。他说，他并不在乎死于肺充血。海明威告诉他说，他的脉搏正常，也没有任何发烧的迹象。菲茨杰拉德要海明威以友谊的名义起誓去给他找一只体温计来。海明威按下了客房服务的电铃。菲茨杰拉德闭上了眼睛。他那似蜡一般光滑的白脸和端端正正的五官，让他看似一个已经死亡的小小的十字军斗士。此时此刻，回忆者承认说：“我开始对文学生涯感到厌倦。”这句话的含义，甚至连马克·吐温的选集中也没有哪句冷面的评论能够超过它。

结果，送来的体温计却是用于浴室的温度计。可海明威隐瞒了这一事实、装模作样地把温度计的一端塞到了菲茨杰拉德的胳膊下量了四分钟，并向他保证体温是正常的。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当他们急速行驶穿越科多尔省的葡萄园时，菲茨杰拉德提起了迈克尔·阿伦的话题。按照菲茨杰拉德的意見，在现代文学中他是一个会受人瞩目的人物。但海明威对此表示异议，他说他自己就无法读到迈克尔·阿伦的作品。菲茨杰拉德感叹道，你不必非读不可，因为他把所有情节中的每一个都扼要地概述了一遍。到达巴黎时，海明威在菲茨杰拉德的公寓旁下了雷诺轿车，乘出租车回了家。“看到了妻子，感觉好极了，我们一起到丁香园去喝了一杯。”

这篇既奇妙有趣又野蛮地贬低他人的故事中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呢？从海明威后来在12月份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一封信中可以断定，菲茨杰拉德确实确实浑身着了凉。“知道你会很高兴在纽约《先驱报》上读到两个人在索恩

河畔沙隆死于感冒。你在那儿也差一点如此。”另一方面，海明威在向马克斯·珀金斯描述这次旅行时，他给珀金斯的印象却全然不同于他给《流动的圣节》的读者的印象。回到巴黎几个星期后，他这样告诉珀金斯编辑：“我们一起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开着（斯科特的）车从里昂一路穿过科多尔省。”以同样的热情他又加了一句：“我已经读过了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认为这绝对是一本第一流的书。我希望一切都能进展良好。”菲茨杰拉德谈起这次旅行来也是眉飞色舞。就在他的伙伴给珀金斯写信的那几天，他告诉格特鲁德·斯泰因：“海明威和我去过里昂，……去取我的车，然后一路顺利地穿过了勃艮第。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家伙，绝对是第一流的。”

七

在《流动的圣节》中，有三章都是用来贬低菲茨杰拉德的形象的。其中人们最常谈论的是最后一章。因为在“尺寸的问题”里，海明威详细地讲述了在他曾经告诉过阿瑟·迈兹纳的故事中最龌龊的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两位作家初次见面的四年以后，在泽尔达经历了“当时所谓的她第一次的精神崩溃”之后，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碰巧都回到了巴黎。在菲茨杰拉德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在米绍餐厅吃了一次午餐。菲茨杰拉德想向海明威询问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一直到了他们吃甜点时——海明威记得他们吃的是樱桃馅饼——菲茨杰拉德才鼓起勇气向他吐露了令他烦恼的事情。他“没有和任何人睡过觉，除了泽尔达之外”。他开始说。因此，当他的妻子勾起了他对自己做爱的器具是否还正常的可怕怀疑时，他没有别的女人可以去寻求安慰。所以，他来求海明威帮忙。泽尔达告诉他，他天生就无法让任何女人感到快乐。她曾说过，是尺寸的问题。海明威立刻陪同他的痛苦不堪的朋友到男性诊室去。经过仔细的检查，医生宣布“一切正常”。可是，菲茨杰拉德的焦虑并未减轻，所以他们一道去了卢浮宫的雕像陈列室。在那儿，海明威即席讲解了男性生殖器的勃起膨胀。“这基本上不是一个在休息时它有多大的问题”，他指出。“而是它能变得有多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角度问题。”另外，他还解释了枕头的使用问题。最后他警告菲茨杰拉德：“泽尔达就是想毁了你。”尽管听了演说，菲茨杰拉德显然仍然感到心烦意乱，因此海明威建议他们去看一些图画。然而菲茨杰拉德说他没有兴趣，再说他还曾答应了要到里兹饭店酒吧去和一些人会面。

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曾经发生过”，被一些研究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权威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从他们谈论这件事的方式上看，这些评论家们认为这件事可信，一是因为它不仅符合菲茨杰拉德对海明威的英雄崇拜，而且符合长期以来菲茨杰拉德在其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怀疑的模式；另外也是因为海明威对所发生事件的回忆充满了听起来非常精确的引证和让人不得不相信的详尽细节，比如说甜点中的樱桃馅饼。但是，就在菲茨杰拉德开始吐露他对生活实情的那种可悲的无知时，《流动的圣节》的作者在桌子上放下了樱桃馅饼，这是他又在沉湎于他历来喜欢玩弄的那种与猥亵的双关语相关的玩笑。它或许是一种标志，说明小说中的其他细节也同样富于幻想。

例如，菲茨杰拉德究竟有多大的可能会告诉海明威他除了泽尔达之外再没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在他回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生的往事时，菲茨杰拉德说过，他曾因为学习能力不足而被暂令停学，因而没有资格再竞选三

角俱乐部的主席。就在他被告知这一消息后的那天晚上，他曾以追逐一个妓女来安慰自己。关于海明威所说的菲茨杰拉德曾说他的性经验非常有限的问题，另外一个更为有力的驳斥是由英国女演员罗莎琳德·富勒提供的。在她没有发表的自传中，她长篇大论地谈到，在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结婚前的那个秋天，她曾与菲茨杰拉德在纽约和纽约附近有过一段纵情的罗曼史。“我们的快乐、我们相互之间的发现似乎没有止境”，富勒小姐回忆说。“我们到处做爱：在戏院的包厢里，在田野上，在太阳、月亮和星星下。”一天晚上，在菲茨杰拉德的旅馆房间里，他俩都服用了斑螫，为的是提高他们的激情。更有甚者，泽尔达也确信，在他们结婚的第一个夏天，菲茨杰拉德就曾和另一位阿拉巴马州的姑娘——也就是塔卢拉·班克黑德的姐姐尤金妮亚——做过爱；而且她还非常关注斯科特对另外一位南方美人米里亚姆·霍普金斯的瞩目。她是一位漂亮而又富有才华的女演员。在 20 年代初的纽约，她曾大出过一番风头。

即使菲茨杰拉德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真地再也没有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单单是这个经验本身也就足以让他对性知识了如指掌，不至于像海明威所声称的那样连什么枕头一类的性交知识也不具备。不错，人们不难相信泽尔达可能向她的丈夫抱怨过她总没有从他那儿得到过性满足。人们也不难相信菲茨杰拉德在痛饮葡萄酒的午餐临近结束时可能会向海明威提到过泽尔达的抱怨。但是，男性诊室里的情景以及随后在卢浮宫里的讲演却带有想象的标记。关于臭名昭著的“尺寸的问题”，有两件事情，也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说得非常肯定。一件是海明威历来争强好胜，他一直对他自己的文学名望忧心忡忡，因此他在《流动的圣节》中有意提醒世人注意菲茨杰拉德的自卑。第二件是海明威自己对阳刚之气和它的外在表现着了魔。评论菲茨杰拉德的面容好似雌雄同体是他惯用的一种伎俩。在海明威看来，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描写一个男人敞开他的短裤，可怜地等待着一位有经验的朋友来为他下一个是否具有男子汉气魄的定论。

八

《流动的圣节》坚称，在他们从里昂回来的路上，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讲述了他追求泽尔达的过程。他谈到了他是怎样在战争期间遇见了她，然后又失去了她，然后又把她赢了回来。他还谈到了 1924 年夏在里维埃拉发生的“一些悲剧”。泽尔达爱上了一位法国海军飞行员爱德华·若赞。菲茨杰拉德希望海明威能够“知道、理解和领会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海明威回忆说，他说得是那么清楚，“我都可以看到单座位的水上飞机以低飞姿势掠过潜水的浮舟，可以看到海水的颜色、浮舟的形状和阴影、泽尔达的棕褐色皮肤、斯科特的棕褐色皮肤、他们的头发的深金色和浅金色，以及那位爱着泽尔达的年轻人的深棕褐色脸庞。”

尽管菲茨杰拉德对他那位 24 岁的妻子的浪漫描写也许会让海明威猜测她肯定是位美人，但海明威对她相貌的第一印象却不好，或者他后来是这么说的。在《流动的圣节》中，他回忆说，那个春末的下午，当他和哈德莉在菲茨杰拉德夫妇的公寓里的一次午宴上被介绍给泽尔达时，她的脸“紧张而憔悴”，她的眼睛显得“疲惫”，而她的头发则“被她的糟糕的波浪发型一时间给弄得一塌糊涂”。在他专门描写她的章节里，一直到了倒数第二段，我们的这位回忆者才最后对她的相貌说了一些表面上看来毫不妒忌的话。

1926年夏天，在里维埃拉的一次聚会上，她变得“非常漂亮，她的皮肤是一种可爱的金黄色，她的头发是一种漂亮的深金色”。然而，即便在这段颂词中，仍然还是怀有恶意，因为他很快就暗中以一段她已经出现疯病的趣闻来结尾。那天晚上在里维埃拉，“她那鹰一般的眼睛明亮、平静。我以为一切都很正常，结局会是皆大欢喜。忽然，她朝我探过身来同我说话，告诉我她最大的秘密：‘厄内斯特，你难道不认为阿尔·乔尔森比耶稣还伟大吗？’”

《流动的圣节》的作者还坚持说，在他与泽尔达见面的那个春天，“她让（她的丈夫）嫉妒别的女人”。这个指控，就像他对菲茨杰拉德的阳刚之气的攻击一样，很有可能是一种捏造，是进一步贬低菲茨杰拉德夫妇的企图。它也带有报复的味道，因为泽尔达对他的男子汉气魄表示过怀疑，这肯定会激起他的怒火。

如果那年春天泽尔达曾经向什么人有过求爱的表示的话，泽尔达漫长的风流史表明，她只会向一个男人作出这种表示，可以想象就是向海明威本人作出了这种表示。而且，由于她是那种海明威通常并不喜欢的过于急切和娇柔的女人，如果她向他施展魅力未获成功的话，海明威的拒绝可能就会给她提供第一个理由去暗示他是一个同性恋。第二，她就可能在她丈夫和他的新朋友之间播种不和。第三，就是在已经不堪重负的斯科特身上再堆上另一个感情负担。

与海明威见面后不久，她就让菲茨杰拉德感到吃惊和烦恼。她把他的新朋友叫作“冒牌货”，然后又讥讽他的裸露肌肉的癖好“和空头支票一样假”。照她那种尖酸刻薄的意见，虽然他看上去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可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像所有那样的男人一样”。她是越想越觉得在她丈夫和海明威之间有什么暧昧的关系。因此，1929年，当菲茨杰拉德夫妇和海明威与他的第二个妻子保利娜·普法伊弗同时都在巴黎逗留时，一天晚上，他们在海明威的住所共进晚餐。吃吃喝喝几个小时后，菲茨杰拉德夫妇回到了家。斯科特在上床时醉醺醺地嘟囔了一句“不再要了，小心肝”。泽尔达认为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正在心里和海明威对话（或许也是真的），由此结论她转而相信这两个男人是情人。1930年，她把这一事件列举为促使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我们回到了帕拉坦大街”，她提醒菲茨杰拉德。“你在醉得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对我说了一大堆我半懂不懂的事情；但是我却懂我们在厄内斯特家吃的那餐饭。”菲茨杰拉德气得简直要发疯。他嚷道：“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差一点要离开你就是那次你告诉我说你以为我是帕拉坦大街上的同性恋者。”

泽尔达对海明威唯一的赞许是他的风度翩翩。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他注意过她。她没有意识到他的注意源于文学的动机。他研究她是为了他决定要写的那本小说的缘故。她那超然冷漠的魅力和张口就来的反驳，她那整夜整夜毫不削减的对晚会的热情，她对男人拜倒在她跟前的欲望，她对洗浴的那种仿佛一定要洗去某种道德龌龊感的情不自禁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对《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布雷特·阿什利的人物刻画。

泽尔达还有另一面。她和斯科特的关系也将在海明威以后的作品中扮演角色。泽尔达的母亲明尼·梅琴·塞尔是个歌剧女低音歌手和演员。在她传授给泽尔达的神智学原则的基础上，泽尔达渐渐相信了精神孪生关系。因此，与她在战争中见到的这位并不富裕且不见经传的普林斯顿大学生订婚，她虽然一直感到“隐隐约约的沮丧”，但1919年的夏天，正是这种信念使得她回

避了这种沮丧的感觉。住在纽约上州西部某个阴暗的单间公寓里的菲茨杰拉德曾收到过一封信。泽尔达在信中兴高采烈地向他报告：在蒙马特尔，她曾去见过一个巫师。她亲自从巫师灵应牌上得到的预言只说到了死亡，但巫师得到的预言却“叫我们结婚，——我们的灵魂是配偶”。泽尔达解释道：对任何懂得如何去解释它的人来说，这个预言极端重要，因为神智学教育人们“自从人类分为两性以来，两个灵魂被一起赋予了形体，无需是在相同的时间，但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瞧，‘灵魂配偶’毕竟不完全是信口胡诌的故事。”

菲茨杰拉德完全被这封信给迷住了。斯科特是泽尔达，泽尔达是斯科特。像泽尔达一样，他越想越觉得可以从这种说法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意思。他们两人都想苗条、漂亮和有出息，都想意见精辟、见解惊人、说起话来出奇地富有创见；他们都崇拜成功、名望，都想成为城里最受景仰的人；他们都是那么地热爱死亡，以至他们永远是相互怂恿去干更加危险的事情：从高处往下跳水，开起车来不顾一切。有时候，他们的认同感甚至使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纽约结婚三个月后，他们驾车去南方，穿着一样的白色灯笼裤和大学预科生的夹克。在《漂亮的和该死的》（1922）中，菲茨杰拉德戏剧化地描写了他们共同的见解。格洛丽亚·吉尔伯特向安东尼·帕奇保证说：“我们是双胞胎。”她这样总结了从母亲那儿学来的信念：“有时候，两个灵魂是一起创造的，……在他们出生前就相爱了。”安东尼对这个观点“欣喜若狂”。

事后证明，菲茨杰拉德夫妇的这种关系对相互都具有破坏性。然而《流动的圣节》的作者却不容辩驳地把所有的错都放在了泽尔达的门槛上。她不仅永远是一个激起了男人的性欲后却不与之共欢的戏弄男子者，而且她用烈酒的引诱去腐蚀菲茨杰拉德的那种让她嫉妒得发疯的写作能力。海明威声称，他头一天与她相见，就意识到了她在玩弄酒精的把戏。那天，她酗酒后面头痛难忍，便不停地折磨菲茨杰拉德，“好像他是一个煞风景和败兴的人”。显然，前一天晚上她曾对他甩过这些话。那是在蒙马特尔的晚会上，因为他不愿意和她一起大醉一番，他们吵了一架。海明威继续回忆说，在罗马和卡普里岛过了一个灾难性的充满了酒精的冬天后，菲茨杰拉德在回到巴黎时下定决心要戒除整夜的酗酒，每天做些锻练，以便正常地工作。然而他才刚刚开始正常工作，“泽尔达就会开始抱怨她好闷，拖着他去参加另一个酒会。他们先是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会同我一起出去一个劲儿地散步，想通过排汗让酒精散发掉。他下定决心这一次他是真地要工作了，而且会顺利地开始。可之后，一切又恢复到老样子。”海明威注意到泽尔达是看着她丈夫狂喝滥饮，他立刻就意识到，在她那张鹰一般的脸上，她那薄薄的嘴唇的微笑“意味着她已知道斯科特不可能写作了”。

总而言之，泽尔达正是海明威最害怕的那种喜欢操纵别人、刻意摧毁男人、专门骚扰工作的女人。尽管他描写她已是在快要步出中年的时候，——此时，他自己也备受酒精中毒的折磨，担心自己失去理智，——但他还是无法把她放大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是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蔑视的对象。只有在《伊甸园》中，在那位酷似泽尔达的妻子身上，他才能在这样一个女人的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第十三章 背叛

—

1925年春天的那个夜晚，当菲茨杰拉德来到疯人酒馆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同海明威在一起喝酒的那对男女是达夫·特怀斯登和她年轻的表弟帕特·格思里。他们两人除了是血缘亲属之外，还是恋人。他俩已经同居了一段时间，居住过的地方从里兹饭店到巴黎第五区的廉价客栈各个不等，通常由从家里寄来的汇款有多少来决定。达夫已经有了一个长期同床共枕的伙伴，但这并不妨碍她与别的男人纠缠在一起，而海明威很快就成了她的心腹圈子中的一员。20年代，蒙帕纳斯大道上一位为海明威倒了不少酒的酒吧老板就一直弄不明白他在特怀斯登女士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按照他的坚定不移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英国姑娘。海明威认为她有风度，那只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对她的魅力的解释。酒吧老板还记得，那时他们常常去巴黎右岸地区跳舞。

在某种程度上，海明威的解释还是有道理的。从孩提时代起，海明威就受到了橡树园尤其是海明威家庭的亲英倾向的影响——什么牛津教室呀等等的。一位有贵族头衔的英国妇女自然而然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为《太阳照常升起》中有贵族头衔的女主人公四处搜寻一个合适的姓氏时，他最终还是决定借用埃德温娜·阿什利的姓氏。因为，在1922年，这位漂亮典雅、生气勃勃、逐乐如狂、金玉满堂的年轻女人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重孙路易斯·蒙巴顿。他们的婚礼成了战后英国最重要的上流社会的婚礼。如果说用“迪基·”蒙巴顿的新娘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女主人公会让海明威感到有趣的话，他同时还从中得到了一种势利的快感，正像他带着特怀斯登女士去跳舞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快感一样。

其实，达夫·特怀斯登最初在生活中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多萝西·斯默思韦特。尽管她的父亲是约克郡的一位富裕的店主，但家世平平。不过，她的母亲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叫作斯特林的家族，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拥有马，并声称与贵族有关联。父母离婚后，达夫随了母亲娘家的姓。在法庭上，她以多萝西·斯特林的身份出现。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嫁给了一个名叫勒特雷尔·拜罗姆的年纪较大的男人。那次婚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达夫很快就成了它的牺牲品，因为在英国秘密机关担任信使的达夫发现自己不愿意放弃在工作中碰到的那些年轻军官的青睐。临近1916年底时，拜罗姆以达夫与人通奸为由和她离婚。数周后，她便与罗杰·特怀斯登结婚。罗杰·特怀斯登是皇家海军指挥官，英国准男爵。达夫是在他母亲强烈的反对声中嫁给他的。甚至在达夫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后，她的公婆仍然鄙夷地把她视为一个向上爬的无耻之徒，一个酒鬼，一个把她天真的儿子引入纵情享乐之途的坏女人。达夫本人对她第二次婚姻的回忆却全然不同。她说得简单明了：她的丈夫是个酒徒，只要端起酒杯就会丑态毕露。海明威也记得他曾对他说过，罗杰准男爵在睡觉时一定要在他俩之间放一把出鞘的剑。可毫无疑问的事实是，这个细节是海明威从一本书中读来的。因为，正如《三天大风》中尼克·亚当斯和比尔之间的对话所显示的那样，海明威年轻时代最喜欢的书之一是莫里斯·休利特的《森林情人》（1898）。用尼克的话说，这对情人“每晚上床都在两人中间放把出

鞘的剑”。

无论如何，达夫与罗杰之间的关系从不顺利。他们常常分居。在此期间，达夫通常就会逃到她外祖母在苏格兰的石头宅第里去，最终便把她送入了表弟帕特·格思里的怀抱。格思里生性暴戾，习惯于扔下一大堆未付款的帐单；他有性欲错乱的历史，还有酗酒的毛病，时而需要到医院里去“戒酒”。这一切都表明他的人格可能失衡，而且肯定冷酷无情。但是，他的这种冷酷无情却在达夫身上引起了共鸣。最后，她和他一起逃到了巴黎，把幼小的男孩丢给了他两位祖母去照管。这时，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诉讼。

1925年5月22日，达夫年届33岁。这就是说，她只比哈德莉·海明威和阿格内丝·冯·库罗夫斯基稍稍年轻一点。有人评论说，虽然她是一个酒徒，可她的脸就像她的花呢衬衫一样“剪裁得当”，气色鲜活，眼睛富有表现力。但在海明威的眼里，达夫的相貌特征无疑就是他在描写《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雷特·阿什利时所强调的那些特征。杰克·巴恩斯在欣赏阿什利女士时说，她身材的曲线“如同赛艇的外壳”，而她的短发“朝后梳，像个男孩子”。另外，她和达夫一样模仿着男人戴一顶毛毡帽，端起酒来的豪侠风度可以丝毫不亚于任何男人。简而言之，海明威的女友从生活走上艺术时几乎都是毫不走样。

二

除了其他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之外，达夫·特怀斯登还具有智慧和强烈的幽默感。四分之一世纪后，哈德莉回忆道：“她笑起来时，整个人都进入到那笑声中。这当然少不了大量粗俗的语言，但却能得到所有人的赞许。”在认为她的笑声特别迷人的人中有哈罗德·洛布。他说，她的笑声就像“嘲鸫鸟对着月亮欢快地鸣叫一样清脆流畅”。如果这些话表现了洛布一生对W·H·赫德森的散文的崇仰之情，它们也同样可以被用来衡量曾经充盈他全身的浪漫激情。

对基蒂·坎内尔的长腿的魅力感到厌倦后，洛布一天下午来到了塞莱克特咖啡馆，走到了达夫跟前。他请她第二天和他一起到一家两人都不知道的偏僻的酒吧去喝一杯。这次约会以开胃酒为起始，以上床共欢为结尾。达夫对这次的经历感到无比的满足，她被说动了心，准备和洛布一道去西班牙北部度过一个星期。对她来说，他们的度假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美好的梦；但对洛布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开始。当达夫意识到她的伙伴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她要认真得多时，她试图警告他别忘了她的水性杨花。“我想……你是把我看成了某种人，可我不是那种人”，她告诉他。“我可能会让你失望至极的。”一个星期后，达夫乘火车回到了巴黎，但洛布却选择在圣让-德吕兹再呆一段时间。他确信自己赢得了爱情，他要回味一下作为爱情征服者的滋味。他想知道，当海明威和格思里得知他在达夫的感情世界中顶替了他们时，将会做何感想。

与此同时，海明威正在具体地构想他对西班牙的又一次访问。这一次，他想先去布尔格特钓一个星期的鱼，然后再去潘普洛纳欢度圣诞节。比尔·史密斯最近刚刚到达巴黎，他十分踊跃地要加入海明威和哈德莉的行程，既要去看斗牛，也要去钓鱼。唐·斯图尔特要海明威算上他一份。洛布也要海明威算上他一份。得知洛布和达夫的放荡行为后，海明威本可以对洛布回答说滚到一边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那意思无非是想让他的朋友相信他并没有

记恨于他。不管怎么说，他能进入博尼-利夫莱特公司，洛布是劳苦功高的。

不过，海明威可不喜欢欠任何人的情，尤其是不想欠洛布的情。再者，一个犹太佬竟然也挤进了达夫的非犹太教的感情世界，私下里海明威对此是怒火中烧。为此，他邀请了达夫和帕特参加他们的旅行游乐。6月21日，他给在圣让-德吕兹的洛布发了一封信。他欺骗性地向洛布保证说：“在潘普洛纳将会是好玩极了。”他又故意随便地加了一句：“帕特和达夫也会来。帕特已经去苏格兰拿钓鱼杆，而达夫也已经去英国拿钱了。”就这样，海明威有意设置了一场会使洛布痛苦万分的冲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描写中，这一痛苦将伴随着他的余生。——因为他从母亲那儿学会了惩罚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侮辱他。

虽然消息惊人，但洛布还是对这封信友好的口吻感到安慰。不过，从达夫那儿收到的两封听起来让人担心的信却多少令他有些发愁，虽然那些信温情脉脉地诉说着她是多么地想念他。“没有你，我真是难过”，她在第一封信里说。“现在，还有一桩不知是否会有好结果的喜讯。我将和海明威还有你们那帮人一起去潘普洛纳。你能容忍吗？我当然是指帕特。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让我知道，我会尽量不去的。但我真是想去，想得快要死，我感觉哪怕是能见到你，能和你谈谈，也会比什么都强。”三天后，她又一次说出了她的不安。“能再次见到你将会使我很高兴”，她开宗明义地说：“虽然我想我得花点时间来控制局势。海明威许诺说肯定会很好玩，我们应该是会玩得很愉快的。”

洛布忽然觉得他有必要把原来打算和海明威等人在一起呆的时间缩短一些。他给海明威拍了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改变了到布尔格特去整整一个星期的主意。他将在圣让-德吕兹等待达夫和帕特的到来，然后和他们一起启程。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对付一个情敌。因为，他的两个情敌肯定都会抓住达夫不放，尽管他们两人肯定都会失败。

三

对所有的人来说，布尔格特之行都是一次极大的失望，特别是对这次旅行的计划者而言。首先，达夫和她的两个伙伴一直没有出现。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定要在圣让-德吕兹逗留到潘普洛纳的圣诞节即将开始时。其次，前一年曾让海明威欢欣鼓舞的那条小河这一次却让伐木给糟蹋得不像样子，漂满了垃圾。鱼儿已经死亡，水池已遭毁坏，堤坝已然坍塌。“让我感到难受”，海明威告诉他的父亲。

潘普洛纳也同样受到了玷污。“伊甸园已不再是从前的伊甸园，”唐·斯图尔特哀叹道。后世被称作“漂亮的人们”的那群人已经发现了圣福明的宗教喜庆节日。从比亚里茨开来的大轿车停在大街上，穿着制服的司机在车旁闲荡。人们可以听到咖啡馆里有人在说英语；想要买到观看斗牛赛的好票更难了；旅馆房间的价格也比1924年明显提高了许多。斯图尔特还感觉到个人的极大失望，因为随着那个“恶魔——性”的侵入，“男性狂欢”的气氛已经从海明威的小圈子的聚会中消逝了。洛布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闷闷不乐的情绪之中。这本不奇怪，因为在圣让-德吕兹，正像达夫曾经预见过的那样，她令他大为失望。一天晚上，在旅馆酒吧里喝酒时，达夫趁着帕特离开的空当对他直言相告，她不再渴望他了。“帕特已经破除了你的魔力”，她说：“他干得很努力。”不过，洛布还是陪伴他们来到了潘普洛纳，一次又一次

地希望能够把她赢回来，结果却发现达夫除了和帕特共居一个卧室之外，还大叫大嚷地追求海明威。照比尔·史密斯的话说，她对“厄内斯特发了狂”；而海明威在回应她的调情信号时是那么地不老练，哈德莉于忧伤之中只好请求别人原谅，要么说她疲惫已极，要么说她头痛难忍，早早便回去就寝。

有时候，海明威和达夫出来喝酒时会戴着配对的贝雷帽。他们两人常常窃窃私语，把别人都晾在一边。不过，他们的亲近行为似乎并没有惹恼帕特。相反，帕特把一切恶意都留给了自觉惭愧的洛布。也许是她为他感到难过，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星期五的晚上达夫独自一人和洛布出去了一个小时左右。第二天午饭时，她那宝石浮雕一般的脸上出现了一只乌青眼，额头上有了一块极丑的伤疤。洛布感到十分震惊和深深的不安。他开始追问出了什么事。但是，洛布在自传中回忆说：海明威打断了他，“说她摔倒时碰到了栏杆上。我气愤已极，却想不出反驳的话。帕特吃醋了，干了丑事。哈德莉失去了她的微笑，尝试着说了一句妙语，却无人理会。比尔看上去一脸不快。”显然，帕特用拳头惩罚了达夫主动鼓励犹太佬的行为。海明威也同样明显打算捍卫帕特，反对来自洛布的任何批评。

那天晚上，海明威的报复计划达到了高潮。洛布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他表示了对帕特的厌恶；“你先别说帕特”，海明威突然插话。“你把这次聚会搅得够糟的了。”帕特把这话解释成最后要一决雌雄的信号。“你为什么还不滚？”他对洛布嚷道。“我不想叫你留在这里，海姆也不想叫你留在这里，没人想叫你留在这里。”洛布两眼直直地盯着达夫。“只要达夫让我走，”他说。“我会走的。”达夫性感地、慢慢地摇着头。“你知道……我不想叫你走。”洛布请求达夫保护他免受驱逐，这让海明威充满了鄙夷。他嗤之以鼻地说：“你这狗日的杂种，竟然向女人求助。”

洛布一生都会记得，随后他站了起来，叫海明威到外面去。海明威照办了。在距离不远的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他们停了下来。如果说因为海明威毕竟比他重40磅，这让洛布感到了一阵恐惧，那么他同时也感觉到了悲哀。这个人曾经是他的朋友，可现在却成了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洛布脱掉了他的上装，小心翼翼地取掉了他那牛角边的眼镜，放在一个口袋里，然后在附近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衣服放在那里。他喃喃地说，他可不想把眼镜给弄破了，因为在潘普洛纳这样的小城里可能没办法把它修好。忽然，他意识到海明威正在朝着他微笑，就是那种“让人没法不喜欢他的”调皮的男孩子式的微笑。洛布说，“我并不想揍你。”海明威说：“我也不想。”他们两人便一起回到了咖啡馆。

第二天早上，洛布居住的旅馆里的守门人给他送来了一张海明威的纸条。“昨晚我对你太厉害太凶狠。我可不想让你在离开时带着那种受到侮辱的隐痛，那是这次节日我最不愿意的事情了。我希望能够抹去我所有卑劣的行为。我想我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这张纸条是想让你知道我已经对我的所作所为和我说的那些卑鄙的、不公正的、无缘无故的话感到由衷的羞愧。”

海明威曾经恶语中伤比尔·史密斯的哥哥Y.K.史密斯。在事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为此向比尔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他也曾为他在格拉纳达在麦克阿尔蒙的面前表现得像个野兽的样子而在回到巴黎时对麦克阿尔蒙表现得极甜极蜜，以此来表示无言的歉意。海明威试图以悔意来弥补他不雅观的

行为的第三个例子发生在 1924 年的秋天。他与文弱的内森·阿施进行了一场拳斗，结果是阿施被打得不省人事。照阿施自己的话讲：“在他告诉了我（作为一个作家）我也许除了有那么一丁点儿新奇之外便毫无创意之后，他便把我打倒在蒙帕纳斯大道上。那天晚上，我睡在原野大街我自己的房间里。他忽然醉醺醺地闯了进来，泪流满面，对我说他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而我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才能）。 ”

一年以后，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记述了他和洛布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但这一情节却是以编排过的面目重新出现的。在潘普洛纳的苏伊佐咖啡馆里，当他们之间的争吵达到高潮时，罗伯特·科恩（洛布）把杰克·巴恩斯（海明威）打得昏死过去。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杰克走进了科恩的房间，发现他在黑暗中趴着躺在床上，充满了悔意，默默地哭泣。

“对不起，杰克。请原谅我。”

“原谅你，真见鬼。”

“请原谅我，杰克。”

厄内斯特·海明威真是一个复杂的人。洛布在与达夫的性爱中取胜令他恼怒，他有意策划了一次社交活动以便使他的敌人暴露在帕特·格思里的恶狠狠的辱骂之下。然后，他自己却又对洛布出言如此不逊，使得洛布别无选择，只好向他提出挑战。在这场挑战中，洛布肯定会输得屁滚尿流。可就在一切要成为现实的关头，海明威的情绪忽然又好转。他没有痛揍洛布一顿，反而对他微笑，第二天一早又以一纸道歉与对手握手言和。但是，《太阳照常升起》所表达的情绪又朝着他本来的情绪方向变换了回去。因为，该小说毫不留情地描述了罗伯特·科恩。对待女人他是一副飘飘然的神气；对待忠实的情人弗朗西斯·克莱因他态度粗鲁；他把 W.H.赫德森的《紫色的土地》作为生活的指南加以接受，暴露了他的知识肤浅和自命不凡；正像帕特·格思里的化身人物迈克·坎贝尔所说的那样，他具有“冷酷的、犹太人的、固执的秉性”，他“像一条被阉了的公牛一样”追着布雷特（达夫）在潘普洛纳到处瞎颠，证明了他极端缺少个人的尊严。为了让科恩——也就是洛布——看上去更糟糕一些，海明威还借用了他自己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来作为洛布生活中所有那些可以辨认的事实的最后点缀。自始至终，自他挥拳猛击体质上远不如他的阿施到他闯进他的牺牲品的房间表示歉意并且像个女人似地泪流不停，海明威都表现得极其差劲。但他却把这一切都转嫁给了洛布。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明威把他自己殴打阿施的事件融入科恩的形象塑造之中这件事情。他曾向基蒂·坎内尔保证说他一定会“收拾”哈罗德·洛布。但他对科恩的描写与其说证明了他具有这种失去理性的欲望，倒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他塑造的科恩的形象和个性有一种认同感。1926 年，左岸的读者们欢天喜地，他们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一本坦率的、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小说。杰克·巴恩斯是海明威，布雷特·阿什利是达夫·特怀斯登，罗伯特·科恩是哈罗德·洛布，比尔·戈顿是唐·斯图尔特，迈克·坎贝尔是帕特·格思里，等等，等等。然而这种假设除了忽略了别的事情之外，还忽略了海明威在想象上与科恩的纠缠不清这一事实。《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像虐待狂一样地以贬低哈罗德·洛布的小说替身为乐，可结果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却为自己感到了羞耻，因而模模糊糊地有些同情科

恩。通过杰克·巴恩斯，海明威表达了他反反覆覆、变化多端的感情。“我喜欢看到（迈克·坎贝尔）伤害科恩，”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杰克在床上对自己说。但紧接着他又承认：“可我又希望他别这么做，因为过后这会让我厌恶我自己。”在某一个场合，杰克这样评说科恩：“他可以是个人很不错的人。”可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我自己就恨他。”海明威自己在一个场合曾经直接对读者说：“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没有把罗伯特·科恩表现得很清楚。”也许，他无法表现清楚的是厄内斯特·海明威他自己。

四

潘普洛纳的圣节一结束，海明威夫妇便双双前往马德里。在马德里的斗牛赛中，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把他斗的一头牛献给了海明威夫妇，哈德莉得到了那头牛的一只牛耳。正像布雷特·阿什利的所作所为一样，哈德莉把那只牛耳包在一块手绢里，藏在梳妆台的抽屉中。不过，尽管贝尔蒙特盛名显赫，给海明威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斗牛士却是他们起先在潘普洛纳见到的一位年轻人尼尼奥·德·拉·帕尔马。7月15日，海明威告诉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说：“贝尔蒙特的所有动作，他的修饰动作、他的姿势以及一切的一切，他（尼尼奥·德·拉·帕尔马）都做了，而且做得更好。然后，他独自一人挺身而出。他挥动披风的动作显得温文尔雅，颇有节制，流畅自如，缓中见稳，没有耍任何花招。他以五个自然的穆莱塔的摆动动作开场，短扎枪运用得出神入化。最后，他以几个精彩漂亮的回合、一整套连贯如流水的动作结束了斗牛，完美无缺地杀死了牛。”尼尼奥出生在西班牙的龙达。他的表现让西班牙所有迷恋斗牛的女士们都开始谈论他。一天下午，他请哈德莉为他拿着披风，她在接受他的请求时表现得激动不已。这件事似乎给了海明威一个灵感。他刚刚在开始写一本小说。他可以通过描写30多岁的女主人公与一位孩子般的斗牛士之间的爱情来引导小说的情节走向高潮。这位斗牛士他将命名为佩德罗·罗梅罗。

海明威最初为这本书起名叫《圣节》。它的第一部分的试验稿是于7月下旬和8月上旬在马德里、巴伦西亚和圣塞瓦斯蒂安创作的，其中许多页的内容在质量上都惊人的低劣。在某些页的内容里出现了完全没有经过文学想象加工的人物，名叫海姆、哈德莉、达夫和多斯·帕索斯；在另外一些页的内容里，作者谈到女主人公时的口气使他听上去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都对我施加着这种性感魅力。”海明威要写一本小说，描写一个失去了阴茎的男人。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危险，海明威曾经和巴黎的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就此作过一次初步的交谈。《圣节》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一次曾经告诉我，除非作为一个幽默的题材，否则这小说没法写。”在圣塞瓦斯蒂安，海明威夫妇搬进了已经越过法国边界的昂代城大饭店。在海滩上，沿着散步的地方生长着繁茂的树木，海明威好好地享受了一下游泳的乐趣。直到他们离开圣塞瓦斯蒂安后，我们的这位正在拼命的作者才最终发挥出他正常的水平，尽管他的故事仍然是非常莫名其妙地从斗牛的中间部分开始，而不是像日后出版时那样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巴黎开始。

在昂代，海明威花了大量的时间写作，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尽管如此，他还是挤时间花精力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选择托尔斯泰的小说并非毫无意义。早在6月份时，他在巴黎就已开始创作一部小说，他尝试着

想将其称为《与青春同行》。主人公尼克、亚当斯在草稿的第一页就已出场。他正在“芝加哥”号军队运输船上，逐渐靠近法国的海岸。船上还有一对波兰军官情人，一个是含情脉脉的法国姑娘，另一个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绰号叫“吹毛求疵的人”，就像豪伊·詹金斯的绰号一样。显然，作者是想跟着尼克一块儿到意大利去，在那里，故事的焦点将在两个情节之间交替变换，时而是威尼托山区和峡谷中的战争场面，时而是尼克在米兰与一位名叫阿格尼丝的护士的恋爱场面。小说进行到第二十七页时便终止了。然而海明威并没有灰心。总有一天，他还会写出一部有关意大利战争的小说。而在昂代时，他忽然想到小说可以插进去一个关于孩子出生的片断，从一个期盼孩子出生的父亲的角度去写。因为，虽然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写进他的文学笔记，但在写给巴克利·亨利的一封信中，他笼统地谈到了这个想法。而且，从巴克利·亨利那儿他将最终得到《永别了，武器》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当时，巴克利的妻子在生产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时遇到了难产。虽说她感觉已经从磨难当中彻底地恢复了过来，可海明威还是想让亨利夫妇知道他在想念着他们。因此，8月12日那天，由于哈德莉一早赶回了巴黎，——她说她离开勃姆比已经太长的时间了，——海明威感到有些孤独，他便坐了下来，给巴克利写信。“巴巴拉恢复了健康，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信的开头写道。“她病得那么厉害，真是太不幸了。天哪，你当时一定是担心死了。可我觉得并不是许多人都能意识到年轻的父亲要经历的是什么事情。当你真正地热爱某个人时，那种爱真是能够让你见鬼。母亲的艰难是那样地引人注目，父亲的艰难便从来无法广为人知！”

有时候，他在晚上写作那本有关圣诞节的小小说时会熬到很晚，直到他的脑袋感觉就像一颗冰冻的洋白菜。可第二天一早，他还是照常起得很早，继续地勇往直前。到8月19日他乘火车返回巴黎时，他计算如果以同样的速度再干一个月，他就可以写完这部小说。

“临近结尾时，我简直就像发了烧一个样。”27年后，他这样告诉他的笔友伯纳德·贝伦森。“临近结尾时，我就像是在自行车比赛中冲刺一样。我不想为了做爱什么的而放慢了速度，因此我就让妻子和她的两个朋友到卢瓦尔去旅行。”当他最终冲过终点线后，他陷入了郁悒之中。“我……感到空虚和孤独，急需要一个姑娘，”他对贝伦森坦白说。

所以，当妻子回家时，我正和一个喜欢胡搞的姑娘在床上，我不得不把她弄出去爬到锯木厂的房顶上……然后换了床单，下去打开院子的大门。除了锯木厂房顶上的那个姑娘之外，大家都对这次意外的返回感到惊喜。……但是，我写得太快，我的激动统统是为了自己，对书却几乎毫不动情。因此我就通奸，由此而进入那种恐怖的、可怕的、头脑绝对清醒的状态，那种只有不信仰上帝的人才了解的安身立命之所。然后，我们就去了福拉尔贝格的施伦斯，过起了美妙、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我又开始重新写作。然后又重写了一遍。然后就有了一本书。这期间，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都在发生着。

这是一个很动听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海明威忘记了哈德莉的卢瓦尔之旅一直到了1926年春才成行。不过，有一点他并没有记错。在9月份前他是和另一个妇女发生过性关系，因为他对婚姻的忠诚不过仅剩下了那么一丁点儿，而他急于把这一丁点儿的忠诚也要踢在一边的冲动越来越控制着他，尽

管由此而产生的愧疚感很快就会使他谈论起自杀来。

那么，那年秋天究竟谁实际上是他定期的性伙伴呢？反正不是达夫·特怀斯登。从潘普洛纳回来后，他从未去见过她。10月1日前后她给海明威寄过一封信。那封信明显地表明，对他俩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已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魔力。那封信是用德朗布尔大街一家画室公寓旅馆的信纸写的，但实际上达夫当时正住在巴黎市外，目的是为了节省。她正迫切地需要省钱。在她的请求下，唐·斯图尔特曾为她付清了潘普洛纳的旅馆帐单。可现在她又在寻求别的朋友帮她支付其他的帐单。

我亲爱的厄内斯特，请原谅我这样做，可你能够借给我一些钱吗？我手头拮据得要命，但这不过只是暂时的情况而已，我一定会还钱给你。我想借3000法郎。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尽力多借一些给我。……如果你能够或愿意成为天使的话，在你接到这封信后，能否立刻给这里酒吧的弗雷德留下一个答复呢？我已是坐立不安，所以希望你真地能够原谅这一切。……祝你好运。你永远的朋友，达夫·特怀斯登。

这封信是地道的交易。达夫就是想要她过去的酒友和旅行伙伴借给她钱，此外别无他求。特怀斯登女士的浪漫目光已经转移到了新的地平线。与此同时，她也不会没有在疯人酒馆里听说，最近人们常常见到海明威与来自美国的两位富裕的年轻女子厮混在一起。她们是保利娜·普法伊弗和吉尼·普法伊弗。

五

出于巧合，保利娜和吉尼的父亲正像哈德莉的父亲一样也是圣路易斯人。年轻时，他曾从事过他的家庭所拥有的医药生意。不过，如果说哈德莉的父亲完全是无可奈何才经了商，那么保罗·普法伊弗则是着急上火地要发家致富。在小城镇里建立了一连串成功的药店之后，他开始扩充业务涉足农业。在阿肯色州皮戈特镇的附近，他以一美元一公顷的精明价格巧妙地收买了六万公顷土地的所有权。他从遥远的衣阿华州和伊利诺伊州雇来了佃农，生产棉花、玉米、小麦和大豆。转眼间普法伊弗就拥有了皮戈特镇的银行、轧棉机，还有城里最大的住宅。他在住宅里堆满了巨大的德国式家具，那可以让他想起他的祖先们生活过的祖国。遵照他的进一步指示，住宅里有一间房被装修成了小教堂，因为尽管普法伊弗本人对宗教毫无兴趣，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她希望他们的四个孩子能够照着她的信仰去生活。

保利娜是一个热爱读书、享有写作天分的既灵敏聪慧又性格严肃的姑娘。高中时，她就学于圣路易斯的圣母女修道会学校；后在密苏里大学主修新闻学。1918年，她受聘为克里夫兰《星报》工作。然后，她到了纽约的《每日电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作品吸引了《名利场》的主编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的目光。他当时正在寻找一位时装记者和广告员。尽管她在《名利场》的任职期限和埃德蒙·威尔逊的任职期限部分巧合，但在他当时的日记中却从未提到过她。这并不是说她不够书生气，也不是说她对机构内部文人学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感兴趣，只是说她的社会轨道与威尔逊的轨道从未发生过交叉。保利娜最亲近的亲戚格斯·普法伊弗叔叔和他的妻子路易斯居住在曼哈顿。下班后，保利娜习惯于回到她在叔叔家豪华的临时住所去放松自己。格斯和另一个颇有天才的普法伊弗氏兄弟拥有理查德·赫德纳特香

料公司、斯隆药剂店和威廉·沃纳制药厂。通过格斯叔叔，保利娜认识了赫德纳特香料公司的一位名叫马修·赫罗尔德的官员，接着便一时冲动地同意了与他结婚。经过再三思考，她对自己是否真地爱上他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当巴黎《时尚》杂志的主编曼堡歇尔主动为她提供了助手的职位时，她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远在 3000 英里之外，她对未婚夫究竟有无感情肯定会变得更为显豁明确。

她在妹妹吉尼的陪伴下渡过了大西洋。吉尼随时随地都是自由的，因为与保利娜不同，吉尼看不出年轻富裕的女子究竟有什么必要为了谋生而工作。在巴黎，在 1925 年的头几个月里，这对姐妹和一些出身于殷实家庭的美国同胞们常常欢聚一堂，例如杰拉尔德·墨菲和萨拉·墨菲，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还有哈罗德·洛布。3 月的一个阴冷的下午，在洛布的公寓里，男主人和他的女友基蒂·坎内尔把普法伊弗姐妹和刚从奥地利返回巴黎的海明威夫妇聚到了一起。洛布想要庆祝一下他的作家伙伴与博尼·利夫莱特公司新近签署的出书合同。

海明威不可能怀疑保利娜和吉尼是一对姐妹。她俩的深棕色头发都剪成了“荷兰姑娘式”的短发，前额梳着刘海儿。两人的身材都娇小玲珑，肌肤细腻，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哈德莉自怀孕以来增加的体重一直没能减轻，可这对姐妹却与她不同，她俩都苗条得有如纤细的柳条。在海明威的眼中，保利娜的另一个长处是她漂亮雅致的衣着与人们所想象的曼堡歇尔的助手正相吻合，特别是那个寒冷的下午她所穿的那件上装，在洛布的公寓里简直是绝色无双。而吉尼的诱人之处由于她那冷嘲热讽的机智和举手投足间的自负与不可一世更是有增无减。与保利娜一样，吉尼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所追所求非常清楚的女人。在她的追求中，高居首位的是其他女人的爱护和陪伴。虽说她也愿意和男人们一道厮混，但她的性要求却显然是女性的同性恋，而且将一直如此持续下去。至于保利娜的性要求，还有一些疑问。40 年代，托比·布鲁斯是海明威的司机兼零工。在基韦斯特岛，他为海明威和保利娜工作过。海明威曾经告诉他，吉尼正在劝说她的姐姐在性的问题上转向她那一边。尽管这个说法也许不无猜测，但保利娜在和海明威离婚后确实实与几位妇女有过爱情关系。在她和海明威相识之前她有过类似的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平心而论，在大学时，哈德莉就曾是同室女友的母亲爱抚的对象，保利娜在海明威家庭首先注目的成员也很有可能就是她。因为，在洛布家见面后不几天，保利娜和吉尼就顺便来到海明威家造访，她们要见的正是哈德莉。而且，那天，没有刮胡子的房子的主人正叉手叉脚地仰面躺在皱皱巴巴、凌乱不堪的床上读书，让保利娜一时看在眼里，顿感受到了侮辱。保利娜日后告诉基蒂·坎内尔说，她无法理解哈德莉怎么能忍受在如此卑贱的环境中生活，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丑东西陪伴在一起。然而，哈德莉仍然是一往情深。是不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保利娜才决定去追求她丈夫的呢？

反正，保利娜对海明威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巨变。他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他幽默诙谐、英勇果敢。她的未婚夫马修·赫罗尔德完全无法与此人相媲美。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她甚而采用了小姑娘的诡计。她会说：“那天我和别人谈起了你。”海明威就会回答：“是吗？他说了些什么？”虽然海明威起初对吉尼更感兴趣，——他曾向基蒂·坎内尔坦白说：“我真想把她塞进她姐姐的衣服。”——但保利娜的百般妩媚很容易就把他争取了过去。

1925 年，在他们结识后的整个春末和夏初，无论何时他们相逢，她都不

停地用甜言蜜语去奉承他。通过滔滔不绝地评论过去的和新近的小说，通过多少有些喋喋不休地谈论《名利场》杂志社里的逸闻趣事，她努力向他显示着：与他现任的妻子相比，她可要具有更多的文学气质。通过表现她的活泼和精力，她也让他意识到她比哈德莉可要苗条得多，年轻得多，尽管她比海明威大四岁。8月份，海明威回到巴黎时，保利娜再次恢复了她的攻势。哈德莉由此卷入了一场争夺丈夫的战斗。如果说她对目前的处境多少表现出了某些意识的话，这种意识表现在她新近学会的为海明威演奏的钢琴曲目的数量上。随着秋叶的变红和飘落，海明威发现自己陷入了不知该忠诚于谁的矛盾中间。他后来提醒保利娜说：“我曾非常镇定地说过，如果这件事到圣诞节时还不能了结的话，我就会自杀，因为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无法了结。我说这话完全不是为了吓唬人。”

情场不顺，赌场得意。埃文·希普曼擅长鉴别马，偶尔也写写诗。他从经销胡安·米罗的艺术品的巴黎商人那儿得到许诺，他可以用5000法郎的价格买下一幅他渴望已久的被西班牙人称作“农场”的油画。但是，满腹内疚的海明威也想把“农场”这幅画送给哈德莉，庆祝她11月9日34岁的生日。得知了他的朋友对这幅画的兴趣后，希普曼大度地提出他们以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谁有权购买油画。海明威赢得了这次赌博。在多斯·帕索斯和其他阔气的朋友的稍稍帮助下，他筹集到了5000法郎。随之他得意洋洋地乘坐出租车把油画扛回了家，挂在他和哈德莉的大床上方。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一起看着“农场”这幅油画是头一次令他们感到辛酸的时刻，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曾经是那么地快乐。六那年秋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导致海明威和哈德莉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而保利娜则竭尽全力充分利用了这次事件。10月5日，博尼·利夫莱特公司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印数1335本。只有海明威才确信它能立刻销售一空。题献页上写着：“献给哈德莉·理查森·海明威。”在该书浅灰色的防尘护封背面是一批知名作家和评论家赞扬作者才华的文字，包括爱德华·J·奥布赖恩、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海明威立刻就为使用了安德森的吹捧短文而感到后悔，因为它怂恿读者不断地比较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他已经腻烦了老是听别人说他是安德森的弟子，或者说他也同样明显地受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必须解除这两个家伙对自己的压迫。好似忽然受到了启发，他意识到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模仿安德森最近的小说《阴险的笑》写一部袖珍滑稽作品。他认为，《阴险的笑》简直糟不可言。他可以至少对其中的几页内容添油加醋地敲打一番，对他这位弗勒吕斯大街上可敬的朋友稍事冷嘲热讽。不管怎么说，肯定是由于托克莱斯小姐的阴谋诡计，安德森近来总是让他感到日子不好过。

（在谈到斯泰因小姐的成就时，我们这位故意用模仿来取笑他人的作家感叹道：“啊，有这么一个女人！她在文字中的试验将把人引向何方呢？试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同时，创作这样一本书也可以使他斩断与博尼·利夫莱特公司之间的联系。因为，作为安德森的出版商和私交甚笃的朋友，霍勒斯·利夫莱特只能拒绝这本书。这样一来，海明威就可以自由地和斯克里布纳、哈考特、布雷斯和其他一些更有名望的出版公司签订合同了。

只要他可以允许自己忘记过去多年来安德森对他是多么地善良，那么他的主意算得上是天衣无缝。然而，哈德莉却并不打算让他忘记过去。她对他

直言相告，她认为他的想法“令人恶心”。可海明威对此并不在意，正像多年以前他对母亲的道德说教毫不在意一样。而且，她的直言并不能阻止他。

从屠格涅夫那里他借用了《春潮》这个书名，从11月中旬开始写作这本小书，到感恩节时完稿。哈德莉读过之后，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为安德森感到难过。她希望海明威不要出版这本书。多斯·帕索斯也同样建议他把书稿保留起来。他承认，书中的有些地方是比较幽默，但总体上说他觉得这书“还不够好，不足以独自成为一部滑稽性模仿类作品”。再说，海明威有什么必要去砍砍杀杀一位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过去曾经写过一些好小说的作家呢？但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却说了一些海明威很愿意听的话。保利娜也是如此。菲茨杰拉德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人写的最好的一部喜剧书。”保利娜赞同说：棒极了。她极力劝说海明威务必把书寄给利夫莱特。

哈德莉和保利娜关于《春潮》的分歧不仅涉及文学，而且涉及道德。这也是她们两人为了努力争夺她们都热爱的那个男人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这场斗争对她们来说是如此地至关重要，不要说精于算计的保利娜，就连说话坦诚的哈德莉也不敢在海明威面前谈起该书对他们三人之间痛苦的三角关系的黑色幽默性描述。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讽刺性模仿《阴险的笑》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如果把彼得·昆内尔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中所说的一些赞美之词加以诠释的话，那么，神秘的印第安人的疯狂而又遥远的战争叫嚣就可以取代黑人女仆们的阴险的笑；嗜酒如命的斯克里普斯·奥尼尔也就像安德森的斯庞奇·马丁一样是在用他那杂乱无章然而又自命不凡的思想在作斗争，就如同刚从糖浆中挣脱出来的苍蝇一般艰难地拖着自己横穿过小说的一页又一页。表面上看，这本书在引用方面过于随意和荒唐，什么海斯曼斯、华兹华斯、卡尔文·柯立芝、史蒂夫·布罗迪、考克西的军队、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的《名利场》、门肯的《美国信使》和斯科菲尔德·塞耶的《日晷》，等等，等等。表面上看，这本书的下流粗俗的语言经过了机智巧妙的陶冶，它的反讽处理得超凡绝顶、经久不衰，以至于艾伦·泰特备受鼓舞，在《民族》一书中为其热情欢呼，称其为“一部袖珍的美国小说杰作”。然而实际上，在这一切表面之下，《春潮》写的是海明威和他的女人们，小说的风格是安德森式的粗笨的乡巴佬风格。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长着一副瘦瘦长长的脸。他一路闯进了密执安州佩托斯基小镇的一家大众化的廉价小饭馆。小饭馆的题词自吹自擂地保证它是“天下最佳”。里面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想要讲述一个奇特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哈德莉·理查森象征性地成了格雷丝·海明威的女儿。这位上了年纪的女招待名叫黛安娜。她说，她出生在英国，也是在英国长大，更确切地说，是在英国的湖泊地区。（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暗暗想到：“那是一片长着金色水仙花的田野。风吹拂着温德米尔湖。”）女招待继续讲述着她那无与伦比的故事。她说，当她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时，她的妈妈把她带到了巴黎。那差不多正好是1900年巴黎博览会召开的时候。（那一年哈德莉长到了八岁。）他们在一家理发店停了下来，买了一些嗅盐，然后在附近的旅店里要了一套与理发店毗连的房间。第二天一早，黛安娜醒来时，发现躺在她妈妈床上的是一位年老的法国将军。（母亲变成了军人，真是有趣的变形。）小姑娘问：我妈妈呢？可将军却说她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向她保证，在旅店里租下这套房间的正是他和黛安娜。小

姑娘跑下楼去查看了旅店的记录，发现记录的情况与将军说的一样。后来，在理发店里，人们也告诉她前一天她是和一位年老的法国将军一起到店来的。漂亮的小姑娘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母亲。与她告别时，法国将军给了她100法郎。带着这个馈赠，她得以到了美国，并且在许多许多年后见到了这位瘦瘦高高的斯克里普斯·奥尼尔。

斯克里普斯喜欢同这位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混在一起。他喜欢倾听她那“活生生的”语言和想着她那“离奇古怪的过去”。斯克里普斯同女招待结了婚。然而不久之后，一位“替补女招待”出现在小饭馆里。这是一位“健康丰满、快活有趣的姑娘”。新的女招待名叫曼蒂。她的活力与健康吸引了斯克里普斯。同时，他也为她随口就能讲来的各种文学轶事所激动，为她所讲述的亨利·詹姆斯的故事所感动：当英国的功勋奖章送到他面前时，老态龙钟的詹姆斯指示他的护士把灯关掉，免得别人看见他脸红。斯克里普斯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曼蒂。

在斯克里普斯的配偶看来，曼蒂“并不比一个荡妇更好”。她意识到了威胁，气愤得浑身发抖。她问自己：“追求别的女人的男人，插在别的女人和丈夫之间，用这些没完没了的文学往事和没完没了的逸闻趣事去破坏别人的家庭，难道能够这样？难道做这件事还对不成？”为了拼死拼活地与曼蒂进行智力上的竞争，这位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订购了《哈泼》杂志。但是，她并不能确信这个花招就一定能起作用。她能守得住他吗？她能守得住他吗？她神经质地想要知道答案。

最后，小饭馆里只剩下了三个人：斯克里普斯、他那上了年纪的妻子和强健的曼蒂。斯克里普斯的眼里只有曼蒂。他的妻子感觉到她与婚姻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她知道一切都完了。”为了最后拼死挽回斯克里普斯的兴趣，她谈到了门肯新近在《美国信使》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按摩脊柱治疗的文章。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斯克里普斯的妻子离开了小饭馆。“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斯克里普斯告诉曼蒂。可到了晚上，斯克里普斯对自己的感情再也不是那么十拿九稳了。这出小小的戏剧在一种满是狐疑的语气中结尾。

小饭馆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曼蒂继续说着话。她现在是他的女人了，而他是她的男人。但是，他是她的男人吗？……曼蒂继续说着话。讲述着一些文学的往事。是真实的事件。……但是，难道这就够了吗？斯克里普斯茫然了。她是他的女人。但是能够持续多久？

《春潮》是一篇有趣的故事，有些地方甚至是非常有趣。彼得·昆内尔和艾伦·泰特的颂词并不为过。可是，如果把这部讽刺性作品放在海明威婚姻危机的环境下来阅读，如果人们还记得海明威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哈德莉和保利娜两个人正在他的脑海里盘旋，而且她们两个人都在得到手稿的那一刻就阅读了这部作品，那么，它的令人厌恶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诚然，作者当时是正在与一阵又一阵的沮丧之情作斗争，黑色幽默既可以替代手枪也可以为作品增色。但与往常一样，他的孤芳自赏也许使他忘记了别人的感情。或

这是一个证明了一种小说理论的结尾。海明威后来成功地劝说菲茨杰拉德采用了这种理论。正像《夜色温柔》的作者1934年4月在写给约翰·皮尔·毕晓普的一封信里所解释的那样：“我确信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在一次谈话中向我详尽阐述了这个观点：在某些情况下，萧索的晚秋比戏剧化的结尾更好。”

者也许他已意识到他的忧思几乎是毫不掩饰的，可他也毫不在乎。他和哈德莉还要在一起生活好几个月，他和保利娜的结合也将持续多年。但是，两个女人的婚姻末日已经在《春潮》中写得明明白白，并且还说明了她们为何会遭到抛弃的让人感到侮辱的缘由。讽刺者把哈德莉和保利娜描写成两个卑躬屈膝地急于讨好于他的女人，——就其最有辱人格的含义而言，女招待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却表示迟早她们都得离开。哈德莉得走，是因为她太老；而保利娜则是因为过于健谈。考虑到 1925 年的秋天这两个女人的心里都满怀希望，她们肯定会不时地否认事实，自我安慰。《春潮》影射的并不是她们，而是《阴险的笑》中的人物。但是，她们两人就真地会完全相信这一点吗？我们很难想象她们能够如此轻易地摆脱怀疑的阴影。

七

11 月 25 日，保罗·罗森菲尔德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在我们的时代里》的评论。它更加证实了海明威的信念：如果他想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与舍伍德·安德森拉开距离。因为，在罗森菲尔德赞扬海明威的文体“极具蓄而待发的抒情风格、勃勃生气和旺盛活力”的同时，在他把海明威的节奏比喻成斯特拉温斯基《春天的加冕礼》中“连续不断的嘭嘭声”的同时，他也指出《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措辞与安德森的俗语用法如出一辙，而且它对某些字词的“反复强调”源于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实践。纽约《晚邮报》上赫舍尔·布里克尔的评论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受到的唯一负面评论。然而即使是在这篇评论中安德森的名字也再次出现。布里克尔宣称，海明威的小说几乎算不上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只有《我的老头儿》除外，这篇小说的质量甚至连《我想知道为什么》的作者也无法超越。

为了说服自己他对霍勒斯·利夫莱特的背叛是合情合理的，海明威又采取了另一个行动方针。他没有指责书评，而是将矛头直指销售量。自出版两个月来，小小的第一版《在我们的时代里》并未销售一空。错误是在广大的读者一方，是因为他们历来就不大喜欢购买短篇小说集吗？不，心怀不满的作者认定，错误是在利夫莱特一边，因为这位出版商从来就不相信这本书能够畅销，他从来就没有促销，从来就没有作过广告。在 12 月 7 日写给利夫莱特的一封信中，海明威告诉他《春潮》的书稿将分成几个邮包寄给他。他希望能够通过电报“立刻”得知关于这本书的决定。他说，他对销售《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方法感到不愉快。“在封面上”收集的“所有那些吹捧性短评”是一个坏主意，因为那“只会让读者心存戒意”，“其中的每一篇本来可以单独使用，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宣传文章”。

自从离开《星报》以后，海明威一直提醒自己他实际上已没有了收入。他只有以消耗他们存款的方式来支付他和哈德莉的旅行费用。为了买下米罗的“农场”，他也只好借钱。他已经厌恶了这种生活方式。他意识到自己对利夫莱特玩弄了十分卑鄙的伎俩。在他准备掩盖这种意识的同时，他也更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他本来是可以利用《在我们的时代里》的版税来满足妻子和孩子的基本需要的。他越是想着利夫莱特，就越是怒不可遏。如果说田园圣母院大街上的婚姻关系摇摇欲坠，那么其中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和哈德莉的经济困难，而纽约的那位犹太人出版商却坐视不顾，未尽任何缓和之力。（菲茨杰拉德对马克斯·珀金斯报告说：“听他说起这事，你会以为利夫莱特破坏了他的家庭，抢了他几百万美元似的。”）海明威得

出结论，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写作《春潮》他是被迫的。给利夫莱特寄去一部他事先就知道会被拒绝的书稿是他唯一摆脱犹太人的魔爪并转移到一位更体面的出版商那儿去的方法。总之，并不是他以双重骗局背叛了利夫莱特，而是利夫莱特背叛了他。

自找的愤怒、自以为是牺牲品的自怜和信手拈来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一切不仅仅把海明威的日积月累的内疚付之一炬，而且点燃了创作《五万元》的火花。12月初他开始写作这篇短篇小说，一周之内就完了稿。他告诉菲茨杰拉德：“对我来说，写起来是轻而易举。”

按照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心理跳跃，这位作者的心从文学的世界转移到了体育世界，他把对霍勒斯·利夫莱特的丑恶情感转换成了对在比赛场上人称本尼·伦纳德的著名犹太人拳击手的丑恶情感。1922年6月22日，在纽约的露天赛场里，在15场的拳击赛打到第十三场时，世界轻量级冠军伦纳德用一记击打对方腰部以下部位的低拳击中了次中量级拳王杰克·布里顿。由于对方的犯规，布里顿被宣布为得胜者。海明威一次又一次地仔细琢磨那场比赛的事件，不断地重新安排它们的顺序，扩大它们的内涵，直至它们能够发泄他对利夫莱特和另外一对犹太人所想发泄的一切愤怒。而他正好擅长于此。

次中量级拳击手杰克·布伦南是一个忠于家庭的男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他呆在泽西的霍根健身场进行训练。他不停地对他的训练者——也就是《五万元》的叙述者——杰里·多伊尔说他是多么思念他的妻子，而杰里自己也注意到杰克每天都给妻子写一封信。杰克晚上很难入睡，其中的原因更加证明了他是一个把家庭的责任看得十分严肃的男人。“你睡不着的时候，杰克，你在想些什么？”杰里问。“啊，我担心，”杰克说，“我担心我在布郎克斯置的产业。我担心我在佛罗里达置的产业。我担心孩子们。我担心老婆。……我有一些股票，我为股票担心。我他妈的还有什么没有想到呢？”

在汉利的小酒店里吃午饭时，杰克向杰里透露他对与未来的对手对阵时有多大的得胜机会感到怀疑。他说：“跟那个小子较量，我需要好运气。”杰里告诉他，“像对付小家伙刘易斯那样对付他。”小说的叙述者突然间提到了犹太佬。“小家伙刘易斯，”杰克嗤之以鼻地说。“那个臭犹太人！”一对在旁边的桌子上已经喝了一会儿酒的妓女听到了这句话，其中一人对此表示了反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臭犹太人？”她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臭犹太人？你这个爱尔兰大草包。”“当然啦，”杰克说，“说得对。”那个妓女继续说：“臭犹太人，他们老是谈到臭犹太人，这些大个子的爱尔兰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臭犹太人？”杰克对杰里建议说他们离开得了。“臭犹太人，”那个妓女又说道：“谁看到你买过一杯酒？你老婆每天早晨都把你的口袋缝起来。这帮爱尔兰人和他们的臭犹太人！”杰克听到了最后的话。“当然啦，”他说。“你也白白赔送了许多东西，对不？”

这些刺人的对骂只有倒过来听才能符合作者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因为，从那个表面上抗议臭犹太人的人嘴里只冒出了一句咒骂臭犹太人的感叹。海明威在《五万元》里从头至尾都站在杰克·布伦南一边。如果杰克过分大声地叱责犹太人，就有可能发生读者厌恶他的情形。海明威便从创作者的角度巧妙地引入了一个喝醉了酒的“娼妓”，让她在不到半页的篇幅内连续七次重复了杰克的骂人之词，以此他保护着杰克不要丧失了读者的同情。

尽管海明威历来一意孤行，但与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相比，他是一个

更有自制力的人。为了进一步淡化偏见的痕迹，他对那位在麦迪逊街心花园最终与杰克打成平局的拳击手的种族和身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态度。（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因为海明威毕竟是想把《五万元》卖给一家美国主流杂志，如《柯里尔》或《星期六晚邮报》。）海明威当然认为那个拳击手是个犹太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写作《五万元》时心里想的是杰克·布里顿与本尼·伦纳德之战，而且是因为他把他笔下英雄的对手和霍勒斯·利夫莱特等同了起来。挑战者的经纪人索利·弗里德曼显然是个犹太人，可索利却说他的拳击手“有点像丹麦人”，也许是由于他长着一头金发。但是，赛场边为他们递手套的那个男孩却一口咬定挑战者是个波希米亚人。为了把水搅得更混，也是为了创造另一个诋毁的机会，吉米·沃尔科特是挑战者的比赛用名，而不是他真实的姓名。当两个对手走进赛场中央触摸手套时，杰克嘲笑似地问他的对手：“你干吗管自己叫‘沃尔科特’？你不知道他是个黑鬼吗？”

小说中另有两个人也是犹太人，至少在海明威的心目中是如此。一天下午，一对赌场经营者在杰克的经纪人约翰·柯林斯的陪同下出现在训练场上。他们的名字叫摩根和斯坦菲尔特。体育赌博可以说是他们的游戏，只是照杰克的话说，“他们一点儿也不肯冒险，那两个家伙”。不管怎么说，杰克不大可能战胜沃尔科特，然而为了确保他会失败，这两个衣着时髦的陌生人说服他拿出自己的五万美元来押在他最喜欢的对手身上。杰克后来告诉杰里：“我会到手 25000 美元（的利润）。”按情理，摩根和斯坦菲尔特也会在沃尔科特的身上重重地押上一笔。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巧妙的双重骗局。他们已经收买了沃尔科特以犯规的形式输给杰克。他们的钱押在杰克身上。尽管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遭人暗算，杰克还是不无讽刺地这样评说这些贪婪奸诈的骗子：他们是“一伙精明的家伙”。通过这两个卑鄙小人，海明威暗地里贬低了两位他以前曾经追随过的犹太人。通过斯坦菲尔特，他奚落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是他第二次奚落她。通过摩根，他继《太阳照常升起》中对哈罗德·洛布发动的攻击之后再一次轻蔑地攻击了他，尽管摩根这个名字在华尔街上比库恩和洛布更富有传奇性。

关于杰克·布伦南最后一战的叙述是《五万元》中的高潮。透过这一成就可以说海明威已经为下一个 10 年做好了准备。首先，他所掌握的有关拳击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自从读高中以来，他不仅亲自参加拳击，而且常常在有职业拳击手训练的体育馆转悠，因而掌握了大量的奇闻轶事。在大西洋两岸的赛场里，他曾见识过二三十场拳击；在报纸上又读到过关于无数次其他比赛的跟踪报道。最后，他还曾爱不释手地仔细研究过林·拉德纳的有关拳击的短篇小说和专栏文章。（正是因为评论家们认为他和拉德纳在写作上多少有些相像，令他感到恼怒。在《五万元》中，海明威出人意料地随意批评了拉德纳。不幸的是，这也正好说明他历来有对恩师忘恩负义的习惯。在回忆起杰克·登普西从巨人杰斯·威拉德的手中摘下了重量级皇冠的那个赤日炎炎的下午时，杰里·多伊尔说：“那个拉德纳，他现在可真够聪明的，问问他，问问他在托莱多批评威拉德不行的那回事吧。”）不过，即便认定海明威本可以写一部关于拳击的百科历史，作为小说家，他并没有忘记“少即是多”。《五万元》最初发表在精装本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中。多萝西·帕克在《纽约人》上评论这部书时这样评论海明威：他的选择意识“从不出错”。“他大手大脚、过分慷慨地丢弃了细节；他把他的字句固定在捷径上。”

经过了最初几个回合的精疲力竭的苦战之后，杰克被击倒在地，裁判员数到了八。当他再一次站起来后，沃尔科特就向他走过去。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输掉比赛。他竭尽全力用右手猛击杰克的身子，而且尽可能打得低。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打在了腰带以下五英寸的地方。杰克疼得眼睛都要从头上掉下来了。他行走的姿态好似他的五脏六腑都要滚落到地上。然而如果他倒下了，他就会失去他的五万美元。“来打啊”，他用嘶哑的声音对沃尔科特嚷道。杰克疯狂地击打沃尔科特的头，挑战者遮拦着。

接着，他狠命地打出左手拳，打中了沃尔科特的腹股沟，紧跟着他的右手拳砰地打在沃尔科特曾打中他的那个部位。大大地低于腰带。沃尔科特倒了下去，抓住身上的那个地方，扭曲着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

比赛结束了。沃尔科特因对方犯规赢得了比赛。双重骗局没有奏效。摩根和斯坦菲尔特秘密押在杰克身上的赌注输掉了，他们在沃尔科特跟前肯定曾经许诺过的大笔贿赂也不会再支付了。

在她对《没有女人的男人》的评论中，多萝西·帕克谈到了海明威1927年对其他作家所施加的“危险的影响”。“他所做的简单的事情看上去是那么容易做”，她评论说：“但你看看那些也在尝试着做这事的孩子们吧。”无论如何，《五万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一个表面玩世不恭、野蛮残忍的拳击小说后面，隐藏着海明威丑恶的愿望。也就是说，他深信一个犹太出版商击中了他的腹股沟，因此他也就完全有权以牙还牙。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错等于一个对。随着寓意巧妙的颠倒，杰克·布伦南成了英雄，而海明威本人的贪婪也得到了辩护。

八

海明威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评论说：施伦斯是读书的好地方。1925年至1926年的冬天，他在那儿就努力读了不少的书。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接着他读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他认为，《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一半写得“相当不错”，但却不如他接下来读的威尔基·柯林斯的《月长石》那么令人快乐。之后，他还阅读了自少年时代起就未能再读但发现自己仍然喜欢读的马里亚特船长的《彼得·辛普尔》、萨默塞特·毛姆的《人间的枷锁》、康拉德的《潮水之间》和两本带有插图的德国战争书籍：第一本描写的是意大利前线山区里的战斗，为他日后构思《永别了，武器》里的某些事件提供了一臂之力；第二本是维腾贝格火炮史。出于人们可以理解的原因，他还急不可耐地翻阅了《这一季》的秋—冬季号杂志，因为除了其他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外，这一期杂志还发表了《没有被斗败的人》和编辑厄内斯特·沃尔什关于《在我们的时代里》的评论。（沃尔什评论说：“读海明威的小说，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早在他开始写作很久之前，这位作家就已从里到外作好了准备。”）海明威认为这篇评论写得“漂亮”，但重读《没有被斗败的人》却让人感到失望。这篇小说不像他在写作时认定的那么好。“噢，天哪，”他对沃尔什感叹说：“我是那么想把东西写好，因而一想到我曾经以为自己写得是那么好而显然却是一塌糊涂时，我就感到痛心。”

同样让他感到痛心的是沃尔什对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新短篇小说集的

赞不绝口的评价。一直以来，海明威对作家麦克阿尔蒙的评价是极低的；1925年秋天，随着他对麦克阿尔蒙的为人的评价再次处于低潮，更加降低了他对作家麦克阿尔蒙的评价。麦克阿尔蒙喜欢恶毒地谈论别人的私事。他四处传播流言蜚语，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个同性恋。听到这个消息后，海明威当面叱责了造谣惑众者。事后，海明威的一些朋友对他汇报说，在这之后的连续几个夜晚，麦克阿尔蒙都到处宣称《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作者是一头忘恩负义的猪，他忘记了他能开始成为一个作家多亏了联络出版公司。海明威因此判定麦克阿尔蒙是“一个婊子养的，他的心就像是长到肉里去的脚指甲”。不过，即使海明威与这位作者的私交仍然亲密，他肯定还是会反对沃尔什对麦克阿尔蒙的书的赞美。因为按照沃尔什的轻率的评判，麦克阿尔蒙的才能超过了马克·吐温。海明威回信说：你说得不错，不过只是在“马克·吐温写了大量的糟粕”的意义上你是正确的。

他还写了一部——也只有一部——非常奇妙的东西：哈克·费恩。如果你现在读哈克贝利·费恩，向上帝保证你一定要像我在大约三个月前重读该书时那样去读它。不要读马克·吐温的其他东西，就读哈克贝利·费恩，最后几章是由豪厄尔斯或什么人增补上去用以结尾的。小说结束时，黑鬼吉姆被人抓住，哈克发现自己孤单一入，而他的黑奴不见了。就是那个结尾。请你读一下哈克贝利·费恩。说真的，如果你还真地相信麦克阿尔蒙曾经写过什么东西或者他的东西加起来可以与哈克贝利·费恩放在同一间房间、同一座楼房、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大洲或同一个杂志里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我就会停止写作，因为如果能有这样的事情，写作还有他妈的什么用。

海明威在施伦斯读的大部分书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令他着迷。不过，那个冬天，他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渴望去读它们，为的是避而不想他个人的生活。他曾告诉过保利娜，如果到圣诞节时他感情中的裂缝还不能得到弥补，他就会自杀。1925年的圣诞节，海明威和哈德莉还有两岁的勃姆比一起在雪中玩耍；那天下午，他也等待着保利娜的来临。她将和他们一起就住在那儿的陶伯旅馆里。对于处在三角关系中的这个男人来说，这一处境既令人欢喜也有如恶梦一般糟糕透顶。在一封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他说起了“我所做的”一切“婊子养的事情”总是萦绕在他的心头，致使他夜晚无法入睡。极度痛苦之中，他还数次乞灵于基督的名字：“基督的鼻子”、“看在基督的份上”和“今天上午仿佛基督一般处在苦不堪言的情绪之中”。几个月后，他向同一位通信者承认：在施伦斯时，他已跌落到地狱中。“大量的失眠照亮了周围的道路，因而我可以研究地形。”他只想到了一个解脱的方式。在天主教盛行的奥地利，在天主的圣诞佳节，眼前又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保利娜为榜样，他便向上帝寻求帮助。

与橡树园的巴顿医生所宣扬的宗教不同，保利娜的信仰并没有忘记十字，而这一事实构成了它对海明威的主要吸引力之一。长期以来，海明威一直对曼泰尼亚的《死去的基督》迷恋不已。这表明他深深地热爱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然而在天主教正视人类社会受苦受难的同时，它也饶恕着人们此时此地所犯下的罪恶。这一事实对于一个被内疚折磨得发疯的男人来说也是异常重要的。几乎可以肯定，自初夏以来，保利娜就一直领着他去教堂，后来又和他谈到了祈祷的习惯。她强调了祈祷的益处，而他却怀

疑祈祷的效力。因为，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类似的对待祈祷态度的差异就曾出现在杰克·巴恩斯和布雷特·阿什利之间的对话里。

“我从来也没得到过祈祷的好处。你得到过吗？”

“哦，有过。”

“胡说”，布雷特说。“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灵验。你看来也不怎么虔诚嘛，杰克。”

“我很虔诚。”

“胡说”，布雷特说。“你今天别来劝诱人家信教这一套啦。”

海明威声称，在他负伤的那天夜里，一位牧师曾经对他喃喃地说过一些洗礼之类的话。对此，海明威的朋友们多年来已经耳熟能详。但是，直到1926年1月2日他从施伦斯给本身身为天主教徒的厄内斯特·沃尔什写了一封信之前，他从未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正是由于他和那位女人的关系所导致的精神痛苦，也正是由于那位女人一直告诉他她知道如何能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才促使他接受了她的信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保利娜劝诱海明威信教的成功立刻就使她在与哈德莉的秘而不宣、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取得了另一个优势。天主教是她和厄内斯特之间的纽带，而哈德莉却被抛在了一边。

不过，《太阳照常升起》很快就会显示出，祈祷只是断断续续地对杰克·巴恩斯很有用，尽管他把自己描绘成“很虔诚”。例如，在他到达潘普洛纳的那天下午，他走进了大教堂，把头靠在前面长木凳的靠背上跪着自己祈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最后他承认，“我有些害臊，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我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至少在这一阵，或许永远。不过，怎么说天主教还是一种伟大的宗教，但愿我有虔敬之心，或许下回来时我会有的。然后，我来到灼热的阳光下，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依然湿漉漉的，我感到它们在太阳下被晒干了。”这个场面的真诚是令人崇敬的。身体的细节有如画面。可杰克的祈祷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并未说明。要想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作者的处境。虽然海明威激烈地反对他儿时所接触的新教主义，但它的道德说教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置之脑后的。早在很久以前，海明威医生就曾说过他的儿子自私自利，心如铁石；早在很久以前，他的母亲就曾指责他试图用不正当的手段剥夺别人的生活。这些判断至今仍然站得住脚，而海明威也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按照他的理解，天主教解脱人们精神负担的方法也决不可能总是能够减轻他的痛苦。“听着，杰克”，比尔·戈顿悄悄地对他说：“你真是天主教徒吗？”“按规定来说，是的”，杰克简洁地回答道。“那是什么意思？”比尔问。“不知道。”比尔得到的回答却简短得、模糊得令人苦恼。在这个回答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海明威在写《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在巴黎的天主教堂里第一次感觉到的对宗教的失望。他在奥地利重写这部小说的那几个月里，他再次感觉到了这种失望。

他为天主教所强烈地吸引，但对它无法始终如一地帮助他又感到深深地失望。随之而来的，是他私下里形成并采取了一种更悲观的宗教见解。这种见解强调人类的生活是无望的，上帝是冷漠的，而宇宙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毫无意义地转动着直至永远。

九

利夫莱特的电报于12月30日到达陶伯旅馆：“拒绝《春潮》，耐心等待《太阳照常升起》的全部手稿。”“这么说”明威说道：“我就自由了。”在她的心里，哈德莉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去鼓励她的丈夫寻求另一家出版商出版他的讽刺作品，可保利娜却紧握双拳，有如斗架一般激动地说他必须立刻就这样做。

他的面前有三种选择，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是一位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小说家。他的畅销书《绿色的海湾树》（1924）使他得以在巴黎市外的一个游览区过上了乡间绅士的生活。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前，他写信给施伦斯，说他对他的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哈考特提到了他可能得到海明威的作品。布罗姆菲尔德高兴地报告了出版商的反应。哈考特是《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崇拜者，他非常愿意能够看到一部关于舍伍德·安德森的书。布罗姆菲尔德引用他的话说，这本书“也许会让整个国家震惊”。另外，海明威也接到了一封从克诺夫寄来的威廉·阿斯彭沃尔·布拉德利的信，其中表明了和他签约的强烈兴趣。最后，还有马克斯·珀金斯。头年春天，海明威在回复他的询问时曾许诺他在有空时一定会寄给他一部手稿。海明威向菲茨杰拉德宣布了他作出的选择：“我曾向马克斯·珀金斯许过诺，我不会设下一个双重骗局来欺骗你和他。”如果霍勒斯·利夫莱特知道了这句话，它一定会让他感到一阵反讽的趣味。

他面对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讨价还价。起初，他曾想给在纽约耶鲁俱乐部的唐·斯图尔特发一份电报，请他到利夫莱特那儿取走手稿，转交给斯克里布纳公司，然后，他自己用信件的方式和珀金斯进行谈判。但是，经过了一夜的心烦意乱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与珀金斯打交道。他对菲茨杰拉德解释说，这样做，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必“每项建议之间都间隔六个星期”。在他离开期间，哈德莉和勃姆比可以留在施伦斯。他会尽快回到他们的身边。不过，他前往纽约的行程还要耽搁一两个星期，因为他的旧护照已经过期，至今他还没有收到新的替代品。

待到这一切发生时，保利娜早已回到了巴黎去为《时尚》杂志报道新款时装展示会。不过，她抽出时间几乎每天给施伦斯寄一封信，有时候写给厄内斯特，有时候写给哈德莉。为了哈德莉的利益，她仍然保持着伪装，好像她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纯粹是好友关系。假如人们把她的那封奇特的信当真说的话，或许还会说那纯粹是男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在信中她感叹说：“噢，我的天，我真希望我是在施伦斯。我真想念你们两个家伙。我是多么地想念你们两个家伙啊！”只有在一封信里，她明确地说出了她的心里话，那明确的程度一定着实让哈德莉吓了一跳。她问道：我为什么不能跟着厄内斯特一起去纽约呢？她继续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就一定会在巴黎欢迎他的到来，像一块磨盘、一块老旧的苔藓或一条冬天的常春藤一样缠着他。

作为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兴奋地对哈德莉说道：她和厄内斯特一起度过了一个可爱的下午，在一家博物馆里观看画片。可是关于晚上，她却只字未提。表面上，海明威是住在蒙帕纳斯大道韦内齐亚旅馆里，而保利娜的可爱的公寓是在皮科大街上。可据推测，他们是在她的家里同床共枕的。

在纽约时，海明威登记住宿在布雷武特旅馆，他会见了“一大堆的人”。

大多数人都是在非法买卖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和没完没了的马提尼酒的乌烟瘴气中出现在他的眼前的。在一家非法酒店里，他和利夫莱特一道喝了一两杯，他告诉出版商说他对事情的结局感到格外地遗憾。分手前，他们两人已经好到了直呼其名的地步。我并无恶意，霍勒斯；我也没有恶意，厄内斯特。在一个更清醒的场合下，来访的作者在斯克里布纳公司大楼未铺地毯的编辑办公室里和马克斯·珀金斯进行了令人满意的长谈。珀金斯 41 岁的年纪，说起话来粗声粗气，但却是有教养的美国佬的口音。屋里屋外，他都像沃尔特·惠特曼一样带着一顶浅顶软呢帽；他的眼睛白里透蓝，就像托马斯·沃尔夫生动地评论的那样：“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薄雾般的亮光，仿佛那里面有一片遥远的海水和天空；那是一位乘坐快速帆船长时间向中国行驶的新英格兰水手的眼睛，它们深得似乎可以淹没什么东西，可以沉下海船。”珀金斯宣称海明威的讽刺作品写得“棒极了”。他主动提出为《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两本书预付 1500 美元，是统一版税的 15%。按照海明威的评判，珀金斯真是“他妈的非常地好”，他的合同条件“好得不得了”。合同一打印出来，他就签了名。之后，他自己也承认，由于和一些人的会面所产生的进一步的刺激，大多数时间他都是狂喝滥饮，“酩酊大醉”。这些人包括马克·康奈利、厄内斯特·博伊德、唐·鲍威尔、罗伯特·本奇利、多萝西·帕克、埃莉诺·怀利，还有过去在巴黎曾是一对恋人而现在结了婚的约翰·赫尔曼和约瑟芬·赫布斯特。

在一艘其客舱已经超员售票的船上，本奇利和多萝西·帕克还陪同海明威一起返回欧洲。结果是，本奇利不得不睡在一个女招待的房间里。第四天过后，这位幽默作家说一切是很有趣，可他觉得该是他倒霉的时候了。第六天时，他确实倒了霉。不过，对海明威来说，此次旅行是一次成功，是一个进步，或者说是他使它看上去仿佛是如此。他已经和纽约最有名望的编辑之一拉上了关系，并且和当地的文人学士喝了个痛快。剩下的唯一麻烦是，他的个人生活和感情生活还是一团糟。

第十四章 双重含义

—

航行临近结束时，海明威借了一本阿妮塔·洛斯的《绅士喜欢金发女郎》。这本书是从另外一位旅客那儿借的，他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有那么两三本书。表面上，这本书就像是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一样正横扫着美国，可海明威却认为它只有二流作家拉德纳的水平。再次回到施伦斯后，有一个多月他没有谈到他所读的东西，因为他正忙着修改《太阳照常升起》。另外，一些新的客人不久就出现在陶伯旅馆里，他们都希望他能花些时间和他们呆在一起。

本来，杰拉尔德·墨菲和萨拉·墨菲已经邀请他们确实不太熟悉的海明威夫妇于3月份到他们在昂蒂布角的美洲别墅里去，和他们一起到地中海去航行。然而海明威由于去纽约耽误了几周的滑雪，所以回来后他就说服了墨菲夫妇和当时正在墨菲家里作客的约翰·多斯·帕索斯来到了奥地利，尽管萨拉·墨菲以前从未滑过雪，而且多斯·帕索斯上次滑雪已是15年前的事了。也许是由于对高度的恐惧，萨拉一直没敢从“小兔子”山坡上滑下去，可她的丈夫和多斯·帕索斯却甚至愿意尝试几招海明威特别喜欢的富有挑战性的下滑动作。如果说杰拉尔德还可以保持通常的优美姿态的话，多斯·帕索斯却连自己也承认“太他妈的笨拙”。当他感到快要失去控制时，他就干脆坐在他的滑雪板上，把它们当作平底雪橇。“当人们发现”，他愉快地回忆道：“……我在裤子的臀部上已经磨了个洞时，大家都笑话我。”

但是，在餐桌上，多斯·帕索斯恢复了他的荣誉，因为他是有名的大肚子食客。酒足饭饱之后，接着他们就在火炉前重新聚在一块儿交谈。海明威不时地会念上几段他的手稿，他预期只要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修改工作。最后，大家都感到了睡意，便回到楼上去。照多斯·帕索斯的话说，他们大家“在宽大的羽绒被下都睡得像棒睡鼠一样”。

在他的余生中，多斯·帕索斯每当回忆起施伦斯来，都把它看作是他与海明威和哈德莉一道度过了“最后的无忧无虑的好时光”的地方。作为一个既不安分而又孤独的单身汉，他像一个蟑螂逃避光明似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奔忙。他特别喜欢与海明威夫妇呆在一起。在他看来，他们幸福得无以复加。当他听说海明威已经遗弃了哈德莉时，他大为震惊。当他得知海明威打算和保利娜·普法伊弗结婚时，他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愿意重新撮合他和哈德莉，而海明威也应该考虑一下成为一个摩门教教徒了。

二

原本是一个男孩，却被人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对待。为了不得不向别人证明你的男子气概，只好断然否认你曾有过恐惧，并且恬不知耻地编造谎言吹嘘你的英雄业绩。从孩提时起，“什么都不怕”就成了你的格言。为了使你的生活“变得”富有艺术性，你迫不得已只有实施最最严厉的“简洁”，因为你“自我理解”的本钱太少，容不得你海阔天空、滔滔不绝，而你对自我曝光的恐惧也过于强烈。你把混乱的感情掖藏在小说的表面之下，就像把炸药隐藏在大桥之下；这本是无可奈何之所为，你却装扮得有如出于艺术之目的。你的巨大野心诱使你顾篇幅本身所内含的危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你没有把问题的症结归根于一种更为微妙的毛病，而是把主人公的残疾归因

于战时意大利的一次飞行事故：这是重复丹农齐奥失去了一只眼睛的故事。总而言之，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了天下第一号自我辩解，并以此作为开端。

但是，《太阳照常升起》并不仅仅是一幅艺术家的画像。它既是一篇社会论说文，也是一篇个人的随笔。这部小说的源泉同时也可以追溯到从巴黎的角度所观察到的 20 年代的性骚乱。

1922 年，是海明威以一种新来者所特有的警觉目睹战后光明之城生活的一年。这一年，科科·沙内尔正轰动一时。在她康邦大街的时装屋里，通过使用胸部平扁、头戴帽盔一般的假发、臀部不乏男孩子气的模特，她向参观者们展示了她那直线条的超短连衣裙和套装，还有她那戴在头上仿佛第二顶帽盔的钟型女帽。1922 年，法国的畅销小说是维克托·玛格丽特的《野姑娘》。小说的 19 岁的女主人公决定，她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生养一个孩子，而不要那种令人可鄙的物种即所谓男人的任何帮助或建议。尽管普安卡雷总统没有按照愤怒的评论家们的不断要求去查禁这部丑恶下流的小说，可玛格丽特毕竟未能逃过被驱逐出荣誉勋位团的耻辱。1922 年，热尼卡·阿萨内修在让·科克托创作的《安提戈涅》中扮演了主角，她的头剃得光秃秃，男不男女不女，她的眉毛也拔得一根不剩。同样是在 1922 年，埃兹拉·庞德陪同海明威光顾了由 49 岁的“累斯博斯女教皇”纳塔利·巴尼在她雅各布大街的住宅里于每周五下午举行的沙龙。

战前，巴尼小姐每天都穿着一套男人式样的骑装，打着黑色的蝴蝶领结，戴着圆顶硬礼帽，在布瓦德布洛涅这个地方骑在马背上。她有意摆出一副女同性恋者的挑战姿态，一副淫乱无度的狂劲。根据她自己在《间接的回忆》中的叙述，她曾经做过 40 多位妇女的情人。在她高墙围绕的花园里，肚皮舞表演者在全是男性的观众面前进行表演。在花园的尽头，有一座希腊寺庙的复制品，叫作爱情寺庙。那里供奉着萨福，不断地举行着例行的礼拜仪式。戏剧表演和化妆舞会更是让雅各布大街 20 号的生活妙趣横生。在这些戏剧中，纳塔利也许会扮成一位牧羊人或水手，而化妆舞会则给了她身披斗篷、头戴三角帽、脚蹬油光锃亮的黑皮靴的机会。女主人的“周五沙龙”声誉日增，名扬巴黎。人们在聚会上可以见到安德烈·吉德、让·科克托、雷蒙德·拉迪盖、罗伯特·德·孟德斯鸠、朱阿纳·巴恩斯、雷纳塔·博尔加蒂、罗曼·布鲁克斯和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罗曼·布鲁克斯并不喜欢庞大的聚会，但她还是来到了“周五沙龙”上，为的是给纳塔利一个面子。纳塔利和她曾经有过一段恋情，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有数年之久。像纳塔利的母亲即华盛顿特区谢里登圈子里的艾丽斯·派克·巴尼一样，罗曼也是一个肖像画家，但她把自己的艺术注意力毫无例外地全部集中到了一些性倒错者身上，诸如让·科克托、罗伯特·德·孟德斯鸠、尤纳·特鲁布里奇和拉德克利夫·霍尔。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小说《孤独之源》以一位经过透明伪装的纳塔利·巴尼作为其女主人公。这本小说将成为 1928 年英裔美国人最著名的丑闻。

在海明威早期生活过的美国，在橡树园，在密执安北部，在堪萨斯城，在纽约，在芝加哥等地，同性恋的形象，不管是男是女，总是卑鄙下流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怪人”。“怪人”这个词毕竟是一个贬义词，意味着道德上的蔑视。离经叛道者因而也就极少有人有足够的勇气从隐蔽的角落里走出来。可 20 年代的巴黎却是一个具有爆炸性差异的地方。

海明威生活在巴黎的操用英语的侨民世界中。通过与西尔维亚·比奇的

友谊以及与纳塔利·巴尼的相识，他也多少熟悉了法国的文学界。但他对上流社会的了解却只是借助于第三手材料。通过与朋友们的交谈——这些朋友曾经仔细钻研过普罗斯特的两卷本《索多梅和戈莫勒》中对上流社会的描写——海明威对法国的上流社会有了一定的知识。看上去，性倒错在巴黎似乎无处不在：上流社会有之，法国的文学界有之，说英语的侨民世界中也有之。

海明威对巴黎拉丁区的男同性恋者鄙夷到了极点，因而相对来说他几乎并不了解他们。就像杰克·巴恩斯和布雷特·阿什利一道走进大众舞厅时所看到的那群脸色苍白、头发卷曲、“一些穿着紧身衣、一些只穿着衬衣的年青人”一样，年轻的海明威所认识的那些热爱男人的男人们大多都是些无名鼠辈，惟有三个最著名的人除外。他们是：鲍勃·麦克阿尔蒙、帕特·格思里和格伦韦·韦斯科特。

相反，热爱女人的女人们在他看来却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单独的个人。他对她们所持的评判从倾心爱慕到模棱两可再到满怀敌意，可谓无所不包。从他最初来到巴黎时起，他就开始常常遇见她们这种人，仿佛他生来就和她们有缘。最早有西尔维亚·比奇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接着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简·希普的那种绝对男性化的发型只消看上一眼，就足以使他对她的性别有所警觉；然后从刘易斯·加兰提埃尔那里他又得知，简在《小评论》中的合作编辑，那位倾国倾城的玛格丽特·安德森竟然无可挽救地与性情古怪的女演员和歌星若尔热特·勒布朗纠缠在了一起。十分矛盾的是，海明威在对玛格丽特充满了热烈的情感，他在乐于带着她去观看职业拳击赛的同时，却对若尔热特加以厌恶。在写给庞德的一封信中，他私下里流露了这种厌恶。他指责她贪欲无度，称她为“勃朗峰上的若尔热特·欲壑难填”。随后，在《太阳照常升起》的舞会场景中，他又公开地、明确地表示了这种厌恶。为了晚上有个伴，杰克挑选了一位长着难看牙齿的法国妓女。他们来到了一张桌子跟前，桌旁坐着他所认识的人。他宣布说：“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未婚妻，若尔热特·勒布朗小姐。”

从布里尔到吉尼·普法伊弗，不管海明威走到哪儿，那里总是有新的热爱女人的女人们供他观察和交谈。她们中有好几个人拥有莎士比亚书店的优惠订阅卡，而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的邻居中她们的存在更是引人注目。在花神咖啡馆里，珍妮特·弗兰勒、南希·丘纳德和短篇小说家索利塔·索拉诺组成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三人帮。她们就像命运女神一样坐成一排，每个人都一口一口地抿着马提尼酒；每个人都穿着一套合体的黑色服装，围着一条缎子围巾，戴着一双白手套。不久后，在朱阿纳·巴恩斯的性讽刺作品《女士年鉴》（1928）中，索拉诺和弗兰勒还将以尼普和塔克姐妹的身份组成一个令人侧目的两人帮。其实，萨福式的巴恩斯小姐单单是她自己一个人就足以构成景观。她长得身材修长、笔直，端庄漂亮。在拉丁区里，她披着一条黑色的披风。在其衬托之下，她那漂亮的脸蛋和满头油亮的赭色美发更是别具一格。初次来巴黎时，她住在雅各布旅馆里。海明威夫妇刚到巴黎城时也暂住在那里。在战后欧洲的首都柏林短暂地停留后，她再次抛锚在巴黎。海明威对她的一些作品评价较高。他赞赏她的美色，而且很有可能在听到她给哈罗德·洛布设下的陷阱时感到极为高兴。在他和基蒂·坎内尔的罗曼史之前，洛布曾经利用一位在《扫帚》杂志为他工作的女秘书来满足他的性欲。最后，他把她带到了巴黎，安置在雅各布旅馆的一间房间里。这位女秘书的

姓从来就没有让人满意地证实过，但是她的名叫弗朗西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以弗朗西斯·克莱因来命名基蒂·坎内尔这个人物，但他给予读者的实际上是一个合洛布的两个情人为一的人物。洛布勾搭上基蒂后，立刻不由分说地割断了他与那位女秘书的联系。正是朱阿纳·巴恩斯想到了应该给洛布设下一个圈套，逼他付给那个姑娘一些钱。女秘书请求洛布最后一次到旅馆里去看她。他一走进房间，朱阿纳就如鹰扑小鸡一般从大厅里闯进来，说他的在场可以证明他和这位年轻的女人曾经有过关系，因此他必须为她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因为她已经怀孕了。这一计划最后是否得逞，我们不得而知。但起码对海明威来说，这个细节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一想到洛布在突然出现的身披黑色披风的朱阿纳面前狼狈不堪的样子，就足以让他感到满足的了。

海明威所认识的女同性恋者真是难以数计！岂止难以数计，她们还聪慧伶俐、富有勃勃生机！但是，以他那种对人性弱点的锲而不舍的兴趣，如果他的想象力竟然会遗漏了女同性恋者生活的阴暗面，遗漏了朱阿纳·巴恩斯的酗酒和神经崩溃，遗漏了纳塔利·巴尼的变态和不贞，那么海明威也就不再是海明威了。在弗勒吕斯大街 27 号的背后所不时发生的一幕幕让人感到羞辱的戏剧，总有一天将会成为《流动的圣节》中被称为“一个格外奇异的结局”的这一章的主题。而在海明威的想象中，这一切是不会被忘却的。

回忆者这样回忆说：那是春天里天气非常可爱的一天，他步行穿过卢森堡公园去拜访斯泰因小姐。高大的栗树长得十分茂盛，孩子们在铺满砂砾的人行道上玩耍，斑尾林鸽咕咕啼鸣。他还没来得及按下门铃，女仆便打开了门，告诉他进来等候，斯泰因小姐一会儿就下来。女仆给了他一杯烧酒。正喝着时，他“听到什么人正用一种我在其他任何地方绝对都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个人对别人说话的方式在向斯泰因小姐说话”。然后，斯泰因小姐请求和恳求的声音传了过来。“别这样，猫咪。别这样，别这样。请别这样。我可以做任何事，猫咪，但求你别这样。请别这样。请别这样，猫咪。”

到他写这些话时，海明威早已因为格特鲁德在《艾丽斯·B.托克莱斯自传》中所说的那些有损于他男子气概的可怕的事情而对她恨之入骨。因此，“一个格外奇异的结局”是一种报复行为，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捏造的。不过，关于格特鲁德和艾丽斯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这一章节还是描述了一个象征性的事实。

由此而言，“一个格外奇异的结局”中最严重的缺点也就不再是幻想，而是删节。正像他在描写菲茨杰拉德无法抵御泽尔达毁灭他的企图时所表现的那样，这位回忆者没有承认他自己象征性地卷入他所描写的这场爱情故事的程度。海明威不仅认识一大批女同性恋者，而且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他的想象中， he 可以与她们认同。从《士兵之家》到《最后一方清净地》，他总是描写一些假小子似的姑娘，这绝非偶然。吉尼·普法伊弗和格特鲁德·斯泰因之所以对他具有性吸引力，或者说他之所以是那么看重哈德莉作为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喝酒、可以和他一起分享体育热情的好伙伴的能力，就像他看重他别的妻子是否具有这种能力一样，这也绝不是偶然的。海明威的母亲与露丝·阿诺德的长期亲近自然会把单一性别之间亲密无间的戏剧化场面带入海明威的家庭。不过，他对女性性别的模糊性感到迷恋的根本原因显然还是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知道自己看上去像个女孩而感觉自己又是个男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他在橡树园的成长经历，

海明威为他日后作为战后巴黎观察家的角色作好了心理准备。

1926年秋，作为《太阳照常升起》早期的评论家，赫伯特·戈尔曼和其他一些熟悉左岸地区生活的评论家们深深为他们在小说的每一页上所能够辨认出的真实的男人和女人的数目而陶醉。这些真人不仅包括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斯特拉·鲍恩，还有醉醺醺的赛马专栏评论员哈罗德·斯特恩斯和同性恋者小说家格伦韦·韦斯科特。但是，在作者一系列的小说人物形象中却有一个空白。他的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女同性恋者。1927年，在纳塔利·巴尼的家中不过参加了几次“周五沙龙”聚会之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就创作了一部20页的有关巴黎女同性恋者的趣味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巴尼小姐成了莱奇摩尔小姐。这部小作品虽未发表，但它的回声最终将会记录在《夜色温柔》之中。然而，《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却完全避开了——至少看上去是如此——热爱女人的女人这个主题，尽管他知道在他所描写的左岸地区的生活中这个主题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他并没有回避这个主题。事实上，尽管他是拐弯抹角，他还是把这个主题封入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当中，从而将这个主题置入到了小说的正中心。不过，也许是由于他的谨慎，或者也许是由于他的潜意识，小说作者只允许自己在一个地方明确地提到了该书的双重性，那就是他赐予主人公的名字。“巴恩斯！”布拉多克斯在大众舞厅里大声对杰克喊叫。“喂，巴恩斯！雅各布·巴恩斯！”几页之后，当罗伯特·科恩邀请布雷特跳舞受到谢绝时，杰克本来的名字再一次戏剧化地重复了一遍。“我已经答应和雅各布跳这一支舞了，”她解释说。“你取的是圣经里的名字，杰克。”她笑着又说了一句。纳塔利·巴尼，雅各布大街20号；朱阿纳·巴恩斯，雅各布旅馆。从这两处联想中，海明威为一个正处在热恋之中的男人起了一个名字。他所热恋的对象是一位富有性攻击性的女性，她的名字可谓阴阳不分，她的发式是男人的发式。作为一个男人，杰克·巴恩斯的困境是：他像一个女同性恋者一样无法用自己的身体去穿透他情人的身体。

设立完这样一个与女同性恋者相似的困境之后，海明威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雅各布·巴恩斯这个名字。雅各布·巴恩斯的这个名字并不单单是一个为了娱乐左岸地区的读者而插入小说中的内在笑话。在这样一部极富双重含义的小说中，有那么两三个地方，杰克和布雷特的故事读起来似乎是两个故事，在第七章中尤其是如此。漫长的一天结束时，疲惫不堪、头疼难忍的杰克回到了公寓，冲了一个澡。他正在用毛巾擦身体时，听到了门铃响。他穿上浴衣，趿上拖鞋去开门。布雷特和米比波普勒斯伯爵——那位热爱香槟酒的米比波普勒斯伯爵——给他带来了一大束玫瑰。请他们进来后，杰克告辞进了卧室。他坐在床边慢慢穿着衣服，感到心情坏透了。布雷特走进卧室，坐在他的旁边。

“怎么啦，亲爱的？觉得头晕？”

她在我的前额上不在意地吻了一下。

“亲爱的”，她说。接着又问：“你想要我把他打发走？”

“不，他是个好人。”

“我把他打发走吧。”

“不要，别这样。”

“说好了，我把他打发走。”

“你不能那么做。”

“怎么不能？你等着。告诉你，他对我可是一片痴心。”

她走出了房门。我脸朝下趴在床上。我感到很难受。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但我没有留神去听。布雷特回来后坐在床上。

“亲爱的，我可怜的人儿。”她抚摸着我的头。

“你对他说了些什么？”我脸背着她躺着。我不愿看见她。

“我打发他去弄香槟酒了。他总是喜欢去买香槟酒。”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亲爱的，觉得好点了吗？头晕好些了吗？”

“好一点了。”

“接着”之后紧跟着一个冒号。“过了一会儿”之后又紧跟着一个冒号。这两种用法都表明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省略了一些动作。第一个冒号后引入了布雷特的一个问句，其动机显然是某种与性相关的念头。第二个冒号则反映出在杰克的身上有某种紧张感得到了缓解：现在他感觉好多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海明威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为了不让马克斯·珀金斯挥动他那根蓝色铅笔，保持艺术上的模糊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虽然小说没有具体说明杰克所受到的伤害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但其潜在的含义却非常明确：杰克仍然可以通过口交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而布雷特也是一个最情愿的“食人生番”。显而易见，杰克和布雷特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爱，这种方式通常使我们联想到女同性恋者以及男同性恋者。

海明威在塑造杰克这个形象时，除了想到了朱阿纳·巴恩斯这样的人之外，也是在描写他自己。与此相反，对34岁的女主人公的塑造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首先，她那男人一般的相貌和冷漠的交谈方式酷似达夫·特怀斯登，她那鲁莽的魅力和常常洗澡的习惯又酷似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另外三位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也对布雷特形象的形成起到了作用。杰克所热爱但却无法从她身上获得性满足的女人是哈德莉的化身；杰克在战争期间在医院里遇见到的女人代表着海明威对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的回忆。至于那位在生活中侮辱过男人的女人，达夫或者泽尔达都可以轻易地作为样板；也就是说，她们都可以被用来作为格雷丝·霍尔·海明威的替身。一位文学人物对布雷特的创造者也曾有所帮助，尽管他自己特别注意对此加以抵赖。在《流动的圣节》中，他强调他从未读过任何一本由迈克尔·阿伦写的书，但这却是一个标志，说明他实际上读过。埃德温·缪尔和其他《太阳照常升起》的评论家们认为布雷特的形象模仿了阿伦的《绿帽子》（1924）中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主人公，这一观点并不为错。

不过，如果说在布雷特的身上可以发现某个真实的或想象的女性的影子，海明威自己却暗示她的形象是以某个男人作为原型。1943年，他告诉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基于他所悟出的一个新的真理。他说，“男女杂揉无法解释”是导致《太阳照常升起》得以产生的痛苦和智慧。正是因为她爱他，布雷特才无法接受现实中的杰克，无法与他生活在一起。她迫不及待地急于与人通奸，毫不顾及这样做会给别人的感情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她的不幸无法遏制，无法消除。就这一切而言，布雷特也就是海明威。

三

这位小说家曾经重读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一点在《太阳照

常升起》的一些景色描写中有所体现。这些景色描写算得上是美国文学中最动人的文字。在一个特别出类拔萃的段落临近结尾时，杰克·巴恩斯甚至模仿了哈克的措辞。

一会儿，我们穿过了群山，公路两侧树木成行，有一条小溪和一片片熟透了的庄稼地。大道白晃晃地、笔直地奔向远方，前面的地势稍稍有些隆起。路的左边是一座小山，山上有座古堡，古堡周围紧紧簇拥着一批建筑物。一片庄稼一直伸向建筑物的墙脚，在风中摇曳起伏。……随后，我们越过一片开阔的平原。右边有一条大河，透过排排的树林，河水闪烁着太阳的光辉。在远方，你可以看见潘普洛纳的高地在平原上兴起。

在圣节开始之前，杰克和以唐·斯图尔特为原型的人物比尔·戈顿来到了伊拉蒂河河边的原野。在描写这里的景物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先例又再次涌上了作者的心头。因为，正如哈克故事中的美和幽默夹带着悲和恐怖一样，精神饱满的杰克和比尔所体现的那种对生活的强烈的欲望和无羁无绊的悟性也掺合着一种无法弥补的不和谐的感觉。正像埃德蒙·威尔逊 1927 年 12 月在《新共和》杂志上所评论的那样，那是一种对“道德环境的可悲和虚妄”的意识。威尔逊颇具洞察力地接着说：这种意识“并没有激起海明威诉诸于狂热的言行；但却毒害了他，使他心烦意乱，因而赋予他的作品以一种罕见的、不详的品质，一种也许在小说中来说是崭新的品质，那就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阳光和绿色夏日的风景。”

杰克和比尔的对话机智敏捷、妙趣横生，充满了文学和政治的嘲讽、有伤风化的评论和亵渎性的言词。所有的应答都是以爱说俏皮话的 20 年代所喜爱的那种乒乒乓乓的节奏加以表达的。可以想象，马克斯·珀金斯并没有真正体味到他过去说的那些下流笑话，因为在原则上他是反对这种污言秽语的。在他写信给海明威为他慎重的修订删改而进行辩解时，如果真有那么“一大堆卑鄙、下流和痴愚的乡巴佬们”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猥亵言行开始叫嚷，那么小说的意义就会被淹没掉。

比尔和杰克之间具有喜剧色彩的俏皮话非常之多，其中第一句便是以反复玩弄“俏皮和怜悯”这些词的方式来巧妙地取笑《了不起的盖茨比》。“俏皮和怜悯”是阿纳托尔·弗朗斯用以鉴别优秀作品的试金石，热爱法国文学的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在他发表于《日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塞尔迪斯宣称，菲茨杰拉德现在已经超过了所有他这一代的作家。虽然他只是以极小一部分美国生活作为他的领地，但他对这部分生活的报道却充满了“俏皮和怜悯以及一种强烈的情感”。菲茨杰拉德自豪地把这些评论显示给海明威，可海明威却因为他眼中的塞尔迪斯是一个哈佛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的势利小人而无论如何也不喜欢他。再说，海明威也许会对塞尔迪斯过分赞赏他的对手而感觉不快。在《流动的圣节》中，他用一种酸溜溜的口吻指责这篇评论，认为它“已好得不可能再好了。要想让它再好一些，除非吉尔伯特·塞尔迪斯也能够再好一些。”但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是借题发挥，把“俏皮和怜悯”变成了一首流行讽刺歌曲，配以《婚礼的钟声正为我和我的新娘而敲响》的曲调。

在布尔格特旅店的卧室里，懒汉比尔终于掀开了被子，一边开始穿衣服，一边对杰克说：出去再挖一点蚯蚓。“为了大家的利益去干吧”，比尔一边

穿上他的内裤，一边告诉杰克。“流露点俏皮和怜悯来吧。”

我带上鱼具袋、鱼网和钓竿袋走出房间。

“嗨！回来！”

我把头探进门里。

“你难道就不流露一点俏皮和怜悯？”

我用拇指顶在鼻子尖上，冲着他做了个轻蔑的手势。

“这可不算是俏皮。”

我下楼的时候，听见比尔在唱：“俏皮和怜悯。当你感到……（这里押韵的词应是“狗屁不值”，但是为了在珀金斯那里过关，海明威却甚至没有试图写出这个词来）。噢，给他们点俏皮，给他们点怜悯。噢，给他们点俏皮。当他们感到……就这么来一点儿俏皮，就这么来一点儿怜悯。……”他一直唱着，从楼上唱到楼下。

在喝咖啡吃吐司时，比尔开始说他们的第二句俏皮话。“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他问杰克，接着便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嗜酒如命。你对性着了魔。你不务实事，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只会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游。”

“听起来这种生活倒蛮舒服嘛”，我说。“那么我在什么时候工作呢？”

“你不工作。有帮人坚持说是有些娘们在养活你。另外有帮人说你是个不中用的男人。”

“不对”，我说。“我不过是遭到过一次事故罢了。再也别提它了，”比尔说。“这种事情是不好说出去的。你应该故弄玄虚，把这事搞成一个谜。就像亨利的那辆自行车。”

他一直讲得滔滔不绝，但是说到这里却顿住了。我猜想，他可能是以为刚才说我是个不中用的男人这句挖苦话刺伤了我。我要引他再讲下去。

“不是自行车”，我说。“他当时是骑在马背上。”

海明威的原稿写的是：“就像亨利·詹姆斯的那辆自行车。”但珀金斯认为这样油腔滑调地提到詹姆斯令人反感，便要求海明威能够冷却一下这块“热点”。在修改毛条校样时，海明威按着珀金斯的要求予以照办，因而让未来的读者一直弄不明白比尔·戈顿的心里究竟是指谁。不过，除了要删除一个可以让人确定是谁的姓氏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含义使得“就像亨利的那辆自行车”成为一个有趣的典故。

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一个儿子和兄弟的手记》（1914）中，詹姆斯曾经兜着圈子讲述了一个他的身体遭到不幸的故事。事情是发生在与国内战争“同一个黑暗的时期”。萨姆特要塞燃起了大火。林肯先生号召人们志愿灭火，詹姆斯最终响应了这个号召，去帮助扑灭一场“卑劣的火灾”，也就是说，他是作为罗德岛新港市一个志愿的救火队员。在他和他的志愿救火队员伙伴们努力想让“一台锈迹斑斑，几乎是临时拿来凑合的旧机器”发动起来，让“一条备用水流流起来”时，他被挤进了“两扇高大的栅栏之间的一个锐角”

里”。他遭受了一次“虽说是模糊但却是可怕的伤害”。詹姆斯在回忆时说，当时人就好像感觉到已经和整个大地“陪伴”在一起。“我是想说，当时人就好像是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全面的痛楚。有几个小时，你几乎说不出究竟是你自己那可怜的肌体最疼痛，还是周围的社会躯体最疼痛。你的肌体还是那么年轻，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你，可正是那儿受伤最厉害；而社会的躯体早已是千疮百孔，因而赋予人以一种悲剧性伙伴的荣誉。”

比尔·戈顿说得没错：詹姆斯是曾经历过一次事故，但却没好说出来。相反，通过煞费苦心地玩弄“可怕”和“可憎”这样一些委婉的字眼，通过引申和把他的伤害比喻成美国国内战争时“千疮百孔”的社会躯体所受的伤害，他的确是在故弄玄虚，把这事搞成了一个谜。但是，别的作家不说，光是年轻的格伦韦·韦斯科特就自信他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儿子和兄弟的手记》。后来，在《猎犬与号角》杂志纪念亨利·詹姆斯的那一期著名刊物（1934年4—6月号）上，他详细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亨利·詹姆斯；流亡与阉割……人们传说，亨利·詹姆斯不能生孩子。”

显然，比尔·戈顿的心中知道这种解释（会不会是海明威在和韦斯科特的交谈中偶然得知的呢？），因为他对詹姆斯的评论缘起于他那个关于性无能的不幸的笑话。令人犯糊涂的是，比尔为什么会借用“亨利的那辆自行车”这个典故。海明威对珀金斯解释说，这个典故不过是一个“前后不合逻辑的推论，与亨利·詹姆斯毫不相干”。然而问题是两者实际上相干。因为，在海明威的心目中，詹姆斯战时所受的伤与詹姆斯30年后在英国学骑自行车时摔得遍体鳞伤已经混为一谈；而且，这种混为一谈之所以发生也绝非偶然。1918年7月8日夜，一位亦属于意大利军队的美国红十字会的少尉曾经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皮亚韦河骑行，路上他也与伤害不期而遇，可伤得究竟有多厉害，他也同样是含糊其辞。

与哈德莉离婚多年以后，海明威曾若有所思地对她说，他认为他有可能“最终会变成普普通通的亨利·詹姆斯或是连环漫画中的亨利·詹姆斯”。从技术上讲，他从这位大师那里学到的经验之一与对话的运用有关。确实，有时候，他对詹姆斯式的技巧使用得过了火，他过于放纵笔下的人物沉湎于对话而显得有些不明智。庞德在信中批评《阿尔卑斯山牧歌》的开头“满篇”是对话，特别指责他过于紧跟在“亨利·詹姆斯的尾巴”之后，原因即在于此。詹姆斯的《专使》中有一篇出了名的演讲。其中的内容同样给海明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从《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一篇重要的对话中看出来。“听着，杰克，”罗伯特·科恩在第二章里说。“难道你从没感到你的年华在流逝，而你却没有及时行乐吗？你没发觉你已经度过了几乎半辈子了吗？”科恩是在以一种更随意的说法重复着詹姆斯的人物兰伯特·斯特雷特的话。在格洛里昂尼漂亮的巴黎花园里，兰伯特·斯特雷特对小比尔海姆倾诉衷肠。“活就活个痛快，不这样可真是个错误。你具体在做什么并不十分重要，只要你活得实实在在。如果你从未那样活过，那你还能有过别的什么活法？”

不过，如果说海明威把詹姆斯珍视为他的伟大的先行者的话，他同时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蔑视，特别是当他遇到在他看来是詹姆斯的男人做了一些不像是男人的行为时。沃尔多·皮尔斯是一位来自缅因州班戈城的心肠下流的大胡子画家。20年代中期，他成了海明威最亲密的朋友之一。1927年，海明威向他报告说：“保利娜一直不错，她大声朗读了亨利·詹姆斯（的《青

春初期》)。”这部小说纯粹是“狗屎”，海明威简捷地继续说道。“除了几个漫画式的野蛮的‘外来人’之外，所有的男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像仙女一样交谈和思想。”在后来写给另外一个亲密朋友的信中，海明威对詹姆斯缺乏对男性的理解更是大加贬斥。1949年，他告诉查尔斯·斯克里布纳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已经开始努力打败那些已故的作家，我知道他们的斤两。（请原谅我使用俗语）我和屠格涅夫先生交了手，打败他并不是太难。我和莫泊桑交过手（我并不要退让一步而给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德”字），打败他用了我四篇最好的小说。……至于亨利·詹姆斯先生，他第一次抓住我时我只滑动一根手指，尔后揍他一次，他就会能耐尽失，叫裁判停止比赛。”在《专使》中，詹姆斯也许会让屏弃声色享乐显得无比辉煌，但海明威却想让他自己的读者知道，如果没有布雷特·阿什利，生活对于杰克·巴恩斯来说可就完全是一场折磨。早饭时，比尔·戈顿一边和杰克说着笑话，一边因说到性无能而说走了嘴。杰克耐心地回答：“我不过是遭到过一次事故罢了。”在这平淡的语气之下，人们可以觉察到他实际的感情。

经过了一早上痛痛快快的钓鱼之后，两个朋友收拾好鱼具开始吃午饭。他们又说了另一句具有喜剧色彩的俏皮话。伴随着两瓶当时在附近的泉水里冰镇的葡萄酒下肚，这句俏皮话更是说得顺畅滑溜。他们漫无边际的一通胡扯横扫了整个当代的美国，从卡尔文·柯立芝、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毕晓普·曼宁到乔·戴维森、弗兰基·弗里施和反沙龙联盟的韦恩·B.惠勒。分别代表着美国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两大不同见解阵营的人物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H.L.门肯也同样出现在这次冒充的圣餐仪式上。在小说有关巴黎的部分中，海明威早已讥讽过门肯是知识界过时的人物，但他仍想再一次令这位巴尔的摩的圣人感到难堪。

“尝”了一点葡萄酒后，杰克和比尔打开了装着他们的午餐——煮鸡蛋和冷鸡腿——的袋子。“先来个鸡蛋”，比尔说。“然后吃鸡。这个道理连布赖恩都明白。”杰克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了报道，他说：布赖恩已经死了。“先生们，”比尔说着，拿出一只鸡腿。“我来颠倒一下。为了布赖恩，为了向这位伟大的俗人表示敬意。我们先吃鸡，然后再吃鸡蛋。”比尔用鸡腿来代替圣餐仪式里的圣饼，他要杰克“毫不怀疑地接受”眼前的一切并和他一道说——

“可我们说什么呀，兄弟？”他用鸡腿指着我，继续说。“让我告诉你。我们要说。而且就我个人来说，要自豪地说。我要你跪下和我一起说，兄弟。在这辽阔的山野之间，谁也不必羞于下跪。记住，丛林是上帝最早的圣殿。让我们跪下宣布：‘可别吃那东西，女士，——它是门肯。’”

比尔挥舞着鸡腿。他已注意到它的外形。鸡腿其实并没有使他想起耶稣，而是想起了门肯的那玩艺儿。油嘴滑舌、言辞诙谐地几句对话后，杰克表现出他并不难跟上他朋友的思维。“你喝醉了”，他告诉比尔。

他们不堪入耳的笑话再一次十分危险地逼近了杰克性无能的话题。为了避而不谈他的情况，两个男人都时常表现出他们的克制。

在他 1927 年发表在《新共和》上的评论里，埃德蒙·威尔逊还说道：海明威的艺术是“一种具有超凡洞察力的水晶”，通过它，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普遍压抑的意象”。但是，这种超凡的洞察力最终没能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保持一种稳定的视觉。作为微型图画大师，海明威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并不习惯于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他部分地丧失了对材料的控制。1926 年，这部小说的两位最有鉴赏力的评论家所发表的绝然相反的评价就指出了它的矛盾性。

康拉德·艾肯在 10 月 31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太阳照常升起》达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诚实和真实的效果”。

那是一个由流亡者组成的奇怪而又可悲的世界。他们的理想已经破灭，生活漫无目的，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得过且过。海明威的那半打人物就都属于这个小小的世界。他们都处在海明威先生绝对敏锐和冷静的观察之下，是以最为简洁的方式被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以男主角而言，通过他的心灵，我们得以了解了事件；再以女主角布雷特和第二个男主角罗伯特·科恩而言，海明威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就不仅于此了。通过他们，他获得了一种近乎深刻的对人物的展示和理解。且不说小说的背景是多么地污秽，当人们反思起这一背景是多么地乏味时，当人们考虑到小说人物（总体上）是多么地丑陋粗野时，人们就会更惊异于海明威先生竟然有能力使他们变得那样动人这个事实。这些家伙们确实存在，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他们的故事肮脏，那么根据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所显示的尊严和超然来看，这个故事同样也极为悲惨。

六个星期之后，艾伦·泰特在写作《国家》时却采取了一种大相径庭的观点。

海明威先生是创作了一本成功的小说，但并非没有在某程度上伤害了他在第一本书中所取得的完整性。出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决定写一本通俗小说，或者说他是写了他唯一能够写的一部小说。

选择后一种猜测，是为了弄明白他的意图，显然这是以非难他的艺术作为代价的。人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虽然感伤是第一次明确地出现在他的散文体作品之中，但这感伤一定是一直存在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出来。《在我们的时代里》所使用的方法是“点彩法”，感伤被淹没在水下。他以高超的技巧把散文体小说通常最常用的公式给颠倒了过来：他不是以选择客观背景和人类行为的细节来加强戏剧化场面，他是用最少的戏剧化描写来尽可能地强化被观察的对象。……

在《太阳照常升起》这部长篇小说中，海明威先生也无法逃脱这类起引导作用的情况，而且，他是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处理类似情况的。他失败了。用海明威先生自己对大字眼表示极度蔑视的术语来说，他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过于强硬，而是在艺术上他还不够强硬。……事实上，他暴露了他那种强硬态度的内在机制：性无能的杰克在想到布雷特是不可企及的情况时说道，“白天要对一切表现得强硬还非常容易，可到了晚上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到此，他的感伤历史完满地结束了。

那么，究竟是像艾肯所相信的那样，作者对杰克的观察是冷静的，他讲

述故事的方式是超然的和有尊严的呢？还是像泰特所认定的那样，这部小说暴露出海明威并不够强硬，他事实上是一个无可挽救的感伤主义者呢？答案是：两个评论家说得都对。《太阳照常升起》中渗透着一种对人类生活不偏不倚、极为悲观的看法，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绝不会溶解于自我开脱的自我怜悯。海明威放在小说开头的两段语录之间的精神差异象征着小说中态度上的不一致。语录之一引自《传道书》，他在小说的第三版及以后的版本中稍稍作了删节：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一次谈话是另一个语录的出处：“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小说得以出版后，海明威惊讶地看到后一条语录竟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连忙向各种各样的通信者保证：他认为格特鲁德的评论是可笑的。11月，他给马克斯·珀金斯写信说：“看到有人（即波士顿《晚间记录》的评论员）怀疑我是否真把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话当真”真是让人耳目一新，“我的意思原本是嘲弄一番那种冠冕堂皇的吹嘘（即格特鲁德自以为是的预言家角色）。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后面的一代人，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去判断。”一直到1932年，在一封写给一个名叫保罗·罗曼的具有学者风度的绅士的信中，他仍然争辩说他同时引用一个现代的和一个古代的权威之言不过是为了“证明早期希伯来作家胜过后来的作家”。

然而，写完了小说第一稿后，海明威曾到沙特尔去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他随身携带的蓝色笔记本却证明他的争辩乃不实之词。因为这本笔记本表明，他曾慎重考虑过将他的小说命名为《迷惘的一代》，他甚至不厌其烦地特意起草了一个前言，解释这句话的起源。他写道，1925年夏，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艾丽斯·托克莱斯停车于汝拉山脉的一个村庄里，让人替她们修理那辆出了毛病的福特车的引擎。一个非常年轻的汽车修理工告诉她们，是一个阀门堵住了，而他立刻就把它修好了。格特鲁德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么一个效率高的工人。老板说，是他自己训练的。学得非常快的正是他最年轻的雇员，可那些年纪在22至30岁之间的新手却比不上也学得这么快。最后证明，所有那些人都是不可教的。老板宣称：“那是没救的一代。”

在把这个法国人的说法改编成她自己的评论时，格特鲁德很有可能是在第一次面对面地攻击海明威，因为妒性大发的艾丽斯已经制定了把他打发走的最后期限。在《流动的圣节》中，海明威肯定地说格特鲁德不仅告诉过他“所有你们这些在战争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迷惘的一代”，而且还说过“你们目空一切。你们嗜酒成性。”回忆者进一步声称，他立刻就对这些话提出了异议。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极为气愤。他自言自语地说：“让她那迷惘一代的鬼话和所有肮脏的、不费力的标签都见鬼去吧。”

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的感觉，他还会因此想到去把他正在创作的小说命名为《迷惘的一代》吗？不错，格特鲁德可能是意在侮辱海明威，但她的话似乎也同时令他激动不已。理由并不难理解：这些话包含着一个确实实

绝妙透顶的短语。1920年，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成了一代人的代言人。正像他在《天堂这边》里所写的那样：这代人“长大时发现所有的上帝都已死亡，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所有的人类信仰都已动摇”。可以想象，一本名叫《迷惘的一代》的小说的作者或许也可以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里把自我表现的角色抢走。

然而，在最终选择小说的名字时，海明威放弃了一代人的失望这个主题，代之以对人类的存在更广阔观察。他后来告诉马克斯·珀金斯，他并不是打算写“一部空洞的、尖刻的讽刺作品”。正相反，他的目的一直是想写一部“十足的悲剧”。这部悲剧对生活的悲观非常像《传道书》中的圣人一样。

作为社会的观察者，圣人远离社会的激情和它的野心。他感兴趣的主要是万物的虚空。他平静地面对着绝望，保持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态度，不时地流露出一丝厌恶或鄙夷，以及一种无法言喻的疲惫。他深思熟虑的结论是：生活不可能奉献永恒的价值。人类命运的绝对主宰是一位不可知的上帝；由此，世界的意义既不可增也无法减，事物的本质无可改变，相互的关系也没法得到任何根本的改善。在地球永恒的转动中，人们不可能发现任何目标或目的。如果说太阳升起，并且划过天空，那不过是为了回到它升起的地方；而河流永不停息地汇入大海，却永远也不会把它填满。那么，创造世界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无法说清楚。然而，圣人却认定尽管生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还是值得活下去。人应该敢于面对事实，接受无法改变的既定现实；同时，像动物一样，他也应该去享受上帝允许他去享受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直至死亡湮没一切。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在潘普洛纳欢度狂欢节时表现出了庸俗不堪的行为。在细细描述这些行为时，海明威是毫不妥协的。阿什利的酒鬼情人迈克·坎贝尔宣称：“布雷特可不是个虐待狂。她只是个迷人的、健壮的娘儿们。”可那位当代的喀耳刻女巫布雷特·阿什利不仅目不转睛地盯着角斗场里马的内脏流出来时鲜血淋漓的情景，而且对她生活中的男人们的痛苦漠不关心。因此，当她设法安排同那位比她小15岁的年轻的斗牛士的初次幽会时，她考虑的只是她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杰克的感情。

在成堆的卑鄙龌龊之中，唯一的道德宽慰来自罗梅罗在斗牛场上的表演。斗牛士如同作家。早在《没有被斗败的人》中，通过对被打得稀烂的、上了年纪的马诺洛的描述，海明威就已经确定了这种等同关系。但是现在，他再次使用了一个未来将会众所周知的说法去象征性地确定这种关系。19岁的罗梅罗让海明威想起了他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时，他深深地爱着一位比他年纪大的妇女，幻想着未来的职业。他说罗梅罗作为一个斗牛士表演的是“传统的技巧，就是通过身躯最大限度地暴露（在牛面前）来保持洗练的动作”；借此，他意在含蓄地阐明一个文学的理想。

不过，为了与他《圣经》式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保持一致，海明威在展示社会激情的空虚无聊时甚至连斗牛也不予以豁免。一天清晨，在穿越城里的街道时，一位冲在牛前面的人被牛赶上，牛角刺进了他的脊背。几个小时后，杰克在一家咖啡馆里对一位侍者描绘这次事故。那人“伤得很重”，杰克说。“伤得很重，”侍者点点头说。“光是为了解闷儿。光是为了取乐。”他走开了，回来时拿着咖啡和牛奶。“扎透了脊背，伤得很重，”他说。“扎得很深。光是为了好玩。也仅仅只是为了好玩。”两个脸色阴沉的男人在街上走过。其中一个对着侍者喊道：“死了！”回到杰克的桌子旁时，侍者说：

“你听见啦？死了！死了。他死了。让牛角扎穿了。全是为了开心一个早晨。真是太荒唐啦。”依照故事的发展，扎死这个人的那头牛在斗牛场上被罗梅罗给杀死了。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牛耳朵被割下来，送给了年轻的斗牛士，他又转送给布雷特。布雷特把牛耳朵用杰克的手帕包好后，便“把这两样东西，牛耳朵和手帕，连同一些穆拉蒂牌香烟头，使劲塞在潘普洛纳蒙托亚旅馆她床头柜抽屉的最里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白天要对一切表现得强硬还非常容易，可到了晚上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艾伦·泰特有意挑选出来用以表示鄙视的这句话，绝不是书中海明威无法抑制住他的感伤从而导致他的悲剧意图归于失败的唯一例证。对于一个好像是恬淡寡欲的男人来说，杰克显然并没有特意向我们隐瞒他的感觉是多么低沉，他也没有隐瞒他喝酒是喝得多么地醉醺醺。而且，在他似乎是不假思索地表现他对钱是多么地慷慨大方时，在他表现他是多么地心地无私时（他在故事临近结尾时中断了正在享受的圣塞瓦斯蒂安的节日以便到马德里去照顾布雷特），他甚至是更为公开地在祈求我们的同情。更有甚者，由于反复使用得大频繁，他的性无能的双关含义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戏剧效果，直至最终变得令人尴尬。喝醉酒的迈克嘲笑地说：告诉罗梅罗，“布雷特想看他穿上那条绿裤子”。“住嘴，”杰克说。他不想让大家看笑话。“告诉他，布雷特太想知道那条裤子他是怎么穿上去的，”迈克说。“住嘴，”杰克说。为了插入一个更可悲的俏皮话，杰克说：马德里的蒙大拿旅馆是一个二层楼的建筑物。可“我却没办法让电梯动起来，”他解释说。“所以我就走上楼去。”在接待桌旁他碰见了女房东，她告诉他旅馆的主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

不过，如果说作者的感情自制力在处理杰克的过程中全面崩溃了的话，在谈到布雷特时却一直漂亮地支撑着，尽管海明威本人未必会同意这种判断。在潘普洛纳，布雷特丝毫不在乎她的品行和名声；在马德里，她却在乎，但是她试图使自己显得清白的努力却只是更加贬低了她自己。她在让杰克进了旅馆房间后脱口而出地说：“我本来会同（罗梅罗）生活下去的，可是我发现这样对他不利。”换句话说，她是想让杰克相信促使她放弃罗梅罗的动机并不是一时的女性性欲已获满足。而是出于对他斗牛士生涯的关心。“最后，他竟想同我结婚。”这句话是她经不住人们细细品味的又一个仿佛她有多大自我克制能力的宣言。布雷特·阿什利去做西班牙人的太太？谁要是以为她竟能满足于这么个角色，那可真是荒唐透顶。那么，为什么她要指望杰克会钦佩她放弃罗梅罗呢？她饱含眼泪如同作戏一般地说：“你知道，我34了。我不愿当一个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正是这句话成了布雷特在王宫旅馆酒吧里喝着两杯马提尼酒时道出的那番自鸣得意的基础。“你知道，决心不做坏女人使我感到很舒坦。……正是这种做人的准则多少可以取代上帝。”“有些人信上帝”，杰克告诉她说：“为数不少哩。”

就这样，他们出了酒吧前往博廷饭店吃午餐。后来，在出租车里，剩余的时间仅仅足够描写最后一个与性器官相关的象征，而这个象征是裹在夹层里展现的，夹层的两端分别是布雷特最后祈求杰克的同情，而杰克也最后祈求读者的同情。

“唉，杰克”，布雷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了

下来，使布雷特紧偎在我身上。

“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五

由一位名叫里奇蒙德·巴雷特的记者所撰写的《树林中的天真儿》，为1928年春天《哈泼》杂志的读者们描绘了《太阳照常升起》自出版一年半以来对年轻人所产生的影响。巴雷特在文章的开头中说：他们把这本书当作了自己的圣经。他们‘牢牢记住了这本书，抛弃了他们的家庭，逃离了大学……（他们）乘船前往巴黎，在大教堂、圆顶建筑物和其他路旁咖啡馆的凉篷下成了一种新的信仰的信徒。”在这种新闻记者所特有的夸张的表面之下，毕竟残留着那么一个有趣的事实。《太阳照常升起》已经成为大学里风靡一时的小说。杰克·巴恩斯曾尖刻地评论说：“有多少年轻人的好恶都受到了门肯的影响啊。”但是，从1926年开始，他们的好恶也同样受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影响。桑顿·怀尔德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报道说，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对这本小说是爱不释手；而在纽约，照马尔科姆·考利的话说，来自史密斯城的姑娘们都“以布雷特女士作为她们的榜样”。

20年代，生活的失衡导致人们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情感，尤其是在擅长追赶时髦的年轻人中间。正是他们那种自以为是历史的牺牲品的感觉促使他们按照小说开头的现代引语的意思去解释《太阳照常升起》，并且以同样是迷惘的灵魂的身份去和杰克与布雷特取得认同。小说发表四个星期后，海明威对马克斯·珀金斯申辩说：“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思是地球将永远存在”，但这并非是说小说就注定只能这样去解读。在扩大了年轻人的定义，使其不仅包括2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而且包括年龄稍大一些的群体之后，埃德蒙·威尔逊在谈到《太阳照常升起》的作者时这样评论道：他“表达了浪漫幻想的破灭，为那一个时期确定了最受喜爱的姿态。那是在心碎肠断之中表现出勇敢的一刻，是阴森恐怖、漠然冷淡的戏谑，是英雄的放浪形骸。他们伟大的格言是‘喝一杯’。在纽约和巴黎的酒吧里，年轻人说起话来都开始像海明威一个样。”

就其加强和巩固了他的声望而言，海明威能够作为历史上一个特殊时刻的代言人是他最大的好运。但是，主要是通过继续挖苦格特鲁德·斯泰因，他继续抗拒着人们给他的书所贴上的“迷惘的一代”的标签。不过，有一次，他忽然放弃了自己为了他那可悲的雄心壮志而作的令人惊愕的辩解，他宣布这本书是一次失败，而错误全在他自己。他的父亲自杀后，他的感情陷入了一片混乱。出于与一位类似父亲的人物交谈的需要，他开始同《弗吉尼亚人》的69岁的作者欧文·威斯特通信。在与这位年长的小说家交流时，他最最痛苦而又最最诚实的书信之一涉及到了他早年作为一个作家在巴黎的情况。他坦白说：

我的生命或多或少已从我的下身进射了出去；我喝酒喝得太凶，那全是

这是一个证明了一种小说理论的结尾。海明威后来成功地劝说菲茨杰拉德采用了这种理论。正像《夜色温柔》的作者1934年4月在写给约翰·皮尔·毕晓普的一封信里所解释的那样：“我确信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在一次谈话中向我详尽阐述了这个观点：在某些情况下，萧索的晚秋比戏剧化的结尾更好。”

由于我自己的错。我的写作顺利了一些，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偶尔把句子连在一起，而不是让它们都噗、噗、噗地断断续续地写下来。然后，同样是用六个星期写了《太阳》……我努力在布雷特这个女人身上去毁灭性格——那才是主要的故事，可我没能做到。……我以为，有关潘普洛纳的部分还不错，其余的部分也有足够的趣味，尽管对我来说，它是一次失败。如果不是因为出版是我唯一可以将它置之脑后的方式，我本来不会出版它。可是如果我把它毁了的话，我也许又会认为它比实际上要好一些。

第四部 （1926—1936）

第十五章 “我倒是真的爱她”

—

海明威将《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已完成的手稿放在手提箱中从施伦斯来到巴黎。1926年4月1日，他向马克斯·珀金斯报告说，这部手稿长达“330页，是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边上未留空白”。几周后，他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他意欲将《太阳》这本书献给他的儿子。

海明威不大愿意把这本书献给哈德莉。那年春天，他们夫妇与普法伊弗姐妹一起去了卢瓦尔河谷。那次旅行颇为不快，回来后，他俩吵了一架。结果是，他就更加坚定了不把这本书献给哈德莉的决心。旅行的最初几天倒也令人愉快，可随后保利娜忽然变得性情乖戾。每当哈德莉想要聊天说话时，她就厉声喝斥，然后就沉默寡言。尽管吉尼没话找话地解释说她姐姐一直都是这么个德性，可哈德莉却总感到那些闪烁其词的礼貌该是搁在一边的时候了。“这是否和厄内斯特有关？”她向吉尼问道：“保利娜是否爱上了他？”吉尼吞吞吐吐地说她知道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一回到巴黎，哈德莉就几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冲口说出她怀疑丈夫已经爱上了保利娜。海明威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指责她竟把这种“事”挑明。“他似乎在对我说，”哈德莉回忆道：“把事情逼到这个份上，全是我的过错。现在，既然我已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们的爱情也就再无稳固可言了。”

身临这样一种困境，海明威在5月1日左右却借题发挥完成了一篇既特别野蛮又充满了内疚的短篇小说《阿尔卑斯山牧歌》。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就他对哈德莉的态度作了象征性的戏剧化处理。对海明威来说，在施伦斯他们所共同度过的几个月的冬天里，他只不过是图个方便才对她表示了冷漠，而在法国一到了春天，他便毫不含糊地埋葬了他们的婚姻。这篇小说描写的是，有那么一个兽性未脱的奥地利农夫，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奥尔兹。多年来，他与妻子一起住在高高的锡尔夫雷塔山谷之上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屋中，山下是加尔蒂村。奥尔兹夫人一直患有心脏病，终于去世，但那时正值12月中旬，奥尔兹无法在化雪之前将她的尸体搬下山运到村里。春季到来时，一天，他背上妻子的尸体来到村里。为死者下葬的牧师揭开她的面罩，见到那毁容的面貌，深感恐惧。迫于压力，那农夫向牧师坦白了他妻子面容被毁坏的原因。她死后，他将她的尸首放在木棚中，当尸体僵硬之后，他便将尸体依靠在墙上，她的嘴巴大张着。每当夜晚他走进棚屋劈柴，他就把灯挂在她的嘴巴上。牧师对他说，他的所作所为真是大逆不道，他还问这农夫是否真地爱他的妻子。“嗯，我爱她，”奥尔兹答道：“我倒是真爱她。”

那年春天，甚至在海明威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在那些看似轻松愉快的段落中，也充斥着残忍的意象。他告诉他的朋友说，夏天到来的某个时候，他想给他看一看《太阳照常升起》的复写稿本，如果他能给个面子，愿意一读，海明威希望这位小说家能不吝赐教。同时，菲茨杰拉德或许也会对故事的情节梗概感兴趣。

我曾试图按照《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轮廓和精神来写本书，但我觉得失败了。这或多或少是因为我从未到过长岛。事情都发生在长岛的纽波特区，女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索菲·艾琳·洛布的姑娘。她杀死了她的母亲。在辛辛

监狱的死刑执行室里，索菲将因杀害她未曾出世的孩子的父亲和姐姐而被处以电刑，但在那儿她生下了双胞胎。这个场面，我取自德莱塞，可书中其他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或你的东西。

我知道你会高兴见到这个稿本的。“太阳照常升起”是索菲被捆在电椅上时说的话，那时电压正在升高。

导致他产生这种幻觉的感情压力还使他在同一封信中，在谈论斗牛士面对死亡表现得勇敢无畏时，自己创造出了一个词。他告诉菲茨杰拉德说，除了勇气之外，还需要点别的什么，那就是：“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他补充说：“除了提琴制造商之外，”勇气“从来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金钱。”

二

海明威曾与哈德莉谈论过5月中旬要一起回西班牙去，但是现在，他们却用一直就折磨着勃姆比的严重咳嗽作为借口来改变他们的计划。哈德莉将和孩子呆在一起，而海明威自己将去马德里。那里有他渴望观看的斗牛，他还有几个故事要写。形单影只肯定不会令人愉快，但他又不能邀请保利娜来陪他，因为她和她的格斯叔叔还有婶婶一起去意大利度假了。

马德里的天气晴朗、干燥，但十分寒冷。事实上，他发现，那里的天气冷得在5月15日周六那天还下了雪，迫使人们取消了第二天的圣伊西德罗圣节。为了在他那没有暖气的房间里保暖，那个周日他猫在床上写作，整个白天直至深夜，因为他知道好歹他也睡不着。

他曾向菲茨杰拉德开玩笑似地保证说，《太阳照常升起》讲的是一次执行死刑时的情况。实际上，他在马德里写的那两篇故事倒确实是如此。奥利·安德烈森以前是个重量级拳手，他的身材过于高大，在他所租的那间房子里，连他躺着的那张床也显得不够长。他痴痴呆呆地等待着来自芝加哥的一对衣着相似的杀手马克斯和阿尔，等着他们来执行刺杀计划。《杀手》是海明威的经典作品。《今天是星期五》则是一部粗制滥造之作。在这出短剧中，三个罗马士兵正和一名希伯来酒商在一起用硬汉子的粗话来讨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受难：“我告诉你，如今他在那上头挺好的。”不过，这部短剧着重描写了这样一种死刑：当他们砸入铁钉时，“肯定会叫你够受”；而当他们把你吊起，你的“重量又开始向下拉扯铁钉时，”情况就会更糟。从传记的角度看，这种描写不无趣味。因为，它向我们暗示出，海明威是多么地渴望用痛苦的感觉去作为一种忏悔，而个中的缘由也许只是他的父亲海明威医生在揍了他一顿之后总是要他请求上帝的宽恕。海明威在完成了《今天是星期五》的写作一周之后，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今天上午我去做了弥撒。

在马德里，令他惴惴不安的内疚感大部分都与哈德莉有关，但他时不时也会记起他所背叛的另一个人。因此，关于即将于5月28日出版的《春潮》，他给舍伍德·安德森写了一封信，一封极没有条理的信。“您瞧，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这些作家）都不得不婉转谨慎的话，”他向过去的良师益友解释道：

如果一个像您自己这样本来可以写一些非常伟大作品的人却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尽管我从未写过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却是一个艺人同伴）是

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应该据实以告。……当然，看起来我似乎是已与那些像本·赫克特那样精明的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为伍了，这正是因为您对我一直都是那么好，对《在我们的时代里》拼了老命给予帮助，我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要以一个作家的真正的感激之情对您秉直相谏。可我想让您知道的是，当然这听起来太狂妄自大了，——唉，见鬼，连这我也说不出口了。

为了再次为这种无稽之谈辩解，他告诉安德森：“除了私人感情之外，没有什么美好的事物会因为讥讽而受到伤害。”极有可能的是，这种荒谬的奇谈怪论是出自于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之口。

三

考虑到里维埃拉的阳光会对勃姆比久治不愈从而令人担忧的咳嗽有好处，哈德莉接受了墨菲一家的邀请带着勃姆比去了南方。美洲别墅的客房让他们感到满心欢喜，勃姆比也因为与墨菲夫妇的孩子们一起在海滩上玩耍而晒出了健康的黑色。不过，一向对健康问题十分敏感的萨拉不喜欢听勃姆比的干咳声，她召来了一位英国医生，经过诊断后认为是百日咳，应该马上隔离。值得幸庆的是，菲茨杰拉德一家正好看上了一个更为宽敞舒适的地方，在租期未满的情况下他们就要离开瑞昂莱潘的帕基塔别墅，搬到一个拥有私人海滩且又离赌场更近的圣路易斯别墅去住。哈德莉和勃姆比以及他们那位忠心耿耿的布勒通仆人玛丽—科科特立即就搬进了帕基塔别墅，海明威在结束了他的为时三周的西班牙之行后也与他们住在了一起。

在巴黎，保利娜每天都收到海明威的来信，她说自己感觉就像过着一种流放的生活。她以一种惯常所特有的胆量问道，试想一下她到瑞昂莱潘去与海明威一家共度孩子的隔离期如何？由于在孩提时她患过百日咳，她并不担心自己会被传染上。海明威对此提议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因此，哈德莉很快就感觉到自己像在陶伯旅馆一样再次生活在一个三角关系的家庭当中。当菲茨杰拉德夫妇为帕基塔别墅所订的租约一到期，他们便举家搬进了附近的松林旅馆。“在那儿，”哈德莉回忆说：“你可以发现三个早餐盘子，三件晾在绳子上的湿浴衣，以及三辆自行车。保利娜试着教我跳水，可我却并没有学会。厄内斯特想让我们一起玩桥牌，可我又发现难以集中精力。每天早晨，我们在海滩上晒太阳或是游泳，中午就在小花园内共进午餐。午睡后，我们沿着瑞昂湾长途骑自行车。”

墨菲夫妇显然对海明威的文学成就和颐指气使的性格感到敬畏，他们对菲茨杰拉德怪诞行为的恼怒也与日俱增，因此，这种局面在那年夏天还造就了另一种紧张的三角关系。墨菲夫妇为海明威在赌场举办了一次晚会，特地为他送上了香槟和鱼子酱，妒意大发的菲茨杰拉德嘲讽说这是一份假心假意的食品。菲茨杰拉德有意卖弄似地把他的椅子从桌子边挪转开，然后粗鲁地直楞楞地瞧着邻桌的一位年轻迷人的小姐。当时，一位年纪相当大的男人正和这位小姐逗乐，他们只好叫来领班进行抱怨。菲茨杰拉德另一个哗众取宠的表演，是把一些烟灰缸扔在地上。杰拉尔德·墨菲对他这种“幼稚而且无

在和墨菲一家驱车观光时，他们的行程曾远至拉纳普勒湾。《伊甸园》中的许多情节都是以那儿为背景的。

聊的”行为忍无可忍，一甩手离开了晚会，尽管他是晚会的主人。

除了发现他这种幼稚的行为令人讨厌之外，墨菲夫妇还不得不去应付菲茨杰拉德对于他们感情的穷追不舍的提问，好像他若不彻底弄清楚有关他们的一切就无法再出版他的下一本小说似的。“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会喜欢或是能够容忍不断地被人分析、再分析或是被人评头论足的感觉，何况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很不友好的分析和评论，对此我们已是感触颇多了，”萨拉以一种指责的口吻对他说。“像你这般年纪你应该知道，”她又强调说：“你不可以对朋友妄加推测。”

菲茨杰拉德痛苦地意识到墨菲夫妇的忠诚已转移到了海明威身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以最认真的态度读完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打印副本，也没有妨碍他给予海明威最睿智的评论。他的建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有关杰克、布雷特和迈克·坎贝尔的背景资料应该大大删减或者干脆省略不用，海明威对于这一建议的反应是毫不留情地砍掉了小说的前15页。菲茨杰拉德还认为，在杰克的叙述中有太多的“嘲讽、自命不凡和无所事事”，有时他还爱用一些陈词滥调（“什么慈悲为怀，等等，这些在任何指南中都有”）。而且，在小说一开始，就有一种“拙劣而又滑稽”的腔调，他希望海明威能在校样中加以纠正。当然，如果说菲茨杰拉德懂得如何去批评，他也懂得如何去称赞、宽慰和鼓励。“天哪，从77页下面到78页上面那部分实在是太精彩了，”他拍案叫绝。他还吁请海明威记住，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你的一个新开端，我认为你写的东西棒极了。你曾是我想在欧洲会见的第一个美国人，也是最后一个美国人”。

总而言之，他的评论是赞不绝口。但是，他有一个与别人的看法炯然不同的见解。他确信在小说中有一处应用了掩饰手法，虽然他并没有使用掩饰手法这个词。这种手法与杰克的去势之伤以及杰克本人无法再像布雷特所希望的那样去勾引她有关。他告诉海明威，“我的评论的焦点对准了81页的某个地方，不过我认为你已不可能再做什么修改。我感到小说缺乏一种——她应该感觉到的——他也应该感觉到的——狂热的、令人痛苦的踌躇感或不安全感——同时还有恐惧感——也许是我疯了。他并不像是一个阳痿的男人，他好像是一个为道德观念所束缚的人。”菲茨杰拉德几乎就是在说：杰克之所以不能和一个他所钟爱的女人做爱并非是战争创伤的结果；而是出于某种深深植根于他心理历程中的因素。

四

6月底，菲茨杰拉德一家回到了巴黎。在讷伊的一家美国医院里，泽尔达接受了一次手术。虽然在正式的医疗单据上写的是阑尾切除术，然而人们有理由确信她真正做的是人工流产。

至于海明威，他依然执着于潘普洛纳的圣节，全然不顾一年前的残败局面。这一次，他不仅把哈德莉，还把保利娜、墨菲一家都带在了身边。斗牛场的第一排座位价格昂贵，由墨菲包揽了全部费用。那些座位每天下午都由他们这帮人占据着。有天早晨，斗牛场免费对所有人开放，海明威挑战似地要杰拉德和他一起进入斗牛场。杰拉德模仿斗牛士的动作可谓维妙维肖，他像挥动斗篷一般地挥舞起他的雨衣。不过，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依然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他发誓说：“爸爸，明年我会做得更好。”他用的是海明威的绰号。尽管当时海明威才27岁，他却热中于给自己这么个称呼。

圣节结束后，墨菲一家回到了里维埃拉，保利娜回到了巴黎，而海明威夫妇却接着去了马德里、巴伦西亚和圣塞瓦斯蒂安。哈德莉说：“旅行一直令人极为不快。”她的情敌写给他们的那些信件使她更觉难受。保利娜写道：“我要弄辆自行车，在树林里骑骑，我还想配个车座。我要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信中流露出富家小姐那种说一不二的语调。

8月初，海明威夫妇又出现在美洲别墅里。他们那种婚姻幸福美满的掩饰已荡然无存。墨菲夫妇得知他们要分道扬镳后，惊诧万分；而当时正在昂蒂布角度蜜月的唐·斯图尔特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消息。在他看来，海明威与哈德莉似乎是一对美满的伉俪。杰拉尔德告诉海明威说，他在巴黎弗瓦德佛大街上有一间工作室，只要他乐意，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海明威立即接受了他的帮助。

在海明威夫妇最后一次共同的旅途中，火车带着他们北上，他们瞥见了大海，随后驶入内地，穿过了褐石小山映衬下平坦的葡萄园地。海明威在一篇名为《美国太太的金丝雀》的短篇小说中回忆到了这一点，在这篇小说中还夹杂了他对母亲的责难情绪。故事描写到，天色渐晚，火车驶过了一间着火的农舍，机动车沿路边停放着，农舍里的东西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周围。在阿维尼翁的站台上挤满了黑人士兵，指挥官是一名身材矮小的白人军士。清晨时分，火车接近巴黎，它小心翼翼地越过一片精心护养的森林，越过有电车的城镇，迎面见到有迪博内、佩尔诺以及贝佳妮等名酒的巨型广告画。在卧铺车厢，一位年纪稍大的美国妇女在旅行时身边带着个装有一只金丝雀的笼子，她正对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说，她曾被迫阻止了她女儿和一名欧洲学生的热恋，原因是她不赞成她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笼子里囚着的金丝雀象征着那个女人对她女儿的控制。在里昂车站阴影的笼罩之下，那对年轻夫妇跟着一个照管他们行李的侍者走出了站台。站台末端是一扇门和一位收票员。那篇小说的末尾这样写道：“我们回到了巴黎，开始办理分居手续。”

五

由于公寓里的一切都令人睹物思人，让人想起厄内斯特，哈德莉无法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她为自己和勃姆比在丁香园咖啡馆对面的博瓦尔旅馆租了间房。所发生的一切使她完全崩溃了，她常常无缘无由地以泪洗面。唐·斯图尔特仍然记得在一次晚宴后送她回旅馆时，她哭了一路。在少年时代，父亲自杀身亡，母亲又坚持认为她童年时背部受伤将永久地影响她过正常生活的能力，因此她的心灵曾受到创伤。大学辍学后，她在阴影中生活了好几年。在她近30岁时，她竟然奇迹一般地遇到并嫁给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男人，他向她展现了这个世界。在他们的儿子出生后，她继续努力地去做一个时刻都伴随在他身旁的伴侣，为此而把自己推向了精疲力竭的边缘。但是，她无法减去怀孕期间所增加的体重，这就标志着她的失败感正与日俱增。丈夫显然在对自己不忠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她只好用过度的吃喝来加以补偿。然而，面对未来，没有了这么一个虽不好伺候但又让人难忘的男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儿子像她自己一样也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成长，她看不出这样的前景如何能有所补偿。

尽管争夺厄内斯特的战斗结束了，她还是试图以最后一搏来挽回局面。由于她知道他讨厌独自生活，她便写了一份正式的建议书，签上名后亲自送交给他。她提出，如果他与保利娜分开100天并且在那之后仍然相爱的话，

她就同意离婚。实际上，她暗地里希望事情能够正好与此相反。也许在这段时间内他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想念妻子和儿子，然后就会回到他们身边。

海明威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和保利娜应该对这张小纸片干脆置之不理，立刻就开始共同生活。他相信，总有一天哈德莉会屈服并同意离婚的。然而保利娜却更加坚强和实际。为了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一切，他们只需要实施三个月的自律。因此，她向《时尚》杂志告了一段假，订了红星船运公司“奔兰德”号大客轮的船票，于9月24日离开布洛涅去了纽约。

“奔兰德”号起航的头天晚上，这对情侣一起吃了鲽鱼和鹧鸪，并且商定了一整套他们在大西洋两岸拍电报的密码。他们约定把保利娜称作“皮拉尔”。第二天早上，船一离开港口，“皮拉尔”就发出她的第一份电报。在船驶入南安普敦港时她又发了一份。她在海上的第一封信中告诉海明威，她正在学习法语，并和别的乘客闲聊，从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效力一直扯到巴西港口的状况，以此来打发时间。到纽约后，她为她未来的丈夫买了几件漂亮的白衬衣，在街上碰到了对海明威的一切都很热中于打听的罗伯特·本奇利，还在斯克里布纳公司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她得知《太阳照常升起》定于10月下旬出版发行。她那富于同情心的格斯叔叔像她预期的一样支持她的做法，可当她回到阿肯色州她父母家并告诉她母亲她准备嫁给一个有妻室的男人时，却成了责骂的对象。虔诚的天主教徒普法伊弗夫人问她女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她（哈德莉）是什么感受呢？”谈话结束时，普法伊弗夫人说也许最好她们再也不要讨论这一问题了，她还提醒保利娜千万别对父亲提及此事。

为了寻求安慰，保利娜来到了她父亲拥有的一大片树林和田野。她在给爱人的信中写道：10月上旬的皮戈特，“一片阳光明媚，空气中充满勃勃生机”，比起那“自鸣得意的新英格兰”来，她更热爱这片郁郁葱葱的原野。不过，如果说大自然让她精神振奋的话，那么大自然最终也令她消沉失望。周末的雨水将秋叶打落在地，呈深褐色，湿漉漉的一片。星期一早晨，天空一片昏暗，“一种近乎疯狂的郁闷”压上了她的心头。她借了邻居男孩的自行车，骑上了一条泥泞的小路，想借此恢复自己的情绪。可回到屋里，她却伤心地哭了，而且断断续续哭了几个小时。那天下午，在写给海明威的信中，她坦白道：“你与哈德莉一起日复一日地过着地狱般的日子，我认为我与母亲的生活也是如此。……除了认为她女儿破坏了一个家庭并且替哈德莉格外难过之外，她还为我担心。……如果哈德莉要求你为她和勃姆比做些什么，无论何事，你都得做，一定要做。不论用多少钱来解决都成。”对海明威的第二位太太来说，金钱上的慷慨似乎总是解决人际关系纷争的最好办法。

六

自从他在里昂的火车站与哈德莉分手的那一刻起，海明威就以努力工作来支撑自己，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和校正斯克里布纳公司寄来的小说校样。8月26日，完成任务后，他将校样寄还给“珀金斯先生”，他仍然像在“毛里塔尼亚”号船上那样以此来称呼他的编辑。在同一邮件中，他还附上了一份《杀手》。这篇作品是“由一位享有盛名、受人尊敬的作者在一架已有六年历史的科罗纳牌打字机上打印出来的”。海明威希望珀金斯能把这篇作品卖给《斯克里布纳杂志》。（斯克里布纳公司的编辑罗伯特·布里奇斯立刻接受了这篇短篇小说并在1927年3月份的杂志上予以发表。）邮件中

所附的第三样也是最后一样东西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献辞页：此书谨献给哈德莉以及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本不想在献辞中提及哈德莉，但是最后这种想法终究未能敌过他对她所怀有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内疚感。

9月份的第一周，海明威开始着手撰写并完成了《美国太太的金丝雀》，又开始了另外一部更重要的作品。蒙帕纳斯墓地的对面，是弗瓦德佛大街，杰拉尔德·墨菲那30英尺高的工作室便位于那里。这是他工作的地方，也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墙上挂满了特大号的油画布。在那上面，墨菲吸收了综合立体派和其他一些现代艺术流派的特点，企图把它们改变成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加以表现。墨菲满怀激情，要把现实中的一些日常用品如剃须刀、手表、烟盒等用最准确的精确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一语双关地描述了他所使用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他得花数月时间把这些物品压缩成纯粹抽象化的形式，直到最后他觉得已作好准备才“重新将它们表现出来”。他的一位耶鲁同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赞扬他说，墨菲的审美标准是使人看到“‘物体本身’——‘物体’逼真神似，甚至可以成为实物的真实化身。”麦克利什进一步解释说，“杰拉尔德曾画过一个爱德华时代的香烟盒，真是维妙维肖，简直跟真的一样。他画的一只黄蜂活灵活现，任何人看了，倒会觉得现实中的黄蜂不是真的黄蜂了。”这些巨幅的艺术作品为他的工作室增色不少，也对海明威追求现实主义的风格起到了惊人的作用。墨菲非常慷慨地让他独用这间工作室。不幸的是，对这位画家的蒙恩感激之情，也正是导致他们之间的友谊最终枯萎凋零的主要原因之一。

9月底，一张信托银行巴黎分行的结帐单送到了海明威手里，他这才发现墨菲还在用另一种方式在暗中悄悄帮助他：他在他的帐户上存进了400美元。这份慷慨，同样也使这位接受者感到不快。

在这个工作室里，海明威写的第二个故事虽然不足3000字，却花费了他不少工夫才完成。在工作休息之余，他给在皮戈特的保利娜写了些充满狂热激情的信，生动地说明了他在感情上是个依赖性很强的人。哈德莉非常了解她的丈夫。对他而言，独自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他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向保利娜嚷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你是我的一切，我最亲爱的”；“我所要的一切就是你普法伊弗，噢，亲爱的上帝啊，我多么想要你啊”；“（对你的思念）无外乎就是黑夜中的恐惧和郁闷沮丧”；“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在各方面都彼此相融，需要对方，可接着却要分离，这种痛苦跟流产又有什么差别？”

在这几个月梦魇般寂寞的日子里，他也花了不少时间跟阿奇博尔德和艾达·麦克利什夫妇呆在一起，与阿奇博尔德一道骑车到沙特尔和巴黎附近的旅游景点观光或拉他去萨拉戈萨看10月份的斗牛表演。他陪艾达去观看职业拳击赛时，对挤撞到她身上的任何人都持寻衅的态度，这令艾达非常尴尬。她记得有好几次，海明威甚至凶神恶煞地威胁要揍那无心的冒犯者。有一天晚上，在麦克利什家，他又恶声恶气，从岩石般坚硬的心底里喷出了一些非常歹毒的话，他临时挤出了一首关于多萝西·帕克的诗，并执意要大声念出来。那天晚上，唐·斯图尔特也在场，对他的行为感觉恶心透顶，从此他对海明威的敬仰大打折扣。

在这首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那是去年4月份时，《纽约人》杂志社那机敏的帕克小姐与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夫妇还有一位健康状况变化无常的史学作家西沃德·柯林斯一道游览了西班牙。回到巴黎后，她告诉海明威说

她非常讨厌这个见鬼的国家，令海明威甚是恼怒。后来，她向海明威借了打字机却没有及时归还，这让他更为光火。她这样做，或许是因为能用这台打字机写作而得意洋洋，因为海明威是她心中的偶像之一。她风尘仆仆直奔法国，就是为了来拜访他。她甚至愿意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跟着他跑去森瓦利，去西班牙；她也希望在他到好莱坞时给予他热忱的款待。事实上，她所发表的有关海明威生活与工作的新闻报道字字句句都是奉承话，她还常常把自己的工作习惯与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献身精神相比较。据她朋友比阿特丽斯·艾姆斯透露，帕克所说的最后有案可查的话，既强烈地表现出她对海明威的绝对仰慕，也为海明威对她究竟持何看法深感不安。“我要你告诉我真话，”她催促道：“厄内斯特是真的喜欢我吗？”不过，如果说海明威因为有这样一个狂热的仰慕者而确实有点洋洋自得的话，这同时也令他对她感到厌恶。她老爱念叨着她是半个犹太人啦，她要自杀啦，或者她老是絮叨着什么流产或失贞方面的令人作呕的细节。1926年秋，海明威性情狂暴易怒，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意。在他看来，《致一位悲剧女诗人》这首诗她当之无愧。诗的前29行充分代表了全诗的恶劣卑鄙：

唤你有一把安全剃刀片刀片
崭新以防感染
割破你的双腕
伤疤却难寻
你吃多了巴比妥安眠药
试图窥视
那邻近国度的阴影
凡未达它那边界的行者无一能够回返。
但你总是适时呕吐
并将你的手腕包扎
诉说着你如何才能看见他的小手
早已形成
你已等待数月之久
那真是麻烦。
但你热爱狗和别人家的孩子
你憎恨西班牙，因为那里的人对驴子冷酷无情。
你希望公牛顶死斗牛士。
西班牙的民族曲调是《两人饮茶》，
你说别让任何人在你面前提到西班牙——
你已和塞尔迪斯一家目睹了这一切
一个犹太人、他的妻子和一个患了肺病的家伙
你冷嘲热讽四处奔走
穿过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
西班牙人拧痛了
你那肥腴的犹太腮帮子
那是在塞维利亚的神圣之周
你忘记了我们的上帝和他的激情。
你那屁股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巴黎

继续给《纽约人》写更多的诗。

但是，正如一篇新小说所显示的那样，那年秋天他最为深恶痛绝的还是婚姻这个概念。如果他不曾结过婚该有多好，他也就不会陷入这种难堪的境地。自怜的感觉与愤怒相互交织在一起。很明显，有时他甚至希望哈德莉能死掉，但他又生怕没有了哈德莉他也会茫然不知所措，再就是一种撕心裂肺般的内疚感也严酷地折磨着他。他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有一次，他送一手推车家具去她弗勒吕斯大街 35 号的新公寓，一见到她，他竟泣不成声。几年前，在多伦多的时候，他曾担心满腔怒火会影响他的写作能力，而现在这种担心以右手已经变形的可怕意象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必须使用某种方法来重新控制住自己，这就是说，他要通过描写自己的感受来消除这种感受。然而，为了便于在艺术上进行把握，他觉得有必要在自己和自己的情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必须把这些情感赋予别的人物，而不是投射在另一个我的叙述者身上。但是这样做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最后，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作品，他从马洛的诗《马尔他的犹太人》中确定了小说的题目，这首诗曾被 T.S.艾略特作为其《一个夫人的写照》的序言：

你犯了淫戒，
但那是在异乡，
况且那荡妇已经死去。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中，《在异乡》的开头一段是无与伦比的。跌宕起伏的节奏，视觉和触觉的感受，成串挂起的死兽死鸟与故事中被缚在理疗仪器上的残疾人之间的客观关联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处于巅峰状态的诗人独具匠心的创作。在这精确的描写背后，是杰拉尔德·墨菲那精细入微的绘画处理手法，而这一段作品正是在那些画前写成的：

秋天，战争一直在继续着，但我们没有再上战场。米兰的深秋冷飕飕的，天总是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放，沿街看看橱窗令人惬意。商店的门外挂满了猎物。雪花飘落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风不时掀动着它们身上的羽毛。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萧瑟的秋风从山岗上吹下来。

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的膝盖和腿受了伤，他正在一家医院里接受理疗。每天下午，他都同三位同样也受了伤的意大利军官一起步行去医院。到目前为止，就读者所知，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杰克·巴恩斯伤得那么重，但是，第四位意大利军官有时候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他的脸上蒙着一块黑色手帕，因为他失去了鼻子。

还有另一位意大利军官，一位右手萎缩的少校，他所摆弄的那台机器就在那美国人常坐的那台像三轮车一样的设备旁边。负责治疗他们的医生对他们能够康复的机会比较乐观，可是少校对此却深表怀疑。当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朝美国人眨了眨眼，一副嘲弄的样子。他的手被放在两个皮搭扣间，搭扣上下弹动，不停地击打他那僵硬的手指。为了给少校鼓劲，医生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照片上那手曾经也只有上校的手那么大，用机器治疗了一

段时间后，变大了一些。“挺有意思，”少校说。“那你有信心吗？”医生问他。“没有。”少校答道。

尽管少校在战前曾是意大利最棒的击剑手，他内心里所感到的愤怒却似乎与毁了他的事业的创伤不甚相干。他不仅对那些机器骂骂咧咧，说它们是“白痴”，他甚至也对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发脾气，因为他说意大利语竟然懒得去学语法。“他骂我是一个丢人的大笨蛋，”叙述者说：“他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竟会煞费苦心来教我。”当他开始盘问美国人的个人生活时，少校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准备去干嘛？”他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去。”

“结婚了吗？”

“没有，不过我想结婚。”

“你真是个大傻瓜，”他说着，一副很生气的样子。“男人决不应该结婚。”

“为什么呢，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结婚，”他怒气冲冲地说道。“即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他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失去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愣愣地瞪着前方，显得非常恼怒和痛苦。

“可是为什么就必然会失去呢？”

“肯定会失掉，”少校望着墙壁说。然后，他低下头看着整形器，猛地一下把那只小手从牵引带中抽出来，使劲地拍在大腿上。“他肯定会失掉的，”他几乎在大声吼叫了。“别跟我争辩！”然后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喊道：“来，把这个该死的東西关掉！”

真正让这位少校苦恼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得了肺炎，生命垂危。他烦躁不安，是因为他害怕失去她，这也是他告诫美国人不要结婚的原因。

不过，等他出去了一会儿再进来时，他的心情就有所不同了。少校为自己对待美国人的粗鲁的态度道歉，还用那只正常的手拍拍他的肩膀。突然间，读者觉察到在少校的愤怒的背后隐藏着痛苦，在他的那番男人应该去找不会失去的东西的断言之中，其实也包含着他对孤独的极度恐惧。刚刚从电话中，少校已经得知他的妻子去世的消息。“太难了，”他咬着下嘴唇说：“我无法控制自己。”他咬住双唇，泪水流到了面颊上。他绕过那些理疗仪器，走出门外。

七

11月17日这一天，在海明威甚至还没来得及将《在异乡》寄到美国去供《斯克里布纳杂志》考虑之前，他在写作这篇小说时的心理状况就戏剧性地得到了缓和。因为，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哈德莉的一封信。哈德莉在信中说，尽管他和保利娜分居后的时间还不到她所规定时间的三分之二，但她

不再想阻拦海明威显然期待已久的离婚了。“我原以为你并没有那么坏，或者比那更坏（我的确言过其实！），”她对海明威说：“但在你跟另一个人结婚的问题上，我发誓只能做一个局外朋友而已。”

海明威在日期为11月18日的回信中说，实际上，在她决定永远放弃他的这一刻，他感到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爱她。这才是他一直所梦想的那种妈妈：她宽容地对待他，不会让他去承担那些在道德上他不愿承担的责任，而是让他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信的开头，他用了“我最亲爱的哈德莉”这样一个表示亲热的措辞，然后他继续说她的信：“就像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一样”，都是“非常勇敢、完全无私而且宽宏大量的”。他说，他不久就会通知斯克里布纳公司，“《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的所有版税都该付给你”；而且，她还可以指望从该书的英国出版商乔纳森·凯普那里得到所有版税。“其数量非常可观，”他告诉她说：“因为那书在英国可能会大有销路。”这样的安排是很合理的，他接着写道，因为“如果我没有和你结婚，如果没有你的忠诚、你的自我牺牲，没有你的激励和爱，没有你的实款资助，我绝不可能写出……《我们的时代》、《春潮》或《太阳》等书的。”另外，他正在立一份遗嘱，他已写信告知他的代理人 and 出版社，在他死后，他所有的书所挣的钱，“过去的和未来的”都归勃姆比所有，而其基金会将由哈德莉替他掌管。最后，他想对她说，“也许对于勃姆比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有你做他的母亲。我不想对你说，我多么佩服你那正直的思想、你的头脑、你的心灵，还有你那可爱的双手。我将总是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够补偿我给你带来的巨大伤害。你是我所知道的最真实、最可爱、最好的人。”

就这样，哈德莉被转化成了一个想象中的人物，海明威立刻就开始在她的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想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保利娜可能将哈德莉的丈夫从她身边带走，然而现实并不是海明威生活的唯一王国。

八

然而在现实中，海明威却很少跟他的母亲直接交往，因为她对1924年11月号《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刊登的《医生夫妇》这篇作品未加评论，这使海明威极为失望。当《我们的时代》于1925年10月5日出版时，海明威从小道消息得知他的父亲也买了一本，可两个月后，他还是没有从他的双亲那儿收到只言片语。又过了两个月，在给伊莎贝尔·西蒙斯的信中，他很气愤地写道：“我想，家人们正在为他们该怎么向我谈及我最新的书而祈祷呢。”伊莎贝尔·西蒙斯是他的高中同学，已经嫁给了弗朗西斯·R.B.戈多尔芬，他是一位古典文学教授。

在那一年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他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在镇上已经听到关于《我们的时代》这部作品的“许多赞美之词”，并亲热地说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同时，海明威医生仍然坚持他的道德说教，他曾把六本《在我们的时代里》退还给了三山出版社。“相信你将来会从不同的人物身上发现更多的人性，并描绘出来，”他强调说：“你给世人看的野蛮与丑恶显然已经够多的了。去从人物身上寻找乐观向上的、愉快而高尚的品质吧。……要记住，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竭尽我们的全力。”至于他的母亲，她对这本收有《士兵之家》以及《医生夫妇》的小说集根本无话可说。她把两篇小说评论附在一封圣诞贺信里寄到了巴黎，一篇是她从保罗·罗森菲尔德的《新共和》杂志上剪下的关于《我们的时代》的评论，另一篇是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评论舍伍德·安德森的《阴险的笑》的文章。同时在信中，她有意大谈特谈起她自己突然萌发的去做一个山水画家的事业。

海明威从施伦斯写给她的回信中充满了虚伪的亲热：“祝贺您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就！谢谢您寄来的《新共和》杂志上的评论，也谢谢您一起寄来的《大西洋月刊》上关于安德森的小说的评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很有眼光，他说出了我对《阴险的笑》的看法。”在信的结尾，他从文学转向个人的事情，很随意地说起一个名叫保利娜·普法伊弗的女人将要到施伦斯来，与他和哈德莉一起过圣诞节。一个星期后，在给麦克利什的一张便条中，他多少表达了一些对他母亲的不满。“我母亲把你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关于《阴险的笑》的评论寄给了我，”他这样写道：“那是一篇他妈的相当不错的评论。我母亲总是把让舍伍德曝光的所有东西都寄给我，他离婚的事或别的什么，因为她每每读到有关我的事也差不离儿，还没那么好呢。她无非是想让我知道这位‘大师’过得怎么样。”

12个月后，海明威分别收到来自父亲和母亲的信，而且都是关于两件事情：《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以及他的婚姻危机。“你现在当然是一个成名作家了，我应该相信，你将来的书肯定会写某种不同的主题，”他的父亲很圆滑地对他说：“你有了了不起的才能，我们希望能够读到并且能够让别人欣赏你的作品。”有一个段落，海明威医生显然很难下笔，但他还是加了这么几句：“有一些谣传是关于家庭内部出现严重危机的闲言碎语。请来信告知真相，这样我就能驳斥那些有关你和哈德莉关系破裂的谣言。”

母亲对于那些传闻的反应在措辞上要温和一些。“你和哈德莉之间的感情正在冷却，”她在信中说：“我相信那不是真的，可是你在近来写给我的信中哪一封也没有提到她的事，这使我不得不有点替你的幸福担心。”但是，在谈到《太阳照常升起》时，她对海明威劈头盖脑地进行了一番道德评判。听说那本小说销路不错她很高兴，尽管在她看来，写出本年度最淫秽的小说之一，真是“荣辱难卜”。除了“他妈的”和“婊子”这种词，厄内斯特一定还会用其他的词语。遗憾的是，她不得不放弃畅销书籍读书会的最近一次聚会，在讨论《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她可“没有脸面在场”。她责问她的儿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你已不再对忠诚、高尚、荣誉和生活中美好的事情感兴趣了吗？——瞧，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一天比一天精彩——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的天堂——我有机会去创造美，并使生活中的崇高得到升华。如果厄内斯特正在经历他那些罗曼蒂克的麻烦事，或者说酗酒已使他无所作为，那么他必须斩断那些束缚，挺身站起来做一名上帝所期望他应该成为的男子汉与作家。甚至在怀他之前，他的父母就已经将他献给了上帝，希望他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孩子，我爱你，”她最后说：“我仍相信你会干出一番流芳百世的业绩。”

艾伦·泰特对《太阳照常升起》的贬损评价见诸报端后没几天，海明威就此对这位诗人发表了一通尖刻的牢骚。然而，母亲的批评在他心中造成的阵阵刺痛远非任何职业评论家所能及。他心痛之至、气愤之极，无法回复母亲的批评，甚至如同六年半前他无法启齿回复她那“银行帐户”的风波一样。格雷丝一直没有收到儿子的来信，于是在1927年元月31日她再次提笔。这一次她的语气轻松愉快，所谈到的都是她自己的事。她想知道“家里人是否已告诉你，我正用我的绘画作品赚大钱呢，每幅售价250美元。”随信她还

附了一份目录表，上面列着近期她在马歇尔·菲尔德大展中展出的作品，其中包括她命名为《铁匠铺》的绘画复制品。事实上，她在通过这种策略强迫他回信。2月5日，他满足了她的要求。

对母亲寄来的在马歇尔·菲尔德大展中展出的作品目录表敷衍了几句之后，他对没有回复母亲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评论解释说：“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在生气，而写信发脾气是很愚蠢的，对自己的母亲这样做则更是愚蠢之至。您不喜欢这本书是很自然的，对于您读到了令您痛楚或厌恶的书，我深感遗憾。”这一段话到此结束，但这一话题并未告一段落。他不仅继续澄清说自己压根儿不以此书为耻，而且颇带讽刺意味地提及双亲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企图令母亲不快。他宣称，这本书并不比“我们橡树园一些最好家庭的某些成员的内心世界”更令人不愉快。他说，实际上唯一的区别是，她对待人类生活是个伪君子，而他则不是。“您必须牢记，在这样一本书中，人们生活中所有的罪恶都呈现在眼前，而在家庭里，既有着面向公众的可爱的一面，又有着我曾在关闭的门户后所观察到的另一面内幕。”

话说到这儿，他还没个完。因为现在他那“沉默的大坝”既然已决了口，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开始嘲笑她的朋友。“芝加哥《论坛报》的范尼·布彻小姐可不是个有头脑的评论家，要是她对我的书大加赞赏，我会觉得十分好笑。在她指导之下的读书会的淑女们如一致认为我在玩弄伎俩出卖才华，以达到最低级而庸俗的目的，那我倒要问问这些淑女们为何要谈一些她们一无所知的东西，说些十分愚蠢的话。”

关于他和哈德莉，他希望母亲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和勃姆比“两个人过得都很好，健康又快活。《太阳照常升起》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版税酬金，按照我的指令正直接汇给哈德莉”。至于格雷丝推测说海明威已成酒鬼这件事，他扯谎安慰她说：他“只是在用餐时喝适量的葡萄酒或啤酒”，实际上他正过着“严格的苦行僧生活”，而且“我从来未喝醉过，甚至不常喝（您会听到一些把我描述成酒鬼的传说——只要你在作品中有喝酒的描写，这种传闻就会随之而来）。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静谧和写作的机会。”

最后，他借着母亲有关他是否对忠诚失去了兴趣的问题进行发挥，他指责她对他不忠爱，而“父亲向来很忠义”。在结尾处他写道：在我的一生中，“如果您把所听说的都当真，您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会使您感到我让您丢脸。相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信任感’这种麻醉剂，您也许就能透过表面上我所有的臭名声，最终发现我根本没有丢您的脸。”

“你说我对你不忠爱，如果这是出自你内心的话，那将使我非常沮丧，”他的母亲于2月20日反击他的信说。“我们的天父憎恨罪恶，但对罪人却仍然施以爱。我仍想以母亲的特权并竭尽我的微薄之力敦促你抛开粗俗低级的东西，胸怀大志。……一生一世，我都信任你，相信你真善美的一面终会战胜不良影响和庸俗欲望。在你的生活中，只要你向上帝伸出克己之手，上帝就会助你成功。”

他们你来我往，唇枪舌箭，然而格雷丝似乎有最终发言权。两个月后，海明威以另一种方式来反击她，他写了一篇题为《我躺下》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位面带胜利微笑的女人站在门廊里，看着丈夫用火拨将烧得黑黑的缺了棱角的箭头、石斧以及剥兽皮的石刀从屋前车道上的火堆中翻出来。

《太阳照常升起》于 1926 年 10 月 22 日出现在书店里，防灰封皮上印的是金色、黑色与褐色，书名两边都有一只金苹果，下面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女子穿着古色古香的希腊式服装。她穿的是凉鞋，脚边有一只牧羊神烟斗，左手掌心上托着另一只金苹果。在封面的最下方，海明威被标明是《我们的时代》和《春潮》这两部作品的作者。书的第一版便卖出了 5090 本。到 12 月中旬，第一版所有的印书全部售完，第二次印刷的 2000 册也同样售之一空。以后的一个月里又售出 3000 册。没有迹象表明公众对这本书的兴趣有所减少。马克斯·珀金斯评价说：“太阳已经升起，……并且正在稳定上升。”

与此同时，海明威也不再从畅销的美国杂志收到退稿单了。除了《杀手》，《斯克里布纳杂志》还刊登了《美国太太的金丝雀》和《在异乡》。令人吃惊的是，《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他的《五万元》。尽管这些小说的作者海明威拿不到像他朋友菲茨杰拉德数年来所通常得到的那样高的稿酬，但显然已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1927 年冬，海明威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过，这首先还得归功于保罗·普法伊弗夫妇的资助。普法伊弗夫人终于同意让海明威做女婿，保利娜的叔叔格斯则更是希望如此。因此，海明威在瑟堡港保利娜所乘坐的轮船上接到了她之后，就与她和吉尼以及麦克利什一家去滑雪，度了一个长假。施伦斯的陶伯旅馆对他来说已经不够档次了。现在，他更看中的是格施培德的罗斯利宾馆的豪华气派。也就是在那儿，他听说哈德莉于 1 月 27 日已在巴黎获准离婚。

3 月份，他们返回了法国首都巴黎。保利娜吃惊地发现，尽管他们的婚礼定在 5 月初，海明威却根本无心帮她去找一套他们要住的公寓。他不仅不帮忙，还与他的伙伴盖伊·希科克一起去旅游。保利娜尖刻地将这次旅游称作“促进男性交谊的意大利之行”。她找了好几天房子，但运气始终不佳。最后还是艾达·麦克利什提供了可靠的消息，将这位准新娘带到了菲鲁街的一套公寓。菲鲁街是一条风景别致的小街，位于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后面。这地方新近才油漆过，有一间大卧室、一间正式客厅、一个餐厅、一间宽敞的厨房、两个洗澡间、一间书房和一间下房。保利娜想要的正是这样的房子，她给叔叔格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格斯叔叔很快就回信说他将来巴黎，而且只要这地方他喜欢，房租就由他来付。

此时此刻，希科克正驾驶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轿车，海明威正看着路线图，促进男性交谊的旅行正进行得十分顺利。从文蒂米利亚进入意大利后，这两个朋友首先驱车前往拉帕洛。在那里，海明威与仍然还是普通牧师的唐·朱塞佩·比安基呆了一晚上，一道回忆起在福萨尔塔的军官餐厅里度过的美好时光。

第二天下午，他们在拉斯佩齐亚停车吃午饭。他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用模板印刷的令人厌烦的元首墨索里尼的画像，每张画像下方都有黑色的手写体“万岁”字样。因为是星期天，通往港口的街道上衣着绚丽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在海明威和希科克打算就餐的饭馆里，他们正浏览着菜单点菜，一个女孩子一边等着他们点菜，一边用手臂勾住希科克的脖子。另一个女孩站在门口，可笑的是她那宽松的衣服里面什么也没穿。第三个女孩时不时地也到门口去站一站。她们三个好像全由坐在后间的桌子边的老妇人所控制。第一个女孩把用餐者要的实心面条和红葡萄酒端来后便坐到了他们身边。只见她

身子往桌上一倾，双手放在自己胸前，问希科克是否喜欢她。“他很崇拜你，”海明威说。他为他的朋友作了周全的回答：“可他不会说意大利语。”希科克问海明威，他是否有必要让这个女孩子再把手臂放在他的脖子上。海明威答道：“当然可以啦。墨索里尼已废除了妓院，这只是个饭馆。”

给他们上的甜食是香蕉。“香蕉还凑合，”希科克说：“它们的皮都还没剥。”那女孩子把希科克拥抱了一下。海明威解释说，这个女孩子很高兴希科克喜欢香蕉。希科克答道：“告诉她我不喜欢香蕉。”海明威把他的意思转达给了她们，然后要来帐单付了款。之后，他们便走出餐馆上了汽车。招待他们的女孩子走出来站在门口，海明威向她挥了挥手，但她没有回答。

接下来的10天，两人走马观花地游览了比萨和佛罗伦萨。他们驾车驶过亚平宁山脉到里米尼然后经博洛尼亚、帕尔马、皮亚琴察及热那亚返回。海明威很快将这次旅行写成了题为《意大利，1927》的文章，并把它送给了《新共和》杂志的埃德蒙·威尔逊。这是一篇对这次旅行的半记实、半虚构的叙述文章，其中包括海明威对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一些印象，非常耐人寻味。最精彩的一段就是星期天在拉斯佩齐亚就餐的那段出色描写。尽管盖伊·希科克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也情有可原。希科克的许多朋友纷纷从《新共和》上剪下了这篇文章并在这段底下划上了红线附上了评语，最后，他终于理解了其中的含义。他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为什么你写的东西中人人都会带上把枪。”本周内来看看我，他敦促道：“我的枪就藏在这个书桌里。”

海明威和保利娜一样，都想举行天主教婚礼。天主教会将海明威和哈德莉的新教婚礼说成是不作数的，海明威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对那些宗教上的胡言乱语，什么哈德莉从未成为海明威的妻子啦，他们的儿子勃姆比是私生子啦等等，艾达·麦克利什厌恶至极，但她对海明威只字未提自己的感觉。海明威和保利娜一举行完婚礼，她还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就哈德莉而言，她只是温和地说教会的这种结论使她感到奇怪。出于为前夫的考虑，她什么都没再多说。自从她决定与海明威离婚以后，她一直与他相处得很好。在格施塔德父子俩相处的10天里，海明威对儿子表现出的关心特别让她高兴。而当她和勃姆比4月中旬离开巴黎去美国旅游时，海明威还把他们送上了开往港口的列车，目送他们离去。他那彬彬有礼的风度，着实令她感动。

保利娜和海明威于5月10日在维克多·雨果广场那高雅的圣奥诺雷迪埃劳教堂结了婚。新郎身穿三件套的花呢西服，已辞去《时尚》杂志社工作的新娘身着直接按照该杂志的款式订做的时髦丝绸婚礼服，戴着一条单串珍珠。她那乌黑的头发卷在耳沿上，看起来像个男孩儿。保利娜唯一的陪伴是吉尼·普法伊弗，近来海明威是如此地喜爱她，他正考虑将下一个短篇小说集献给她。然而，普法伊弗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只寄给了他们1000美元的支票以示他们的存在，他们没有参加婚礼。

为度蜜月，海明威选择的是个未受污染的渔村勒格劳-迪鲁瓦，它坐落在罗纳河入海口顶端艾格莫尔特地区下面的沼泽平原地带。受命于菲利普·勒·阿迪，西蒙娜·博卡内格拉于13世纪后期在艾格莫尔特修建起了雄伟的壁垒。海明威喜欢研究战争，所以他爱攀爬这些壁垒。由于在人迹罕至的海滩赤身行走，这对新婚夫妇皮肤晒得很黑。一天，他们决定扮成吉普赛人，骑自行车去参加当地人的喜庆节日。他们用浆果汁涂在脸上，这样他们

脸上的颜色就更深了。穿上吉普赛人的服装后，他俩看起来就像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20年后，对于这一点的记忆促使海明威把他描写性变异的奇异小说《伊甸园》的开头几篇设定在勒格劳—迪鲁瓦。

罗纳三角洲开阔无荫、灼热逼人。那荒芜苍白的景色，大大激发了海明威的想象力。那儿的一切都使他想起以前曾动笔写过的短篇小说中的场面——“埃布罗河河谷的那一边，”他的手稿是这样开头的：

白色的山冈连绵起伏。这一边，无遮无荫，没有树木，车站就在阳光照耀下的两排铁轨之间。紧挨着车站的一边，是一幢笼罩在闷热的阴影中的房屋，一串串竹珠子编成的门帘挂在酒吧间敞开着门口挡苍蝇。那个美国人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姑娘坐在屋外荫凉处的一张桌子旁。天气很热，巴塞罗那开来的快车还有40分钟才能到站。列车在这个中转站只停靠两分钟，然后继续行驶，开往马德里。

在勒格劳—迪鲁瓦的三周里，海明威用几天时间写完了《白象似的群山》。选择这样的主题对在度蜜月的人来说，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故事很有可能取源于他对第一个妻子的想象，重现了他在《禁捕季节》里所描写的那种压力。作者再次希望对故事中不愿做流产的女主人公表示同情。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故事中男主人公蛮横无理地坚持要她流产，这正表明了海明威对他与哈德莉婚姻失败的最新理论：如果他们两人的生活中没有孩子的介入，他们本不会分手。

1926年秋，他的这种想法在内心中一直萦绕不散，他写给当时住在皮戈特的保利娜的一封信也有所表露。在信中，他很奇怪地使用了流产这个词。他写道：“你瞧，普法伊弗，我认为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在各方面都彼此相融，需要对方，可接着却要分离，这种痛苦跟流产又有什么差别？”但是，直到他把哈德莉神化为他所认识的最真实、最可爱、最好的人之后几个月，他才真切地感觉到当初一个劲儿反对勃姆比出生的想法有多么恶劣，所以他就此写了一篇小说。他本可以把它命名为《禁捕季节：第二部分》。

“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的，吉格。真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这个男人向他的女性同伴说着。他们正坐在一块阴凉地里喝着啤酒。他们坐的那块地方是在车站边上，穿越那片河谷便是那排在她看来就像是白象似的座座小山。“我们会拥有一切的，”他对她说：“我们会拥有整个世界。”但是，“除你之外，我什么人都不要，”他强调说：“我不会要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个无名氏男人——就像《禁捕季节》中的那个年轻人也是无名氏一样——来说，一个孩子无疑与一只毫无用处的白象一样。然而这位名叫吉格的女人拒绝了他。尽管她也答应让步，但她附加的却是他所无法接受的要求。“那我就干，”她说：“因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怎么样。”不过，当他回答说“但如果你是那种感觉的话，我就不想让你做了”时，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只是在重新准备再次努力使她就范。他不停地磨着嘴皮，最后她忍无可忍地说道：“能不能请你，请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万求求你，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那人非常沮丧，独自踱到了吧台要了一瓶安尼斯酒。一切都毫无结果。与《禁捕季节》中的那位年轻人不同的是，他并未改变主意，然而他也并未获胜。“你感觉好点了吗？”回到桌旁后他向吉格问道。“我很好，”她说：

“我一点没事儿，我很好。”这最后的几句假话显然言不由衷，但却最终道出了他们这场纷争背后的丑陋与恐怖程度。从痛苦的开端到痛苦的结局，整个故事反映了海明威内心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杀子于腹的念头如梦魇一般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不散，可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这样的梦实在卑鄙可恶。

在手稿的结尾处，有一条铅笔写的注释。这位正在度蜜月的作家写道：“手稿、保利娜——罢、罢、罢。”他的措辞隐含着惊诧和疑惑，也可能还意味着一种警示。

第十六章 空心人

—

如同海明威在后来的岁月中所经历的许多次外出远征一样，他去罗讷三角州的旅行也因意外事故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有一天，在游泳的时候，他的脚在一块岩石上割伤，患了炭疽热感染，脚肿了起来，体温直往上窜。回到巴黎后，他被迫卧床休息了10天。

在他又能起来走动时，他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一家裁缝店定做了一套手工制作的西装，另外还有漂亮的男式软呢帽和大衣。如此穿着时髦笔挺，圆了他向往已久的梦想。至于他要付的价钱，他似乎毫不在乎。因为不仅美元对法郎的比价格外坚挺，而且他们公寓的房租也是由保利娜的叔叔格斯在掏钱；《太阳照常升起》的销售已达到了2万马克，秋季到来时，斯克里布纳公司又将出版他的一本新的小说集。

《没有女人的男人》是他为这部集子选择的极好的标题，尽管其微妙之处对于那些热中于海明威神话的人来说来必一定能够体会得出。这标题当然暗示着他所描写的是那个狂傲的男性世界，那个充满了犯罪、拳击、斗牛的男性世界，——这就是那些爱好神话的人们所提出的解释。但他同时也是在暗示：女人与男人的疏远（反过来也一样）是他的主题之一；在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一篇小说中，他也有意识地描写了一个男人在失去妻子之后那痛心欲绝的悲伤。他觉得有四篇小说会对读者产生最大的影响，他把它们放在了在这个集子的开头：《没有被斗败的人》、《在异乡》、《白象似的群山》以及《杀手》。另外两篇力作，《五万元》和《阿尔卑斯山牧歌》，他打算分别放在第六篇和第十篇的位置。正如他在结束《我们的时代》时用的是充满回忆的《大双心河》，他也决定在结束《没有女人的男人》时用充满回忆的《我躺下》。充实这本小说集的其他作品是：《祖国对你说什么》（也就是《意大利，1927》，所用的标题是一条源于丹农齐奥的口号）、《十个印第安人》（讲述的是普鲁迪·米切尔如何使年轻的尼克·亚当斯心痛欲碎的故事）、《追车比赛》（描写的是一位正在平步青云者的滑稽表演）、《简单的调查》（讲述的是一位同性恋的意大利军官对其年轻的勤务兵的兴趣）、《陈腐的故事》（是向已故斗牛士马埃拉表示致意的故事）、《美国太太的金丝雀》以及那篇平庸的《今天是星期五》。如果说《没有女人的男人》没能注定成为一名20世纪美国作家所发表的影响最广泛的小说集的话，那么只是因为在其之前已经有了《我们的时代》。

新书计划完成之后，他开始考虑他与保利娜该在哪儿度过夏天，因为他的要求就是保利娜的愿望，就像以前是哈德莉的愿望一样。尽管他在6月17日收到了萨拉·墨菲一封亲切友好的信，邀请他们去美洲别墅，但他却宁可回到西班牙去，而且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当他们重返潘普洛纳欢度圣诞节时，肯定触发了一些不幸的回忆，但他们在表面上却只字未提。随后，像杰克·巴恩斯那样，他们决定在圣塞瓦斯蒂安游泳和歇息。他们又从那儿前往巴伦西亚和马德里，那两个鬼地方都热得要命；但他们在8月的第一个周末所到达的西班牙西北部倒是阴凉多雨，令人愉快。拉科鲁尼亚是“欧洲尽可能地伸入到大西洋中去的一个了不起的城市，”海明威在给巴克利·亨利的一封信中说：“漂亮宽阔的街道上没有人行道或街沟，我在那儿吃了入夏以

来的第一顿佳肴。”圣地亚哥—德拉孔波斯特拉对他更具吸引力，用他的话说“西班牙最可爱的城市”。在那儿，他和保利娜愉快地呆了近两周，有时阅读《没有女人的男人》的校样，有时在大教堂的侧廊漫步。

二

他们旅行的最后两周是在昂代布拉奇度过的。在那儿他们收到的邮件中有一封是海明威医生从巴黎寄出的。尽管他和格雷丝一直都在给儿子写信，但厄内斯特同他们俩都没有通信，甚至连他与保利娜的婚事都未提。去年冬天，他与母亲的通信中你来我往、唇枪舌箭之后，海明威医生一直为此事不安。他写道：“自去年12月份以来，要是你曾回过我写的任何一封信，说说你的心里话，我就会感到，嗨，多么高兴啊，我也就会少有几夜不眠之夜，少做几次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孩子，但要记住：‘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全世界，但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这又有什么好处可言？’让我们经常听到你的消息吧，切记莫忘！”

海明威对这些责难的回复长达六页，大部分都言不由衷，但有几处还相当感人。他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和哈德莉的分手。他向父亲保证说，他们只不过是“断交”而已，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决定倒是她作出的，而不是海明威。“我并没有抛弃她，也没有与任何人通奸。我与勃姆比住在公寓里，哈德莉外出旅行时我照料他。而正是当她这次旅行回来时，她决定要彻底离婚。”他继续说道：“一年来，我爱着两个人，但对哈德莉是绝对忠实的。……我们离婚后，如果哈德莉需要我的话，我肯定会回到她的身边。她说事情就像这样顺其自然比较好，我们俩都会好过些。我将会永远爱着哈德莉和勃姆比，也将永远照顾他们。我也将永远爱着我现在娶的保利娜·普法伊弗。”他已意识到自己“懒于动笔写信”，对此深感抱歉，但“我尽量将自己的私生活不予公开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向别人提起。当然，我也的确应该向您和母亲说明此事。但我总不能老写这些吧。”

当话锋转到有关他的写作问题时，他流露出由于他的母亲为了《太阳照常升起》而责难他，这件事给他造成的创伤仍在隐隐作痛。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写的那种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品味不同。可评论家们并不都是范尼·布彻。我心里清楚在我的作品中我并没有给你脸上抹黑，相反，我所做的总有一天会使您感到骄傲。……如果您愿意的话，有时您可以为我感到骄傲，那是为我的作品本身，而不是为我的成就，因为我在这方面还未有所辉煌建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三个人的幸福之外，我的作品对我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您不会知道我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肯定您也知道，上帝在天可以作证，母亲所感到羞愧的是本不该感到羞愧的事。

在信的结尾处，他试图谈到爱，又忍不住自怜了起来，信还没写完，他又变得十分生气：

我很爱您，也很爱母亲，我很抱歉这封信这么长，它也许解释不了什么，不过自从我学会使用钢笔和墨水以来，我还没有给别人写过长达六页的信。

我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她宁愿看见我躺在坟墓里也不愿意看见我——我不记得了——也许是抽烟吧。幸好我对抽烟一点也不感兴趣，已有三年没抽了，尽管你会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我抽烟抽得有多凶的传闻。……我希望您让母亲看看这封信。去年春天她给我写了一封华而不实的信，恐怕我没有回。我未向您二老吐露知心话，主要是因为母亲说我写的都是些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我感到很伤心，所以只好保持缄默。……然而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们俩能从这封信中得到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再搞文学评论或人身攻击，我是会经常写信的。

写这封信的日期是9月14日。海明威心里很清楚，再过一个月，斯克里布纳公司将出版他的《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书。他的父母和格雷丝的读书社将会发现该书的最后一个故事中充满了许多熟而可辨的细节。躺在意大利一家丝厂的地板上，主人公想起了他爷爷的房子，当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曾在那儿住过，还有“母亲设计建造的新住房”，那是他家后来搬去住的。“您不会知道我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海明威在信中说出了这句最辛酸的话：“我知道，肯定您也知道，上帝在天可以作证，母亲所感到羞愧的是本不该感到羞愧的事。”不过，《我躺下》中对格雷丝竭尽诋毁的描写，肯定会使她有失脸面。

三

回到巴黎后，保利娜告诉海明威她已经怀孕了。不管对这消息感到多么地痛苦不堪，他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以免破坏了家庭的宁静，而宁静正是他当时所渴望的。因为，在昂代布拉奇，他就开始酝酿一部名为《吉米·布林》的新作，这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据他自己所称，这是一本现代的《汤姆·琼斯》，小说旨在追溯流浪汉主人公和他那革命者父亲的经历。他们从橡树园来到芝加哥，再到纽约，最后到巴黎——吉米母亲的故乡。到10月中旬，这个孜孜不倦的作者已完成了3万字；第二年的3月份，当他最终放弃这部书时，手稿又增加了原有的一半。

正当他工作受挫时，《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本书出版了。书的尾页是黄色的，在一个黄色的圆圈里有一幅图，画的是一条正在向前猛冲的公牛，中间有三条深黄色的条纹。这本书吸引了众多评论家们的注意，非常令人满意。这一事实正好有助于说明这本书能在三个月内销售15000册的原因。对于一部短篇小说集来说，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但是，评论家们的观点却有很大的分歧。1927年10月9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每周图书专栏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首页的书评中尽显其恶语伤人之能事。她大肆批评出版商对书籍内容所作的宣传，其实海明威对此并无任何责任。书的宣传者声称：“任何削弱人们斗志的女性影响都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由于训练、纪律、死亡还是某种境况。”伍尔夫夫人评论道：

对此，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去理解：妇女不适合训练、纪律、死亡或某种境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去揭示这位评论家的思维过程，那么就会发现：任何对于性别的强调都是危险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告诉一个男人这是一本女人的书或者告诉一个女人这是一本男人的书，你只会带来与艺术毫无关系的同情与反感。最伟大的作家们从不以某种

方式强调性别不同。当这个评论家看书时，并没有人提醒他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可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性烦恼的原因，人们的性别意识强烈，在文学作品中，其表现要么过于夸张，要么就反对性别特征，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取的。

她对海明威下的最后结论是：尽管海明威的言谈举止跟得上时代潮流，但他的思想却落伍了；他的才华最近不是拓展了而是收缩了；与他的长篇小说相比，他的短篇小说显得“有些干巴巴的，枯燥无味”。

西里尔·康诺利在《新政治家》上写道，他觉得这些短篇小说“混杂有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文风、凯尔特人的幼稚和生活的片断，……使其得到弥补的是运用了幽默的手法、颇具力量的对话以及显而易见的对（所描写）人物的认识”。尽管美国人认为海明威是乔伊斯第二，可他“只不过是一匹黑马，而不是可靠的希望”。H.L.门肯在《美国信使》上评论说，海明威和桑顿·怀尔德“近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赢得了许多评论家的敬意”，但那只不过是“精湛的技巧”使他们引人注目。珀西·哈奇森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的意见也认为，海明威的艺术充其量只不过是“新闻报道者的艺术，只是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已”。

而在另一方面，威廉·柯蒂斯告诉《城市与乡村》的读者，《没有女人的男人》“也许是自从基普林年轻时代以来出版的最出色的短篇小说集”。多萝西·帕克尽管听说过海明威讽刺她的诗文，却不记前嫌，她在《纽约人》上称赞该书为“一部真正不同凡响的作品。……我不知道在哪里还能找到比这更伟大的短篇小说集”。在《新共和》杂志上，埃德蒙·威尔逊对海明威大肆赞扬，他的评论文章伊始就不无尖刻地断言说，海明威的名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如此之高度，以至于诋毁他都已成为了当今的时髦”。《日晷》杂志的评论员 N.L. 罗思曼把海明威描述成“我们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甚至大胆地预言，总有一天海明威“将会写出一部伟大的悲剧”。

四

1927年圣诞节后不久，海明威和保利娜在瑞士观光旅游。糟糕的是，四岁的勃姆比把手指头插进了他父亲的右眼，指甲擦伤了瞳孔。海明威一个星期都疼痛难忍，两眼不停地流泪，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三个月后，海明威又受了重伤。同阿奇博尔德和艾达·麦克利什夫妇吃完晚餐后，凌晨两点，他走进了他和保利娜房间的浴室。也许是因为太困了，不过更有可能是喝醉了，他没有拉抽水马桶上的链子，而是用力拽天窗的绳子，整个天窗及窗户上的厚玻璃都落在了他头上。结果，在头发分叉处的正下方，砸了一条月牙形的口子，缝了九针才合拢，留下了终身的疤痕。

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因为，到1928年，大众传媒认为海明威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值得报道。在拉帕洛，埃兹拉·庞德听到这一消息时，马上写了一封信去跟他那受了伤的朋友开玩笑。“你这只造孽的野公猫，”3月11日他写道：“你是不是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能够向上摔出去穿过那该死的天窗！！！！！”同一天，哈德莉也给他写了封充满同情的信，这一定又使海明威想起了她的可爱之处。“你这可怜又可爱的老家伙！像你这样漂亮的家伙竟然碰到了这样倒霉透顶的事儿！我猜想你（和保利娜）对生活中一个接一个的不幸有点灰心丧气吧。”

前一年 10 月份，哈德莉和勃姆比回到了巴黎。海明威再次看见她时，他很快惊讶地感到她不仅十分漂亮而且很快乐。原来，她变得这么快乐的原因是由于她在美国逗留的那段日子里，她与芝加哥《每日新闻》驻巴黎的记者保罗·莫勒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哈德莉和莫勒的相识始于一年前的巴黎，当时她和海明威刚刚分手。有几次他们在一起打网球，然后去天文台咖啡馆喝啤酒歇凉。莫勒喜欢她那“击球时的利索劲”、她那“不露锋芒的机智”以及她那“恰到好处的幽默”。不过，他俩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罗曼史，因为 40 岁的莫勒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是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的父亲。但是，当他们在美国再次相遇时，莫勒告诉她他的情况不同了。他的妻子已决定搬到她的一个女朋友那儿去住，那位朋友在巴黎有个工作室。而莫勒则打算买下克雷西昂布里附近的一个乡村住宅，乘车去巴黎上班。莫勒说，如果哈德莉愿意的话，他会很乐意带她出去约会。哈德莉表示，那会使她感到非常高兴。

海明威开始考虑离开巴黎，也许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前妻不仅打算继续住在巴黎，而且喜欢上了一个男人。看见她和莫勒在一起，会令他想起他们曾经度过的快乐时光，这会使他感到不舒服。另一个更为明确的吸引着他尽快搬家的原因是，有好些对岸的作家正在寻找机会对他进行攻击。尽管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最终会原谅他，但是由于他在《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中对他们的描写，斯特拉·鲍恩、哈罗德·洛布以及基蒂·坎内尔将会永远记恨于他。同时，经过前思后虑，达夫·特怀斯登对他也有怨恨。格特鲁德·斯泰因对他也怀有恶意，而她的敏锐和机智使其成为海明威不可低估的对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海明威在巴黎的安乐窝并未完全遭到破坏。西尔维亚·比奇和珍妮特·弗兰娜仍像以前一样喜欢他，他和菲茨杰拉德以及多斯·帕索斯也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1926 年底，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突然返回了美国，在好莱坞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在位于威尔明顿附近的特拉华河边租了一幢名为埃勒斯利的仿希腊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模式的住宅。至于那喜欢到处游荡的多斯·帕索斯，他简直从未把法国首都当成自己的家。他这会儿也在美国，和曼哈顿的一家叫作“新剧作家”的实验剧组在一块儿工作。移居巴黎的美国人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但也有许多人正在逆这个潮流而动，纷纷西迁回国。

海明威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祖国的了解甚少，因此美国的魅力对他而言便随之增强了。尽管他到纽约去过几次，但还真不敢说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他从未在佛罗里达垂钓过，也不曾在落基山西部狩猎。当然，在欧洲的这些年里，他从未忽视过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也就是在最近，他又连续第二年在格施塔德呆了六个星期。在此之前，他还到柏林去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在大型体育场参加了一次为期六天的自行车比赛。如今有了保利娜的那份经济来源，再加上他自己不断增加的收入，显而易见，海明威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运动员的生活。美洲、欧洲或许还有非洲都可以成为他的运动场所。因此，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准备放弃巴黎的生活，他还是打算利用他和保利娜马上就要去美国欢度的假期对新的运动场地作一次考察。

五

他们起程的日期是依照保利娜不愿在欧洲生孩子的初衷拟定的，因为尽管保利娜坚持认为自己精力充沛，但她在怀孕期间仍倍感不适，而且她对欧洲的医疗水平并不十分放心。孩子预期要在 6 月底出生，保利娜在巴黎的私

人医生建议她在怀孕的第七个月底之前，或者最好是更早一些，就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生产。于是，3月下旬，她和海明威乘一艘名为欧瑞塔号的英国轮船前往哈瓦那，然后在哈瓦那乘小船到90英里外的基韦斯特岛。这个残破不堪的小镇子位于佛罗里达州内陆向南延伸的一连串岛屿中最南端的一个岛上。这个地方是经多斯·帕索斯推荐，由海明威自己选择的作为重新熟悉美国生活的起点。他们随身携带了许多皮箱，其中有一只装着两部正在写的作品：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名为《吉米·布林》，尽管已写了4万字，但海明威对自己能否完成这部小说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然而那个短篇小说却出乎意料地写得十分顺手。

一直待保利娜很好的格斯叔叔送给他们一辆十分漂亮的黄色福特轿车作为礼物，送到了基韦斯特码头。他们驱车察看了镇子。镇民中多数是黑人和古巴人，还有那些佛罗里达州南部沿海各珊瑚小岛的本地白人，他们的祖先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和美国中部诸州而不是南方。1928年，镇子里居民只有1万人左右，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减少。镇子里的建筑多数都有来历，是未刷油漆的木制结构，但却有一种古朴之韵。一个海军基地和一块军用地占去了海边的大片土地。紫色和暗红色的九重葛，粉色和红色的木槿和夹竹桃，还有芒果树、番石榴、菩提树以及椰子树等热带植物争艳斗丽，十分繁茂。尽管基韦斯特曾一度因为拥有繁荣的雪茄烟草工业而自豪，但20年代末工厂里大多数工人都与大海有着这样或那样密切的联系。他们原本要么是渔民、轮船上的木匠，要么是海军基地的平民雇员。中午时分，所有的生意都会暂时停顿下来，街上没有车辆驶过。迪瓦勒街旁的咖啡店里出售浓浓的古巴式咖啡，其中拌有炼乳以增加甜味，另外还出售那种叫作“波罗斯”的香甜可口的小饼。在“醉汉乔伊”这样的酒吧中，在海港过夜的富有的游艇主人和那些正在休假的商船水手们紧凑在一起狂饮着私酿的朗姆酒和可口可乐。

教会海明威钓海鲢和麝香鳖的人名叫查尔斯·汤普森，这个粗壮的家伙和他年龄相仿，家里拥有海岛上的各种行当，包括渔坊、雪茄烟盒加工厂、五金店和渔具店。4月21日那天，汤普森的学生怀着他那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拼劲告诉马克斯·珀金斯，说自己捕获了“到这儿以来该季节所能捕到的最大的海鲢，竟然重达63磅”。同时，海明威也向这位谨慎的编辑保证说他并没有忽视自己的工作。尽管他被迫将《吉米·布林》这部小说束之高阁，但那个短篇小说的手稿已写出10万字而且“进展十分顺利”。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它将扩展成《永别了，武器》的初稿。

海明威和保利娜在基韦斯特呆了五周。在此期间，他们最早的客人竟然是海明威医生和格雷丝。他们碰巧也正在圣彼得斯堡度假，厄内斯特得知后便打电报邀请他们过来。然而海明威和保利娜所租用的房子过于狭小，住不下来访过夜的客人，附近的海外旅馆又正好尚未客满，于是海明威的父母就在那里住下来，开销也不是太大。海明威和母亲之间靠书信来往保持的关系至少可以说并不是十分融洽，他只是希望母亲能和保利娜见个面并且接受她。

在一篇介绍她作为画家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的报道中，格雷丝最近被一位记者描写为“春光满面，意气风发，……看起来就像舒曼·亨克那样的首席女歌星”。当时，正值格雷丝56岁生日差两个月之际，儿子海明威向前倾身吻她以示问候，她确实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真地做过首席女歌星一般。格雷丝身材胖大，穿着拖过脚踝的长裙，梳饰整洁的头发在一顶白色毡帽的衬

托下越发动人。她红润的脸颊透着无穷的活力。她那双闪烁的眼睛似乎显示出生活的乐趣。在外貌上，她和56岁的丈夫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明威医生由于身患糖尿病，加上几次心绞痛发作，使他老得很快。对经济状况的提心吊胆也加速了他的衰老。像20年代所有从事狂热投机的美国人一样，海明威医生也一度卷入了佛罗里达州繁荣的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可随后地价接二连三地下跌，他元气大伤，精神上的打击比金钱上的损失更为惨重。他的头发胡子已经花白了，乱蓬蓬的一团糟；他的燕子领再也不适合他的脖子，可却没有换；他的眼睛常常覆盖着一层泪雾，显得泪眼朦胧。虽然保利娜和他的双亲相互之间相处得很融洽，海明威还是没有表示一点对他们来访的满意之辞。如果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的写作是出于他对改善人际关系的失望态度，那么再次与父母的会面只能使他越发确信这一悲观的结论。

多斯·帕索斯是另一位在海外旅馆登记入住的来访者。尽管他对出海捕鱼并不太感兴趣，但出于友谊他还是和海明威一道乘查尔斯·汤普森的汽艇出海，结果他发现自己喜欢在海面上观赏那些群岛和热带地平线上眩目的落日。他还喜欢用西班牙语同基韦斯特岛上残留的几家雪茄烟草加工厂的工人聊天。当他得知工人们站在工作台边，自己掏钱请人朗诵托尔斯泰的西班牙语译本时，深受感动。

正当多斯·帕索斯打算离开基韦斯特到苏联继续旅行时，海明威夫妇的又一位客人到了。这位客人名叫凯蒂·史密斯。自从和哈德莉结婚后，海明威一直没有见过凯蒂。最近几年，他听说凯蒂与其弟比尔还有另外两位女士住在马萨诸塞州普罗温斯敦的一家名叫斯穆莱大厅的合建住宅里。她有位合住伙伴名叫伊迪丝·福利，是在芝加哥结识的朋友，海明威也是那时认识伊迪丝的。像凯蒂一样，伊迪丝也靠写作一些毫无价值的杂志文章谋生。她大胆地与比尔一起分享了“男孩”和“虫子的果实”，这些都是酗酒成性的比尔为在家里自酿的酒起的名字。伊迪丝和凯蒂在一起，成了一些有关性方面的流言蜚语的目标。在下科德角一带，有人确信伊迪丝和凯蒂是恋人。根据玛丽·麦卡锡所说，埃德蒙·威尔逊认为，在凯蒂的圈子里，所有关系密切的女性朋友都是“同性恋者”。在威尔逊30年代所写的日记中，他描写自己的妻子玛格丽特·坎比对凯蒂非常迷恋，即使在凯蒂嫁给多斯·帕索斯之后，仍对她念念不忘。“她的目光，”威尔逊写道：“追逐着凯蒂·多斯·帕索斯，……在普罗温斯敦苏珊·格拉斯佩尔家的前厅里，不知怎的，她的眼神令我心痛，在她那小巧的女性身体中男性的冲动显得那么无力、尴尬和荒唐。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而她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1928年，在基韦斯特，多斯·帕索斯同样也为凯蒂那双黄绿色猫一样的眼睛以及娇羞又不乏灵慧的气质所倾倒，尽管他是一直到第二年他们双双回到基韦斯特拜访海明威夫妇时才开始主动追求凯蒂。

六

同时邀请他们俩人来访，是不是海明威有意要做媒人呢？绝对不是。1929年，海明威让多斯·帕索斯到基韦斯特来，是为了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萨尼。“在他邀请了多斯·帕索斯来这里后，”萨尼回忆道：“他一有机会就在我面前夸奖他。我便开始期望着多斯的到来，脑海里有着他的一幅很好的形象。可当他真的到来后，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令我吃惊的动作呆滞和神经兮兮的秃顶男人。厄尼竟然疏忽了，没有告诉我他那朋友的体格外貌，他还比我大九岁。当然，我可没有去奉承多斯，而厄尼也因为我不感兴趣和显然的无礼态度而极为生气。”

把保利娜送上了火车先行回家后，海明威冒着严酷的热浪开着那辆福特轿车来到了阿肯色州。除了保利娜的母亲所讲述的那些有关当地白人无耻行径的滑稽故事外，海明威对皮戈特镇的其他东西提不起一点兴趣。捕捉鹌鹑的季节已过，酷暑又毫不留情，海明威也找不出任何十分得体的办法可以退出那些家庭聚会从而去继续写他的小说。

直至和保利娜移居到堪萨斯城之后，海明威的心情才渐渐好起来。这是因为保利娜可以在医疗设施优良的市研究医院里生产，二是因为保利娜的两位阔绰朋友鲁思和马尔科姆·劳里夫妇乐意将市郊的宽敞房子借给海明威夫妇。常常在黎明就开始的上午的工作结束后，下午海明威可以去参加马球比赛以便放松一下。一天，出于好奇，海明威在会议大厅前下车。当时，共和党人正在会议大厅投票选举赫伯特·胡佛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政治的虚伪海明威十分反感，很快就走开了。晚饭前，他通常在劳里家的游泳池中游一圈凉快凉快；晚饭后，他就会上床阅读赞恩·格雷最新的有关钓鱼的文章或一些类似的消遣书。

6月17日那天，海明威完成了小说的第二卷。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的伤口复原后，告别怀有身孕的凯瑟琳·巴克利，离开米兰搭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回到前线，最终卷入了卡波雷托大灾难。作者在6月里的一个早晨写信给画家沃尔多·皮尔斯，信中高兴而骄傲地宣布说，他已经知道故事将怎样发展下去了。据推测，这可能预示着已构思出凯瑟琳·巴克利在瑞士一家医院因难产时间过长最终导致剖腹产而身亡的情节。这种先知先觉不可思议地与保利娜在研究医院产房里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可以说就是一种预言。保利娜分娩的剧痛开始于6月20日。18个小时后，整夜未眠的父亲得知一个9.5磅的男婴剖腹产出。虽然孩子出生即死亡这一海明威的等式得以避免，但毕竟是在经历了巨大的危险和痛苦之后。

“（我的妻子）经受了痛苦，”几星期后他在写给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简要地提到：“随后，情况又极不稳定。”至于那个取名叫作帕特里克的小男婴，他倒似乎是又黑又大又结实”。在签上名后，海明威显然是想起了珀金斯拼命想要个儿子，却生了五个女儿。作为一个失望的父亲对另一个失望的父亲所说的话，海明威在附笔中补充道：“我倒希望这个男孩原本能是你的几个女儿之一。”不过，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他的一种乐趣就是用女人来使自己获得永恒；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还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那就是把自己所喜欢的几乎每一个女性都称为“女儿”。

保利娜出院后，海明威对新生儿子的最初的敌意在从堪萨斯城到皮戈特镇21个小时的十分潮湿的火车路程中变成了令人不快的事实。海明威厌恶地告诉沃尔多·皮尔斯说，帕特里克壮得像头牛，一路上都像牛一样哞哞直叫唤，为人父已足以让人进精神病院了，更何况此人正在构思小说呢？《永别了，武器》是一部关于逃避的小说，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似乎相信，自己也该逃之夭夭，起码也要离开一段时间。因此，7月25日晚上，他独自返回堪萨斯城，取出了自己那辆黄色福特轿车，按预先计划的那样，叫上老朋友比尔·霍恩一起去了怀俄明。在写给盖伊·希科克的潦草的便条上，他提到他的“宏篇巨著”已经写到第482页。换言之，他已经把有关卡波雷托大撤退和弗雷德里克开小差的精彩片段确定了下来。整整三个星期，海明威过着远离家庭琐事的宁静开心的生活。他早上写作，下午去钓鱒鱼，到了晚上，

则尽量避免饮用过多的私酿的威士忌酒。等到他的妻子出现并且看上去准备履行其应尽的首要义务时，他的手稿还剩下 30 页左右要写。做一个贤妻良母是哈德莉的意愿，然而海明威第二任夫人对此却毫无兴趣。“你走了之后，”她在 7 月 31 日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只是一个母亲，那真是太乏味了。”当她的妹妹吉尼声称她愿意照顾帕特里克时，保利娜对她感激不尽并接受了这一帮助。“赶快派人来接你的妻子，”她在 8 月 4 日请求海明威：“我情愿自己出路费。”有时，她的来信几乎让人觉得帕特里克是吉尼的孩子。“吉尼取消了两点钟的喂食，因为医生说他的体重增加太快。他已经开始喝桔子汁了，我想我们会很喜欢他的。”

在怀俄明州谢里登的度假牧场，她和丈夫会合后，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地让他认为她是个很好的玩伴。如果他实在不想写作而想去打尖尾松鸡时，她就会拿起枪和他一起去；如果说她的垂钓技术仍然比不上哈德莉，那倒不是因为她的尝试还不够多。8 月 22 日，海明威告知珀金斯，小说已经完工了。之后，他向保利娜建议，到斯内克河谷和比格霍恩山去探险。他们如期前往。“这真是个让人把眼睛都看斜了的十分奇妙的地方，看上去就像西班牙，”几个星期后，他告诉沃尔多·皮尔斯说。特别是一个“十分可爱的老家伙也真他妈地写得棒，”他接着又说。这个老家伙就是欧文·威斯特。自打海明威能记事起，他就很喜欢《弗吉尼亚人》。但是，他之所以到怀俄明的谢尔这个地方来拜访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海明威通过巴克利·亨利了解到，这位年老的作家对《太阳照常升起》和《五万元》的印象极为深刻。“我要是 30 岁，”威斯特写信给亨利说：“那我也会像那样写的。”

9 月下旬，海明威把他那辆黄色福特轿车驶入了保利娜父母家的私人车道。此时，他仍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向珀金斯自夸说：“我……感觉一直不错，大脑和身体再强健不过了，信心十足，精力旺盛，运气不错，自从我到美国后，还没有生过病，更有幸的是，也没什么意外。”他的脑海里浮游着各式各样令人高兴的计划。虽然他也很想开始修改底稿，但又决定先冷却一下，等他回到基韦斯特后再说。在那里，他和保利娜准备在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过冬，而查尔斯·汤普森的妻子洛林肯定能为他们找到这样一座漂亮的别墅。但是，在启程去佛罗里达之前，他们再次把帕特里克甩给了吉尼照顾。他们先是前往芝加哥，再一路向东，所经地区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康韦，和麦克利什夫妇在那儿他们的乡间别墅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之后，他们到了纽约市，与珀金斯商谈关于出版计划的问题，还和迈克·斯特雷特以及沃尔多·皮尔斯进行了几次拳击比赛；然后，他们去了特拉华河边称为埃勒斯利的宅邸，在那里，菲茨杰拉德听到消息说海明威已完成了小说的底稿，心里非常不安，他发誓要每天花八个小时来进行他自己的创作。

七

洛林·汤普森为海明威一家所选的房子是一套白色构架的住宅，有六间卧室。这样，在不至于无法招待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的同时，他们还能给婴儿帕特里克提供他自己的房间，并把另一个房间给海明威的妹妹萨尼住。萨尼感恩节刚过就来了，要住上好一阵子。为了得到她的路费，她主动提出帮助照顾帕特里克和就要到美国来看望其父的五岁的勃姆比，另外还准备为她哥哥打印一部分最后的定稿。但是，还没等海明威来得及安下心来写作最后的定稿，勃姆比乘坐的船就到了曼哈顿的港口，他不得不前去迎接。

12月6日下午，父子俩离开纽约的宾州车站，准备返回佛罗里达。在特伦顿，海明威接到一个电报，说他父亲于那天清晨逝世了。到费城后，他下了火车，把勃姆比托付给火车上一位看上去挺负责任的服务员，便搭乘晚间特快列车赶到芝加哥去了。从上高中的妹妹卡罗尔那里，而不是从吞服了大量镇静剂的母亲那儿，他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海明威医生前一天早上醒来，觉得脚疼。他意志消沉，开始胡思乱想。他脚上的疼痛可能是动脉阻塞所致，可能会导致生疽，进而要做截肢手术。吃早饭时，他对格雷丝说他感到害怕。她就劝他再去征询一下别的医生的意见。虽然他当时满口答应，实际上他却并没有去。大概中午时分，他回到家里，去了地下室，烧掉了一些个人的材料。他对妻子说，他感觉很疲劳，先上楼去回房休息，到午饭时再叫他。在这幢静谧的房子里，除了他和妻子之外，就只有因感冒卧床的13岁的莱斯特和在厨房里的厨师。关上卧室房门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手枪对准右太阳穴开枪自杀了，那是一把南北战争时期的“长约翰”左轮手枪，是他从两年前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

尽管海明威还能安排好葬礼的一切事宜，可他的精神已经麻木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在第一公理会教堂做完礼拜仪式后，他对马塞利娜说，天主教教义教导他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他们的父亲死后会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的。这使得她极为恼怒。另一方面，他又安慰小莱斯特和卡罗尔说，对于他们父亲的死，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因为老人家有病，头脑一时糊涂，不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然而，莱斯特却永远无法忘记那声枪响。在穿过大厅传来时，它是那样地清晰。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喇叭声声》（1953）中，他回忆起那时的情形：他听到枪声，就从床上下来，用手试着推父亲卧室的门。“门开了，漆黑一团的卧室里，除了一扇百叶窗开着，其他的全都关着。父亲躺在床上，喘着粗气，双目紧闭着，半明半暗中乍一看，父亲好像没有什么事。他把手放到父亲头的下面，很容易一下子就滑了进去，当他将手再抽出来时，发现手上粘糊糊的，满手鲜血，还带着温热。”然而如此描写父亲死时的情形，只是增强了莱斯特对那次事件的记忆。后来，他哥哥的自杀对于他来说无异于又一声晴天霹雳，此后他便惶惶不可终日。1982年，他的医生告诉他，由于糖尿病的缘故，他将不得不进行双腿截肢手术，莱斯特便同样也将一粒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部。

海明威医生刚一下葬，莱斯特就曾向他母亲索要“长约翰”左轮手枪作纪念。不过厄内斯特也要过，所以当他回到基韦斯特时，她就给他寄去了，——虽然她说后来她又想要回来。她一再保证说：“我可以替你保管。”在一封圣诞贺信中，格雷丝像以往一样想尽量显得高兴些。她要求她的大儿子“一点也别为我们担心。一切都很好。莱斯特……对我来说实在是很好的安慰。噢！他可真爱你。……谢天谢地。愿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带给你更多欢乐。爱你的母亲。”实际上，她是在掩饰她越来越担心的经济状况。从2月初开始，她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收了三个学绘画的学生和两个学声乐的学生，而且正打算将房间出租。海明威在回这封信的时候，告诉母亲说他决定以后每月寄给她100美元的支票，供她安享晚年。

如果说指责他母亲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这一可怕的念头此时已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他毕竟还没有准备好大肆宣扬。12月16日，他用平静的口吻对马克斯·珀金斯说道：“使我最感痛苦的是，我的父亲是我最在意的人。”

在给盖伊·希科克的信中他开玩笑说，要是亲戚们答应不再给他写信，他宁愿倒赔钱。这些话与他后来所说的那些话相比要委婉得多。在这段时期的通信中，有两个现象比他对自己的母亲所作的评论更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他承认他正在对《永别了，武器》的手稿进行修改，这使他绞尽了脑汁（“写的时候真要命，修改的时候更糟，”他向欧文·威斯特坦白地说）；其二，他忽然开始大量使用措辞激烈的语言，令人惊诧。比方说，在他向威斯特描述他在写《太阳照常升起》时的生活状况时，他说那就好像“或多或少已从我的下身进射了出去”；而在告诉多斯·帕索斯他的父亲已经自杀身亡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那本该死的书全用铅笔写了一遍，另一本用打字机打了三遍。”但是，最能揭示出他的内心世界的，还是他对最后定稿所作的那些改动。

八

12月中旬，他开始陆续给他的两个打字员保利娜和萨尼一些稿件，上面标出了需要删除的主要内容，其中所删除的最重要的部分与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心理活动有关。譬如在书的第十七章开头的部分，写亨利在腿部手术后苏醒过来的感受。原来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腿很疼，因此我试图回到原来我所在的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可我回不去，一次又一次地挣扎，但毫无作用。他们给我水让我漱了口，然后我就直挺挺地躺着，默默等待着疼痛达到最高峰，指望从那以后它就会消退。但疼痛似乎没有止境，并早已超过了疼痛原本总应该有的停止的限度。我原以为上帝从不会让我们不堪忍受。我一直都相信，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会失去知觉，而烈士们就都是这样走向成功的。但现在情况恰好相反。深入骨髓的痛苦让我无法忍受，而且到处都疼。我的胸部开始不断地抽搐、抽搐。我张开嘴喊叫再喊叫，可除了横隔膜上下不停地抽动之外，我发不出任何声音。过了一会儿，痛苦稍稍减轻了，我感到自己能够忍受了，但却丝毫不感激我们的主……

然而在经过修改的稿子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得只剩了四句话：“手术后我醒来发现自己没死。你并没有死。他们只不过是把你窒息罢了。那不像是濒临死亡，而只是一种化学窒息方法，这样你就没有了知觉，过后你也只会觉得是大醉了一场，但当你呕吐时，吐出来只是胆汁，呕吐以后你也并不感觉好一些。”在小说的初稿中，弗雷德里克·亨利是个反应明显迟钝的人物，而在经过删节的最后定稿中，他变得近乎木讷了。长时间以来，海明威对如何安排凯瑟琳·巴克利的孩子的命运一直犹豫不决。这同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父亲的自杀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心浮气燥，思维混乱。1928年夏，在怀俄明州，他写下了这样一个场景：护士告诉亨利，他那刚出生的儿子因脐带绕颈窒息而亡。可当天他又放弃了这种写法，代之以一段充满了希望的对话。护士对亨利说：

“知道吗，婴儿还活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还活着，就这意思。”

“你跟人说话可得注意点。”

但在父亲下葬一个月后，他又删去了这几行，而且将亨利最后一刻对上帝的祈祷“带走这孩子，但请别让她死”改为“您已经带走了孩子，但请别让她死”。不过，这种对原计划的推翻并不表示最后的决定。甚至在1929年4月他和他的全家返回巴黎后，他仍在考虑着那孩子的命运。5月间，他写了一个新的结局，没让那孩子死去，可接着他又写了另外几种结局，孩子又未能活下来。直到6月24日，他才义无反顾地决定再也不去削弱《永别了，武器》中死神的胜利喜悦，而这时距离该书的出版发行仅仅只剩下三个月了。

海明威医生之死所造成的另一种效果，是加深了海明威与马克斯·珀金斯之间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使其成为一种更多是私交成分的默契，尽管当时珀金斯与另一位作家之间也正在发展类似的关系。1929年1月2日，珀金斯在他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办公桌上抬起头看见了一位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的巨人，名叫托马斯·沃尔夫，他站在那里占满了整个门框。他写了一部小说《噢，失去的》，小说的手稿字迹凌乱，大部分手稿当时正铺洒在珀金斯的办公桌上。沃尔夫非常需要一个父亲般的人，在珀金斯身上他找到了这个人，而珀金斯本人也一直希望有个儿子。在这传奇似的会面过后29天，珀金斯应海明威的急切邀请来到了基韦斯特。从那一刻起，他在海明威的生活当中也充当起一个父亲的角色，尽管海明威对他的要求比起沃尔夫而言要稍微缓和一点。

珀金斯在佛罗里达逗留的八天里，主人每天早晨6点就带他一起去钓鱼，直到傍晚才带他回家。晚上，珀金斯就专心致志地读《永别了，武器》的打字稿，他不停地称赞这本书写得很精彩。回到纽约后没有多久，他就兴高采烈地电告海明威，《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布里奇斯已经同意在该书出版之前将此小说连载，并且提议支付他16000美元。但在接下来的2月13日的信中，珀金斯又更加郑重其事地说，文中的“某些词”“必须用空白来隐藏”，“某些段落”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删节问题，主要是因为其中有些词的舍弃必然会损害这些段落的意思”。事实上，虽然珀金斯并不像他的佛蒙特州的新英格兰人祖先那样因循守旧，但是对于海明威硬是要将一些污言秽语印刷成文他毕竟也不甚同情，罗伯特·布里奇斯也是如此。

除了删去“放屁”、“操你妈的”、“狗娘养的”、“婊子”、“贱货”、“卵蛋”、“狗杂种”和用作感叹词的“耶稣基督”之外，布里奇斯还删除了里纳尔迪和亨利中尉对于性交会给“一直都是好女孩”的任何姑娘带来痛苦的长篇大论，并将凯瑟琳和亨利私通的场面简化为关于心脏正在怦怦乱跳的对话。虽然这些删改使海明威勃然大怒，但却仍不足以阻止波士顿极端的爱尔兰人警长迈克尔·H.克劳利（对于这种事情他向来听命于时刻戒备协会属下的灯塔山新英格兰人组织）禁止在该市的报摊上出售6月号的《斯克里布纳杂志》。

当海明威收到了珀金斯准备印刷成书的小说校样时，他高兴地发现他的

作者所选的这一书名出自《牛津英语诗歌集》。乔治·皮尔的原诗《永别了，武器》发表于1590年，是献给伊丽莎白女王的诗歌。诗中颂扬了一位名叫亨利的骑士，他因年事过高而不能继续在女王的比武大会上作为斗士。

编辑将“耶稣基督”、“狗娘养的”、“婊子”和“贱货”等词又重新放回书中。尽管海明威竭力要求仍使用“卵蛋”，珀金斯却只允许他使用“阴囊”。作者建议他和编辑各自妥协一半，将“狗杂种”印成“狗——”，但珀金斯在这一点上寸步不让，坚决主张整体留下空白。不过，他最终还是撤回了他那显得过于小心谨慎的建议，并没有把所有的床上描写也删掉。

事先未征求海明威的同意，珀金斯便于4月上旬寄了一份样稿给欧文·威斯特。他这么做既可能是希望威斯特能给小说写一篇简介，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书中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盼望着这位资深的小说家能自己主动提出。在给珀金斯的头两封回信中，威斯特对他说，虽然他还在读这本书，但他早已准备好“将我的热忱转化成某种您能够使用的东西，来帮助（海明威）和他的书以及他的出版商”。

读完小说后，威斯特又一次写信给珀金斯。他表示，自己仍然十分推崇这部小说，但是对于爱情与战争这两大主题未能在结尾处得到完美的结合而略感遗憾，尽管他也承认爱情毫无疑问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在给威斯特的回信中，珀金斯指出，就这种遗憾而言，他的感受更为强烈。

威斯特随即将自己的评论寄给了海明威。5月24日，珀金斯也最终向作者透露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的）第一个问题事关该书两个主题——爱情与战争——之间的结合。在我看来，这两者的结合，在凯瑟琳和亨利中尉到达瑞士之前一直比较完美。可从那以后，他俩和读者几乎都忘记了战争，虽说并未完全忘却。从心理上讲，战争该被遗忘，如此深深坠入情网的人们是不可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就没有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没有逼你在这一部分中多叙述一些战争的情况或回忆。可是我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既然战争在这个爱情故事中已经起到了某种深刻的作用并且仍然在起着某种被动的作用，就应当继续积极主动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来，战争是会起到某种决定性作用的，只要凯瑟琳之死的发生能够和战争产生一定的联系，那么我想，她作为护士的生活以及她所有的描写等等就可以为她的死负主要的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医生在那可怕的夜晚随便只用一句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在亨利和读者的意识中整个故事就会回到战争的主题当中。

当我说这些话时，我意识到一个人在做这种工作时可能会像某些教授那样因为要遵循一个原则而变得走火入魔。前后呼应？没有什么比简单划一的结局更令人恶心的了。……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威斯特给你的信中也提到了爱情和战争这两个因素，他对此持不同观点，似乎小说谈的只是爱情，而战争只是感人的背景和必要的铺垫，或基本上如此。但我很难这样看。

虽然珀金斯是一位受人尊敬、忠于职守的编辑，但他并不理解《永别了，武器》，更别说理解内心痛苦的作者了。海明威收到珀金斯的来信的时候，正在为修改手稿的最后几段而忘我工作，因为尽管他已竭尽全力，但还是无法使这几段听上去令人满意。他在痛苦中挣扎着，竟写出了32种不同的结局。如果再把一个主题因素添加进去，并不能把亨利和凯瑟琳的故事调节到珀金斯所相信的那种程度，反而会把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因此，他对这种修改是毫无兴趣。

在构成小说第一章的前五段中，“and”这个词被反复使用。20多年后，海明威访问纽约期间，他总是醉醺醺地宣称，这是在“刻意模仿约翰·塞瓦斯蒂安·巴赫先生，当他演奏复调时，他就反复使用一个音符”。不论巴赫的作品是否真地为他的写作树立了榜样，“and”这个词的频繁出现无疑使富有适当变化的优美乐曲更具流畅和韵律。第一段以“那一年的深夏”开启全文，这样的意境让我们置身于那个时间框架，一直贯穿至第二段结束，甚至在准备将读者引入下文时，也还是这个意境。河床里尽是鹅卵石和大圆石，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又白又干，湍急的河水清亮透澈，在河道中泛着微蓝。树干沾满灰尘，“那年的树叶凋零得早……”秋季的短暂在第三段中表现出来：那被雨水浸黑了的栗子树干，光秃秃的稀疏的葡萄藤，“整个乡间都变得潮湿灰暗、死气沉沉……”在最后一句中，“绵绵不绝的雨”便宣告了冬季的来临。

如果要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对这部小说的一句著名的赞扬之词加以诠释的话，那就是：第一章中的字句就像是星罗棋布的鹅卵石，刚刚从小说里所描写的河床中被捡回来；因为其所负载的是丰富的象征意味，所以如同河床里的大圆石一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夏的落叶预示着部队的末日的到来，他们行进的步伐使他们稍有振作，可秋季多雨，士兵们一个个满身泥泞，胀鼓鼓的斗篷让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似的”。这一句预示着凯瑟琳·巴克利的致命的怀孕。但是，弗雷德里克·亨利那黯然的叙述声音并不仅仅代表着对那些可怕事件的事后聪明，它也体现了说话者在1915年夏末，也就是故事开始时的心境。

战前，由于亨利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他一直住在罗马。在他看来，那是一个“肮脏的地方”。然而当意大利参战后，他却由于一些既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原因报名参加了意大利的救护队。“并非每件事都有合理的解释，”他对凯瑟琳·巴克利说。在感情上他觉得自己和这场战争毫不相干，以至于他甚至不相信它能给他带来什么伤害。“（这场战争）和我完全没有关系，”他说：“依我看来就像电影中的战争一样，对我没有什么危险。”

就在听说德奥两军已在卡波雷托攻破北部防线之前，亨利坦白说，他对虚饰夸张的辞藻极为厌恶。这一段后来很快就成了海明威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然而，他的坦白所表达的并非是战争引起的幻灭感——1929年或那以后的许多读者都是如此猜测，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一直”都是这种感觉。这场战争只是加剧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直至“最后”，他对语言的信任仅仅缩减到依赖一些特定的数字、日期和地名上。与普遍的印象恰好相反，《永别了，武器》一书的叙述者并没有暗示那些鼓舞人心的文字对他的报名入伍有任何激励作用：

神圣的、光荣的和牺牲等等这些字眼，以及徒劳无益的豪言壮语常常使我困惑。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是站在雨中，在耳朵几乎听不见的地方，以致传来的只是那些大声喊叫出来的字眼。我们也曾在张贴布告的人漫不经心地一张盖着另一张贴的布告中看到过这些字眼。可如今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从未见过任何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并不光荣，牺牲也只不过像芝加哥的屠宰场，要是肉无法处理，便就地埋掉。有许多字眼教你听得受不了，最后只有地名还算有尊严。有些数字也算有尊严，有些日期以及相关的

地名是你唯一能诉说的一切，是你唯一能用来表示意义的一切。

至少是在美国，1929年代表着战后厌世情绪的顶峰。当时，骇人听闻的孤立主义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1930）正在争取议会的通过；同年也正是反战小说风靡的一年。评论家和读者们一样，他们都认为在这些反战小说中除了海明威的作品外，最重要的一部要算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所写的《西线无战事》的英译本。雷马克小说的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展现的是“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他们正处在刚刚开始感到生命的脉搏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就被迫与死亡碰个正着”。然而海明威的意图则大不一样。还是欧文·威斯特的理解较为接近，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所讲的故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故事。虽然亨利中尉所讲述的卡波雷托战役后的脱逃和他最终获得的“单独和平”等都不枉其盛名，但归根结底，就小说而言，这种叙述只是一种隐喻。因为，对弗雷德里克·亨利的描写是对情绪混乱的一种研究，而脱逃与开小差所起的作用是为了在更大的程度上从生活中得到解脱。

小说最初几章所揭示的情况是，从感情的抑制发展到冷漠无情，这是弗雷德里克·亨利处世态度的基本模式。譬如说，他故意在寄给美国家人的明信片上什么也不说，因为尽管照他后来所说的，他过去也曾喜欢他们，但“我们常常争吵，感情就淡漠了”。他对战友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例如他休假归队时，里纳尔迪搂着他的脖子吻他，亨利的反应只是“哎呀”了一声。里纳尔迪性情开朗，不至于因如此的冷遇而感到沮丧，但那位来自阿布鲁齐的随军牧师因为亨利没有如约到他家去，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希望亨利去他家看看并“已写信告诉他父亲我要去，而且他们做好了准备”。可为什么后来决定不去，不但对牧师是个谜，而且对亨利自己也显然是个谜，因为他说：“我本打算去的，后来为何没去，我……也不明白。”至于他晚上醉酒后和他一起睡觉的那些妓女，他时而在意，时而又不在意，早晨起床后，“有时在价钱上还讨价还价”。这部小说原稿中有一条删除的参考书目表明，T.S.艾略特1925年写的《空心人》在20年代后期对海明威的思想影响很大。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亨利对世界的空虚反应中看得很明白。艾略特写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意愿与行动之间，落下了阴影。”

凯瑟琳·巴克利是一个年轻美貌的英国女人。她的紧张不安和神经过敏让亨利想起了布雷特·阿什利。甚至他对她的追求也不过是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假装爱她，可实际上他却认为凯瑟琳有点疯疯癫癫。“我并不在乎今后我会怎么样，”他说：“这总比每晚逛军官俱乐部好。在那里，你身上爬满了女孩子们，把你的帽舌往后一拉，就算对你有感情的意思，在这期间，她们还跟别的军官一次次上楼去。”凯瑟琳最后告诉他说她知道他所玩的“鬼把戏”，可他却只是又一次报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不过，我可是真心爱你，”他辩解道。

受伤的中尉被送到米兰的美国医院的那天上午，凯瑟琳来看望他，那时她刚被派到那儿工作。“亲爱的，你好，”她热切地说。“你好，”亨利回答道，一时间他所用的依然是那种惯用的冷淡口吻。但随后他又补充说：“我一看见她，就爱上了她。我内心的一切都变了。”小说随之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小说的发展，人物的性格左右摇摆不定，趋向梦幻。不仅空心人找到了激情，而且他的布雷特·阿什利式的小姐突然间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在她的

身上融进了阿格尼丝·冯·库罗夫斯基和哈德莉的性格。

在此书还未出版之前，菲茨杰拉德就读过该书，并给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凯瑟琳仿佛明显比亨利要大，尽管她本来不应该如此。菲茨杰拉德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你在看待他（弗雷德里克）时用的是一种老于世故的眼光，就像现在的你看待当时的你。但你仍然用1917年你19岁时的眼光去看待她。结果呢，除非你把她写得有时愚昧无知，否则就会产生矛盾：要么作者是一个幼稚的家伙，要么她就是伪装成红十字会护士的埃莱诺拉·杜丝。和以往一样，洞察力极强的菲茨杰拉德是有所指的，尽管要是他能弄清作者为什么会让里纳尔迪反复地把亨利称为“婴儿”的原因，他本可以提出更深刻的意见。评论家米利森特·贝尔1984年在重新审视这部小说时曾经极其敏锐地富有创见性地指出：亨利爱上凯瑟琳时正处于生活不能自理阶段，他像个睡在摇篮里的婴儿一样躺在医院的床上，当护士盖奇用热水、肥皂、布给他擦洗身子时，当凯瑟琳给他量“可爱的体温”或是望着他像“一个小男孩”那样睡着时，他显然非常满足于对她们的依赖。当凯瑟琳晚上回到他身边时，他仿佛就像是一个获得了母亲的特许能够享有性兴奋特权的小孩。

亨利恋爱着的女人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她用发夹挽起的发式（尽管不是金发）来源于海明威在1918年爱上的护士、1921年娶的妻子以及他童年时代的母亲。凯瑟琳很耐心地坐在亨利的床边，不时地弯下身子吻他，听任他把发夹取下来。他喜欢这样做，他对此说得很清楚。“我总爱取下她的发针，”他说：

把它们放在被单上，她的头发散落下来，我注视着她，而她一动不动，然后我取下最后两个发针，这样头发就全部垂落下来，她沉下头，这样我们两人就都罩在垂落的头发里，那感觉犹如置身于一顶帐篷里或者一道奔泻的瀑布后面。

显然，她那“漂亮的头发”是他性快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凯瑟琳对此非常明白。她曾有一次问道：“你要不要我把头发放下来？你想玩吗？”这些话是有意逗引他，他们也常常乐此不疲。

性别转换的幻想也融入了他们的床上游戏，虽然这种变化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趋向明显。起初，凯瑟琳急切地表示要和她的情人融为一体，她就自己与亨利打算干的事情制造了一种错觉。“我就是你，”她对亨利说：“别再编造出一个单独的我了。”她的需要即是“你的需要，我个人已不再存在。只有你的需要”。这些陈述也许后来会导致一种观点，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所提出的那种激进的观点：《永别了，武器》的作者戏剧性地描绘了一幅粗野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男人统治着下贱而又温顺的女人。然而即使在他俩关系暧昧的最初阶段，亨利所说的话对凯瑟琳的评论也只有有限的影响。他暗示说，结合是一种双行道路，“除了狂欢的时刻之外，我们还有许多表示爱情的小花招。当我们不在一个房间里时，我们都试着把一些想法传进对方的脑子里去。有时这似乎还真起作用，不过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在思考同一件事。”显然他俩都想融入对方的生活，而且至少这种融合在

埃莱诺拉·杜丝是意大利著名女演员，以饰演莎剧中的朱丽叶、左拉的《黛莱丝·拉甘》、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等闻名，与本书中所提到的作家丹农齐奥相爱并主演他为她创作的剧本。——译者注

精神上是可能的。他俩在瑞士的一家膳宿公寓住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1922年海明威与哈德莉就是在这同一家农舍的床上度过了一个舒适温馨的冬天，凯瑟琳最后提出他俩不仅要在思想上相通，而且在外表上也要相像。如此看来，凯瑟琳比亨利更迫不及待地试图融合，这一点所表明的绝不是她这方面的顺从，而是亨利的被动性：

“亲爱的，为什么你不让头发长起来？”

“怎么长呢？”

“就让它再长得长一点。”

“现在已经够长的啦。”

“不够长。你再留长一点。我剪短一点，这样咱们俩就相像啦，只是我俩一个是金发，一个是黑发。”

“我不许你剪短头发。”

“那样一定很有趣。我讨厌长头发了，夜里在床上真是累赘。”

“可我喜欢。”

“你不喜欢它短一些吗？”

“也许会喜欢。不过我还是喜欢它现在的样子。”

“也许头发短一点好，这样咱们俩就相像啦。哦，亲爱的，我多么需要你呀，真想和你融为一体。”

“你是说，咱们俩是同一个人。”

“这我知道，到了夜里咱们就是。”

“夜晚真美妙。”

到了夜里，凯瑟琳说：“我想让我们完全融为一体。”这话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海明威让他的两位主人公都名从巴克利·亨利的理由：他认为他俩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两个部分。

第四十章开始时亨利如是说：这对恋人生活在冰雪覆盖的世界里，过着“愉快的生活”。然而，字里行间却透着焦虑和不安。几个月前得知凯瑟琳怀孕后，亨利很绝望，说他陷入了一种生物学上的圈套。在第四十章即倒数第二章里，在对生存的沉思冥想中，陷入困境这个主题再次出现。人们在这里比在这部小说中任何其他的部分都能更清楚地听到作者本人的声音。

亨利的沉思冥想紧跟着“我们过着愉快的生活”这句话。在把注意力的镜头对准自己之前，亨利首先对来自阿布鲁齐的善良的牧师的情况简要地审视了一番：“他一直热爱上帝，因此很快活，我敢肯定什么也不会把他与上帝分开。但是要天生成那样得有多少智慧，得有多少幸运呀？如果你不是那样又该怎么办呢？”接着，在重新陈述这些悲切的问题时，他所说的话变得与自己更加相关，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确信自己在生活中的运气实在是太糟糕：

然而如果你一出世就什么都不爱，你母亲温暖的乳汁从来不是天堂，你最初爱的是一面山坡，最后爱的是一个女人，除了想拥有她之外，其他女人都不想，可她又被夺走了，那你又该怎么办呢？她不在了，你就感到无所适

从，要是从一开始就爱上上帝，也许会好一点。然而你并不爱上上帝，那么谈论上帝，思念上帝也就一点好处都没有。

格雷丝用来记录海明威早年生活的剪贴簿中有一段写道，他有半年睡在她的床上，整晚整晚地要吃她的奶。海明威在他童年时期，不知有多少次读过这段话？在基韦斯特与他那丰腴富态、雍容华贵的母亲见面之后的那个夏天，他写下的一段思考正好与这段话相呼应，如此便证明了他对母亲强烈的依恋。可与此同时，他又恨格雷丝。他近乎疯狂似地确信她肯定会要他去终身体味她的乳汁，但她的乳汁却有如毒药，——这种信念就迫使他否认他曾经与她亲近过。然而，他最终还是决定在小说的最后定稿中删去了这整段思考。这一举动包含有非常的意义。这一段的每一个字词都暗示出，他始终强烈地渴望着从他这方面能够开始——终于能够开始！——谈论他那遥远过去的感情纠葛之源。但是，作为对他不能去爱的原因和过程的分析，它只意味着这不过才是坦白的刚刚开始，而他又无法坦白得更详细、更清楚。他就是不能坦白了。

从感情上来说，甚至于《太阳照常升起》或《春潮》都没有像《永别了，武器》那样有一个如此残缺不全的结尾。因为，在下定决心让凯瑟琳死去之后，海明威还是无法完全表达悲伤。当亨利把护士们赶出房间后，他最终单独与凯瑟琳的尸体呆在一起了，他关上门，关上电灯。“但是……丝毫没有用。这好像是在向一尊塑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房间，离开了医院，冒雨走回旅馆。”总之，他的反应实际上是毫无反应，而且他不像是感到吃惊的样子。

1929年春季，作者痛苦地写出了各种各样的结局，但却苦于无法确定。其中有两篇结局，具有相当的长度，而且读上去像是他打算继续写下去而找回感觉。但是，最后他似乎意识到他只不过是故弄玄虚，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还是简洁一些的好。当亨利冒雨回到旅馆时，他又成为了故事开始时的那个空心人。母亲似的人物曾想与他“完全融为一体”，但仅仅是这种试图回归的关系并未能使他超脱这种虽生犹死的状态，所以她一过世，他也完了。他的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代表着婴儿似的亨利自己，小孩一出生便因脐带绕颈窒息而亡。亨利说：“我真希望就他妈这样窒息而死。”事实他也已经是如此。

十

底色为白色的护封上印着蓝、橙两种耀眼的色彩。前面的扉页上有一个内容提要，那上面把凯瑟琳·巴克利写成了卡塞琳·巴克雷。但装订似乎没什么问题。书发行四个星期后，即10月22日，小说销售量达33000册；一个月后，尽管当时正值股市暴跌，销售量达到了5万册。1930年1月8日，海明威得知，加印的2万多册也销售一空。

美国的一些杂志刊登了马尔科姆·考利、克利夫顿·法迪曼、亨利·塞德尔·坎比和T.S.马修斯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极好的赞美评论。在英国，阿诺德·贝内特、J.B.普里斯特利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未署名的评论员也对该书作了同样热情洋溢的评论。这些评论有助于扩大对该书的需求量，并且使作者的知名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1929年11月30日，《纽约人》杂志在“人物特写”专栏里刊登了多萝西·帕克所写的文章，可以说，它标志

着海明威已经从知名人物一跃而成为当今的传奇人物。

帕克小姐承认，她敬畏海明威就好像一个游客敬畏雄伟的大峡谷那灿烂的日落景色一样。然而尽管他名声显赫，人们却对他多有误解，她继续说道。人们以为，他只是一个识字不多的流氓，曾经做过流浪汉，撬过保险箱，当过屠宰场的帮工，而现在他却以名流身份常常出入塞莱克特咖啡馆，畅饮名酒，玩弄女人，憎恨美国。幸运的是，帕克小姐恰好有能力恢复事实的本来面目。她断言，他早年离家出走，一心想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但却弄到了一份驻外记者的工作。由于战争爆发，他加入了意大利军队，身负七处重伤。他的那块铝制膝盖骨只不过是那场战争的纪念物之一。作为一名小说家，他愿意干起工作来“如痴如狂，一干到底”，他对《永别了，武器》的结尾部分所作的修改竟达70次之多，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的职业和个人行为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

他具有最深沉的勇气，而我则有幸看到了这种勇气。……他经受过痛苦和疾病，经受过你难以相信的贫困——那是一种伴随着实实在在的饥饿的贫困；他所承担的责任是常人的八倍。但是他始终没有妥协。他始终没有为了走捷径而偏离自己选定的人生之路。这需要勇气呀。

帕克小姐又说，根据海明威的说法，勇气就是指“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她带着赞叹的口气总结说：他的一就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蔚为奇观的扑朔迷离之中，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弗雷德里克·亨利与作者的战争生涯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种不正确的假想。在描写卡波雷托大撤退时，海明威巧妙地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例如，他的诀窍是，不时地添加一些几乎是毫不相干的细节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仿佛是情不自禁地往事历历在目。这便诱导为他作个人简介的宣传者相信作者和叙述者之间有过相同的经历，尽管在海明威的这部小说开头所写的的时间里，他最东边只到过楠塔基特岛，而且那时他正开始上中学。

感到迷惑的并不只是帕克小姐一人，其他许多读者也受到了愚弄。因此，海明威觉得在小说的第二版中有必要加以澄清。他说：“本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真人，书中所提到的部队和军事机构也不是真实的部队和军事机构。”他同时还指示珀金斯对新闻界发布一个类似的声明。三年后，当电影《永别了，武器》在美国影院上映时，他对那些与他名字相联的“浪漫的、虚假的军旅生涯和个人经历”再次提出了抗议。不过，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那些人并不希望得到事实的真相。迟至1949年，《小花冠》杂志的一位作家仍将海明威对卡波雷托的描写归结为“回忆中的生动片断”。五年以后，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贾科莫·安东尼尼在《文学猛兽》中还会谈到“那是他在意大利逗留期间”，这位小说家决定“应征入伍奔赴前线”，接着又赞扬他“以超乎寻常的生动性”营造出了“卡波雷托大灾难之前头两年（有意大利参加的）战争的氛围”。

但是，如果说弗雷德里克·亨利影响了海明威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那么反过来也一样，而且还远不止此。因为，在公众的心目中，作者的形象比小说更高大，结果读者自然而然地将作者的形象强加到小说主人公身上。众所周知，由于在战斗中负伤，海明威的理想破灭了，所以在《永别了，武器》中叙述者厌世的口吻是可以理解为源于他对战场的回忆。也正因为世界上大

多数人都相信海明威生性耿直、能打擅斗（这一时期反对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像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和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等愤世嫉俗者），J.B.普里斯特利在将小说定性成“残忍的男性行为”不知怎么就达到了“（它的）爱情故事中那美丽的柔情和悲怆”时，他并不是在替他自己而是在替许许多多的读者说话。至于受伤的亨利中尉对所受到的照料明显感到满意，那也可以被判断为是对粗犷的支配欲的一种表达，——如果说还真地有人想要对此作出判断的话。刘易斯·加兰提埃尔在《猎犬与号角》一文中声称：“他，一个男人，得到别人的伺候和崇拜。在伺候他和崇拜他的女人面前，他可以自鸣得意地翘一番尾巴。”加兰提埃尔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能够读到并欣赏男子的被动性格，但他并不认同海明威作品中的如此描写。不管怎么说，海明威毕竟曾将他的眼镜击飞。

海明威既为他的书被人们误解而感到生气，但与此同时，他也寻求方法来消除那些会危及或有损于他那硬汉声望的宣传。因此，当1929年11月2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每周图书专栏里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时，——故事说：一天晚上，在圆顶运动场，由于莫利·卡拉汉对职业拳击赛一无所知，便遭到《永别了，武器》一书的作者的野蛮对待。那个年轻的加拿大人向他挑战，继而将那流氓一拳击倒。——海明威感到的是气急败坏，而不是感到有趣。由于前一年夏天在卡拉汉和海明威所举行的一场友谊比赛中，是菲茨杰拉德作为那场比赛的计时员——虽然干得并不太好，海明威便迫使菲茨杰拉德给卡拉汉发送了一份由对方付费的电报，要求卡拉汉公开声明该故事纯属虚构。然而因为卡拉汉早已立即意识到《先驱论坛报》上的故事可能会毁坏“一个对海明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奇”，所以他早就给报社去了一封信。他说，他从来没有向海明威提出过挑战，也从来没有把他击倒。尽管他们一起进行过几次拳击比赛，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致渴，从而去喝一杯啤酒罢了。

第十七章 健全的身体病态的心灵

—

1930年1月，基韦斯特岛成了海明威一家的永久性地址。有一阵子保利娜似乎还满足于那些租用的住房，但在1931年春，她看上了一幢两层楼的白色石砌住宅。那房子坐落在怀特海德大街的一个漂亮的街角上，房顶漏水，布线陈旧。格斯叔叔用8000美元买下了这处住房，并完全作为礼物送给了她。这幢住宅建于南北战争后不久，是该岛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如果人们能够想象出法院的那种威严气派，那种前有双重门廊、三面围有精心制作的铁栏杆的气派，那么这幢住宅看上去还真有些像一座法院。高大的铁栅栏和棕榈树环绕着那曾经是景色优美的庭园。

就像他和哈德莉离开芝加哥前往巴黎时一样，这时海明威的生活方式也大有改变。不过这种改变却不能保证思想上的成熟。他一直未能超越过去而原谅他的母亲。从经济的角度讲，他对她的态度无可指责。正如他曾毫不隐讳地对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生活中我唯一有幸能比较体面的事儿就是钱了，所以甚感潇洒但也很过细。”1931年，他用《永别了，武器》一书所赚来的大部分版税为格雷丝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极大地充实了他源源不断提供给她们的生活费用。然而除此之外，他和她的关系缺少任何互爱的迹象。在她给他的信中，她不禁要给儿子洋洋洒洒的劝导，或者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大加说教。在一个典型的段落中，她谈到已故的丈夫时说：“可怜的家伙，他工作非常辛苦，生活给予他的太少。我无法让他起死回生，哪怕是一分钟也好。他应该享有休息、安宁和愉快。”海明威并没有对这种评论视而不见，反而大发雷霆，他的反应使她感到困惑和不安。她不无懊恼地说，她已意识到，她生性说话就会刺伤他，但他为什么就不能作一点理解的尝试呢？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做不到这一点。1931年2月，在她守寡后首次拜访基韦斯特岛期间，他对她毫不关心。过后没几个月，他就突然停止给她写信，尽管他知道她总是希望能收到他的信。1932年4月5日，她告诉他说：“这封信之后，我不再写信打扰你了，因为你得花些时间来回复我已经写给你的六封信。”由于他的怠慢，格雷丝深感受到了伤害，同时她又傲然不服，她同样也不再枉费什么心机去避开与他的冲突。30年代中期，他曾专横地要求她出售掉那值不了多少钱但却空耗税费的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并威胁说要切断他的经济援助，除非她听他的话。但她却斩钉截铁地答道：“别拿那一套来威胁我。你父亲在我们结婚时曾经试过这套手腕，可后来却一生为此后悔。”对此，海明威蛮横地回敬说：“我亲爱的妈妈，我和父亲截然不同，我从不威胁任何人。我只作出许诺。如果我说了要是你不做某种明智的事情，我将不再支付您的赡养费用，我是说到做到，决不含糊的。”

30年代早期，多斯·帕索斯是海明威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他常常听到海明威谩骂格雷丝。因此，在他生命的晚期，他曾说过厄内斯特是在他所有认识的人当中唯一的一个真正憎恨其母的人。甚至对那些和他并不是十分亲近的人，他都要说些批评她的话。1939年，他对森瓦利的那位摄影师的妻子蒂莉·阿诺德脱口而出地说：“她什么事都要管。”年复一年，她的日子已指日可数，但他的态度却依然如故。1949年，格雷丝已年近八旬。可他在写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一封信中仍然火冒三丈地谈到他们母子的之间关系：

“我们从未有过任何麻烦。……只是我不想见她，而且她也知道，她也绝对来不了这儿（古巴）。 ”

至于对他的父亲，他也是搅和在一团说不清的感情之中。在《两代父子》（1933）中，尼克·亚当斯声称他对狩猎和钓鱼的“激情”“丝毫未减”，而且现在，在38岁之际，“他对父亲让他了解了这一切甚为感激”。但是，就海明威的情况来看，那种激情在他三十几岁时不但未减，反而增强了，直到最终似乎成了一种病态。从黄石河的克拉克福克支流中，他一天之内可以钓上30条鲑鱼；在阿肯色州皮戈特镇附近的河边洼地打鹤鹑，他可以随时填弹随时射击；在蒙大拿西部克雷齐的荒山野岭中，他私猎麋鹿；在德赖托图格斯群岛，他垂钓王鱼；在格尔夫河的湍流中，他奋力捕捉巨大的马林鱼。凡此种种，无论“爸爸”海明威在描写哪一种本领时，他都是在狂热地称赞他少儿时代最敬仰的父亲的本事。然而如果说他力求模仿，他更试图超越。父亲自杀了，表现得像个懦夫。而他通常所追求的是创记录的狩猎壮举，他比自己的良师更具有男子气概。

《午后之死》（1932）是海明威在父亲自杀后写成的第一本书，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父亲对他的决定性影响。该书旨在向英美读者介绍现代西班牙斗牛，其素材基于他作为一个斗牛狂热爱好者的经历、他与许多斗牛士（其中包括他与当时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精英悉尼·富兰克林）的亲密交往，以及他在一份参考文献目录中所提到的情况：他自诩研读了有关斗牛术的2077本书和小册子。尽管如此，在他这本深奥的“论文”中，他还隐隐约约地揉入了一种个人的悲剧，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他无法将其删除。于是，书一开头，作者就无意中透露出他在第一次见识斗牛之前就已经目睹过死亡，但他却永远无法对其加以研究，无法“像个男子汉或许会做的那样，譬如说，去分析他父亲的自杀”。后来，他干脆说自己“对自杀很感兴趣”。不过，人们不仅仅可以从这些小的方面感觉到海明威医生在《午后之死》一书中那幽灵般的存在。因为，他忽隐忽现地就在那儿，与死神纠缠在一起，这种气氛一直贯穿了整部作品。

二

《午后之死》这本书同时也证明，海明威的个人神话也渗透进了他的严肃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不是心神不定的尼克·亚当斯，不是残废的杰克·巴恩斯，也不是空虚颓废的弗雷德里克·亨利，而是一个蛮横无礼、自诩为万事通的名为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人。尽管他关于写作艺术的转弯抹角的评论对任何喜爱现代文学的读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在斗牛方面的渊博学识令人生厌；他那硬汉子的形象看上去窘迫不堪；他对同行作家的尖刻评论大体上也并不显得有趣。后来，海明威自己也肯定认识到了《午后之死》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在他正准备将这本书稿交给马克斯·珀金斯时，他用悲观的口吻给多斯·帕索斯写道：“我正在审阅这部刚刚完成的失败之作的打印稿。假如这整本书与其中的某些部分一样不尽如人意，那么它的确是糟透了；但倘若这整部作品与其中的某些情节一样还过得去，那它也就还很不错。我正在努力删除大部分败笔之处。”

但是，珀金斯的反应浇灭了他的渴望。“写信对你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那是一件愚蠢的事，不过读过之后，我确实受益匪浅，”马克斯在1932年2月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对人能起到作用，使得那些起先认为斗牛只是

一种儿戏的人在读过以后，最终会认识到它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天后他又去信说：“它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按计划写出，不如说是水到渠成，而这就是一部佳作的特征。”海明威在没能邀请到珀金斯与自己一起去德赖托图格斯群岛钓鱼后，又与珀金斯通信在插图问题上讨价还价。他自己希望有 200 幅插图，但最终珀金斯很老练地说服了他，使他欣然接受了 64 幅插图。唯一令海明威对编辑大为光火的是，在他开始读校样之后，他发现每一页上都标有“海明威之死”的字样，他觉得这种做法一点儿也不幽默。他对马克斯咆哮道，你应该知道我这人有点迷信。每翻一页都得要看到那狗日的篇头，他禁不住又叫嚷起来，这真是“他妈的混账透顶”。在回信中，珀金斯解释说并未注意到篇头，他向怒火中烧的作者保证：“如果我看到了，我会知道如何去做的。对恶兆我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清楚。只要我一人驾车，发生了这样的不祥之事，我看见一只黑猫从车前横穿马路，我就会立刻开车在街角拐弯绕行。如果有任何我的家人在车里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就会告诉他们不要犯傻。”

珀金斯认为《午后之死》很不错，但评论家们大多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罗伯特·科茨在《纽约人》中是这样开始评论该书的，他说这是一本“关于斗牛的各个方面的极为详尽的专著，从牛的饲养过程直到斗牛场上遭到杀戮的那一刻；同时，它还对各种斗牛士的技巧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坦白地说，只要有那么一点就够我消受半天了。”科茨对海明威的那种“小男孩所使用的恶言恶语”以及他的文学评论也都不以为然：“在那些评论中，傲慢和易怒之中夹杂着苦涩（正如他嘲笑威廉·福克纳、T.S.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让·科克托以及其他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的时候一样，而福克纳除了受到其影响之外，并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科茨是喜欢的话，那就是作者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显露的那份坦诚。《午后之死》的作者坦白说：“在寻找详尽的细节以及在删繁就简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巨大劳动”多年来已经融入了他所写的故事。总之，科茨感觉到，《午后之死》“在故意对读者和评论界不屑一顾的方面简直就是一本自杀的书，我确实感到，正因为这一点，海明威先生肯定会让那些曾经虚伪地狂热地崇拜过他的人开始对他横加指责”。事实上，该书的“自杀”性质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

H.L.门肯从来就不喜欢海明威的作品，他对该书的“粗俗……低劣”感到愤慨。门肯说，如果作者仅仅是限于对斗牛的艺术和知识加以解说，“毫无疑问，他讲得条理清晰、精彩有趣”。但不幸的是，门肯继续说，他经常会偏离主题以“愚蠢地证实他是个调皮的家伙，而当他这样做时，他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平庸俗气或者更糟的情况当中去。他心目中的读者，其衡量标准似乎就是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橡树园镇的妇女援救会。很明显，为了能使这位天真的老太太感到震惊，方法就是对她使用四个字母的古老下流词汇。海明威先生这么做带有某种寓意和勤奋，他甚至把她拖进自己的小说，为她的惊恐而窃喜”。

不过，最无情的评论文章是 1933 年 6 月 7 日由马克斯·伊斯特曼发表在《新共和》上的那一篇。他称那篇文章为《午后之牛》，因为，“即便是说得尽可能地客气点，在他描写斗牛的字里行间，到处倾泻和张贴的都是大量的牛皮”。海明威所提到的“仪式”和“悲剧”都是些“多愁善感的废话”，而且正是“那些艺术的小保姆们和眼睛暗淡的诗学教授们喋喋不休地兜售的那种废话，而这些人他是最瞧不起了”。那么，伊斯特曼问道，为什么“我

们这位鼓吹对事情一定要直话直说的硬汉，我们这位成熟的人，我们这位凶猛的现实主义者，一越过边界踏上了去观看西班牙斗牛的路程时，自己却瞎了眼，并且把自己裹藏在青年人浪漫主义的迷云之中了呢？”伊斯特曼战战兢兢地退缩在一种无可归属的观点后面开始回答：“大家当然都知道，海明威对自己是否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缺乏沉着的自信。”不过，在此之后，这个评论家的所言所语却显然是在替自己进行辩解。

我们这些长大要当艺术家的孩子们，内在的机体往往过于娇弱，大多数都会因为内心小小的疑虑而时常惶惶不安。然而有些情况却似乎使海明威有了一种永久的责任感，去显示热血男儿的阳刚之气。他的阳刚之气不仅必须明确地表现在他那宽肩阔背有力的摆动以及他的衣着之上，还必须表现在他那大刀阔斧的散文风格的和任其流露的强烈感情之上。他性格上的这种特征已经……创造出一种名符其实的小说流派——你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文学风格，就像在他的胸脯上戴上假胸毛。

海明威过去对门肯的敌对态度就不在意，所以没有特别地理会他的评论。但他和罗伯特·科茨在巴黎时曾是朋友，因此他的攻击令他防守失措。在写给多斯·帕索斯的一封信中，他指责这篇批评文章“自以为是，故弄高深”。

《纽约人》曾经未经海明威的允许发表了他写给科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为自己讲的有关科克托、赫胥黎和艾略特的俏皮话进行了辩解，并矢口否认他曾说过任何贬低《圣殿》作者的话，尽管他的确说过。然而在信的结尾处，他又从那站不住脚的阵地上撤了下来，大谈什么他对福克纳所作的评论并不能反映他对福克纳的总的看法。“我对福克纳充满敬意并祝他一切顺利，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开他的玩笑。对于任何事情我都没有不开玩笑的，只要这个玩笑十分有趣的话，那就有些像射鸟，即使我自己的母亲在鸟群中飞得起劲，我也会开枪射击的。”如果说《午后之牛》激怒了他，那么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寄还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海明威写给《新共和》杂志的，但该杂志的编辑布鲁斯·布利文拒绝刊印这封信——更是让他火上浇油。“通过一些精神分析的鬼把戏，”麦克利什说：“这个文学上的无能之辈”开始相信：

海明威先生雄浑的艺术活力……源于他自认为毫无男子汉气概这一事实。……我不知道在马克斯·伊斯特曼先生的脑海中究竟什么才算得上是男子汉气概，但我确切地知道我曾亲眼目睹海明威先生几度遭遇极大的危险：在茫茫的大海上，在崇山峻岭中，在西班牙的街道上。……对于伊斯特曼先生温文尔雅、转弯抹角地提到的那些所谓更富于个性化的具有男子汉气概的证据，我个人从无体验。不过，我希望他无论如何去查看一下巴黎和堪萨斯等城市中的出生记录，在那儿他可以在私下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紧跟在麦克利什的抗议之后，海明威自己也写了一封信给《新共和》，在信中他也将《午后之牛》解释成一种对其性能力的诽谤。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明威本能地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英俊的伊斯特曼在和女士们的交往上一直春风得意，他的艳福不容置疑，因此他只好降格以求，转而对他的年龄进行了一番嘲讽，并将他和另外两个

其阳刚之气很容易受到责难的批评家联系起来。这两人便是众所周知的性无能的亚力山大·伍尔科特以及明显是同性恋的斯塔克·扬。

先生们：

难道你们不能让马克斯·伊斯特曼先生详尽地叙述他认为我性无能的怀旧性遐想吗？在这里，它可以被（大声地）愉快地朗读出来。我们的消遣方式历来简单，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将很乐意提供图解以便为伊斯特曼先生那平淡无味的议论增添一点光彩。对于我的能力，亚力山大·伍尔科特和已届中年的伊斯特曼先生都曾公开表示过怀疑，他们一心企望这种怀疑能够是事实。我们很快就可能从斯塔克·扬先生那儿也听到类似的怀疑，这种盼望该不会是过分吧？

然而这些话并不能缓解他的愤怒或他那日渐加深的忧郁。在给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他不无痛楚地写道：“我真想永远别再出版什么狗屁的东西了。”

不值得为这些蠢猪写些什么，我对天发誓不值得。这出闹剧从头到尾叫人感到厌恶，让人想呕吐。我所写的有关西班牙斗牛的事，字字句句都是千真万确，是长期以来毫无遗漏的仔细观察的结果。可他们倒好，把钱付给了伊斯特曼那个对此一窍不通的家伙，让他说我写了些过于感伤的废话。……什么大家当然都知道我自己是否是一个男人缺乏沉着的自信，简直是他妈的胡说八道。……他们是一帮讨厌的家伙，是一些曾经从事过专门职业的绝妙男人，马克斯·伊斯特曼是一个性的探求者（我是指用他的手）、一个政治上的叛徒（就是说，他曾背弃了左派），见他妈的鬼，我可不想在他们身上白费口舌了。……你瞧，他们没法越过去的障碍是，第一，我是个男人；第二，我可以把他们任何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第三，我会写文章。这最后一条对他们的打击最重，但他们对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喜欢。但爸爸我会让他们喜欢的。

为了平息自己惹起的这场风波，伊斯特曼给麦克利什写了一封短信，振振有词地对这位诗人强加在他评论上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还给海明威写了一封措辞更为谦恭的替自己进行开脱的道歉信，并且在给《新共和》的一封公开信上宣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诽谤海明威的“男子汉气概以及勇气呀什么的”；事实上，他还很敬佩海明威的勇气。他说，记得第一次见到海明威是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当时海明威刚刚在一次煤气取暖器爆炸时被掀出浴室，但他离开事故现场时“脸上带着微笑，就好像一个人安然坐在雪橇上”。对于海明威的近作，他想表达的只是真实的海明威实际上“温和而敏感”，所以他“对妓院和牛血的咆哮”不过只是“一种内心夸张的假象”罢了。

但是，伊斯特曼的这些被海明威称之为“舔屁股”的举动丝毫没能消除海明威的怒火。因此，四年后，当他在马克斯·珀金斯的办公室与伊斯特曼狭路相逢时，没几分钟他就暴怒起来。在起初的几句幽默寒暄之后，他就把伊斯特曼和自己的衬衣扣都扯开了，还咧开嘴笑着，说是为了比较他们的胸脯。珀金斯记得，海明威的胸毛“比任何人都浓密”，而伊斯特曼则“像秃头男人的脑袋一样光秃秃”。这时，两位作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深感窘迫的珀金斯也开始觉得总的来说这次会面还算相当顺利。突然，海明威愤怒地涨

红了脸。“你说我性无能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伊斯特曼一边努力寻找最合适的回答，一边四处张望。他在珀金斯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自己的小品文集《行动的艺术与生活》（1934）。在这本书里，有再版的《午后之牛》。他把这本书递给海明威，说：“喏，看看我到底讲了些什么。”海明威开始一页页地浏览着并不断地发出咒骂。显然，正是由于亲眼看到了这篇评论使他完全丧失了剩余的自控能力。他抓住书脊，砸到了伊斯特曼的脸上。被激怒了的伊斯特曼抓住海明威，两人互相扭打起来，摔倒在地板上。珀金斯冲上前去，想在海明威杀死他无力反抗的对手之前把他拽开。然而令这位编辑感到惊奇的是，伊斯特曼正压在上面，而海明威则躺在下面，咧着嘴大笑着。就像他和哈罗德·洛布在潘普洛纳最后摊牌时一样，他的脾气顷刻之间就变得和蔼可亲了。伊斯特曼比海明威年长16岁，不管人们的想象力如何丰富，他在体力上都不是海明威的对手。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伤害伊斯特曼，但他并没想那么做，尽管他曾经向珀金斯扬言他要进行以牙还牙的可怕报复。

三天以后，纽约的各家早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先驱论坛报》，开始发表报道，并且引用伊斯特曼的话说：在被击中脸部之后，他和海明威扭打了起来，他把对手扔过了珀金斯的办公桌，还紧紧地压在海明威下面，直到珀金斯求他让海明威起来，他才放手。海明威却是另一种说法：他只不过是轻轻拍了伊斯特曼一下，如果他真地下手，恐怕早就把伊斯特曼从五楼的窗户扔到外面第五大街上去了。伊斯特曼“像个女人似地朝我扑过来，张开两手……又撕又抓”，而“我则一直哈哈大笑”，海明威向记者们保证说：“我说，‘马克斯，如果你年轻10岁的话，我会让你好好吃点苦头。’”当时，纽约的多家晚报基本上都刊登了伊斯特曼的说法。有一家报纸把海明威和伊斯特曼的像片登在一起，像片上的海明威满脸郁闷，而伊斯特曼却正在微笑，这张像片是从他的《笑的乐趣》的护封上翻印下来的。同时，另有一家报纸声称，伊斯特曼正在准备写一篇题为《痛打厄内斯特的乐趣》的文章。

沃尔特·温切尔、O.O.麦金太尔、海伍德·布龙以及其他专栏作家都曾因为这件事大显身手。戴蒙·鲁尼恩号称仅威彻斯特一个县就有六个姑娘在发现她们的未婚夫没有胸毛后提出解除婚约；《纽约时报》则刊登了一篇针对“猛击者”海明威和“小羊羔”伊斯特曼这两个对手的编者按，其运用的幽默极为笨拙；《纽约人》上的“城镇闲谈”专栏也讽刺了这种“智者与伟人的窘况”，在同期杂志上，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了一个长满胸毛的年轻人，没穿衬衫，正在接受一个医生的检查。“作家？”画上只标注了一个词。

新闻界自作聪明的人们竭尽能事地对这场争斗写了许多风趣的评论，却忽视了《午后之死》中的一个稀奇古怪的段落。在这段话里，海明威不仅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使用了“雌雄同体”这个词，而且他也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他认为“古怪”的人不是简简单单地加以嘲笑。

格雷科喜欢以宗教为题材作画，一方面是因为他显然信仰宗教，同时也是因为他无与伦比的艺术在当时可以不受局限，可以不必拘于精确地重现那些坐着让他画下其肖像的贵族的面容。他可以任意地漫游在他的另一个世界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画下一些圣者、使徒，基督和圣女，在他的想象之中可以充满了雌雄同体的面容和身体。

在巴黎时，有一次我和一个姑娘聊天，她正在写一部描述埃尔·格雷科生活的小说，我对她说：“你要把他写成一个同性恋吗？”

“不，”她说：“我干嘛要那样做呢？”

“你看过他的画吗？”

“当然啦。”

“你在哪儿见过比他画得更好的经典范例吗？你认为那一切只是巧合或者那些人都只是很古怪吗？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在全世界各地都像那样被塑造的圣人就是圣·塞瓦斯蒂安，而格雷科把他们全都画成了那个样。去看看那些画吧，但别带着我的观点去看。”

“我还没有考虑过那个问题呢。”

“那就好好想想吧，”我说：“如果你想写他的生活的话。”

早在少年时代，海明威就曾数次去过芝加哥艺术学院，在那里他见到了埃尔·格雷科画的全幅的《圣母升天图》。但在西班牙他还曾见识过埃尔·格雷科最伟大的作品中那些形容憔悴的奇特人物。他们消瘦的容颜、伸长的双手、火焰般的形体显然令他感到不安。他没有用 20 年代或 30 年代初期大多数艺术评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神秘术语来解释这些极为复杂的匠心独运的夸张，而是将其看作是精神性欲的象征。虽然这种解释对于理解埃尔·格雷科的意识并没有多少帮助，但是如果用于解释《午后之死》中的所有那些“内心夸张的假象”，那倒是不啻可以作为一种在瞬间真实地反映了海明威内心世界的手段。

三

1932 年，《午后之死》出版的那一年，同时也标志着海明威第二次婚姻破裂的开始。在法律上，这段婚姻将一直延续到 1940 年，但在此之前它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致命的麻烦始于 1931 年。那时，保利娜告诉他自己又将有了孩子了。这种情况可不是他所期望的，唯一的安慰就是希望这次会是个女孩。11 月 11 日，停战纪念日那天傍晚六点，保利娜在堪萨斯城她生帕特里克的那家医院开始分娩。12 个小时后，她的医生认为有必要再次施行剖腹产。从她腹中取出的是个九磅重的男孩，长着深蓝色头发。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作格雷戈里·汉考克。孩子的父亲神色惨淡地开玩笑说，格雷戈里这个名字是根据许多坏透了的教皇的名字而起的，而汉考克则是为了纪念海明威自己的外祖母卡罗琳·汉考克·霍尔。

第二年 4 月，为了逃避婴儿的哭闹声，就像在帕特里克出生后那样，海明威在基韦斯特岛的密友乔·拉塞尔的陪伴下，乘坐这位“醉汉乔伊”酒吧主人的 32 英尺长的游艇“阿妮塔”号，去哈瓦那度为期两周的假期，但结果却延续了两个月。他以每晚两美元的价格在安博斯蒙多斯旅馆的五楼租了一个角落里的房间。其间保利娜分两次来和他住了一个星期，这时房租就要多加半美元。从那儿朝北眺望，可以从一座古老的大教堂上方一直看到港口入口处与大海，往东则可以看到卡萨布兰卡半岛及港口的横截面。大多数的早晨，他都会和拉塞尔出去钓大马林鱼，下午则一般用来校对《午后之死》的样稿以及创作有关尼克·亚当斯的一篇新的小说。入夜之后，有很多活动可供选择：在舞蹈学院里，有叫作艺术女郎的伴舞姑娘们，她们看上去端庄娴

静，每个舞曲要价五美分，并提供价格不等的额外服务；在回力球球场的赌博厅内，赌注的下法变化无常，赌额不断上升，而且赌注登记者在每一点上都接收赌注；另外还有弗罗里迪塔酒吧，那是一家海鲜餐厅式酒吧，那里有金丝绒地毯和精美的挂帘，同时还发明了代基里酒而享有盛名。不过，海明威主要还是以选择与简·梅森为伴的方式来共度晚间。

G. 格兰特·梅森是泛美航空公司驻古巴的首脑人物，在哈瓦那西部的捷曼尼塔斯拥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别墅。他的妻子简·梅森 22 岁，身段苗条，富于曲线，一头金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散落在鹅蛋形脸庞的两边。她是海明威追求过的最美貌的一个女子。作为纽约州塔克西多帕克镇的本地人，她毕业于布里亚克里夫大学。在一时冲动嫁给了梅森之前，她才刚刚在华盛顿特区涉足社会。跳舞、饮酒和深海捕鱼是她当下所热中的活动。她的爱好中还包括在狩猎者俱乐部射击鸽子，而这种运动别的女子很少涉足。她感到与男人们为伴很轻松，愿意男人们把她当作其中的一员来看待。可是她的美貌总是让男人们殷勤备至，她的目的也就难以达到了。

当她发现丈夫令她感到厌倦时，她便收养了两个小男孩，努力使自己沉浸在母亲应尽的义务之中。然而做母亲的责任也不能吸引住她。她很快将孩子托付给了一名英国奶妈。她的下一个想法是，重温她在布里亚克里夫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对雕刻的兴趣。在那之后，她又投资于一家专营古巴工艺品的手工艺品商店。

简的这种朝三暮四的个性很有可能缘于她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由于她所嫁给的那个木头人对任何细小的情绪变化都没有兴趣，她便越来越疏远他了。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安博斯蒙多斯旅馆的这位著名作家一再向自己表达的同情和给予的鼓励，她又非常感激。在到达哈瓦那的两个月前，海明威得知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已住进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菲利普斯诊所。在想象中，他渐渐把简·梅森当作他自己的泽尔达。不同的是，通过教她钓马林鱼，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她说她没有精神病，他努力想让她病情好转。他所做的这一切就像他处理自己的问题那样，对那些问题他在公众场合往往矢口加以否认。（“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没感到什么‘失调’，” 1932 年 8 月 9 日，他向一位笔友保证说）。为此，他还把有关性情古怪的尼克·亚当斯的新小说命名为《你们决不会这样》，以此来激发起简对自己的信心。

然而如果说他鼓励简战胜自己的疾病，那么他自己却是因为简的疾病而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住。“他说他从没发过疯，”因头部受到重伤而发疯的亚德·弗朗西斯这样评论年轻的尼克·亚当斯。疯子伯格回答说：“他这人是运气好，可他要经历的事情还多着哩。”在创作了《拳击家》三年之后，海明威曾失手拉下一扇天窗，砸在脑门上；九个月后，他精神错乱的父亲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自杀了。这两件事情之间本无多大联系，但却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感，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也会发疯。因此，就像他以前曾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他又用尼克·亚当斯作为掩护来探测自己内心的焦虑。在《拳击家》中，尼克的头上挨了一棍子，却没有病态的迹象。在《你们决不会这样》中，尼克是一位意大利北部的士兵，头部也受过重伤，但此时的他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他了，这一点在他有一次和一位不住地询问他身体状况的意大利军官的谈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你到底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我一点没事。”

“不，我是说到底怎么样了？”

“我很好，只是不开灯就睡不着。目前就是这样。”

“我看你该做开颅手术进行检查。我虽不是医生，但我懂。”

“嗯，可医生们认为让它自己吸收好些，现在就是这么回事。怎么了？”

在你看来，我看上去并没有疯，对不对？”

“你看起来棒极了，”

“一旦让他们把你诊断为发疯了，那可就惨喽，”尼克说：“没人会再相信你了。”

1932年5月，简离开哈瓦那前往纽约，住进了多格图斯医院。那只是个小手术，而不是作精神病治疗。海明威得知后很是高兴。她在母亲位于塔克西多帕克镇的别墅经过一段短暂的疗养后，用电报告知她的钓鱼老师她即将归来。“周六上午到。周日可否钓鱼。爱你的简。”海明威又一次乐坏了。

在把帕特里克和婴儿格雷戈里送回到皮戈特镇他们的外祖父母那儿由一位新近雇来的名叫艾达·斯特恩的保姆照顾后，保利娜回到了哈瓦那，与丈夫重新生活在一起。当简从纽约回来时，她仍然在那儿。然而不久以后她自己又离开了，去了阿肯色州，尽管她这样做无疑是不情愿的。从她寄回来的信里可以看出，她对于现在已经有有了一个情敌的局面有所惊醒，而她的这个情敌比自己年轻14岁，又美得让人神魂颠倒。一收到厄内斯特的信，听说他与乔·拉塞尔以及简三个人同一条大马林鱼斗了两个多小时但最后又让它溜了的时候，她就急忙告诉他：“明年我们再去捉大鱼，就你和我。你再来时，我可不会再把你晾在那儿很久很久也不管了。……我很想你，一直都想。我愿意像一只小狗那样围着你转，帕特里克也会的。格雷戈里看上去漂亮极了，四颗小牙，还有又光滑又卷曲的头发。……快点、快点、快点，简直再也等不及了。我想你会喜欢我的。”最后这一句话是指她新近才做的发型。正如海明威在去怀俄明的路上途经皮戈特镇接她时会发现的那样，她现在又和婚礼那天一样，一副男女不分的打扮了：乌黑的头发修得短短的，向前一直梳理到前额上。事实上，自从在《永别了，武器》中发现弗雷德里克·亨利的梦中情人是个金发女郎后，保利娜就一直不清楚到底该把头发弄成什么样，但同时她又完全清楚把头发弄漂亮是当务之急。1929年的那个夏天，她变成了一个金发女郎。在她怀上第二胎的头几个月里，她同样试图通过自己持久的波浪式的头发唤起丈夫的迷恋，保持住丈夫对自己的兴趣。“我想你会喜欢的，”她在信中对他说：“快一点，让你的头发也长起来，午后下雨时我会在你的脑后把它们扎成辫儿或是打上结。”在海明威娶的四个女人中，唯独只有保利娜把头发当作写信时谈论的主题。

1933年春天，海明威回到哈瓦那，又一次长时间地逗留在那里。这一次，他同样没带他的妻子。在寄给海明威的一封信中，保利娜懊恼地承认自己的身上有一些缺陷，她说她要把她那“大鼻子、丑嘴唇、招风耳以及脸上的痣子和黑痣统统都去掉后再到古巴。我清楚，梅森夫人和那些古巴的女人真可爱”。但是，几乎就是在这之后，勃姆比为她在安博斯蒙多斯旅馆的出现提供了借口。这男孩到基韦斯特岛来探望他的父亲，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惯例。他已经九岁，颇为能干，但是保利娜却坚持要陪伴他去哈瓦那。不过，由于

她想监督正在怀特海德大街住宅里进行的庭院布置工作，再加上她在那儿也没有感受到特别地受欢迎，她就没有在古巴停留太久。

那年春天，简在她丈夫和海明威的伴随下，曾在桑苏西呆了很多个晚上。她与这位小说家在棕榈树下共舞，与他并肩在轮盘赌桌上赌博。白天，她用她的巨型帕卡德轿车带着海明威在哈瓦那到处兜风，和他一起乘坐“阿妮塔”号游艇去钓鱼；她也去过他在安博斯蒙多斯旅馆的房间，尽管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她从没有像海明威后来所声称的那样从楣窗爬到屋里去。

在某个时候，他们显然谈到过结婚。但在6月初时，他们的好事突然中断了。在她位于捷曼尼塔斯的家中，简越过三楼的阳台跳到下面的篱笆中，摔断了腰。过去，她也曾半真半假地尝试过自杀，但没有受伤。她的丈夫对那些举动不屑一顾，认为她是有意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然而她这次摔断了腰就让他不得不认真地加以考虑了。一旦得到机会，他就把她抬上了船，送往纽约。在她所住的特别船舱中，舷窗上安装了栅栏，有一位护士一天24小时照料她。在纽约，她在一所医院呆了五个月，不仅配置了一副固定背带，必须穿戴一年；而且还得在劳伦斯·库比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疗程的精神病治疗。

四

1933年1月，海明威在没有保利娜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去纽约旅行。在由马克斯·珀金斯于第五十三大街切里奥饭店举行的午餐宴会上，他遇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最能引起海明威注意的是沃尔夫那有如孩童一般的风度。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对珀金斯说，像他那种特别的天才总是像小孩子一样，由此而要负的责任也就可真他妈的要命。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当时也在城里，即便是他醒的时候，他也总是带有几分醉意。他既同埃德蒙·威尔逊争吵，也同海明威争吵。这便给了海明威又一个以屈尊的语气和珀金斯谈论一位斯科里布纳公司的作家的机会。他在一封信中问道，为什么斯科特拒绝长大？

其实，他自己在城里的行为同样也不够成熟。一位名叫约翰·加德纳的年轻人前来他所在的一家饭店，把他当作是海明威家族的男性族长，请求海明威同意把他最小的妹妹卡罗尔嫁给自己。当他们在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的罗林斯学院读本科时，加德纳就已爱上了卡罗尔。让加德纳大吃一惊的是，海明威对他的请求火冒三丈，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不立刻停止见卡罗尔的话，就要把他打得牙齿满天飞。

对一位无辜的年轻人大发雷霆，这或许与海明威在《午后之死》受到负面评论后所产生的苦恼有很大关系。从那个冬天一直到1933年春天，他一直表现得冲动好斗，其中另一个原因恐怕与他正准备在秋季出版的小说集不无关系。因为，虽然他知道在《胜者无所得》中可以收入一些够得上他早期作品水准的小说，但这本书也会反映出他的想象力的发展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

《你们决不会这样》表现了一个人发疯后的感觉，这种表现使得这篇小说成为有关性情古怪的尼克·亚当斯的描写中又一篇杰作，也是该书中的突出之作。夜复一夜，尼克从恶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他总是梦见福萨尔塔城外一座现实中他从未见过的黄色房子，梦见房子旁边那长长的马厩，梦见一条运河，梦见一条比现实中宽阔得多也平静得多的河。因为他穿着一身美军军服，所以他获准可以骑自行车自由行驶，其理论根据是看到他的军服

会提高意大利军人的士气，但他却不愿意戴头盔。“要知道它们一点儿用也没有，”他说：“我记得刚开始带上时还算是一种安慰，可后来，我看到里面溅满脑浆的次数太多了。”与对尼克发疯的描写同样精彩的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几乎写得同样悲惨。海明威怀着怜悯和敬畏之情，把父亲那种同年龄的抗争以及孤独和绝望的感觉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只草草几笔就生动地勾勒出咖啡馆里的三个西班牙人：一个又老又聋的顾客和两个侍者，其中一个已届中年，另一个还年轻。天色已晚，咖啡馆里静悄悄的，但这种温馨的氛围却使这位老人和年纪稍大的侍者获得了可以暂时摆脱内心空虚和寂寞的场所。《先生们，祝你们快乐！》是该书中又一篇充斥着愤怒的情绪与讽刺意味的大手笔；《两代父子》中对克莱伦斯·埃德蒙兹·海明威的描写亦是如此。

不过，这四篇短篇小说显然与《胜者无所得》中其余的小说不同。在《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中，海明威通过象征性地处理他与格雷丝之间目前的经济关系问题更新了他们母子之间的争论。这里头所写到的一个同性恋者，他停止付给母亲所在墓地的租金而任她的尸骨被抛撒在公用坟冢上，这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位名人对于不得不给其所憎恨的女人每月生活费的强烈反感。在《大转变》中，主要写的是一男一女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中唇枪舌剑的过程，由于这女人找了另一个女人当情人，从而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从对话的节奏与急切性来看，这篇小说与《白象似的群山》基本一致，但其背景则不能像《白象似的群山》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上的光》中，这位情绪上深陷困扰的作者再次向自己的母亲开了一枪。

这后一篇小说的名字取自霍尔曼·亨特的一幅同名油画。1896年夏，歌坛生涯刚刚告吹的格雷丝和她父亲在欧洲旅游期间，在牛津学院的小教堂内欣赏了这幅画。父亲死后，格雷丝给她常去的教堂赠送了一张这幅画的复制品，悬挂在圣殿中以纪念父亲。就像童年时他曾在无数个星期天早上所做的一样，海明威再一次仰望这幅画，这时，他，这个和外祖父霍尔同名的人，能感觉到在夜深人静时，耶稣的身影就站在门前。门的铰链已生锈了，门口爬满了常春藤，门槛前还铺着层层黑纱。耶稣一手提着灯笼，另一只手举着，作敲门状。在小说对这种带有亵渎意味的场面的描绘中，第一句话就提到了一扇门，——那是在一个臭气熏天的密执安小城中，一扇通往酒吧间的门。进了酒吧后，年轻的叙述者和好友汤姆一人喝了一杯啤酒，汤姆还初次品尝了免费午餐中难以下咽的猪蹄。后来，这两个男孩走进了火车站的大门。里面有五个妓女，四个印第安人，六个白人，其中一个同性恋。最胖的那个妓女有350磅，可以被称作大号的格雷丝或格特鲁德·斯泰因，因为她叫艾丽斯。她与另一个妓女争论了一番，话题是她们当中究竟是谁曾一度有幸获得为著名拳手斯坦利·凯彻尔服务的特权，可她们却都把他叫作史蒂夫·凯彻尔。这个故事不乏可爱之处，总体上说也不乏道德上的复杂性。但是，《世上的光》还是明显地不如《我们的时代》中有关童年的小说。尽管海明威一再坚持这是他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但显然他以密执安为创作题材的写作已是智穷力竭了。

《暴风劫》代表着海明威有关佛罗里达题材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尽管小说中包含了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打动人的动作和事件”，即他在《午后之死》中所说的写作的“精髓”。他在描写曼戈基岛、西南基岛以及丽贝卡灯塔时所调用的却还是10年前他在寒冷的巴黎写作时那受到严格约束、犹如

清教般拘谨的散文风格。《怀俄明葡萄酒》的背景是他在西半球上刚刚熟悉不久的另一个地区，但故事中的家庭像是法国家庭，景色描写却也越看越像西班牙，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落基山脉西部将要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一席。《怀俄明葡萄酒》表明，他根本不愿去描写这一带；他所写的另一篇冗长而乏味的小小说《赌徒、修女和收音机》也证明了这一点。该篇小说讲述的是他在蒙大拿州比灵斯镇圣文森特医院的经历，1930年11月，他曾因开车驶出路面右臂严重骨折而住进这家医院治疗。

在《向瑞士致敬》中，他用三篇短文轻描淡写地表达了他对哈德莉的怀念，但并不像所期待的那样滑稽有趣。在《等了一整天》中，他回忆起在皮戈特镇的一段时光，当时勃姆比发烧病倒，体温高达华氏102度，这孩子确信自己就要死了，因为他以为所有温度计都是以摄氏度为标准的。正如T.S.马修斯在《新共和》杂志上评论的那样，《等了一整天》完全可以大胆地推荐给布恩·塔金顿的《彭罗德和萨姆》的崇拜者。《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是在《午后之死》的第十二章中曾经出现过的有关战争的半真实半虚构性的研究论文。《读者来信》则是收入集子中篇幅最短质量最糟的一篇，它起源于作者同堪萨斯城的内科医生兼稿件辛迪加专栏作家洛根·克伦德宁的友谊。克伦德宁认为一位小说家会对他收到的那种专栏读者来信感兴趣，于是就往基韦斯特寄了几封。其中有一封是个女人写的，信中说她丈夫在随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时染上了梅毒，她想知道能不能再和他保持性关系而不危及自己的健康。海明威对这封信稍加编辑修改就发表了，只附加了一个两句话的介绍和一段总结。海明威曾经特别喜欢这样评论菲茨杰拉德，说什么可怜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由于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故事而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菲茨杰拉德卖给通俗杂志的任何一件作品都不会比《读者来信》或《等了一整天》的质量更为低劣。

说到对《胜者无所得》的评论意见，威廉·特洛伊在《民族》杂志上指出：“正是在海明威的崇拜者们中间，人们最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怀疑，这位冠军即便就算是没有已经丧失他的阵地，也已经在逐渐丧失他的阵地。”至于特洛伊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个集子中收入了“（作者）让公众所见到的最差劲、最无趣的作品”。

在一封写给珀金斯的信中——珀金斯自己也觉得对《胜者无所得》的评论“实在让人气愤”——海明威称亨利·塞德尔·坎比是“一个傻瓜”，他把约翰·张伯伦所作的评价斥之为“一派胡言”，而对另几个在他的作品里挑刺的人他的回答是吹牛说：“不管什么时候，我写的小说总比别人强。”不过，与其说是靠写书评吃饭的“那些只懂得挑刺的笨蛋们”成功地让他感到了烦恼，毋宁说真正促使他考虑拔枪自卫的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因为，当《艾丽斯·B.托克莱斯自传》在《大西洋月刊》上连载后，接着又被装订成硬皮书，与《胜者无所得》在同一季度里发行。他“看起来很现代，闻起来却像是博物馆，”这便是斯泰因小姐对海明威写作的决定性评价。她那激烈的言词像一支支利箭射向海明威，而那只箭头上带着最致命的毒素的箭就是她声称他是个卑怯小人，“就像是马克·吐温描绘过的密西西比河上平底船上的那些人”。自从父亲过世后，性格上懦弱问题就成了海明威的致命伤。出于某种原因，格特鲁德·斯泰因看出了这一点。

虽说有很大的争议，《胜者无所得》还是在发行的头两个月就卖出了12500册。这个好消息迟至1934年1月才传到海明威那里，当时他正在肯尼亚内罗毕新斯坦利饭店自己的房间里休养。因患阿米巴性痢疾，他不得不中断他那有史以来最奢侈的狩猎远征。

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期，他过的日子却比菲茨杰拉德在20年代的黄金岁月中过的日子还要奢华，他的东非之行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事实。他从阅读请人弄到的各种小册子中得知，一次像样的两人远程狩猎约花费两万美元。这一预算并没有吓坏他。格斯·普法伊弗曾经主动提出为这次旅行提供25000美元；而且，海明威知道，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向装帧精美的名为《绅士》的男士新杂志多投“信件”以便扩大这笔资金。他曾一度放弃了为报章杂志写稿。虽然在经济上他会因此而紧张一些，但他坚信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一个从事严肃创作的作家逐渐毁掉自己。不过，那种对艺术的酷爱与追求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绅士》杂志的主编阿诺德·金里奇宣布他愿付每1500字200美元的稿酬（在1936年又涨至500美元）时，他欣然接受了。

在基韦斯特岛的好友查尔斯·汤普森的陪伴下，海明威与保利娜于1933年12月10日来到了内罗毕。内罗毕是通往这一全新国度的门户，它舒舒服服地躺在蜿蜒的吉库尤山脚下，面对着阿西平原，向北可以看到肯尼亚山，向南可以望见坦噶尼喀的乞力马扎罗山。不到30年的时间，沿着歪歪斜斜的乌干达铁路延伸的一排波状铁皮棚屋区就扩展成了一大片由英国人、波尔人、印第安人、索马里人、阿比西尼亚人以及其他非洲土著人居住的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在这里的英国人，大部分都经商，因为在荒原大漠里，内罗毕简直就是个数钱的帐房；同时，这里的白人也包括一大帮“白种人捣蛋鬼”，他们要么是有钱人，要么是造反派，要么是形形色色的纨绔子弟，个个都沉溺于调情、酗酒和赌马之中。然而，也有部分英国人过着富有浪漫情调的冒险生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一位叫贝里尔·马卡姆的女子。尽管就人而言，海明威不是很喜欢这位传奇式人物，但对她印象颇深。马卡姆起先跟着父亲学养马学训马，后来她转搞航运，驾驶着一架小飞机传递邮件或运载乘客和给养到苏丹、坦噶尼喀、肯尼亚、罗得西亚等地。1942年，她出版了一本精心撰写的自传《伴夜西行》，海明威曾无比惊讶地问马克斯·珀金斯：“你读过贝里尔·马卡姆的《伴夜西行》吗？”

在非洲时，我跟她挺熟。我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写飞行日志之外，她还能够并且将会操笔在纸上写作。可她写得这么好，如此精彩，使我作为一个作家羞愧难当。我感觉自己只是个大大咧咧的文字木匠，在工作中随随便便地有啥凑啥，时不时把文字钉在一起或胡乱搭个猪圈。而这个姑娘……却比我们这帮自诩为作家的人都干得出色。……我希望你能弄一本来读读，因为那确实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通过坦噶尼喀导游有限公司，海明威夫妇结识了坦噶尼喀的导游巴龙；布鲁尔·冯·布利克森（即与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离婚的前夫）以及肯尼亚的导游菲利普·珀西瓦尔。后者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上代人健在时曾经做过西奥多·罗斯福的白种猎人。他对海明威夫妇说，如果他们能等个把星期，他将很乐意像为西奥多·罗斯福效劳那样款待海明威夫妇。同

时，他们还可以在穆阿丘陵逗留，在珀西瓦尔的农场里打瞪羚和黑斑羚。

年轻的扬·艾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是格兰特和简·梅森的一位朋友，他当时也呆在珀西瓦尔的农场。海明威要是早几天到的话，就会见到腰缠万贯的运动员温斯顿·格斯特，此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好友。虽然海明威对范德比尔特颇有好感，曾经鼓励他为《绅士》杂志写一些关于赛马的文章，但是，令他真正感兴趣的人是珀西瓦尔。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钦克·多尔曼—史密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巴克·拉纳姆一样，这位头发花白的猎手给海明威的印象是个地地道道的捕猎能手。从珀西瓦尔这方面来说呢，他觉得咧嘴常笑、精力惊人的海明威与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简直是一模一样。

圣诞节前五天，珀西瓦尔和他的新客户们开着一辆没有门的盒子形状的汽车向塞伦盖蒂平原出发了。同在车里的，还有一名黑人司机、两名背枪的黑人和一名白人狩猎助手。另有两辆由黑人驾驶的满载野营装备的卡车“突突突突”地跟在后面。这个旅行队伍快到阿鲁沙城时，他们当中的五名白人打算在当地的一间旅店过夜。保利娜在日记中写道：“乞力马扎罗山在高空时隐时现，像一只咧着嘴常笑的柴郡猫。”

到了塞伦盖蒂平原，首先跳入眼帘的景色十分迷人。极目所及，翠绿的景色中，黑压压的角马成群结队。据坦噶尼喀狩猎部统计，其数目多达 300 万只。在这些兽群的后面和附近常常有狮子、花斑袋狼、胡狼等出没活动。在两个星期加三天的狩猎期间，在猎豹、杂色羚羊、许许多多的大羚羊、水羚和瞪羚活动的地区，海明威、查尔斯·汤普森和保利娜一共击倒了四只狮子、两头大豹子和 35 只土狼。无论是在罗斯福的《非洲猎径》还是在其他的资料中，海明威从来都没有读到和见识过东非如此美丽的景色和如此之多的猎物。

不过，在这次狩猎活动的收获大大出乎意料的同时，也不是说就没有挫折和烦恼。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捕杀功劳往往都是由查尔斯获得的；每天的放血使得保利娜开始感到恶心；海明威染上的痢疾也日趋加重。最后，正像海明威后来对《绅士》杂志的读者们所说的那样，1月14日，这个受难者“变得坚信不疑”：“虽然我不是一个信奉者，我却被选中去作为菩萨重降人间时扶持菩萨的人。在甚感荣幸的同时，我又思量着菩萨在这个岁数时与格特鲁德·斯泰因到底有多相像。我发现情况急迫，使我在射击高空飞来的鸟时越发困难，最后不得不斜倚在树上，偶尔凑合几枪。”不过，尽管他所经历的那种涨鼓鼓的感觉使他觉得自己像个孕妇，可事实上，那是他的下肠脱垂的缘故。

珀西瓦尔决定，海明威必须由飞机送到阿鲁沙，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一直送到内罗毕去接受治疗。狩猎助手本·福里出发前往最近的电报站，它在维多利亚湖，有 115 英里之遥。他要去发一份电报，要一架飞机来。“本在今晚就可以抵达那儿，”保利娜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那么明天早上飞机就能到这里了。”可是，早上飞机却没有来，这样便开始了痛苦的等待。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将这一情节重现得非常精彩。为了保存元气，这位病人一直卧床休息，只是到了晚上，才挪到篝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坐。第二天早上，他宣称自己好些了，但站起来后，由于身体太虚，仍然不能走路。保利娜和汤普森一道去打鸟去了。海明威只好靠读点英文杂志自娱。直到第三天早上，一个尖鼻矮个的越野飞行员皮尔逊（绰号“肥肥”）才驾驶着一架双座双翼飞机终于降落了。“厄内斯特和那个像是属于黄鼠狼

家族的小不点的飞行员乘坐着那架银色的小飞机走了。厄内斯特兴高采烈，显得英俊潇洒，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过于消瘦的原因吧，”在他们飞离后不久，保利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途，皮尔逊在阿鲁沙加了油，然后继续向内罗毕飞去。当飞机向东升高时，他和他的乘客可以看见乞力马扎罗山雄伟宽阔、巍峨高耸的四方顶，在阳光下，它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灿烂耀眼的白光。

“你们那位身患阿米巴痢疾的记者正卧床不起，他注射了足量的依米丁，”几天后，海明威在第一封从坦噶尼喀写给《绅士》杂志的信中说：“阿米巴痢疾的症状先是隐隐约约，再就是声势浩大，接着便轰轰烈烈了。据我所知，一位麦克唐纳先生是记录的保持者，在24个小时里他一共写了232次，尽管许多身患此病的老病号们声称麦克唐纳的记录从未加以适当审查。”这个玩笑非常具有幽默感，但却远远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个心境。他知道，过去的几天里，珀西瓦尔已经领着保利娜和汤普森游览了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南部壮观的乡村景象，而他却在内罗毕无精打彩地躺在床上。这个对比不仅表明，作为猎手他根本不是他的朋友汤普森的对手，在汤普森的辉煌战绩面前，他输得无地自容；而且，在耐力方面，他不由得注意到，年纪比他大得多的珀西瓦尔具有更出色的表现。

重返狩猎远征之后，海明威开始打犀牛和大弯角羚，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坐在营火前，和这位在《非洲的青山》中被称之为“老伯”的慈父般的白人猎手一起喝威士忌和汽水。在珀西瓦尔告诉他的许多故事里，有一个与一名叫罗伊施的登山者有关。1926年秋，罗伊施在攀越乞力马扎罗山西坡时，在顶峰附近发现一只已被冻僵而变得干枯的豹子的尸体。海明威觉得这个无法解释的传说充满了异常的诗意。或许在这头豹子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缩影。他远离故土，来到异乡，冥冥之中似乎注定要早死。

除了不断催促珀西瓦尔讲述有关这头豹子的详情之外，海明威还显得兴致勃勃，总想说服珀西瓦尔评判他以前的客户们是勇敢还是懦弱。作为交换，他对自己的朋友们也作了一些评论。菲茨杰拉德是一个“颇有魅力的胆小鬼”，与他相比，他的另一个朋友多斯·帕索斯可真是“他妈的勇猛如野牛”。珀西瓦尔很有可能被他的问题和评论弄得莫名其妙。但是，《非洲的青山》的手稿中被删除的一段则较为清楚地表现出到底是什么驱策他说出了这些话。

我的父亲是个胆小鬼。他毫无理由地自杀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胆小，直到在心里琢磨出了它的原委。当胆小鬼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不再当胆小鬼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说真的，处于真实的危境之中，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大雨冲刷过一般清醒。现在，当然很容易了。那是因为我不再害怕会发生什么事。我深深明白，活着去面对生活总是好的，这样在你死的那一刻，你为你的事业和生活的乐趣已竭尽了全力，做到生和死的协调，这是非常困难的。

在非洲，海明威前所未有地干了许多事情来证明他比他的父亲有勇气。然而，他自己也有过死的愿望。因此，如果他想决定结束所有的一切，那么他是否能够在死的同时又维护自己的男子汉声誉并反击别人指责他的胆怯，就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死于非命或是死于敌手。

六

在他们踏上归程时，海明威夫妇与艾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以及巴龙·布鲁尔·冯·布利克森为伴，乘坐一条豪华的瑞典船“格里普斯霍姆”号，离开蒙巴萨驶向维勒弗朗什。从维勒弗朗什他们又改乘车到尼斯再转火车到达巴黎。在巴黎时，海明威坚持要在那里逗留九天，以便他可以与一些未疏远的老朋友叙旧。珍妮特·弗兰娜尽力表现出她还依然爱着海明威，西尔维亚·比奇也一样，只是西尔维亚干了两件蠢事。头一件是她拿着1934年4月那一期的英国杂志《生活与通信》，指给他看那上面有一篇由温德姆·刘易斯写的对海明威作品的评论，名为《笨牛》。在这篇评论里，难得有一个句子不带刺的。

海明威无时不用的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其实是一个智力低下、呆头呆脑、只会说单音节词的傻蛋。海明威在幕后操纵着或推动着这个有气无力、结结巴巴的傀儡，从而经过所有让他感兴趣的场面。这个滑稽的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他那才华横溢的作者的一个白痴翻版。他满世界地“斯坦”个没完，一双大而无光、若有所思的眼睛好似毕加索的布娃娃女人（也就是毕加索享有专利的那种半古典的手脚大得出奇的女人）。总之，斯坦小姐的文学风格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傀儡。

海明威念着念着，肝火顿起，怒不可遏，他一读完这篇文章，便举拳砸向西尔维亚的一个郁金香花瓶，碎片哗啦啦地落得满地都是。

几天之后，西尔维亚又犯了一个错误。那是一天傍晚，天气很冷，还下着雨。她和凯瑟琳·安妮·波特在闲聊。突然莎士比亚书店的门被撞开，海明威奔了进来。他身着一件旧雨衣，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西尔维亚奔了过去拥抱他，表示欢迎。然后她一手牵着海明威，一手拉着波特，叫着她两个享有盛名的客人的全名，大声说道：“我要让美国现代最著名的两位作家认识一下。”她眼中流露着使徒一般柔和甜美的目光。刚说完那句话，电话铃响了，她飞奔过去接电话。“我和海明威都面无表情地站着，一眼不眨地盯着对方，足足有10秒钟，一句话都没说，”海明威死后三年，波特在一家杂志上撰文回忆道：“然后海明威一个大转身，疾速奔了出去，他从黑暗的雨夜中闯进了屋，又冲进黑暗的雨夜之中，如此而已。……姑且不说个人之间完全缺乏相互的同情，事实上，我们的内心确实无法共鸣；恐怕对于这位名震遐迩的年轻人来说，听见他的名字竟然与一个他闻所未闻的人相提并论共称作家，何况还是个女流之辈，那也一定很不是个滋味。我几乎都要替他感到难过了。”

这的确是个精彩场面。然而事实却有可能并非如此。因为，说到写小说，凯瑟琳·安妮·波特早就以不可信赖和用词尖刻而扬名。自我标榜她的目光吓坏了海明威这个伟人，以致使他急转身逃进夜幕之中，这一点倒确实与她终身都想把自己戏剧化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得克萨斯女郎这件事相符合。如果说海明威从来没有听说过她，那也就是在暗示说粗野的海明威缺乏细腻的感情，不可能欣赏她所写的那些故事的微妙之处。然而，她的成名作《开花的紫荆树》最初是刊登在《猎犬与号角》上，这本杂志海明威是经常阅读的。海明威去世时，他在古巴住宅的书房里收藏有三本波特的著作：《灰色

骑士灰色马》、《斜塔故事集》以及《保卫女巫》。所以说，那个下着雨的傍晚，在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对波特的作品表示了欣赏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海明威在西尔维亚接完电话前就离开了书店，那也许是因为他另有约会。

很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雨夜，他与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在左岸的一家酒吧打了一架，因为他听到消息说麦克阿尔蒙正准备在一本回忆录中对海明威进行极其恶毒的评论，以报复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对其尖刻的讥讽。海明威没有给他的这位前出版商以任何机会来证实或否认这些消息，就把他叫到了酒吧外，一顿狠揍。麦克阿尔蒙伤势不轻，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急救治疗。

海明威乘“法国岛屿”号轮船横渡大西洋的旅途比他在巴黎老家度过的一周要愉快得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马林·迪特里希也在那船上。马林后来在《本周》杂志上的一篇由别人代笔的文章中描述了她与海明威的邂逅过程。“我走进了船上餐厅，参加一个宴会，”她回忆道：“旁边的男士纷纷给我让座，但我一眼就看出我会成为桌边的第13个人，我便以我讲迷信为由辞谢了他们，突然有个高大男士挡住了我的路，他说他将很高兴凑满这第14个人。此人就是海明威。”那天海明威单独来到餐厅是因为保利娜晕船而未能陪他，还是因为保利娜就在另一张餐桌上等他，文章里没有讲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晚海明威与迪特里希共同进餐之后，他还陪她在甲板上散步，听她朗诵她女儿玛丽亚写的一篇有关自杀的诗歌。

在他们那次相遇之后的25年里，海明威和迪特里希频频通过长途电话保持联系。他们要是呆在同一个城市里，便会常常聚会，喝酒吃饭。他曾不止一次地透露过，迪特里希使他想起了《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巴克利，这种说法很有趣，因为凯瑟琳有种想做两性人的愿望：她想看上去跟她的情人一样。如果说在与她同时代的女影星中迪特里希比任何人都表现得更为性感的话，那是一种具有两性化的性感。让·科克托曾对她说：“你的名字以爱抚开头，以鞭笞结尾”；而影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坚持认为，她银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这种美在本质上是“有性无别的”。在电影《摩洛哥》（1930）中，她不仅身穿燕尾服，束着白色领带，而且还在她自己即兴设计的场面里深吻了一个女人的嘴唇；在《金发碧眼的维纳斯》（1932）里，她再次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排合唱舞女，并掐了其中一个女孩子的乳房；在《迷茫者之舟》（1929）中，她打扮得格外招摇，扮演一个身穿皮服、眼戴护目镜的美国女飞行员。飞机在一艘船边失事后，援救她的人把她当成了男子。就是在镜头之外，她也常常随便地穿着定制的黑色男装。

海明威曾对她形象冷酷的一面开玩笑，叫她“德国佬”。但埋藏在幽默背后的却是他被迪特里希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别给深深地吸引住了。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将她写进他的小说，去从事那么一个性别转换的游戏。在《海流之中的岛屿》里，托马斯·赫德森梦见他与第一个妻子同床共寝。虽然在很多方面她带有哈德莉的成分，但她同时还是一个影星，一头“银”发，高颧骨，凹陷的面颊“总是足以使人心碎”。是她开始了那场游戏，而赫德森是

马林·迪特里希的这种模糊性别的表现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表现。舞蹈家薇拉·佐林娜曾经暗示过这一点。在其自传中，薇拉·佐林娜称迪特里希曾勾引她。另外人们也不断谣传说她与其他女人之间的友谊性质也令人质疑。（参见薇拉·佐林娜：《佐林娜》，纽约1986年版，第114—115页。）

被动的参与者：

“是我当你还是你当我？”

“你先挑。”

“我当你。”

“我当不了你。但可以试试。”

“法国岛屿”号轮船在纽约入坞停靠几天后，海明威以未来肯定会向《绅士》杂志投稿为条件向阿诺德·金里奇借得一笔 3300 美元的贷款。这笔钱被用作了现金预付款，买了一条豪华的 38 英尺长的动力船。这条船是双引擎，双螺旋桨，两只舵，六个铺位。海明威给船起名为“皮拉尔”号，表面上像是出于对保利娜的敬意，可他又经常不让保利娜登船长途旅行。

5 月初，“皮拉尔”号游艇被送到迈阿密。从那里，船的新主人将其向南驶往基韦斯特岛。接下来的几周，海明威上午用来撰写《非洲的青山》，下午在诸基列岛附近钓旗鱼，晚上则依次招待墨菲夫妇、艾达·麦克里什和其他作家，其中包括唐·鲍威尔夫妇、多斯·帕索斯和凯蒂。到月底，一年一度到皮戈特镇去拜访的时间到了，但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保利娜自己去了她父母家，而且还带走了帕特里克。至于三岁的吉吉（格雷戈里当时的昵称），也被保姆艾达·斯特恩带到纽约州锡拉丘兹的家中去了。尽管吉吉对艾达制定的没完没了的规矩只要稍有触犯，烈性的艾达都会对他暴跳如雷，可吉吉还是没命地紧紧拽住她的裙子，因为他母亲对他几乎毫无兴趣。“艾达，别离开我，请别丢下我。”吉吉常常尖叫道。“好，好，我不走开，你这个小混蛋，”艾达吼叫着回答：“但你要是再胡闹一次……”数年后，保利娜向她的小儿子解释了她让艾达抚养他的原因，那是因为“我受不了大淘气的小孩子。……但我是爱你的，宝贝，真的，我确实爱，虽然恐怕我并不常常表现出来。”

在皮戈特，保利娜写信告诉海明威，她父亲刚刚给她 2308 美元，那是她父亲从她小时候给她开立的节俭储蓄帐户上取出的，后来不知怎么给忘记了。“这笔飞来之财，暂无它用，”她声称：“（如果你要是想要点）只要告诉我一声，不要再缠别的女人，你亲爱的保利娜。”保利娜想向他炫耀家庭的财富，想用钱来收买他爱自己，但这种可悲的做法对他毫无作用。相反，它可能使海明威在对她的态度上更加冷漠，因为做一只镀金鸟笼中的小鸟这种想法，他绝对无法忍受。所以，保利娜于 6 月 21 日回到基韦斯特岛才三周半后，海明威就向她告别，乘着“皮拉尔”号去古巴了。

海明威匆匆离开基韦斯特，除了因为他对妻子渴望关切的迫切愿望感到厌烦因而想逃避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他在启程前一天给阿诺德·金里奇写了封信，说他觉得和这些个“小不点的旗鱼”纠缠真是无聊之极，“当我去逮它们时我会因为打搅了它们而感到遗憾”。去古巴钓大马林鱼当然会大大有所改观，但他唯一真想于的事情是双手握枪，重访非洲。他对基韦斯特也感到腻味，因为镇子上尽是一些依赖联邦紧急援救署的政府救济为生的寄生虫。为什么不带孩子到非洲去呢？他怒气冲冲地问道：“要么让他们去死，要么让他们去享乐趣，总比生长在城里、生长在犹太人搞的联邦紧急援救署这一类骗人的把戏里强。”实际上，他扩大了攻击对象，他说总的来看他再也不“他妈的关心”什么美国了。“好了，晚安，金先生，”他在信的末

尾写道，他的话音也随着他感到压抑程度的加深而提高：“如果你还热爱美国，那很好，伙计，但我并不为之感动，也好久没为之感动过了，而且现在我仍然无法为之感动。这就好比是因为萨拉·伯恩哈特曾经不错因而就去设想她现在也好一样。我会说‘见鬼去吧’。我到过更美好的地方（西班牙），（遇见过）更优秀的人。这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最漂亮的树林等等，但我他妈的更喜欢动物。”

七

1934年，海明威在古巴住了三个月。在这一段时间，他常常与简·梅森会面，见到她的脊背固定带，比见他的妻子还要多。他尽可能让妻子呆在基韦斯特。保利娜发狂般地改变她头发的颜色。有一个周末她甚至取消了去哈瓦那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的订座，以便让美发师可以除去他所使用的染色剂中的一些粉红色。保利娜对她那飘荡不定的丈夫解释说：“我想在公共场合与朋友会面前让头发变得金黄一点。”

10月底，海明威又出现在基韦斯特，情绪低落。首先，他捕捉马林鱼的运气一直不佳。有时候他从黎明到日落也难得抓到一条像模像样的鱼。令他欣慰的是，他写的那本有关非洲的书已经接近尾声，但他又担心这本书的质量问题。简·梅森声称寒冬即将来临，其中一段时间她打算呆在东非，这便更增加了海明威心头的不安感，因为他知道简将住在她的一位英国朋友理查德·库珀上校家中，那是一幢阴凉迷人的房子，俯瞰马尼亚拉湖。况且，2月份时，海明威和妻子保利娜曾与上校打过照面。据海明威观察，库珀上校极受女士们的青睐。最后一件让海明威烦心的事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尽管《艾丽斯·B.托克莱斯自传》的出版已有一年了，海明威仍然念念不忘她的攻击。有时候，她在他心中激起的怒火几乎可与他对其母亲的恶感相比。“你决不会相信而且现在也无法证明她在更年期之前倒他妈的是个容易相处的女人，”他于11月16日写信给阿诺德·金里奇说：“我可不愿向曾经是我朋友的入开枪，不管他们后来变得有多坏。我可不是没有枪，子弹也上了膛，我也知道最致命的点在哪儿……”

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凯蒂回到基韦斯特后，他们租了几个月的平房住。海明威一见到他们便阴阳怪气地就多斯·帕索斯最近为好莱坞工作一事开起玩笑，玩笑的目的在于指出：尽管《北纬四十二度》愤怒地抨击了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堕落，但它的作者本人却是爱美元如命。凯蒂和海明威相交了大半辈子，她毫不犹豫地给予还击，取笑他的傲气。然而，她从来没有当面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海明威批评她丈夫为好莱坞卖命，其实他所谈论的是他自己也感到正在堕落。

在多斯·帕索斯的回忆录《美好时光》中，他回忆起1934年至1935年冬天的那一段时光。海明威不仅脾气暴躁，而且常常生病，主要是喉咙发炎。他总是抱怨被人打扰，晚饭前总是回到主人卧室，让保利娜和多斯·帕索斯夫妇陪伴他。他们围着他的床坐下，用碟子吃饭时，他斜靠着枕头小口喝着饮料。“我们把那称作‘皇家床’，”多斯·帕索斯回忆道：“我很难想象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人会像厄内斯特一样尽可能地在床上度过时光。”

1935年4月7日那天，海明威开枪误伤双腿，不得不在床上呆了大半个星期。事情发生时，多斯·帕索斯和凯蒂也在他的身边。那天清晨，他们和迈克·斯特雷特而不是保利娜凑成了一行四人，登上了“皮拉尔”号，想要

熟悉一下比米尼岛，那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窄窄的小岛，位于基韦斯特岛东北方向，距离 230 英里，靠近格尔夫河的东端。这几个月来，海明威一直渴望能追到巨大的金枪鱼，在这一带水域中应该能够捕到。沿河驶入大约 20 英里时，多斯·帕索斯和斯特雷特一人叉到一条海豚，而海明威则逮到了一头大鲨鱼。他把这头怪物拖到船边后，用左手操起鱼叉把它抓稳，右手则拿起口径为 22 毫米的自动手枪朝大白鲨头顶打去。大白鲨剧烈地旋转抽搐，突然“嘭”的一声鱼叉断了，击中他握枪的右手，破坏了他的瞄准，此刻他正好又要射击。他不由自主地数次扣动扳机，击中了几样东西，其中有船上的铜栏杆，子弹弹回的碎片击中了他的双腿。他刚刚雇来的舵手赶紧把“皮拉尔”号游艇调转方向，驶回基韦斯特岛。凯蒂对海明威大为光火，一路上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在她看来，海明威总爱这样漫不经心地玩弄他的手枪，他会轻而易举地要了别人的命。

八

1935 年晚春，海明威腿伤复原后，住在停靠于比米尼港口的“皮拉尔”号游艇上。他知道，保利娜和孩子们将于夏季早些时候飞到那儿，他们将在潇洒鱼翁饭店住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可眼下，他无所事事。寂寞之余，他给简·梅森写了一封信，催她过来钓钓鱼，谈谈她的非洲之行以及她的库珀先生，他有意这样写道“（非洲）真是棒极了，”简在回信中这样说：“我太喜欢这次旅行了。‘我的库珀先生’还向你问好呢。”虽然几个星期后简最终来到了比米尼岛，但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她的芳心已另有所属，就算是海明威想重温旧梦也只好就此作罢。6 月 20 日，简在迈阿密给海明威写了封致谢短信：“因受到强烈阳光照射、我的皮肤隐隐作痛。库珀先生很可爱，他到怀俄明（打猎钓鱼）去了。那么请你把双手交叉起来，保佑他一切平安顺利。不要管我，不管‘将来怎样’，他也该休自一下了。”

8 月份海明威回到基韦斯特，在他的邮件中他发现了一篇文章，名为《厄内斯特·海明威：艺术的悲剧》。这是一名苏联评论家和翻译家伊万·卡什金写的。有趣的是，他也生于 1899 年。卡什金认为，海明威那类似痉挛毫无笑意的微笑是他忧伤的表现，反映出他内心深处一种悲剧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现在已经把他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卡什金诊断性的结论是：健全的身体，病态的心灵。关于平衡问题，这篇文章的见解非常独到和深刻。卡什金认为，海明威精神失衡的迹象可以从他的一些照片的脸上看出来，但另一些照片却反映不出，特别是 1935 年夏他在比米尼岛拍的照片中就看不出这个问题。在那些照片中，不管他是表情严肃或是面带微笑，他看上去都貌似一个生活在理想国中的人。

在比米尼岛的那些格外引人注目的照片中，有一张所拍摄的海明威目光稳定，前臂粗壮，戴着一副拳击手套，他旁边的黑人青年也是这样。那年夏天，他向岛上所有的男性公民发出拳击赛挑战。他们中的任何人，不论体形身高，只要能戴上六盎司的手套跟他打上三个回合，海明威将付给他 100 美元。那一个月当中，有四名挑战者出场尝试，但均未赢得那笔钱。比米尼海滩还上演了一幕精彩的表演，是海明威与一名曾与吉恩·藤尼交过手的职业重量级拳击手汤姆·希尼的较量。尽管业余拳手没有获胜，但职业拳击手也未能赢。海明威在向朋友们讲述这场比赛时，把它说得像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

乔治·布朗过去是哈里·格里布的教练，同时也是纽约一家体育馆多年的业主。他认识海明威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十分了解他。尽管布朗认为海明威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之一”，但对于海明威作为拳击手的才能和职业道德水准，布朗的评价并不高。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告诉格雷戈里·海明威，比米尼岛的黑人或许还不太了解拳击这项运动，所以海明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们击倒，尽管海明威腿脚不灵活，身体协调性差，反应迟钝。至于说与汤姆·希尼的较量，布朗坚信是希尼故意谦让。“希尼在迈阿密曾有一家酒吧，我认识他已有多年。他是个很棒的家伙。”谈及他自己与海明威在拳击赛台上的经历，令布朗大为震惊的是，这位小说家不断地对他使用各种不道德的伎俩，时而用膝盖猛顶布朗的裤裆，时而在近距互扭时用拳头击打头顶，甚至在布朗就这种恶劣行为严厉地惩罚过他之后，他还是这样。布朗回忆到，有一天海明威带着一张报纸走进健身房的蒸汽间。通过门廊布朗可以看到海明威把报纸折叠了起来，捏紧压实握在手心里。当布朗走进去时，海明威友好地走上前来，然后冷不防猛然将报纸使劲朝布朗的肋部刺去。被激怒的布朗立刻以重拳回敬，力量之大使海明威倒在地上，头重重地撞在地板的瓷砖上。

自始至终，这位体育馆经理一直都是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这位小说家心理定势的看法。他就是想赢，从来不择手段。但布朗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老朋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既有可能是一种发泄手段，该不会也是一种希望得到惩罚的手段吧？

第十八章 万事皆空

—

《非洲的青山》出版于 1935 年 10 月 25 日。在一封于 7 月份从比米尼岛写给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上，海明威声称：这是“百分之百的自传”。紧接着，在书的序言中他又公开地重申了这一点。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该书的杜撰性的成分，或许他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对此反复强调了。

出于对侄女的喜爱，格斯·普法伊弗慷慨解囊，海明威夫妇的野猎之行才得以实现。为了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非洲的青山》一书的作者把保利娜写成了一位完全值得仰慕的女性，通篇都扭捏作态地称她为“可怜的宝贝儿”，简称“宝贝儿”。他声称，她的存在使得她的英雄丈夫更为完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除了孩子，我唯一真正关心的人正和我在一起，我不愿与任何不在场的人分享这种生活。”然而，在和一位名叫坎迪斯基的奥地利人讨论有关写作生涯的障碍时，他却又提到了女人对作家有害的问题。“宝贝儿”就此向海明威提出质问：

“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

“什么女人？”

“你们刚才提到的女人。”

“让她们见鬼去吧，”我说，“那是些你醉糊涂了才去沾的臭娘们儿。”

“哦，你就是这样干的。”

“瞎说。”

无论这种对婚姻不忠的矢口否认是否反映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为其清白所表示的抗议，海明威都把这次谈话付诸了笔端。那时，他在哈瓦那逗留了三个月，与简·梅森同居，而保利娜此时回到了基韦斯特，正为自己的头发仔细润色。然而，如果说《非洲的青山》一书中关于婚姻生活的描述可能并不会使保利娜相信那就是“绝对真实”的话，对海明威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别的读者是否会相信。结果表明，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时代》周刊的评论专栏因海明威对个人情感的坦诚，尤其是对“妻子的体贴和痴情”而深受感动。

在与坎迪斯基的谈话中，海明威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自信同样也是用来欺骗读者的。他用一种我乃所谈之事局外人的超然口气告诉那位奥地利人：在美国“我们没有特别伟大的作家。在某个时代，有些事情影响了我们有些不错的作家。我可以解释，但说来话长，也许会令你感到厌烦”。在坎迪斯基的一再请求下，他才同意详述其意，也就是说，下面的话并非因他内心的一种急切愿望所致。

我们从许多方面毁了（我们的作家）。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他们要赚钱。一位作家只有靠碰运气才能赚钱，虽然好书最终是会赚钱的。接下来，手头宽裕了，我们的作家便要提高生活水准。就这样，他们被套上了一副枷锁。他们得用写作来维持住家的开销、妻子的消费等等，这使他们不得不弄

在现实生活中，坎迪斯基的原形汉斯·科里乔纳是海明威在狩猎途中遇到的一位东非帮工。

出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他们并非有意如此，或者是因为时间仓促，或者是因为无米而凑炊，或者是因为他们的野心太大。一旦他们背叛了自己，他们就会为自己强作辩护，更多的质量低劣之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评论家们的摆布。如果作家对评论家的赞赏之词深信不疑，那么当评论家说他们一无是处时，他们也就不由得信其邪说而丧失自信了。目前我们就有两位优秀的作家因读了评论家的文章而失去了信心无法动笔。如果他们大胆创作，有时可能写出上乘之作，有时也可能写出平庸之作，甚至低劣之作，但毕竟他们能写出佳作来。可是他们听了评论家的话，就一心想写出千古流芳的不朽之作，也就是评论家们所谓的那种杰作。它们当然不会是什么真正的不朽之作，仅仅是不错罢了。于是现在他们不知从何下手了，这种枯萎正是评论家们一手造成的。

为了防止有人怀疑这种低调的分析也适合厄内斯特·海明威自己的情况，《非洲的青山》的作者同意让坎迪斯基就他自己的生生活方面提几个问题。坎迪斯基首先问他是否也想赚钱。“我感兴趣的是其他东西，”海明威冠冕堂皇地说：“我生活得挺舒服，但我必须写作，如果不写出一定数量的作品，我就不能享受我的下半辈子。”“那就是说你很幸福了？”坎迪斯基问道。“除非我想到了别人，”他回答说，一副悲天悯人的口吻。

二

尽管全国各地颇有一些评论家对《非洲的青山》表示赞赏，但几乎所有的名家都纷纷攻击这本书。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刘易斯·甘尼特将其贬为“不过是又一次游猎而已”。T.S.马修斯在《新共和》中写道：“坐下来读一本海明威的新书，在过去是令人兴奋的事，可现在却实在是叫人震惊。……他自以为啥都能写，也都能得逞，也许他是真能写点东西，但他所写的东西却不是他自以为会让人着迷的那么回事。”伯纳德·德沃托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中宣称：这本书的毛病“在于很少有精彩异常的片段，大部分都平淡无味。……（作者）好像一直在过于精细地研读《奥德赛》的散文译本，或类似海明威作品的德文译本一类的书。其结果呢，一改过去海明威典型的短句风格，三句一行，而现在却是三句一页。”还是埃德蒙·威尔逊的问题提得好：海明威自己是否也被其神话所禁锢？威尔逊在《新共和》上推测说：“或许他正被美国公众制造的关于他个人传奇的神话所围困。正如卡什金（艾万·卡什金）曾指出的，这些传说与人们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的东西很少联系。但无论如何，在其作品中，他是他所创造的众多形象中最糟糕的，对自己的评论也最糟糕。他特有的散文风格已荡然无存。”

这些攻击不仅激怒了海明威，还使他于11月陷入了严重的精神抑郁。菲茨杰拉德在低调的诉苦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肺病、听力障碍和失眠的苦痛，这正好给了海明威一个机会回诉了自己也深受失眠困扰。他在圣诞节前几天的回信中写道：“最近我也一直难以入睡，无论我何时上床，醒来时总会听到一点或两点的钟声，然后就于躺着听着敲三点、四点、五点钟。不过，由于我已对过去的任何事情都不去计较了，所以也不太碍事，只是静静地躺在那儿，一躺就是一夜，这样似乎也像睡着了似的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然而节日过后，他的情况恶化了。1936年1月26日，海明威在给保利娜的母亲——他很喜欢她，还称她为“亲爱的妈妈”——的一封信上承认，在过去的一

个月中，他常常是在凌晨两点左右起床，工作至天明，因为他的脑子总是在飞速运转而无法入眠。当然，多作些运动也许能帮助自己放松下来，于是每天他都驾着“皮拉尔”号出去，风雨无阻。现在果然感觉好多了，他肯定地对普法伊弗太太说。他还补充道：“过去从不知道忧郁是什么滋味，我很高兴现在能够亲身体会，这样我才能够体会别人的感受，对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也更能理解了。”虽然他在这封信里否认有过“真正的精神抑郁”，但事实上他却长期消沉。在一封于2月13日写给多斯·帕索斯的信上，他描写了这种抑郁的表现形式：“我感到一种强烈得可怕的空虚感，万念俱灰，好像我再也没有能力去跟女人睡觉，去跟写作搏斗，完全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1月上旬的某个时候，也就是在他抑郁的最高峰时期，他在2月号的《绅士》杂志上读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崩溃》系列散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以“一切生命的过程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崩溃瓦解的过程”作为开始，又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的一则略加改变的引文作为结束：“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变成呢？”在这之间，他还插入了一段可怖的描写：39岁的菲茨杰拉德怎样“像一只旧碟子一样碎裂了”。

在随后那个月所发表的第二篇题为《粘起来》的文章中，这位垮掉了的小说家用失眠暗喻自己每日的情形：“凌晨三时，一个被人遗忘的包裹就像死亡判决一般具有悲壮的重要性……在灵魂最黑暗的夜色中，总是凌晨三时，日复一日。”在一阵忽然爆发的痛苦中，菲茨杰拉德宣称，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他一直在埃德蒙·威尔逊和厄内斯特·海明威等人的各种力量中找到依托，他已没有任何他可以称之为他自己的个性了。“于是不再有‘我’，也不再有任何自尊的基础了。……这种失去自我的感觉很奇特，就像一个被单独留在一所大房子里的孩子，明知自己现在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想做了。”第三篇文章《小心轻放》发表在4月号的《绅士》杂志上，也是围绕着“万事皆空的思想”来写的。早在五年前发表的《爵士时代的回声》中，他就谈到自己已经意识到有些朋友已被黑暗的暴力所吞噬。“一位同班同学在长岛杀死了妻子和他自己；一位从费城的一幢摩天大厦上‘意外地’摔下来，另一位则从纽约的摩天大厦上有意纵身跳下；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间非法秘密酒吧被杀，另一位则在纽约的一间非法秘密酒吧遭到殴打后爬回普林斯顿俱乐部的家中死去；还有一位在一家禁闭他的疯人院里被一个疯子用斧头砸碎了脑袋。从那以后，那个‘死亡之口’还在陆续吞噬着周围的一些人。泽尔达的哥哥安东尼由于神经崩溃于1933年从莫比尔一家医院的窗子上跳下摔死；在菲茨杰拉德的社交圈子中另一位朋友埃米莉·范德比尔特也于1935年夏在蒙大拿的一家大牧场上自戕身亡。”不过，在《小心轻放》中，菲茨杰拉德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多萝西·帕克和范·怀克·布鲁克斯的悲剧。“一位当代的著名人物抱有这种万事皆空的倾向已有半年之久；另一位同样显赫的人物在一家精神病院一呆就是几个月，无法忍受与任何朋友的接触。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他们的身边。”

为了避免与他们同样的命运，菲茨杰拉德说，他决定继续从事写作，但他将“不再努力去做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慷慨正直的人”。他宣称自己正在努力训练一种微笑。这种微笑将“集下面所有这些人的‘微笑’于一身：旅店的经理、老干事故的滑头、有要人来访时的中学校长、开电梯的有色工人、女里女气搔首弄姿的男子、能用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买进原料的生产商、初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的训练有素的护士、初上封面出卖色相的女人、巴望能

在镜头跟前被多拍一次的家伙、脚趾发炎而强作笑容的芭蕾舞演员，等等。”而且，他正在一名声乐教师的帮助下，使自己具有更完美的嗓音，说起话来绝不显山露水，而只是让听话者信心倍增。一块写有“卡南洞窟”牌子将永久地挂在他的门上。但他将尽量去做“一只该做啥就做啥的动物，”他总结说：“如果你丢给我一块骨头，上面带有足够的肉，我甚至会去舔你的手。”

先是在写给约翰和凯蒂·多斯·帕索斯的信中，后来又在给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不顾羞耻在世人面前赤裸裸地渲染自己的失败情绪表示震惊。“《绅士》上的那些文章在我看来真是令人难过，”他对珀金斯说：“我向来知道他不会思考，向来都不行，但他有了了不起的才华，关键在于要去用，而不是在公众面前瞎嚷嚷。天哪！人的一生中会屡次经历这种空虚之感，然后又解脱出来，继续工作。”

海明威知道他说的话是有所指的。挨过生活中最低沉的一段时日之后，他现在已差不多能和过去一样正常工作了。到4月号《绅士》杂志的后续期刊已被人从杂货店的书架上取走时，《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写作已告完成（前一年的夏天他就开始写，但后来撂在了一边），《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写作也已开始并且完成。不过，如果说这些精彩的小说对《崩溃》中所揭示的神经崩溃是一种无声的抨击，那么它们本身却也浸透着“万事皆空的思想”。海明威在同期写出的还有另一篇挺不错的小说《世界之都》，它的故事讲的是：在马德里的一家斗牛士公寓里，一个助理服务员在一次“模拟斗牛”中被绑在椅子腿上的两把既厚实又锋利的切肉刀刺中下腹，流血致死。这篇小说连同《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一起标志着海明威想象中的世界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中的主人公亦遭不测，但不能说成是自杀。尽管这一思想的发展最终还包括了几部长篇作品，但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代表作仍然还是开始时发表的这几部短篇杰作。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那个在《非洲的青山》里似乎完全被一个有关自己的神话所围困的作家又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三

起初，《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那位垂死的作家名叫亨利·沃尔登，虽然海明威从来没有也不打算拜读梭罗的书。然而转念一想，他又决定把亨利改为哈里，从而将主人公与亨利·詹姆斯联系起来。在《大师的教训》中，詹姆斯在分析一名著名作家的堕落时使用了绝妙的讽刺手法。出于对这种手法的赞赏，海明威打定主意把他的主人公和詹姆斯等同起来。

哈里临死前患的正是海明威医生在自杀的当天怀疑自己会染上的病。一根刺划伤了他的右腿，恶化为坏疽。他正等待着飞机把他送往一家医院，因此正好有不少时间与他的妻子海伦吵嘴斗气。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中曾经压抑住的对保利娜的所有不满情绪通过哈里对海伦的极度厌倦而发泄出来。“可怜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把有钱人臆想成“特有魅力的人，可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便大受打击，正如任何别的事也使他深受打击一样”。可哈里却不同，他一直认为“那些有钱人都索然无味，不是酗酒过度，

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曾经创作过一部名为《沃尔登湖》的作品。海明威原来为《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主人公起的名字令人联想起这位作家。——译者注

便是沉溺于西洋双陆棋”。在他看来，贪杯的海伦也不例外。他无情地声称他不爱她，也从未爱过她。“你这个臭婊子，”有一次他还骂她：“你这个有钱的臭婊子。”

哈里对妻子的不满显然是有些过分，但这也不是他对她的唯一感受。海伦对他关怀备至，为他读书消遣，尽量不让他喝威士忌加苏打水，因为她知道酒精对患坏疽的病人很不利。她还单独远出猎获了一只小公羊，以便厨师能做个他可能会喜欢的有营养的肉汤。这些关怀的举止使他想起了她的种种好处。她并不算漂亮，可他喜欢她的脸蛋，而且她博览群书，对夫妻生活热情高，并精于此道。他自己承认：“她对他确实不错。她是个好女人，非常出色，真的。”这篇小說再次表露了那种在《非洲的青山》中被略去了的情感：哈里真正恨的人实际上是他自己。

哈里责怪妻子通过“可恶的金钱”的作用把自己引向了自我放纵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她的才华的荒废。这是毫无道理的，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恰恰是他自己毁掉了自己的才华。……他背叛了自己，背叛了信仰，酗酒过度致使灵感迟钝，懒散怠惰引致才华荒废，他势利虚荣，自负偏执，做事奸狡不择手段，这些才是毁了他自己的根本原因。……他那点才华究竟是什么？姑且就算那是才华，可他不但不去开发，反而去出卖。”在主人公的自我谴责的背后，含有海明威本人生活中的诸多因素的折射：他为自己过度沉湎于玩乐、疏于工作而感到内疚，为自己酗酒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的新交之中有那么多的百万富翁感到惶惶然；他对自己近来著书的寥寥无几深感痛苦；他认识到在大庭广众大出风头实际上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但是，也许只有哈里所说的那句“出卖”才华的话才象征着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最为本质的相似之处。因为，同样的字词曾经出现在海明威的母亲递给他的一封信上。当时，他母亲要求他离开温迪米尔，这封信现在仍保存在他在基韦斯特的档案中。格蕾丝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儿子：“除非你停止出卖那张漂亮的脸蛋去勾引容易受骗上当的小姑娘们；除非你不再忽视你对神灵、对救世主耶稣基督应尽的天职……”这多年前所受到的批评以同样的措辞及本质意义又出现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哈里承认，他吃喝玩乐的一切用度都是从那容易轻信的妻子那里骗来的。说实在的，他已经“在他的一生当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卖了生命力，而没有情感的投入，你看重的就只有金钱的价值了”。在他灵魂深处的阴暗角落里，哈里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评判，就如同她母亲曾经对他的创造者所作出的评判一样。

哈里躺在树荫下的帆布床上，望着远方那片灼热而眩目的平原。他看见三只硕大的鸟蹲踞在地面上，非常令人讨厌，另外还有10余只在上空盘旋。这些不祥之物正是他命运的凶兆。然而死亡对他来说已不可怕，因为恐惧感早已过去。他清楚地表明，现在他已不再感到痛苦。他承认，多年以来，对死亡的恐惧“曾一直萦绕着他”。可现在，“奇怪的是，只要你厌倦够了，就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大道这个结局。”当死亡最终到来时，那令人激动的感觉如同乘坐一架银色的飞机，飞向那在阳光下闪烁耀眼的非洲最高峰。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主人公对死的渴望在一片美丽的幻景中实现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死亡在海明威头脑中越来越真实，他甚至能够想象他妻子发现他尸体时的情形。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他证实了这一点。被一声猎狗嚎叫声惊醒后，海伦将手电光照到哈里的小床上。哈里尸体的大部分落在蚊帐杆下，只有腿还吊在床沿，包扎绷带都已散落下来，露出

里面的肉已烂到了大腿的一半。帐篷外，猪狗仍在嚎叫着，像刚才吵醒她时一样，“可她只听得见自己的心在咚咚直跳”。这一幕预示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同样惨不忍睹的一幕：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玛丽·海明威被一声枪声惊醒后，惊恐地奔下楼来，在他们房子的前厅发现了她丈夫蜷曲着的尸体躺卧在血泊中，脑浆溅满了油毡地板。

四

35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个子很高，皮肤黝黑，非常富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篇小说开始前不久，他因面对一头从灌木丛中窜出的受伤的狮子而落荒而逃，便在公众面前落下了个“胆小鬼”的名声。从第一个场景的双关语中，读者还可以推知，这种怯懦同时还是一个涵盖面更广的问题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他在性生活上的不佳表现。当时，麦康伯与其妻玛戈以及另一位英国的白人猎手罗伯特·威尔逊，正坐在餐篷下的餐桌前，准备在午饭前喝些饮料。

“你是要酸橙汁还是柠檬汁？”麦康伯问道。

“我要一杯兼烈酒，”罗伯特·威尔逊对他说。

“我也要一杯兼烈酒。我需要喝点儿酒，”麦康伯的妻子说。

“我想这玩意儿正合适，”麦康伯表示赞同。“叫他（餐厅侍者）调三杯兼烈酒。”

威尔逊故意要了一种令人联想起钻洞工具的杜松子酒，以回答麦康伯要他喝柠檬汁的提议。这样，威尔逊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男子的气概和他的阔老板就是不一样这个事实。玛戈立刻说她也喜欢这种饮料，这无异于在暗示当晚她想和那位白人猎手分享双人吊床。

要不是长着黑头发又“保养得极好”，要不是她已显得并不年轻，这位风韵犹存、长着标准瓜子脸的玛戈完全就和简·梅森一个样儿。1959年那个“危险的夏天”，海明威在西班牙写了一篇题为《短篇小说的艺术》的文章，直到1981年才发表。文中他曾断言，简·梅森确实是玛戈的模子，虽然他并未提及她的名字。“我塑造这个形象完全是出自我（当时）所认识的最坏的女人。我最初认识她时，她挺可爱，但她并不是合我胃口的好乖乖，只是她本身挺可爱。可她觉得我是称心如意，这一点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至于白人猎手罗伯特·威尔逊，海明威声称，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基于他的偶像菲利普·珀西瓦尔，尽管出于家庭和商业上的原因他对此稍有掩饰。”

关于简·梅森的这些歪曲性言辞，是出自一个醉鬼而且是道德败坏的人之口。这家伙死抱着虚构的神话不放。玛戈·麦康伯的原型不仅曾一度是作者最中意的女人，而且，若不是她爱上了库珀上校，很可能一直都是。海明威日渐衰老，却又不肯承认这一点，因此他也就不能进一步承认，当写到麦康伯半夜发现玛戈不在他们帐篷里的另一张吊床上时，他把自己的嫉妒也写进了作品中。至于他进一步说明《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白人猎手其实就是小说化的菲利普·珀西瓦尔，这更是无稽之谈。如果珀西瓦尔在世时读到这些奇闻，他定会感到受辱。1953年，海明威在接见一名记者时对故事结尾所作的解释同样不可信。“弗朗西斯的妻子恨他，因为他是个懦夫，”海明威对记者说：“但当他恢复了勇气时，她又非常怕他以至不

得不置他于死地，——用枪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除了《大双心河》之外，海明威的作品没有哪一篇曾像《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这样被随意地重读了许多遍。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自己对其所作的评论。虽然一些勇敢的持异议者也曾让世人听到过他们自己的观点，但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评论意见大多还是支持埃德蒙·威尔逊在《厄内斯特：道德规范的布尔东·戈热》一文中的观点，也就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男主人公在最后一刻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然后又被他那位不希望他有灵魂的女人用枪击倒。在这里，海明威终于将（詹姆斯·）瑟伯所谓的男女纷争大白于天下，并写了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寓言：在文明的世界里，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文明女人先是瞧不起一个没有进取心、缺乏勇气的男人，可一旦那个男人开始显示出进取心和勇气时，那女人又出于嫉妒试图将他毁灭掉。”

威尔逊不喜欢《非洲的青山》中那个自命不凡的主人公。他曾经用极端尖酸刻薄的言辞表示过这一点。然而，这个虚构的人物大大影响了这位评论家对《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评判。显而易见，既然一开始就是本着这样一种假设：在所有作家当中，海明威当然是一个最能对一位既会摆弄枪支又擅长捕杀动物的猎人表示同情的人；那么，威尔逊似乎就是在进一步假设《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白人猎手实际上在为作者本人说话。而且，由于白人猎手控告玛戈谋杀亲夫，威尔逊便断定她正如被指控的那样犯了罪。威尔逊说：“从《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流露出的感情，主要是对女人越来越深的敌意。”然而，如果他看重的是这个故事，而不是他对作者的看法，他可能就会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简单。

午饭前喝着兼烈酒时，玛戈把麦康伯的花销讽刺了一通，接着就哭了起来，不得不离开餐桌。20多分钟后，她又回来了，冷峻地控制了自己的举止。她品头论足，话中带刺，使白人猎手和她的丈夫都很不快。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她说得越发清楚：她自己其实并不喜欢打猎。借口运动而“用枪掀掉动物的脑袋”是一种极为残忍的屠杀，这对动物来说极不公平，因为动物是处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麦康伯——尽管他没能满足她的要求，她还是爱他的——傻就傻在去追求一种野蛮的消遣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对他并不适合，何况这样还会危及他自己的性命。“我已经把这件事完全撇开了，”她边说边在桌旁坐了下来。“弗朗西斯会不会捕杀狮子有什么关系？那不是他的行当，那是威尔逊先生的行当。威尔逊先生杀戮的本领真叫人忘不了，你什么都杀，对吧？”威尔逊很恼火，他揣摩道：“她们是世上最冷酷的，……最冷酷、最狠心、最富有掠夺性，也最迷人；她们变得冷酷以后，她们的男人就得软下来，要不然，就会精神崩溃。……她去了20分钟，现在回来了，原来是去涂上了一层美国女人那种狠心的油彩。她们是最该死的女人，真的，最该死的。”不可否认，威尔逊的这些评论是有着一股冲劲。然而，这得放到一定的环境中去理解：在小说中，玛戈对他抱有鄙夷的态度；在其他一些方面，小说也揭示出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英国人的脸是红色，的确非常红，像是被烘烤出来的红色。这种渲染暗示了他的残忍，一种英国殖民者所特有的嗜血个性，因为，在30年代，地图绘制者们仍把大英帝国的版图绘成红色。他“有一双没有表情的机枪手似的眼睛”；他的微笑还算讨人喜欢，“只要你没注意他受伤时的眼神是副

什么样子”；——这种眼神和笑容进一步显示出威尔逊粗鲁和乏味的个性。当餐厅侍者用一种白人猎手认为是无礼的方式看着蒙受羞辱的麦康伯时，威尔逊的反应毫无疑问证实了他性格中的这个方面。他威胁那侍者，要抽他 15 鞭子。尽管鞭打黑人佣人是违法的，但威尔逊冷酷地向麦康伯解释说：“他们情愿挨揍，也不愿扣工钱。”

去猎杀狮子那天早晨，有一个倒叙段落描写了威尔逊给自己装备了一支“短短的、式样难看、枪口大得吓人的 505 型吉布斯枪”。这是说明他生性残忍的又一个例证。正像菲利普·珀西瓦尔后来在一篇尚未发表的自传中所强调的那样，吉布斯来复枪杀伤力极大，在狩猎中使用是不大光彩的，所以他自己从来不带。然而，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吉布斯枪的巨响令人毛骨悚然：“卡—拉—轰！……卡拉轰！”——不仅在头一天猎狮时能听见，而且在第二天狩猎者们追赶野牛时也能听见。

三头庞大的黑油槽车一般的公牛飞快地穿过大草原的另一头的边缘；狩猎者们驾驶汽车以每小时 45 英里的速度穷追猛赶，威尔逊和麦康伯翻身跳出车外便开火，两人均弹无虚发，表现了高超的猎人技艺；——在海明威所创作的作品里，正是这些主要文字构成了最激动人心的动作系列描写之一。在所有三头公牛看来是被杀掉后，脸色煞白、自认已被吓坏了的玛戈坐在车里忍不住连连称赞丈夫的表演。“你真了不起，亲爱的，”她说。“汽车开得真惊险，”她补充说道。然而当她喝完一口威士忌镇静下来后，她又不喜欢这一切了。“依我看，这好像很不公道，”她对威尔逊说：“坐着汽车去撵那些走投无路的大牲口。”

“是吗？”威尔逊说道。

“要是他们在内罗毕听说了这事，会怎样呢？”

“第一，我的执照会被吊销。第二，会闹得挺不愉快，”威尔逊边说边拿起扁酒瓶喝了一口，“我就会失业。”

“真的吗？”

“是啊，真的。”

“嘿，”麦康伯说，一整天他头一次露出笑容，“这回她可抓住你一个把柄了。”

“你的口才倒真帅，弗朗西斯，”玛戈·麦康伯说道。

就在这场丑恶表演的节骨眼上，一名扛枪者走近他们并说其中的一头公牛并没有死，它爬起来钻进了灌木丛。面对那头受伤的狮子时，麦康伯的胆量未能经受住考验，因此，如果他乐意，他可以凭借对付一头受伤的野牛再来考验一下自己的胆量。他不仅准备好了，而且渴望接受这场考验。玛戈呢，她的脸又变得煞白，像病了一样。至于威尔逊，他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主顾的变化在性方面的含义。“地道的孩子气的美国男人。真是他妈的怪人。”但是他现在喜欢上这位麦康伯了。“真是他妈奇怪的家伙。也许这意味着他再也不会当王八了。嘿，那可是一件绝妙的事。”

当麦康伯与威尔逊准备好进到灌木丛里去时，玛戈用带有几分轻蔑的口吻问丈夫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勇敢。“但是她的轻蔑并不坦然，她好像非常害怕什么。”麦康伯非常自然而舒心地笑了，他承认他确实变得勇敢了。玛戈痛苦地问他这是否迟了点儿。这是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心灵面纱的

一角在跳动，可海明威不过只把这面纱揭开了一点：“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尽管她由于备受挫折而变得轻浮淫荡，她最终并没有使她丈夫成为他们共同的不幸生活的替罪羊。她的痛苦源于她对他们婚姻的悲观看法，而不是居心不良想推卸责任。

从汽车里，玛戈看到公牛冲出灌木丛向威尔逊和她的丈夫猛扑过来，两人不停地开枪，但公牛仍不停地往前冲。麦康伯仔细瞄准，即便公牛近在眼前，他也毫不退缩，又开了一枪。这时他感到“突然有一道炽烈的、令人目眩的电光在他的脑子里爆炸，这就是他的一切感觉”。玛戈从车里用6.5毫米口径的曼利切来复枪开了枪，“击中了她丈夫颅底骨上面约摸两英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部位”。

威尔逊立即草率地下结论说玛戈是故意枪杀麦康伯，他认为他明白其中的缘由。她对丈夫新近获得的男子气概怕得要死，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有胆量离开她，所以她就杀了他。“他早晚也会离开你的，”当她坐在汽车的角落里哭泣时，威尔逊对她说。细心的读者不可能同意威尔逊——不管是罗伯特·威尔逊还是埃德蒙·威尔逊——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小说里曾特别点明玛戈的本意是想杀掉公牛。“汽车上的麦康伯太太呢，眼看野牛的犄角马上就要捅到麦康伯身上，就用那支6.5毫米口径的曼利切来复枪向野牛开了一枪。”她开枪是为了营救丈夫的生命，而不是结果他。在她所站的位置，看上去公牛立即就要猛撞到她丈夫身上并杀死他，如果她真地想要麦康伯的命，她脑海中的一闪念肯定是啥也别干。威尔逊在玛戈失去丈夫后控告她谋杀，只是再次证明了他自己的残忍，并找到了一种绝好的保护，以防止玛戈在内罗毕状告他违反猎人守则的不光彩的行为。与埃德蒙·威尔逊的结论恰恰相反，《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并不是要讲述一个毁灭了人们心灵的泼妇的故事。

其实，这篇小说讲的主要是关于自我征服的危险。麦康伯遭到毁灭的原因，并不是妻子的恶毒，而是一种危险的渴望，即他想具有勇猛的男子气概的渴望。作者在小说中分裂成了两个对立面。野蛮的罗伯特·威尔逊和他的双人吊床以及大来复枪是神话中海明威的化身，而满腹狐疑的麦康伯则代表着另一个海明威，在他看来，黑暗中不仅过去而且将来总有魂灵存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彷徨者成功地赢得了野蛮人的赞同。简而言之，他成为了他并不适合成为的那种人，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就像《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那位妻子最终被开脱了罪责一样——她的丈夫最终不再指责她悲剧性地埋没了他的才华，一个至关重要的叙述细节也解除了玛戈是麦康伯悲剧的罪魁祸首的责任。在阐明她没有罪过时，海明威表现出他能够满怀同情心地去塑造有真实问题的真实女性，也能够满怀同情心地去看待她们的不幸，他的这种能力并没有随着《雨里的猫》的完成而消失。然而，当他完成这部作品15年后在接见一名记者时，他又重新躲在了海明威神话的背后，给故事蒙上了一层憎恨女人的表象。

五

在进行这两部非洲题材的小说创作时，妹妹厄休拉的来访使海明威精神振奋。很快，厄休拉就爱上了基韦斯特。然而有一天黄昏，她回到家里，泪眼蒙蒙，因为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华莱士·史蒂文斯很有说服力地告诉她，

她那大名鼎鼎的哥哥是个笨蛋，而且根本算不上是个男子汉。得悉此事，海明威立即带上厄休拉冒着细雨蒙蒙的暮色出发了，并与刚刚离开酒会的史蒂文斯碰个正着。这位身高 6.2 英尺、体重 225 磅的诗人体格强健，自以为能打善斗，可当两人摆好架势以后，史蒂文斯一记重拳扑了个空，被海明威摔在街上的水坑里。又被打倒了两次之后，史蒂文斯的腮帮又挨了一拳，手也两处被打折，接着又被打趴在地。几天后，史蒂文斯到海明威家登门拜访，向厄休拉道歉，和昔日的对手重归于好。海明威保证对所发生的一切守口如瓶，以免揭穿史蒂文斯对外所编造的从楼梯上摔下来弄伤了脸和手的谎言。但是，史蒂文斯一离开小镇，海明威就在一封给萨拉·墨菲的信里兴高采烈地详述了这场格斗。“那位可爱的史蒂文斯先生，”他嘲讽说：“我希望他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而开始研习箭术或机关枪。”

第二年 9 月，在与菲茨杰拉德之间发生的一次龃龉中，海明威又燃起了想让同行作家们丢丑的欲望。菲茨杰拉德在 8 月号的《绅士》杂志上阅读《乞力马扎罗的雪》时，发现书中垂死的主人公曾轻蔑地提起可怜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对富人们的那种天真浪漫的敬畏。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泽尔达刚刚被高地医院接受入院，而非菲茨杰拉德本人正在经济窘迫中挣扎。这位被激怒的作家从那儿给海明威写了封义正辞严的短信，要求他在文字中不要再提到他。他在顺便谈到《崩溃》时说：“如果什么时候我想写《哀悼经》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要我的朋友们在我的死尸前大声祈祷。”海明威的回信显然被菲茨杰拉德毁掉，不过在此之前他给阿诺德·金里奇看了这封信。多年以后，阿诺德在描述该信时说，信中所使用的语言“你即使用在一条黄狗身上都得犹豫”。但菲茨杰拉德仅仅告诉马克斯·珀金斯说，他收到了海明威“一封狂妄的信”，“告诉我他是多么伟大的作家以及他如何爱他的孩子”。但是，对一个刚刚被抛弃的情妇比阿特丽斯·丹斯，他谈得更加尖刻些：“（海明威）和我一样精神崩溃了，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我趋于悲伤抑郁，而他则趋于狂妄自大。”

海明威也同样写信给珀金斯谈到了菲茨杰拉德的信。考虑到菲茨杰拉德在《绅士》杂志里所说的“那些关于他自己的可怕的事”，在海明威看来，他的老朋友对《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有关他的挖苦竟然会有怒不可遏的反应，这真是他妈的怪事。至于他在回信中对菲茨杰拉德说了些什么，他强调说他仅仅是向菲茨杰拉德说清楚，五年来，他一直都没写过自己所认识的人，因为他替他们感到可悲。但从现在起，他将当一名小说家，而不再做绅士了。显然，珀金斯不难认识到，这句富于威胁性的话是在恶意解释菲茨杰拉德在《崩溃》中所描述的那种决心，那种表明他将不再心慈手软的决心。

为了不疏远海明威，珀金斯非常小心，他从不在他及大多数人面前流露出自己对他的虚荣及残忍的极度厌恶。然而，和他那位可爱的弗吉尼亚贵族伊丽莎白·莱蒙——自 1922 年起他们就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痛苦的柏拉图式恋爱——在一起时，他俩多少都对他所列出的名单上这位声名最为显赫的作家有一些反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杂志版本中，海明威让哈里回忆起那个“可怜菲茨杰拉德……有一次怎样动手写一篇短篇小说（即《富有的男孩》），他开头这样写道：‘豪门巨富是跟你我之辈不同的。’”“有人”就俏皮地说：“是的，他们比咱们有钱。”然而，珀金斯向伊丽莎白透露说，这句俏皮话说出来时他本人就在场，可受嘲笑的对象是海明威本人而不是那篇短篇小说的作者。珀金斯说，在纽约的一家餐馆吃午饭时，海明威告诉他

和爱尔兰作家玛丽·科拉姆，他自己“正在逐步了解有钱人”。也许正是他的嗓音中所流露出的自我满足才引出了玛丽·科拉姆的回话：“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富人有更多的钱。”

第五部 (1936 1945)

第十九章 西班牙悲剧

—

1936年9月26日，海明威在怀俄明州科迪附近的诺德基斯特牧场写信给马克斯·珀金斯，说自从两个月前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他一直恨自己没有亲身在战争现场，“心中无限悔恨”，但他期待着很快就会去西班牙。信中他还兴高采烈地谈到六天来射杀了三头灰熊。在同一天写给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信中，他也兴致勃勃地提及此事。不过，信写到一半，情绪骤变。“我本人热爱生活，热爱至深，如果开枪自杀，我会深恶痛绝。但我想或许很快可以安排让别人开枪打死我自己，以免贻害子女。”

要是西班牙的屠杀继续下去，有人邀请他去报道战争，而且他也愿意这样去做的话，他是可以安排让人开枪打死的，无论谁也不会生疑。但这仅仅是这场战争吸引他的原因之一。投入战争的危险还会给他提供新的小说素材，他在非洲的游猎就是如此。再说世界各地一片萧条，而他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去西班牙战场可以减轻他的负疚感。何况这是离开保利娜的一个绝好借口。因此，当北美报业联盟这家新闻机构的总经理约翰·惠勒11月底给他写信，问他是否有意再当一次战地记者的时候，他的答复便无可置疑了。

累计起来，他将到这个罹受战火的国家一共去四次，时间分别是在1937年和1938年的春季和夏季。无论是他在新的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对社会统一的鼓吹，还是他从前线发回的报道，抑或是他为了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拥护派的事业所从事的其他活动，都将使他以一个对左派具有强烈同情心的人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场大戏将与一场小戏同时演出。战争不仅会帮助他摆脱保利娜，同时也会让他找到一个共赴战乱的女人，玛莎·盖尔霍恩。为了寻求战火中的危险和刺激，他甘愿变成她追求的对象，正像他和哈德莉还是夫妻时保利娜在追求他一样。最终，与盖尔霍恩的私通关系发展成了婚姻。然而无论是在这场婚姻中，还是在与左翼政治发生的罗曼史中，海明威都悲哀地发现：自己蒙受了欺骗。

二

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联盟执政，支持者不到投票人数的50%。数以百万计投票支持右派民族阵线的西班牙人，有的对新政府心存畏惧，有的则嗤之以鼻；除此之外，新政府也无法控制左派激进分子，因此几个月后国家便乱作一团。截至6月中旬，烧毁教堂160座，发生政界谋杀案269起，破坏政治中心69个，洗劫新闻机构10家，总罢工113次，局部罢工228次；武装农民占领了多座大型庄园，瓜分土地；西班牙两大工会劳工总会和全国劳工同盟之间枪战激烈。左派盲目制造的暴力事件主要是由以下这些人所为：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新近成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波乌姆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追随者、共产主义社会青年运动组织属下的街头团伙以及本该去维护和平的共和国防暴警察突击警卫军等。与此同时，隶属右派主要青年组织即人民行动青年联盟的团体也忙着进行他们自己的挑衅和暴行，其中包括几起让左派分子蒙受了不白之冤的教堂焚烧事件。给国内秩序以最后一击的事件是，7月的第二个星期，突击警卫军为报两名警卫被一右派团体杀害之仇，谋杀了极端保守的议会领导人卡尔沃·索特洛。7

月 17 日，狡猾而野心勃勃的将军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摩洛哥发动武装叛乱，两天内暴乱便蔓延到了整个西班牙大地。

实际上，当时所爆发的不仅仅是拥护派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内战，而且是一场世界大战的缩影，因为佛朗哥的部队立即得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控制下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支持，而人民阵线也得到了苏联、墨西哥和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纵队外国志愿军的支持。另外，共和政府拥护派的内部也发生了战争中的战争。1939 年春，巴塞罗那是共产主义者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波乌姆党联盟鏖战的场所，平定这场战斗动用了海军和 4000 名突击警卫军士兵。此后，革命的社会党总理弗朗西斯科·拉戈尔·卡瓦列罗拒不解散波乌姆党联盟，于是共产党以此为由逼他下台。他的继承人是温和的社会党人胡安·内格里恩，但共产党的宿敌安赫尔·西拉尔萨被免去了内政部长的职务，共产党不仅占据了許多市镇警察局的关键职位，还取代了各副部长之职。

驱逐卡瓦列罗以及共产党后来下的几步棋不仅令人想起了斯大林在苏联所玩弄的阴谋诡计，而且在拥护派掌权的西班牙所发生的其他政治事件也无不带有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印记。于是，共产党统治的马德里警察局在捕获了两名佛朗哥的长枪党成员后，就恫吓他们，并与之密谋制造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呼吁叛乱的虚假计划，还在计划背后附上一封写给佛朗哥的信，署名是波乌姆党联盟的领导人安德列斯·尼恩。一旦“证据”在手，共产党就能下令逮捕和折磨尼恩和他的主要同伙。（由于尼恩不屈不挠，原计划按照莫斯科审判苏联“叛徒”的方式进行的摆样子公审只好放弃。）到战争末期，无数其他非共产党的左派分子不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就是在狱中就地审判后立即处死。遇害最早、最有名的牺牲者中有一个叫何塞·罗夫莱斯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讲师，他与多斯·帕索斯相交多年，翻译过其作品。罗夫莱斯被杀十有八九是因为他做过苏联驻西班牙军事代表团团长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将军的翻译，对西班牙国防部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了解太多，不合苏联秘密警察即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西班牙分局的口味。

1936 年去世的拉迪亚德·基普林生前曾使用过“因为紧张而崩溃的脆弱的知识分子”这句话，这话放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再合适不过了。从无数个专栏论坛来看，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无法承受因直面这场纷繁的西班牙悲剧而产生的精神压力，便把共和政府拥护派的事业美化成了爱好民主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一场振奋人心的斗争。因而，他们不仅忽视了非共产党的左派内部的极端混乱状况，同时也拒不接受如下事实：共产国际的撒谎高手威廉·明岑贝尔格和奥托·卡茨（后均被斯大林下令处死）所炮制的反法西斯宣传其实是以花言巧语掩盖了帝国主义对某种制度的图谋，这种制度之残忍比起希特勒来毫不逊色，也大大超过了佛朗哥建立的强制性统治。

但是，无法直面精神压力并不是海明威的问题所在。如果他极易受到时局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他政治上还不老练。他一生对政治发生兴趣的时候少而又少，但却想在西班牙之谜中打开一条出路。结果是早已注定的。尽管他对读者说自己是不会受到捉弄的“爸爸”，事实上他却很容易被人愚弄，直到战争结果已成定局，他仍在为共产党卖命。

在西班牙采访期间，他从未考虑过既站在共和政府拥护派的立场又站在

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报道这场冲突。正如他第一次去西班牙前几个星期在写给保利娜父母的一封信中表示的那样，他已经确定了战争的性质。为了抚慰普法伊弗夫人的天主教敏感，他先是说“共产党可能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坏”，但接着又强调补充“他们是西班牙人”，这场战争是他们和“流亡地主、摩尔人以及德国人”之间的一场斗争。他离开美国前就已完全下定决心的另一个迹象是，他决定利用1937年元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纽约与青年小说家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一道拍一部亲拥护派的宣传片《战火中的西班牙》；此外还有一个迹象，他2月第二次到纽约时，与多斯·帕索斯、麦克利什和莉莲·赫尔曼共同成立了当代历史学家有限公司，旨在资助和制作一部反映西班牙战争的纪录片。该片由荷兰电影导演约里斯·伊文斯提出创意，海明威撰写解说词。麦克利什是位多愁善感的自由主义者，对斯大林直至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外交意图持有善意的看法。莉莲·赫尔曼尽管貌似十分正直，却始终追随苏联的路线。伊文斯从1928年到1930年一直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现在依然同情共产党。四个人当中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多斯·帕索斯能够作出独立的政治判断，海明威本该从中学点什么，但可惜他很快就偏偏跟多斯顶上了牛。

1937年春，伊文斯和他的年轻摄影师约翰·费尔诺特（又名费尔诺）前往马德里周围的战场时，海明威也经常同行。在拍摄战斗的间隙，伊文斯操着完美的英语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来巩固他的新朋友在家乡就已形成的对这场战争的观念。当电影拍摄完毕并取名为《西班牙大地》时，伊文斯请海明威帮他重写电影的主题陈述词。于是，海明威帮他写了三句话，与共产国际宣传部门的广告语配合得恰到好处。“我们通过民主选举得到了开发我们土地的权利。现在，军事集团和流亡地主正攻打我们，妄图重新夺去我们的土地。贵族老爷闲置土地而自得其乐，但我们却要争取浇灌、开发这片西班牙大地的权利而斗争。”

作为一名北美报业联盟的记者，海明威发出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机枪冲锋枪的密集扫射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连睡觉也有危险，因为照他对读者的解释，他在马德里佛罗里达饭店下榻的套房位于饭店前部，正对着两英里外民族主义者的枪炮。跟1918年的情形一样，他的虚构不乏真实的重要成分。他的生命多次遭到危险，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在战火中表现英勇也毋庸置疑，许多目击者都作过证明。《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在描述海明威救他的经过时说：

那是1938年埃布罗河战役中的事，因为桥被炸毁，我们只好坐划艇从河西划到河东。水流很急，河下方几百码处有讨厌的急流，所以船一部分是用绳子拉着过河的，但中途绳子断了。我们开始很快滑向急流。海明威霍地抓住双桨……用了好大劲……把我们安全送到对岸。危难时刻他确实是一条好汉。

然而他的勇敢并不是连命也不要，他也不愿让同伴愚蠢地冒险。由于在佛罗里达饭店他是和另一位名叫玛莎·盖尔霍恩的记者同住那套房，如果真像他暗示的那样，套房暴露在大炮的轰炸之下，他很可能是不会再住下去的。此外，在有些地方，比如在“古老家园”——那是一栋弹痕累累的公寓楼的顶层歇脚处，可以俯瞰发生在村舍内的战斗，——他的行为还是小心谨慎的。

伊文斯、马修斯和其他也利用了这个优越位置的观察者们经常受到他的警告，说双筒望远镜稍一反光，就会把他们的位置暴露给佛朗哥的摩尔人大炮弹着点的观察员，引来一阵轰炸。他后来在短篇小说《决战前夜》中写道：“你如果愿意饱尝冷枪滋味的话，只要无遮无蔽地拿起望远镜来望望就行。他们（摩尔人）的枪法也精得狠，所以他们……弄得我整天口渴。”《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在西班牙并没有忘记对早死的迷恋，完全没有。但另一方面，他仍然热爱生活，身在他最喜爱的欧洲国家更让他想到自己是多么地热爱生活。俄国作家伊利娅·爱伦堡对这段时期的海明威的印象是，他基本上是个乐观的人，对生活非常执着，尽管“他热中于危险、死亡，一心想干大事”。爱伦堡还认为，英勇保卫马德里的人们对海明威有着潜在的影响。因为他们不肯投降，所以“他充满活力，精神振奋”。或许，此时此刻，海明威证实了尼采的观点：自杀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因为有了它，你就能成功地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瓜达拉哈拉前线第一阶段的历史性战斗结束后，海明威报道说，他跟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们及其手下官兵一道巡视了战场，查看了阵地，并沿着坦克车的车辙前进。这是他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公开暗示：他对战争的了解远比赫伯特·马修斯和塞夫顿·德尔默这样纯粹的记者要多得多，所以拥护派的指挥官们都把他当作顾问。他在私下里对自己军事才能的自吹自擂更是令人咋舌。例如，在他第二次去了西班牙后，他看到《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觉得该文似乎在暗示马修斯是唯一参加过特鲁埃尔战役的记者。在写给现在已与保罗·莫勒结婚的哈德莉的一封不大连贯的信中，他说：

告诉保罗我想什么时候跟他讲讲发生在特鲁埃

尔的事。马修斯和德尔默被拒发了通行证，我以名义为他们担保后，那位女检察员准备丢掉工作也要放我们几个人的东西过去（他们获准只能发公报）。比马修斯还早 10 个小时把有关该次战役的头一篇报道发到纽约，回来后，与步兵一起参加了整个进攻，跟随一个连爆破手和三个连的步兵进城，发了这个消息，回来后，准备电传最精彩的有关逐户进行争夺的战斗报道，但北美报业联盟来电报说不想再要。我猜是怕花太多钱。

这封信究竟有多少地方脱离事实很难说，但毋庸置疑的是，写信的人并不是个好记者。他不仅并不比赫伯特·马修斯强，还常常沦落到重复自己的报道的地步，所以他第三次去了西班牙之后，约翰·惠勒就再也没有续签他与北美报业联盟的合同。

带他参观瓜达拉哈拉前线的军官是一位已加入共产党的前普鲁士上校，名叫汉斯·卡勒。由于卡勒是第十一国际纵队的司令官，所以海明威经常应邀参观该纵队，同时也逐渐认识了第十二和第十四国际纵队的官兵，尤其是第十二国际纵队的政委，那位既英勇又英俊的德国共产党作家古斯托夫·雷格纳，还有第十四国际纵队的司令官，那位波兰将军“沃尔特”，他那满是伤疤的光头使他显得虽英勇却丑陋。如果有哪位共产党的高级军官让他讨厌的话，那就是法国人安德烈·马蒂，他认为这人是个疯子。马蒂能担任阿尔瓦塞特国际纵队总部的司令官，靠的不是军事成就，而是自 1919 年以来一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忠心耿耿。那年，为了支持白俄罗斯军队，作为水兵兼机

械师的他率领法国黑海舰队发生哗变，违抗了巴黎下达的命令。

在俄国人攻占的马德里盖洛德饭店，天天供应的美食和令人头晕脑涨的充满权力与阴谋的气氛吸引着海明威，就像火吸引飞蛾一样。在这里，他见到四位共产党的司令官，他们冷酷的性格和专业智慧令他心动神摇，正如菲利普·珀西瓦在非洲激动过他一样。来自加利西亚的恩里克·利斯特原是采石工人，他最为残忍。他起先在拉科鲁尼亚组织发动流血事件和革命，后来步步高升，当上了师长。最聪明的要算胡安·莫德斯托，从前是伐木工人，曾在佛朗哥统率的西班牙外籍军团担任过中士，跟利斯特一样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因为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暴动流产后，两人都逃到了苏联，在伏龙芝上军校。四人中的第三位是健谈的大胡子巨人瓦伦廷·冈萨雷斯，军界人称“农民”，因为共产党希望他吸引更多的农民入党；第四个是化名为埃米利奥·克莱贝的匈牙利人，办事认真，很有才干。

盖洛德饭店还使海明威结识了其他三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年轻而极有头脑的《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人称西番莲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她总是一身黑服，因其在马德里电台上激烈而具戏剧性的讲演而驰名，尤其是那篇以“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诺帕萨兰（他们不会得逞）！”的口号结尾的演说。还有一位是佩佩·金塔尼利亚，即阴险的“马德里刽子手”，他是海明威的老朋友、社会主义画家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的兄弟。在跟这些政治里手闲聊的过程中，北美报业联盟的这位海外傻蛋错误地认为自己掌握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在多斯·帕索斯为老朋友何塞·罗夫莱斯仍被拘留而忧心忡忡，并开始对当局提出尖锐问题的时候，海明威则居高临下地安慰他说，佩佩·金塔尼利亚跟他保证过，罗夫莱斯不管被指控犯了什么罪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当时，他的朋友乔西·赫布斯特刚刚到达马德里，他还敦促他告诉多斯·帕索斯“停止质问”，“如果他执意问下去”，结果一定是“大家都有麻烦”，而且会妨碍《西班牙大地》的顺利完成。赫布斯特话中带刺地回答，巴伦西亚一位“消息可靠”人士刚刚对她说，罗夫莱斯决不会出席审判会，他已经死了；还有，人民阵线的官员希望尽量不让多斯·帕索斯知道这个消息，以防他诋毁他们的事业。赫布斯特表明，她自己不能辜负通知她的人对她的信任，不能把真相告诉多斯·帕索斯，但海明威可以也应该告诉他。海明威一时傻了眼，语无伦次地答道，如果罗夫莱斯死了，那他肯定是间谍。但他还是答应把消息传达给多斯·帕索斯。

经过施虐狂般的精心策划，海明威决定在一个公共场合告诉多斯·帕索斯。在庆祝第十五国际纵队改编的一次热闹的午宴上，他随口对多斯·帕索斯说罗夫莱斯已被处死。他还以自己说话的方式让多斯·帕索斯知道，根据他老练的政治眼光，罗夫莱斯该死。关于海明威政治的判断力，赫布斯特后来评论说，他无力应付自己在西班牙努力获得的“新经验”，而多斯·帕索斯拒不相信他的翻译犯有叛国罪这件事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多斯·帕索斯而言，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一来是海明威告诉他坏消息的时候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二来是海明威以迂尊降贵的态度对待他，好像他是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一个白痴。多斯·帕索斯认为，海明威才是白痴，因为他允许自己在政治上被人利用。他认为，海明威因为没在小说里反映时代的大事，一度曾是左派谩骂的目标，但如今他竟成了左派寄予殷切希望的“红人”。

1937年5月18日，当西班牙内战中最著名的记者乘坐“诺曼底”号轮船抵达纽约时，立即被一群记者和《生活》杂志的一名摄影记者在甲板上团团围住。他神采奕奕地告诉记者们，他所有在西班牙的老朋友依然活着，身体健康；他预言佛朗哥绝对占领不了西班牙首都，共和政府的拥护派将赢得战争的胜利。

他在比米尼岛钓了两个星期的鱼，然后飞回纽约。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当时也在纽约，两人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会谈。“厄内斯特，见到你身体那么好，浑身是劲，我真高兴，”那天晚上菲茨杰拉德在南下的列车上给海明威写道。其实，海明威回纽约的主要目的是在6月4日卡内基大厅举行的第二届全美作家大会上发言。

这次大会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全美作家联盟发起，联盟下任主席是秘密的正式共产党员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大会的实质是代表共产党将自由主义分子网罗到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加以利用。那位心地善良的和气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海明威发言的那天晚上主持大会。日程表上还有两位重要发言人，一位是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厄尔·白劳德，另一位是约里斯·伊文斯，尽管《西班牙大地》还没有制作声带，可后者还是打算给观众放映。

因为全身紧张，镜片又模糊不清——那天晚上大厅里挤满了人，温度很高，海明威不等波涛般的掌声平息，就开始磕磕巴巴地讲起来。但大约一分钟后，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他就“活跃起来，话也流利了”。他宣称，作家反抗法西斯主义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只有这种形式的政府才不让他们说出真相。他以此暗示苏联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从而极不明智地帮助苏联减少了一周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将要造成的宣传损失。因为，6月11日，一年前由斯大林发动的“大恐怖”重新抬头，苏军总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位高级将领被当作德国人的同谋而遭到杀害。（截至“大恐怖”吞噬其最后一个牺牲品时，100万左右的苏联共产党党员被处死，另外约占军官人数一半的三万名军官丧生。）海明威如此这般间接地为斯大林吹捧一番之后，又开始直接吹嘘自己，他要听众注意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追踪战争真相的作家与寸步不离扶手椅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

这种真理是否值得冒险去追求，作家们必须自行决定。当然，花时间引经据典地争论各种教条问题要舒服得多。有些人不想研究他们自己声称所信仰的事物，只是想讨论和维持自己的地位——是用打字机占领、用自来水笔巩固的经过巧妙选择的地位。对于这些人，永远都会有新的分歧、新的争议、美妙奇异的教条和散失的头号浪漫故事。然而现在有战争，从现在开始起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将会战争，作家们想要研究战争，就必须到战争中去。

听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回到纽约。此行的目的是修订他为影片《西班牙大地》创作的脚本。尽管伊文斯批评他的评论太罗嗦，令他大为光火，他还是很快平静下来，承认剧本应该更精简一些。但据奥森·韦尔斯说，他和海明威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代表当代历史学家有限公司将一份剧本审定稿交给韦尔斯，让他录音。伊文斯可能已对海明威相当简洁的修改稿表示满意，但韦尔斯认为有些台词没必要那么复杂，而有些台词又大花哨，因此他就照直说了。但他的意见海明威可不

受用。1966年，韦尔斯在《电影笔记》中回忆说：

由于不久前我刚刚导演过水银戏剧这种带有先锋派性质的戏剧，所以他认为我多少有点搞男同性恋，就说：“你们这些戏剧界的奶油小生，你知道真正的战争是怎么回事吗？”

我一横心，当时就做了几个女人的姿势，对他说：“海明威先生，你好强壮，好魁梧啊！”这下他火了，抓起一把椅子，我也搬了一把，就在那儿，在西班牙内战的电影画面面前，当他们经过银幕时，我们一场恶战。那真是妙不可言的情景：像我们这样的两个家伙就在那些反映挣扎和垂死的人们的电影画面面前……最后我们用一瓶威士忌互相祝酒。

麦克利什和伊文斯对韦尔斯精美的配音表示满意，但莉莲·赫尔曼和她的演员朋友弗雷德里克·马奇发现他那甜美的嗓音与战争片严酷的现实并不协调。迫于他们是戏剧界里的专家，伊文斯于是只好请海明威朗读他自己写的台词。虽然海明威是歌手的儿子，但他答复说从未接受过正确呼吸的训练，所以无法接受这件任务。不过最后海明威还是被说服去作了朗诵，伊文斯也认为结果不错。按照这位荷兰人的看法，由于录音技术不高、海明威的声音听起来很平淡，但他的音调自然，使解说词具有了高度的可信性。当伊文斯通知韦尔斯准备把他的录音淘汰时，韦尔斯很不高兴，特别是他没拿到钱。

7月，海明威和伊文斯来到洛杉矶，为援助西班牙——即拥护派的西班牙——战争向好莱坞的巨子们和影星们争取经济上的支持。在弗雷德里克·马奇和他妻子弗洛伦斯·埃尔德里奇安排的一次会议上，伊文斯放映了那部电影，海明威宣读了一篇战士受苦、无辜百姓被炸的演讲稿。菲茨杰拉德也在场，海明威的勃勃生气像往常一样令他着迷。他在写给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说：“厄内斯特来时像一阵旋风，在多次鸡尾酒会上让大导演厄恩斯特·卢比茨大煞威风，因为他拒绝大导演在好莱坞美化和重拍他的电影。我觉得他的精神处在紧张状态，其中有一种几乎是宗教性的东西。他把米里亚姆·霍普金斯刚从赌桌上赢来的1000美元筹集到手，谣传一夜就筹资14000美元。”对海明威本人，菲茨杰拉德发了一封表示钦羡的电报：电影无法用语言赞美，你的风度也一样。

当天晚上，莉莲·赫尔曼也在场。她在《一个未经修饰的女人》（1969）中声称，聚会结束后，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几个人应多萝西·帕克的邀请去她家里喝一杯，尽管她说多蒂和海明威其实并不喜欢对方。（这话当然不对，至少对帕克来说不是如此。）赫尔曼还写道，菲茨杰拉德邀请她同乘一辆车，她答应了。显然，他怕开车，因为他每小时开不了10或12英里，而且双手握住方向盘还抖个不停，甚至连赫尔曼把双手放在他手上帮他稳住也没用。到了帕克家，他又宣布不想进去。他解释说要留在车上，“我怕厄内斯特，我想，是怕头脑清醒……”“别怕，”我打断他的话：“他（海明威）从来不喜欢好作家，自然也不会喜欢比他更好的作家。来吧，玩个痛快！”

他们进屋时恰好看见海明威将一个高杯玻璃杯朝客厅的石砌壁炉摔去。菲茨杰拉德转身去拉门上的插销，但赫尔曼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厨房，

对她最亲密的好朋友达希尔·哈密特说：“请帮帮菲茨杰拉德先生。他怕厄内斯特，摔杯子帮不了他。”哈密特的回答完全不沾边：“厄内斯特从来都写不好女人。他在书里写女人不过是让她们佩服他而已。”据赫尔曼说，那天晚上其余的时间都平安无事。至于海明威为什么摔杯子，她没有专门予以解释；为什么菲茨杰拉德不打算进屋，怕开车却又抢先去多蒂·帕克家，她没有说明；她也没说为什么她要对哈密特说那些所谓她说过的话，弄得她好像就是根据哈密特的《瘦汉》拍成的电影中的默纳·洛伊一样。

然而，关于这件事的叙述以及她在这本回忆录中——在这本回忆录中还零零散散地记录着另一些仍有争议的会面时的情景——关于其他事件的叙述，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你对海明威的看法。他是一个二流的作家，是酗酒成性的莽汉。不过，有一次她评论道：“我喜欢厄内斯特。”或许，在1937年和1938年她是喜欢他，因为当时无论在国内国外他都是斯大林派的宠儿，但他在《丧钟为谁而鸣》（1940）中跟共产国际分手之后，她就不喜欢他了。她先是在私下的谈话里挑剔了他20多年，最后终于在《一个未经修饰的女人》一书中竭尽创造才能给了他一个了断。

1937年秋，在海明威离开美国二度去往西班牙前夕，他在纽约出席了《绅士》杂志出版商戴维·斯马特主办的宴会。戴维·斯马特想出版一本新杂志《视野》，计划于1938年初发行，阿诺德·金里奇任主编。根据斯马特的构思，《视野》要装帧豪华，尽管反共产主义，却要公开宣扬左派思想。金里奇的愿望是把它办成一本“知情者的杂志”，告诉人们世界政治的真实动态。让他们俩惊喜交加的是，海明威问能不能当一名编辑，在杂志尚未面世之前的通告中他确实也被列为编辑之一。但是，杂志的首刊撤销了这则通告。“厄内斯特·海明威自《视野》规划之初就去了西班牙。我们虽宣布他为编辑，但他从未参与杂志的编辑和杂志方针的制定。如果他对《视野》的看法与我们一致，我们愿意请他做编辑。如果不一致，他可以继续为杂志撰稿，除非他被解雇或自动放弃。”这是一种礼貌的说法，意思是海明威得知该杂志不会向共产主义伸出同志般的手时，马上改变主意，没让刊头登载他的名字。虽然他为《视野》写了整整一年稿，却丝毫没有向杂志所标榜的左派思想妥协。首刊上两幅反共漫画尤其令他难受，他在次年6月发表在该杂志的一篇文章里解释了原因。他争辩说：“不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就不可能是一本反法西斯的杂志。”而任何一个给别人扣赤色帽子并大肆迫害别人的左派编辑一定是个“傻瓜或无赖”。

海明威认为，《视野》最亲切的一面是其明眼人的格调。他在自己为杂志所写的文章中一再以戏剧性的口吻自称熟谙西班牙的情况，而其他评论西班牙的人却不知道这些情况。在一篇题为《阿拉贡叛变》的文章中，他虽未提到多斯·帕索斯的名字，却以屈尊的架式谈论到一位同胞作家“好心的天真”和“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态度”。他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模糊地暗示，人民阵线政府中已经有些政客叛变了，但他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报道这件尚无人知晓的事情。在后来一篇名为《内幕新解》的文章中，他再次不点名地讥笑多斯·帕索斯，这次是因为后者认为一场政治恐怖即将笼罩马德里。海明威对此不相信。他有“朋友在安全部”，跟他“很早就认识，信得过”，所以他可以告诉《视野》的读者，马德里“和欧洲其他任何首都一样，不存在恐怖”。

四

编发带有偏见的报道以及撰写电影剧本和高谈阔论并不是海明威获得左派信任的唯一方式。他的一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方向也同样让他那迅速膨胀的政治迷俱乐部感到满意。1937年10月15日，《有的和没有的》出版，斯克里布纳公司将它定性为长篇小说，其实该书由三个短篇构成，其中有两篇已发表过，一篇刊登在1934年4月的《世界主义者》上，另一篇刊登在1936年2月的《绅士》上。

头一篇是《过海记》，以第一人称形式叙述了游艇主人哈里·摩根生活的艰辛，当时他离开哈瓦那出来当钓鱼导游。小说字字句句粗鲁鄙俗，宣传的是作者的神话，甚至于对一次施虐狂般的谋杀的前前后后都津津乐道。因为哈里跟一个姓辛的中国双料骗子搅到一起后，为了对付“这位中国佬的”两面性，先是抢他的钱，后来赤手空拳把他打死。“我把他朝前按倒，两个大拇指深深地掐进了他的脖后梗，把他的脖子往后拧，终于喉管给巴嗒一声扭断了。别以为你就听不到脖子断裂的声音。”

第二篇是《买卖人的归来》，是由一篇报道“世纪飓风”的文章演变而来。1935年劳动节那天，这场飓风席卷了佛罗里达诸基列岛，别的不说，它摧毁了自然资源保护队的一个劳动营，淹死了很多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数是老兵。由于许多人都认为自然资源保护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所以纽约《新群众报》的共产党编辑们急于诋毁该队的活动。他们认为把这些老兵的死作为资本主义冷漠无情的标志就能够达到目的。有个叫约瑟夫·诺思的编辑想知道海明威愿不愿意写一篇在这方面起点作用的文章，因为在《非洲的青山》10月份正式出版前，在一本先期印刷出的书中，诺思读到有这样一个哩嗦的段落，听起来就像是橡树园的一位共和党人主人公已经腻味了改革，他痛斥新政为“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把戏。不切实际的混蛋花的钱都是别人要缴的税。我们城里每个人都停止工作去吃救济。打鱼的全都变成了木匠。与《圣经》完全颠倒了一个个儿”。诺思推想，也许一个嘲弄新政的人可以做共产党的帮手，而他很快就收到的海明威所写的一篇文章完全证实了他的推理。

文章《谁杀害了老兵》想要知道为什么老兵们在飓风季节被送到自然资源保护队去干活，每月只给少得可怜的45美元，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虽然海明威承认他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但他的无知并不妨碍他谴责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像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这样的富人、游艇主人和钓鱼者”在飓风季节是不会到佛罗里达诸基列岛的，这样他们的船和其他值钱的财产就不会遭到破坏。“但老兵，尤其是靠补助金生活的一类老兵不是财产。他们只是人，一事无成的人，他们能够失去的只有生命。”至于华盛顿那些具体下令让老兵们前往诸基列岛的政府官僚们，海明威说其实他们犯有杀人罪。

在《谁杀害了老兵》发表三个月后写的小说《买卖人的归来》中，海明威再次攻击了罗斯福政府的基层办事机构，嘲笑了一位自命不凡的官员要剥夺哈里·摩根的生计的决定。尽管禁酒令已经撤销，哈里和一个叫韦斯利的“黑鬼”仍在古巴和佛罗里达诸基列岛之间贩运私酒。故事开始前两人已被美国海关官员拘捕，不知后来怎么设法逃跑，却双双被开枪打中。故事一开始，两个受伤的酒贩子正接近基沃曼岛旁的水渠，哈里把一桶桶的酒扔进海里，这样海关人员就拿不到他们犯罪的证据。可是很不幸，他的行动被一条

包船里的两个人看到。其中一个弗雷德里克·哈里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美国三大要员之一”，用另一个叫威利斯的话说是“政府大员之一”。哈里森认定哈里是坏蛋，命令记下他的船号。包船船长抗议说，哈里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靠他养活。这位船长愤怒地质问：“基韦斯特人在这里给政府干活，一星期才挣6.5美元，你们他妈的吃的是谁知道吗？”然而这位华盛顿要员竟不为所动。故事的结尾表示，哈里必将很快受到法律制裁。

情节不连贯，人物刻画粗糙，缺少引人入胜的行动，对话拙劣，这就是小说《买卖人的归来》的主要特色。不过，海明威自称喜欢这篇小说，还立即开始创作第三部以哈里·摩根为主角的小说，结果因情绪极端低落而搁置一旁。但是到了1936年秋，他又在诺德基斯特牧场重新开始写作，到他前往西班牙的时候，《有的和没有的》的手稿基本完成。回国后，除了去纽约在作家大会上发言，找伊文斯一起撰写《西班牙大地》的解说词，其余时间他都在改稿。

回国后首次出门途中，海明威去珀金斯家看望了他。马克斯妻子路易丝对海明威横冲直撞、喧宾夺主的行为非常反感。她回忆道：“厄内斯特·海明威进门后，也不正眼看看马克斯就嚷道：‘电话呢？我要跟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谈谈。他是美国唯一值得一谈的人。’”但在与马克斯私下谈话时，他的态度变得比较犹豫。他承认对自己的新小说有些疑虑。他觉得不单独出版可能要好一点，并建议出书时凑上三篇好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的雪》和《世界之都》，最后一篇是一个有关马德里的公寓助理服务员帕科的悲剧故事。

乘飞机回家时，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这本书的封面标题是《有的和没有的》，或者是《不同的武器》，或者是《重返战争》，他非此即彼地提着建议。书中可以收集下列作品：那篇他很有可能叫作《哈里·摩根》的小说，以前曾提到的那三个短篇小说，《新群众报》上发表的关于谋杀老兵的文章，以及从马德里发回的一篇新闻报道和在全美作家大会上用过的发言稿。他相信，这本文集一定是本“大作”，珀金斯可以照此作一番宣传。

几经周折，珀金斯弄到一份发言稿。他尽量压制住自己对这篇稿子的轻视，写信给海明威说，在一本汇编文集里重印它不知是否明智。“我真的认为仅仅因为这是篇发言稿就把它收进来，的确会使这本书显得过于杂乱，或许吧。”

珀金斯很快就读完了《哈里·摩根》，他宣称“很好，很动人”。这篇小说毫无疑问唤起了他对佛罗里达诸基列岛和格尔夫河生活的鲜活的回忆。1929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和海明威去那儿钓鱼。但是，他向哈佛大学的老朋友沃尔多·皮尔斯却表示了对该书的深深的忧虑，他提到哈里·摩根时总是说“类型”，而不是说一个人。问题是，把这种看法告诉作者也没有用，因为珀金斯感到，这种时候海明威除了最温和的批评之外什么意见也不可能接受。因此，他没有把注意力对准这篇小说的不足之处，而是集中精力打消海明威把有关哈里·摩根的小说和其作品汇编成集的念头。1937年7月底，他终于成功地说服海明威单独出版这篇小说，书名就叫《有的和没有的》。只是到书已付印之后他才敢提出批评。那天，海明威到他那褐石建造的家里来喝一杯，这位编辑估计他看上去已经放松了。让他感到沮丧的是，海明威误解了他的信号。甚至当他解释他希望自己逆耳的话将来能对他有所帮助

时，海明威一拍咖啡桌，叫道：“见鬼，那你就让汤姆·沃尔夫写去吧！”

人们猜想，如果这位小说家鼓励他的编辑说真话，那么珀金斯一定会把火力对准第三部分。因为虽然前两部分也很糟，但最后一部分最为可悲，那首先是因为其中的性社会学如同连环画那么简单。由于从海关官员手里逃跑的时候受了枪伤，哈里只好切除右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作证后，他的船也被没收。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睾丸还在，这一点他妻子玛丽最清楚。无论是有一次她和哈里在床上谈话时，还是在一些莫利·布卢姆式的独白中，她都坦白地说她相信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跟她丈夫一样强壮，而哈里也认为她很性感，胖得性感。相反，小说中的有钱人性生活很成问题，比如布拉德利夫妇，海明威几乎完全是以格兰特和简·梅森为原型来塑造的，结果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律师们逼他在书的前面加上否认声明：“本书人物纯属虚构。”汤米·布拉德利阳痿，海伦·布拉德利是色情狂，所以汤米不介意他妻子找谁去满足饥渴，只要他能经常看到就行。但当她正跟作家理查德·戈登做爱，他面带微笑出现在她卧室门口的时候，戈登变得非常焦躁，连阳具也软了。海伦欲火中烧，浑身发抖，又因好事不成，气得打颤，她“啪”地给了她情人一耳光，打得他“两眼金星直冒”。

戈登的形象丑化的是多斯·帕索斯，可问题是这位小说家做了什么事，竟落得如此下场。事情的起因不是罗夫莱斯事件，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因为海明威在西班牙跟多斯·帕索斯吵架很久以前就创造了戈登这个人物。但如果政治不是祸根，那又是什么呢？一句话，是嫉妒。多斯·帕索斯之所以跟海明威发生冲突，跟死去的菲茨杰拉德一样，是因为他在文学上取得了一种海明威没有料到而又无法容忍的成就。在30年代初期，只有好心年长的海姆对多斯·帕索斯的作品给予的帮助和鼓励最多最大，不过他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时候总是一副傲慢的样子。所以，1932年初海明威刚读完《一九一九年》就对他说，你的新书“精彩极了”。多斯·帕索斯计划写三部曲，准备就叫《美国》，《一九一九年》是第二部。

这本书是《北纬四十二度》的四倍，棒极了。小说从头到尾都很好，你的文笔真绝，我怕你要遇到什么事了——这样你吃水果时一定得洗了、削皮。现在你得注意一件事。第三部可千万别出错，别去写什么十全十美的人物。不要写斯蒂芬·德迪勒斯，——一定要记住是布卢姆和布卢姆夫人救了乔伊斯，——正是这种十全十美可能毁了这个杂种，毁了这本书，使它成不了文学杰作。假如你是想写一位高尚的共产党人，那就记着这个杂种很有可能手淫，而且嫉妒成性。一定要把他们写成人，人，人，不要让他们变成符号。

然而三部曲中篇幅最长、雄心最大的一部终于写成后，海明威对作者的亲切态度就改变了。

事情是从1936年5月开始的。多斯·帕索斯夫妇和仍在为儿子鲍斯的死伤心不已的萨拉·墨菲同意跟海明威一起去哈瓦那度假，主要是在“皮拉尔”号游艇上钓鱼。但是，多斯·帕索斯随身带上了《赚大钱》的英国版的校样，这本书计划于9月出版，比美国版晚一个月。海明威当时和事后都抱怨他在

哈瓦那几乎没见到多斯·帕索斯，因为那段时间他完全埋头搞校样。早年他可以召唤多斯和其他密友跟他一起痛痛快快地玩，这份亲密现在却已无法重现。萨拉郁郁寡欢也扫了大家的兴，尤其是没有钓到多少鱼。回到纽约后，多斯·帕索斯设法弥补，给海明威送来了一箱香槟酒，写了一封多少表示歉意的信。“啊呀海姆，这次提议真难为你了，带一帮娘儿们去哈瓦那，不过这一趟确实对萨拉大有好处。”

海明威曾让多斯·帕索斯将多余的校样留一份给他，他看后写信给作者谈了自己的反应。“你校对时一定吃尽了苦头，书的篇幅跟《圣经》一样长，但我能看出你没法再删的原因。那些年（20年代）的时间看上去越是很短，写起来就越是要写很长。”海明威没有赞美他的书，多斯·帕索斯一定像脸上挨了一拳。尽管海明威在信的末尾为自己在哈瓦那妄自尊大的行为道歉，但这也不能带给他多少安慰。“准备很快出去好好玩玩，多锻炼一些，不带校样，老海姆也不发牢骚。……什么时候找机会想好好款待朋友们一番。”

《赚大钱》的出版赢得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赞扬，自《永别了，武器》之后，海明威还没有受到过这种礼遇。8月10日的《时代》周刊把事情搞得更糟，因为封面上刊登了一张多斯·帕索斯的照片，没带眼镜，抽着雪茄，显得十分粗犷。照片下面是作者的全名，约翰·罗德里戈·多斯·帕索斯，以及一句醒目的话：“写作只为被人诅咒，不想让人拯救。”从前有四位年长一些的作家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1927年是辛克莱·刘易斯，1931年是威拉·凯瑟，1933年是格特鲁德·斯泰因，1934年是厄普顿·辛克莱，但海明威这一辈的小说家还没有。然而荣登榜首的竟是多斯·帕索斯，而不是他海明威，这可太气人了！对抗性的诋毁油然而生，海明威终于在《有的和没有的》一系列新的章节中出了这口气。

哈里·摩根的确是条硬汉，而皮肤呈深褐色、头发浅灰、身体结实的戈登不过貌似强硬罢了，两人的区别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中就表现出来。第十八章写哈里，短得多的第十九章写戈登。第十八章开头写的是哈里目前有两样可观的东西：一条新船和一个口头协议；协议是跟四个古巴革命党人达成的，他把他们送回国就能拿到200美元。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抢劫了基韦斯特的一家银行，杀死了哈里的舱面水手，掏枪强占了甲板。哈里心里清楚，一旦他把他们送上岸，块头最大的古巴人，那个叫罗伯托的畜牲就会想办法干掉他。

船驶入格尔夫河，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渐渐黑下来。哈里站在船舵前，听那个最年轻、最可爱的革命党人埃米利奥讲他们怎样抢银行，讲他怎样跟罗伯托这样的人交往。“我们现在只是为打仗筹集资金，”少年真诚地说：“为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以后决不会使用的办法。而且现在用的人以后也不会要。但要达到目的必须不惜一切手段。俄国就是这么干的。斯大林在革命前就当过多年土匪。”哈里听了这番鬼话，心里说：“操他妈的革命。”为了保住脑袋，他突然行动，抓起藏在舱盖下面的汤普森冲锋枪，打死了这个少年理想主义者，心中没有丝毫愧疚。一旦他解决了那四个革命党后——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就站起来去关舱盖，不料很快被仅仅受了点伤的罗伯托一枪击中了肚子。一阵动物般的抽搐之后，身负重伤的哈里开枪还击，一阵猛扫，打死了大个子古巴人。但他的仇还没报完，后来他又拿出伤害头部的

那一套——这说明他的创造者对这种伤害越来越痴迷了，他用机枪顶着罗伯特托的头部扣动扳机。“……枪声就像棒打黄瓜的声音。”这时，哈里才将血迹斑斑的船掉过头来往回开。

第十九章的故事发生在基韦斯特，时间是次日上午。理查德·戈登去弗雷迪酒吧后骑车回家途中，见到一个粗壮的女人，眼睛哭得通红，原来金黄色的头发也变淡了。当然戈登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哈里·摩根的妻子，她之所以哭是因为还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多斯·帕索斯非常相信自己只要见谁一面就能对他作出估价，他讲故事采用的是全景式手法，每每谈到维护社会正义便满腔热情。这一切在海明威描写戈登扫视玛丽的过程中都进行了讥讽。戈登坐在和妻子海伦租的那间小屋的前厅，对着正在写的一篇反映丝厂罢工的小说讲道：

今天这一章，他将运用刚才回家途中见过的那个哭红眼睛的大个子女人。她丈夫晚上回家后讨厌她，讨厌她变粗俗了，长肥了，不喜欢她变淡的头发，过分肥大的乳房，也不高兴她不同情他当组织者所做的工作。他将把她跟那天晚上开会发言的犹太姑娘相比，那姑娘年纪轻，乳房坚挺，嘴唇丰满，身材小巧。这样写很好。的确好，可以写得很棒，而且也是实情。他一闪念间便窥见了那种女人的整个内心生活。

然而，海明威对多斯·帕索斯的讽刺只是在第二十章里他审视戈登的性生活时才变得充满恶意。这位作家不仅在布拉德利夫人身上不能坚挺，就连在妻子面前的性统治地位也丧失了。海伦厌恶他垂青“布拉德利老婆那条肮脏有钱的母狗”，因而她就让别的男人吻她。戈登表示反对时，她说他让她恶心。海明威决定把他们争吵主体的焦点集中在戈登坚持结婚不要孩子上面，这不能不算是他作家生涯中极其可耻的举动之一，因为他一定知道，多斯·帕索斯很想做父亲。但是，凯蒂又显然不能生育，所以直到1949年（凯蒂两年前死于车祸）多斯·帕索斯与伊丽莎白·霍尔德里奇结婚后，他才最终圆了他的父亲梦。

我们本来可以生孩子，我当然也想要，但我们养不起，海伦·戈登提醒丈夫。“但我们有钱去昂蒂布角游泳，去瑞士滑雪。我们有钱到基韦斯特这个地方来。”她意识到，自结婚以来，她一直都放弃了自己爱恋戈登所最想要的东西。“爱情曾经是最了不起的事，对不？”她说。

你曾是天才，我是你全部的生命。我曾是你的伴侣，你的小黑花。狗屁。爱情不过是又一个肮脏的谎言。爱情是通经药，让我再来月经，因为你怕有孩子。爱情是奎宁，奎宁，还是奎宁，直到我变成聋子。爱情是你带我去作肮脏的流产，是那种恐怖。爱情是我的五脏六腑全都弄得一团糟。爱情是一半导管加一半旋转的灌肠器。我知道我们的爱情。爱情总是挂在浴室门背后的上面，闻起来像来苏水儿。让爱情见鬼去吧。爱情是你让我才快活起来然后你就张着嘴呼呼睡去，而我躺在床上，一夜睡不着，还害怕做祷告，尽管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权利作祷告。爱情是你曾经教过我的所有的肮脏把戏，可

后来，海明威拼命四处散布多斯·帕索斯具有黑人血统的谣言，这是他决心采用卑鄙手段伤害多斯·帕索斯的另一个标

能是你从某本书中学到的。好啦。我和你到此为止，我和爱情到此为止。你这种让人捏鼻子的爱情。你这个作家。

在一本男女之间的谈话大部分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说里，显而易见海伦的话是情真意切的。海明威可能是在利用戈登夫妇的争吵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讥讽《时代》周刊形象粗犷的封面人物的男子气，但他所塑造的海伦的原型并不是多斯·帕索斯的妻子。跟无神论者凯蒂不同，海伦是天主教徒，因为戈登不肯和她在教堂结婚，她至今耿耿于怀。“你很清楚，这件事伤透了我那可怜的母亲的心，”她用责备的语气提醒他。她谈到节育器和流产时表现的厌恶背后也体现了她一个天主教徒的良知。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给保利娜的第二自我取名叫海伦；他在《有的和没有的》中用这个名字时想法也一样。

保利娜剖腹产生下格雷戈里后，医生警告她一定不要再怀孕。15年后，海明威告诉格雷戈里，这样他就必须进行不完全性交，他和保利娜解除婚约就是因为不完全性交。格雷戈里在《我的爸爸：个人回忆录》（1976）中说：“但任何傻子，不用说医生的儿子，都知道一个月里有好几个时期可以过好性生活而又不怕怀孕。”显然，格雷戈里没有想到去怀疑他的父亲——尽管他谈到不完全性交——有没有强迫他的母亲违背天主教的良知而去做《有的和没有的》里非常尖刻地提到的那些事。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有的和没有的》又一次表现了海明威能够在小说中放弃男性的观点，极力认同一个以实际生活中跟他吵过架的女人为原型的女人。1936年秋，他的第二次婚姻濒临崩溃，只要发现一个可以取代保利娜的女人，他就会开始考虑离开她。但是，在他正在创作的这部小说手稿中，他却支持一个离开丈夫的妻子，并且她离婚时的口头禅是“你这个作家”。

临终前，身负重伤的哈里·摩根喘着粗气，对着把他的船拖到基韦斯特码头的海岸警卫队的快艇艇长和副手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读来其实是有言外之意的。“一个人怎么干也干不出他妈的什么名堂。”实际上，嗜杀成性的哈里所表达的一直都是一种病态的人生观，可海明威却没有哪一次认为那是一种病态。相反，他让它沐浴着英雄之光。故事结尾时他笔锋一转，杀人犯变成了政治哲学家。哈里告诉别人的话里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年轻的埃米利奥主张革命理想主义者必须跟罗伯托那样的畜性和斯大林那样的土匪结成联盟，这是对的，因为行动一致才能取得胜利，目的正当往往就可以不择手段。

伯纳德·德沃托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书评最具说服力。“（《有的和没有的》）有关社会的论断和发现十分天真、零碎、随意，无法用来批判现存的社会秩序：相比较而言，就连《新群众报》三四年前吹捧的最简单的蓝色牛仔裤加统一的灰姑娘故事也显得深刻。”德沃托嘲讽地说。海明威赞美动物性这一点同样令他沮丧。在玛丽·摩根夸奖丈夫的身体活动时，德沃托指出，她是把这类活动比作动物的活动，而且小说的美体现在一条鲨鱼潜水吞噬一滩滩鲜血时身体长而弯曲。德沃托承认，海明威先生只要愿意，完全有权爱上鲨鱼；然而很难看出，他不得已地补充说，食人性跟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看看目前把海明威当作盟友的左派在采用他的结论时如何进行调整将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崇尚流血意识、神圣的

暴力，崇尚鲨鱼流线型的美至今一直是他们的政敌（即希特勒）的特色。”

其实，左派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评论家发现了这篇小说的可恶。在《南方评论》上，德尔莫尔·施瓦茨斥之为“愚蠢荒谬的书，给一位好作家丢脸，一本完全不该印刷的书”。刘易斯·克罗内贝格尔向《民族》的读者描述这本书“既不平衡，又不完整，远未达到专业水准”。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否定的看法，该书出版两年后埃德蒙·威尔逊所说的话却也没有任何夸张的含义。他厌恶地说：“左派……认为他这本最不可信的小说传达了一种新的启示。”

当时，《新共和》杂志的马尔科姆·考利刚刚在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供词中找到了罪证，他也在《有的和没有的》中看到了想要看的东西。必须承认，该小说缺乏“效果的统一和自信”，但也包括了海明威自创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分”。“有些场面，技巧的运用已达到最高境界，另一些场面又带他步入了新的感情领域。”至于哈里喘着粗气说他已意识到一个人单干成不了事的那一幕，真是“写得太漂亮了”。考利说，哈里的话，可能是海明威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灵活翻译。考利最后说，几年来，“文学界的鬣狗总在说海明威完蛋了，但他们被自己的鼻子所背叛，在没有腐臭的地方闻到了腐臭。就凭这本书，我敢说他的生涯才刚刚开始。”持相同意见的鉴赏家还有纽约评论界年仅22岁的奇才艾尔弗雷德·卡津，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大声宣告自己的快意，说《有的和没有的》让他看到海明威身上的新东西，因为书中所表现的作家能够“敞开心扉生气和咆哮，”他对富人的憎恨也大有可观。卡津承认，虽然该书整体上“很难说是那么回事”，但它仍然是“一位从讨厌的失败主义时尚中奋斗出来的真诚的艺术家的”作品。

五

如果说海明威正想跟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去分享他在西班牙的冒险，那么，1936年12月，在他第一次去战场之前的两个月，他在基韦斯特的醉汉乔伊酒吧找到了这位伴侣。正当他结帐准备回家时，走进来三位游客：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女郎。女郎一头浓密的齐肩茶金色秀发，高颧骨，嘴唇丰满，令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一眼。他顺着她那黑色棉纱裙的简单线条往下，看到她那颀长优美的金褐色双腿。他还注意到年轻女郎跟同伴说话时声音低而沙哑，带有东海岸的口音。第二天下午，他再次光顾酒吧时，那三个人又来了。向他们介绍自己并对他们施展魔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年轻女郎说她叫玛莎·盖尔霍恩。年纪大的妇女是她母亲，小伙子是她弟弟艾尔弗雷德，在医学院念书，现在正度假。

醉汉乔伊酒吧的黑人侍者斯金纳后来说，那天下午他看见盖尔霍恩小姐和海明威交谈，使他联想到美和兽性。这个比方既适用于玛莎，但更适用于穿着带香味的巴斯克短裤、腰间扎一根绳子的海明威。盖尔霍恩小姐虽然在瞬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金发碧眼的美女，但鼻子太高，还是个双下巴。她可算不上是另一个简·梅森，但她理解力强，人很聪明，而且才28岁（保利娜41岁，海明威37岁）。她对海明威说，她老家在圣路易斯，这可能让他想起了哈德莉。另外引起他共鸣的还有一点，她过世的父亲原来是医生，而他的父亲也是。

黑夜降临时，酒吧里的灯亮了，然而海明威依然没有打算告别这些新朋

友的意思。他跟他们讲了些基韦斯特的历史，并主动提出带他们游览小岛，参观适于游泳的场所。与此同时，在怀特海德大街，保利娜正摆上螯虾晚宴，陪客人查尔斯和洛林·汤普森夫妇共饮第二杯酒。最后，她请查尔斯去醉汉乔伊酒吧看看是什么事留在了她丈夫。在酒吧里，海明威让查尔斯告诉保利娜，他不回家吃晚饭了，但晚些时候他会去彭娜玫瑰园接她。查尔斯回来向保利娜作了汇报，保利娜马上想知道盖尔霍恩小姐长得什么样儿。得知她年轻又漂亮，保利娜十分沮丧。

六

玛莎跟哈德莉相似的另一特点，是她在布林·莫尔学院念过书，但没有毕业。因为，在快念完二年级时，有人请她为《新共和》杂志做临时工，她决定不放弃这个机会。她在那儿只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很快开始为纽约北部地区的一家报纸写稿。1929年底，她的地址转到了巴黎，在那里相继为《时尚》、合众社和圣路易斯《快邮报》工作。1933年夏天，她去卡普里岛写了一篇三个美国姑娘为寻找自己而辍学的小说。书名《疯狂的追求》是济慈式的，书的警句是借海明威的：“勇者无惧”。

1934年秋，她回到美国，与法国记者马奎斯·贝特朗·德·茹弗内尔几年来的联络就此中断。经过朋友圣路易斯《快邮报》驻华盛顿记者马奎斯·蔡尔兹的介绍，她进了哈里·霍普金斯的白宫办公厅。她建议哈里·霍普金斯聘请她担任联邦紧急救助署的一名调查员。她想通过采访的形式确定失业问题究竟尖锐到何种程度。霍普金斯派她到全国各地去采访，她发回的有关苦难和绝望的报告非常感人，所以霍普金斯把她引荐给埃莉诺·罗斯福。霍普金斯知道，罗斯福夫人对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另一位调查员洛雷纳·希科克的报道产生过极其浓厚的兴趣。玛莎的布林·莫尔作风打动了罗斯福夫人的心，正如她的报道一样。两人开始通信，由通信迅速发展成一种持久的友谊。

通过第一夫人，玛莎会见了总统。另一次，也是在白宫，她又被介绍给H.G.韦尔斯，当时他正周游全美，因为他计划为《柯里尔》杂志写几篇关于新政的文章。尽管他跟最后一个大情人莫拉·巴德伯格过从密切，但莫拉此时身在爱沙尼亚，而他发现这个年轻的盖尔霍恩小姐很有魅力。所以，韦尔斯为她的联邦紧急救济署报道集《我见到的问题》写了一篇表示欣赏的前言，并把书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帕特南，帕特南甚至没等莫罗出版该书的美国版就先行出了英国版。

罗斯福夫人在该书出版前已经收到一本样书。从1936年8月5日开始，连续一个星期，她在“我的生活”专栏中三次兴奋地提到玛莎。她在最长的一篇祝词中写道：“《我见到的问题》的美国版。”

将于本月23日出版。我无法向大家解释玛莎·盖尔霍恩怎么会写得这样好。她年轻漂亮，大学毕业（原文即如此），家庭条件好，做过一些女子青年联盟的工作，身着精美的巴黎服装，内藏机智与头脑。她了解很多人、很多事，还能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写出来。让我们对她的才华表示感谢，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她的论释以帮助我们相互理解。

各种书评同样予以赞美，并在各大杂志刊载。多萝西·汤普森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书评通篇溢美之辞。《星期六文学评论》封面刊登了作

者的照片，里面还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评介该书。刘易斯·甘尼特在其稿件辛迪加专栏里拿她的书与海明威的作品相比。（他问：“这个玛莎·盖尔霍恩是谁？她的文章像一团火。……海明威也写不出更地道的美语。厄内斯特·海明威也无法教玛莎·盖尔霍恩什么是简洁的语言。”）

成名后，她收到过几封请她演讲的请柬，另外还受到邀请于11月1日在海德公园与罗斯福夫妇共进午餐。到12月时，她已准备度假。由于她父亲年初已去世，父亲不在，一家人很难过好圣诞节，所以她向母亲和弟弟建议在迈阿密度假。一发现这座城市不合胃口，他们就乘公共汽车来到基韦斯特。在这里，玛莎很快就看中了名叫“醉汉乔伊”的酒吧。可以想象，那第一天下午她也看中了海明威。

一天，海明威驾车带盖尔霍恩一家周游小岛，看见保利娜在街上行走，就停车。虽然她很干脆地接受他的邀请上了车，跟他的新朋友见了面，但“情绪很不好”。玛莎多年后回忆说，海明威“脾气也很大”。不过玛莎强调说：“我从未想过她可能是嫉妒我。”然而，这种表示清白的抗议无法使人相信。在她母亲和弟弟走后，她选择在基韦斯特多呆一个星期，其真正的原因也不可能是她想多游游泳、多晒日光浴。

不过，就某一天晚上而言，她的回忆是可信的。那天，保利娜请她到怀特海德大街做客，她到他们家为海明威送行。她自己早已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她要报道西班牙内战。所以，他们谈话时经常提到怎样进入西班牙的问题，另外也谈了其他一些与两人的写作相关的问题。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的关系是同行。他是世界闻名的作家，而她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盖尔霍恩这个名字对《哈泼市场》和其他杂志的读者来说十分熟悉，稿件辛迪加书评专栏作家哈里·汉森刚刚将《我见到的问题》的作者誉为本年度文学界里的新发现。

元月10日或10日前后，玛莎离开基韦斯特前往圣路易斯。第二天，海明威告诉保利娜，他有急事要去纽约。在迈阿密，他赶上玛莎，建议在一家牛排馆与他的拳友汤姆·希尼共进晚餐。随后，他们乘坐同一列火车北上。与此同时，阿诺德·金里奇发给海明威的电报抵达基韦斯特。金里奇听人谣传说海明威病了，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保利娜的回电很幽默，令人叫绝：“小道消息毫无根据厄内斯特在迈阿密正去纽约健康嘛可谓好极了多谢挂念”。

七

在圣路易斯，玛莎给保利娜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让保利娜深深回忆起自己曾经写给哈德利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密苏里正下着冰冷的雨，但至少读一读她目前正在看的“厄内斯蒂诺”的文集是一种享受。想起保利娜在怀特海德大街款待她的情景也令她感到慰藉。“……如果我写日记，里面一定全是你的好话。”

收到这封可疑的信之前，保利娜就已被自己对婚姻的焦虑和痛苦折磨得不成样子，不靠打网球和游泳把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就无法入睡。各种援助拥护派的委员会的主席发给她丈夫的一封信使他的打算日益明朗。他要走向战争，撇下她一个人。她尽管努力克制，但还是无法在寄往纽约给他的信

中压抑自己的凄凉之情。“想跟你在一起，不想呆在这里，没人陪伴，只有大海。所有关于西班牙和救护车的电报让我感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就在门前不远的地方，我习惯性地只能在那儿看到狼和鹳。……好啦，再见啦，穿短裤的大人物，祝你好运，可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你的情况？”

他回到基韦斯特后，她建议陪他一起去西班牙，但这个想法立即被他否决。不过同时他在一封迟发的圣诞贺信中却特别感谢保利娜的父母把她嫁给了他。“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他发现，看玛莎一贯兴致勃勃的来信比跟郁郁寡欢的妻子交谈要愉快得多。但是，1937年2月15日，在他动身去欧洲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中，玛莎在谈到法英就西班牙内战所签订的不干涉协定时显得十分不安。也许这个协议会让她无法进入西班牙。“我的保护神，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然而她又笔锋急转，感叹道：“但我突然发现连好好想想的时间都没有。”为了防止她到纽约时他已经坐船离开，她想让他知道她的心愿，那就是他要在巴黎留言，把他要住的地方告诉她。她恳求道：“请不要消失。难道我们不是同一联盟的成员吗？海明斯坦，我非常地喜欢你。”

两星期后她到达纽约，发现海明威几天前确实是取道法国前往西班牙，同行的是埃文·希普曼和布鲁克林斗牛士悉尼·富兰克林。她到巴黎时他又走了，但多亏《柯里尔》杂志的凯尔·克赖顿给了她一封证实她是该杂志的特别记者的信——尽管她不是，她才能劝说法国当局发给了她在西班牙边境让军警放行所必须的证件。从入境后第二天开始，她取道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朝马德里迂回前进，终于在3月的倒数第二天在格兰维亚饭店的半地下餐厅赶上了海明威，这里是指定外国记者用餐的地方。“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孩子，”他大声说道，站起来紧紧地搂着她。“因为我猜定你做得好。”他一副妄自尊大的样子，并不是开玩笑。玛莎很惊讶，一刹那间也很恼火。

一天晚上，一枚民族主义者的炮弹击中了佛罗里达饭店的热水箱，泄漏的蒸汽开始进入较高楼层。塞夫顿·德尔默回忆道：“当人们都涌出卧室到地下室去躲藏的时候，厄内斯特和玛莎也在里面，各种关系都显露出来。”于是，海明威现在有了情妇成了饭店人人皆知的事实。白天，玛莎有时跟随海明威同伊文斯一起出去拍电影。但是她同样很喜欢——而海明威又绝对不喜欢——去市内各家医院看望伤员。她想花时间学西班牙语是导致他们午餐后分头行动的另一个因素。可一到晚上，这对情人便又聚在一块，在奇特科酒吧喝苏格兰威士忌或黄杜松子酒。

4月底，他们跟一位司机到四个主要的作战前线转了一个星期。如果有时离马德里太远，不能保证一夜之间返回佛罗里达饭店，他们就在野战指挥官的司令部里睡行军床，或者就睡在汽车里。在敌军的炮火下，玛莎表现得极其出色，主要是因为她已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但她冷静的举止也要归功于海明威的循循善诱。他教她识别不同的枪炮声以及什么时候必须立刻进行报道；他还不断地宽慰她，说她不仅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而且比大多数男人还勇敢。另外，他总跟她说要认真对待《柯里尔》所给予的凭证和信任，后来她终于坐下来为这家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只有炮弹在呼啸》的文章。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可能是要让她更加喜欢自己。但不管这是真是假，帮助她成长为一名合格战地记者的人无疑是他，可这份成就却令他抱憾终生。

花钱是保利娜拴住她男人的主要策略之一。1937年春，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让人在怀特海德大街的房产周围建了一堵高墙，以免丈夫将来会受到干扰；她还修了一个咸水游泳池，其豪华程度在迈阿密南部前所未闻。她满心希望过个宁静的夏天，或许厄内斯特会修改《有的和没有的》的手稿，在游泳池里放松放松，然后来到她的身边。

她的计划连成功的边也没沾上。他5月份回来后，径直离开家去了比米尼岛，然后就开始跑纽约。而且，玛莎·盖尔霍恩也为他制定了计划。5月28日，在白宫与罗斯福夫人共进午餐时，她建议第一夫人邀请海明威、约里斯·伊文斯和她把《西班牙大地》放给总统看。“玛莎·盖尔霍恩似乎是抱着深深的信念回来的，”第二天，罗斯福夫人对她的专栏读者说：“她深信西班牙人民是光荣的人民，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事对全世界都会很重要。”然而，那份信念固然很深，但玛莎自以为是赢家的信念更深。

7月8日，她在曼哈顿见到海明威和伊文斯。从那儿他们坐出租车去纽瓦克机场搭乘下午飞往华盛顿的班机。玛莎知道，罗斯福的白宫的饭菜会非常糟糕，便在起飞前先吃了三块三明治，可海明威认为她疯了，伊文斯也不管她怎么劝说就是不采取防范措施。不幸的是，对挨了饿的男人们来说她并没有疯。几乎一个月之后，海明威还在谈论他吃过的最差的一顿饭。在一封显示了细致观察力的书信里他对保利娜的母亲说：“我们喝了一碗雨水汤，然后吃了橡胶雏鸽，一道美味的干色拉和某位倾慕者送来的一块蛋糕。”罗斯福夫人给他的印象是“又高又大，很有魅力，简直是个聋子。别人跟她说话她完全一句没听见，但她很有魅力，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察觉”。海明威一向对男子女性化的迹象很警觉，他描述总统“具有哈佛人那种非凡的魅力、性无能和女性化，就像劳动部的大女部长，例如说……”（海明威根本不知道，总统威严的母亲一直到他快六岁的时候还让他穿女孩的裙子，留金黄色的长卷发。）

写信给普法伊弗夫人的人也随便地提到了玛莎·盖尔霍恩，说她就是那个为他和伊文斯被邀请去白宫“做安排的女孩”。海明威用相当长的篇幅把家里的情况告诉岳母。“保利娜和孩子们都很好。她看上去很可爱，比以前漂亮多了。孩子们很开心，您知道孩子们在热天是很难做到这样的。格雷戈里要和艾达（那个脾气坏的保姆）离开基韦斯特去锡拉丘兹，保利娜将带另外两个男孩去一家牧场。”而他自己则该回西班牙了。当然，他知道普法伊弗夫人强烈反对这个想法，理由是留在基韦斯特照看儿子是他的责任。他同意她的反对“很有道理”，但又说他曾答应西班牙的朋友们他要回到他们身边，不能说话不算话。而且，他补充说，即便呆在家里怕也教不了儿子多少东西。

他赞美保利娜的话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他越想早日决定结束第二次婚姻，就越是意识到保持这桩婚姻的好处。保利娜对他的写作一直都能提出精辟的意见，而且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他开心。她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况且，他对玛莎还满腹狐疑。由于她在个人习惯上非常讲究，而他却非常邋，他们在佛罗里达饭店的套房里便成了奇怪的一对。还有，她的野心也让人害怕。12年前，他在《春潮》中表示与保利娜结婚令他很担心。1937年秋，马德里周围的战斗暂时平静的时候，就在玛莎再次与他在佛罗里达饭店同床的时刻，他写了一个三幕剧，剧中他苦苦思索，终于意识到他可能又在开始犯一个婚姻错误。

《第五纵队》一年后由斯克里布纳公司收入《第五纵队和首辑四十九篇短篇小说》出版。在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经过长时间困难重重的预演，这部由比利·罗斯资助，经好莱坞编剧杰明·F.格拉泽尔为了舞台需要进行过自由改编，由弗朗肖·托恩（饰菲利普·罗林斯）、凯瑟琳·洛克（饰多萝西·布里奇斯）、勒诺尔·乌尔里克、李.J.科布和阿诺德·莫斯演出，由戏剧协会出品的戏剧终于在1940年3月搬到百老汇。剧评有誉有毁。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尽管《第五纵队》这出戏不很平稳，第二幕丝毫没有开始时的那份十足的坦诚，但它成功地作了一番陈述，这陈述总能打动人心，有时还意义深刻，甚至令人震惊。”纽约《邮报》的约翰·梅森·布朗觉得，虽然剧本“在大多数地方演得非常出色，很吸引人，但由于写得不够清楚，缺乏真实的关联，所以其优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公益》周刊的评论员格伦维尔·弗尔蒙将该剧置于海明威全部作品的大背景中，发现它的失败是海明威所特有的。“里面有……一个男记者和一位美国姑娘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故事很牵强，毫无新意，这证明海明威还没有学会写爱情戏。”

菲利普·罗林斯个头很大，笑起来很开心，走路像大猩猩，爱吃蒜多的三明治，爱喝奇科特酒吧的散装苏格兰威士忌。在佛罗里达饭店与他住一间套房的叫多萝西·布里奇斯。她是一个高个的漂亮的金发女郎，家在瓦瑟，双腿优美，说话时一副上流社会的口吻，穿一件银狐斗篷，把房间布置得像家一样，保持室内清洁整齐是她的癖好。她对战争的认识才稍有提高，就打算给《世界主义者》写作一篇文章，但不幸的是，她自己承认说，她对大学城只知道“那么一点点”，村舍对她是“一个不解之谜”，而乌塞拉斯和卡拉万切尔这些地方完全“令人感到害怕”。

在第二幕中，一个叫阿尼塔的摩尔人妓女（在百老汇上演时勒诺尔·乌尔里克演得很淫荡）决心警告菲利普不要纠缠多萝西。“听着，你现在别想在那个大美人身犯错误。”遗憾的是，菲利普承认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说：“恐怕我想这样，我正想犯一个天大的错误。”阿尼塔坚持反对说，那位大美人“不像你。跟你不是一类人”。菲利普不同意这些话，可他自己的话又更加显示出他的矛盾。“你对她不公平，阿尼塔。就算她懒惰，被宠坏了，相当愚蠢，成天就知道名和利，但她还是很漂亮、很友好、很有魅力，相当清白，而且很勇敢。”在第三幕里，菲利普的西班牙朋友马克斯同志问他多萝西的背景时，他几乎说不出她的好话。

她的背景跟所有带了些钱到欧洲来的美国姑娘一样。她们全都一个样。露营，上大学，家里有钱，现在或许多一些，或许少一些，往往是现在少一些，找男人，乱搞男女关系，流产，野心勃勃，最终结婚安家或者不结婚安家。有的开商店，或在商店干活，有的搞写作，还有的玩乐器，演戏，拍电影。她们有一个叫作青年女子联盟的玩意儿，我想是少女们在那儿忙乎。全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一个搞写作。还写得很好，只要她不太懒。你要是愿意，可以去问她。不过很没有意思，我可告诉你。

这番话使我们对剧终菲利普要与多萝西断绝关系的决定有所准备。他承认，她对他在床上很有用，但“你不该为这种商品付太高的价钱”。多萝西被他的拒绝惊呆了，但还不至于愣得话也不会说。她让他滚出去，也管他叫商品。

随着怒气的上升，她那青年女子联盟的挑剔劲“腾”地涌上来。“你是一个十足的邪恶的商品，”她嚷道：“再也别回来。到外面呆一夜。脏兮兮的，满脚是泥，乱七八糟。你这个可恶的商品。”

可以这么说，《第五纵队》应该是给玛莎·盖尔霍恩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即如果她想在与海明威的婚姻中找到长久的幸福实在希望渺茫。不过，他在西班牙对她的态度跟他在文学杜撰中对她的态度大相径庭，因而她以为菲利普·罗林斯并不是影射实际生活中的海明威或许也情有可原。再说，这出戏也不是通篇写一桩没有结果的风流韵事。作为安全部的一名反谍报人员，菲利普·罗林斯所做的出色工作一定更容易让玛莎想到，《第五纵队》不过是一部想象之作，与她本人无

这出戏的第二幕第一场发生在安全部总部一个摆设简陋、窗户破败的房间里。启幕时，菲利普正跟“一个薄嘴唇、鹰钩鼻、满脸正经的矮子”交谈。他叫安东尼诺，但多斯·帕索斯以及其他知情的读者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外貌跟那位共产党的反间谍头子佩佩·金塔尼利亚一致。菲利普与安东尼诺发生联系的意义在第三幕中成功地显露出来。菲利普和马克斯同志端掉了一个由六个法西斯分子控制的火炮据点——埃德蒙·威尔逊恰当地把这场戏称作是“具有一个男孩子的幻想的性质，连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都可能觉得太过分”——并俘虏了一个第五纵队队员，由于他对共和政府犯下了罪行，安东尼诺急于要处置他。然而，佩佩·金塔尼利亚自己对共和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在剧中却只字未提，连他在安德列斯·尼恩的失踪和摧毁波乌姆党领导层时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置一词，尽管远在海明威还没有为《第五纵队》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西班牙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就开始询问“尼恩在哪里？”作为爱情研究，海明威的戏是在痛苦地发现自我；而作为政治研究，这部戏是在自我放纵，自我欺骗。

九

1937年12月，海明威写完《第五纵队》后，与玛莎在巴塞罗那格调高雅的雄伟饭店共进圣诞晚餐，他每次到这座城市都住在这家饭店。饭后，他把她送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她从巴黎再去勒阿弗尔，然后坐船回家。她登上诺曼底号轮船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从信中有所保留的口吻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还没有准备向她求婚。“我希望你一切的一切都好，希望你的圣诞节过得像圣诞节。以后见，祝好，马蒂。”

他独自来到巴黎，发现保利娜已经在城里，住在爱丽舍公园饭店的顶层套房中。秋天里她悄悄地留了一头盖尔霍恩似的长发，她到欧洲来本打算在西班牙与丈夫不宣而聚，但在签证时出了问题。这对夫妇在爱丽舍公园饭店的重逢笼罩着愁云惨雾。保利娜非常恼火的是，海明威对自己依然不忠，她发誓总有一天要清算这笔帐，并威胁说要像简·梅森那样从套房的阳台上跳下去。他呢，也犯了肝病，疼得厉害，找到一个医生看病，医生给了他叶绿醇粉和利胆液，并警告他说如果想康复就必须彻底戒酒。一个以身体强健而自豪的人从此日渐衰弱，多年以后，他终于患上了可怕的疾病。

第二十章 “卖这书就像在地狱里卖冰镇的代墓里酒”

—

1938年整整一年，海明威让保利娜深受悬念的折磨。后来他又到马德里去住了两次，两次都是玛莎作陪。没有海明威，保利娜无法在基韦斯特住下去，那年秋天她在纽约租了一套公寓，这样离她妹妹吉尼就很近。每周，吉尼一定会安排姐姐参加许多午餐聚会和首场演出，周末就开车送她去康涅狄格州看望几个普法伊弗姨妈。姐儿俩单独在一起时，谈来谈去总离不开海明威。吉尼很早就对他不满，主张如果他要求离婚，保利娜应该要求从经济上解决问题，不能让他就这么一走了之。吉尼说得越多，保利娜就越伤心。

那年在基韦斯特过圣诞节的时候，海明威和保利娜在孩子们面前装出一副婚姻美满的样子。一个半月后，他们又重演了这一幕，因为海明威的母亲七年来第一次来到了他们家。表面上，她来佛罗里达是因为小女儿卡罗尔和丈夫孩子都住在莱克威尔士，其实格雷丝也很想看看孙子格雷戈里，她还从未见过他，而且她也没有彻底放弃同厄内斯特恢复母子亲情的希望。所以，12月时她忍气吞声地写信给他，问能不能去基韦斯特。尽管他立刻回信说当然可以，却在小岛另一边的卡萨马里纳给她租了间房，没有邀请她到怀特海德大街来住。

格雷丝虽已66岁，却仍然很有风度，她依旧穿一身上个时代的雪纺绸长装，更显得气度不凡。有一位在她这次来访时被介绍给她认识的妇女40年后记忆犹新地说：“她进屋的时候就像女王驾到一样。她口才很好，经常用一些玄妙的词语。……她放射出一股巨大的热情，让我感到像是一只奇异的天堂之鸟飞到了我们中间，相形之下我们都成了灰麻雀。”然而，年幼的帕特里克·海明威认为他祖母爱撒谎，因为她把有一天送给他的折刀说成是她爸爸的。当时帕特里克10岁，已经不小了，足以知道这把刀一定是祖母刚刚在一家廉价商店买到的，但是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足以让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孤单的老太婆设法在讨他喜欢的举动。

很有可能，格雷丝把她在圣诞节所写信中的某些事又跟海明威说了一遍。西班牙共和政府拥护派即将面临的失败使她黯然神伤，原因可能是她知道他们的事业对她儿子来说意义有多么重大。即便她收入不丰，她也一直在为那些照料西班牙战争孤儿的机构捐款。她当然万分感激厄内斯特最近寄给她一张巨额支票，但她觉得他的爱心比金钱宝贵得多。如果他能回温迪米尔去看看她，她会多么高兴啊！

他对母亲这些友好表示的答复一定是相当狠心，因为她走后很少再给他写信，即便写也未流露多大的热情。事实上，15个月后她寄来一封短笺，说她听说他在写一部新小说，希望里面能讲一次“具有建设性的话”。他回信时一副冰冷的口吻，这表明虽然他名气很大，她却又一次伤了他的自尊心。第二年秋天，《丧钟为谁而鸣》出版，里面就有一段是袒露他的情怀。罗伯特·乔丹用长长的篇幅追述了祖父的史密斯—韦森牌左轮手枪以及父亲用它自杀的经过，末了，他写了几句有关母亲的想法。他想，我父亲“是个胆小鬼，这在男人是最大的不幸。因为他如果不是胆小鬼，就应该响当地站在那个女人面前，不让她欺负。不知道他要是娶了别的女人我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事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想着，咧嘴一笑。或许她欺负他倒是为另一个人提供了一种所欠缺的东西”。

二

他母亲一离开基韦斯特，海明威便放下模范丈夫的伪装，乘“皮拉尔”号游艇去了古巴，也没带保利娜。离家前夕他给珀金斯写了封信，谈及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想出版一部新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最近在《绅士》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三篇短篇小说：《检举》、《蝴蝶与坦克》和《决战前夜》，以及第四个短篇小说，也就是下一期《世界主义者》即将发表的《他们都是不朽的》。他还想收录两篇很长的作品，不过尚未动笔，一篇是关于特鲁埃尔之战，另一篇是写波兰长矛轻骑兵袭击一道山关。再有一篇规划中的小说是讲一位以获利为目的的老渔夫只身一人在小船上与一条剑鱼搏斗四天四夜的故事，结果鱼被他拖到岸边后，却让鲨鱼给吃了。（关于特鲁埃尔战役和波兰长矛轻骑兵的故事均未写成，但12年后，在《老人与海》中，他再次讲述了老渔夫的传奇故事。）他说，他还很想写一部反映西班牙战争的长篇小说。他透露了写作计划之后，在信的末尾作了一番有趣的自白。他每天晚上都做撤军的恶梦。“很可怕的梦，梦境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清晰。这事很奇怪，因为就是在西班牙我也没做过有关（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恶梦。……昨晚我又梦到撤退，还他妈的特别清晰。我的想象一定出了毛病。因此我要不停地编故事，为的是使自己尽量不去记忆过去的事。”

在哈瓦那，在安博斯蒙多斯旅馆二楼的一间小屋里，放满了他的渔具和其他行李，报纸杂志也随处可见。在这里，他用两个星期完成了一篇战争小说《山梁下》。从他为北美报业联盟所写的新闻报道到《第五纵队》，海明威都在吹捧共产党的纪律。可《山梁下》表明他再也不希望在他们的纪律和野蛮之间划清界限。然而，这并不表示他新近又有了一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态度，而是他厌恶任何形式的政治的又一次显示。当失败开始笼罩共和政府拥护派的事业时，一位痛苦失望的作者在寻找政治替罪羊，也不管他们是白还是黑。

1939年3月1日，一个他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开始写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长篇小说。三个星期后，他完成了15000字。于是他回基韦斯特看望勃姆比。勃姆比15岁，体重165磅，是校足球队队员。4月中旬，他返回哈瓦那，重新刻苦写作。他说，如果他在薄暮时分打网球、游泳，那不过是让肠胃活动活动。晚上，他尽量控制自己只喝三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再吃晚饭。

玛莎来和海明威团聚时，本来是指望他说已经找到一个两人住的房子，但他不仅对安博斯蒙多斯旅馆一片狼藉的房间毫不在意，而且连一个好一些的地方也没去找。（“我爱干净其实与常人没什么不同，”玛莎多年后抱怨道：“我不过是和一般人一样爱干净罢了。……但厄内斯特脏得很，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不讲整洁的人之一。”）她自己找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则报纸租赁广告中提到一处15公顷的房地产，叫作“芬卡比亚农庄”，或者“观景庄”，位于山顶，可以俯视圣弗兰西斯科·德波勒村庄，离哈瓦那商业区15英里。这是一座仅一层的农舍，大大咧咧地躺在那儿，西班牙式结构，客厅有60英尺，想必经历过一段兴盛时期，但室内装饰现在已惨不忍睹。此外，室外游泳池里有一池子绿水，叫人怀疑不知从何而来；丛生的杂草也覆盖了四周围有篱笆的网球场。海明威认为这里乱七八糟，无可救药，每月只出100

美元的房租也不划算。但正是它的破败吸引了玛莎的想象力。她起初是自己掏钱，雇了一个油漆工、一个木工和两个花匠，开始重振观景庄。

一间专用工作室最终为海明威准备停当，不过，他总喜欢在自己宽大的卧室里写作，卧室四面白墙，铺黄色地板砖，窗户朝南或朝东，光线充足，微风阵阵。在这种宜人的环境里，字句奔腾而出，一周能写六七千字，新的人物、新的情节大量涌出，令人惊叹。尽管他5月份很有把握7月底就能写完，但7月来了又去、小说的结尾却无处可寻。

让他停止写作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度假。他在基韦斯特呆了没几天，刚把他的黑色别克车装上折篷——因为保利娜跟朋友去欧洲旅游，他们在怀特海德大街的家中除了一个看门的，什么人也没有——就开车送玛莎去圣路易斯看望她母亲。在8月的最后几天，他又一个人驱车来到怀俄明州，他跟三个儿子约好在诺德基斯特牧场见面。途中，他顺便拜访了哈德莉和保罗·莫勒，夫妇俩正在科迪附近的一个牧场钓鱼度假。几个星期以前，海明威从古巴写信给哈德莉，谈到困扰着他的自杀情绪，因为他与第二个妻子的婚姻接近破裂的时候，他想从第一个妻子那里得到安慰。他坦言道：“生活很复杂。我该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不能像你我声名显赫的先辈那样垂头丧气，不能像他们那样轻生。因为对孩子们的影响很不好。”

保利娜从欧洲写给他的信里充满了喜悦，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异常。她一到纽约，就打电话给呆在诺德基斯特牧场的海明威，说她想飞回去来个全家大团圆。不幸的是，她在飞机上患了感冒，到达牧场的时候，已经在发烧。海明威照顾她时态度非常冷淡，只给她端端清淡的饭菜，给她杯子里倒满黑麦威士忌酒，而让她最疼爱的孩子帕特里克担负起宽慰她的责任。她虽然有病在身，心绪不宁，但最后还是下床把装衣服的行李打开了。用帕特里克的说话，对她“打击最大”的是，她发现在最喜欢的衣服中间，有一件的蜡制钮扣融化到衣料里去了。于是她哭了，眼泪一流就流个不停。帕特里克怎么劝也没用。她那令人心神不宁的啜泣声使海明威无法集中注意力，他终于决定从此永远离开她。他安排好让人开车把保利娜和儿子们送回东部后，给在圣路易斯的玛莎挂了电话，叫她到蒙太拿比林斯机场去接他。

三

爱达荷州森瓦利饭店就是他和玛莎此行西出比林斯所要到达的目的地。自从1936年以来，埃夫里尔·哈里曼就致力于把森瓦利发展成一个全年的度假圣地，以增加他们家历史最长的主要产业即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客流量。哈里曼的广告商史蒂夫·汉纳根想出一个主意，如果能诱使一批电影明星和其他一些包括海明威在内的名流来使用这里的设施，那么饭店很快就可以名声大振。于是，当海明威打电话说他和玛莎要来时，他们就给他俩分了一个二楼拐角的豪华套房，两间卧室都有壁炉，还可观赏秀美的山色。海明威知道，这不会收他们一分钱。

玛莎以前从未摸过枪，怎么也不会迷上流血运动。但是，跟她前面的保利娜和哈德莉一样，她是应该分享心上人的娱乐兴趣的。而森瓦利栖息着大量山鹑、绿头鸭和哀鸽，是猎手的天堂。由于海明威教导有方，她的射击技术突飞猛进。

表面上她幸福无比。然而，她宣布 11 月份要离开森瓦利去为《柯里尔》报道俄芬战争。快到她动身的日子时，海明威逢人便抱怨自己要被抛弃。“严冬就要来了，老婆却要走，老印第安人该怎么办？”他问森瓦利摄影记者的妻子蒂莉·阿诺德。但玛莎离开的前夜，他还是超脱憎恨为她饯行，并举杯祝贺她的勇气。玛莎准备走的时候对蒂莉说：“注意一下那个大土老冒儿，……你们出门进城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刮刮脸，收拾收拾干净。”这番叮嘱貌似热情，其实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因为海明威不爱整洁正迅速成为玛莎的一大难题。“那头猪”是她强加给他的爱称，说明她相当恼怒。

她走后，他将他们在饭店的套间命名为“海明斯坦受管制被抛弃之处”，但晚上跟饭店的人打扑克牌、掷骰子赌博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安慰；他劝马克斯·珀金斯——他卷入了与托马斯·沃尔夫的房地产相关的税收问题——来住个把星期，马克斯也没来。离开哈德莉之后，他十分想念在美旅居的保利娜。离开保利娜，他也同样深切地思念玛莎。在写给保利娜母亲的一封信中，他说他过着“非常孤独的日子”，尽管他没有提到玛莎不在是他孤独的原因。相反，他告诉普法伊弗夫人，她女儿吉尼所散布的恶意的谣言要为他与保利娜的婚姻破裂负责。“弗吉尼亚关于我的生活和行为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他向她保证：“但她的宣传足以在适当的时候破坏我的家庭。”回信时普法伊弗夫人说得很简单：“今年的圣诞节我过得最伤心，一个破碎的家庭就是一个悲剧，家里有了孩子尤其如此。”他回古巴时，给珀金斯寄去新小说的前八页以及故事中间的 30 页。这位编辑的回电正是他所期望的：印象特好停寄开篇几页很美第八章尤佳即寄合同。

玛莎与他团聚时，他见到她一阵狂喜，又满腹的责备。1940 年元月 19 日，他起草了一份嘲弄性的合同让她签字，合同精确地揭示了他的感受。他一边深深地依赖于她，一边又想控制她。

我，在下面署名的玛莎夫人，或胖猪夫人……特此保证并承诺决不以任何形式虐待我现在和将来的丈夫。……我知道一位非常出色的、敏感的作家是不能在两个月零 16 天里被撇下不管的，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困难和不可想象的事情，不管他愿意与否，都会发生在他身上。我承认我……是造成他在一个人生活的这段长时间里心神不宁的主要原因。……我同时代表证人宣布，我不会不让他工作，相反，他和他的工作在我一生中至关重要。……因此我深感遗憾并将努力……弥补他所经历的不幸，同时努力保护他将来免于同样的不幸。以上陈述是我用爱心，在神志最为清醒时，完全出于自愿所做出的。玛莎·盖尔霍恩。证人：R.R.拉比特法官，P.O.（怒火中烧的）猪法官。

性生活不大协调也是他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正如多年后玛莎向《海明威的女人们》的作者伯尼斯·克尔特所承认的那样，两个恋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之一，所谓“我用我的肉体崇拜你”，对于玛莎来说始终不存在。

2 月，海明威就开始留头发。他给朋友的解释是，他决定写完小说再理发，以免干扰泉涌般的创作灵感。其实，他把头发留长是想掩盖头发的日渐稀疏。另外，他可能是在想法子为难玛莎，她老是巴不得他把头理得整整齐齐

齐。因为在 1940 年的头几个月，她还是那副自主独立的样子，虽然海明威跟两个爱唠叨的妻子生活了 20 年，但还是适应不了。比如在政治上，他们分歧很大，主要是因为她觉得这个话题很有吸引力，而他则不以为然。她平均一天两次滔滔不绝地表示对税收或其他什么话题的愤慨。海明威叫她不要再说话时，用了些不敬的词语，她一气之下出了屋，坐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

一个月后，她带着她母亲回来了，于是又出了一件尴尬事。埃德娜·盖尔霍恩是公认的好脾气，玛莎的第二个、也是她最不满意的丈夫 T.S. 马修斯在 1985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评论他的前岳母：“如果世界上还有天使，她就是一个。”尽管海明威也喜欢埃德娜，但有一天他忘记了陪她和玛莎去一个地方的计划，自己到佛罗里迪塔酒吧和一些游客喝了几杯。他没有在说好碰头的地方露面，玛莎确信自己知道能在哪里找到他。她狂风一般冲入佛罗里迪塔酒吧，痛骂他粗心大意，要他向埃德娜道歉。她对他说：“你可以让我白等，但不能这样对我妈。”一顿臭骂搞得他十分狼狈，灰溜溜地跟在她后面出了酒吧。

四

1940 年 4 月 21 日，海明威随信寄出了新小说手稿的前 512 页，信中他给珀金斯提供了一则关于标题的有趣建议：

《丧钟为谁而鸣》

长篇小说

作者 海明威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的一块，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如果大海冲走了一块泥土，欧洲就小了一点，那情形犹如大海冲走了一个海角，犹如大海冲走了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死一个人，我就少一部

分，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让人来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约翰·邓恩

他补充道，这个标题具有一个标题所必须具有的魔力，珀金斯回电表示同意：令人倾倒认为（本书）绝对精彩有新意……标题漂亮祝贺你。

三个月后全书写成。7 月 13 日，他还在修改小说的结尾时，跟珀金斯说一周后将亲自带书稿去纽约。同时，他情不自禁地告诉他的编辑，最后一章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炸桥时和炸桥后的部分简直精彩得令人受不了。我写完了一个部分——算了吧，不说了——你自己看去。我浑身乏力，失去知觉，好像那些事都发生在我身上。不管怎样，这本书是没治了。”

从迈阿密往北，一路上他都在光线暗淡、没有空调的特等客车车厢里校对打字原稿。当他步履沉重地登上纽约市宾州车站的台阶时，他感到自己像是“加工厂里的一条瞎眼沙丁鱼”。在巴克利饭店一间带有两个双人床的套房里安顿下来后，他就开始用最快的速度边修改边派信使把一批批打字稿送往斯克里布纳公司。这一过程比预料的多了几天，因为他想花时间跟他请来同住的古斯塔沃·杜兰谈一谈。他首次认识杜兰是在 20 年代，那时，这位年轻的西班牙人来到巴黎的日子还不长，目的是完成他的音乐学业并开始作曲家生涯。但是，1937 年他们在马德里再次相遇时，杜兰成了海明威眼中的“大英雄”。因为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这位作曲家具有军事天才。一开始，他

只是预备部队的少尉，但很快提升为第六十九师师长。就在佛朗哥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逃到伦敦，与一位名叫邦特·克朗普顿的美国女继承人结婚后又逃亡美国。从巴克利饭店的另一张双人床的有利位置，杜兰通过半睁半闭的眼睛观察到海明威起得很早，在套房里光着脚踏着脚尖走路，以免打扰他的客人。早餐时，他喝一杯提神醒脑的茶兼杜松子酒。邀请杜兰来此，部分原因是海明威想让杜兰核实他的西班牙语的英译文，但更主要是因为他急于知道杜兰对小说的看法，所以海明威请他看打字稿。尽管杜兰看了对话很不自在，而且发现故事的一些情节不大可信，但总体上他还是欣赏这部小说的。

小说的部分校样是8月底在观景庄看的，其余部分9月初在森瓦利看完。这时，除了玛莎和海明威本人，他的三个儿子也成了埃夫里尔·哈里曼不收分文的客人，而九岁的格雷戈里的费用——如单人双向飞碟射击课，单人溜冰课，晚餐吃牛排、青蛙腿或珠鸡的费用——令饭店的管帐员直蹙眉。当多萝西·帕克与丈夫、加里·库珀与妻子也来到饭店时，一向善于交际的海明威感到身边的人太多，应付不过来，尽管他很喜欢库珀。这位好莱坞影星曾在1932年由派拉蒙电影公司制作的根据《永别了，武器》拍摄的电影（海伦·海斯饰凯瑟琳·巴克利）里扮演弗雷德里克·亨利，海明威对他说，如果哪家好莱坞电影公司把《丧钟为谁而鸣》拍成电影的话，他认为他要是演罗伯特·乔丹一定会很出色。

他本来希望10月中旬再次结婚，但他在与保利娜苦苦谈判以求达成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时所耗费的时间比他所料想的要长，其主要原因是保利娜表现出惊人的顽固。那一年他一直在抱怨她试图以种种要求整垮他。的确，他曾埋怨要每个月给她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生活费，他认为她并不需要这笔钱。然而，对保利娜来说，这些钱代表着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残忍而她的苦难又有多么深重。她征求她叔叔格斯的意见后，最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如果她什么时候想卖掉基韦斯特的房子，卖房子的钱她与海明威六四分。鉴于这栋房子本来就是格斯叔叔先买下的，大部分装修费也是普法伊弗掏的钱，这个建议还是十分慷慨的。但是，尽管海明威最后答应了这项条件，却异常不满。他开始跟朋友说保利娜不仅狠狠杀了他一笔，而且迫使他放弃了在爱达荷州凯彻姆拥有（其实他并没有）的一些值钱的房地产，以及很大一笔稿费（又是谎言）。

11月4日，献给玛莎·盖尔霍恩的《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后两星期，保利娜在迈阿密被准予离婚，理由是遭到遗弃。两个半星期后，在怀俄明州夏延市，海明威和玛莎当着一位治安法官的面结了婚。

五

黑色的护封上印着红、白、蓝、灰四色，封面底部是一幅劳埃德·阿诺德在森瓦利拍摄的海明威的照片。除了“本月新书俱乐部”印行的13.5万册之外，首印即达75000册。12月底，书商已售出18.9万册；到1941年4月1日，卖出49.1万册。正如海明威在用电报发给哈德莉的一封信中所说：“卖这书就像在地狱里卖冰镇的代基里酒。”1943年底，累计销售量高达78.5万册，外加英国销售的10万册，使该书成为自《飘》以来美国最畅销的一部小说。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年初，派拉蒙电影公司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由多个种族的演员联袂演出，加里·库珀饰罗伯特·乔丹，英格丽·鲍曼饰玛丽亚，卡蒂纳·帕克西诺饰皮拉尔，阿基姆·塔米罗夫饰巴勃罗，影

片哄动一时，非常叫座。

关于这部小说的最初评论自然促进了小说的销售。J.唐纳德·亚当斯在《纽约时报书评》的首页贺词中，称之为海明威所写的最好、最全面、最深刻、最真实的书。亚当斯说，罗伯特·乔丹和玛丽亚的爱情场面不仅胜于《永别了，武器》中的可比场景，而且在美国小说中也是最好的。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也喜欢这些爱情场面。他力赞这些场面写得“完美”。“完美的爱情场面在现代文学中很少见。任何了解自己专长的作家写起性来都驾轻就熟，但只有艺术家才能把爱情写得这么美，这么真。”按照《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评论员霍华德·芒福德·琼斯的专业眼光看来，《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所写的最精美、最丰富的小说……（玛丽亚）被以轻柔的笔触表现出来——对于一个思想比较纯正、很共和派的唐璜来说是一个新的海蒂。……拉·皮拉尔是幻想破灭的游击队首领巴勃罗的妻子，在这个丰满的福斯塔夫似的人物身上，海明威创造了一个山峰似的人物。……在叙述和描写部分，我认为（他）达到了比其他小说更为广泛的效果……我认为至少可以这么说，《丧钟为谁而鸣》可以看作是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名利场》或《汤姆叔叔的小屋》。”埃德蒙·威尔逊在《新共和》杂志上的评价值得注意。他说：“那个好猎手，那个海滨的超人，那个佛罗里达饭店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他们那压抑的、狂热的态度和幻梦就像酒精一般蒸发了。艺术家海明威又跟我们在了一起了，好似老朋友又回来了。”对该书的“题材感”大加赞赏之后，威尔逊接着又谈到小说的弱点。小说结构“时瘳时鼓”，乔丹与玛丽亚的爱情故事缺乏“海明威在其他某些小说里描写的爱情故事中那种真正的、炽热的激情”。然而，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威尔逊的语气再肯定不过了。“（海明威）经过一段时间的艺术上的消沉之后又返回到他的艺术，并为其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范畴；在一个普遍茫然恐慌的时代，他将刚刚过去的事情戏剧化了，但不是从偏袒的新闻角度出发，而是从使得人类既团结友爱又相互倾轧的共同本能着眼，这一点令人释然，它证明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健全的。”

今天看来，这些评论中更为有趣的一点是，没有哪一篇提到那个爱情故事的离奇，也没有哪一篇谈到书中对自我毁灭的痴迷。作为艺术家的海明威可能是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回来了，但海明威的神话却依然蒙蔽着读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渗透在他作品中的最隐秘的本能。

六

1938年4月，海明威前往巴塞罗那北部的海滨城市马塔罗，此行的最大特色是碰到了一个叫玛丽亚的护士。他本来是想在那儿的一家医院花上一个小时左右安慰一位叫弗雷德·凯勒的朋友，这位朋友在亚伯拉罕·林肯纵队里作战时臀部受伤，正在休养。但是，他跟玛丽亚的谈话却更为有趣。她是一位文静勤劳的年轻女性，是“恬静之魂”，只是她还记得战争初期被一帮民族主义士兵轮奸的那可怕一幕。她痛苦的经历以及温顺的个性，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在刻画玛丽亚时给予了一定的表现。但在本质上，玛丽亚的反面原型就是海明威将这部小说献给她的那个女人，当然相貌除外。

她的双腿在开叉的裤脚处显得修长而干净，牙齿洁白，皮肤和眼睛呈同样的金黄茶褐色，高高的颧骨，快活的双眼，一张双唇丰满的嘴，头发则是“被太阳烤焦的稻田的金褐色”。玛丽亚与玛莎·盖尔霍恩唯一重要的区别

在于，玛丽亚的头发“满头都剪得很短，比海狸皮上的毛长不了多少”。为了解释她的头发像个男孩的原因，她说，她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法西斯分子捉拿后，被强行剃了光头。从那时起都三个月了，头上只长出来一部分头发。海狸般的短发正好配上她对罗伯特·乔丹动物般的痴情，而动物般的痴情又恰好配上他对她的昵称“兔子”。

乔丹是蒙太拿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教师，在拥护派指挥员中间以精通爆破和敬业精神而著称。小说一开始，他正在察看地形，他的工作是炸毁一帮拥护派游击队控制下的塞哥维亚省塞拉某处的一座峡谷上的钢桥。为了配合炸桥，他的朋友戈尔兹将军（他的光头表明他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海明威的朋友“沃尔特”将军）统率的拥护派军队将发动突然袭击。这是一项即便在最佳条件下也非常难以进行的危险工作，后来则变得更加危险，因为一来游击队首领巴勃罗强烈反对，二来敌人以奸诈的手段掌握了发动进攻的地点和时间。所有这些焦心的难题似乎都必须在不足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得到解决。但是每天晚上，有时是白天，乔丹都跟玛丽亚在一起，开始是因为性，但后来便超出了性。

为了让他的编辑在审查时可以放心，海明威在写乔丹抚摸玛丽亚的头发时，用他喉咙的膨胀感和变粗感来代替裤裆部位的变化。

“来吧。”罗伯特说着，伸手去抚摸她的头顶。他一天都想做这件事，现在他做了，感到喉咙在膨胀。她在他手下动了动，抬头冲他一笑，他感到她那剪过的浓密的头发粗糙而柔软，在手指间波动。然后他把手放在她脖子上，然后又把手放下来。

“再来嘛！”她说：“我希望你整天都这样。”“以后吧。”罗伯特·乔丹说，声音有点沙哑。

这件事过了很久之后，小说又写到星光下在他的睡袋里：

“我想过你的头发，”他说：“也想过可以用它做什么。你看现在你头上到处都长满了跟动物一样长的头发，摸一摸很舒服，我很喜欢，头发很美，我用手一摸，它就像麦田一样起伏。”

“你用手摸啊。”

他用手去摸，把手放在那儿，继续对着她的喉咙说话，同时感到自己的喉咙在膨胀。“但在马德里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去理发店，他们会把你头发的两边和后面剪得整整齐齐，跟剪我的头发一样，那样头发长起来的时候在城里就显得好看一些。”

“那我就跟你相像了，”她说，搂紧他。“那以后我决不想再动它。”

事实上，一头短发的玛丽亚和一头乱发的乔丹（“我不喜欢理发，”他解释说。）已经很相像了。皮拉尔很早就这样说过他们：“看长相你们像兄妹。”玛丽亚答道：“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我就是我。这下可清楚了。”乔丹也喜欢认为他跟玛丽亚有联系。“玛丽亚是我的真爱，我的妻子。以前我

“兔子”也是西班牙语中描述女性性器官的较为粗俗的说法之一。海明威刻意没有对马克斯·珀金斯解释这一点。

从未有过真爱，从未有过妻子；她也是我妹妹，以前我从未有过妹妹；她也是我女儿，可将来我决不会有女儿。”在他的睡袋里做爱的那些个晚上，这两个长得相像、形同手足的恋人强烈地感到自己就是对方的一部分，似乎双方已经交融了（“我是你，你是我，这个就是那个”），倘若他们愿意也可以交换身份（“如果你什么时候希望改变，我将乐于改变”）。

某种形式的不协调或许破坏过海明威和玛莎的性生活，但在他小说的梦幻世界里起主宰作用的却是性爱的协调。尽管在炸桥前两人在一起的最后那个晚上，由于法西斯分子蹂躏后所遗留的剧痛，玛丽亚不能让乔丹插入，可他也只是说了几句节欲美德之类的话骗了骗自己，因为她愿意以另外某种形式让他高兴的愿望最终带给他一种“被接受的喜悦”。

但是，如果说性生活的美满强化了两个恋人“我的肉就是你的肉、我的血就是你的血”的幻想，那么他们相似的家庭悲剧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我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共和党人，”玛丽亚对乔丹说。那是在第一个夜晚。晚饭后，他在游击队的洞穴里看着她帮皮拉尔洗碗抹碗。“就因为这个他们枪毙了他，”她补充道。“我父亲也当了一辈子的共和党人，”乔丹答道。但不同的是，“（我父亲）开枪自杀了。”皮拉尔问他父亲是不是为了避免遭受折磨才自杀的，乔丹就顺着嘴说道：“是为了避免遭受折磨。”玛丽亚没听出他回答时的调侃语气，眼泪汪汪地看着他说：“我父亲弄不到武器。啊，我真高兴你父亲运气好，弄到了武器。”“是啊，是很走运。”乔丹说话时又是一副调侃的口吻。“那你和我，我们两人一样，”玛丽亚说。

第二天，玛丽亚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自杀这事变得更为明显。她说，如果乔丹教她用手枪射击，那么“假如对方受伤而必须避免被捕的话，我们谁都可以打死对方和他自己或她自己。”她还主动给他看了藏在胸前口袋皮套里的精美的单面剃刀刀片。她断然说道：“我总带着它。皮拉尔说必须在耳朵下面这里划开，朝这儿拉。”她说着，用手指示意给他看。“她说这儿有根大动脉，用刀片从这儿划拉准错不了。她还说，这样不疼，只需在耳朵下面按紧往下划拉。她说这很容易，你一划拉他们就没办法。”跟乔丹在睡袋里最后一次约会时，她承认说她几个月前就很渴望去死。她父亲被处死的那天，母亲也被法西斯分子枪杀，玛丽亚真希望他们也把她杀了算了。

在他的女主人公身上，海明威任意挥洒他对死的幻想。但在处理明显带有自传性质的男主人公时，他却相当严谨地把握着自己，只是到了小说最后三分之一时才逐渐放松。自然，小说很早就点明乔丹在苦苦思索父亲的自杀，后来他又通过一段内心独白更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谁都有权这样做，他想。但这不是件好事。我能理解，但不赞同。‘懦弱’就是那个词。但你真地理解吗？是的，我理解但是……是的，但是……你要做这种事就必须满脑子都是你自己。……我永远也忘不了头一次知道他是个懦夫时让我有多恶心。说下去，用英语说。懦夫。”这一段尽管写得很真实，但仅仅是开始暗示乔丹是在用父亲的死作为自己跟自己讨论自杀的一种途径。类似的自我隐瞒在他与玛丽亚的谈话中也有所表现。于是，当她演示完她知道怎样割断颈动脉自杀后，乔丹对她这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反应很小。“于是她就

海明威独特的童年生活对他的文学想象产生了无尽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个情景中得到进一步证实。醉醺醺的巴勃罗得知罗伯特·乔丹来自美国，便问道：“那里的男人是不是也像女人一样穿裙子？”尽管乔丹向他保证说他所指的一定是苏格兰，巴勃罗却坚持说：“谁都知道你们是穿裙子的。”

没完没了他说那件事，他想，好像这件安排妥当的事情肯定会发生似的。”然而最惊人的，是皮拉尔在讲到拥护派对一座山城的法西斯头子们进行屠杀时他所作出的反应，确切地说，他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在几个方面，皮拉尔是格雷丝·海明威的吉普赛式翻版，尤其是她对丈夫巴勃罗的控制、她说话时就像唱歌剧似的腔调以及她对性模糊的玛丽亚的喜爱，这种喜爱非常强烈，她被迫否认这种喜爱来源于性变态。

皮拉尔回忆说，有 20 个人被迫在手执连枷的两排人之间接受夹道痛打，打死以后将尸体从悬崖顶端扔进下面的河里。市长唐·贝尼托·加西亚是第一个。一个同情拥护派的人面部抽搐，咬着嘴唇，握连枷的手都白了。他“使劲打了一下，正打在唐·贝尼托头部一侧，唐·贝尼托看了看他，那人又是一下，叫道：‘来吧，你这个王八蛋。’这一下击中了唐·贝尼托的面部，他抬手护脸，他们直把他打得趴在地下……”唐·费德里科·冈萨雷斯，一位磨粉饲料商店店主，是第二个。他又高又瘦，头发梳到头顶覆盖在光秃部位（像海明威一样？），他很害怕，双腿都不能支撑着走过夹道，就站在那儿，双眼上翻望着天，双手上举像要把天抓住。一个农民一棍子“狠狠打在他脑袋边上”，唐·费德里科“垂手捂住头顶光秃的部分，他低头用手护着的时候，盖在光秃部位的细长头发便从指缝里滑出来。……他快步跑过夹道，连枷劈里啪啦落在背上和肩上，直到他倒下。排尾的人将他抬起来，一使劲扔下悬崖。”就这样一个接一个，20 个法西斯分子全死了。

《丧钟为谁而鸣》里有关屠杀这一章，是对发生在龙达的一起真实屠杀事件的再创造。但是，皮拉尔所述故事的震慑效果并非出自什么历史记载，而是源于海明威对头部受伤的特别兴趣。不过，如果说罗伯特·乔丹也有这份嗜好，那是被精心隐藏起来了。我们所得知的是，在皮拉尔讲完后，他的想法具有一种文学性：“那个女人要是能写作该有多好。他要试着写出来，如果他运气好，能记住，就能照她说的写下来。天哪，她可真能讲故事。”

直到小说的高潮阶段、主人公才得以探讨困扰海明威多年的问题。如果准备死，让人打死是不是比自杀好一些呢？桥炸毁后，乔丹和游击队员似乎在成功地撤离，以避免前进的法西斯军队。但谁知他骑的大灰马从他身上翻滚了过去，压断了他的左盆骨。包括玛丽亚在内的游击队员都不能管他，必须继续撤退。他一个人躺在树林里，左手弯曲部位放着把冲锋枪，疼得几乎昏过去。他意识到，如果他真地昏过去，法西斯会抓住他审问游击队的去向，可能会用折磨的方式逼他说。所以自然而然他要考虑自杀。唯一体面的做法是，设法保持清醒，等候法西斯骑兵队的出现，他向他们开火，这样就能迫使他们把自己打死。

乔丹的运气，海明威声明，非常好。他刚想好要尽量保持清醒等到法西斯骑兵队的出现，突然一对骑兵冲出林子，为首的是一名上校。现在，乔丹感到“与万物已浑然一体”。他长时间仔细观赏着天上一朵朵大大的白云，用手掌抚摸着身边的松针和身前的松树树干及树皮。松树林最外面那些树与草地的绿草坡交接处洒满阳光，他要等上校到了那儿再开火。“他能感觉到心脏正贴着树林的那层松针在跳动。”

七

共产党的评论家之所以对这本书十分恼火，不仅仅是因为有关屠杀的那章把法西斯描写成了受害者。《工人日报》专事诽谤的文人麦克·戈尔德知

道，“肢解”这个词一直是海明威的重要词语，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说：《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被阶级自大狂“肢解”了。戈尔德接着说，小说只能证明，一个没有原则的作家参加拥护派的事业，是为了利用它达到个人目的。一旦事业失败，他就放弃，就像《永别了，武器》中弗雷德里克·亨利那样，“留下一串借口、哀鸣和诽谤”。小说家阿尔瓦·贝西仍然满怀感激地记得，1938年春季的一天，在埃布罗河东岸，海明威给了他一包好运牌香烟。他在《新群众报》上赞颂了海明威参加战争的举动，但对海明威的这本战争小说的评价是：“他现在完美地展示了他那非凡的技巧，用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小说悬念触及了行动的某些时刻。只是从这一点来看，这本书还算得上是他的最高成就。”无论就理解的深度还是思想的广度而言，贝西都发现这本书有严重缺陷，原因是作者耽于自我。“他还必须扩大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人格，以便去拥抱各个地方其他人的真实生活；他还必须深深扎入到他人的生活中去，从而发现自己的生活。”贝西还写了一封致海明威的公开信，亚伯拉罕·林肯纵队老兵协会的三个高级官员在信上签了字，信是由《工人日报》发表的。公开信谴责海明威“肢解”了民主事业，因为他中伤西番莲，诋毁安德烈·马蒂，歪曲苏联对西班牙的态度；而且，由于没有把这场战争跟世界范围内继续进行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联系起来，他还掩盖了战争的意义。

促使罗伯特·乔丹对共产党员幻想破灭的是一个名叫卡科夫的记者。“他脚踏黑马靴，下着灰马裤，身穿灰紧身衣，小手小脚，脸和身体弱不禁风，一口坏牙，说起话来唾沫横飞，罗伯特·乔丹头一次见到他时就觉得他的样子很滑稽。但是在乔丹认识的人当中，也就数他更有头脑，更有内在的威严和外在的无礼与诙谐。卡科夫在生活中的原型是《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938年底，大恐怖即将结束时，斯大林下令将他杀害。虽然海明威没有在背景为1937年春天的《丧钟为谁而鸣》中预先提到这次谋杀，他对科利佐夫的刻画明显反映出他是了解这位记者死亡的环境的。因为科利佐夫愤世嫉俗，在盖洛德饭店的晚间聚会上，他一再以嘲讽的口气谈论共产国际的路线，使他看似宴会上一个呲牙咧嘴狞笑的幽灵。海明威愿意给这个“叛徒”如此大的谈话空间，肯定会把麦克·戈尔德、阿尔瓦·贝西以及同伙气得肺都要炸了。

“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卡科夫微笑着对乔丹说。他接着又说：“当然也不赞成犯罪的恐怖主义组织和反革命组织。布哈林之流所豢养的杀人鬣狗奸诈凶恶，还有类似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雷科夫及其走狗这些人类的渣滓，我们都深恶痛绝。我们痛恨厌恶这些十足的魔鬼。”他又笑了。

“但我依然相信，政治暗杀可以说是使用得非常广泛。”

“你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但我们必然要处死和消灭这些十足的恶魔、人类的渣滓、将军身边的忠实走狗以及令人憎恶的背信弃义的上将和司令。这叫消灭，杀他们不叫暗杀。这个区别你清楚吗？”

“我清楚。”罗伯特·乔丹说。

当罗伯特·乔丹问到共产党与其极左同盟即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托派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波乌姆党在巴塞罗那交战的情况时，卡科夫的回答反映出海明威对后两股势力的不切实际早已有之的讥讽。但卡科夫的讲话同时也表明了一个复活的反政治的小说家对共产党也毫不原谅的决心。巴塞罗那之战结束后，共产党迫害波乌姆党；他们认为波乌姆党接受了佛朗哥的资助，因而诡辩说自己的惨无人道是正当的；他们在安德列斯·尼恩的命运上撒了谎，令人憎恶。在这些问题上，海明威都无法原谅共产党。

如果说卡科夫的议论使海明威遭到了共产党评论员的非难，这些议论同样也激起了德怀特·麦克唐纳这样的浪漫主义革命者的愤怒。在《党派评论》上，麦克唐纳猛烈抨击《丧钟为谁而鸣》。他紧紧抓住海明威对无政府主义者所作的“可资证据的描绘”，说这证明他内心依然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这种指控十分荒谬，只能使海明威更加蔑视坐在扶手椅里的激进分子。“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番莲）令我作呕，总是这样，”1940年4月，海明威对一位报界记者杰伊·艾伦说。他在小说的第三十二章里描述了这份情感。在这一章里，多洛雷斯成了卡科夫和一名《消息报》记者讨论的话题。那名记者面部发灰，一副愁苦萎顿的模样，眼泡肿胀，下唇耷拉着，显示出他的精神状况。此人听到一个消息异常激动，消息并不真实，是说法西斯军队在塞哥维亚附近自己打起来了，用机枪镇压叛乱分子，用飞机轰炸自己的部队。他对卡科夫说：“多洛雷斯亲自带回了这个消息。她带着消息来到这里，我从未见过她像这样周身洋溢着狂喜。她的脸表示消息是真的。那张了不起的脸——”

“那张了不起的脸。”卡科夫说，从他的声音里根本听不出是什么口气。

“你能听到她说话就好了，”肿眼泡的人说：“那消息本身就她从她脸上流露出来，那光彩可不是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听声音你就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我要在为《消息报》写的一篇文章里谈谈。对于我，这是战争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我从那个兼有怜悯、同情和真实的了不起的声音里听到了那个消息。她的脸就像人民所崇拜的真正圣徒的脸一样放射出善和真。叫她西番莲可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卡科夫干巴巴地说。

虽然这一段有些拙劣，它产生的影响却是深刻的。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当中，只有共产党的辩护士不为海明威对假圣徒的嘲讽所动摇。

早在战争失败以前，海明威就同样感到安德烈·马蒂的可怕，在小说中他也充分地表现了其可怕的一面。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们不会忘记他在另一个段落里所作的评价，他写道：“他的脸看上去就像是从小狮子爪下的废物中塑造出来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马蒂是个十足的偏执狂，他清除了纵队里许多不同国籍、数量众多的路线偏离分子，用他手下一个下士的话说：“他比六零六更能起净化作用。”由于马蒂的人物刻画威胁到他那关于《丧钟为谁而鸣》是斯大林主义想象的产物这一论点，德怀特·麦克唐纳主张，海明威是把他作为古怪的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体制的象征来表现的。麦克唐纳又一次给弄糊涂了。小说中的马蒂是个象征，这没错，只不过他不是麦克唐纳所希望的那种象征。在海明威看来，把抗击佛朗哥的政治化是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大错特错的根本所在：政治将领啦，政治领袖啦，以及无论是什么由头的政治阴谋啦，这些全都是拥护派事业失败的祸根。这

一判断的简单粗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1936年，海明威对政治还一无所知，而最迟在1939年年中，他又再次抛弃了这个话题。（比如，1939年8月，纳粹德国与苏联达成了肮脏的交易，瓜分了波兰，并使德国人敢于放开手脚采取下一步行动。可人们在海明威的通信中根本看不到有关的论述。）但是，海明威的判断与所谓成熟的麦克唐纳说他依然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观点相比，到底又简单粗糙多少呢？

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文章的同一期《党派评论》上也发表了一篇《丧钟为谁而鸣》的评论文章，说对安德烈·马蒂的描写“很出色”。但是，他感到小说没能道出西班牙的政治悲剧。由于“没有注意或者不够严肃”，海明威没能让苏联政客的卑鄙邪恶、西番莲道德上的欺骗、安德烈·马蒂的精神病以及其他悲剧性的事实“成为书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着重描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结果“小说本身失败了，不是绝对失败，而是相对失败，没有挖掘出可能性和隐含的意图”。罗伯特·乔丹的故事“最多只适于拍电影”，特里林说。他能“经历”各种政治风险，“但却无法应付，不敢评价”。

1949年，特里林的理念小说《旅途中》出版两年后，海明威断言：“你不妨把莱昂内尔·特里林、索尔·贝娄、杜鲁门·卡波特、让·斯塔福德……和罗伯特·劳里关进一个笼子里，好好地揍一顿，但你会发现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也看不起特里林关于罗伯特·乔丹不敢评价拥护派政治的评论，那是可以原谅的。

跟《大双心河》里的钓鱼者一样，乔丹也想压抑住恼人的思绪。“打不赢仗我就放不下心来，”他对卡科夫说。但事实上，他并不能关闭思想机器。于是，当他在第八章中试图告诉自己法西斯不会知道他的朋友戈尔兹将军的进攻计划时，“内心有个声音说，他们为什么不能？他们已经知道了其余所有的计划。”害怕拥护派内部有人背叛的猜忌心理必然使他对拥护派政客产生消极的看法。那位充满激情但却无所建树的自由主义者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所管理的政府，一听到佛朗哥叛乱的消息，就像纸屋一样地垮了台，被乔丹鄙视为——尽管没有明说——“当叛乱发生时把（共和国）搬到他们所在关隘的那帮盗马贼”。

在乔丹称之为他的教育的另一个阶段，他认真地听着卡科夫的分析。当时，拉尔戈·卡瓦列罗作出了一个胆怯的决定，要把政府所在地从被困的马德里迁往巴伦西亚。卡科夫对这一决定可能引起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卡科夫说：“我刚从巴伦西亚回来，我在那儿见过很多人。从马德里逃去的懦夫还在那儿统治着。他们已经快快活活地住下来，懒懒散散地实行官僚统治。……他们现在最热中的是削弱战争军需部。”至于巴塞罗那，卡科夫对乔丹保证说，那个无政府主义的红黑旗帜曾一度飘扬的地方，“依然是一派喜剧的气氛”。“起先这里是怪物和浪漫的革命党人的乐园，现在却成了冒牌士兵的天堂。这些士兵喜欢穿军服，喜欢走路高视阔步，大摇大摆，喜欢戴红黑肩章。与战争有关的他们统统都喜欢，就是不爱打仗。巴伦西亚令人恶心，巴塞罗那让人发笑。”

主人公接受教育的结果是，他厌恶地认识到共和国的整个领导层都腐败了，实质上跟以前的一切西班牙政府一个样。“噢……把这个从头到脚尽是奸诈、满脸脏物的肮脏国家扔到粪池里去吧，”乔丹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和玛丽亚躺在睡袋里时自忖道。

把他们一起扔进粪池，拉尔戈，普列托，阿森西奥，米亚哈，罗霍，统统扔进去。把他们一个个扔进去淹死。把整个尔虞我诈的国家都扔进去。把他们的自私自利自负奸诈也扔进去，不停地永远地往粪池里扔。我们为他们死之前要扔，我们为他们死之后也要扔。把他们都扔进去淹死。……上帝可怜可怜西班牙人民吧。……把一直控制着西班牙、统治着西班牙军队的所有疯狂的、自私自利的、奸诈的畜生搞臭。除了人民全都搞臭。然后还要万分小心，看看那些上台的人究竟会变成什么。

显然，莱昂内尔·特里林觉得这番不分青红皂白的控诉令人简直无法容忍，所以根本就不去记它。关于西班牙内战，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最欣赏的评论家是乔治·奥威尔。可以肯定，《向卡塔洛尼亚致敬》的作者也认为，人民阵线的所有力量全都背信弃义。但海明威没有注意去衡量相关的责任，而奥威尔则把在政治上破坏了联合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这笔帐大部分都算在共产党头上。而且，作为一名战争失误的评判者，奥威尔同样倾向于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波乌姆党不加深究。尽管海明威的确知道极左派民兵一般没有发挥什么战斗力，但奥威尔却断言他们发挥了战斗力。他一再宣称，在他参加过的波乌姆党民兵的各个级别，他呼吸到了政治平等和同志之情的空气。“不存在普通意义上的军衔，没有头衔，没有徽章，不用碰脚跟，也不用敬礼”。《向卡塔洛尼亚致敬》的作者可能对共产党不抱幻想，但他依然紧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乌托邦式梦想。海明威就不能这样说，虽然他也有“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警句。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的爱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他对帮他炸桥的老人安塞尔莫的情感同样也是如此。用《向乌托邦致敬》来命名奥威尔的书可能更为恰当，犹如《向死亡致敬》可以用作海明威的书名一样。

八

出于说不清楚是竞争还是友好的复杂情感，海明威送了一本小说给菲茨杰拉德，题字是“献给可亲可敬的斯科特”。1940年11月8日，菲茨杰拉德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他对该书的意见。“这是一本精美的小说，谁也写不了这么好。……我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完这本书，边看边试图解决写作中间的许多问题，但却常常很难发现你究竟是怎样取得某些效果的、可你总是把握得那么好。屠杀写得很精彩，还有山上那一仗以及实际的爆破场面。……我打算把全书再看一遍。”然而他根本没能看成，因为六星期后他得了致命的心脏病。

大概菲茨杰拉德最喜欢的最适合于拍电影的片断也得到了派拉蒙电影公司要员们的欣赏，为了取得把书拍成电影的权利，他们答应付给海明威10万美元。不过，虽说这些巨头们认为把小说拍成电影会带来巨额票房收入这一点没有错，但这部电影在艺术上不会有生命力，因为小说中最值得记忆的行动场面即便具有电影所需要的即时性和流动性，可同时又充满了海明威的语言魔力，摄影机的眼睛根本无法复制。况且，达德利·尼科尔斯改编的剧本不是对政治表示反感，而是带有反法西斯的伤感情调；而睡袋中的爱情场面——表演时必须遵循各项严格的限制，影片才能得到全能的海斯审查部门的准许印章——与小说描述的那种关系相比，几乎什么都没表现。读过马克斯·珀金斯对电影的介绍后，海明威表示了自己的愿望：谁也别想逼他去看

这部电影。

第二十一章 联合行动

—

虽然他已身处名望的巅峰，却没有忘记昔日的朋友。1941年1月，海明威去纽约，跟索利塔·索拉诺在她的华盛顿广场公寓里喝了一杯。索利塔在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后离开了巴黎，但是，她说，玛格丽特·安德森却留了下来，照顾过去的情人若尔热特·勒布朗，她患了癌症。而今，若尔热特一死，索利塔补充说，玛格丽特十分拮据，可以求助的朋友在法国首都又寥寥无几。几乎就在这次令人不安的谈话之后，海明威染上了重度流感，在伦巴第饭店卧床不起。尽管如此，他还是为玛格丽特·安德森开出一张400美元的支票，寄给索利塔，并附上一封短笺，最后几句是：“我很爱你，索利塔。请保重。千万别担心，我们当中只要一个有钱，大家就都有钱。”在1941年，400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小评论》曾有恩于他，所以他想尽力帮助它的老编辑，一如数年后他竭力为埃兹拉·庞德奔走。

随着《丧钟为谁而鸣》的销售量不断上升，他甚至试图做一个大度的丈夫，陪玛莎去了一趟远东，她计划在那儿给《柯里尔》杂志写一系列文章，报道中日战争和美国军需品流向蒋介石政府的情况。他宽容地说，玛莎有个好笑的想法，就是在缅甸公路上度蜜月。他这样说意在暗示他对亚洲了无兴趣。然而，多年后，玛莎在《我和某人的旅游记》（1978）中叙述了这次旅行，说海明威很快就爱上了香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网罗了一批随从，其中有一名当地警察，也有几个肥胖狡猾的中国百万富翁。在适应满是泥泞的韶关城内唯一的饭店的原始设施方面，他比她遇到的麻烦要少得多。当她为两人怎么可能设法用分给他们的一碗水洗漱而大惑不解时，他说他们根本就不要洗了、如果玛莎梦想刷牙，那她就是个傻瓜。“振作起来，”她记得他兴奋地说：“是谁想来中国的呀？”经过一段艰难的飞行，他们到达重庆，同蒋介石和他那精明的妻子单独共进午餐，还秘密会晤了周恩来。然后两人又飞往仰光，在那儿分手。因为当时海明威急于回古巴，而玛莎更感兴趣的是察看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陆海军防御部署。

回家途中，他在基韦斯特跟两个小些的儿子住了几天。保利娜当时在旧金山。但是，这次与家人重聚丝毫没有使他赢得她的信任。她虽然自己做母亲也是时好时坏，但在7月16日的信中却指责从前的丈夫逃避做父亲的责任。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并不充分，他强调经济原因。国内税收署会追着他缴纳另外的税款，除非他每年有半年呆在国外，所以他必须呆在观景庄，或到中国那么远的地方去。他还精确地、更是尖刻地提醒保利娜，他每年为了儿子而被迫付给她的6000美元就是税前收入21000美元中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秋天，他还是设法使每个人都高兴了一番，又一次安排让三个儿子全跟他和玛莎去住森瓦利饭店。在“熊迹”威廉斯，一位受雇于饭店的肯塔基上校的指导下，四个姓海明威的男子在萨蒙河中游岔口附近地势高而起伏的乡野骑马猎杀羚羊。开头两天，他们看见成群成群的羚羊，但只是在远处看，因为一旦它们的哨兵发出危险信号，这些动物就以惊人的速度跑开了。接着，第三天快完的时候，他们碰到一群羚羊在一个瓶颈状的山谷吃

海明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结识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也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草。海明威跳下马，从马鞍后面的枪袋里抽出一支斯普林菲尔德 30—06 型步枪，以最快的速度跑出 100 码，来到一个羚羊逃遁必经的宽宽的土堆旁，趴在地上，把枪放在前面，开了火。在 275 码的距离之外，他一枪就将那头最大的羚羊的脖颈打断。“那才叫打枪，如果你问我的话，”威廉斯上校拉长声音评论道。

为了给儿子们树立一个近乎神一样的猎手榜样，海明威又在扮演他儿时眼中的海明威医生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他对海明威家族的价值观念又持一种强烈的反对态度。凡是父母赞成的，他很可能反对，反之亦然。于是，1943 年春天，勃姆比在达特茅斯大学读完一年级来观景庄跟他住的时候，他决定勃姆比必须失去童贞，如果他还没有的话。“勃姆比，你跟女人睡过觉没有？”他问。“没有，爸爸，”勃姆比撒谎地答道。“你想不想？”“想啊，爸爸，”勃姆比真心地答道。事情很明显，海明威早已请了一个名叫奥格的妓女，并跟朋友温斯顿·格斯特安排好这次幽会在格斯特的公寓里进行。见到奥格，勃姆比一阵大笑，她也是。好像是头一天夜晚，他们在一家酒吧已见过面，后来两人上床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小时。不妨说，既然她已经认识他，奥格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他父亲要她把他的表现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第二天上午即将和勃姆比分手前，她给观景庄打电话，对海明威保证说：“是的，先生。对，像头公牛。”

1942 年与 1943 年夏天，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也来观景庄多呆了些日子。他们什么时候想喝烈性酒都可以喝。头一年夏天，格雷戈里才 10 岁，却也一再利用他父亲的宽容。结果，有时他早上就喝得晕晕乎乎的，即使在游泳池里泡了又泡也清醒不了。大约 10 点钟回屋时，他总看见父亲手拿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兴致很高地向他道早安，问他感觉怎么样。于是格雷戈里照实说感到恶心，但父亲听了从没有想到去训斥他，更不谈从道德上开导他一番。他总说：“我为你调一杯红玛丽酒。你不过是有点恶心罢了。”每当他谈到要确立一些原则时，他最多也只是问格雷戈里是不是要少喝点酒，理由是：“夏天未了，我们总不能把患有震颤性谵妄的你送回到妈妈身边吧。”

尽管海明威依旧保持着天一亮就起床写作的习惯，但在再次去报道战争之前，海明威在这两个夏天写出的作品非常少。一个原因是，他喜欢花很多时间跟儿子们呆在一起，打网球或垒球，在猎手俱乐部打活鸽子，或在“皮拉尔”号游艇上钓鱼。晚上，他喜欢陪他们去看回力球比赛。当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的父亲不仅认识每一个运动员，而且还请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观景庄喝过酒、游过泳时，他们便越发高兴。比赛结束后，自豪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们一般都去佛罗里迪塔酒吧吃晚饭，尽管有时他们也去五楼的中餐馆“温和的人”。餐馆比妓院高两层，可以纵览全城。

1942 年夏天，哈瓦那流行脊髓灰质炎。因此，当格雷戈里开始抱怨腿疼，随后嗓子疼，并且发烧时，家人都怕他得了这种病。古巴医生一天两次来观景庄用橡皮锤敲击他的膝盖，开了些药却没用。当谈到他能不能康复的问题时，医生非常含糊，搞得这孩子十分害怕。与往常一样，海明威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下显得非常镇静，他担负起照料儿子的全部责任，每四小时量一次体温，把饭菜送到卧室。到了晚上，他就躺在病床上儿子的身边，“讲好听的故事”。格雷戈里还记得：

讲他小时候在密执安的生活，讲他怎么抓第一条鱒鱼，伐木工人没来的

时候那原始森林有多美。他跟我讲他小时候受过几次惊吓，讲他如何常常梦见身上长毛的妖怪，每天晚上都会变高一点，然后，正要吃他的时候，却跳出篱笆。他说害怕正常得很，不必感到羞耻。掌握它的诀窍是控制自己的想象。但他说他知道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难。

危机过去，格雷戈里康复后，海明威谈起儿子的复原时那口气就像是说，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功劳。但不久后，他还真地救了格雷戈里的命。故事发生在他带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用鱼叉去捕鱼的某一天。把“皮拉尔”号停泊在格尔夫河畔一个深水暗礁旁之后，海明威戴着护目镜，捏一把鱼叉就下了水，孩子们也跟着他学。他们沿着暗礁呈扇形前进，寻找黄尾鱼、笛笛鲷和石鲈。一旦叉到一条鱼，他们就回到游艇旁，等“皮拉尔”号上的古巴驾驶员兼厨师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把鱼取下来。年幼的格雷戈里觉得这样有点费劲，另外想了一个存放到手的石鲈的办法。他解开皮带，把皮带一端从鱼嘴里穿进去，打鱼鳃里拉出来，然后重新系上。很快，水中鱼血的味道吸引了不受欢迎的一伙，三条槌头鲨鱼。一看见它们高高的三角形背鳍呈S形弧线不慌不忙地朝他游来，这孩子身不由己地发出一声声尖叫。尽管浪涛咆哮着撞击暗礁，他父亲还是在40码开外的地方听到了。父亲叫道：“听着，伙计，不要慌，扔点东西吸引它们的注意力，游到我这儿来。”格雷戈里从皮带上取下石鲈，扔给鲨鱼，朝父亲游去。海明威把他扛在肩上，伸长双臂奋力击水，以侧泳式游向游艇。在暗礁的那一边，格雷戈里看见鲨鱼吞噬石鲈的地方波翻浪涌。

格雷戈里后来猜想，谁都会去救孩子。即便如此，他那天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海明威的儿子。他爸爸表面上喜欢热闹，其实很内向，不大会用传统的方式表达父爱，所以格雷戈里从未意识到父亲爱他有多深，直到海明威霍地把他扛在宽大的肩膀上，朝回游过暗礁，而自己的身体大部分依旧暴露在水面下，随时可能遭到致命的攻击。

二

据说，马里奥·拉米雷斯·德尔加多船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击沉过德国潜艇的古巴人。多年后，德尔加多把“皮拉尔”号的船长描绘成“一个花花公子，心血来潮地在古巴沿海追寻着潜艇”。

海明威想参加二战而又不离开古巴的第一个想法是，成立一个反间谍小组，查出在哈瓦那的纳粹间谍。他跟在美国大使馆供职的朋友罗伯特·乔伊斯说，五年前他在马德里就组织过一个类似的秘密间谍网络。通过乔伊斯，他得到机会向新任美国大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解释了自己的计划。通过布雷登，他得到古巴政府的授权，招募了一批勇猛的汉子分头出去自由行动。正如半个世纪以前西奥多·罗斯福在古巴成立的莽骑兵由牛仔和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一样，海明威所自称的骗子工厂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渔民和回力球运动员，二是从西班牙逃难来的贵族，外加一名曾在抗击佛朗哥的战斗中使用过机枪的天主教神父。从1942年3月开始，工厂的所有报道都由海明威在观景庄校对打好，然后再亲手送到大使馆罗伯特·乔伊斯的办公室。

不到三个星期，他发现这项工作还不够他忙的，这一点从5月底他向斯普鲁伊尔·布雷登提出的新建议中可以看出。除了把骗子工厂继续办下去，

他还想在“皮拉尔”号上装备政府发的火箭筒、手榴弹、50毫米口径机枪和无线电设备。海明威解释说，“皮拉尔”号将装扮成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艘船，一共配备八个人，沿着岛屿以北海岸巡逻，直到被德国潜艇截住。一旦潜艇甲板上聚集了一帮要上船搜查的人，“皮拉尔”号上的人就用机枪开火，然后努力用火箭筒和手榴弹将潜艇击毁。由于这个半生不熟的计划很有可能是由海明威想出来的，所以布雷登大使就应允了。

在这位堂·吉诃德似的潜艇追寻者所挑来跟随他的人中间，有身材高大的百万富翁运动家，即被海明威称之为沃尔菲的温斯顿·格斯特，还有名叫弗朗西斯科·帕克斯奇·伊瓦露西亚的巴斯克水手，以及“皮拉尔”号的驾驶员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他的热情很有魅力，所以这批人一个个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武器比起德国潜艇所装备的机关炮来说有天壤之别。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德国潜艇的指挥官对海明威及其一伙表示出丝毫兴趣，“皮拉尔”号的巡逻（汽油由政府提供）就变成了打渔，手榴弹在他们醉酒后玩耍时扔进了大海。海明威把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加进来之后，等于默认他的所谓追寻潜艇已变成装样子了，但这一点他从未坦率承认过。相反，数年后，他还坚持对一位年轻的朋友A.E.霍奇勒说：“我们能发送有用的情报，海军情报部门还派我们侦察了几艘纳粹潜艇的位置，这几艘潜艇后来被海军的深水炸弹炸毁，估计给炸沉了。”更有甚者，他还往奇思上堆妙想，说：“我们的迷惑进攻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再说玛莎，她从一开始就公开鄙视他的冒险行动，无法明白他为什么不像她那样急于到达英国，一旦盟军跨过英吉利海峡攻打希特勒的“欧洲堡垒”，也好就近了解战况。1943年11月6日，她从伦敦给他写信，再次试图劝他放弃在古巴的“可耻愚蠢的生活”。她告诉他，她来到伦敦后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是英雄。“我想大家喜欢我是因为你选择了我，所以才给予我高度的赞许。”但或许恰恰是因为他在那么多人眼里是英雄，所以他才极不愿意接受玛莎的一再恳求。1918年，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令人钦佩。但他不满足于应得的信赖，于是用神话把自己包裹起来。30年代，他在西班牙又这么干过一次。1943年，他已然成为这神话的俘虏。如果他参加保卫欧洲的战斗，他现在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炮火下表现出非凡的勇猛。可是，虽然他非常了解战争，也依旧非常勇敢，但年龄、身体状况和酒精对他造成了危害，而且在他意识到这些因素后思想压力可能也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芝加哥，年轻的他曾写过一个幻想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奥彭的青年战士不愿同英烈祠的英雄们作战。回家后，他发现他母亲心甘情愿地批准了他的愿望，便如释重负。她对他说，从今以后，他可以一心一意地搞艺术。可以想象，海明威的第三个妻子本来可以批准他同样的想法，但是，她却想方设法要丈夫重返战场。他之所以这么恶劣地对待她，或许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三

1943年初秋，玛莎离开观景庄，因为一来《柯里尔》的编辑要她去调查英国的战况，二来她再也无法忍受虐待。动身前不久，她见到海明威的私人医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索托隆戈。她跟他说：“医生，我是来与你告别的。我要去欧洲，不再回到畜牲身边。”（“她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人，”埃雷拉医生叫他解释玛莎这句话的含义时，海明威含含糊糊地回答。）

但她一走就想念他，给他写了一封封的长信，在信中让自己梦想着他们将来会拥有的幸福时光。“……我们将一起写书，欣赏秋天，绕着玉米地行走，等待雏鸡的出现。”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可12月13日却收到了四封。她宣称：“所以那天是个民族性的节假日。”然而，无论在哪一封信中，他对她一再要他离开古巴跟她会合的请求都置之不理。她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失望，向他保证说：“我不再强求你来。……我想你会后悔的，对所有需要并热爱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普遍的损失。……但这事我不会再谈了。”但是，就她而言，她强调补充道：“为了亲临反攻现场，看见解放伊始的巴黎，观看那儿的和平，我愿不惜一切代价。……我必须既按你的方式生活，又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否则就没有爱你的那个我了。要是我在观景庄周围砌一堵精美的大石墙，坐在里头，你是决不会要我的。”

他并不在乎呆在观景庄就像坐牢的暗示，也不在意她写的圣诞信。信的开头说：“你是真实的，你是我的。”但接下来她却承认古巴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些热心的、令人厌倦的好人，那里的生活很遥远，有点恐怖，我害怕。请你原谅。我一想起它，就像被那些可以吞下一头牛的美丽热带花朵掐住了脖子。”但是，1944年3月，在意大利前线经过一番旋风般的视察，又在北非着陆以后，她飞回了家，原因很简单，她依然爱着她丈夫。令她十分沮丧的是，他马上开始对她大喊大叫。她记得：“我正要睡觉时他却把我弄醒。他吓唬我，冲我叫嚷，嘲笑我。我的过错其实就是我参加了战争而他却没有，但他却不这样说。他说我大概是疯了，只想着激动和危险，对谁都不负责任，难以想象的自私……一直没个完。说真的，这些话很残忍，很难听。”

一次，他又没完没了地指责她，并宣布说原来不打算参加欧洲的战争，但现在改主意了。为此，他带着一种恶意的满足感对她说，他将为《柯里尔》报道这场战争。在所有强烈要求他署名报道的新闻机构中，他故意选择了她所在的那一家，以使她没有机会得到报道法国之战的官方证件，因为根据记者团的规定，一家杂志只许派一名记者去前线。

4月，这对不合的夫妇飞抵纽约，海明威对玛莎的“可怕的疯狂辱骂”于是又开始了。他跟她讲，他将被人打死，被打死的时候，他希望她对她做过的事感到满意。他一边这样说，一边进一步报复她。他拒绝运用自己的影响让她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他已经想办法为自己弄到了一个座位。他说：“噢不，我不能那么做。他们只让男人坐飞机。”玛莎乘坐一艘装运炸药的货船，经过迂回危险的旅行，渡过了大西洋。事后，玛莎得知她丈夫所乘坐的飞往伦敦的航班其实是有女乘客的。除了运载一批海军军官之外，飞机还有幸运送了女演员杰特鲁德·劳伦斯。

四

他的头发迅速变少、变稀，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为此他很是沮丧。在古巴，为了应付这一危机，他留起了大胡子。他的借口是，追寻潜艇的时候，因为不断地暴露在太阳底下，他的脸过于敏感，没法剃。如果他想在法国参加战斗之前显得更加像个士兵，他就必须把胡子剃掉。然而，1944年5月底的一天，伦敦的气候热得反常，可在他决定去索霍区的白塔餐厅吃午饭时，却依然留着胡子。

他挤过人群，朝餐厅的后部走去，看见年轻的欧文·肖正坐在一张有两个座位的桌子旁，对面是一个娇小但不漂亮的三四十岁的女人，蜜棕色的卷

发剪得很短，像男孩一样，紧身套衫叫人注意她的胸部。肖与这位女伴的浪漫故事已有几个月了，但四年后，他在《年轻的狮子》中，通过路易丝·姆肯伯这个人物回忆了她，表现出对她并不是十分喜爱。路易丝天生一头光亮的头发，小巧玲珑的身材，“似乎不列颠群岛的每个要人都认识。她对付男人驾轻就熟，很有一套手腕，因而总会被邀请参加名人乡间别墅的周末聚会……”海明威握了握肖的手，看了看他的女伴，请这位作家给他们介绍一下。肖照办了。他说，她名叫玛丽·韦尔什，在《时代》周刊伦敦分部工作。从肖的言行来看，显然他和她关系暧昧，这或许令反犹太民族的海明威回想起另一个犹太人，就是那位喜欢异族金发女郎的哈罗德·洛布。不管怎样，他接下去问玛丽，能不能哪天和他在白塔餐厅一起吃午饭。海明威插一脚的大胆举动惹恼了肖（他后来回敬了海明威，在《年轻的狮子》中把他描绘成《柯里尔》的一个矮胖记者，由于过量饮酒，圆脸上长了很多斑），但玛丽却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在带有斑点的乱蓬蓬的大胡子上面，他的眼睛显得很美丽，”她写道。与他共进午餐她会很高兴，她表示。

但是，就她而言，他们的头一次约会并不值得纪念。因为结过两次婚的玛丽在战时的伦敦跟许多男人约会过，而海明威在吃饭时始终是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他可能心情不好），使她不禁想念跟别的男人们在一起时他们逗乐的情景。不过，在他们同住的多彻斯特饭店的聚会上第二次见到他时，情形就不同了。他尾随她回到卧室，同住那间房的康妮·厄恩斯特吃了一惊，他却快活地跟她和她的男友迈克尔·富特打了招呼。小巧的玛丽躺在双人床上想休息一下，他却毫不客气地坐到她身旁。英国上空的黎明久久不去，黎明中，他情不自禁地讲述了在橡树园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他讲了他专横的母亲，他亲爱的姐姐，他被迫带她去参加班级舞会，以及他那漂亮、机灵、聪明的妹妹厄休拉。讲完这些，他突然作出惊人的表白。“我不了解你，玛丽，”他温柔地说：“但我想与你结婚。”玛丽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等他又郑重地说了一遍，她这才相信。她提醒他，两人都结了婚，认识刚不久。“这场战争也许会把我们分开的，”他坚定地接着说：“但我们必须开始联合行动。”海明威是找好了接替者才跟前两个妻子离婚的。这一次，跟第三个妻子的关系还没有最后摊牌，他便急不可待地拉第四个排上了队。

他对玛丽的迷恋发人深省。她生于1908年，在明尼苏达州伯米吉镇长大，是阿德琳和汤姆·韦尔什的独生女。夫妇俩出生卑微。个性刚强的汤姆·韦尔什在一家伐木公司工作，但为了贴补家用，天暖的月份还在密西西比河上开船，带游客和当地人一玩就是一天。每年夏季，小玛丽要跟父亲和父亲的帮手在船上生活三个月，把笃信宗教的母亲留在伯米吉。尽管她父母从未提起离婚，但显然他们关系不合，尤其是在抚养女儿的问题上想法不一致。玛丽特别喜欢她父亲以男人对男人的方式对待她，有时候真恨不能自己生下来就是男孩。

在诺思韦斯顿读完大学后，她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有一段时间，她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做社会版的记者（年轻的莱斯特·海明威最终也成为该报的一员，保罗·莫勒任执行编辑），但她真正想干的是去欧洲工作，伦敦《每日快报》的邀请使她如愿以偿。从1940年起，她受雇于《时代》周刊，工作成绩有好有坏。同事拉尔·塔克·沃滕贝克佩服她不管形势多么严峻都能“浑身是胆”，但另一位同事威廉·沃尔顿则认为她不能发掘事件的深层意义。

至于她的罗曼史则纷然杂呈。1929年，她在诺思韦斯顿与一个名叫劳伦斯·库克的大学生结婚，两年后离婚。1938年，她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澳大利亚人诺埃尔·蒙克斯结婚，但到1944年，这桩婚姻也岌岌可危。蒙克斯另外找了个女人，而玛丽的生活，用比尔·沃尔顿的话说，“充满了情人”。海明威后来骂她跟他们当中一些人勾勾搭搭，目的是想得到对当记者的她来说可能有用的情报。

两人的第三次会面发生在罗伯特·卡帕这位《生活》杂志著名的摄影记者所举行的晚会后一天左右。5月24日，罗伯特·卡帕在贝尔格莱维亚自己的公寓里举行聚会，海明威参加了，但玛丽没去。罗伯特·卡帕邀请了一大帮客人，其中包括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他是随一个纪录片摄制组来到英国的；还有闯劲十足的比尔·沃尔顿，他正准备跟第八十二空降部队的空降兵跳进法国；以及一位叫彼得·戈雷的英国医生和他的德国难民妻子。凌晨三点左右，戈雷夫妇主动提出开车送海明威回多彻斯特饭店。由于实行灯火管制，街上很黑，但更糟的似乎是戈雷夫妇不胜酒力，他们的车撞在一个钢制水箱上，海明威头朝前撞到了挡风玻璃，膝盖也狠狠地撞在仪表板上。在海德公园角的圣乔治医院，医生们花了两个半小时，缝了27针才将他的头部伤口缝合。他发现，膝盖肿胀使他一走路就疼，脑震荡引起的一阵阵头疼几乎就没停过。那天，玛丽·韦尔什突然到圣乔治医院来看他，发现他躺在一间又大又空、布满尘土的病房里，头上像包头一样缠着绷带。“我过一两天就回多彻斯特饭店，”他说：“到时候来看我。”玛丽微微一笑。“我会的，”她答应道。

到那间满是灰尘的病房去探视的还有玛莎。那天她坐的船在利物浦靠港时，她就听一些记者说她丈夫出了车祸。海明威在多彻斯特饭店为她订了一间靠近他自己房间的客房。她在饭店安顿下来后，便绕道去了医院。虽然医生严重警告他必须禁酒，他床下还是摆了一大堆酒瓶。玛莎进门就发现了，觉得非常讨厌。接下来，他们的谈话不仅很不愉快，而且比海明威所料想的要果断得多。因为，在他奚落玛莎，说他来英国都快两星期了，可却没能从下身给美国陆军妇女队打上一枪时，他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还没打算跟她说他们俩已经结束了。所以，玛莎的答复令他震惊。当时的情景一定让他想起了米兰的那家美国医院以及——如果再联想一下——自己被阿格尼丝所抛弃的情景。玛莎告诉他，过大西洋时，她花大量时间考虑了他在古巴和纽约对她的“无休止的疯狂凌辱”以及他在“皮拉尔”号上无耻的“表演”。她跟他到此为止，她宣布。话音未落，她便大步走出病房，回到多彻斯特饭店，在高一些的楼层要了一间房。

五

反攻日的前一天晚上，海明威扎着护头的绷带，因为膝盖肿胀，他明显地一走一跛。就这样，他登上了多萝西亚·L·迪克斯号攻击运输舰。第二天，即1944年6月6日黎明时分，他坐在一艘车辆及人员登陆舰的尾部，舰上挤满了戴着头盔的士兵。这只登陆舰的指挥官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罗阿洛克城的罗伯特·安德森中尉，他的任务是指挥部队在奥马哈滩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岸。事后，安德森将船快速驶回迪克斯号战舰，用水手长的坐椅把普通乘客一个个吊上甲板。是夜，海明威在多彻斯特饭店为《柯里尔》杂志撰写了一篇报道，叙述“我们是怎样夺取福克斯·格林海滩的”。

《胜利之旅》不仅给人以作者随部队登上了海岸的印象，并且强烈地暗示，如果没有海明威先生的帮助，安德森中尉和他的部队想找到福克斯·格林海滩将要费好大的功夫。海明威先生对所有相关地图背得烂熟，能够满有把握地辨认出科利维尔镇教堂塔楼那样的标志物，而那些军人则把握很小。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成为海明威神话的又一个传幅媒介；并且，像 20 多年以前一样，就算海明威虚构的故事神乎其神，也会被天真的崇拜者热心地传播开来。于是，自命为“男人杂志”的《真实》于 60 年代初刊发了一篇题为《海明威最长的一天》的文章，文章援引一名参加过反攻、未透露身份的老兵的话说，“这个叫海明威的汉子”负责指挥一个战斗队，这支队伍被德国发射的猛烈的纵射炮火困在了沙滩上，他带领队伍脱了险，来到一座小山的背风处，又从那儿爬回水里，以便将自己对战斗的估计告诉沙滩之战的指挥官。刚被他救过命的士兵认定他准会被打死，可他却没有，令他们难以理解。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作者原是一位海军军官，名叫威廉·凡杜森，但他暗示，故事的来源却不是一名未透露身份的老兵，而是海明威本人。因为，在 1944 年 5 月飞越大西洋的那趟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凡杜森是海明威的同伴之一，他对海明威佩服得五体投地，打那以后，无论这位小说家跟他讲什么，他都从不怀疑。莱斯特·海明威同样相信他哥哥在福克斯·格林海滩的英雄事迹，在他所撰写的有关海明威的回忆录里尽职地描写了这些事迹。

6 月 6 日登陆以后，足足过了一个半月，海明威才勉强参加诺曼底的地面作战。在战斗间隙，他跟随皇家空军坐了几次飞机，还陪玛丽·韦尔什逛了逛镇子。一天下午，海明威跟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到多彻斯特饭店埃默拉德·丘纳德下榻的大套房去喝茶。埃默拉德·丘纳德是南希的母亲，十分令人敬畏，海明威在巴黎时就已牢牢记住了她。年轻的小说家弗雷德里克·普罗科施那天也拜访了丘纳德女士，就她想在气势上压倒海明威时所发生的事，他后来发文描述了自己奇特的印象。

她起先问他对伦敦有什么看法。他承认不大喜欢伦敦，尤其是房子，看上去都差不多。“就拿伊顿广场来说吧，那些房子全一个样。显得单调。”丘纳德女士发现了第一个空当，便一把抓住。“的确是这样，”她表示同意。“毫无疑问是有某种单调。”她盯住茶杯里面，若有所思地补充道：“是啊，单调。这是可怕的败笔不是，海明威先生？我正在读《伊利亚特》。里面也有单调的时候。……你看过《伊利亚特》吗，海明威先生？”

他在大学里读过，他嘟囔道。丘纳德女士坦白地说，她本人没上过大学。海明威回答说，做个自学的男人也没什么坏处。“但这正是可怕之处，”丘纳德女士忙说：“偏偏我不是男人。做女人真苦啊。我们身上缺点太多了。你作为男人，作为一个勇敢的男人，没有这些个缺点。”这几把利剑刺得又快又巧妙，你几乎觉察不到其中的残忍，普罗科施回忆道。

丘纳德女士接着说：“男人的不足比女人更为明显。事实上也好衡量。长度，深度，深度，直观性。男人的不足一眼就能看出来。看女人就难了。完全没有便利的尺度。得靠直觉，但直觉会骗人。你看女人靠直觉吗，海明威先生？”“我的直觉不如您，我想，”海明威答道，咧嘴一笑。普罗科施觉得，经过这一回合，气氛发生了某种不易察觉的变化。他感觉到了网球比赛中关键性阶段的那种比分的波动、优劣势的转换以及双方所使出的杀手锏的强弱。

爱好文学的德斯蒙德·麦卡锡一直在房间一角的椅子上睡觉，这时候他醒了。“世界上总会有托尔斯泰的，”他说：“他像巨人一样昂首阔步。一个留着胡子的人。”丘纳德女士接过话茬说道：“胡子是小说家必不可少的。查尔斯·狄更斯有胡子。乔治·梅瑞狄斯有胡子。……我欣赏你的胡子，海明威先生。”“各有各的爱好，”海明威答道。这种机智的反驳令普罗科施不由得更加仔细地打量海明威阔大的下颌，乱蓬蓬的胡须，愠怒的微笑和闪烁的双眼。“他身上有种动物的诡秘和食肉动物的愚蠢，但即便愚蠢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同时，普罗科施坚信，这个大人物又有点不对劲儿，尽管他说不清，就好像那么“悬在半空中，像丛林里的一股怪味”。忽然，普罗科施想起很久前的一天，他在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里拿起一本海明威早期故事集。浏览中他为故事所散发出的“动物恐惧和动物暴力的气息”所震惊。

丘纳德女士接着谈起俄国这个话题。你怎么看那个费解的国家，她问。有的人说俄国好，有的人说俄国坏，海明威咕哝着；而且，他对巴塔哥尼亚也没有把握。丘纳德女士感慨道，她愿意跟他去巴塔哥尼亚。“我们同行一定十分美妙！”海明威不禁笑了。普罗科施发现，他笑的时候露出白牙，很好看，这笑代表着胜利和光荣。

海明威走后，西里尔·康诺利附在普罗科施耳边轻声说，第一回合埃默拉德赢了，但那以后“全都是海明威的了”。丘纳德女士一眼就猜到了康诺利的话。普罗科施从她眼中看出了内心的失败，但她眼里很快又闪现出一丝胜利的表情。“我恨惊讶，”丘纳德女士口气温和地说。“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你也许觉得我很怪，但我就觉得他不男不女。”康诺利回答，这个词用到海明威身上倒很特殊。“我相信是很特殊，”她说：“或许，这个词不确切。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毫无阳刚之气。”

海明威对丘纳德女士的看法怎么样，他没跟人说起过，也许是他想到终于能加入乔治·S·巴顿在诺曼底的一个装甲师而非非常激动的缘故吧。然而，坦克战令他摸不着头脑，于是他便转到了第一军第四步兵师。“我们的生活非常愉快，非常开心。到处是死人，从德国人那里夺了许多战利品，开了很多次枪，打了很多仗，”8月1日，他给玛丽·韦尔什写信时兴奋地说。四天后，他又变得萎靡不振。他向玛丽报告说，他坐在一辆缴获来的德国摩托车的边斗里行驶在圣波伊斯村附近时，被一枚坦克炮弹片击倒，又伤了头部。

事情的真相是，第四师摩托队的驾驶员阿奇·佩尔基沿着下山的环形道，在灌木树丛中高速行驶，要不是他拼命捏住刹车就会正好撞上德国反坦克炮的炮口。佩尔基和海明威头朝下翻进了公路一边的水沟，坐在佩尔基后面的罗伯特·卡帕栽到另一边的水沟。反坦克小组的一名机枪手开始向摩托车开火。此后两个小时，两名手持冲锋枪的德国兵一直注视着沟里的动静。那些德国人最终认定美国人死了后才撤走。佩尔基和卡帕经历了这起痛苦的事件，皮毛都没伤着，但海明威落到铺有石头的沟底时，伤了一个肾，还把头又撞伤了。

这第二次头部受伤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埃雷拉医生后来在哈瓦那跟他说，他在伦敦发生那次脑震荡后，医生本该打开他的头颅，抽出瘀血。埃雷拉狠狠批评了海明威，说他对医生隐瞒自己头疼的严重性，以便出院时赶上反攻日。所以，在诺曼底发生的第二次脑震荡，埃雷拉接着说，加重了尚未恢复的伤势，具体就表现在海明威身上立即出现的种种症状，有一些困扰他达几个月之久，如复视、说话迟缓、丧失语言记忆力、倾向于反手倒退着

写字、耳鸣以及阳痿等等。最后，令埃雷拉震惊的是，虽说面临着这种种困难，海明威离开战场去蒙圣米歇尔休假的时间却没超过两天。

8月20日左右，他告别第四师。经过战略情报局戴维·布鲁斯上校的批准，他招募了一批秘密游击队，开始在离巴黎30英里的朗布依埃镇一带从事侦察活动。1985年，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尔贝·J.盖拉尔回忆道，海明威“既当兵又当情报侦察员的举动激怒了其他记者”；幽默家安迪·鲁尼也记得，那些记者对这位爱卖弄的名人很反感，尽管鲁尼承认，他可能“比派去执行任务的任何军人都了解德国人的火炮和坦克部署”。

海明威对《柯里尔》的读者说，他一听说解放巴黎的荣誉将授予雅克·勒克莱尔将军以及法国第二装甲师，就试图将他得到的这一情报告诉将军，但却被命令“走开”；而且，一位好管闲事的法国中尉因此警告他和他的“乌七八糟的游击队”原地别动，等勒克莱尔的部队通过以后再行动。这位《柯里尔》的记者很勇敢，很有办法，他“这时采取迂回措施，沿着公路跋山涉水来到一家酒吧”。他解了渴之后，就跟他手下的人会合，沿着一条小路疾行军，赶上了勒克莱尔先遣部队最前面的坦克。“马上就要拿下巴黎了，”记者海明威声音相当颤抖地、如同作戏一样地宣称。“我嗓子眼像堵着个东西，很好玩，我还要擦擦眼镜，”他坦白地说：“因为现在在我们下面的这座灰色的、总是那么美丽的城市，就是全世界我最热爱的城市。”

后来，他私下里跟人炫耀说，他“跟着头一支部队进了巴黎”。但除了在《柯里尔》杂志上附带地说明“我在所有的巷战中都受到保护——最严密的保护，我们进了房子或居民楼的大门后我身后还有人把守楼道”之外，他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描述巴黎解放那天他在城里的活动。当然，他也无需发表什么文章，因为这件事别的作家替他做了。当法国第二装甲师的大部分人马仍在塞纳河南岸与敌军发生冲突时，“海明威特遣部队”似乎已在凯旋门附近清扫德国后卫部队。当谨慎的勒克莱尔最后进入法国首都的时候，据说他看到一座教堂门口悬挂着一副标语，“厄内斯特·海明威的财产”。于是自然就有了海明威解放了里兹饭店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罗伯特·卡帕在他的回忆录《焦点旁边》（1947）中坚称，他本人在巴黎解放的当天晚上来到这家饭店，碰到海明威的法国司机，司机说：“爸爸拿下了整幢饭店。地窖里很多东西。你快上去。”但事情的真相是，身穿盟军军装的其他军人早在爸爸之前就到了饭店，因为他帮别人在布瓦德布洛涅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清除了几名德国兵，分散了部分时间，事后又到香树丽舍大街旅游者俱乐部稍作停留，喝了一杯人家敬的香槟酒。至于海明威“上尉”和他的游击队在搜集情报上的成就，在（美国）重要军史办公室的权威著作《爆发与追求》（1961）中连脚注都没排上。根据戴维·布鲁斯措辞讲究的个人判断，海明威和他的部下“十分活跃，无所畏惧，有时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但最好的情报还是镇里人提供的，而且是有关朗布依埃镇与巴黎之间的农村的情报。”

六

他在里兹饭店一直住到8月底，成天泡在威士忌和香槟酒里，来访的人川流不息，比如前来向他致意的年轻的J.D.塞林格和与之开展嘲讽竞赛的安德烈·马尔罗。

1935年，海明威曾这样评价马尔罗的《人类状况》：这是“我十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但是，1938

巴黎解放后不到一天，玛丽·韦尔什也出现在里兹饭店。

她说服了她在《时代》周刊的老板瓦尔特·格雷布勒，让她报道法国第二装甲师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胜利阅兵式。“爸爸，来了一位太太，”她敲响海明威房间的门铃后，佩尔基去开门时喊道。海明威打里间来到门厅，迎上去紧紧抱住她，像旋转木马式地将她悬空转了一圈，陪她进到里间，把她介绍给他的两个衣着很马虎的游击队员，他们两人正坐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边擦枪边大口喝着香槟。当天晚上，他带玛丽到左岸地区的一家餐馆吃饭，饭后，他们乘着温柔的夜色一直步行回到饭店。“你能做我的泡菜吗，又酸又辣？”两人漫步行走时，他轻柔地问她。玛丽答道：“莼萝泡菜。因为你是海明斯坦，吃犹太菜。”尽管她本人也在里兹饭店要了房，她却跟海明威去了31号房，穿着内衣，一眨眼就溜上他的床，“蒙头大睡”。（她记得，这间房的另一张床堆满“加伦德 M—1 型军用步枪、手榴弹和其他金属物品”。）第二天一大早，香槟酒瓶塞“嘭”的一声惊醒了她。“你打了一晚上鼾，你挺能打鼾的，”海明威高兴地说着，递给她一杯不甜的毕雷香槟。她一仰脖喝完了酒，扔掉酒杯后又按门铃要咖啡，这时她才发觉阿奇·佩尔基正悄悄地用一个政府发的小炉子在空荡荡的壁炉里煮咖啡。

转眼之间，她摇身一变，成为她自称的“一个厉害男孩的角色”。在跟保利娜和玛莎结婚之前，海明威已经预料到他的婚姻不会有好结果。现在，他与玛丽的关系又不稳固，令他犯愁，他意识到另一场婚姻灾难正在形成。他既不能全身心地爱她，同时又舍不得放弃，所以就不断地责难她——有一次他叫她“你他妈这个只会傻笑、不会干事的女战地记者”，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弥补，把她介绍给西尔维亚·比奇那样出色的人物，或者带她去蒙帕纳斯大道，看他以前常去的一些地方。

如果说海明威在伦敦因为玛莎极端冷落他而冲朋友们发火时带有某种恐慌的话，那么，他在巴黎向玛丽求爱则带有某种绝望。就他对自身安全的态度而言，他开始流露出种种越发令人不安的心态。9月1日，他一时冲动，决定去旅行。这次旅行不仅很危险，而且很荒唐，教人不禁要问，他是诚心想叫人把他打死还是失去了理智。触发这次旅行的是查尔斯·T.（巴克·）拉纳姆上校给他的一则书面信息。这位第四步兵师第二十二团团副矮脚鸡的模样，不敬鬼神，很有特色。诺曼底爆发战争的时候，他赢得了海明威的敬爱。

拉纳姆于1902年出生在华盛顿特区，毕业于西点军校（1924）、步兵学校（1932）以及指挥与参谋学校（1939）。30年代，他曾协助编辑《步兵》杂志。二战即将爆发时，他前往好莱坞，监督拍摄了一系列后来被广泛使用的训练片，并撰写了各片的脚本。他既是职业军人，又是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哈泼》杂志发表了他的几首十四行诗，让他很是自豪。1954年，他退伍时已拥有17枚勋章，因此，海明威以英雄崇拜的口吻称赞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最勇敢、最聪慧的团级指挥官”。

年春，两人在巴塞罗那的一次见面伤害了各自的感情。从那以后，海明威便称这位法国人是个卑鄙小人和冒牌货，于1937年2月就撤出了西班牙，目的是在战争实际开始之前就去写一本有关战争的“了不起的劣作”。1944年他们在里兹饭店的重逢并未能缓和他的敌意。1953年1月，他对伯纳德·贝伦森的一次谈话代表了他在晚年对马尔罗的看法。“你怎样才能辨别一个人是否真地杀过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呢，通常他的眼睛绝对不会眨。骗子的眼睛总在眨。不信你就找时间去见见马尔罗。”

1944年8月底，包括拉纳姆部队在内的一支美国快速特遣部队越过埃纳河与瓦兹河，往北向比利时边境追击德军。在朗德勒西镇附近，第二十二团在一次著名的战斗中俘虏了2000人。“去上吊吧，勇敢的海明斯坦。我们在朗德勒西打仗，而你却不在那儿。”拉纳姆告诉他那位住在里兹饭店的朋友，却没有想到这番善意的调笑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9月2日上午，接到拉纳姆的信还不到24小时，海明威坐上吉普车就去了朗德勒西镇，开车的是让·德肯，一个反纳粹狂，33岁，跟海明威到过朗布依埃镇。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行驶，两人在波默伊尔村赶上了拉纳姆，令他大吃一惊。由于估计不会再打仗，海明威和德肯几乎是立即调头返回巴黎。然而，在他们来回途中穿过的边境上，到处都是被侧翼包抄但却全副武装的德国小分队，随便哪一个都可能把两个身穿美军制服、坐吉普车旅行的人干掉。巴克·拉纳姆认为，海明威那次疯狂的冒险能够平安无事，算他走了大运。

回里兹饭店后过了两天，他和德肯再次离开巴黎，这次是希望跟第四师取得联系，他们正向德军壁垒森严的锡格弗莱德前线发动进攻。9月底，美国艺术家约翰·格罗斯碰到海明威时，他正带着一群非正规作战人员，住在他称之为“海明威城堡”（或者“海明斯坦城堡”）的农舍里，农舍与德军之间没有盟军。在格罗斯看来，这位小说家在炮火中具有超凡脱俗的冷静，而他的冷静通过一天晚上在拉纳姆上校总部的军官食堂里发生的事得到了最好的表现。进餐时，一枚炮弹正好落在食堂外面，炸坏了窗户，炸灭了电灯。尽管每个军官马上趴到地上，海明威却沉着地继续在黑暗中切他的肉，吃他的肉。一根蜡烛点亮后，军官们戴着头盔回到餐桌，惊讶地发现海明威不肯学他们谨慎的样子。这个故事还有一种说法。拉纳姆上校记得，炸弹一爆炸，他和那些军官就朝藏土豆的地窖里跑，但当他命令海明威“快点把屁股挪出食堂进入地窖”而后者置之不理时，拉纳姆就又回到餐桌前，跟海明威坐在一起。听到第二次爆炸声后，拉纳姆让海明威把他妈的钢盔戴上，海明威还是不听。于是拉纳姆也取下头盔。由于拉纳姆十分佩服海明威，他在他的行为中就没有发现任何企图自杀的成分。在他眼里，镇定足以说明这件事。而格罗斯呢，他则既被海明威的行为所打动，又觉得他精神不正常。

这段时间他写给玛丽的信，不是叫她“最亲爱的泡菜”、“最可爱的小朋友”，就是“我心爱的”，充满了对她的爱意和渴望。但9月底回到里兹饭店后，他却把大部分的青睐抛给了马林·迪特里希，她也住在这家饭店，常常喜欢跟海明威呆在一起。“马林总喜欢逛下来，进入海明威的房间，在他刮脸的时候，坐在他浴缸上跟他唱歌，”玛丽在她的自传里回忆道。而他刚一进门，她本人则要跟他“好好地争论几句”，接下去则必定要吵几回。于是，一天晚上，三四个第二十二团的营级指挥官来吃饭的时候，海明威大声夸奖了马林，说她招待得好，却指责玛丽怠慢了客人。“整个晚上……你都怠慢了我的朋友，”他冷冷地对她说，这时，她的房间里最后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你的表现糟糕透顶，”为了强调他又补充说。玛丽将怒气压了一会儿，但只是一会儿。你的朋友都是醉鬼和莽汉。她说：“他们在我的浴室里闹翻了天，……他们还赶走了马林。他们在德国也许是英雄，但在这里是臭虫，臭虫，臭虫。但我——没——有——怠——慢——他——们，你那些粗野的朋友。”她后来发觉，“也许是英雄”这几个字令他再也忍无可忍，海明威上前一巴掌打在她下巴上。自从母亲用梳子背打她以来，这还是她头一次挨打。她趴在床上，一支手捂着灼痛的皮肤。“你这个可怜的胆小鬼，”

她嚶嚶地说：“好你个可怜的、肥胖的、愚蠢的胆小鬼。你打女人。”海明威坐到她身旁。她一把将他推倒，骑在他髋关节上面，双拳捶打他的胸部。“你个大恶霸，你个腐烂的自大狂。”她哭喊道。她很惊讶，海明威竟咧嘴看着她，和气地说，她发疯的样子很漂亮。

那天晚上，他们各睡各的房。早上，玛丽醒来后余怒未消，毅然决定要离开这个可怕的男人，自己生活。接下来几个小时里，包括两个昨晚来过的营长和马林在内，一连串使者来到她门前。他们传信说，爸爸很后悔，他是真地爱她。大约中午时分，门铃又响了。玛丽发现，来人是海明威，看上去兴致很高，不是装出来的。他说：“泡菜，我终于发现昨晚的问题了。请听我说。”玛丽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但还是让他说了下去。“你昨天理了发，是吧？”他问。是的，她说；她的朋友，里兹饭店的理发师每周都为她理。“她在你头发上做了点什么，使你显得很讨厌，很坏。”海明威急切地解释道：“她完全改变了你的面部表情。我昨晚不知道你是什么表情。但问题就在这儿。”尽管她在那一刹那间的反应是他在胡说，她却很快原谅了他。

七

由于好几位记者都抱怨他违反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争时期新闻记者行为的管理条例，10月初，海明威被传唤到设在南锡的第三军监察长总部出席听证会。对他具体的指控是，在朗布依埃镇，他取下了制服上的记者标志，带领着称他为上尉或上校的自由法国游击队员，协助保卫这座城镇并不断地在该地区巡逻。状告他的那些记者还作证说，他们在他房间里看见过手榴弹、地雷、火箭筒、步枪和一些小型武器，他布置并保留了一间地图室，一位真正的上校给他当参谋长。这些指控如果属实，必能将他逐出法国。

发过誓后，海明威开始熟练地为自己开罪。他有时脱掉上衣取下标志，是因为8月的天气又热又潮。尽管他给抵抗组织提过意见，他却一再拒绝了他们要他作为领头人的请求。詹姆斯·W·桑顿少校同样也就在城镇边缘部署队伍一事征求过他的意见，但除此之外他在保卫该城中没有发挥丝毫作用。如果有些自由法国游击队员称他为上尉或上校，他们这么做仅仅是出于热爱，就像新英格兰一些城镇的居民习惯把小渔船的主人叫船长一样。他房里堆武器和军火是因为朗布依埃镇存放武器的地方不够。他以记者的身份外出巡逻是为了找到好的报道素材。他有地图是真的，但地图是为他个人的职业需要服务的。至于那个所谓的给他当参谋长的上校，实际上是海明威给他当翻译，因为那位上校的法语很糟，只有靠人帮助才能跟那些游击队员们交流。10月8日，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巴克·拉纳姆，他已洗清了罪名。

此后五个星期，他和玛丽在里兹饭店过着简陋的生活，主要目的是重新掌握斯克鲁比先生，他这是在说他的性能力。然而尽管她十分老练，他第二次脑震荡带来的后果却依然使他无法行事。

在这段性焦虑时期，他不知怎么获悉玛莎从意大利来到了巴黎，住在林肯饭店。他终于打通她的电话，执意要她跟他吃顿饭。考虑到现在正是他们开始谈离婚的好时候，她便答应了。但不幸的是，她痛苦地回忆道，他带了“‘他’团里的一帮当兵的年轻哥儿们，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当着他们的面侮辱我，讽刺我。他们也难受，便慢慢地走开，我瞅准机会，从被团团围住的靠墙的座位上站起来跑掉”。他满怀宿醉的痛悔，送了她一张字条表示道歉，把他对她的态度比作是往圣杯上吐痰。但是，这种夸张对她毫无作用。

11月3日，她从荷兰给他写信，说采取确定性措施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都是诚实的人，大人物，”她哄骗似地说：“这样下去没有用，很愚蠢。我们俩不是这种风格。……我想最好是你我把事情了断。”

好像是有某种力量在强烈地诱使他结束包括婚姻在内的一些东西，11月中旬，他一头扎进了西部整个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之一：许特根森林战役。在那场战斗持续的可怕的日日夜夜里，与他同住一室的比尔·沃尔顿感到十分震惊的是，在没有战斗的间歇，他不断地一次次提到他母亲。他想让沃尔顿知道，他瞧不起她的原因之一是她收到他的钱时的样子，那些钱是他写了一些她因道德原因而不喜欢的书挣来的。他动情地说，这事是无法原谅的。

在被树林间跳来飞去的炮弹弹片的声音折磨了两个半星期之后，海明威乘吉普车回到巴黎。因为发烧、嗓子疼，他瘫倒在了床上。玛丽敏锐地发现，他的脾气也没个准。由于刚刚应邀参加了一场惬意的聚会，她身穿平民的衣着，带着一瓶白兰地来到他房间，希望酒能让他高兴起来。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博瓦尔来看过他，他跟她说。“他们说了有趣的事没有？”她随口问道，因为她的心思还在自己漂亮的黑衣服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活像个蜘蛛停在那儿？”他生气地问。玛丽不屑于回答，转身就一溜烟地走了。她后来在日记中说，不知道她与海明威对彼此来说是否真地很合适。她伤心地发现，他根本不懂感情，她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女人想抓住他不放，因为他简直是在把她们当婊子看。

里兹饭店的管理者们派了些医生上来给他检查，医生们都说他得了肺炎。海明威的弟弟相信医生的话。莱斯特跟海明威在一起时，有两三次发现他在浴室里吐过多次返回床上的时候，面色苍白，路都走不稳。然而，莱斯特的偶像又一次响应了战斗的号召。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突出部之战的战斗于12月16日打响，冯·伦斯德的队伍在卢森堡向美国第一军拉得很长的战线发起了猛攻。17日上午，还在出汗、发烧的海明威设法弄到一辆吉普车和一名司机后，就朝卢森堡进发。巴克·拉纳姆见到他那副样子，忙把他交给团里的医生，医生让他上床躺下，吞服了一些磺胺片。22日，他又能动地走动了，但那时德军的攻势已经减弱。

24日中午前后，玛莎在卢森堡露面，马上就与丈夫联系上了。虽然她总在显示他们的婚姻必须结束的决心，但她似乎又在给他一个最后挽救的机会。那天晚上，他俩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在罗登堡巴克·拉纳姆的住处过了夜。但第二天，他们坐吉普车巡视指挥所时，他又开始贬低她作为记者的能力，两人不欢而散。一星期后，他又逮着一个侮辱她的机会。住进所有美国记者都要住的卢森堡那家饭店后不久，比尔·沃尔顿碰巧在大厅见到玛莎，就请她晚上一起吃饭。那天早些时候，沃尔顿碰到海明威，跟他说要和他的妻子在新年的前一天约会。“我也来，”海明威张嘴一笑，说道。

那顿饭简直就是一场梦魇。海明威用各种各样的侮辱性言辞辱骂玛莎，而她也想到了一些适合于骂他的词儿。沃尔顿一度对海明威说，他不能闲坐在一旁，听他对一个女人讲那种侮辱人的话，但这位小说家听了这番责备后，耸耸肩说，他总不能用弓和箭去追杀大象。两人回饭店后，他又换了一种方式追赶他妻子。在沃尔顿房间里，他脱下外衣，仅穿着长内衣，又从工具箱抓起拖把和桶。他头顶着桶，端着拖把当长矛，开始试图将玛莎锁得严严实实的房门撞倒。“滚开，你个酒鬼，”她气愤地叫道。后来他终于走了，她和沃尔顿都重重地舒了口气。

从那以后，他似乎接受了他和玛莎的婚姻确实已结束的事实，因此他情绪明显好转。元月中旬，他一回巴黎，玛丽就注意到了这种情绪。当时比尔·沃尔顿住在里兹饭店，他也说他朋友的情绪好了，性情也活泼了。海明威说，斯克鲁比先生又能工作了，他感谢玛丽使他感到自己像个男人。沃尔顿记得：“他讲得很多。他为玛丽感到骄傲，他旋风般卷进里兹饭店的食堂时，这个娇小的姑娘就倚在他手臂上。”“她不是把他当作文学家来迎合的，”沃尔顿补充说：“而是把他当作很内行的斗士，是个男性十足、床上功夫极佳的男人。”

虽说一谈到性方面的成功她就脸红，可玛丽似乎已经认为，尽管海明威情绪反复无常，但他还是会让她幸福的，——虽然很快她就得到了一个相反的警告。巴克·拉纳姆给海明威带来了一份礼物：一个绒布镶边的盒子里装着的两支德国造手枪以及相应的子弹。海明威趁着醉酒的兴奋劲儿，迅速将一把手枪装上了子弹，在房子里蹦跳着，不时地透过法式窗户瞄准司法部后花园中假想的敌人。他正要朝壁炉开枪，拉纳姆阻止了他。海明威接着看见了他请玛丽借给他的一张她与第二个丈夫的合影。他把相片摘了下来，踏着舞步进了浴室，玛丽在后面追。“别像个傻瓜，”她嘟囔道。她感到非常反感的是，她看见他把相片搁在马桶上，朝它开了六枪。不仅是相片，就连马桶和饭店的部分管道也被这一连串的子弹打坏了。饭店的一些职员跑过来，玛丽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得到“那份理智和秩序。”

1945年的头一个星期，海明威返回古巴途经伦敦时，特地去多彻斯特饭店看望玛莎，让她吃了一惊。玛莎回忆说：“虽说他以前根本不谈离婚的事，他那次来时却说同意，他要像我想的那样在古巴离婚。……我巴不得离婚，这样我就能把护照上的姓名改回到盖尔霍恩。我最大的愿望是摆脱他和他的名字，赶快从这整个画面中走出去。”由于他去时她正患流感倒在床上，他只呆了一会儿。他向她保证说，不管是在办离婚手续的过程中还是在离婚以后，他都会照顾她的利益，就当是他自己的利益一样，说完就走了。

在他登上即将把他送回美国的空军轰炸机时，充满了希望，决心也很大。玛丽马上也会坐船跟回去。她先到芝加哥，将她要与诺埃尔·蒙克斯离婚并与厄内斯特·海明威结婚的打算告诉她父母，然后她到观景庄与他会合。他们分别后，他的日子会不好过，但他将利用这段时间恢复身体。他要每天在池子里游泳，做一些急需的书架，把第一次喝酒的时间推迟到中午。这段时间，他既谨慎又乐观。他经过了第三次重大战争，活了下来，他为自己获得了近乎疯狂的勇敢。他甩掉了第三个不合适的妻子，即将再娶一个，这一个可能与他的幻想更对路。离开巴黎的前夕，他给玛丽写了封短信，称她为“最亲爱的泡菜”，自己则署名为“爱你的丈夫，大山。”他发誓要永远爱她。但他俩的结合是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呢，抑或仅仅是老模式的重复，是那个结局的又一次开始呢？还有一场战争要进行，——一场与自己较量的大决战。

第六部 (1945—1961)

第二十二章 恐怖

—

在海明威生命的最后 16 年中，减少饮酒量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他也常常这样去做。用他的一位战后酒友小马里奥·梅诺卡尔——他是一位古巴糖场主的儿子，接受过美式教育——的话来说：“（海明威）恢复元气的本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可以拼命地酗酒，也可以在某一天忽然停止豪饮，只适量地饮酒。第二天，他便会同往常一样强壮，正常得没有什么两样……”除了恢复元气这种不同寻常的本领之外，他还具有在喝得半醉或大醉的状态下表现得完全清醒或至少是比较清醒的能力。这种天才使他得以蒙骗了莉莲·罗斯、A.E. 霍奇勒和其他的旁观者。

罗斯小姐第一次见到海明威是在 1947 年圣诞节的前一天。她前来爱达荷州的凯彻姆拜访海明威，与她正在为《纽约人》撰写的一篇关于海明威的斗牛士朋友悉尼·富兰克林的“人物特写”有关。她回忆说，当时，他正在自己的野营小屋前等她。

在零下 10 度的干冷空气中，他站在已经变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穿着卧室里的拖鞋，光着脚丫子，西裤上系着一条带有一个银制搭扣的印第安腰带，上身穿一件薄薄的西式运动衬衣，口袋上钉有钮扣，领口敞开。他的八字须已灰白，但他当时还没有开始蓄留那种使他看上去德高望重的大胡子，也就是那种最终会让他显得神圣和真诚的大胡子，——不知为什么，这种形象从未与他那粗犷的一面相冲突。那天早上，他看上去粗犷、魁梧、热情、友善且和蔼。我穿着很厚的外套，但我完全冻僵了。可海明威呢，当我问他时，他却说他一点儿也不冷。他似乎蕴藏着一种巨大的体内热能。

问题是：这种体内的热能是否是某种防寒剂呢？很明显，罗斯小姐并没有向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A.E.（阿伦·爱德华·）霍奇勒是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二十五六岁的空军退伍军人，他崇拜海明威的作品，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作家。1948 年春天，霍奇勒为当时正在聘用他的《世界主义者》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文学的未来》的文章。为了征求意见，他来到哈瓦那采访海明威。两人在电话里约定，下午五点在弗罗里迪塔酒吧会面。霍奇勒先到。当他在宽敞明亮的摆有红木餐桌的酒吧里等候时，他叫了一份“爸爸双杯”。正如这个酒名所暗示的，“爸爸双杯”是以海明威来命名的。它的原料包括两杯半的巴卡迪牌白色标签朗姆酒、半只葡萄柚的果汁和六滴黑樱桃酒，将这些原料放入电动搅拌器中有力地搅拌，然后倒入高脚杯中泛着泡沫端给客人。当海明威终于到来时，霍奇勒注意到他

穿着卡其布的裤子，束一条宽边的老皮革腰带，巨大的搭扣上刻着德文“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字样。上身是一件宽松的亚麻运动衫，脚踏一双棕色平底鞋，没穿袜子。头发乌黑，更显得两鬓斑白。他那浓密的八字须长得越过了嘴角，但下巴上并没有胡子。他显得很魁梧，但既不是体现在身高上，因为他只有 6.1 英尺，也不是体现在体重上，而是在整体印象上。他 200 磅

的体重大多集中于腰部以上。他的肩部宽阔而结实，长长的胳膊肌肉发达（左臂上伤痕累累，肘部有点畸形），胸脯厚实，肚子挺起，但臀部和腿并不突出。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就要喷薄而出的力量——他十分紧张，触电似地抖动不已；但他能控制住自己，犹如一匹赛马被勒得紧紧的。他停下来用流利的西班牙语与一位琴师交谈。他的身上有某种气质深深地打动了，——快乐：上帝呀，我想，他是多么地快乐啊！我从未见过有谁能够如此地沉浸在欢乐和幸福的氛围中。他快乐的情绪四处照射，在场的每个人都作出了反应。

当他走进酒吧时，霍奇勒进一步注意到他额头上有一条长椭圆形的疤痕。“霍奇勒，”这位小说家一边握手一边说：“欢迎到年轻人俱乐部来。”酒吧侍者在他们面前放下了两杯冰镇的代基里酒，它们装在花瓶似的玻璃酒杯中，比霍奇勒先前喝的要多一倍的量。“我们这儿拥有代基里酒制作艺术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海明威说：“一晚上曾喝掉16桶。”在一旁听他俩谈话的酒吧侍者接着说，16桶是酒店保持的最佳记录。霍奇勒回忆道，听到这话，海明威立即举杯品尝，他喝了一大口，让它在嘴里含了好一会儿，才分好几次咽下去。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双份的双杯酒不断地送上来。其间，他们俩人讨论的问题涉及到罗伯特·弗莱厄蒂的影片、特德·威廉姆斯、莉娜·霍恩、普鲁斯特、箭鱼的烹调方法、春药以及印第安人。八点钟，海明威起身准备返回观景庄，他在小型客车的前排座位上落坐，旁边是他的司机胡安。他小心翼翼地端着为这段旅途准备的酒。根据霍奇勒热心的观察和记数，这是他的第八杯。霍奇勒回到了自己的旅店。在那儿他千方百计地总算给他们的谈话作了些记录，尽管他满脑子都是朗姆酒的迷雾。

霍奇勒对海明威的外形描述使海明威的身高增加了一英寸；在对代基里酒的记数上，其中的两杯同样可能是夸张了。然而不管怎么说，他所记录的这件轶事表明，他并不完全了解海明威当时酗酒的情形，因为他从不曾理解——即使在他回忆时也是如此——当海明威步入酒吧时，环绕在他周围的快乐气氛正是被他自黎明起就很有可能沉湎于其中的狂喝滥饮引发的，而他为旅途准备的那杯酒也不过是晚餐和临睡前要喝的酒的序曲罢了。

八年以前，海明威自己就曾在一封写给马克斯·琅金斯的“周日例行宿醉信”中夸口说，前一天夜里，他曾以苦艾酒开场，晚餐时喝了一瓶红葡萄酒，在镇子上玩回力球之前又转而喝了伏特加，此后“又痛饮威士忌和苏打水直至凌晨三点”。战后，海明威吹嘘耐力可以随着饮酒量的增大而增强，他自己就是这方面最完美的表率。他可以喝得越来越多，却从不醉倒。1949年，巴克·拉纳姆去观景庄访问时，他的印象是，海明威喝了“数加仑的烈酒，多半是以15：1的比例混合而成的马提尼酒。……虽然他服用大把安眠药，但他总是在早上四点半就醒了。他通常立即又开始喝酒，同时站着写作，一只手握铅笔，另一只手端酒。”

因此，在1945年6月20日这个雨濛濛的早上，当玛丽将飞回芝加哥去办理她与第二任丈夫离婚的法律终结手续时，尽管海明威看上去相当清醒，他的反应却明显地因酒精而变得迟缓了。他命令司机胡安坐到后面去，自己亲自开车去机场。车到狩猎者俱乐部时，他离开了通向哈瓦那的主干道，抄了一条近路。这之前，运送泥土的卡车曾把大块的泥土漏到路面上，雨水让

泥土滑得像肥皂一样。车开始打滑时，海明威就提醒坐在身旁的玛丽：“真是糟透了，泡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结果，在加速时他们一头撞进了一堆高高的土里。海明威的额头被后视镜撞破了，鲜血直流。四根肋骨被方向盘撞断，左膝盖被仪表盘撞伤。玛丽飞出了挡风玻璃，要不是位聪明的外科整容医生的帮助，她下半辈子就得在脸上留下个丑陋的疤痕。

在“皮拉尔”号游艇上，酗酒也是日常的训练活动。1950年夏，当他去替换他的舵手伙伴时，厄运又一次降临于海明威：他在潮湿的甲板上滑倒了。他是这样向钦克·多尔曼-史密斯描述这次事故的。“当他忽然转动侧舷以进入航道时，我一只腿绊在舷柱上，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到（更糟的）右腿上。划开了一条五英寸的口子，一直切到骨头里面，切断了一些我从来不知其名称的动脉。……同时还受到了五级（薄福风级）的震荡。”六年来，这是他的第三次脑震荡，也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或第五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二

临近1947年夏末时，海明威开始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吱吱声在大脑中作响，就像乡间小路边电话线摇曳的声音。他本来就有高血压的倾向，而他的饮酒量更是加大了犯病的可能性。在向埃雷拉医生咨询时，他发现他的血压是高压215，低压125，体重也达到了256磅。通过节食，减少饮酒量，服用抗高血压药物，到今年岁末他减掉了28磅，血压也降到了高压150，低压104。但是，再次酗酒很快便洗劫了这次胜利。

1950年9月，他第一次发生水肿，造成右脚和右腿几处严重疼痛。他说，他觉得他的脚冷得像冰，肿得像“马戏团的大象”。几年之后，正如马德里的胡安·马迪纳威谢医生在1956年10月所记录的，他的水肿就已从浮肿的眼睑上看出来了。当时，海明威在几星期不停的饮酒之后来找胡安·马迪纳威谢医生为他作体检。胡安·马迪纳威谢医生发现他的血压达到了高压210，低压105，胆固醇含量高达380，并患了肝病、动脉硬化（通常是糖尿病的信号），在主动脉周围的区域还患有炎症。那天早些时候，海明威在机场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阿伦·霍奇勒，他那时已成为海明威最亲密的朋友。“我的一切体检指标都不合格，”他说：“马迪纳威谢为我制定了严格的食谱，每餐不得多于一杯酒，每天只能饮用五盎司的威士忌。他还一再重申，不能醉酒，不能醉酒。你能说这是让往日的那个快活人恢复活力的药方吗？”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1957年初他的体重降到了200磅，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状况也得到了改善。然而，这次胜利也同样没能保持多久。

肝硬化是一种能够改变肝脏结构、损坏肝脏功能的致命疾病。无论何人，只要每天饮用了四盎司或四盎司以上酒精度高达86度的烈酒，就会比常人有着更高的这种疾病的发病率。1953年夏末，在东非的那段日子里，海明威每天要饮用两三瓶烈酒，每餐都必备有酒。肯尼亚狩猎部的巡视员丹尼斯·扎菲罗曾证实说：“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醉醺醺的，”尽管他很少表现出醉态；他“只是变得更加开心，更加受欢迎，也更加胡说八道。没有酒他就变得阴郁、沉默和压抑”。1938年1月，海明威在巴黎突然感到肝区硬变疼痛，他这才意识到他的肝脏出了毛病。从此，与肝脏有关的疾病一直折磨着他的晚年。1957年，在写给伯纳德·贝伦森的信中，玛丽·海明威说，让厄内斯特眼下心情压抑的“主要原因”，是“他那可怜的、长期折磨人的肝脏”。乔治·普林顿在回忆50年代与海明威的会面时也说：“他的肝脏很糟糕。你甚

至可以看见他的肝区像一只吸饱血的长蚂蟥从身体里肿胀出来。”

然而，甚至连 1954 年 1 月在非洲上空两架飞机失事时给他造成的脑震荡，以及肝脏、脾脏和右肾的破裂、左眼的暂时失明、左耳失聪、背骨粉碎性骨折、右肩与右臂的扭伤、右脚的扭伤、括约肌的暂时瘫痪，还有头部、胳膊和面部的一级烧伤等等，都没能让海明威与他的酒瓶绝缘。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对他的肌体所造成的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小的压力也可能导致可怕的崩溃，其中最糟糕的一次崩溃始于 1955 年 11 月 17 日。那天，海明威在哈瓦那通风条件极差的体育宫参加授勋仪式，他被迫在电视摄像聚光灯下坐了两个钟头，等待接受圣克里斯托瓦尔勋位。三周后，他给斯克克里布纳公司的华莱士·迈那写信说：

汗水湿透了我所有的衣服，以至于可以从我穿的黑外套上拧出水来。我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更衣室里换了衬衫和外套，但由于考虑欠周没有带上可以猛喝一口暖和一下身子的酒，也没多带几条裤子。结果是我那在飞机失事中撕裂了的右肾严重着凉，疼痛难忍，另一个肾和肝脏也受到了影响。当我的右脚肿得像个足球，血压使脚指甲充血时，我开始认识到事情的确很糟了。那真是让人难忘。……脚部浮肿是 11 月 19 日发生的。从 20 日起医生就让我卧床休息。我直到那天深夜才和他联系上。他和另外两名医生被化验结果（就不用细节来打扰你了）给吓坏了，但这三天来的化验报告都很棒。

加起来，他一共卧床休息了 40 天。

1959 年夏，由于海明威不久前去潘普洛纳访问时毫无节制地喝酒导致了肾功能紊乱，他接受了森瓦利的一个朋友乔治·塞维尔斯医生的治疗。12 个月之后，一位古巴医生告诉海明威，他患有血色素沉着病，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其特征是患者全身，特别是肝脏和胰腺内，有含铁血黄素即一种含铁的分解物质的沉着。这种疾病几乎只发生在 50 岁以上的男性患者身上。在接近四分之三的病例中，血色素沉着病可以被定义为肝硬化、皮肤上色素沉着和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的肝脏通常变大、变硬，并有瘤子；糖尿病变得越来越厉害；经常性阳痿；心肌梗塞症也不少见。在接受古巴医生诊断后的那个冬季，海明威在梅奥诊所被确诊为患有危险的高血压、肝肾疾病、脚踝浮肿、血尿、血脂过高以及轻度糖尿病，其主要症状为多尿、干渴、皮肤干燥。该诊所的肝病专家休·R·巴特医生也认为他“很有可能”还患有血色素沉着病。

周期性的肌肉痉挛和长期失眠，间或性的阳痿和早衰，这些也都是海明威酗酒引起的众多灾难。由于对疾病的免疫力逐渐丧失，他又染上了极度痛苦并且最终会使他相貌畸形的皮肤病。

1949 年 3 月，在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他的皮肤病由于一粒掉进左眼的沙子发生感染而开始发作。它很快发展成为丹毒，即一种严重的链球菌皮肤感染，通常伴有发寒、发烧，有时还恶心呕吐。海明威的症状是，他的整个面部包括眼睑都被感染了。其病情如此严重，医生们都害怕会引起脑膜炎从而导致失明。帕多瓦的一家医院用青霉素进行治疗，清除了大多数被海明威称之为“异物”的东西，但那年晚些时候，在观景庄，巴克·拉纳姆还是注意到他的皮肤病仍然很糟，他甚至不能刮脸。1950 年 2 月，他回到科尔蒂纳时又染上了另一种皮肤病。虽然经过每天注射 100 万单位的青霉素，

附加金霉素和经常使用的鱼石脂药膏，他最终抑制了它，但他仍然很容易受到疹子的侵袭，并且可能因良性皮肤癌而导致破相。一位西班牙记者何塞·卡斯蒂略一普切尔在一本书中回忆起在西班牙的海明威时说，到 1960 年，一条总不见好的亮红色斑块从这位小说家的鼻梁开始向下几乎延伸到嘴巴，向上几乎延伸到眼睛，那上面不断地有鳞状白片剥落。

然而，烈酒对他心理上的伤害可能要比对他身体机能的损害大得多。目前，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经过一段时间后，酗酒会改变大脑细胞的功能，损害神经系统，使大脑皮层收缩，促使内分泌系统紊乱，进而导致机体不再自然分泌欣快剂。因此，一旦停用酒精，兴奋高潮过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正常的安宁感。可悲的是，就海明威而言，他原本是依赖酒精来振奋精神，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地导致了这种感情的阻滞。在他的晚年，由于他大量地服药，他对借助酒精来振奋精神的长期需要就变得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的抗高血压药都是镇静剂，他每晚必须要服用的大把大把安眠药也一样。在他用一杯杯戈登牌杜松子酒或葡萄酒来服药的同时，海明威等于就是在心理上玩一把俄罗斯的轮盘赌。

不过，在 1945 年春天，一系列将更加残酷地考验他的勇气的病痛——这些病痛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企图自我毁灭的冲动——还没有表现出来。至少在表面上，人们似乎还没有理由怀疑这位受伤的斗士仍然处在体力和文学创造力的顶峰。当时，他回到了古巴，去迎接他那第四任的妻子。

三

“玛丽小姐很有耐力，”1956 年，海明威向《观望》杂志的读者们透露：“她还很勇敢、迷人、聪明，是一个能让与她在一起的男人感到很愉快的妻子。她还是一个出色的钓鱼能手，一个不错的飞鸟射击手，游泳健将，高超的厨师，很有品味的葡萄酒鉴赏家，出色的园艺家，业余天文学家，艺术、政治经济学、斯瓦希里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研究者，并且能用西班牙语管理好一条船或一幢住宅。”说得不错，玛丽是很有耐力。为了维持与这样一个男人——根据玛莎·盖尔霍恩后来的判断，这个男人“每年都变得更加疯狂”——的 15 年的婚姻，她必须如此。

玛丽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大多数早晨，海明威都会“兴高采烈地醒来，带着朝气蓬勃的计划”。然而一顿苏格兰威士忌、杜松子酒和香槟酒的早餐，就能把吉基尔博士变成海德先生，而且其速度惊人，足以令玛丽目瞪口呆。说到这一点，玛丽总是忘不了 1946 年 3 月 14 日发生在她的婚礼上的事情。根据古巴婚姻法，那天早上一位忧郁的律师在一间尽是老式古巴竹料家具的忧郁的办公室里向她解释说，一旦要解除婚约，任何一方赠送给对方的礼物都必须归还。“难道也包括我的结婚戒指？”感到震惊的玛丽想要知道答案。“当然了，”她未来的丈夫插话说。“我就不能从你这儿带走任何东西吗？”玛丽佯装绝望地问。“只可以带走我所拥有的一切，我的小猫，”海明威答道，突然激动起来。当他和玛丽还有他的两个小儿子以及温斯顿·格斯特准

吉基尔博士是 19 世纪英国小说家 R.L. 斯蒂文森所著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一位善良厚道的医生，因服用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变成了另一个名叫海德先生的极其凶残的人。——译者注

根据古巴法律，如果你以遭到抛弃的理由在离婚案中胜诉，你还可以获得前任伴侣名下的一切财产。海

备休息一会儿并在弗罗里迪塔酒吧吃午饭时，海明威咕哝道：“让我们现在就举起毒药杯吧。”玛丽颇为震惊，冲口而出说：“你这个杂种。只有该死的人才会在午餐时痛饮一番。”她的指责并未能让他感到羞愧。“新娘可真是横眉冷对啊，”他嘲弄地反驳着。“我倒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中年的拳击手而不是新娘，”玛丽也反唇相讥。在律师办公室里正式签署婚姻契约之后，这对理应感到幸福的新人和二十几个朋友在哈瓦那的一间寓所内聚会，喝香槟，吃鱼子酱。在几个“情绪愈来愈高涨的”小时内，玛丽回忆说，她和海明威都很开心，但在回家的路上，她的满意之情全被“一场愤怒的责备和辱骂的小型地震”所吞没。一回到观景庄，海明威就“心安理得地就寝并进入了梦乡”，而玛丽则愤怒地从壁橱里拖出一些行李，开始收拾她的衣服。早上，海明威“像往常一样恢复了活力，兴高采烈”，玛丽便决定不再离开他。

50年代末，当她再次濒临要离开他的边缘时，她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她的性生活的缺乏。但是她需要多久或多么频繁地忍受这种失望，她并没有说。然而不论是私下里还是明面上，海明威自己则坚持说他与玛丽的性生活非常美满。例如，在东非，1953年12月20日清晨，他拿起玛丽关于他们这次游猎的日记，在上面题了长长的几句话，其中回忆起他们1948年在威尼斯托尔塞罗岛做爱的欢乐情景。在深秋和初春的一小段日子里，他们住在洛坎达—西普里亚尼饭店，“壁炉里燃烧着山毛榉木柴，他们每天至少在清晨、中午和晚上做爱，度过了爸爸所知道的最美好的时光。”

当然，日记中那段文字的感人之处并不是因为它提到了他们做爱的频率，而是它表现出了的对雌雄同体与性别角色转换的无法抗拒的迷恋。海明威与玛丽的生活使他在创造凯瑟琳·巴克利和玛丽亚时所表达的无言的幻想成为现实。

她一直都想成为男孩，像男孩那样思考，但不必丧失任何女性气质。如果你要是被这一点弄糊涂了的话，你就该去退休。她喜欢让我当她的女孩，我也乐意如此，这倒不是因为我完全变蠢了。……作为回报，她奖励我，到了夜里我们便做任何既能让她高兴也能让我高兴的事。……玛丽从未有过女同性恋的冲动，可她总想成为一个男孩。因为我从未喜欢过任何男人，也不喜欢与男人发生任何接触，除了一般的西班牙式拥抱之外，……我喜欢感受玛丽的拥抱，那种感觉非常新颖，超越一切宗族的律法。12月19日晚，我们实践了这些事情，我从未如此幸福。

四

无论玛丽的奖励是什么，海明威从未以她所热望的忠诚表现来回报她。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从始至终，他都肆无忌惮地与其他女人调情。据玛丽说，40年代后期，电影导演霍华德·霍克斯的美丽的金发妻子斯丽姆——她曾一度是一名模特，后来成为了基思女士——就曾是众多与海明威“彼此倾慕的女友”之一，另外还有发梢卷曲、活泼可爱的吉姬·维那特尔，她是小说家和电视剧作家彼得·维那特尔的妻子。（1949年12月1日，离午夜12

明成就曾援引这条法律，从玛莎·盖尔霍恩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包括500美元的银行帐户、她的汽车、借枪、打字机、网球拍和她的长内衣等。

点只差几分钟时，在巴黎的里兹饭店，玛丽躺在她于战时曾经用过的老房间里，满怀妒忌地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从吉姬·维那特尔的房间里出来到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可厄内斯特说：‘我一会儿就来。’”）不过，很有可能的是，在这些关系中，暧昧的成分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少得多，因为对海明威来说，似乎表面才是最重要的。甚至当玛丽呆在芝加哥，他叫了一名 18 岁的哈瓦那妓女——他昵称她为色诺芬比亚——与他在观景庄一同进餐时，他的动机也不过是要向马里奥·梅诺卡尔和温斯顿·格斯特这类玩弄女性的高手们炫耀一下与他共同进餐的女伴，而不是真想带她上床。这类戏剧性的表演同样也是他向阿德里亚娜·伊万契奇求爱的特征。

他们的相见是在 1948 年 12 月的一个雨天。巴罗内·南尤奇·弗兰凯蒂是一位意大利运动员。他邀请海明威参加他在塔利亚门托河上拥有的狩猎小屋举行的聚会，这所狩猎小屋位于皮亚韦河畔福萨尔塔以北 25 英里处。阿德里亚娜是弗兰凯蒂的客人中唯一的女性。整个下午的狩猎活动结束后，海明威撞见她正在小屋厨房里的火堆前烘干她美丽的黑发。得知她忘了带梳子来，他从夹克的口袋中摸出了自己的梳子，把它整整齐齐地掰成两半，递给她一半。对于一个需要女人才能感觉到完整的男人来说，这真是个颇具深刻含义的举动。

她很快就要过 19 岁的生日。正是在这个年纪的那天晚上，他在福萨尔塔受了伤。由此，也就难怪在《过河入林》中他会让坎特韦尔上校详细地把战场上的故事描述给他年轻的意大利情人雷纳塔听。雷纳塔这个名字也反映了小说家的幻想：阿德里亚娜就是他自己的再生。她和他之间还有另一条他相信确实存在的纽带，那条纽带就缘起于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这个事实。卡洛·伊万契奇是威尼斯里米迪奥大街上一所坚固的住宅的主人，同时也是塔利亚门托河畔圣米凯尔一处房地产的主人。战后，他曾打算竞选威尼斯市的市长，但在 1945 年的春季，他为政敌所谋杀。所以，当海明威开始叫阿德里亚娜“女儿”时，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对他来说，马林·迪特里希以及其他许多同样吸引过他的成熟女性可能也是“女儿”，但是这个没有父亲的阿德里亚娜与他的确并不同属一代人，因此这种称呼就使他对她的渴望带上了一种乱伦的扭曲。

丹毒发作后，海明威在帕多瓦的一家医院经过治疗得以康复。之后，他于 1949 年 4 月回到威尼斯，邀请阿德里亚娜和她的兄长詹弗兰科与他在格里蒂皇宫饭店共进午餐。这年的下半年，他忙于写《过河入林》这本书，他们彼此之间依靠通信来往。1950 年的冬天和春天，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有过几次有他人陪伴在场的重逢。在母亲和兄长詹弗兰科的陪同下，她于 1950 年 10 月来到了观景庄，一直呆到 1951 年 2 月。

在他写给阿德里亚娜的信中，他的声音里跳动着一种无法满足的激情。他呼喊着她，他思念她那“利刃一般的智慧和可爱的心灵、身体及精神”；他告诉她，他想把她拥入自己的怀中，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他一次次地称她为“海明斯坦”，而自己则署名为“阿·伊万契奇”，此举意在向她说明，他们是如此地亲密，完全可以互换身份。每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会连续几分钟地抚摸着她的手，还总忘不了赞美她那蹩脚的诗歌和糟糕的绘画。当她竟然冒昧地把她为《过河入林》和《老人与海》所设计的护封交给斯克里

布纳公司时，这位愚蠢而多情的作者竟然强迫出版商接受了它们。

“如果阿德里亚娜对于作为男人的海明威怀有一丝情感，他们就有可能发展出一段爱情，”后来，小马里奥·梅诺卡尔这样评论阿德里亚娜与海明威的关系。“她接受了他给予她和家人的款待、善意与慷慨，但却没有任何回报。”换句话说，阿德里亚娜做好了与海明威结婚的准备，以此作为一种手段去恢复日益衰落的家族财富，并且实现与闻人名流过从甚密的梦想。但是，对于海明威的身体，她并不感兴趣。至于海明威呢，简而言之，只有当她成为海明威夫人时，他才能与她发生关系。正因为如此，他更是按捺不住地相信她比玛丽更聪明、更可爱，其出生也要高贵得多。要不是在观景庄出了那件丑事，要不是在伊万契奇一家人面前发生了那难堪的一幕，要不是随后玛丽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他很有可能最后会发展到满足她对自己的一切要价。

根据玛丽多少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自传，这一幕发生之前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一天晚餐的时候，她主动提出帮助詹弗兰科·伊万契奇填写一份去美国访问的签证申请表。用完甜点之后，她把自己的手提式打字机放到客厅的桌子上。当她和詹弗兰科正在工作时，海明威走进房间，随即勃然大怒。他拿起打字机就往地板上摔。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当伊万契奇一家、埃雷拉医生和他们的主人们坐在一起喝酒时，玛丽的一些轻率言辞又让海明威发作了。这一次他把酒泼到了玛丽脸上。“你难道非得到处摔东西才能让你得到客人们的钟爱不成，”玛丽一边说着一边走回她的卧室。

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之后，一天早上，她打断了正在自己的打字机前工作的海明威，叫他到客厅里去和她见面。他非常顺从地这样做了。经过她在自传中的重新整理，接下来的摊牌过程是这样的：

“我的话不多，但是你要仔细听好，”我说，目光直视他忧郁的棕色眼睛。“我想我能理解你对这个姑娘的感情。”（我避免了使用“着迷”这个词）。“我早就告诉你，我同情你。”（我把“幼稚”和“傻瓜”这类词咽了下去。）

“你对我的侮辱与无礼伤害了我，这一点你一定明白。”

“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爱你，而且我爱这个地方，爱“皮拉尔”号游艇和我们在这里正过着的正常生活。”

“所以，尽管你试图赶我离开这儿，离开你，可你是不会成功的。你听见了吗？因为我认为这对你我都会很糟，会令你我都无所适从。”

厄内斯特点了点头，他听到了我说的话。

“好了，就说这些。无论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除非杀了我，那样会弄得一团糟，否则我仍会呆在这儿，掌管你的房子和你的观景庄，直到有一天你能在早晨清醒地到我这儿来，坦率而明白地告诉我说你想让我离开。”

“我希望你听见我说的话了。”

厄内斯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一脸的沉思，卡其布短裤下的腿上起了鸡皮疙瘩。那是一个凄冷的早晨。

据斯克里布纳公司当时的广告宣传部主任说：“‘阿’为这两本书设计的护封封面画是如此糟糕，我们不得不很巧妙地把它们重画一遍。”

“好的，我都听见了，”他说完就出去了。

他从来没有说过让我离开。

他是从来都没有说过让她离开，但是在被她制服一个半月之后，他开始称她是懒婆娘，并抓起了一个她在威尼斯买的烟灰缸扔出门外，烟灰缸在露台的红色瓷砖上摔得粉碎。更有甚者，不管是在信中还是在当面，他都继续因为阿德里亚娜而丑态百出。1954年4月，他们见了最后一次面。当时，因为在非洲经历了两次飞机失事，他正在威尼斯疗养。他对阿德里亚娜所象征的青春是如此地渴望，终于无法再控制住感情的决堤，痛哭起来。他说他想活下去，这样就能再见到她，因为他仍爱着她；他发疯似地补充说，离开她就像被截了肢一样痛苦。当泪水开始流下来时，他惨兮兮他说，“瞧哇，女儿，瞧。现在你可以对所有的人说你见过厄内斯特·海明威掉眼泪啦。”

五

海明威认识到，直到1950年的这10年间，他都有可能不会发表任何值得一提的作品。作为补救，他便决定着干几项宏大的计划。然而可悲的是，他的自律能力的消失与这项决定并驾齐趋，结果就使得他的工作变得完全难以驾驭。

从1945年至1947年，他断断续续完成了长达1195页的手稿，是一篇题为《年轻的海洋》的故事，它将作为一部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关于海洋的漫谈故事的第一部分。他希望这部海洋漫谈最终将成为一部陆、海、空三部曲的开篇卷。1950年12月1日前后，他开始创作海洋漫谈的第二部分《缺席的海洋》，到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宣布已经“完工”。在用仅仅六周的时间迅速完成了一部关于一位老人在格尔夫河上与一条大鱼搏斗的无名中篇小说之后，1951年3月5日，他开始了第三部分《成熟的海洋》的写作。三个半月后，在写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信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目前正忙于修改海洋漫谈的第一部分，自1947年以来他一直没有读过这一部分。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他把它“完全重写了一遍”，删减了179页，但是仍有大量的删减工作要做，因为他想把这个故事控制在15万字以内。在给斯克里布纳的信中他还指出，他想把那篇关于老人与鱼的无名中篇小说也纳入到海洋漫谈中作为第四部分。最后，他告诉他的出版商：

据我的医生说，我绝对能活着完成这部书。但是，六个月来我工作得太勤奋了，我知道自己需要换个环境休息一下。通过训练和节制饮食，人们可以很快就让血压恢复正常，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然而紧接着的辛勤工作很快就会令你疲倦不堪，因而你很容易被击垮。我不认为会有多少作家能够以每天1000字的速度一口气连续创作四个月，同时又拿出像你在这儿时曾经读到的那些作品。或许也存在这样的人吧。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未做到过。

在向朋友们多次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仍不满足的阿德里亚娜1980年再次在她的回忆录《比安卡塔》（书名取自海明威与玛丽在观景庄增修的一座塔的名字）中提到此事。尽管阿德里亚娜对此书寄予厚望，评论界与公众对它的孤芳自赏却并不关心。她在生活中还经历了其他痛苦：两次不幸的婚姻，与儿子的感情疏远，酗酒以及一连串的神经性疾病；同时，她也无法适应自己文学理想的破灭。1983年3月，她在罗马西北部奥尔贝泰洛的一个农场的树上自缢而死。

现在，我想保持与创作第一部分时同样的速度。可我恳请你，不要因为我说上面的那些话，就以为我认为第一部分很逊色。

他向斯克里布纳大胆地保证第一部分质量出色，其实这正掩饰着他的绝望。他唯恐第一部分不合格，同时，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后，他愿意署名发表的唯一一篇关于海洋的故事手稿，是那篇关于老人与海的故事。不过，他去世九年以后，他的遗孀和小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合作，删减编辑了他所有尚未销毁的未经发表的海洋漫谈手稿，以《海流之中的岛屿》“——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义出版。

在这部遗留下来的长篇小说中，夹杂有许多可以表明海明威仍然宝刀未老的章节。其中的“比米尼岛”这部分，以阳光普照、浪花飞溅的场景描写作为开篇并统领全文，随之而来的，是一篇关于托马斯·赫德森的一个儿子长达几小时地与一条大鱼搏斗却不能获胜的扣人心弦的故事。这篇故事完美地再现了作者对与大自然相关的万事万物的无限同情。不过，“比米尼岛”这部分同样也表明，海明威无意在小说中回避他的顾影自怜，他也没能想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去解释他为什么会小说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及自杀。为了给他自己配个“双胞胎兄弟”，他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名叫戴维斯的作家与画家赫德森凑成一双人物，但这种做法只是导致了叙述焦点的丧失。在小说的其余部分，脱缰野马似的大男子主义随处可见。“古巴”是小说的第二部分，有关佛罗里达塔酒吧的一个场景描写是它的特色。赫德森和一群酒吧间的常客们一起聊天，其中还包括一个名叫“真诚的莉尔”的妓女。这段描写既无聊又令人尴尬。小说的第三部分是“在海洋上”，它浪漫地再现了作者追寻德国潜艇的经历。这是一篇毫无意义充满暴力的冒险小说，与其说是海明威所为，倒真不如说像是一位海明威的模仿者为男性杂志所撰写的故事。

自从此书 1970 年 10 月 6 日出版以来，对其最有力的评论来自《新共和》的乔纳森·亚德利、《哈泼》的欧文·豪、《新政治家》的约翰·厄普代克、《评论》的斯蒂芬·多纳迪厄和《纽约书评》的克里斯托弗·里克斯。他们的评论都无可挑剔。“（《海流之中的岛屿》）处处闪烁着（海明威）被浪费的天才，”亚德利说：“使阅读成为一种令人沮丧、令人悲哀的经历。”豪认为，托马斯·赫德森的“严重缺陷”，“在于他深刻地再现了他的塑造者，但其本身的塑造却并不深刻。读者通过他探察到海明威的内心世界，却无法把这个人本身作为一个有趣的人加以观察。”在海明威的早期作品里，厄普代克评论说，“他对粗糙的痴迷显得既有荣耀也有必要，整整一代的美国男性都学着以（他的那种）坚韧不拔的口吻说话。但是在这里，艺术的张力被突然扭断，敏感视野与病态的人格之间的界限也被超越。”多纳迪厄断言说，海明威在最后一部分显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但是这部小说在总体上说都有一种失眠者的焦躁不安的特点，让人联想起一个心力交瘁的人在绝望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情景。结果是，果敢和决心与困惑和彷徨复合并存，从而导致了这部书的叙述力度强弱不均：故事常常会显得稍稍有些缺乏控制，仿佛开始了一种自由生长的生命，时而会开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奇花异朵来，接着却被人斩断，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再次出现，就像是九头蛇的脑

关于“九头蛇”的传说源于希腊神话。相传割去它的九个头中的任何一个头，都会再生出两个头。后为

袋。”对于里克斯来说，《海流之中的岛屿》有如“布朗神父的故事，里面有太多的杀人害命的凶器，令人惊惶失措”，——他这么说，意思是指赫德森那一连串令人生畏的痛苦：婚姻的多次失败、儿子们的死亡以及由于酗酒和缺乏自律给自己的画家生涯所带来的威胁，这些都构成了将他层层包围在内的一系列事关重大的问题。由此而然，里克斯最终下结论说：“这部小说就像是 T.S.艾略特眼中的《哈姆雷特》。艾略特所寻找的是一种客观关联物，是‘一系列事物，某种情景，一连串事件，它们可以成为那种特殊情感的表达公式’；而他所找到的是病态和失败。”

援引艾略特对哈姆雷特的问题的分析来理解托马斯·赫德森的问题，的确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问题是绝然相反的。因为，赫德森不像哈姆雷特，他丝毫不提自己对母亲的恶感。

六

这位作家在即将迎娶一位梦想成为男孩的女人为妻时，也同样希望拥有听众。为此，海明威于 1946 年 1 月开始创作一部新小说。在这部书中，他准备采用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的语言，更加生动地表现男女两性模糊难辨。

在《伊甸园》的原始手稿中，充满了作者对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的怀念，虽然她们在小说中的替身比丈夫们要年轻。小说开始时，故事的焦点放在一个叫戴维·伯恩的知名作家与新娘凯瑟琳在勒格劳一迪鲁瓦的蜜月旅行上。这座小渔村坐落在罗讷河入海口的脚下。1927 年，海明威与保利娜在婚礼后就来过此地。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又像在《海流之中的岛屿》里一样，再次为自己塑造了“双胞胎兄弟”，他引入了第二位主人公：年轻的画家尼克·谢尔登。他那印第安人的黑发又厚又长。他和他的红发妻子巴尔巴拉住在巴黎的一间公寓里，而这所公寓又酷似海明威和哈德莉 1922 年至 1923 年的家。最后，这两对夫妇终于相遇了。相互之间的性诱惑力致使两个妇女的关系融为一体。然而，女同性恋的欲望只不过是促成一种更大的偏向。在他们的婚姻中，每个夏娃和她们的亚当一样，都如痴如醉地迷恋着巴黎罗丹博物馆的一尊名为“变异”的雕像。关于这尊雕像“没有任何照片……或复制品出售”。他们感兴趣的关键在于这尊雕像象征着那种性角色倒置的实验主义，而这种实验主义主导着他们的生活，萦绕在他们的思想中。

海明威的写作速度已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到 1946 年 2 月中旬，他的手头上已经完成了 400 页；截至 4 月底，是 700 页；到 7 月中旬，就达到 1000 页了。他向巴克·拉纳姆承认说，自己正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驱使，他认为自己活不过那一年了。然而到 1947 年初，他又承认只有 100 页被打字机打了出来，不久后，他就把手稿塞入了文件夹。可是一年之后，当他提到这本书的主题是“一个人必定会失去他幸福的乐园”时，那又说明他仍在考虑这本书。50 年代初期，作者断断续续地试图进一步理清手稿的思路，但是一直到 1958 年春，他才终于开始对整个故事进行系统地修改。到那年 6 月底，他已修改了 28 章。7 月份结束时，海明威充满了自信。他快活地宣布，在三周之内就可以完工。9 月中旬，他再次提到已“接近尾声”。但是到了岁末，他就不再提这本书。另一部宏伟的计划——一部长达 20 万字的著作——也以失败而告终。说到海明威的性别双重性，没有哪一本小说能比《伊甸园》的表

现更为淋漓尽致，其中包括他在 50 年代着手创作却没有完成的那部关于尼克·亚当斯和他的妹妹利特勒斯的流浪汉小说。他没有出版《伊甸园》的原因之一，也许是觉得其中的胆大妄为尚不能被当时的公众所接受。但是，他放弃这部手稿的主要原因显然还是由于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地认识到手稿的凌乱。迫于一种倾吐思想和卸下包袱的疯狂需要，他一开始就在六个月内完成了 1000 页；然而最后，面对一大堆令人尴尬的描写、一连串曲里拐弯毫不连贯的情节以及病态的不断重复的对话，他也实在是束手无策、无可救药了。

当然，即使该小说的众多瑕疵阻止了海明威去出版它，但它们终究未能阻止他的出版商们。1986 年春，经过作家兼编辑汤姆·詹克斯大幅度的出色修改，斯科里布纳公司出版了小说的节略本，包括戴维和凯瑟琳的那部分故事以及一个可能是由戴维插叙的奇谈趣闻，所讲述的是关于父子俩在非洲旅行捕猎大象的故事。第一版印刷的 10 万本一周内全部售完。该书也被纳入“本月新书俱乐部”，其中部分章节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运动画报》和《生活》杂志上。

在勒格劳一迪鲁瓦，28 岁的俄克拉何马人戴维·伯恩发现自己受到一个意志强硬的疯女人的压力，有时不得不佯装做一个女孩。这个疯女人并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那 21 岁的新婚妻子。她的身高与黄褐色头发显现着玛莎·盖尔霍恩的影子，但是她在床上的行为却很像作者在和玛丽游猎时日记中的描述。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凯瑟琳的疯狂变得更加类似恶魔（戴维戏称她为“魔鬼”并非毫无缘由）。当她完全被自己的疯狂所控制时，她痛斥他所写的那些有关他少年时代的小说“毫无价值”；她还提议建立一个“三角家庭”，作为进一步削弱他的意志的手段；最后，她在他的手稿上浇上煤油，随后付之一炬。（为了炮制这疯狂的最后一举，海明威揉合了哈德莉在巴黎痛失手稿一事，——在巴克·拉纳姆看来，他“从未原谅过她”；另外，他还揉合了他母亲喜欢焚烧东西的嗜好。）

不过，蜜月之初，欢度蜜月的一对新人在他们阳光普照的“乐园”里还是非常幸福。正如 1927 年的海明威和保利娜，他们穿着渔民的短衫、短裤，皮肤晒得黝黑，头发的颜色因日晒、海水浸泡而变浅、变花。“在他们说明自己是夫妻之前，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俩是兄妹。有些人不相信他们已经结婚，这令那位姑娘非常高兴。”

一天，他们吃过午饭做过爱之后，凯瑟琳对戴维说她“准备改变一下”。他表示反对，尽管他还不明白她的意思。可是她毫不让步，她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这是为了你，”她说：“也是为了我，我不会假装这不是为了我。然而它也会影响到你。”当她结束了到艾格莫尔特的一次神秘的骑车旅行回来时，他开始对她脑海中的想法有了模糊的认识。她的头发像男孩子一样剪成平头，两边都毫不妥协地剪得很短，耳朵完全露了出来，短发很平滑地仅仅覆盖着头顶。“给你个惊喜，”她告诉他：“我是个女孩。可我现在也是个男孩，我可以做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

这篇关于非洲的故事酷似贝里尔·马卡姆在《伴夜西行》中所讲述的自己少女时代在肯尼亚的狩猎经历。考虑到海明威对马卡姆作品的无限敬意，似乎可以肯定，他借用了该书的意象和戏剧性场面。他居然以自己的男主人公替换掉马卡姆笔下的少女，这又是一个性角色倒置的例子，而性角色倒置正是《伊甸园》的特点。

“三角家庭”是指结婚双方及其中一方之情人住在一起的家庭。——译者注

那天晚上在床上，她让他把手从她的胸脯上拿开（“它们只是我的嫁妆”），去感受一下她的头发有多短。“感觉一下我的双颊和脖子背后，”她催促着：“哦，它感觉多么妙，多么好，多么干净，多么新鲜。”躺在她那修长、轻巧的身体下，他感到她抱住了他，而后又向下摸索，他用自己的双手帮着指点。虽然房间里很黑，戴维还是闭上了眼睛；他所感觉到的只有“她的体重和内心的新奇”。当她问道：“现在你分不出谁是谁了，是吗？”他必须承认她说得对。“你在改变，”她惊呼：“哦，你变了，你变了。你真地变了，你是我的姑娘凯瑟琳。你愿意变成我的姑娘，让我拥有你吗？”他提醒她说她才是凯瑟琳，但是她却否认。“不，”她说：“我是彼得，你才是我美妙的凯瑟琳，你是我美丽的凯瑟琳，你变了可真好。哦，谢谢你，凯瑟琳，非常感谢。”这一幕的性欲冲动比海明威任何作品的同类场面都更强烈。

第二天，戴维非常担心，不知道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因为事情发展得如此疯狂、危险和迅速。然而既然凯瑟琳已经开始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再停下来。因此，当他们从勒格劳—迪鲁瓦去昂代时，她绕道去比亚里茨又理了一次发。“我告诉理发师，我想把头发全部往前梳，”她后来向戴维解释说：“他照我说的办了，头发一直垂到我的鼻子那儿，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说我要剪成像初次上公立学校的小男孩那样的发式。……所以当他剪完以后，我活像是上过伊顿公学的最漂亮的女孩。我不断地让他剪得再短些，再短些，直到伊顿公学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仍让他接着剪。于是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姐，这可不是伊顿公学的短发了。……所以我让他接着再剪短一些，然后我又让他再剪短一些。……”

从西班牙旅行归来，他们回到里维埃拉，在一家玫瑰色的、又矮又长的旅店里租了三间最靠里的房间。这家旅店坐落在拉纳普勒湾埃斯特里尔一侧的一片松林中。戴维本想在每天早上从事写作，但这个计划仅坚持了一个来月，因为他的个人生活变得过于复杂，已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了。在根据理发师的名字命名的“让先生的手杖”的理发店里，凯瑟琳又给自己剪了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发式，并把头发的颜色染成了银色，以使她那无比黝黑的肤色更加突出。戴维也想理个发，凯瑟琳便让他也剃成她那个样子。“但是应更短一些，”戴维说。“就理成一样长”，凯瑟琳说。她的意愿占了上风。起初，戴维也反对把头发的颜色染成亮色，但他紧接着往镜子里一看（《伊甸园》中到处都是镜子），发现他与妻子的外表已经相当相似了。他的脸色和她一样呈棕色，他的发式也是“她的发式”。凯瑟琳感觉到了他的犹豫，便替他拿主意。“开始吧，就这样，”她对理发师下命令说。

不久，一个名叫玛丽塔的皮肤黝黑、个头矮小、年轻漂亮的女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很快，她就和他们俩发生了性关系，因为正如凯瑟琳所说的那样，玛丽塔“既是个女孩，也是个男孩”。说到与一位女性做爱，那正是凯瑟琳多年以来的愿望，因此勾引她对玛丽塔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可是要引诱戴维上钩，不仅需要玛丽塔的大胆进攻，还得需要凯瑟琳的竭力撮合。“去

参看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所提到的斯科特、泽尔达以及爱德华·若赞于1924年夏季在里维埃拉海滨时晒得黝黑的情况。

1947年初，海明威曾怂恿玛丽把头发染成银色，并把自己的头发也染成棕红色。对于自己的变化，他向观景庄的仆人们解释说，他不知是把什么当成了玛丽用剩下的洗发水，他洗了头发后就变成了那个样子。

和她聊一会儿吧，戴维，”凯瑟琳有一次曾这么怂恿他：“要是你想占她的便宜，那就替我好好地干。”就这样，海明威与哈德莉和保利娜于1926年夏天在瑞昂莱潘所保持的私通关系在拉纳普勒湾再次重演。只是这一次妻子的角色由保利娜式的人物充当，她无耻地赞美丈夫的不忠行为，而自己则充当情敌的临时情人。至于她们三人一起消受的裸泳，是否代表了海明威对与姐妹们一起在沃伦獭夜间游泳洗浴的不安的回忆呢？

在《伊甸园》中，工作也为堕落所淹没。尽管戴维在书的的开头声称自己从不在写作之时或写作之前饮酒，但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喝得越来越多。小说中一再强调凯瑟琳和玛丽塔（她被戴维称为女继承人）的身体健康这一事实，它暗示着金钱可以毁灭作家。（在告诉戴维玛丽塔为他买了一箱1915年的博林杰酒之后，凯瑟琳说：“女继承人和我的富有会令你无忧无虑，难道你不认为自己真幸运吗？”）

公众的瞩目是对戴维完整人格的又一个威胁。因此，当小说的最后部分断言说戴维的写作“源自一个坚不可摧的内核，不会被砸裂，甚至不会被划伤或留下痕迹”时，这种说法难免有些虚张声势。在倒数第二章中，读者对他感觉能力丝毫未受损害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戴维悲惨地发现，在写下了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之后，即使他再冥思苦想几个小时，他也无法再下笔写下任何一句了。只是到了梦幻般的最后一章，当他再次和玛丽塔开始了温柔的生活后，他才又可以写作了，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能力“它会有任何损坏地回到了他的身边”。

由于在小说的结尾中戴维和玛丽塔（小玛丽）的生活很幸福，有些《伊甸园》的评论家们便以为这最终反映了海明威1946年平静的思想，他在那年与玛丽·韦尔什结了婚。然而，戴维并不是海明威的唯一代言人。正像是凯瑟琳而不是戴维带头实现了作者离奇的情欲幻想一样，凯瑟琳也是海明威的代言人。凯瑟琳必须完成自己与生俱来的性角色的要求，当她承认自己无法完成这种性角色的要求时，她实际也是在替海明威说话。“你根本就不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玛丽塔略带讽刺地说，而凯瑟琳只好表示赞同。“我知道，”她说：“在马德里，为了成为一个女孩，我把自己弄得支离破碎，这种想法的唯一后果就是把我弄得支离破碎。”凯瑟琳对自己的疯狂状态满怀恐惧的知觉，但她又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人听到她的倾诉；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中她无力找到幸福，她盲目地愤怒地力图要破坏这次婚姻；——凯瑟琳和海明威之间的这些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此说来；她理当是书中最生动的角色，难道这一点还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吗？在她的身上，她的创造者倾注了他相当大的想象。

第二十三章 “先生们，现在你们以为如何呢？”

—

自从 40 年代末以后，海明威与传媒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 1945 年到 1948 年间，单在《时代》周刊的“人物特写”专栏中，有关海明威的报道就达九次之多，其中四次还配发了他的照片。任何人一旦相信了《时代》周刊的报道，就肯定会认为这位小说家正与“马球好手温斯顿·格斯特”一起在“享受”着打猎、钓鱼；当然也会认为他偏爱一种叫作“格尔夫河之死”的酒，它由少量的苦味黑啤酒、酸橙汁和一高杯荷兰杜松子酒掺兑而成；同时他们也会相信那些照片说明上对海明威的评价：“世界上最令人震惊和令人激动的脑袋”有六个，他便拥有其中之一。

在他与玛莎离异之际，《纽约星期天明镜杂志》上曾有一篇题为《丧钟为厄内斯特的三位妻子而鸣》的文章叙述了他婚姻破裂的历史。一年后，在赫斯特主编的《美国人周刊》上，另一篇题为《海明威创立时尚》的文章指出，他对女性之美怀有一种“短发”理念，他试图在他笔下所有女性的头上都强加这种短发。可以说，有关海明威与性的报道，这家杂志是首开先河。与此同时，一位《纽约邮报周末刊》的女记者在采访海明威后说道：“爸爸”看起来“威猛雄劲，足以用他的石匠平凿让所有的时髦女郎都神魂颠倒。”

在 1949 年的《假日》杂志上，海明威发表了一篇名为《蓝色长河》的文章，其中附有他敞着胸在“皮拉尔”号游艇甲板上钓鱼的照片。在这篇文章中，海明威自己也在公众面前进行了有助于自我形象的宣传。他对自己正在古巴享受的美妙生活作了详尽的描述：在古巴，斗鸡是合法的，芒果树大约有 18 个品种，门前长长的山坡上遍地长的都是，一直延伸到家门口。即便是最炎热的月份，每天清晨也是清新和凉爽的。“你可以将同线电话的振铃用纸堵上，这样就不用不着接电话了，……在那里，在那些凉爽的清晨，就像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你的工作会进展得十分顺利。”

另一方面，他又不时感到有关他的报道未免也“他妈的太多了点”，让他简直有些恶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试图避开大众的瞩目，但却很少成功。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就是他曾试图躲避马尔科姆·考利的采访。1948 年，考利受命于全球最具公众影响力的《生活》杂志，要完成一篇 9000 字的《爸爸先生画像》。于是，他提出要去观景庄采访。尽管有那么一段时间海明威曾试图撵走他，但他显然又被来访者所提供的优惠条件所打动，因为那份来自《生活》杂志的酬金足够他送儿子去埃克塞特。结果，这位评论家便和他在一起生活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

一直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海明威才见到变成铅字的《爸爸先生画像》。他的评价是“还算可以”但“不是非常准确”。几年后，考利就自己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严正声明。他指出，被访者唯一能够提出异议的地方是有关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轶事，文中曾提到他腰带上的几个水罐中装的是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对此，海明威一方面以嘲讽的口吻谈到优质苦艾酒在二战期间根本弄不到；再则，他也根本犯不着把水罐的空间浪费在那走私的玩意儿上，不管它是什么好东西。遗憾的是，有关水罐的轶事远不是我们那位评论家的唯一疏漏。五年前，在为《袖珍版海明威全集》一书作序时，这位评论家甚至连海明威的出生年份也没有弄清楚，因此，他也无法证实有关

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其他事实。在观景庄被采访时，这座别墅的主人日日夜夜嗜酒如命，这当然会使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考利似乎从未怀疑过主人酒后奇谈怪论的可信度。《爸爸先生画像》一文不仅对他追寻德国潜艇的行动过于当真，而且无限夸大了他在法国参战的重要性。虽然考利悄悄屏弃了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加入阿尔迪蒂敢死队的传闻，但他又忍不住让这则失去价值的珍闻有所弥补，他竟首肯了多萝西·帕克的见解：那副铝制护膝是海明威在皮亚韦河畔福萨尔塔的纪念品。考利还曾写到，早在14岁时，海明威就曾师从一位名叫扬·阿哈恩的职业拳击手在芝加哥一家体育馆接受拳击训练，在一次比赛中，他的鼻子被打骨折了，但第二天他又重返拳击场；中学毕业后，他在堪萨斯城《星报》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席位，那是因为他自己的高论征服了老板。（拜拜了，泰勒叔叔，我再也不需要您的帮助啦！）不过，最能说明考利对传闻的轻信竟然达到了令人惊讶之地步的，还是他的这个断言——天知道他是从哪儿道听途说，他竟硬说斯大林的军队曾拿着《丧钟为谁而鸣》作为讲授游击战的教材，可事实却是，斯大林对这部小说大肆诅咒，直到他去世之后这部小说才被译成俄文。

考利的采访过后，海明威给他去了一封信，信中埋怨说，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谈得太多，使他整整一周都无法写作。然而这一点仅仅是《爸爸先生画像》的第一个消极影响。由于这篇文章的读者是普通大众，因此考利几乎没有对海明威的作品予以丝毫重视。事实上，他似乎急于要向读者说明，这位小说家只不过是一名善于行动的好汉，而非一位作家。与30年代相比，也许主要是因为海明威保持沉默的时间太长，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文学地位提出了更加尖刻的疑问，所以考利的文章就愈发为诸如德怀特·麦克唐纳等评论家找到了口实。德怀特·麦克唐纳一直想诋毁海明威，说他的一切成就无非基于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就连海明威自己也承认考利的文章给他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过河入林》出版后，在评论家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中，海明威对莱因哈特的一位编辑托马斯·布莱德索说：“对我来说，马尔科姆·考利的文章刊登在《生活》杂志上真是糟透了。”接着，他带着一份别人以为他并不具备的宽容又告诉布莱德索说：“……那不是马尔科姆的错，他所做的一切原本是出于好意。”然而，宽容并不意味着敬重。所以，1949年3月9日，在写给霍奇勒的信中，他的言语间透露出几丝苦涩：

《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真让我有点恶心。毫无疑问，即便不说杜撰二字，《生活》杂志与真实生活之间也有诸多差异。……可我以为，对于像我这类的人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构成的，考利是一无所知。读着读着，我总感到我是被套进了他笔下的形象。让它见鬼去吧。过去，我曾有一种从未公诸于众的自尊下拥有一份美好的个人生活；而现在，我感到有人在那上面拉屎撒尿，然后擦在华而不实的纸上，并让它留在上面。

两年后，当年轻的评论家查尔斯·芬顿准备为《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学习成长过程》一书收集素材时，他得到了海明威的告诫：“想想那位可怜的老考利吧，他对我的生活几乎是操他妈地一无所知，他毁了我整个的一生。”

二

另一位诱使海明威显露出善良天性的人是《纽约人》杂志的记者莉莲·罗

斯。1947年在爱达荷州会面时，两人就很投缘。于是开始书信来往，继而成为好友。在信中，他亲热地称她为“女儿”，并赞许她的报道文笔细腻。他去世后，罗斯小姐亲切地回忆说：“他的赞扬是坦率和诚恳的，目的就是让我感觉良好。他会说你这人很可靠，他会把你比作乔·佩奇与休·凯西，而你用不着成为一名棒球的档案保管员也能领会到他是在夸奖你。他在信中的语气……本身就使你感到舒服，它是那么清新，那么美妙。”

由于在悉尼·富兰克林的人物特写上取得成功，罗斯小姐和《纽约人》的主编哈罗德·罗斯决定，她应该给海明威也写一篇人物特写，如果他同意合作的话。海明威一直伏案于《过河入林》的创作。1949年11月中旬，作品终于接近尾声。他同玛丽来到纽约，他同意罗斯与他们一起呆上两天。“这是一篇赞赏他的文章。”她后来在谈及它时说道。在这篇文章里，她“试图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海明威这个敢于与地球上任何凡夫俗子表现不同的人在工作间隙里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从而将这样一个人的真实风貌描绘出来：他的卓然不群，他那充沛的生命力以及他那强烈的、原汁原味的幽默感”。这篇特写的校样一出来，她就敦促《纽约人》杂志社给海明威和玛丽寄去了一份复印件。寄回来的校样只经过了少许改动。在随件附函中，海明威只建议有一处最好删掉，除此之外，他告诉她文章写得有趣而精彩。这篇题为《先生们，现在你们以为如何呢？》的文章于1950年5月13日发表在《纽约人》杂志上。它标志着一位记者第一次成功地透过宣传与自我宣传的帷幕而窥测到了幕后的这个人物。

罗斯小姐的文章开头写道，按照事先的安排，她与海明威在艾都怀尔德机场的一个出口处见面。他正四处寻找玛丽，玛丽去取行李去了。他脑后的头发长长的，有些灰白，两鬓则全白了；他的髭须也是白的，下额的白胡子足有半英寸长，蓬乱而茂密。他一只胳膊下掖着已磨毛的公文包，里面放着尚未脱稿的（过河入林）的手稿；另一只手则紧紧拽着一个名叫梅尔斯的小个子男人，他们在飞行途中刚刚认识，梅尔斯答应就在此时此地阅读这部新书的一部分。“这本书让他受不了，”海明威说：“书的开头节奏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直到他受不了。我总是让情绪高涨到读者觉得难以忍受，然后再稳定下来，免得还要给他们准备氧幕。书就跟引擎一样，也得逐渐减速才行。”这时候，玛丽与推着行李车的行李员一同走来，行李车上堆有14件行李，海明威逐一清点，以免有任何遗失。

尽管玛丽看起来急于进城，但她的丈夫却另有主意。“亲爱的，咱们别急。每天必须得喝上一杯。”靠在机场休息室的吧台上，他一口气干了六杯波旁威士忌。“玛丽，我们到饭店的第一件事，”喝酒的间隙他对妻子说：“就是给德国佬打电话。”“德国佬”指的是马林·迪特里希，他一边给罗斯小姐解释，一边举起手背护住脸，作出一副闪避重拳的模样，同时他笑起来。

海明威夫妇下榻在雪利—荷兰饭店。他俩套房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套仿奇彭代尔式的桌椅。“大概他们把这叫作中国哥特式客房，”海明威揶揄道。他解掉领结，脱去夹克，松开领口扣子，然后给住在广场饭店的迪特里希小姐挂去电话，留了言。接着，他通知服务台给他们送些鱼子酱和两瓶只经过一次发酵的佩里那一茄埃香槟酒。放下电话，他似乎还没有想好接下来该干啥。罗斯小姐告诉他，评论界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而海明威则明确表示他对评论界没什么好印象。

他坐在扶手椅上喝着一杯香槟，他的情绪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波动。他突然以一种生气的口吻说：“至今我对一战的可怕感觉还记忆犹新，以致整整10年我都无法写它。”当提起最近那个俨然以第二个托尔斯泰自居的战争题材作家时，他补充道：“我不声不响开始写作、慢慢地，我打败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我又打败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两局打成平手，在决胜局中我想我还是以微弱的优势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是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

他说，就像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他的这部新作品原本是作为一个短篇小说那样开头的。他写《太阳照常升起》只花了六周时间，但由于初稿太糟糕，又花了五个月进行修改。他希望，通过了解他的这些经历能够鼓励那些年轻的作家们远离心理医生。他回忆说，一名心理医生曾写信询问他从心理分析学那儿学到过什么，他回答说很少。“你从不会见到有哪个防御性拳击手会在进攻中显得虎虎有生气，”他向罗斯小姐解释说：“除非你的实力比进攻性拳击手强，否则你最好还是别打第一拳。你挤住他，挨他几拳也行，为的是逼近他。躲过摆拳，闪过勾拳，使出你浑身的力气给他致命一击。”罗斯小姐想问这部新作品是否不同于其他作品，他给了她一个长长的充满责备的白眼。摸着那只公文箱，他说，他认为这部书打败了《永别了，武器》，因为它不存在幼稚和无知。“先生们，现在你们以为如何呢？”他悻悻地说。

迪特里希小姐终于来了。玛丽·海明威放下手中正在整理的行李从卧室奔出来，热情地向她问好。海明威也一样。“德国佬是拳击场上最棒的拳击手，”他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给她斟上一杯香槟，同时也给其他人重新斟满酒。迪特里希小姐也一边忙着给大家传看她一岁半孙子的照片，一边介绍她如何成天泡在第三大道她女儿的公寓里陷入了一大堆保姆的活计和家务的日常琐事中。“女儿，你这可是在用重拳揍他们哪，”海明威说。

第二天，当罗斯小姐到达海明威夫妇的套房时，她发现这位小说家正穿着一件桔红色方格浴衣，抿着一杯香槟酒。他告诉她六点钟他就起床了，对手稿作了大量删节。扶手椅旁边搁着一张方桌，上面摆有两瓶香槟冷饮。当确定其中的一瓶已经空了时，海明威又启开了第二瓶。在斟酒的时候，他唱起了“第三步兵师之歌”。他说自己各种音乐都喜欢，甚至歌剧也喜欢，遗憾的是他毫无天赋，所以唱不了。接下来的一段叙述显然是将姐姐马塞利娜的经历综合到了自己身上，但这一点罗斯小姐当然不会知道。他说，有一年，他被母亲从学校接回家，让他学习演奏大提琴。他渴望到室外的新鲜空气中去踢足球，但母亲却执意要在屋里听到室内乐。

他坐在扶手椅上，不时点点头以引起罗斯小姐的注意。他说一个人上了年纪再要他崇拜英雄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他故意把声音压低成了一种嘟哝说，他有一只猫名叫博伊西，它想变成人，于是，人吃什么，博伊西也吃什么。它嚼复合维生素B片，尽管那玩意儿苦得跟芦荟一样。它还以为海明威小气，因为他不让他服用降压灵片，因为他叫它去睡却不给它吃安眠药。海明威突然笑出声来。“先生们，现在你们以为如何呢？”他问道。

玛丽走进了房间。她要出去办点事。她建议海明威穿好衣服，也顺便出去办一些自己的事。海明威说已经到午饭的时间了。玛丽说，他穿衣服的功夫她就会在房间里把午餐安排好。海明威将杯里的酒喝完，进了卧室。到他

出来时，服务员已经把午餐准备好了。海明威说没有塔维尔酒哪里称得上是午餐。大家一直等着，直到服务员把酒送来。海明威首先开始享用的是牡蛎，每一只他都要嚼上好半天。“细嚼慢咽消化好，”他说。玛丽用完餐，很快将酒一饮而尽。海明威则慢慢抿完。罗斯小姐看看表，快三点了。他们一起起身。海明威遗憾地看着那只尚未见空的香槟酒瓶。“留下半瓶香槟酒就是留下敌人，”他说。大家又重新坐下。

“人物特写”中所描绘的其他场景发生在不同地点：在阿伯克龙比—菲奇商店里，海明威买了一件上衣和一双拖鞋，并撞见了温斯顿·格斯特；第二天早上，在雪利—荷兰饭店，海明威当着儿子帕特里克——当时他是哈佛大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的面告诉罗斯小姐，当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海明威医生就饮弹自尽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海明威一边大口从银色扁瓶里咕着酒，一边与帕特里克大谈特谈各种绘画的精美之处，他谈到自己为何喜爱埃尔·格雷科的作品“托莱多的风景”，如何作为一名作家从塞尚的风景画中汲取了众多灵感；最后，又是在雪利—荷兰饭店，海明威在那儿见到了查尔斯·斯科里布纳，他受邀与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这时，帕特里克静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看着自己的父亲。

罗斯小姐完全被海明威的每个字和每个手势给迷住了。多亏她具有极高的描摹天赋，她把他维妙维肖地搬上了书。但是，正是由于《先生们，现在你们以为如何呢？》十分贴近生活，它让我们在大都市的喧嚣背后也窥视到了几丝潜在的恐怖阴影。在这篇文章问世的25年前，海明威就在《拳击家》中暗示过年轻的尼克·亚当斯的未来会在那个发疯的可怜的拳击手亚德·弗郎西斯身上找到影子。海明威一直坚持向罗斯小姐这样反驳有关他就要发疯的传闻：“你从不会见到有哪个防御性拳击手会在进攻中显得虎虎有生气。”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心理健康，他选择了拳击这种比喻，这正好表明他对《拳击家》的预言竟然会不幸言中有多么地恐惧。“我是一个奇怪的老头儿，”在有一次他极为罕见地卸掉了一切保护时，他这样对罗斯小姐说。那时，他50岁的生日才刚刚过去四个月。

三

罗斯小姐一直坚持说，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尊重她的原意来理解她的“人物特写”，但是：

有些读者则表现得很粗暴，而且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对海明威的人品大不以为然，竟以为我也同他们一样，所以，他们是出于错误的理由才欣赏我的文章。也就是说，我对海明威的品行描写得很准确，他们就以为我是在讽刺或抨击他。另一些人则干脆不喜欢海明威说话的方式（他们甚至连海明威有时放弃冠词并说一种玩笑似的印第安语言的玩世不恭态度也看不顺眼）；他们不欣赏他的自由自在；不喜欢他不拿自己当回事儿；他们不喜欢他浪费时光，成天泡在拳击场或动物园里；他们不喜欢他与朋友闲聊、钓鱼或和大家在一起开心；不喜欢他在创作某本书的大功即将告成时大肆挥霍鱼子酱和香槟酒；他们不喜欢这，不喜欢那。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喜欢海明威这个人。他们希望他变成别的什么人，也许是变成他们自己。

德怀特·麦克唐纳声称，“人物特写”阐明了海明威是如何完全地接受了传媒为他所树立的公众性格，如何成为了一个“可笑（但又阳刚气十足）的庸人”而又洋洋自得。莫顿·多万·扎贝尔认为，如果人们仔细想想罗斯小姐为这位艺术家所作的画像，“人们一定会留下疑问：严肃的艺术和写作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保留下来的呢。”约瑟夫·沃伦·比奇发现，“一名已然成熟而且享有极高声誉的严肃艺术家竟会如此幼稚而笨拙地四处炫耀”；“一个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人竟会让自己那么多的个人秘密公布在世人面前”；“一个阅历那样丰富、对生活的见解那样广博的人竟会如此不知羞耻地自我感觉良好和自我陶醉”，这一切都令他感到痛苦。詹姆斯·瑟伯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评论说：“约翰·麦克纳尔蒂（《纽约人》杂志的一名撰稿人）算得上是当今智者中的一位，他曾如此评论莉莲·罗斯写的那篇有关海明威的人物特写：‘这事就像埃迪·威特库斯的事件一样，她太爱他了，最终就枪毙了他。’”

海明威一听到这些风声，就反过来宽慰那位坐立不安的特写作者不要为那些播唇弄舌者们而苦恼，这无非是读者们往往总会把事情弄得是非混淆。在后来的信中，他再次设法安慰她。她转述其中一封信的话说：“有些人无法理解他的逍遥，无法理解他竟然没有变得神经质，无法理解他竟然会是一名不慕浮华的严肃作家。”然而，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海明威却很快就开始声称，当他读到人物特写的校样时他简直惊呆了。尽管他永远不会同意那帮评论家们把莉莲·罗斯看作是新闻界的迪莱拉——“她的写作并非是出于恶意，”他向托马斯·布莱德索肯定地说。——但他还是有些为时已晚地就人物特写中的某些暗示为自己辩护。他告诉布莱德索：“尽管如果她愿意，她有权把我写成那副形象，可我却不相信我会像个混血的乔克托人那么讲话，更不会认为说什么我天一亮就起床，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写作就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然而那时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书，而每当你完成一本书时你就会想逍遥几个星期，你他妈的真地会对什么也不在乎。所以，尽管我知道这篇文章对我不利，就像《生活》杂志上（考利）的文章对我不利一样，但我毫不介意。原本并无恶意，却遭来了不少中伤。但我依然喜欢莉莲。”

在所有有关这篇人物特写的评论中，恐怕最能使这位自尊自重的人感到沮丧的要数他的宿敌艾丽斯·B.托克莱斯的评论了。好在海明威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一封她写给友人的私人信件中，她的评论表现出她对莉莲·罗斯笔下人物的悲剧性格津津乐道。“他自己和他妻子的行动中暴露出一些异常，可珍妮特·弗兰娜告诉我他病得不轻，这才算是部分地解释了个中的缘由。得知他现在的样子，想到这会让他多么恐怖，真是令人痛苦呀。”

四

1950年的前八个月中，海明威曾多次重提自杀的话题。最明显的一次是他在8月份写给莉莲·罗斯的信中提到，最近他曾从“皮拉尔”号游艇的甲板上跳入深水处。他自称他一直往下沉，一直沉到一英里半那么深，在那儿他吐出了肺里所有的氧气。如果不是突然意识到这会给儿子们树立起一个多么坏的榜样，他真不会挣扎着浮出水面。

他越来越多地涉及这类话题，其中的部分原因也许是他对《过河入林》

迪莱拉是《圣经》中力士参孙的情妇，后来将参孙出卖给非利士人。——译者注

一书的即将问世感到极度紧张。这部书定于 1950 年 9 月 7 日出版。它不仅是作者十年来首部问世的新长篇小说，而且是作者在没有编辑的引导、鼓励和建议的情况下自行创作的一部作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却是一直指望着编辑为他提供类似的引导、鼓励和建议。

1946 年 1 月的一天，临近傍晚时分，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在离家不远的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乡间公路上驱车兜风。很快天就黑下来。“天很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后来写信给海明威说：“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赶回家做些事了，所以，大概我是开快了些。我来到一个小弯道，一分钟后就看到前面隐隐约约有一部卡车的影子，它似乎没打尾灯。我想从它旁边绕过去，但天知道一个人怎么蹦了出来，正好挡在路中央。我急忙拼命踩刹车，但肯定还是狠狠撞上了前面的卡车，因为它把我的车的前半部全毁掉了。我立刻钻出车身，感觉并没受伤，但奇怪的是，鼻子出血了。”虽说他撞断了肋骨，疼痛使他必须套上紧胸衣，但他还是很快又返回去工作。第二年夏天，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悄悄对海明威说，马克斯韦尔必须好好休息，可他却拒绝休假。“除了工作，他似乎什么也不需要，”斯克里布纳补充说：“我希望你能劝他去度假，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的主意。”尽管海明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说珀金斯同他一起呆在森瓦利，但他还是没能说动他。事实上，这位自尊自重的编辑从小道消息上已经得知海明威非常挂念他，他之所以整个秋天都不歇气地工作就是想证明他一切正常。然而到了 12 月份，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同事们都开始为他的健康异常担忧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劳，很虚弱，双手发抖，还不停地咳嗽。

长期以来，对于生活的强烈失意感一直萦绕着这位编辑，但是到了 1947 年的头几个月，这种情绪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其中的原因当然包括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手中最负盛名的作者将会遭遇失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知道海明威正在努力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也就是《伊甸园》，可到了 1947 年初，他又得知这项工作已经中止了。珀金斯对此十分失望。这年春天，他对妻子说：“海明成才思已尽了。”几个月后，珀金斯终于病倒了。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城的医院里，他被诊断患有晚期胸膜炎和肺炎。1947 年 6 月 17 日凌晨五点，他溘然长逝。噩耗传到海明威耳朵里，他大为震惊。他在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信中不无悲惨地写道：马克斯韦尔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编辑，更是一位睿智和忠实的朋友。

如果珀金斯在 1950 年还活着，他会不会试图说服自己这位最能动辄发怒的作者把《过河入林》这篇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浓缩成一个短篇小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因为正像加拿大评论家诺思罗普·弗赖伊指出的那样：

《过河入林》的主题是发生在威尼斯的死亡。坎特韦尔上校……就是(托马斯·)曼笔下那位遭遇挫折的老小说家，只不过是身份变成了军人罢了。上校是个孤独的人。在他的周围是一种普遍的憎恨，那憎恨的对象是他的军服，就像是人们对着他的军服敬礼一样；在他的身后是一桩破裂的婚姻和一段辉煌的军旅生涯所带来的潦倒；而在他的前面等待着他的却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心脏病猝发。……这是一个伟大的主题，如果能经高手的妙笔处理，比如说经过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处理，它本合成为一篇篇幅较长的充满震撼力的短篇小说。

小说开始时的狩猎场景充满神奇色彩：冰雪预示着生命的无常；而浅浅

的环形湖中所生长的冰冷僵硬的水草，以及在阴郁而灰蒙蒙的天空中忽然停止扇动翅膀并一头栽向湖面的野鸭，则蕴涵着持续性的审美意识。故事结尾处，上校之死虽然只寥寥数笔，但它也同样表现出大师的手笔。在小说的第七章里，也有一些笔触凄婉动人之处：作者借坎特韦尔上校之口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已然痛苦地意识到像他现在这样活下去会有多么地艰难。在这本题有“献给可爱的玛丽”的书中，作者的第二自我们心自问道：

为什么我总是个杂种，为什么我不能像自己历来所希望的那样放弃这种舞刀弄枪的生活去做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我一直努力变得公正，但却总是那么粗暴和野蛮，可这又并不是说我就已经树立起了屏障，绝不再去拍权威和世人的马屁。我必须在所剩无几的有生之年做一个少一些野性多一些善心的好人。我们必须从今晚就开始，他想着。可上帝将帮助我在哪儿、将让我和谁一起来改过自新呢。不幸的是，像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原本有可能成为一篇很精彩的短篇小说的素材竟被支离破碎地散失在一部令人腻烦的长篇小说之中。精华都被废话冲淡了：喋喋不休的上校没完没了地讲述着各类二战指挥官们所干的蠢事和他年轻情人的可爱的头发；讲述着格里蒂皇宫饭店的饭菜如何有品位、如何合他的口味，而他和领班之间又是如何亲密无间。

海明威在《伊甸园》中曾经谈到，一个作家的内核应该坚不可摧，应该不会被砸裂，甚至不会被划伤或留下痕迹。然而事实上，他自己的内核却被传媒塑造的形象所淹没，以致于他笔下的任何小说中的斗士都无法再逃脱他所强加的社会形象。其结果便无疑是一种自我讽刺，而《纽约人》杂志的E.B.怀特又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新的嘲讽。他杜撰的一篇《过街入店》尤有妙趣，开头的几段是这样的：

中午时分，珀利先生走下楼来，他一边转弯在破旧的第四十五街人行道向上走着，一边琢磨着：这是我最后、最好、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午餐。在他前面走着的正好是饭店前台女招待。我的胳膊肘是显得有些胖，他自忖着，但我擅于辞令。

他向前赶了几步，企图赶上她，但又一次感到疼痛。这事儿可真臭，他想。不过，一旦我在其他财务助理员身上干了那些事，我就不该恨任何人了。已经死了16个，谁知道还会有多少。

现在，姑娘离他很近了。他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清新的招待气息，能感觉到她软软的发梢。她的皮肤是淡蓝色的，像马的侧身的颜色。

“我爱你”，他说，“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好吗，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真地很爱你。”

“噢，你好，珀利先生”，姑娘惊愕了。“快别这么说。”

一对扇尾鸽从古老的保险信托公司大楼上飞来，它们扇动着翅膀想停在什么地方。多么可爱的一对儿，珀利想着，停下脚步。“我们去巴尔的摩饭店好吗，在范德比尔特大道上，那不过是这些大街的一个小岔路。要么我们也可以去施拉夫特饭店，我的老朋友博蒂切利是那里姑娘们的头儿，他们有盛在长颈瓶里的蛋黄酱。”

“那就去施拉夫特饭店吧。”姑娘低声说：“不过，我还得先给妈咪打个电话。”她进了一间公用电话亭，用手指准确而优雅地拨了号。然后，她打起了电话。

虽说他们的关系并不密切，小说家约翰·奥哈拉多年来却一直尊敬海明威。他们在纽约第三大道的蒂姆·科斯特洛饭店曾有过一次愉快的聚餐，那是在1944年初，海明威正准备飞往欧洲战场。这次，奥哈拉也意识到了评论界要对《过河入林》的作者毫不留情面，所以他努力保护他，因为他受邀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对新书作出评述。可惜的是，他只是把事情搅得没法再糟。他谈到了海明威的全部成就在于过度的夸张；他把自己对《过河入林》一书有限的溢美之词统统放在对海明威的赞许之上，说他是一个毫无幻想的硬汉子。“这位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他断言说，“这位继莎士比亚逝世之后最杰出的作家，”——在补充中他更是加重了份量，“已经写了一本新书。”这位作家，他说，当然是指厄内斯特·海明威。“自1616年以来的千百万作家中，他是最最重要、最最杰出的一个。……照他自己最喜欢用的比喻来说，也许他无法跨越所有的距离，但他仍然能够伤着你。他总是个危险，他总是那样头向右倾地站在那儿。真正是无可比拟。”（“显而易见，”海明威在一封写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信中抱怨说：“什么莎士比亚，什么当之无愧的冠军，都是一派无稽之谈。……为什么他非得说这些不可？”）

文学界内的派系之争历来臭名远扬。以《过河入林》之事为例，虽然有一大帮人像一群吃人的鲨鱼，一嗅到水中的血腥味，便迫不及待地蜂拥而至，然而正是他们的那些野蛮攻击同时也引起了另一些人对他们的蔑视之意。由爱德华·威克斯主编的《大西洋月刊》曾发表一则短评，对《过河入林》作了积极的评论。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受到鼓舞，在一封写给同样在《大西洋月刊》工作的老友查里斯·莫顿的信中，他请求好友转达他对威克斯的祝贺，而这份祝贺

谨代表一小部分觉得没有必要在海明威的最后一部书上给他个下马威的评论家。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小伙子们如此怀恨？难道他们已经感到老狼受伤了，而此时此刻正是将他一头打翻在地的最佳时刻？我一直在读这本书。坦率地说，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比起那些贬低者所说的，它还是要好得多。这本小说中没有什么情节，没有多少故事，几乎也没有多少描景。但我以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多少突出了独特的风格。自然，你是无法期盼能从飞刀者的手中得到仁慈的，他们正是以向别人飞刀子来谋生。不过你也许会想，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也扪心自问过：海明威到底要干什么。很明显，他并不想创作一部旷世杰作，而是想通过一个并非不像他本人的角色，来试图总结一个人的人生态度，这个人已日薄西山，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而感到苦涩和愤怒。显而易见，海明威已病入膏肓，他相信自己已无法康复，这使他（对）生活中他曾经最看重的东西有了新的感觉，因此他使用了一种非常粗略的方式在纸上记录下这种感觉。我以为，那些喜欢精心打扮的事后议论者，那些自诩为评论家的人，他们一定会觉得他根本不该写这书。多数人也不会写这书。如果他们的感觉同他一样，他们绝不会有勇气写什么东西。我他妈的就确信我是不会写的。

伊夫林·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他选择了一个公众讲坛来发表他对那些评论家的看法。“他们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嘲弄他人，”他在《公民》杂志上撰文写道：

（他们）一致同意这是一次值得庆贺的大失败。……为什么他们（对海明威）都如此憎恨呢？我相信原因在于，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某种不可饶恕的东西——高雅的情调。在所有他那些咆哮、咒骂和拳头后面，他的身上还是不时流露出某种基本的骑士精神：他尊重女性，同情弱者，崇尚荣誉。当今的文学界中弥漫着一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粗鄙风气，可那帮评论家们在他的书中却恰好找不到这种风气。这，便是他们的抱怨显得如此沸沸扬扬、如此自以为得计的原因。

至于海明威本人对这些评论所作出的反应，他简直是气得发疯，而且他把一腔怒火都倾泻到他的出版商头上。“伙计，你他妈的到哪儿去了？”9月9日，他几乎是对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大叫大嚷：“难道你读了《时代》周刊上的评论后就去了新泽西州的荒野，打算从那儿发起你的反击吗？不错，每个人是有自己的处事方式。但是，一本书出来后，例行的规矩难道不是要向作者通报事情的进展和公众的反应吗？要知道，为了不误时限，不负诺言，我可是殚心竭虑，把一切都赔上了。”

他对其他作家的妒嫉也在不断上升。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以前就不妒嫉。由于此前的几年中他写了好几部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的书，他的失败情绪早已促使他的妒嫉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拿1949年来说，他曾以嘲弄的口吻把托马斯·沃尔夫描述成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一个文学界的押尼耳；他还把约翰·奥哈拉说成是个酒鬼，他对自己所具有的爱尔兰血统抱有自卑综合症。1950年初，阿瑟·迈兹纳请他谈一谈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昔日往事，他竟只在一些恶毒的轶事逸闻上大做文章。不过，一直到评论界对他的《过河入林》嗤之以鼻之后，他对其他作家的评论才开始显得有失体面。有关詹姆斯·琼斯的评论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例。

1951年初，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了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在书的护封上，出版商们宣称：“此书的出版将与《人间天堂》或《向家乡看吧，安琪儿》的问世一样具有重大意义。就像菲茨杰拉德和沃尔夫的处女作一样，《从这里到永恒》也将会推出一位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这家为海明威出书的出版社不仅仅是将另一名小说家捧上了天，更有甚者，他们这样做时，进行比较的是《人间天堂》和《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而不是1926年海明威推出的那两部力作《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不仅如此，几乎每个评论家都对琼斯小说的战争真实性大加褒奖。书中的二等兵普鲁伊特、沃登中士、斯塔克中士，还有其他入，他们在珍珠港事件的数月之前一直生活在斯科菲尔德军营，——评论家们一致热情洋溢地认同他们都是真实情况中活生生的人，就像他们曾经一致认为《过河入林》一书充满了虚假一样。海明威对《从这里到永恒》想得越多，离精神变态的边缘就越近。当查尔斯·斯克里布纳愚蠢到竟然问他是否也认为琼斯是个伟大作家时，他真的陷入变态了，尽管在他的疯话中还存有不可否认的洞察力。

……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技法极其高明的捣蛋鬼，他的书将会对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也许，我应该将它再读一遍以便给你提供更准确的答案。但是，我想我没必要非得吃下一满碗疥癣才知道它是疥癣；也没必要非

押尼耳是古以色列第一代国王扫罗之堂兄弟，军队指挥官。——译者注

喝下滚开的水，才知道它是煮沸的水；更没必要淌过鼻涕之河，才知道它是鼻涕。我希望在书还没有破坏他的或你们的销路之前，他最好自己去死掉。如果你们想请他喝杯文学之茶，也许就是等于让他吸干一桶鼻涕，再从一个死去的黑鬼耳朵里吸出脓血。然后你们可以为他叫一个他想要的那种女人来，让他在她的面前卖弄自己的像片和那些剪报。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搞到的那个大耳朵笨蛋的照片（是些没有损坏的耳朵）、看上去竟还那么硬得刺眼。我很高兴他为你们赚了钱，我永远不会笑话他。我只是要送他更大的一桶更浓的鼻涕。他的心灵会促使他自己去自杀，他会的。

五

格雷丝·海明威多年来一直深受血循环毛病的折磨。在她位于伊利诺伊州河林镇基斯通大道的家里，她一直是由露丝·阿诺德照料。1950年深秋，在她78岁时，她被迫离开了家，住进了橡树园医院。大概是在那里的第一年，一名护理者不慎弄翻了她的轮椅使她脑部受伤，致使记忆严重丧失，很快便导致老年痴呆症。她与自己那位举世闻名的儿子的最后争执发生在1949年的夏天，而此时此刻，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最后那次争执的起因源于厄内斯特听说一位女作家正在与母亲联系，试图安排一次采访。她是《麦考尔》的撰稿人。在一位高明记者的诱导下，一个年迈而喋喋不休的老妇人很容易被引入对儿子幼年时代的回忆之中。海明威便迅速采取行动以制止这次采访。

8月27日，海明威从观景庄寄出一封信。他指示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吩咐他的秘书“给那个《麦考尔》的女人写封信，告诉她是我在赡养我的母亲，倘若她再接受什么采访或向任何有关我的文章提供信息，我将断绝一切赡养她的费用”。仿佛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出版商会对自己如此着急上火的举动感到诧异，他接着说：“我母亲年事已高，记忆已经支离破碎，她会沉醉在那些荒唐离奇的叙述之中。”由于担心，他的憎恶之情愈发加深。他补充说，由于现在她已过于年迈，所以近来他“扮演了一名孝子的角色”，然而事实上他仍然“对她恨之入骨”，因为她“逼得我父亲自尽了”。

虽然信件开头的这些话已经十分激烈，但这仅仅还只是一个开头。他想要知道“那个可怜的《麦考尔》的女人怎么会想到这么个主意”，她怎么会想到“她可以写我们的家庭，写我和那帮天赋较差的兄弟们（原文即如此）与姐妹们之间的区别，例如我那个婊子似的姐姐马塞利娜，那个可爱的妹妹厄休拉，还有小妹妹萨尼，她在校队（是男队）投起球来或弹起琴来像个天使。……”他越是唾沫横飞，越是变得俗不可耐。“难道这帮婊子以为我需要宣传吗？”在激烈的长篇大论结尾时，他问道。“我知道你们是想出名点的，可我已经不在乎了，宣传的滋味就像猫的屎尿一样令人愉快。”

在他给斯克里布纳写信的同时，他似乎也给基韦斯特岛的什么人写了信，请求他们将他留在怀特海德大街的几盒个人物品寄来。其中一盒里放着她母亲汇编的多本剪贴簿和有关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品。这些东西一寄到观景庄，他立即藏起来。多疑的他害怕一旦玛丽看到这些东西，她会将照片卖给某家杂志。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给他母亲写一封信。

前些天，我很高兴地收到了您为我们这些孩子所收集的剪贴簿。它们被

保存在基韦斯特已有多年，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它们了。请让我对您的辛劳和我们幼年时您给我们这些孩子的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那时我们太小、一定让您太操心了。剪贴簿上您的亲笔题词看起来很可爱。那些由父亲拍摄的照片几乎张张都是精妙绝伦。我希望您会好起来，也让我祝愿您和露丝·阿诺德一切顺利，请代我向她表示最诚挚的祝福。

他的语气是亲切的。也许是看着那些照片不由自主地让他感到与母亲亲近了些；或着也许是由于照片重新被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感到舒了口气。但是，在下一段里，他的语气变得生硬起来。毫无疑问，此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他母亲加以威胁。

斯克里布纳公司来信说，《麦考尔》的一个女人正与他们接触，我想她是要与您取得联系，写一篇有关我孩提时代的文章。对这样的宣传，我并不喜爱，当然也不允许。她真是个非常莽撞和恶毒的人；我想，也是那种令人非常讨厌的记者。我已叫斯克里布纳公司给那女人去信，让她知道是我在赡养您的一切，如果一旦未经我的允许他们发表了任何文章，我将收回我对您的一切供给。希望这样做能够了结这件事。

自从在橡树园医院头部受伤后，格雷丝由萨尼看护着，在她位于孟菲斯的家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她已无法确认萨尼是自己的女儿，她经常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一样躲着她。最终，各种迹象表明她必须重新入院。仿佛她已意识到这是永别，在女儿家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坐到了钢琴边，像过去一样，她轻快地弹了一会儿。1951年6月28日，死亡之神降临到孟菲斯的一家医院。

当萨尼用电报发来的噩耗传到观景庄时，海明威战时的老友比尔·沃尔顿也在那里。沃尔顿记得，过了一会儿，海明威从一张写字台最下层的抽屉里搬出了格雷丝那些有关他童年生活的剪贴簿。他们两人一起对着几张照片十分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并乐呵呵地看着上面格雷丝的题词。不过，沃尔顿并没有看到那些把海明威装扮成小丫头的照片。

两天后，海明威给卡洛斯·贝克写信，信中谈及母亲的逝世使他在心中追忆起不少往事：在她年轻的时候，“在家里的一切越来越糟糕”之前，她显得有多么美；在家庭破裂之前，她的孩子们又是生活得多么幸福。

六

1947年春，当帕特里克、格雷戈里和保利娜一起呆在基韦斯特时，兄弟俩遇到了一次车祸，帕特里克的头撞伤了。虽然一阵阵严重的头疼接踵而来，却没有迹象表明他伤得很厉害，所以他母亲也就没有反对他继续网球运动，也没有反对他实施到古巴去看望他父亲的计划。然而，在观景庄，他却突然陷入了严重的神志失常。在那期间，就像海明威写给莉莲·罗斯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他不断地“反抗撒旦和一切恶魔还有所有当地的魔鬼”，而其中最大的魔鬼就是他父亲。但是，海明威执意要亲自照料儿子，给他送饭，帮他进餐，一直睡在他的屋外以便夜里能随时看护他。三个月后，帕特里克终于康复了。

从那以后，海明威与次子的关系看起来似乎很亲密。但是，当他长大以

后，至少有一次当被问及是否可以说他们父子关系融洽时，保利娜最钟爱的儿子却表现出冷淡和生气的样子，并且拒绝作出回答。也许，就是在那次昏迷当中，帕特里克以视父亲为魔鬼的方式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最深切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勃姆比则毫无疑问地很乐意有爸爸的陪伴。事实上，1986年春，在波士顿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的一次仪式上，他竟很动情地说他曾有过一位多么优秀的父亲；他不无痛心地指责那些海明威的传记作家们没有把这一点表现出来。至于海明威最伶俐的儿子格雷戈里，他们父子间的关系也很明显。父子俩一度曾是父子情深，然而1950年春格雷戈里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不辞而别以后，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紧接着发生的可怕事件更使两人无法挽回地疏远起来。

大学第一年结束后，格雷戈里感到在学校里继续呆下去简直受不了，便参加了一个迷信于排除有害印象精神治疗法的教派组织。1951年夏天之前，他一直与自己的第一位妻子生活在南加利福尼亚，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简，以前曾是鲍尔斯的一名模特。后来，格雷戈里又结过两次婚。大约到了那年的9月底，格雷戈里由于涉嫌一宗毒品案被捕入狱。当时正在旧金山的保利娜闻讯乘飞机赶来看她能帮上什么忙。约在30日晚上9时，她从洛杉矶妹妹吉尼的家中给观景庄的海明威挂电话，告诉他最新发生的事情。据吉尼说，他对前妻充满嘲讽的言辞很快就使她大声叫嚷起来并禁不住抽噎。放下电话后，保利娜心烦意乱，径直上了床，但在凌晨一时她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三小时后，她死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10月2日，海明威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写了一封信，信中所流露的感情与三个月前在给卡洛斯·贝克的信中谈及母亲的逝世时十分相似：“怀念的思绪向我涌来，犹如波浪一般最终还是冲破了我为了保护心灵的港湾而设下的堤防。对于保利娜的死，不管她的死因是否如同港口四处飘浮的浮渣一般，我都倍感伤心。许多年里，我曾一直深爱着她，让她的过失都见鬼去吧。”然而，他并不认为他们在电话上感情激烈的交谈与保利娜的猝死有任何关联。

保利娜的葬礼后过了几个月，格雷戈里、简和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出现在观景庄。此次拜访曾一度气氛融洽，格雷戈里甚至感到融洽得足以提起他被捕的话题。他说：“真的，老爸，这事没那么严重。”父亲的回答却让他非常不愉快地感到出乎意料。“不严重？哦，可它害死了你妈。”过了不久，在机扬告别时，海明威对儿子说了一句俏皮话：“好吧，千万别动用任何木质信托基金。”格雷戈里笑了。这是他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到他。

50年代剩下的岁月对于格雷戈里来说简直遭透了。他纵酒过度，无法工作，与简离了婚，把遗产挥霍于非洲游猎的途中（曾有一次，他疯狂地在一个月里屠杀了18只大象）。为了消除抑郁，他只好依靠电击治疗法。他也不止一次地用唾沫横飞的愤怒语言给父亲写信，取笑他是一个酒鬼，并威胁说要痛揍他。他要让他知道那篇《老人与海》不过“像是一桶用来擦洗酒吧间地板的自作多情的污水那样令人恶心”。

尽管内心烦躁不安，但格雷戈里仍然设法完成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习，并于1960年被迈阿密大学医学院录取。他被录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去世的那家加利福尼亚医院写信，查询验尸报告。他得知，她死

英语中有木婚一说，是指结婚五周年纪念。海明威的这句俏皮话大概是说希望儿子不要很快就离婚。——译者注

于嗜铬细胞瘤，这是一种罕见的肾上腺肿瘤。他从资料中查到，这种病之所以罕见，是由于患病时必须分泌超出常量的肾上腺素致使血压达到难以置信的高度。后来他又得知，这类肿瘤分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持续不断地分泌肾上腺素，而另一种是间断性的。格雷戈里猜想母亲属于后一种类型。他随即给父亲去信，信中得意洋洋地指出：很明显，母亲的死并不是由于他的毒品事件使她情绪不安，而是由于她死前八小时与老厄内斯特之间那场火爆的电话交谈。“肿瘤早已开始坏死或腐烂，当那天晚上又大量分泌肾上腺素时，血压迅速上升；在坏死的组织内部或附近，一根中粗的血管突然破裂，导致肿瘤组织停止分泌肾上腺素，她的血压突然由 300 降至 0。由于休克她死在手术台上。”

一收到信，海明威便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祝贺他被医学院录取。接着，他提醒格雷戈里说他的祖父曾是一名医生，但是他自杀了。说到这儿，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他用一种无精打采而又苦涩的口吻告诉儿子，那天早些时候他去看过一位哈瓦那的医生，医生告诉他得了一种罕见疾病（血色素沉着症），它会导致失明和性功能永远丧失。格雷戈里试图安慰他，说古巴医生的医术不高明，他应该回到纽约重新作检查。海明威说他已经和纽约通过几次电话了，很快他就会回去的。

突然，他的声音变了。他期望儿子能记住他们父子俩曾经分享的一次经历。“还记得博施的那幅世界末日的画吗？所有的魔鬼向罪人围挤过来，而我让你看其中那个绅士打扮的男子，他义愤填膺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拔出了他的佩剑。还记得吗？在所有那些面目狰狞的人物中，我仅仅把他指给你看，还说：看呀，看他在哪儿，他以为可以用一把剑去对付死亡吗？而你看上去像是完全听懂了我所说的一切。”

第二十四章 “这一带的乡村景色优美”

—

为了挽救不断下降的声誉，海明威把赌注压在了《过河入林》上，结果却输得很惨。他又用《老人与海》赌了一回，这本书则颇受评论家们的青睐。“我认为这是海明威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西里尔·康诺利，伦敦《周日时报》）；“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罗伯特·戈勒姆·戴维斯，《纽约时报书评》）；“海明威先生又登上了‘冠军’的宝座”（阿瑟·考尔德—马歇尔，《听众》）；这是“他的最佳之作”（威廉·福克纳，《谢南多厄报》）。赞美声一浪高过一浪，到后来人们变得深信不疑：这本书最终会为海明威赢得普利策奖，甚而不久他还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零零星星的批评声中，最有权威性的声音来自约翰·奥尔德里奇。“时下流行着对……《老人与海》的狂热，我承认我无法分享这种狂热，”他在《弗吉尼亚评论季刊》中写道。对他来说，这本书“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显然是次要作品”。12年后，经过重新考虑，奥尔德里奇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每周图书专栏里对该书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这部小说所讲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一个幌子，像是刻在石头上的一个古典寓言，生动极了，也很有意义，但却很死板。一个故事，在它作为独特的个体被感受之前就已作为某种共性被接纳，过快地成为神话，这不能不让人对它的活力提出质疑。”

令人惊奇的是，这本书不仅名声鹊起，而且大为畅销。在斯克里布纳公司1952年9月8日正式出版前一星期，《生活》杂志用一期的版面全文登载了这篇27000字的小说，两天之内就售出了530万册，其中大多数显然是上架后不到八小时就被买走了。“本月新书俱乐部”把这部小说作为主选读物，订购了第一版印刷的15.3万册。自出版发行后，该书又迅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在榜上一呆就是26周。

今天，关于《老人与海》一书，唯一值得一提的问题是：一本含悲忍泪、伤感不已的小说，一部毫不留情的伪《圣经》，一本把关于棒球的机智谈论（“我既怕底特律的老虎队，又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与粗俗得骇人的描写（这种描写象征着耶稣的受苦受难：“他睡着了，脸朝下搁在报纸上，双臂张开，伸得很直，手心向上”）混淆在一起的书，怎么竟然会雅俗共赏，获得了绝大多数人雷鸣般的掌声呢？

简单的回答就是：人们虽不情愿但却放弃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正如德尔莫尔·施瓦茨1952年11月在《党派评论》中所争辩的那样，人们对《老人与海》一书的喝彩，主要是源于“要继续崇拜一个伟大作家的强烈愿望”，其中既有“坚持要唱赞歌的语气，也有感到松了一口气的语气”。精明的施瓦茨评论说，有人感到松了一口气是因为以前的《过河入林》写得“太糟糕了，简直是一种不祥之兆”；而有人坚持要唱赞歌则是因为“这部新作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好得像名家的手笔，尚不足以作为海明威的代表作”。不过，这部小说所引起的反响也与更大的历史背景有关。因为，《老人与海》不仅代表了一位深恐自己才思已经干涸的作家富有深刻含义的个人宣言，同时，与《太阳照常升起》一样，它也非常肯定地表达了一种梦幻已然破灭的社会情绪。

那年秋天，在每个美国人似乎都在阅读和谈论《老人与海》的时候，德

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中遥遥领先，把对手埃德来·史蒂文森抛在了后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选民们把在朝鲜无休止的战争归咎于民主党。七年前，美国曾迫使敌军无条件投降，可对朝鲜之战，人们早已放弃了实现那个目标的梦想。如今，美国人民的全部愿望就是光荣地结束战争。人民相信艾森豪威尔，他们相信这位国父般的和谈家有办法找到解决办法。

在这一令人欣慰的人物“艾克”身后隐现着一位年长得多的老将军，他的一段心酸史甚至更能说明美国人权力无边之感消失的原因。1950年6月25日，当北朝鲜集结起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三八线，扑进南朝鲜的时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总统派往前线统率一支联合国武装力量。9月15日，麦克阿瑟利用美军海上控制的优势，采取侧面包围这一绝妙的传统战术，指挥一支部队在三八线附近的仁川登陆。生命线一旦被切断，入侵的共产党军队便分崩离析、溃不成军，而麦克阿瑟又派出部队全速挺进北朝鲜。那情景真是太壮观了，太辉煌了，就仿佛又打赢了一场小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然而，中国的干预使胜利的美好前景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麦克阿瑟请求允许他使用空中力量袭击北朝鲜边界之外敌军所拥有的那个安全避难所。可杜鲁门害怕俄国人可能会卷入，并可能引起原子弹大战，于是他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麦克阿瑟公开提出抗议，杜鲁门便把他解职了。

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对这位受辱的将军持同情态度。而且，在他返回纽约时，人们特意为他举行了一次游行。结果是，所聚集的人群比在欧洲胜利日后站在街道两旁欢迎艾森豪威尔的人还要多一倍。当时，他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好评，其中那句久久萦绕在人们的耳边，让整个演讲达到了高潮的话是：“老兵们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隐退了。”

然而，这些敬意却代表着一次告别礼，不仅仅是告别了一段非凡的军旅生涯，而且是告别了某种意义超乎其外的东西。尽管麦克阿瑟在仁川创下了一次辉煌的战绩，可最后在他自己的嘴里这次战绩也变得一钱不值。除了极少数死硬派衷心拥护麦克阿瑟为总统外，那些1951年在路边欢迎他的人们，那些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大街小巷和高级中学的人们，都明白他所代表的那一套国际行为哲学已经过时了。这位伟大的将军也过时了。

不知是有意的设计还是无意的摸索，朝鲜战争以及它所有的潜在含义很快就在流行艺术中以各种方式反映了出来。确实，几经磨炼之后，美国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新形势有了很强的意识，以致于大众甚至在其原意完全是另一码事的作品中也能找出影射朝鲜战争的象征来。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卡尔·福尔曼所写的一个著名的电影剧本。长期以来，福尔曼对苏维埃抱有同情心。国会的调查员们竟然会对电影界的工作人员是否忠诚持有怀疑态度，这使他大为光火。他号召左翼的朋友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拒不合作的证人的统一战线，可是却发现自己被他们给抛弃了，几乎是只留下他一个人在继续作战——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的。满怀着对朋友们的厌恶以及对政府当局的蔑视，他把全部的情感都转移到了一部有关良心的戏剧中，其背景设置在昔日的西部。当然，要是观众们早就知道福尔曼的原意是要写一部政治寓言，他们根本不会对根据他的剧本所拍摄的电影感兴趣。他们成群结队地去看《正午》，是因为这部片子反映了他们的情感，而不是福尔曼的情感。

影片选用传奇式人物加里·库珀作主角，他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样清楚，被看作过时货是多么令人感到羞辱的事情。1940年，他和海明威在森

瓦利初次交上朋友的时候，我们那位小说家就发现他非常具有吸引力。他是个好人，海明威热情洋溢地对马克斯·珀金斯说，他“就像他看起来的那样，诚实、正直、友好，一点儿也没被宠坏”。正是这种相貌和气质，使得库珀自 20 年代以来就十分具有票房号召力。然而到了 40 年代中期，他对观众的吸引力开始减弱。1951 年，也就是在他 50 岁生日的那一年，《电影先驱》杂志在它的十佳卖座影星排行榜中去掉了他的名字。岁月在他的额头和嘴角两边都刻上了深深的皱纹。但他那总是湿润的眼睛，他那总是忧郁的神色，还有他走路时那紧绷绷的样子，却表明他是在忍受着溃疡病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出演《正午》，实际上是试图把身体衰弱作为一种优势，从而来挽救自己的事业。结果，他的表演赢得了学院奖。

威尔·凯恩是哈德利维尔小镇一个即将退休的警长，他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年轻女子（格雷丝·凯利）为妻，准备带着她一起离开，到另外一个镇子上去。他打算以开杂货店为生。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得知，五年前在他的帮助下被抓起来关进监狱的一个罪犯，现在被放了出来，正在赶回哈德利维尔镇，还带了三个歹徒做帮手，要找警长报仇。在去往新家的路上，凯恩觉得他不能在那些恶棍面前一逃了之。于是，他不顾他那位和平主义妻子的一再反对，掉头回到了哈德利维尔镇。令他惊恐的是，他发现镇子上的乡亲们都不愿意站在他一边。过了五年平平安安的日子后，他们都不想再打仗，其中有些人甚至对凯恩似乎也没有多少敬意。没有了他们的帮助，警长一脸肃穆，满腹疑虑。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他所要面临的挑战看来足以把他击垮。

根据西部片那神圣的传统，英雄最终毕竟还是赢得了胜利。可是当镇上的人们围过来向他欢呼喝彩时，他却冷淡地拒绝了，并轻蔑地摘下徽章，扔到地上，迈开大步独自离去。是良心驱使他回来，结果却落得个与众人疏远，后来又不欢而散。这种胜利的美酒品尝起来如同失败的苦果一般酸涩。这是一部与众不同西部片。当时它所面向的美国，也早已学会了欣赏类似的嘲讽。

1952 年 7 月 30 日，《正午》首映式在纽约举行。直到令海明威东山再起的力作在《生活》杂志上登出五周之后，这部影片仍在为成百上千的影剧院吸引着众多的观众。与加里·库珀所扮演的警长相比，渔夫圣地亚哥的身上更多地刻上了岁月的痕迹（“这位老人身材干瘦，形容憔悴，脖子后面有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的一些乡邻们不但对他毫无敬意，而且还视之为笑料（“许多渔夫都拿这位老人开玩笑”）。出海 84 天，他没有捕到一条鱼，他不顾一切地想要进行一次胜利的远征。为了找到活生生的例子来鼓励自己，圣地亚哥想到了一位老棒球手，有一阵子他曾因为脚跟处生了疼痛难忍的骨刺而成了残疾。不过，最近这位棒球手康复了，“了不起的迪·马焦再现了当年的雄风”。就像威尔·凯恩不得已而为之的那样，圣地亚哥独自一人出发去作战了。在他的捕鱼生涯中，这次所遇到的结果是最可怕的对头。和凯恩一样，他也既是赢家又是输家，因为他破记录捕到的那条青枪鱼，鱼肉已被鲨鱼吞吃光了。当老渔夫进港的时候，那条大鱼的骨架所宣示的胜利是极具反讽意味的。他曾英勇搏击，因此也许可以说圣地亚哥最后还是证明了他自己；然而，他的朋友，那位小男孩，却在哭泣。

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的那个时期，标志着美国从此开始了没完没了的经济消耗，开始了它在所卷入的战争中时不时必须对敌血战的历史。在这个时

期，在人们的眼睛里，美国式的英雄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知怎么的，他已失去了一些东西，可到底是什么却又很难确切地指出；他失去的不是他的英勇无畏，也不是他的足智多谋；总的来说，那也不是他的自信，尽管自我怀疑的痛苦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的问题主要和他所处的形势有关；他经验丰富，但如今已上了年纪；继续战斗是一件要求高、难度大的事情，而人们普遍的疑虑，即对于他的技术是否过硬、方法是否得当的质疑，使他所面临的战斗更富有挑战性；最糟糕的是，对于胜利的意义，人们不再有一致的看法，所以也再没有任何一次胜利能给人带来纯粹的满足。

《老人与海》不仅以显而易见的小说形式反映了海明威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男人同自己的种种搏斗，同时它还具有更为广泛和更为深远的象征意义。

二

《老人与海》一书荣获普利策奖的消息，海明威是在 1953 年 5 月一个晴朗的春日午后，同玛丽一道在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钓鱼时，通过收音机听到的。尽管他立刻就以这类奖项是次品诺贝尔奖的说法来贬低它，可实际上他却非常高兴，甚至是欣喜若狂。他信手便把随之而来的奖金支票签给了勃姆比，从中感到了更大的幸福。

对他来说，做出这种姿态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根据他和利兰·海沃德刚刚签定的合同，从《老人与海》的拍摄权中他可获得 25000 美元；另外，作为摄制捕鱼场面时的顾问，他还可获得 25000 美元。在普利策奖颁布 10 天后，更大的财源朝着他滚滚而来。《观望》杂志的出版商派出一个编辑代表团来到古巴，以五位数的价钱邀请他撰写有关东非的系列文章。他和玛丽在 8 月份时就可以重去那里。

在蒙巴萨他们与菲利普·珀西瓦尔重逢，那情形真是感人至深。接着，他们又参观了这位白人老猎手地处马查科斯附近穆阿丘陵的可爱的农场，使得他们的旅行在一开始就显得挺棒。但是，这次旅行后来却被海明威自甘堕落的行为搅得一团糟。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从一辆高速行驶的越野车上摔了下来，划破了脸，伤得不轻，还扭伤了一边的肩膀。酗酒还使得他在打猎时技术失常，十分难堪。他试图给自己解围，用捕获的猎物争面子，可那些东西显然是他那来自古巴的同伴神枪手马里奥·梅诺卡尔的杰作。有一次，他的表现实在是太糟，于是他便开始给自己找借口，结果菲利普·珀西瓦尔厌烦地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喔，厄内斯特，别给我胡扯了。整个儿就是丢人现眼嘛！”

他担心这些小插曲会使他的阳刚之气受到怀疑，于是他就在行为上走向了别的极端。他剃光了头，说是想变成一个当地人。对于这件无聊的事，他还花了很多心思，拿着长矛去打猎，把自己的衣服染成马萨伊人服装的锈迹斑斑的颜色，还追求一个名叫黛芭的瓦卡穆巴族女孩，她住在离莱托乞托克村很近的一个农场里。狩猎监护人丹尼斯·扎菲罗认为黛芭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宿营地垃圾”，玛丽也觉得她早该洗个澡了。可是在海明威的嘴里，她简直就是非洲的普鲁迪·博尔顿。我的女朋友是个“黑人，生得非常美丽”，他向《纽约时报》的那位笔友哈维·布赖特保证说。她也“极端无礼”，他接着说：“但绝对是那种可爱和娇嫩的粗鲁。我最好是别再写这个了，因为我想把这一点写得很真实，现在可不能弄糟了。不管怎么说，那太令我着迷

了。”

只有在梅诺卡尔、珀西瓦尔和珀西瓦尔的助手罗伊·霍姆都离开之后，在他仅有扎菲罗和玛丽做伴的宁静日子里，他的大脑才得以平静下来。他再也不捕猎动物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叫司机带他出去，只是去看看动物。无论何时，只要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可看，他便抽出一本书来读。“他爱非洲，”扎菲罗在1983年对海明威的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说：“他爱坐在那儿，进行观赏。他懂得自然知识，知道动物们在哪儿，会做些什么。……（而且）他总在读书、读书。口袋里随时都装着平装书、报纸和杂志。”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他所热爱的东非，海明威雇了一位名叫罗伊·马什的飞行员，带着他和玛丽乘坐一架塞士那180小型飞机，在一些胜景奇观之上作了一系列的飞行，比如恩戈罗火山口、卢旺达—乌隆迪的月亮山脉以及乌干达的默奇森瀑布。在默奇森瀑布，尼罗河水从不同的高度倾泻下来，错落有致，它不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飞流直下，显得很突兀。当马什在瀑布上空第三次绕飞的时候，他突然看到飞机前有一队朱鹭，于是急忙俯冲到它们的下面。飞机的螺旋桨和尾翼撞上了一根悬在峡谷上空的电报线，马什只得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紧急降落。玛丽折断了两根肋骨，海明威又一次扭伤了肩膀，马什却安然无恙。

海明威生了一堆火，他们在火堆前打着瞌睡。过了一夜之后，他们总算摇着东西大声呐喊地拦下了一艘过路的内河船，被带到了艾伯特湖东岸的布蒂亚巴。在旅途中，海明威发现这艘船曾在电影《非洲女王》中显过身手。该片由凯瑟琳·赫本和汉弗莱·博加特主演。对于凯瑟琳·赫本，海明威后来写道，“我非常欣赏她”；至于汉弗莱·博加特，“我从没见过他在现实生活中打过棒球”。

在布蒂亚巴，他们发现有两个人在码头上等着他们，一位是警察，名叫威廉斯，另一位是专飞无地面导航的飞行员，他自我介绍说是雷金纳德·卡特赖特上尉。为了搜寻他们的遗体，威廉斯和雷金纳德已在空中飞了大半天，因为飞越默奇森瀑布的一位英国外航公司的飞行员看到了塞士那小型飞机的残骸，却没发现有生还者的迹象。有关海明威之死的报道已经通过电报发了出去。1954年1月25日星期一清晨，许多报纸就要全文登载一篇讣告，纽约《先驱论坛报》便是其中之一。卡特赖特和威廉斯说，现在发现他的死讯只是夸大其辞，他们感到十分高兴。卡特赖特还说，他那架古老但却宽敞的双引擎德哈维兰式飞机可以听任海明威的调遣。让我来飞，把你和你的同伴们送到恩德培去吧，他恳请道。

布蒂亚巴的临时跑道后来被海明威比作是南达科他州的红色山地，因为它的一道道巨大的山脊看起来也像搓衣板似的。德哈维兰式飞机沿着跑道高速前进，“以野山羊的姿态从一个危岩跳到另一个危岩，从一个悬崖跳到另一个悬崖”。突然，飞机右引擎和右翼油箱爆炸起火，迎面而来的风吹得火焰直扑机尾。罗伊·马什一脚踢破了一扇窗户，他和玛丽缩着身子挤出去跑开了。当时，海明威发现舱门被弯曲的金属关得死死的。按理说，他本该一脚把门蹬开，可他却像公牛似地用头去撞。他究竟是求生还是求死，这种矛盾的愿望似乎全都包含在了这可怕的、竭尽全力的撞击之中。他为自己撞开了通向自由之路，但也为自己招致了又一次脑震荡。卡特赖特最后一个离开飞机，他踢开了另一扇窗户。

玛丽的膝盖受到撞击，由于疼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海明威的头皮流着

血，脑液从头盖骨中渗出来；后背下部的脊椎被撞碎，感觉就像烧红的火钳；他不停地呕吐，怎么也止不住。他和玛丽被开车送往 50 英里以外马辛迪的铁路旅馆，这段路在他一生中看来似乎是最长的 程。第二天，另一辆车带着他们又走了 100 英里，到了恩德培。在那儿，他们住进了维多利亚湖旅馆的一个拐角房间。尽管他的眼睛看到的都是重影，而且只有一边耳朵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声音，但海明威还是同意和一群记者见见面。这些人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且别说他在头部所受的伤，单单是他的肝、脾和一个肾所受的伤就足以令他丧命。一篇几乎完全是虚假的报道通过联合新闻专线发了出去。在纽约，它被大张旗鼓地登在了《时报》、《邮报》和《镜报》上。另外，它还上了《时代》周刊的“人物特写”专栏。据说，他手拿一瓶杜松子酒和一串香蕉来到了吵吵嚷嚷的新闻发布会，满不在乎地宣称他的运气还不错。这个故事引起了奥格登·纳什的注意，于是他写了一首题为《一串香蕉》的诗，这首诗接着又被配了乐，并由何塞·费雷尔和罗斯玛丽·克卢尼录成了磁带。“一串香蕉，一瓶酒/幸福来，饥饿走/我有一串香蕉，一瓶酒——/我的运气，她好到了头。”

总算是没有呕吐，总算是熬过了新闻发布会之后，海明威摇摇晃晃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和玛丽一块儿同南非作家斯图尔特·克卢蒂共进晚餐。对那天晚上他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就是：在他眼里，斯图尔特看上去像一对双胞胎。

三

为了和《时代》的虚假报道一比高下，《新闻周刊》在 2 月 15 日也发了一篇报道，说这位击不垮的“爸爸”在第二次事故后，违抗了医生要他彻底休息一下的命令，攀登了乞力马扎罗山。虽然他不屈不挠的真实事迹并没有这么精彩，但却令人感动。在内罗毕的短暂逗留期间，他为《观望》杂志口述了一篇有关自己遭遇的 15000 字的文章，然后飞到了肯尼亚海岸的一个海滩营地。他原计划在那儿和儿子帕特里克以及菲利普·珀西瓦尔一起钓鱼，但好几次的剧烈疼痛使得他无法出海。不过，有一次，在营地附近爆发灌丛大火的时候，他试图显示自己，证明自己在危急关头还是个有用之人。尽管其他的消防队员恳求他别费劲了，可他坚持要帮忙，结果一下子失去平衡跌倒在火海里。在布蒂亚巴，飞机失火的时候，他曾有两处被烧伤（“火这东西从来没有真正帮助过谁，当然贞德除外，”他在给哈维·布赖特的信中写道），可这次他遭受的烧伤甚至更严重，范围更大。在消防队员把他拖离险境之前，他的嘴唇、胸部、腹部和腿受了二度烧伤，左手和右臂受了三度烧伤。

威尼斯是他返回古巴途中的下一站。4 月份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是在格里蒂皇宫饭店的床上度过的。虽说摄影师不断地企图闯入他的房间，但他坚决不让他们进去。“惊扰一个残兵败将，”他抗议说，“是违法的”。经他允许进去的朋友们都注意到，他的头发突然间变白了，人也瘦了 20 磅，看起来就好像缩小了似的。“我不是指他的身体瘦了一圈，”阿伦·霍奇勒说：“而是他所具有的高大魁梧的气质似乎已经不见了。”

接下来的那个夏季，他住在观景庄。他绝望地发现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只有信了，而在这些信中他写满了对其他作家的贬低之词。他对哈维·布赖特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既是个地道的沾沾自喜的醉汉，又是一个自取

其辱的爱尔兰酒鬼。他还告诉布赖特以及巴克·拉纳姆和莉莲·罗斯，他对福克纳的最新小说《寓言》评价很低。他宣称，一个每天要写 5000 字那种东西的人，所需要的就是一夸脱威士忌，一个贮藏干草的厩楼，以及对句法的漠视。

当传言四起，说他在那年秋季将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时候，他显然很高兴，但他对此也心存狐疑；就像他对巴克·拉纳姆所说的，得过奖的人没有一个能在这之后再写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10 月 28 日那天，传言被证实了。记者们和祝贺的人群都到了观景庄，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令听众大吃一惊的是，他在言谈中赞扬了卡尔·桑德伯格、伊萨克·迪内森和伯纳德·贝伦森。后来他对巴克·拉纳姆解释说：

你知道，我多多少少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档次的作家，可这并不能成为我表现得狂妄自大的理由，也不能去对别人说。……说句你我之间的知心话，我是这样想的：桑德伯格上了岁数，对我的赞扬他会表示欣赏。（他的确如此。）布利基的妻子（迪内森）比曾经得过奖的任何该死的瑞典作家都要强一些，布利基（巴龙·布鲁尔·冯·布利克森—芬莱克）已经下了地狱，听到我说他老婆好话会很高兴的。在我看来，贝伦森倒是该得（尽管他并不比我更该得），但是如果他得奖，或者说他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我会很高兴的。

来自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的官方嘉奖触怒了他。尽管他们赞扬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开创了一代有力的文风”，但却把他早期的作品——也就是他最佳的作品——的特色归纳为“粗野蛮横，愤世嫉俗，冷漠麻木”。那些本应细读作品的读者，他们的领悟力再一次受到了海明威神话的干扰。

健康状况不稳定成了他没有去斯德哥尔摩作演说的借口。他厌恶这种走过场的形式。因此，美国驻瑞典大使约翰·卡伯特代表他领了奖。不过，他还是给瑞典学院寄去了一篇书面发言，该文在颁奖大会上曾大声宣读。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提到委员会的官方嘉奖，但他还是用一句话斥责了它。可以说，在他谈论自己的作品时，这句话是最精彩的暗示之一。“一个人所写的作品，人们也许无法立刻就发现其中的某些东西，在这点上，对他来说有时是一种运气；但是这些东西终究将会非常清晰起来，根据它们以及作家所掌握的点石成金的能力的大小，将决定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或是被人遗忘。”说了这句话后，他接着又谈论起作家通常的命运。他的字字句句再一次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真诚，但字里行间也充满了一种尊严。所以，尽管他是以个人的口气在发言，他却没有对听众们谈论那正在吞噬他的悲剧，只是极其偶然地瞥视了这种悲剧一两眼。

写作，即便是在最成功的时候，也是一种孤寂的生活。作家的组织固然可以帮助排遣作家的孤独，但我怀疑它们未必就能促进作家的创作。倘若一个作家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成长起来，他自然可以免除孤寂之苦，可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他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甚至就在这篇书面发言被宣读给瑞典学院的时候，海明威对创作力日渐

衰退的惊觉也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可怕的毫无收获的夏季过去了。那年秋天，他开始创作一本有关那次灾难性的非洲之旅的日记体小说。但他写得越多，就越不满意。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半后，《非洲日记》的初稿已经拥有了乱七八糟凑合在一起的20万字。这时，由于这位作者对它很不满意，便把手稿用玻璃纸一包，寄存到银行的地窖里去了。他要去秘鲁为《老人与海》一片中捕鱼场景的摄制做顾问。也许从那儿回来以后，他能够把这本日记大刀阔斧地修整出个模样来。

然而，当他1956年晚春回到观景庄时，他发现他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写作那本有关非洲的书了。因此，他便开始以一种似乎在发烧的速度来创作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只有两篇他认为值得发表，一篇是《得了条明眼狗》，另一篇是《人情世故》，它们都以《黑暗中的两则故事》为总标题刊登在1957年11月《大西洋月刊》创刊100周年的纪念号上。前一篇刻画了一位美国作家，在威尼斯他的双目失明了；后一篇则讲叙了一个名叫黑仔的流浪汉，他在怀俄明的一个沙龙的争斗中被打瞎了双眼。要不是署上了海明威的名字，这些写得不尽如人意的故事肯定会被《大西洋月刊》拒之门外。不过，如果说在文学上它们无足轻重，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却反映了作者的焦虑。自从1949年发过一次丹毒之后，海明威就一直担心有一天他可能会失明。

四

1956年晚秋，在巴黎的里兹饭店，搬运工们把海明威夫妇的行李搬进了套房。其中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搬运工提到，饭店的地下室里还有两个海明威的小箱子，它们放在那儿已有多年，上面积了不少灰尘。海明威打开一看，惊奇地发现了他20年代在巴黎生活的种种纪念品。据乔治·普林顿回忆，海明威的一些朋友们曾经说过，飞机失事的伤痛对海明威影响很大，使他变得喜爱自省和回首往事，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谈论起过去。然而，被遗忘的箱子重又获得发现，它们所唤起的，就不再仅仅是谈论了；它们激励着他开始在一部回忆录中去重新捕获他过去生活中最具有故事性的情节。

1957年，他积极开始了《流动的圣节》一书的创作，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然后就搁了下来，因为他想修改《伊甸园》。1958年底至1959年初的那个冬天，他和玛丽来到了爱达荷州的采矿老镇凯彻姆。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接连租了几幢带有家具的住宅，随后又以五万美元的价钱从花花公子似的百万富翁鲍勃·托平手中买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房产。此时，他又开始琢磨起那本回忆录。1959年春天，当他和玛丽离家去西班牙时，这部书的手稿也与他们一同前往。当然，由于分心的事情太多，他一直还是无法投入大量的时间去从事其他的写作。

五

海明威夫妇去西班牙搭乘的是“S.S.宪法”号轮船。此番旅行，就工作上的原因而言，是斯克里布纳公司决定要再版《午后之死》，而海明威觉得有必要对其修订一下。他希望通过在西班牙各地观看整整一季的斗牛，还有惊险刺激的决斗式斗牛（这是一位赞助商在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格尔·多明奎因之间安排下的竞技，只有他们两名斗牛士，却要对付六头牛，而不是寻常的三头牛），他能获得足够的新素材，从而为这个新版本增添一个几千字的尾声。

4 月底，当海明威夫妇抵达阿尔赫西拉斯港时，有一位名叫内森·（比尔）·戴维斯的美国侨民在码头上迎接他们。海明威以前在墨西哥作短期旅行时曾遇见他。戴维斯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加利福尼亚人，他在西班牙拥有商业利益。他是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的姐夫，也是一位文学名人的“收藏家”——他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去马拉加附近他美丽的拉康苏拉庄园游玩。能够请到海明威去作客，标志着戴维斯最热中的社会生活之梦的实现。他觉得能够亲自侍奉这位作家简直是一种特权。

5 月 10 日星期天，戴维斯驾驶着一辆租来的粉红色福特轿车送海明威夫妇去马拉加观看斗小牛。然而斗牛士和公牛的表现都很差劲，以致于这几位失望的观众们在 11 点晚餐之前“多喝了一杯马提尼”（这是按照玛丽温和的说法），进餐时又喝了“过多的葡萄酒”。那天晚上便是恣意纵乐开始的预兆。

海明威旅行计划的下一个节目是去马德里过圣伊西德罗圣节。11 天里，他们的生活中回荡着斗牛场人群的喧嚣声和午餐时三五成群的人们用各种语言交谈的闲聊声。到晚餐时，他们可能又会和在午餐时遇到的那些人重逢。节日的晚餐将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海明威和玛丽要么出去和朋友们一起喝几杯，吃一点儿小吃；要么邀请他们过来，在新建的苏西亚旅馆的套房里款待他们。

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孤独过；玛丽所自称的“巡回马戏团”也几乎总是马不停蹄。继马德里之后，他们又去了科尔多瓦，接着是塞维利亚。在塞维利亚之后，玛丽已是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只好回到拉康苏拉庄园休息，然而比尔·戴维斯和海明威则继续着他们的旅行。在阿兰胡埃斯，他们亲眼目睹奥多涅斯受了一次重伤，那是那一年他所遭受的两次重伤的第一次。于是，海明威的下一件差事，便是花时间在马德里医院的病房里陪伴这位受伤的斗牛士，还有他的一大帮朋友和食客。当他和戴维斯最后回到拉康苏拉庄园的时候，新一轮的欢筵又开始了。一天，斯丽姆·海沃德突然带着一位好莱坞的朋友一起跑来加入了午餐。“亲爱的，你真瘦，但帅极了”，她冲着这位贵客大叫道。“你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劳伦·巴考尔轻言细语地说。海明威像一只球胸鸽一般挺起了胸膛，玛丽则因为被这些“风骚”的女人们晾在一边而忿忿不平。三点半午餐开始了，一直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开着粉红色的福特轿车追逐斗牛的行动又开始了。有时候玛丽会和他们一块儿去，有时候则不去，然而无论她去与不去对她丈夫来说似乎都无所谓，因为围在他身边的人不断增加。6 月底，霍奇勒来到了这里。当一位名叫瓦莱莉·丹比—史密斯的 19 岁黑发爱尔兰姑娘设法安排自己同海明威在苏西亚旅馆见了一面之后——她的借口是：她是比利时新闻社的特约记者，新闻社委托她来采访海明威，——他立刻就以每月 250 美元的薪水雇她为秘书。西班牙记者何塞·路易斯·卡斯蒂略—普切尔也是常常围在海明威身边的人之一，后来他在《海明威在西班牙》一书中说，尽管这位小说家对玛丽很冷淡、疏远、毫不关心，宛如生活在她身边的一个陌生人，但他却“禁不住偷偷地向那位多情多意、头发凌乱的爱尔兰小姑娘瞟上几眼，要么就碰碰她”。

1944 年，巴考尔和汉弗莱·博加特联袂主演了影片《有的和没有的》。尽管对话大多是威廉·福克纳写的，但巴考尔对博加特所说的最有名的一句台词却是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构思的：“你知道怎么吹口哨，是吗？只要把嘴撅起来，吹气，就行了。”

在潘普洛纳，作家彼得·巴克利和他的新婚妻子、森瓦利医院的乔治·塞维尔斯和他的太太，还有两位漂亮的美国女郎特迪·乔·保尔森和玛丽·肖恩梅克，也加入了海明威的随从队伍。海明威公然向瓦莱莉大献殷勤，却把玛丽冷落在一旁，那情形就和他在完全相同的咖啡馆里当着哈德莉的面去极力讨好达夫·特怀斯登一样。有一回，他们离开潘普洛纳到伊拉蒂河去游泳和野餐。一路上，瓦莱莉坐在福特轿车的前排，夹在戴维斯和海明威中间，玛丽却坐在后面。不过，她那天所要受的耻辱才刚刚开始。当她翻越岩石准备去深水区游泳的时候，她摔倒了，右脚中趾两处骨折。尽管她疼得很厉害，海明威却一点儿也不关心。“你折断了脚趾，我感到很难过，”他那礼节性的问候简直令人心寒。

在潘普洛纳圣节余下的节日里，忧郁的玛丽很少活动，不单单是由于脚伤，而且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肮脏的桌子，溅出来的葡萄酒的酸味儿，还有与进门来要么是为了签名要么是为了白喝酒的陌生人的愚蠢的闲聊，以及海明威没完没了的重复的格言警句”——也越来越使她感到厌倦甚至厌恶。相反，她丈夫看起来倒是陶醉于人们的关注之中。为了更加尽兴，他把每晚的睡眠减少到三至四小时；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力，他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也喝得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他又患上了新的肾功能紊乱。塞维尔斯医生不得不尽力为他治疗。

7月20日晚上，海明威60岁生日的前夜，在马拉加米拉玛饭店晚餐后的舞会上，巴克·拉纳姆看出来海明威还明显地患上了精神错乱。同戴维·布鲁斯夫人跳完舞后，拉纳姆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当他从海明威的椅子后面经过时，左臂擦了一下海明威的后脑勺。海明威的反应就好像拉纳姆打了他似的。他大声地挑衅似地警告他说，谁也不准碰他的头。他昔日的战友气得说不出话来，一声没吭就走开了。后来海明威向他走过来道歉，眼中噙满了泪水。他可怜兮兮地解释说，他把头发往前梳成刘海儿的样子就是要遮住秃顶，可拉纳姆的手臂一扫，就把头发都弄乱了。如果拉纳姆肯原谅他，他一早就去理发店把头发剪得和他一样短。虽然拉纳姆不明白他的这个许诺是有来由和说来话长的，但他却意识到他的老朋友颇有些不对劲，因而粗声粗气地打断了他，叫他别像个蠢驴似的再说下去了。

奥多涅斯和多明奎因之间的第一场决斗式斗牛于7月30日在巴伦西亚岛举行，组织者们就海明威要出现在斗牛现场一事大做文章。在此事被公诸于众之前，《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就意识到了他在西班牙逗留的文学动机，现在他们从巴黎分社派了一个名叫威尔·兰的人同他洽谈。兰被授权问他，是否有兴趣把他计划要写的有关斗牛的作品，首先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然后再出精装书，就像他当初在这本杂志上试发《老人与海》一样。海明威说，他当然会很感兴趣的。

不过，把自己交付给了《生活》杂志，就意味着他得坚持按他的旅行计划看斗牛，尽管他已开始觉得受够了在这个欧洲第二多山的国家里来回奔波之苦。从马德里到昆卡，再到阿利坎特；从穆尔西亚回到阿利坎特，然后再回穆尔西亚；从龙达到塞维利亚，然后北上去梅里达，接着又往北去贝哈尔：粉红的福特轿车简直是不停地跑着。海明威对旅途越厌倦，对妻子也就越冷淡越粗暴。他觉得，对他来说她已变得“不堪入耳”了。

10月4日，玛丽撇下他，独自从巴黎乘飞机回了家。她谎称这么做只是为了整理一下在古巴和爱达荷州的房子，以便准备奥多涅斯和他美丽的太太

即多明奎因的妹妹卡门的来访。可是，在观景庄里辛苦了还不到几天之后，她就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不空行的长达三页半的信，概述了他近来对她的态度。结尾处她告诉他说，她准备在纽约租一套小公寓，等把凯彻姆的房子一整理好，自己就到那儿去住。

海明威打电报作了答复。“感谢来信及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很遗憾不同意你信中的那几条和结尾，但尊重你的意见，尽管根本不同意。……为繁重的劳动和诸多麻烦致歉。……爱你依旧。”对一个饿得要命的女人来说，这顿饭少得可怜，但是也足够了，她终究没有离开他。

六

为《生活》杂志的撰稿完成了5000字以后，海明威便搭乘“自由”号轮船回纽约。在船上的最后一天，他和后来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立传的安德鲁·特恩布尔一起在一等舱的酒吧间里喝了一杯。饱经磨难、生性敏感、后来自杀身亡的特恩布尔被海明威的脸打动了：那有如“悲伤的面具”的脸，那“泡沫似的”大胡子上“俊美”的容貌，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以及那“动人、羞怯的”眼神，都让他为之心动。

重新团聚的海明威夫妇与卡门和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在凯彻姆所共同度过的那个假期，令所有的人都很失望。更为糟糕的是，玛丽有一天外出打猎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左肘粉碎性骨折。因此，当1960年海明威和玛丽回到古巴观景庄时，他们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那儿，海明威继续进行着有关奥多涅斯和多明奎因决斗式斗牛的写作。2月，他打长途电话给霍奇勒，告诉他说已经写了17000多字。一个月后，他又给霍奇勒打了电话。他坦率地说，作品出人意料地拉长了。他最新的估计是：全部写完以后会达到3万字。他问霍奇勒是否能给《生活》杂志的总编埃德·汤普森打个电话，说他打算在4月7日前完稿。

海明威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霍奇勒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既疲惫又紧张。为《生活》写的那篇作品现在的字数已经达到了63562个字。他不可能在4月份完稿了。也许能在5月底以前写完，如果他的眼睛能够撑得住的话（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解释说，一位古巴医生曾告诉过他，他正患有“一种所谓干性角膜炎的眼病”，结果，“家里字体较大，能供我读的书就只有《汤姆·索耶》了”。

5月4日，已过半夜，霍奇勒被海明威的又一个电话吵醒了，“《危险的夏天》”（这是他给作品起的名字）现在已有92453个字，而且还在继续拉长。三个星期以后，他对霍奇勒宣布，他手头已有108746个字，不过他想要讲的故事终于讲完了——除了一个尾声，为此他还得再到西班牙跑一趟。不过，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是，他必须从手稿中删除7万字，以便降到他认为对《生活》杂志合适的长度。

下一个月里，他给霍奇勒打了12次电话，声音听起来越来越着急。尽管在三周半的时间里，他每天从一大清早开始就干上整整一天，但他最后承认说只能删掉530个字。既然《生活》杂志已经作了广告，他说他不能就此撒

干性角膜炎在成年妇女中比在成年男子中更常见。它通常的表现是：开始时泪腺分泌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发炎。严重情况下，角膜的溃烂、血管化和结疤，都会引起严重失明。

手不管。可是，“我就是不可能再把它过一遍了，霍奇；在我看来，一切都似乎不可能再动了，而且我也不能再用眼了。”作为一个作家，海明威过去经常嘲笑托马斯·沃尔夫患有文字痼疾，蔑视他非得需要马克斯·帕金斯的帮忙才能将作品整理成形，并使之能够发表。可如今，他发现自己也落入了同样的境地。在海明威急切的要求下，霍奇勒于6月27日飞抵哈瓦那。

霍奇勒很快就列出了一个单子，在打印手稿的前100页（一共有688页）提出了八处建议性删除意见，交给了海明威。第二天上午，两个人在海明威的卧室里展开讨论。霍奇勒立刻注意到了两样东西：一排七种不同颜色的药丸，海明威正用苏打水一粒接一粒地吞服；还有一叠纸，上面写着他拒绝所有霍奇勒的删除建议的原因。令霍奇勒更为吃惊的是，这些话的语句都写得很糟，有的甚至不可理解。

接下来的三天里，霍奇勒继续提出删改建议，海明威继续不断地加以否定。后来，海明威渐渐让步了，直到删除了54916个字。这时他再不能考虑任何进一步的删改了，因为他的眼睛累坏了，读完一页得花10至12分钟以上。“我来告诉你，霍奇，”他大声叫道：“这就像是在卡夫卡的恶梦里。我像以往一样装着很快活，其实根本不是。我累散了架，精神上也垮了。”

霍奇勒把删改后的书稿带回了纽约，交给了埃德·汤普森。这位《生活》杂志的编辑大吃一惊。就是这个节本的长度也是他原先谈好的两倍多。不过，他同意出九万美元买下其中的一部分，并另付一万美元购得在该杂志的西班牙语版上的再版权。

8月4日，海明威乘飞机回到西班牙。比尔·戴维斯对他朋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心理变化十分震惊。他睡不着觉，尽管吞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每一件事都会令他担忧。他甚而想到，比尔正阴谋弄坏那辆他驾驶着带他到处奔波的轿车以便谋杀他。孤独、内疚和悔恨之感如同一阵阵巨浪劈头盖脸地冲击着他，另外还有每当记忆丧失时所产生的极度的沮丧。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感到“崩溃”的坦白，他曾一度表现出十足的蔑视，而现在他自己却在用这个词了，不仅仅是在对朋友们有如妄想狂似地窃窃私语比尔的轿车谋杀计划时使用，而且在不断写给玛丽的讲述他身体和精神状况的信中也常提到。

《生活》杂志分三期刊出了《危险的夏天》的缩写本。第一期于1960年9月5日出版，作者的彩照印在封面上，他面带微笑，气色格外好。然而海明威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满意。这本杂志“让我恶心”，他冲玛丽嚷道，封面上的那张脸简直是“可怕”。看到里面的作品和编排的照片，他为自己“写出这样的东西而感到羞耻、感到难受”。

10月初的一天下午，霍奇勒到马德里的苏西亚旅馆与他会合。第二天早上，海明威来到他的房间，他们共进早餐。小说家抱怨说，糟糕的肾害得他整晚都没睡。当他举起茶杯送到唇边时，手直发颤。他们俩接着谈起了正在拟议中的《过河入林》的电影剧本。霍奇勒建议由索菲亚·罗兰出演雷纳塔这一角色，可海明威从来没听说过她。“我现在的的生活是既遮风又蔽雨，与世隔绝呀，”他解释道。“你这人是运气好、可你要经历的事情还多着哩，”

霍奇是霍奇勒的昵称。——译者注

斯克里布纳公司于1985年出版了该书的一个更为浓缩的版本。其介绍性前言是由詹姆斯·A·米舍内写的。

霍奇勒以玩笑似的口吻说。海明威两眼迸射出愤怒的目光。“这句话出自《拳击家》，”他严厉地说：“你意识到了吗？”霍奇勒一不小心确实是引用了这篇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在疯子亚德把尼克·亚当斯介绍给伯格的那部分中出现的。

“见到你很高兴。”伯格说、“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

“芝加哥。”尼克说。

“那城市不错呀，”黑人说：“我还没请教你的名字。”

“亚当斯。尼克·亚当斯。”

“他说他从没发过疯，伯格，”亚德说。

“他这人是运气好，可他要经历的事情还多着哩，”黑人说。——

七

据埃雷拉医生说，海明威在观景庄度过的最后几年里，对自杀的事谈得很多。事实上，他的确不止一次地在众人面前表演过自杀的场面。他会说：“看，我准备这么干。”于是，埃雷拉记得，他会“坐在椅子上，光着脚，把他那支曼利切 256 型步枪的枪托放在客厅的纤维地毯上，置于两腿之间。接着，他身体前倾，把枪管伸进嘴里，枪口顶住上颚。他会用大拇指按下扳机，然后我们便听见喀搭一声枪响。”他微笑着抬起头，结束了表演，说道：“这就是用枪进行‘剖腹自杀’的技术。……上颚是头部最软的地方。”

埃雷拉医生说，在海明威同玛丽的关系中，枪也扮演了一个可恶的角色。“他们的关系变得太糟糕了，”医生回忆道：“我不得不加以干涉，结果我和他打了起来。大约早上四点时，我离开了农庄，那时我觉得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他们已没有生命危险了。因为他们曾用枪相互威胁，我不得不把他们所有的枪都拿走，放进我的汽车里。实际上，我拿走了他们所有的武器，并把这些武器带到了我家。”

1960 年秋天，在凯彻姆，耽于死亡的病态表现已经成为海明威的全部生活，而且这种表现变得比以往更为可怕了。他对霍奇勒、玛丽以及其他所有能听到他说话的人们宣称，联邦调查局正在捉拿他。他还担心，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不会再让他在观景庄住下去；他没有足够的钱付收入税，当地的警长总有一天会逮捕他，因为他在停车场倒车时撞了另一辆车。他无法完成《流动的圣节》的手稿也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写作了。他常常把自杀的念头挂在嘴边。就在感恩节前，他那一直波动不定的血压达到了高压 250，低压 125。

通过这整个秋季，塞维尔斯医生终于逐渐地说服了他，治疗“忧虑”的专家们可以帮他的忙。可是当塞维尔斯提出堪萨斯城托皮卡小镇一家世界闻名的精神病医院的名字时，他却不愿意听。“他们会说我神经失常的，”他说。显然，他已经考虑到了他被禁闭在门宁格诊所的消息会如何影响他的公众形象。况且，他说，心理医生也让他感到害怕，在他所遇到过的心理医生中，没有一个人有幽默感。他所依赖的心理医生就是“便携式三号花冠烟”。对他来说，以 60 岁的年纪在门宁格诊所接受弗洛伊德式的那种治疗，谈论他的幼年，剥掉他层层遮掩的包装，这样——如果他把这件事当真的话——将

玛丽·海明威于 1986 年 11 月去世。在这以前的几年里，她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所以研究海明威生平
的学者们想要同她讨论她所知道的有关她丈夫独特的幼年教养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1985 年，当玛莎·盖

会令他异常痛苦，但他根本不可能这么做。不过，塞维尔斯医生还提到了梅奥诊所，那是一家完全不同的诊所。上那儿去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果他在那儿的消息真的不可避免地传出去了的话，他可以向人们解释说他是因为高血压正在接受治疗。的确，这是他当初能够想到接受的唯一治疗。

11月30日，在塞维尔斯医生的陪同下，海明威乘飞机来到了梅奥的家乡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并以塞维尔斯的名字在圣玛丽医院登了记。经过对小说家的几次会诊，精神病科的霍华德·P.罗姆大夫推荐他去进行一整个疗程的电休克治疗。因为这种疗法代表了一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机械性方法，所以海明威同意接受治疗。

电休克疗法是两位意大利医生在1938年发明的，两年后传入了美国。人们发现，患有严重抑郁症或是妄想型抑郁症的病人经过一个疗程（8—12次）的治疗，病情会迅速减轻。他们还发现，使用电休克疗法会导致病人丧失部分记忆。有些精神病医生宣称，丧失的记忆只包括病人在治疗前六个月和治疗后两个月的事情，而且这种症状会及时消失；但另一些专家则提到了严重的记忆丧失以及脑部组织的损伤。这一疗法的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过一段时间以后，病人的抑郁症还会复发。

尽管对电休克疗法的有效性还没有达成共识，可罗姆医生几乎别无选择，只得向海明威推荐这一疗法。现代的医疗手段，像氯丙嗪之类的安定药和盐酸阿米替林之类的三环抗抑郁药，那时都还没有。海明威患严重的抑郁症已经很久了，因而很明显他现在不可能像过去许多次一样让自己慢慢康复。何况对这位病人来说，交谈疗法事实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除了电休克疗法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961年1月22日，海明威回到了爱达荷州。尽管玛丽曾经气愤地声称：“精神病医生的结论是，治疗已经完成了，”可是由于海明威的住院记录仍在继续封存之中，人们还远远无法搞清楚究竟是罗姆大夫真的这么认为呢，还是他把病人不寻常的愉悦情绪当作了事实上只是表象而已的“健康正在飞速恢复”的表现呢？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海明威急于出院，玛丽从没试着去说服他留下来，而罗姆大夫也无权违背他的意愿把他留在那儿。

一抵达凯彻姆，海明威就拿出了《流动的圣节》的手稿。“又在发愤地工作”，三天后他发电报给在坦噶尼喀农场的儿子帕特里克说。如果这份电报更详细的话，它就会包含以下内容：每天早晨他七点起床，八点半开始工作，直到一点；午饭后小睡一会儿；下午三点左右，上学的孩子们乘坐黄色的校车回家，总会见到一个头戴方格花帽，身穿轻便夹克，脚踩一双重靴子的白胡子老人沿着93号路散步，他们冲他挥手，他也总是挥手呼应。晚餐时，他饭量不多，喝一杯红葡萄酒。

2月6日，在一封写给斯克里布纳公司业务部的小L.H.布拉格的信中，他描述了一番有关他正在创作中的回忆录的进展情况。他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过了一遍，分成了不同的章节；同时，他也正在考虑从他那“惯有的长长的清单上”选一个书名。最重要的是，他正在写另一章，即第十九章，他称这是“最后一章”。

尔霍恩被问及海明威是否对她说过他与马塞利娜是双胞胎时，她断然回答说：“没有。”

从手稿中可以看出，这一章讲的是所谓菲茨杰拉德对他的性器官感到焦虑的事情。但是，在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尺寸的问题”是作为倒数第二章出现的。

他似乎又一次击败了他的无能和愤怒，用写作的魔法驱逐了它们，用对街道、咖啡馆、佳肴美酒、朋友和妻子的回忆治好了病。长时间的工作使得1921年至1926年的巴黎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过去的他。“如果你有幸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巴黎，”1950年他对一位朋友宣称：“那么，无论你的余生在哪儿度过，它总是伴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是一段辛酸的话，后来玛丽就是从中为这本回忆录选择了个书名。

八

《生活》杂志从《流动的圣节》中选了一些章节刊登在1964年4月10日那一期上。三周半以后，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了玛丽编辑的全部原稿第一次印刷达85000册，另外还为“本月新书俱乐部”印了20.4万册。从5月24日到12月6日，这本书一直雄踞于《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排行榜之上，并有19个星期排在第一的位置。总体上说，评论家们对这本书是大为推崇的。斯坦利·考夫曼在《斯共和》中称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小型钻石矿”；《纽约书评》的弗兰克·克莫德说：“就某些方面来讲，（这是）海明威自2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本书。”但是，能够大胆地站出来并且挑明了在许多评论家那里只是暗示了一下意见的人是《赫德森评论》的马文·穆德瑞克。他宣称，海明威能够写出《流动的圣节》，这“证明他在死亡时精神还是健康的。”不过，乔治·普林顿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也许是因为他对海明威在50年代的精神崩溃还记忆犹新。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专栏中写道：“然而尽管他一一列举了佳肴、美酒、巴黎的街道……甚至在描写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幽默的气息，可里面还是有一种混沌与死亡即将逼近的格调。”这个评价持续至今。

回忆录的第一章引导读者进入了一个梦境。像弗雷德里克·亨利和凯瑟琳·巴克利一样，海明威和哈德莉爱得情深意切，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尽管穷困潦倒，他们却看不起富人，因为他们相互拥有，在漫漫长夜里，温暖相依。

然而，在“虚假的春天”那一章末尾，当他和哈德莉在米绍餐厅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接着又在他们漆黑的卧室里做爱之后，回忆录中却第一次暗示了这位健康非常、快乐无边的主人公正经历着某种抑郁之苦。虽说他拥有这些快乐和满足，但是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渴望却并没有在他的心中平息下来。夜里，当他醒来时，他向窗外望去，看着高楼大厦屋顶上的灯光，他仍然能够感觉到那种渴望的存在。他把脸从月光下挪开，埋进阴影里，试图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可是他“太笨了”，竟想不出原因。回想起来，那天早晨生活似乎是那么简单。然而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儿没有一样东西是简单的，回忆者接着以一种更为苍老、更为苦涩的声音评说着。

在有一章的结尾处，回忆录表现出了抑郁情绪对他更为残酷的侵袭。海明威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画家朱尔斯·帕辛一起在圆屋咖啡馆喝酒，他很欣赏他的幽默感也很喜欢他的画。当时，和他们在一块儿的还有两个年轻的模特儿，其中一个金发，另一个是一头黑短发，据她们自己说是姐妹俩。

删减和重新编排段落，拼合各种不同手稿中的材料，重新安排章节顺序，这些都是玛丽主动承担的编辑任务，尽管她在正式出版物的前言中没有提及。相反，她还不太聪明地宣布，是她丈夫于1960年在古巴的时候就写完了这本书。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帕辛问海明威想不想和黑妹妹做爱。海明威回答说：“你大概今天已经和她玩够了吧。”他们继续讲着黄色笑话，直到金发女郎叫了起来：“我已听腻了这种话。”海明威起身要走的时候，他看了帕辛一眼。他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露齿大笑着，这个法国人看起来就像是 19 世纪 90 年代百老汇里的角色。“……后来他自缢身亡时，我还是宁愿记住那天晚上他在圆屋咖啡馆里的模样，”回忆者又接着说。不知不觉地，他引入了对自己的评论：“人们说我们未来行为的种子埋在每个人心里，不过，我总以为在那些游戏人生的人心中，孕育种子的土壤更好，肥料的等级也更高。”

在下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展开了自由的联想，他又一次超越了回忆录表面的时间框架。他谈论着在青年时代就对皮卡比亚和温德姆·刘易斯的绘画不甚喜欢，而埃兹拉·庞德对他们却有极大的热情。

我们从未就这些事情争论过，因为我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总是保持缄默。倘若有人喜欢他朋友的绘画或作文，我想这可能就像有些人喜欢他们的家人一样，指责他们是不礼貌的。有时，要批评家人，不管是你自己的或是结婚以后的家人，可能会经历相当长的一段酝酿时间。而对付那些差劲的画家，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他们不可能做什么恶事，也不会像家人那样亲密地伤害你。对付这种画家，你只要不看他们就行了。可是，即便你学会了不看着家人，也不听他们说话，并且还学会了不回信，家人还是会以许许多多的方式威胁到你。

由于他的母亲曾在 20 年代从事过绘画，海明威从谈论画家转向谈论家人不过是轻松一跃，至于从那儿再转到谈论你最终将学会不写回信这种事实时就更容易了。尽管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格雷丝已去世多年，但这位《流动的圣节》的作者仍然在同她作斗争。

在以后的几章里，“死亡的愿望”这根红线主要是通过有意或无意地选用一些比喻来渐渐展开的。譬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疯人酒吧里多喝了一口香槟之后，脸就变成了死神之头，这个描写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回忆录的作者最能发人深省地暴露出厄内斯特·海明威内心欲望的言辞还是体现在有关厄内斯特·沃尔什的那一章里，该章的题目是“将死之人”。

按照回忆者以恶毒的语言所说的那样，阴险、急切、患有肺结核的沃尔什是一个以死亡谋生的骗子。沃尔什的骗术，换一种说法，就是他的痼疾，他以此换取异性的好感、经济补助和其他作家的同情。他请海明威吃一顿昂贵的午餐，就是要控制他，让海明威为他与别人合编的杂志投稿，并在他自己不得不离开巴黎的时候让海明威去全权负责文章的编印，直到文章印出来。沃尔什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摆出一副“人之将死”的面孔，然后却告诉海明威说他还挺好的，没有什么毛病。“你是说，我不会马上死去？”海明威问。“不，你是注定要活下去的，”沃尔什说。“那就给我时间吧，”海明威说。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就像是与《拳击家》形成了相互呼应。

由玛丽决定选用的该书的最后一章，是献给哈德莉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的痛苦的渴求；不过，也充满了对死的渴求。

海明威说，过去施伦斯没有专用滑雪电梯，也没有缆车，你必须踩着附在滑雪板底面的海豹皮，一连爬上好几个小时。瓦尔特·伦特是滑雪学校的

头儿。他认为滑雪的乐趣就在于要爬到山区的最高处，尽管当雪在夜晚飘落到温暖的山坡上时，那里常常有雪崩的威胁。

“我记得……”这句“咒语”曾经在五个不同的段落中出现，回忆者那时正注视着哈德莉和年轻的自己穿过果园和田野，从掬木和松林中向上爬，最后终于到达了树林以上的高山区。在那儿，海明威看见了一只竖起了前爪的狐狸，还被雷鸟从雪中腾飞时的噪声吓了一跳。回忆者称这是个“奇怪的世界”，可是在他小说的读者们看来，这地方却让人想起了瑞士银装素裹的避难营，在那儿弗雷德里克和怀孕的凯瑟琳共同度过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它还让人想起了非洲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雪皑皑的山顶。包裹在福拉尔贝格的防寒服里，海明威夫妇滑了整整一冬的雪。3月里，各种条件终于能让人一显身手了。“……快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在大冰河上滑行，又平又直，只要双腿能控制好，脚踝保持不变，就能一直向前。我们向前低倾着身子，加速滑行，在冰雪静静的嘶嘶声中永久地永久地向下滑行。”永久地永久地。当说这些话的这位作家从梅奥诊所回来以后，当这位总有死神萦绕在心头的作家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索图斯山的座座山峰时，他也许想象过哈德莉和他自己一起滑雪，一起滑向永恒的情景。

又一个冬天来了，犹如一场“恶梦”，作者突然狂吼着暴怒起来。由于他不肯为任何一次失败的婚姻承担责任，海明威便把第一次的婚姻失败归咎于四个人。虽然他没有点名道姓，可他们的身份显而易见，那就是：杰拉尔德·墨菲、萨拉·墨菲、多斯·帕索斯和保利娜·普法伊弗。一对有钱的夫妇在一个婊子养的“引水鱼”的带领下，教会了一个轻信的年轻人，使他相信每天都在过着圣节，而一个同样也很富有的年轻女人暂时成为了这位轻信的年轻人那同样轻信的妻子的最好朋友，然后她便残酷地行动起来，把这个年轻人从她身边夺走。

如果说这个年轻人他自己也犯了错误，那么他错就错在他的一个决定。那一次，他到纽约去了几天，回施伦斯的路上，他决定在巴黎停留，以便能同那位富有的年轻女人在一块儿呆上一段时间。但是最后，他还是登上了去奥地利的火车，而且当他瞥见在火车站成堆的木头边伫立的妻子时，当他瞥见她那在阳光下现出红色与金色的头发，她那长了一个冬天、笨拙但却美丽的头发时，“我真希望，除了她，我在死之前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

九

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的缓和并没有维持多久。海明威终于永久性地搁下了《流动的圣节》，因为他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据玛丽说，大概是在1961年2月20日那天，海明威想给一本名人亲笔题词录写几句话。一位华盛顿的妇女正在编辑这本书，目的是要向刚刚就职的总流约翰·F·肯尼迪致以敬意。他写了好几个小时，作了十几次尝试，但没有哪一次能达到让他基本满意的水平。玛丽记得，房间里弥漫着绝望的空气。然后塞维尔斯医生来了，给病人量血压。海明威卷起袖子，坐在沙发椅上，他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在他看来意味着一切的那份天赋如今已经抛弃了他。若要描述他此时此刻最后的绝望，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密尔顿写给萨姆森·阿戈尼斯特斯的那四行诗了：

我所有的希望已破灭：内在的天性

似乎都已精疲力竭，无法施展；
我辉煌的历程已尽，耻辱之旅，
不久将伴我共度余生。

3 月间，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呆滞、空洞的眼神让人回想起他父亲的有些相片。一天夜里，玛丽打开电视收看《麦克白》，她觉得这部片子很不错。可海明威却说很恐怖，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啪”地一声关掉了电视。4 月 21 日，玛丽下楼来，发现他站在客厅的前厅里，手中拿着一支他最喜爱的猎枪。面前的窗台上放着两颗子弹。尽管他不怎么搭理，玛丽仍然不停地和他说话，直到塞维尔斯来给他量血压。玛丽打电话又叫了另一位医生，在他的帮助下，塞维尔斯才说服海明威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在那儿他被安排服用了镇静剂。

几天以后，海明威坚持要回家，他说他要拿点需要的东西。一名护士和一个高大强壮的名叫唐·安德森的人就带他回去了。小汽车刚一停下，他便抢在其他人之前冲进了屋，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便抓起一支猎枪，把一粒子弹塞入枪膛，调转枪口，放到了下巴底下。经过一番无声的生死搏斗，安德森终于设法掰开了枪膛，护士把子弹取了出来。海明威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地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医院，然后他的衣服被拿走，锁进了壁橱。

玛丽给他最亲爱的妹妹厄休拉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已深信不疑，自己不可能再被治愈。”但是，当塞维尔斯医生立刻又安排他重进梅奥诊所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在去罗切斯特的路上，他所乘坐的风笛一科曼契式飞机的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城加油。海明威走出机舱，活动活动筋骨，唐·安德森像个影子似地跟在他身后。海明威走进附近的一个机棚，在几个工具箱里摸索了一阵，很明显是在找枪，然后他又转向一架正在滑行的飞机，冲着螺旋桨快步走去。可当飞行员关掉引擎时，他却突然停了下来。风笛一科曼契式飞机再次飞上了天空，他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在余下的旅程里，一路欢快地说笑着。

他被安排住进了圣玛丽医院的“自杀看护部”，有护士值班，还有经管这家医院的嬷嬷们不停地去探视，给他带点东西，问他今天感觉怎样。海明威的精神显得好了一些，也许这些妇女给予他的母爱般的关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 月底的雨季过去了，迎来了 5 月初美丽的晴空。滚滚的热浪又送走了 5 月，并一直持续到 6 月中旬。这时的白天又变得凉爽宜人，夜晚正好甜美入睡。

接受了新一轮电休克治疗之后，他的性欲又重被唤醒。他向罗姆医生抱怨说他欲火难耐，罗姆便给玛丽打电话，叫她到罗切斯特来。由于她太过于欣喜，结果她在丈夫房里的那一晚，用她简洁的话说，“双方都没有完全满足”。

仅仅一两个晚上之后，罗姆医生就给玛丽在罗切斯特卡勒饭店的房间打电话，叫她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他的办公室来。他说他有些好消息要告诉她，或者说她后来就是这样描述罗姆医生所讲的原话。她准时到场，惊奇地发现海明威也在那儿，令她很担忧。他穿着一身便服，咧着嘴在傻笑。

后来，在她多年的孀居岁月里，玛丽对梅奥诊所的精神病科怨声载道。她在自传中写道：海明威“迷惑并欺骗了罗姆医生，使他下结论说他已恢复理智”。玛莎·盖尔霍恩也应声附和说：“梅奥诊所在对海明威的诊治中犯

了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情况也许的确如此，也许并非如此。

生活中的一大讽刺就是：富人、名人和权贵往往还不如常人那样能得到非常严格的治疗，因为医生敬畏他们。海明威不仅仅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还以活力和勇气闻名于世。他来到了罗姆医生的办公室，对他说他想回家（他一定是这样做了）。这种时候，要想勇敢地对抗他，对任何一位医生来说都是个难题。一种可能是，海明威威胁了罗姆医生，说他要通知传媒，他被扣在这儿完全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直到罗姆医生最终只好让步，放他归去。另一种可能是，海明威确实欺骗了医生；毕竟，他一生都在欺骗世人。只有把海明威的档案公诸于众，梅奥诊所才有望澄清关于他出院的种种谣传和质疑。可是，多年来，该诊所面对巨大的压力，却继续坚持医生为病人保守秘密的原则，没有去违反它，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6月26日明媚的清晨，海明威和他的练拳老伙伴乔治·布朗一起乘坐一辆租来的别克车离开了罗切斯特，玛丽坐在后座上。海明威不住地担心，他们可能找不到地方过夜，所以他们常常在下午两三点就到汽车旅店登记住宿。直到6月30日晚上，1700英里的旅程才全部走完。

7月1日星期六傍晚，玛丽和乔治·布朗劝说海明威出去到当地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他在那儿的举动显然显得十分多疑。他们三人在屋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在那儿最不易受到攻击和伤害。这时，他注意到了另一张桌子上的几个陌生人。他唤来女招待苏珊，问她是否知道他们是谁。苏珊猜测说可能是从特温福尔斯来的推销员。“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海明威说。那天夜里，玛丽宽衣解带准备上床时，唱起了一支古老的意大利民歌。正如歌名所暗示的，这首歌的主题是头发：“TuttiMiChiamanoBionde”（“他们都叫我金发女郎”）。海明威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了她的歌声，于是便跟着一块儿唱。歌唱完后，他叫道：“晚安，我的小猫咪。”

尽管家里所有的枪支都被锁进了地下室的储藏间，钥匙却放在一眼便能看到的厨房窗台上。玛丽也曾想到过把它藏起来，但最终又觉得“谁也无权禁止一个人去拿他自己的东西”。星期天早晨七点左右，海明威起床去了厨房。他拿到钥匙，打开储藏间，选了一支他在阿伯克龙比—菲奇商店里买的12毫米口径双管英式猎枪，装上两粒子弹，然后上楼到前厅，掉转枪口对准自己开了火。他的整个头盖骨都给炸飞了，因而分辨不出他到底是把枪管塞进了嘴里还是顶住了额头。

为了等待帕特里克从非洲乘飞机赶回来，葬礼一直推迟到7月5日。在墓地，玛丽和海明威的三个儿子站在一边，他的兄弟莱斯特和三个姐妹马塞利娜、厄休拉以及萨尼（卡罗尔没有参加）排成一排站在另一边。一位和蔼但却有些无能的天主教教士罗伯特·沃尔德曼神父主持了葬礼。在杰克、帕特里克和格雷戈里的要求下，神父同意宣读《传道书》中“日头出来”的那一段，可实际上他拿的《圣经》并非是钦定英译本《圣经》，而且他只读了其中的第一行。

瓦莱莉·丹比—史密斯也出席了葬礼。她此番前来是为了给《新闻周刊》写专访。虽然葬礼的前前后后玛丽对她一直冷若冰霜，可是她发现格雷戈里·海明威对她却十分殷勤。（他们后来结了婚。）厄休拉似乎很孤僻，跟谁都没怎么说话。萨尼大声说，在教堂作祈祷的时候，她在通向圣坛的地毯上看见了一个完美的厄内斯特的头部轮廓，他悲伤的眼睛似乎在恳求她。马塞利娜忙着做笔记，为她正在撰写的那本书积累材料，那本书写的是她在海

明威家族中成长的经历。她对萨尼说，自杀的人是进不了天堂的。她的声音中带着恶意，而这句话实际上是她那位著名的弟弟在他们父亲的葬礼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是一句得罪了她的话。

墓地位于两棵松树之间，面向索图斯群山。对厄内斯特·海明威的遗体来说，这个位置看来正合适。就在他去世前的几星期，他还从梅奥诊所写了一封信给塞维尔斯九岁的儿子弗里茨（他因病毒性心脏病在丹佛住院，六年后病死）。海明威说：“这一带的乡村景色优美。我曾有机会见过密西西比河沿岸一些很不错的地方。在过去伐木的岁月里，人们曾从这儿运送过木头，还有拓荒者北上的痕迹。我看到过一些肥美的鲈鱼在河里跳跃。以前，我对密西西比河上游一无所知，可这儿真是个很美的地方，秋天有许多野雉和鸭子。”尽管他对死充满了疯狂的渴望，可还是能从这个凡尘俗世中感受到乐趣；而且，他还感到有责任去帮助其他身处逆境的人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同往常一样，他的意义和魅力就在于自相矛盾之中。

掩埋在松树下的这个人，并没有倒在战斗中，也没有倒在任何一次对力量和勇气的实际考验之中。他最终输掉的这场战斗是同自己的战斗。无论身在何处，他几乎每一次都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令人惊异地活了下来。19岁时，他在米兰曾感叹道：“……与其在年老体衰、万念俱灭时死去，还不如在这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青年时代死去，让生命在灿烂的光明中消逝。”然而，正是因为青春挡住了他对死亡的向往，他才来得及创下这丰功伟业：他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塑造了一批人物，描绘了众多场景，进而传达了他的思想和经历，表现了真理的精髓。一旦他被年龄和疾病剥夺了写作的能力，一旦他因为害怕不再能够符合他为自己所树立的形象而变得沮丧绝望、萎靡不振时，他内心盘算已久的可能的结局就变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一个充满血腥气味的世纪里，他在血泊中的惨死将会令人难忘。但是，在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中，就像在他留给丹佛医院里的那个男孩子的遗产中，仍然包含着一份礼物，那就是：希望。在他一次次地追求新的历险时，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致；对于自己的艺术，他具有勇敢的献身精神。通过这一切，他向我们肯定了：在这个艰难险恶的世界里，依然还有生的希望。

